马列毛主义者基础书单之复杂劳动与资产阶级法权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编

2023

声明

本pdf文件由志愿者制作，内容搜集自telegram频道“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其频道链接是t.me/proletarianstruggles。

编者简介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我党主张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本报作为全国性质的政治报，通过建立代办员网络、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宣传革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群众。

斗争报将力图对一切引起关注和争论的斗争事件按马列毛主义的精神进行评论，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当中。

联系方式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从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一切资本主义政党的敌人。因此，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客们必然会用尽各种办法攻击我们党，可以预见到阶级敌人的其中一种手段就是**表面上假扮成支持我党**的口吻，**事实上却肆意编造谣言来歪曲我党的主张**，甚至**冒充我党党员发表反动言论，把我们从未说过的话强行按在我们头上**，把我党抹黑成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赤匪或者极端“左”倾的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红卫兵，借此欺骗恐吓小资产阶级群众远离和仇视无产阶级革命派，迫使群众对我们党的纲领和主张保持一无所知的状态。有鉴于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预先发布下列联系方式和 GPG 公钥，以便广大群众能够直接联系我党和了解我们的立场，摆脱资产阶级的谎言。

我们的**公开群组**对所有进步群众开放，只要不发表反动言论都可以留在群内。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审查每一个加入群组的人的真实身份，不可能把警察、自由派、机会主义者等等绝对排除在公开群组以外，这些反革命分子必然潜藏在群众里伺机而动。因此，各平台的**公开群组**里鱼龙混杂，**群成员的言论仅能代表发言者个人，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立场**。不论在墙内还是墙外，只有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和《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上公布和验证过的宣传平台能够代表我们党的正式立场，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自称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骗子。

一、网站

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

jiashigrsyt1.github.io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proletarianstruggles.github.io

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

二、邮箱

佳士工人声援团联络邮箱

jiashigrsyt@protonmail.com

斗争报邮箱

douzhengbao@protonmail.com

三、Telegram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t.me/proletarianstruggles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t.me/JSshengyuan

管理员电报账号

https://t.me/jsgrsyt

https://t.me/zgmzdzygcd

四、Matrix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app.element.io/#/room/#proletarianstruggles:matrix.org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app.element.io/#/room/#JSshengyuan:matrix.org

管理员 Matrix 账号

https://app.element.io/#/user/@jiashigrsyt:matrix.org

https://app.element.io/#/user/@mcpc:matrix.org

五、Keybase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团队

https://keybase.io/team/douzhengbao

管理员 Keybase 账号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

六、XMPP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jsshengyuan@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管理员 XMPP 账号

jsgrsyt@conversations.im

mcpc@yax.im

七、GPG 公钥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pgp_keys.asc

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files.wordpress.com/2023/11/pgp_keys.asc

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pgp_keys.asc

目录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1] 1

一 1

二 1

注释： 2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4

注释： 10

伦敦的 5 月 4 日 13

注释： 19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23

注释： 37

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 39

注释： 44

在美国 48

注释： 49

在英国（机会主义的悲惨结局） 50

注释： 51

在澳大利亚 53

注释：......54
都柏林的阶级战争......56
注释：......59
哈利·奎尔奇......61
注释：......63
第二国际的破产......64
一......65
二......69
三......73
四......79
五......82
六......88
七......96
八......104
九......109
注释：......112
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117
注释：......125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28

毛主席指示......128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6）......130
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134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　第二部分：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育制度......138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景山学校......139
“八·一”学校的“和平演变”......155
看，刘少奇的黑手，是怎样拉着育英小学“和平演变”的？......162
十一学校调查报告......173
芳草地小学调查报告......176
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181
旧教育制度的护法神......181
反攻倒算的司令......184
假共产主义教育的祖师爷......186
戳穿“两种教育制度”的反动本质......191
名为缩小三大差别，实为扩大三大差别......192
用资本主义半工半读冒充社会主义半工半读......195
反面教员的“教育理论”可以休矣......197
考学之道......200

稀奇的“商行”......200
卢布保送......200
苏修在教育方面全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　为苏修反动统治服务......202
鲜明对照......205
在苏修集团大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　苏联高等学校一片乌烟瘴气　苏修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激起苏联人民和学生的满腔怒火......206
特权阶层少爷横行霸道......206
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活标本......207
苏联人民决不饶恕苏修的罪行......208
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210
苏修集团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形形色色......212
“专家治校”......213
“智育第一”......213
灌输毒素......214
追逐名利......214
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216
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217
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219

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221
摧毁修正主义教育的"小宝塔"制……224
"小宝塔"的出笼……224
"小宝塔"的反动实质……225
严重的后果……226
苏修叛徒的铜臭教育……228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七·二一指示）……23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232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233
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235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237
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240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是好……240
一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242
怎样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245
苏修的所谓教育"改革"是什么货色？……248
"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　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250
贫下中农最欢迎"土专家"……251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和提高"土专家"……253

从“土专家”的成长，看农业教育革命的方向......254
揭穿排斥我们入学的阴谋......256
农村的教育阵地我们贫下中农占定了......258
我们就是要登上学校讲台......261
“厂办校，两挂钩”——甘肃省兰州市关于城市中学走工厂办校道路的调查报告......264
工厂办校的几点做法......264
工厂办校后的新变化......267
工农兵齐赞工厂办校好得很......269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271
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271
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282
拜贫下中农为师　一点一滴从头学......282
彻底改造世界观　一颗红心为人民......284
不忘历史的经验　永葆革命的青春......286
广阔的天地　灿烂的前程......288
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291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291

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294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297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300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303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305

依靠群众　开门招生...309

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312

改造教育阵地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关于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工农兵讲师团的调查报告...316

（一）...317

（二）...318

（三）...321

彻底批判“知识私有”观...324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批判刘少奇、陆定一反对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行...328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328

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334

教育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338

注：......342

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的深远意义......343

改革招生制度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谈张铁生同志的“答卷”......350

巩固和发展大学教育革命的成果......355

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362

一......362

二......365

三......366

四......369

评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英雄——切什科夫......371

一、什么“时代的命令”......371

二、什么“当代英雄”......375

三、打倒苏修叛徒集团......379

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招生路线......383

“七·二一”指示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的光辉发展......383

贯彻“七·二一”指示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革命......386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392

如此“全民教育”......398

大搞“天才教育”......398

排斥工农及其子女......399
实行森严的教育等级制......401
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谈点看法（反面教材）......403
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也来谈点看法......408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把学校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战略措施......411
一、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究竟来自哪里？......411
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高等学校的主要表现......413
三、在学校里究竟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417
必须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419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逐步消灭三大差别......426
一......426
二......428
三......434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437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37
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440
关键在党委坚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442
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445
工科院校要为工业生产服务——山东工学院的调查报告......450

苏修教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457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垄断教育领导大权......457
卢布和权力——进入大学的通行证......458
高等学校——繁殖新资产阶级的温床......460
苏修教育造成的严重恶果......462
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永放光芒——兼评“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个口号......464
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评苏修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471
（一）......472
（二）......474
（三）......476
苏联教育的演变及历史经验......478
（一）......478
（二）......481
（三）......486
破除分配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491
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新乡化学纤维厂工程技术人员联系实际学理论，在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502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504

不能把技术当成私有财产......514
让思想冲破“知识私有”的牢笼......516
封闭“苏哈列夫卡”和改造教师队伍......524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调查报告......531
（一）......531
（二）......533
（三）......534
（四）......536
工人技术队伍的生力军——记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538
这才是自己的大学生......538
工作越干越出色......539
安到哪里都起作用......540
知识属于人民......541
资产阶级的领地　修正主义的染缸——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教育......543
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543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领地......544
培养精神贵族的场所......545
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苏修教育......548
高喊“普及教育”，追逐最大利润......548

大搞“天才”教育，资产阶级霸占学校......549
加强军国主义教育，把学校绑上争霸世界的战车......550
推行“专家治校”，维护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551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缩小和消灭是历史的必然——兼斥林彪对干部走“五·七”道路的诬蔑......552
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中的“传动零件”......563
一......563
二......565
三......567
注：......568
附:《传动零件》（苏修短篇小说·梗概）......569
从小说中的农学院看苏修教育......572
一所特别的大学......580
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大措施......589
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594
这笔账必得算一算　清一清——评苏修戏剧《账目两清》......598
附：苏修剧本《账目两清》......604
坚持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正确路线——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612
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619

牢记党的基本路线......625
开门办学　越办越好......630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35
一、深刻认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断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635
二、引导学员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637
三、抓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充分发挥原有教师的积极作用......638
四、坚持开门办学，广大工农兵直接参加培养学员......641
五、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促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642
六、结合生产、科研任务进行教学，在斗争中增长才干......644
七、办农村分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645
八、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646
九、受教育者也办教育，在办教育中受教育......647
十、努力建设一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高、紧密联系群众、团结战斗、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648
工农兵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651
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655
办大学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655
农业大学必须实行“社来社去”......658

农业大学必须办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之中......660
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吗？......663
喜看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669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评彩色故事影片《决裂》......676
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683
一定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686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688
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691
从招生站的一场斗争说起......694
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评彩色故事影片《决裂》......696
一......696
二......698
三......700
“智育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703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大连工学院和红旗造船厂实行厂校结合办学 709
从厂校挂钩到厂校结合......709
课堂大教师多教材新......710
可喜的成果......712
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714

“反对形而上学”是假　否定教育革命是真......720
决不允许旧的招生制度重演......726
批判“知识私有”　坚持教育革命......729
一......729
二......732
三......737
大是大非必须辩论清楚——驳所谓“教育质量下降”的谬论......740
半是谤文　半是挽歌——痛斥苏修对我国教育战线大辩论的诬蔑......744
一......744
二......747
三......749
反动腐朽的苏联教育......752
鼓吹“白专”道路的目的何在？......758
“智育第一”的罪状......761
“知识私有”观念非批判不可......764
驳“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论......769
开门办学不容否定......773
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779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779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为反对教育革命制造舆论 ..781
对十七年的教育怎么估计，实质是对旧学校要不要根本改造的问题 782
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784
右倾翻案风要把教育革命“扭”向哪里？ 788
否认“知识私有”的存在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791
（一） 791
（二） 793
（三） 794
（四） 795
（五） 797
“让位”与篡权..800
共产主义幼芽不可摧——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调查报告 804
（一） 804
（二） 806
（三） 808
反对“社来社去”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朝阳农学院师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811
彻底批判邓小平妄图利用大学培养工人贵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817

邓小平叫嚷“无以为继”，反对与工农划等号，就是要培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工人贵族......817

邓小平鼓吹的关门读书，“重点学理论”，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道路......820

邓小平拼命抓大学，就是要把大学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服务......823

教育革命的一朵新花——记清华业余大学......826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知识私有”观念......831

批判“知识私有”观念，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831

批判“知识私有”观念，促进世界观改造......833

批判“知识私有”观念，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835

苏修教育的不治之症——“分数狂”......838

坚决与工农划等号——驳邓小平攻击大学生当工人、农民的谬论......843

新沙皇与新贵族......849

决不和工人讲平等的新贵族——评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851

反对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就是要培养工人贵族——批判邓小平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罪行......855

必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855

必须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857

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859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新体制调查......................................862

坚持“七·二一”道路　培养工人阶级科技队伍......................................868

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科研所——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而作......................................877

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掩盖科技战线的阶级斗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则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努力把科研所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878

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专家治所”、业务挂帅，把科研单位搞成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我们则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来占领和改造科研阵地......................................882

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鼓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劳动，“关门办所”。我们则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门办科研，坚定地走三结合道路......................................884

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用名利、地位，物质刺激的手段，拉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我们则从造就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目标出发，抓紧知识分子队伍的改造，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逐步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887

五、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鼓吹个人奋斗，专业对口，搞分散主义，技术垄断，冷冷清清地搞科研。我们则大搞群众运动，多兵种联合作战，三结合大会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889
六、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我们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890
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我们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勤俭办科研......891
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大搞专家治所，反对党对科研的领导；我们则坚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892
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894
“社来社去”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897
莫斯科版的“升官图”——评奇文《怎样成为部长》......903
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重要指示的初步体会......907
大学招生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为高等院校实行“三来三去”叫好......915
坚定不移地和工农划等号——沈阳机电学院总结培养普通劳动者的经验......922
培养普通劳动者，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922
和工农划等号，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923
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924

建设一支能和工农划等号的教师队伍..926

关键在建立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头和工农划等号的领导班子
....927

“我和你就不平等”——从苏修文艺作品看苏联社会的阶级对立....................929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1]

摘自 1871 年 9 月 20 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一

马克思以为巴塞尔代表大会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经过检查后，他承认代表大会曾通过这样一个决议[2]。这是良好的愿望；当时他本人也认为这件事是可能的，现在他确信，工联不会赞同这样的联合了。马克思说道，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低薪工人是不能加入的：每天被经济发展从乡村赶往城市的大批工人，长期留在工联外面，而最贫苦的群众从来都进不了工联。出生在伦敦东区的工人的情形也是一样，那里十个工人中只有一个工人参加工联。农民、短工从来不加入这些团体。

工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它们始终是少数。它们不能领导无产者群众，可是国际却对这些人发生直接的影响；国际不需要组织工联来吸引工人；国际主义的思想一下子就把他们吸引住了。这是唯一能取得工人完全信任的团体。

语言的隔阂也阻碍了工联的国际主义团结。

二

马克思不同意斯廷斯对工联的担心[3]；工联——甚至其中组织得最好的，在美国有分支的——如果不转向我们，永远也做不了什么事；工联对英国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4]采取了旁观态度。

自从有了国际，形势就改变了；如果工联想运用自己的力量，那末依靠我们的帮助便什么都能够做到。工联的章程里有一条是禁止工联干预政治的；工联只是在国际的影响下才采取了政治行动。许多年来总委员会都同工联保持着联系；

有过一个委员会[5]；现在总委员会还同三个大城市——曼彻斯特、北明翰、设菲尔德的工联有联系。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丁的记录译的，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草稿校对过

注释：

[1]伦敦代表会议就德拉埃于1871年9月20日在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展开了辩论，马克思在辩论中发表了关于工联的演说。德拉埃的决议草案建议成立工会的国际联合，以便“造成行政权的分散”和建立“未来的真正的公社”。德拉埃这些空想的建议（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前身，其结果必然要否定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遭到了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在发言中还指出了当时英国工联在派系上闭关自守，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放弃政治斗争。同时，马克思也强调指出了国际争取吸引工联参加政治活动、以革命无产阶级的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工联成员的重要性。代表会议否决了德拉埃的草案，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通过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实际任务来加强工会的国际联系（见本卷第454页）。——第694页。

[2]指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其中有一条是委托总委员会实现工会的国际团结（见《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held at Basle，in Switzerland．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1869》．London，［1869］，p．30）。——第694页。

[3]比利时代表斯廷斯在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问题的辩论中，曾表示担心各国工会团体在一旦实现国际团结之后，可能会被英国工联所吞并。——第695页。

[4]指宪章运动，这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按照弗·伊·列宁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6页）。宪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第695页。

[5]指英国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1865年春在伦敦建立了改革同盟，这是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马克思竭力争取实现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在他的影响下，改革同盟不像资产阶级那样要求把选举权只扩大到个别住房的房主和房客，而是提出了给全国所有男性成年居民以普选权的要求。这个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前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由于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执行总委员会所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第695页。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弗·恩格斯

（1885 年 2 月中）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显然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2]；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该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注：在德译本中不是“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而是“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编者注］来实现宪章。这时 1847 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 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该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 1848 年 4 月 10 日[3]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活动［注：在德译本中不是“活动”，而是“政治活动”。——编者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 年的议会改革[4]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5]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注：在德译本中不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而是“一致或

有密切关系”。——编者注］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民族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尔兰［注：在德译本中不是“爱尔兰”，而是“卫星”。——编者注］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呵！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器量较小的［注：在德译本中不是“器量较小的”，而是“沾染市侩习气较深的”。——编者注］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 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注：在德译本中不是“自然而然地”，而是“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编者注］重新出现的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就变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所领导的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反对［注：在德译本中不是“反对”，而是“激烈反对”。——编者注］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而且还容许把它推广到差不多所有部门中去。

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 1848 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逐渐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使工人地位低于雇主或不利于工人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曾经誓死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6]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 年和 1884 年的议会改革[7]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 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注：在德译本中不是“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而是“奇特的命运”。——编者注］。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独立［注：在德译本中不是“独立”，而是“某种程度的独立”。——编者注］，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不得不［注：在德译本中不是“不得不”，而是“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编者注］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气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 1850—1870 年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

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 年有一次危机，1866 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人口［注：在德译本中不是“农业人口”，而是“农业工人”。——编者注］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注：在德译本中不是“工作日”，而是“通常工作日”，不是“恢复”，而是“一定程度的恢复”。——编者注］，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 1848 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尽管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 1848 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注：在德译本中这里加有：“（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

诺先生）”。——编者注］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8]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 1847 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 1866 年的破产之后，1873 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该到来的时候即 1877 年或 1878 年发生，但是从 1876 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赤贫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

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 1883 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9]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 1848—1868 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受保护的”工人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

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况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沾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并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写于 1885 年 2 月中

载于 1885 年 3 月 1 日“公益”杂志第 2 期，并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 1885 年 6 月“新时代”杂志第 6 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公益”杂志，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注释：

[1]“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是恩格斯为“公益”杂志写的，后来这篇文章由他译成德文，刊登在 1885 年 6 月的“新时代”杂志上。恩格斯以后把这篇文章全部包括到 1887 年出版的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见本卷第 292—298 页）里，1892 年他把它包括到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311—325、367—383 页）里。

“公益”(《The　Commonweal》)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1891 年和 1893—1894 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1886 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 224 页。

[2]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 年、1842 年和 1849 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三个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第 224 页。

[3]宪章派原定于 1848 年 4 月 10 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 225 页。

[4]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 1831 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 年 6 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 225 页。

[5]英国的谷物税是根据所谓的谷物法征发的。谷物法的目的是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由于 1846 年通过了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而告结束。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是对土地贵族的一个有力的打击，并且加快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第 225 页。

[6]这里和这一段下面的一些带引号的话是恩格斯转达人民宪章主要要求的内容。——第 226 页。

[7]1867 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改革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 1867 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作获得了选举权。

1884 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 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作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在英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第 227 页。

[8]东头（East-End）——伦敦的东部，包括无产阶级和贫民居住的各区。——第 229 页。

[9]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 1883 年 9 月在南港举行的第五十三次会议的报告”1884 年伦敦版第 608—609 页（《Report of the Fifty-Third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held at Southport in September 1883》．London，1884，ｐ．608—609）。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成立于 1831 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协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形式发表。——第 230 页。

伦敦的 5 月 4 日

恩格斯

（1890 年 5 月 5 日和 21 日之间）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单是因为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它还使我们能够证实各个国家里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他们都同意一点，即无产阶级的节日活动在欧洲大陆所有各国中，以奥地利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而在奥地利的城市中，又以维也纳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因此，奥地利的，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在运动中就取得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就在几年以前，奥地利的运动几乎完全停顿，各德意志省和各斯拉夫省的工人分裂成两个互相敌视的党派，把自己的力量都消耗在内部斗争上面；仅仅在三年以前，如果有人断定说，1890 年 5 月 1 日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会向全世界做出如何庆祝无产阶级的阶级节日的示范，人们一定会报之以嘲笑。当我们必须对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法国仍然消耗着工人力量的那些内部纷争作出自己的判断时，是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的。谁能肯定说巴黎不能做到维也纳已经做到的事呢？

可是在 5 月 4 日这一天，伦敦使维也纳黯然失色了。在全部五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890 年 5 月 4 日，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熟悉一下 5 月 4 日以前的历史。

去年年初，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工人区——伦敦东头——开始逐渐行动起来。1889 年 4 月 1 日成立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Gas Workers’ and General Labourers’ Union），目前会员总数达十万人。这个工会同码头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很多工人冬季在煤气企业做工，夏季在码头做工），码头工人大罢工主要就是

在它的积极协助下举行的，这次罢工使伦敦东部最底层工人也一改其消极状态。[2]目前，在这些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中间，工会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了，而他们那些迄今毫无生气的原有工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然而这新旧工联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旧工联所网罗的都是"有技术的"工人；它们带有闭塞的性质，根本不接纳没有受过行会训练的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就自己促使非行会工人来同它们竞争；它们有钱，但是越有钱，它们就越退化为单纯的患病职工补助会和丧葬基金会；它们保守，千方百计地尽一切可能躲避"可诅咒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新工会则接纳每一个同行；它们基本上是，而煤气工人的工会甚至纯粹是，为了进行罢工而组织的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它们的行列中虽然还不是人人皆社会主义者，但它们至少是坚定不移地只愿意要社会主义者而不要其他任何人来做它们的领袖。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已经在东头积极进行了许多年；在这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最近四年里，他们在几乎全部由工人组成的"激进俱乐部"[3]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最好的场所，他们坚持进行宣传，而且现在已经看出成绩很大。在码头工人罢工时期，艾威林夫人是三位负责分发津贴的妇女之一；海德门先生——特拉法加广场的逃兵[4]——却用诬蔑来答谢她们，说她们硬要罢工基金会为这项工作每星期付给她们每人三英镑。去年冬天也是在东头举行的银镇罢工，几乎完全是由艾威林夫人一人领导的[5]；在煤气工人委员会里，她代表她本人所创建的女工支部。

去年秋天，煤气工人在伦敦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在伦敦南部，却因罢工失败而又被取消了[6]，这向他们充分证明，在伦敦北部，这个胜利果实也绝不是永远保了险的。这些工人坚决响应了艾威林夫人提出的根据巴黎代表大会决议在伦敦为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举行五一节活动的建议，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同某些社会主义团体、激进俱乐部以及东头的另外一些工联一起，

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为此在海德公园组织一次大示威。在发现今年任何想在 5 月 1 日（星期四）举行这种示威的企图必遭失败以后，示威决定改在 5 月 4 日（星期日）这天举行。

为了尽可能使伦敦所有的工人都参加示威，中央委员会天真地对伦敦工联理事会也发出了邀请。这个组织是由伦敦各工联，而主要是“有技术的”工人的那些旧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自然，其中占大多数的目前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工联理事会看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发展大有非它所能控制之势。旧工联也赞成八小时工作日，但是不赞成由法律加以规定。他们对八小时工作日的理解是这样的：八小时的工作付给常规日工资，——每小时的工资照此折算，——但同时也允许每个人一天加班随便多少小时，条件是提高每个小时的加班费，譬如说，提高到相当于平时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工资的数目。因此，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把示威导向这样一个方向，即争取可以按照“自由”协议来规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而不是争取以议会法案形式写成硬性条文的工作日。抱着这样的目的，工联理事会就同前面提到的那位海德门先生的社会民主联盟联合了起来，社会民主联盟是这样一个团体，它仍然以英国社会主义的唯一能救世的教会自居，它完全合乎逻辑地同法国的可能派[7]永远结成了联盟，派代表团参加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五一节活动是一种亵渎圣灵的罪过。对于这个组织说来，运动也已经不是它所能控制的了。但是加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边就意味着服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相反，如果工联理事会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如果节日活动不在 5 月 1 日而在 5 月 4 日举行，那就不是险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五一节活动了，那就可以去参加了。所以，尽管社会民主联盟的纲领中订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样一条，联盟还是满心欢喜地跟工联理事会勾结了起来。

于是，两个以这种古怪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新盟友就对中央委员会要了这样一种狡猾手段，这种手段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大概会被认为不仅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但在欧美工人们看来，却无疑是极端卑鄙的。原来，在海德公园举行人民集会，其组织者应事先向公共工程部（Board of Works）提出申请，并报告具体细节，其中包括取得让用来做讲坛的四轮车在草地上通过的许可。此外还有一条规定是，一经有人申请在公园举行集会，即不得有第二个集会同日在公园举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提出这种申请。这两个为了对付中央委员会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一知道这个消息，立刻就申请 5 月 4 日在公园举行集会，并被批准设立七个讲坛，这一切都是背着中央委员会干的。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这样一来，在 5 月 4 日那一天公园由他们租定了，胜利毫无问题。理事会随后就召开了各工联代表的会议，也邀请了中央委员会派两位代表出席；中央委员会派去了三位代表，其中一位是艾威林夫人。工联理事会在他们面前以全局主持者自居。理事会宣布，只有工会才能参加示威和携带自己的旗帜，也就是说，不许社会主义的组织、政治俱乐部这样做；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民主联盟却能参加示威，这还是一个谜。理事会向会议提出了一个事先拟好的决议草案，草案中恰恰把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条抽掉了；主张恢复这一条的提议既没有加以讨论，也没有提付表决。最后，理事会竟拒绝艾威林夫人以代表的身分参加会议，说什么她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是不对的），尽管理事会主席希普顿先生自己已经足足有十五年的时间，连想也没想干干自己的本行。

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人们对于他们这种狡猾手段很气愤。看来示威似乎已最终地落到只代表着伦敦工人中微不足道的少数的那两个组织的掌握之中了。而且看来对此似乎毫无别的办法，只好去抢夺工联理事会的讲坛了。煤气工人就曾表示要这样干。于是爱德华·艾威林就到公共工程部去，结果争取到破例批准中央委员

会在公园也设立七个讲坛。靠欺骗手段利用示威来达到少数人目的的企图破产了；工联理事会变得和气起来，情愿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央委员会就组织示威一事进行商议。

必须知道示威前的这一段过程，才能理解示威的性质和充分估计它的意义。由不久前投入运动的东头工人们倡议举行的示威，得到了如此普遍的响应，以致两个互相敌视的组织（它们互相敌视的程度并不下于它们共同对举行示威这一基本思想的敌视）也被迫联合起来，以便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利用这次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宣扬劳资平等的保守的工联理事会，另一方面是在不会招致危险时总要大谈其社会革命的标榜激进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施展卑鄙的阴谋诡计，企图靠它们二者都深恶痛绝的示威来大捞一笔资本。由于这些缘故，5 月 4 日的集会分成了两边。一边是眼光超不出雇佣劳动制度框子的保守的工人，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个软弱无力但又热中于权势的社会主义宗派；另一边是不久以前投入运动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对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义[8]听也不愿再听了，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并且要同他们自己选择的同盟军，而不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小集团强加给他们的同盟军一道去争得这种解放。一边是以本身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行会习气的工联和依靠最坏的同盟军的狭隘宗派为代表的停滞状态；另一边是重新觉醒起来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气勃勃的自由的运动。即使眼力最差的人也会一下就看得出，在这次包含两面的集会上，哪一面生气勃勃，哪一面死气沉沉。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人海，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而来的有十万多人，个人加入进来的差不多也有十万人；每一处都是万众一心，斗志昂扬，同时又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与此相反，在勾结起来的反动分子们的讲坛那边，一切都毫无生气；他们的队伍人数少得多，组织得很坏，一片混乱，而且大多数都来迟了，以致有几处在中央委员会那边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工联理事会那边有个别激进

俱乐部的自由派领导人以及某些工联的头面人物参加，可是正是这些组织的一般成员，甚至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的整整四个分部的一般成员在内，却在中央委员会的行列里行进。虽然如此，工联理事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是在中央委员会这边。

许许多多观察了这次示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离开时都已深信，充当伟大自由党的附属品和执票工具达四十年之久的英国无产阶级，已经终于觉醒过来，投入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活动。1890 年 5 月 4 日英国工人阶级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军，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它的漫长的冬眠——一方面是 1836—1850 年的宪章运动遭到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 1848—1880 年工业获得巨大发展的结果——终于打破了。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了战斗队伍。八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风潮一直此伏彼起，时有发生。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团体，但是没有一个超出宗派的水平之上；宣传鼓动家和所谓党的领袖——其中有的甚至是纯粹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都是些没有士兵的指挥官。这差不多总是使我们想起 1849 年巴登运动[9]中著名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上校一名、军官十一名、号兵和列兵各一名。而这些各色各样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还为了争夺对未来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而互相争吵，这种景象更是令人难以乐观。现在，所有这一切将很快像在德国、在奥地利那样停止下来。强大的群众运动将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团体不复存在，它将把士兵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给指挥官指出他们应守的岗位。谁不喜欢这样，可以走开。事情不能没有摩擦，然而事情终能做成。不久以后，比很多人预料的还要早一些，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军将同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成为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坚强有力的大军，大陆和美国的所有同志都将为它热烈欢呼。

写于 1890 年 5 月 5 日和 21 日之间

载于 1890 年 5 月 23 日“工人报”第 2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注释：

[1]“伦敦的 5 月 4 日”一文，是恩格斯在 1890 年 5 月 5 日和 21 日之间，为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写的。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组织根据 1889 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 97）的决定举行了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活动。群众示威和大会——在奥地利最有组织——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进行。

伦敦的工人也有组织地举行了第一次五一节活动，他们是在 5 月的第一个星期日——1890 年 5 月 4 日——举行的，他们的行动使恩格斯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尽管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们和英国机会主义的社会党人海德门，企图对示威进行领导，把示威活动置于妥协性的口号之下，示威还是显示出，伦敦广大工人群众决心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斗争。追随改良主义者的只是一小部分属于所谓工人贵族的工人。绝大多数示威参加者——约有二十万人——都拥护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示威的骨干是煤气企业和伦敦码头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在八十年代带头开始为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工联和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恩格斯出席了示威结束时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杰出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保·拉法格以及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等发表了演说。

“伦敦的 5 月 4 日”一文除载于“工人报”外，还在 1890 年 5 月 29 日“选民报”第 85 号刊登过。1890 年 5 月 31 日“柏林人民报”第 123 号也发表过这篇文章，发表时删去了开头关于奥地利的五一节活动的那部分。——第 69 页。

[2]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

1889年8月12日至9月14日举行的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三万，其他行业的工人三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者的团结（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五万英镑），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以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工联的总数即增加一倍多。——第70页。

[3]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却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71页。

[4]指海德门在1887年11月13日英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特拉法加广场示威当中的行径。大会以与会者同警察发生冲突而告终，有几百人受伤（3人致命），大会的一些组织者被逮捕。在这次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的事变当中，海德门怯懦地躲避了起来。——第71页。

[5]银镇罢工（银镇是东头的一个地方）——1889年9—12月，制造水底电缆和橡胶制品的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约有三千人。他们要求提高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加班工资、节日工资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积极

参加了罢工的组织工作。她在罢工的过程中创建了青年女工联合会。罢工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最后，因为其他工联的工人没有给予支持，银镇工人遭到失败。——第 71 页。

[6]恩格斯指的是 1889 年 12 月至 1890 年 2 月伦敦南部煤气公司的工人举行的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公司老板不遵守前已达成的协议：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只录用煤气工人工会的会员等等。结果工人方面失败了，原因是其他的工联，特别是码头工人工会没有给予足够的积极支援，此外还由于 1890 年罢工运动开始进入低潮。此后，八小时工作日在该公司所属的企业中被取消。——第 71 页。

[7]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 1884 年 8 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 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

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 1882 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的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的原则是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第 72 页。

[8]曼彻斯特主义，曼彻斯特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派别，反映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

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自由党的左翼。

谈到旧工联的曼彻斯特主义，恩格斯是指它们的活动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这些工联的领袖们力图使无产阶级的任务仅限于进行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要求在劳工保护法方面实行某些有利于工人的变更的经济斗争，借此诱使无产阶级离开工人运动的阶级目的。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宣传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阶级和平。——第 74 页。

[9]指恩格斯参加过的 1849 年 5 月至 7 月间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关于这次起义，见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7—235 页）。——第 75 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弗·恩格斯

（1892 年 7 月 21 日）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 1845 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二十四岁。现在我的年纪比那时大了两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使我脸红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 1887 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 年由斯万·容涅先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注：见本卷第 311—325 页。——编者注]是根据美国版序言[2]写成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成的。现代大工业已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

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对一个生意人来说被看做智慧的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拉得尔菲亚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战役[3]以后，连那条规规矩矩的德国老原则也声誉扫地了，那条原则就是：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 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的废除及由它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固然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料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 1844 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只对那些为了免于在竞争中毁灭而必须抓住每一文钱的急需钱财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这样，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其精神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直接矛盾，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

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规模的事业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欺压现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条件，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

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现在已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 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 1885 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 1844 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 1844 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

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 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 1844 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房屋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即详细地一一列举 1844 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这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 1865 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话。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 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 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 1825 年到 1842 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 1842 年到 1868 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 1842 年以后日趋消失。从 1868 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 1885 年 3 月 1 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 6 月的“新时代”第 6 期上。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

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 1847 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 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 1848 年 4 月 10 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 年的议会改革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 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 1848 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以前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 年和 1884 年的议会改革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 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

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 1850—1870 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 年有一次危机，1866 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通常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 1848 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

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 1848 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些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 1847 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 1866 年的破产之后，1873 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 1877 年或 1878 年发生，但是从 1876 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

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 1883 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 1848—1868 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我在 1885 年是这样写的。在 1892 年 1 月 11 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 1885 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 fin de siè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存在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个别分子还须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者

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致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注：詹·凯·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提出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并且公开宣布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反对他们，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外的极大多数当选了。在密德尔斯布罗，一个工人候选人[注：约·哈·威尔逊。——编者注]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以前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可耻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协商，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在英国工人中间统治了几乎四十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管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大大鼓舞英国人的竞赛精神。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现，有格莱斯顿先生执政，新议会就不能开始工作，有新议会在，格莱斯

顿先生就不能做任何事情；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弗·恩格斯

1892 年 7 月 21 日于伦敦

载于 189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 2 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注释：

[1]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 1892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269—587 页）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基本上是作者根据该书 1892 年英国版序言（见本卷第 311—325 页）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译成的德译文。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亦按 1885 年“新时代”杂志第 6 期上的德文照录于本序言中。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的。——第 367 页。

[2]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260—266 页）。这篇文章本来是作为美国版序言写的，但恩格斯后来又改用了另一篇阐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文章（同上，第 345—353 页）做序言。——第 367 页。

[3]1876 年 5 月 10 日，为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拉得尔菲亚开幕。在参加博览会的四十个国家中也有德国。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被迫承认，德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言一出，报界哗然。“人民国家报”在 7 月至 9 月也专门就这件出丑的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

格斯把这个事件叫做工业上的耶拿战役，是借普鲁士军队在 1806 年 10 月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来作比喻。——第 368 页。

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

列宁

（1912 年 10 月 5 日〔18 日〕以前）

大家知道，英国有两个工人政党：一个是现在称作“英国社会党”[103]的社会民主党，另一个是所谓“独立工党”[2]。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出现这种分裂不是偶然的。它由来已久，是由英国的历史特点造成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最早，在很长时间内这个国家曾经是世界的“工厂”。这种特殊的垄断地位为英国的工人贵族，即少数受过训练、收入高的工人创造了比较不错的生活条件。

因此，在这种工人贵族中就产生了市侩的、行会的习气，他们脱离了本阶级，跟着自由派走，嘲笑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独立工党”也就是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党。人们说得有道理，这个党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派则非常依赖。

最近，英国的垄断地位彻底垮台了。早先比较不错的生活由于生活费用飞涨变得极端贫困。阶级斗争大大尖锐起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机会主义的基础日渐崩溃，过去自由派工人政策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得以传布的那种基础也在崩溃。

当很大一部分英国工人还有这种思想的时候，是谈不上消除工人中的分裂的。只要社会民主党还在反对自由派工人政策，靠空话和愿望是建立不了统一的。但是现在，这种统一开始真正成为可能的了，因为就在“独立工党”内部，反对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了。

我们手头有一份该党关于它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即 1912 年 5 月 27 日和 28 日在梅瑟（Merthyr）召开的“第二十届年会”的正式报告。这份报告中关于“议

会策略”问题的辩论非常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是关于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即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策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辩论，虽则发言人没有这样提。

代表大会上的这场辩论是由议会议员乔伊特引起的。他提出了反对支持自由党[3]的提案（关于这个提案我们马上会详细谈到），同他意见一致的康韦支持他的提案，康韦坦率地说，“普通工人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工党[4]在议会中有没有自己的独立路线？”工人愈来愈怀疑工党成了自由党的“俘虏”。“国内日益流行这样的看法：工党只不过是自由党的一翼”。应当指出，议会中的“工党”，其成员不仅有“独立工党”议员，而且有工会选出的议员。后者自称工人议员和“工党”党员，但又不加入“独立工党”。英国的机会主义者做到了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想要做的事情：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议员同所谓无党派的工会议员联合起来了。我国某些孟什维克在 1906—1907 年议论过的臭名远扬的“广泛工人政党”[5]在英国实现了，并且只在英国实现了。

乔伊特为了切实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纯粹是“英国式”的，即没有任何一般原则（英国人是以“实用主义”和不喜好一般原则自豪的；这也就是那种行会习气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提案要求下院的工人团无视（不去理会）自由党内阁可能落到少数地位而不得不提出辞职的种种危险，要求对每个问题都要坚定不移地（steadfastly）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on the merits of the questions）来投票。

乔伊特的提案“抓住了要害”。英国的自由党内阁和整个自由党竭力怂恿工人说，应当把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即反对保守党[6]）；应当保住自由派的多数地位，如果工人不投和自由派一样的票，自由派的多数地位就会丧失；工人不应当孤立起来，他们应当支持自由派。而乔伊特则把问题提得很明确：“坚定不移地”投票，不要顾及自由党内阁垮台的危险，不要根据自由党的利益，而要根据

事情的是非曲直来投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实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

（在“独立工党”的队伍中，马克思主义原则上不被接受，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是根本不用的。）

在党内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立刻攻击乔伊特。而且——也算一个特点！——他们攻击时正象机会主义者那样躲躲闪闪，支吾搪塞。他们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支持自由党。他们用泛泛的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必然地提到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瞧，跟我国的取消派一模一样，每当他们在实际上准备用自由派工人政策来代替工人阶级独立性的时候，总是要格外响亮地叫嚷工人阶级的“独立性”。

机会主义多数派的代表默里提出了“修正案”即反提案，内容如下：

“代表会议认为，工党为了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仍然应当估计到自己的策略可能产生的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后果。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左右它的决定只能是它作为一个政党的自身利益以及谋求增加有利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愿望。”

请把两个提案比较一下。乔伊特的提案明确地要求同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决裂，默里的提案则空洞无物，冠冕堂皇，乍看起来无可争辩，而实际上恰恰是在掩盖其支持自由派的政策。如果默里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在对崇敬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发表演说，他就会毫不费力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美化他的机会主义，会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要求估计到每个事件的一切具体情况，什么我们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什么我们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要“利用冲突”、“抓住”现存制度中“各种矛盾的阿基里斯之踵[7]”等等，等等。

机会主义可以用随便哪一种学说的术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遭遇”的全部特点正在于，不仅工人政党的机会主义，而

且自由派政党的机会主义（如伊兹哥耶夫之流）都爱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把自己打扮起来！但这些术语是打了引号的。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谈梅瑟的第二十届年会吧。

麦克拉克伦表示赞同乔伊特的话。

他说：“一个政党的利益是什么呢？是否仅仅在于保住自己在下院的议员席位呢？如果真是考虑党的利益，那就应当象重视议会内的议员一样，重视议会外的男女工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组织。我们应当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贯彻自己的原则。”

麦克拉克伦援引了关于赫斯威尔监狱事件（关押在狱中的一个小孩被拷打致死）的投票情况。议会中有人提出质询。自由党内阁面临垮台的危险，——英国不是普鲁士，内阁如果只得到少数支持票就要提出辞职。于是，工党议员为了挽救内阁，就投票为拷打者开脱罪责。

麦克拉克伦说，工党老是考虑它的票会对政府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他说，内阁垮台，就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内阁垮台和重新选举的结果，将会是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麦克拉克伦光说“两个政党”，没有用“资产阶级”的字样——英国人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然而，这两个党联合得愈快，对我们的运动就愈有好处。我们的宣传员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议员应该在议会中贯彻的。否则，托利党工人（即保守党人）就永远不会相信自由党和工党有什么区别。即使我们失去议会中的全部席位，但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也比为了取得自由党政府的让步而对它竭力奉承要有利得多！

工党领袖，议会议员凯尔－哈第躲躲闪闪，转弯抹角……说：

“其实我们在议会中并不处于钟摆那样的地位，——自由派同爱尔兰人在议会中比托利党人和工人的联盟强大……我在赫斯威尔监狱拷打事件上投政府的票，是因为确信这样投票实质上是正确的，而不是为了支持政府。拷打当然是事实，

因此我们大家去议会时本来是决心投票反对政府的。但是，我们在议会中听取了对方的意见，原来，虽则监狱长这样残忍是有过错的，但是一般说来，这个监狱还是王国里比较好的监狱。在这种情况下，投票反对政府就错了……〈请看，英国的机会主义者把工党搞成什么样子了：对这位领袖的这种言论没有嘘一声，而竟泰然地听了下去！〉

过错不在‘独立工党’党员身上。煤矿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工党，可是当煤矿工人议员加入工人团后，便暴露出他们原来是自由派。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们只是名义上加入了工党……

乔伊特的提案会使全套议会制度变得荒唐可笑。任何一次投票都必须考虑后果。

……我建议还是将这个提案和修正案搁下为好。”（！！！）

兰斯伯里支持乔伊特的提案说：

“凯尔－哈第毫无根据地把提案说成是愚蠢可笑的，似乎它建议对个别问题投票时不必考虑事情的各个方面。提案建议不要考虑的仅仅是，投票的结果对政府的稳定性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赞同社会主义，厌恶那些通过非正式会议和‘操纵’议员来控制下院的政客们的手腕。我的经验告诉我，过去讨论任何一个提出来的问题总是从这个问题的投票结果对政府的命运会有什么影响着眼的。

工党几乎完全不能使自己同自由党划清界限。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什么立法问题上工党曾经同自由党划清了界限。我们作为一个党，过去在工人保险问题上一直是政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工党过去一向投票赞成政府和政府的计划。

在赫斯威尔感化院问题上的投票情况，使我感到惭愧。明明是一个孩子被拷打，而且是被拷打致死，我们却投票支持政府，为拷打者开脱罪责！我们的‘督办’〈“whips”——监督自己党团投票的指挥者或全权代表〉在议会中四处奔走，

要求工人议员不要使政府遭到失败……教人们违心地投票，就意味着要使我们祖国的民主制的未来遭受致命的打击……”

议会议员菲力浦·斯诺登，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象游蛇那样圆滑，他说：

“我的斗争本能要我投票赞成提案，但是我的良知、我的理智、我的经验提醒我投反对票。我同意，现在的议会制度对那些抱着理想主义和政治热情进入议会的人产生了腐蚀作用，但我并不认为，通过了乔伊特的提案就会产生根本的变化。讨论一件事情的实质，决不能只限于考虑当时的情况。有些问题对于工党，比起任何投票对政府的后果还更重要，例如关于妇女的选举权问题就是这样，然而是否可以忽视对任何小问题的投票的后果呢？如果采取这种政策，就会造成必须经常举行普遍选举，而对公众来说，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了……政策就是妥协。”

投票结果，赞成提案的有 73 票，反对的有 195 票。

机会主义者取得了胜利。这种情况在英国“独立工党”这样的机会主义政党中，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机会主义使这个党的队伍中产生了反对派，这是现在完全肯定了的事实。

反对机会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比他们的德国同志经常采取的做法要正确得多，因为后者维护那些同机会主义者妥协的腐朽行径。由于公开提出自己的提案，引起了一场极端重要的原则争论，这场争论对英国的工人阶级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自由派工人政策是靠机会主义首领们的传统习惯、因循守旧和狡诈圆滑维持的，但是，这个政策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

载于 1913 年 4 月《启蒙》杂志第 4 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22 卷第 122—128 页

注释：

[1]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 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

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35]。

[2]独立工党（I．L．P．）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于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35]。

[3]自由党是英国的一个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代替辉格党的位置而与保守党相对立。19世纪至20世纪初，自由党多次执政，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16—1922年，自由党领袖戴·劳合－乔治领导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20世纪初，在工党成立后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自由党力图保持它对工人的影响，推行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政策，但也不惜公然动用军队来对付罢工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党的势力急剧衰落，它在英国两党制中的地位为工党所取代。——[136]。

[4]工党成立于 1900 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英国的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 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136]。

[5]指孟什维克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 1905 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分册第 208 页）。——[136]。

[6]保守党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贵族的政党，于 19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在老托利党基础上形成。在英国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保守党继续维护土地贵族利益，同时也逐步变成了垄断资本的政党。保守党在英国多次执掌政权。——[137]。

[7]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使他象神一样永生不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踵部即脚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他的脚跟因没有沾上圣

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后来阿基里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跟而死。

______[138]。

在美国

列宁

（1912 年 12 月 7 日〔20 日〕以前）

“美国劳工联合会”[1]（各种工会组织的联合会）第三十二届年会在罗切斯特市闭幕了。这个联合会和迅速成长的社会主义政党同时并存，它是现在还存在着的旧行会传统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传统这些旧事物的残余，这些传统目前还完全支配着美国的工人阶级贵族。

1911 年 8 月 31 日，劳联的会员为 1841268 人。塞缪尔·龚帕斯这个社会主义的死敌再次当选为主席。社会主义工人的候选人麦克斯·海斯（Hayes）得到了 5074 票，龚帕斯得到了 11974 票，而过去龚帕斯当选是一致通过的。美国工会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同“工会工作者”的斗争虽然进展缓慢，但是结果必定是前者战胜后者。

龚帕斯不仅完全相信“劳动同资本协调”的资产阶级神话，而且直截了当地在劳联中奉行资产阶级政策以反对社会主义政策，尽管他在口头上维护工会政治上的完全“中立”！不久以前，美国选举总统的时候，龚帕斯在劳联的正式机关报上转载了所有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共和党和进步党）的纲领，而却没有刊登社会党的纲领！！

就连拥护龚帕斯的人，在罗切斯特代表大会上对他的这种行为也提出了抗议。

美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同英国工人运动的现状一样向我们表明，纯工会趋向和社会主义趋向之间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分歧，这也就是资产阶级工人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策的分歧。这是因为，尽管这些话听起来多么奇怪，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如果工人阶级忘记了自己解放的目标，同雇佣奴隶制妥协，为了使自己的奴

隶地位得到虚假的“改善”，只顾一会儿同这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一会儿又同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那么，工人阶级也是有可能奉行资产阶级政策的。

造成英国和美国资产阶级工人政策特别突出和（暂时）有影响的主要历史原因，是长久以来的政治自由以及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向深度和广度方面发展的各种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贵族，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跟在资产阶级后面亦步亦趋。

在 20 世纪，英国和美国的这种特点正在迅速消失，因为别的国家正在追赶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主义，工人群众正在从生活经验中学习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社会主义在美国和英国胜利的日子就会来得愈早。

载于 1954 年《共产党人》杂志第 6 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22 卷第 231—232 页

注释：

[1]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是美国的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 1881 年。劳联主要联合工人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参加劳联的工会基本是按行会原则组织的。劳联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鼓吹阶级合作，执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并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1955 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同 1935 年建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称作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250]。

在英国（机会主义的悲惨结局）

列宁

（1913 年 4 月 12 日〔25 日〕）

英国工党[1]是一个极端机会主义的、浸透自由派工人政策精神的工人组织，应当把它同英国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即英国社会党[2]和独立工党[3]区别开来。

在英国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社会主义政党是完全公开存在的。但是“工党”却是一部分非政治性工人组织和另一部分自由派工人组织在议会中的代表：这就是说，工党是我国那些辱骂“地下组织”的取消派所希望的那种大杂烩。

英国工党的机会主义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工人贵族”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英国资本特别高的利润。现在这些条件即将成为过去。甚至“独立工党”即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也看到，“工党”已经陷入泥潭。

在“独立工党”的机关报《工人领袖》（《Labour Leader》）[4]最近一号上，发表了这样一条颇有教益的消息：英国议会正在讨论海军部的预算。社会主义者提议削减预算。资产阶级当然否决这项提案，投票拥护政府。

“工党”的议员怎样呢？

15 人赞成削减，即反对政府；21 人缺席；4 人投票拥护政府，即反对削减！！

这 4 个人当中有两个人提出的理由是，在他们的选区里，工人恰恰是在生产军火的工业部门谋生。

这是机会主义所造成的背叛社会主义、背叛工人事业的明显例证。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英国社会主义者中间，正在日益广泛地谴责这种背叛行为。俄国工人也应该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从中领悟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致命危害性。

载于 1913 年 4 月 12 日《真理报》第 85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23 卷第 63—64 页

注释：

[1]英国工党成立于 1900 年，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由工联、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等组织联合组成，目的是把工人代表选入议会。1906 年改称工党。工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同工联总理事会、合作党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所谓全国劳动委员会。工党成立初期就成分来说是工人的政党（后来有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但就思想和政策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组织。该党领导人从党成立时起就采取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领导机构多数人持沙文主义立场，工党领袖阿·韩德逊等参加了王国联合政府。——63。

[2]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 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 年 2 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 年 4 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 1916 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 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63。

[3]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 年 1 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 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63。

[4]《工人领袖》（《Labour Leade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91 年创刊。1893 年起成为独立工党的机关报。1904 年以前的编辑是凯·哈第。1922 年该报改称《新领袖》；1946 年又改称《社会主义领袖》。——63。

在澳大利亚

列宁

（1913年6月8日〔21日〕）

在澳大利亚，新的议会选举已于不久前结束。工党[1]原在众议院中领先，75个议席中占44席。但是，这次工党遭到了失败。现在它只占75个议席中的36席了。自由派成了多数，但这个多数是很不稳定的，因为在参议院的36个议席中有30席是工人的。

在这个国家里，工人在参议院中占优势，而不久前在众议院中也占优势，可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遭到任何危险，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奇特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这种情况常常成为资产阶级著作家发表谬论的借口，不久前，德国工人报刊的一位英国通讯员对这种情况作了解释。

澳大利亚工党甚至在口头上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实际上，这是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而所谓的澳大利亚自由派，则是保守派。

这种在党的名称上奇怪而荒诞地滥用字眼的现象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美国，昨天的奴隶主今天叫作民主党人，又如在法国，昨天的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敌人，今天叫作“激进社会党人”！要想了解政党的真正作用，不要看它的招牌，而要看它的阶级性质和每个国家的历史条件。

澳大利亚是英国的一个年轻的殖民地。

在澳大利亚，资本主义还十分年轻。这个国家才刚刚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国家。大部分工人是英国移民。他们离开英国的时候，正是自由派工人政策在英国几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当时的英国工人群众都是自由派。直到现在，英国多数熟练的、受过训练的工厂工人都是自由派或半自由派。这种情况是英国在上一世

纪下半叶处于特别有利的垄断地位造成的。只是现在，英国工人群众才转向（但转得缓慢）社会主义。

如果说，在英国，所谓“工党”就是非社会主义的工会与极端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的联盟，那么在澳大利亚，工党就是非社会主义的工人工会的纯粹代表机构。

澳大利亚工党的领袖就是工会的官员，这种人到处都是最温和最“顺从资本的”分子，而在澳大利亚则是完全温和的、纯粹自由主义的分子。

使澳洲各国结成统一的澳大利亚的纽带还很不牢固。工党不得不关心这一纽带的发展和巩固，关心中央政府的建立。

澳大利亚工党所推行的正是其他国家的自由派所推行的那一套，即全国统一的海关税率、统一的学校法、统一的土地税和统一的工厂法。

很明显，随着澳大利亚作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终发展和巩固，工人的生活状况会发生变化，自由主义的“工党”也会发生变化，会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工党。澳大利亚的例子是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一般规律的例外的一个佐证。这个一般规律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会产生社会主义的工党。这个例外就是，由于特殊的、对整个资本主义来说是不正常的条件，才会在某个时期产生自由主义的工党。

欧洲和俄国的自由派试图拿澳大利亚作例子来“教导”人民，说阶级斗争是不必要的，他们这样说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要想把澳大利亚的条件（这是一个不发达的、居住着英国自由派工人的年轻的殖民地）搬到其他早已形成为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达的国家去，那是可笑的。

载于 1913 年 6 月 13 日《真理报》第 134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23 卷第 290—292 页

注释：

[1]指澳大利亚工党。该党于 19 世纪 90 年代创建，有许多工会是它的集体党员。——302。

都柏林的阶级战争

列宁

（1913 年 8 月 29 日〔9 月 11 日〕）

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是一个有 50 万人口、工业不很发达的城市。在那里，渗透到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生活的阶级斗争已经激化，成了阶级战争。警察局简直象发了疯，喝醉了酒的警察殴打和平工人，擅自闯入民宅，折磨老弱妇孺。数百名（400 人以上）工人受伤，有两名工人被打死——这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所有杰出的工人领袖都已被捕。发表最和平的言论也要被关进监牢。城市就象一座兵营。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一个和平的、有文化的、文明的、自由的国家里，怎么会燃起这样的战火来呢？

爱尔兰有点象英属波兰，只是在类型上与其说它象华沙—罗兹—栋布罗瓦，不如说它象加里西亚。民族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使这个不幸国家的无产者变得一贫如洗，使农民成了僧侣主义的顽固守旧、愚昧无知的奴隶，使资产阶级成了在民族主义美丽辞藻掩盖下的一支压迫工人的暴君即资本家的队伍，最后，还使行政当局成了惯于采取种种暴力的匪帮。

现在，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即爱尔兰的资产者）取得了胜利：他们即将从英国地主手里赎回自己的土地；他们即将取得民族自治权（为了这个著名的爱尔兰自治[1]，爱尔兰同英国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他们将与“自己的”爱尔兰神父们一道自由地来管理“自己的”国土。

现在，这个民族主义的爱尔兰资产阶级便以宣布要同爱尔兰工人运动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来庆祝自己“民族的”胜利和自己“国家的”成熟。

英国的总督住在都柏林。但是他的权力实际上不如都柏林资本家的领袖，一个姓墨菲（Murphy）的人。这位墨菲是《Independent》报（《独立报》[2]——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的出版者，市电车公司的大股东和经理，都柏林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东。墨菲宣称（当然是代表所有爱尔兰资本家），他准备花75万英镑）将近700万卢布）来破坏爱尔兰的工会。

但这些工会已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继爱尔兰资产阶级坏蛋庆祝自己“民族的”胜利之后出现的是爱尔兰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爱尔兰无产阶级发现了爱尔兰运输工人工会书记拉金（Larkin）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干的领袖。拉金赋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具有爱尔兰人的旺盛精力，他在非熟练工人中间创造了奇迹，这一部分不列颠无产阶级群众，在英国常常由于英国“熟练”（skilled）工人具有那种令人诅咒的市侩式的、自由主义的、贵族的情调而不得不处于同先进工人隔绝的状态。

一种新的气象在爱尔兰工会中出现了。非熟练工人群众给工会带来了空前活跃的气氛。连妇女也开始组织起来，这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未曾有过的现象。就工人的组织情况来说，都柏林很可能成为整个大不列颠的先进城市。这个国家的特点是：天主教神父个个脑满肠肥，而工人则忍饥挨饿、衣衫褴褛，甚至在星期日也穿得很破烂，因为他们买不起节日服装。这个身受双重和三重民族压迫的国家，已开始变成一个拥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大军的国家。

于是墨菲便宣布向拉金和“拉金主义”进行资产阶级的十字军讨伐。一开始就解雇了200个电车工人，为的是在解雇工人期间挑起罢工，从而破坏整个斗争。运输工人工会举行了罢工，要求让被解雇的工人复工。墨菲组织同盟歇业来对付工人。工人则用罢工来回答他们。战争全面展开，怒火在燃烧。

拉金（附带说说，他是因参加爱尔兰解放运动而于1867年被处死的著名的拉金的孙子）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还指出，反对爱

尔兰"自治"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党曾肆无忌惮地号召反抗政府，以革命相威胁，并组织对自治的武装反抗，毫无顾忌地向这个国家散发革命呼吁书。

但是，英国的沙文主义者卡森、伦敦德里、博纳·罗（英国的普利什凯维奇分子，扼杀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这些反动分子可以做的事，却不容许无产者-社会主义者去做。拉金被逮捕。工人集会被禁止。

爱尔兰毕竟不是俄国。剥夺集会自由激起了群众的怒潮。不得不把拉金送交法庭审判。然而在法庭上拉金变成了原告，实际上处于被告地位的倒是墨菲自己。拉金通过同证人的交叉讯问证明，在他（拉金）被捕前夕，墨菲曾同总督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拉金宣称警察是墨菲豢养的，对拉金的这种说法谁也不敢反驳。

拉金被保释出来了（政治自由不能马上取消）。拉金公开表示他无论如何要参加群众大会。果然，他化了装来到会场，并开始向群众发表演说。警察认出是他，就把他抓住并殴打他。开始了为时两天的警棍专政，他们殴打群众，折磨妇女和儿童。警察擅自闯入工人住宅。运输工会会员、工人诺兰被他们活活打死，另一个也因受伤致死。

星期四，即 9 月 4 日（俄历 8 月 22 日），举行了诺兰的葬礼。都柏林的无产者组成了 5 万人的游行队伍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野兽般的警察都躲藏起来了，他们不敢触怒群众，送葬行列秩序井然。一位爱尔兰老人对德国记者说："这次游行示威比安葬帕内尔〈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著名领袖〉时还要壮观。"

都柏林事件将成为爱尔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转折点。墨菲扬言要破坏爱尔兰工会。但他所破坏的只不过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对爱尔兰无产阶级的最后一点残余影响。他促使爱尔兰独立自主的、毫无民族主义偏见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受到了锻炼。

这一点立刻就在 9 月 1 日（俄历 8 月 19 日）于曼彻斯特召开的工会（工联）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了。尽管有充满庸俗习气的、只想讨好上司的机会主义的工

会工作者进行阻挠，都柏林事件还是激起了代表们的怒火。都柏林工人代表团受到了热烈欢迎。五金工会都柏林分会主席、代表帕特里奇讲述了警察在都柏林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一位年轻女工刚躺下睡觉，警察就闯进屋里来了。这个姑娘躲到厕所里，但仍被他们揪着头发拖了出来。警察们喝得酩酊大醉。这帮“人”（带引号的）竟连10岁的儿童或5岁的小孩都要痛打一顿！

帕特里奇由于发表了连法官自己也认为是和平的演说而两次被捕。帕特里奇说：我相信，假如我当众念诵“我的主啊”，我也会马上被捕的。

曼彻斯特代表大会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去都柏林。当地的资产阶级又抓起了民族主义的武器（同我国波兰、乌克兰或犹太人中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模一样！），他们说，“英国人管不着爱尔兰土地上的事”！幸而民族主义者在工人中间已经失去了影响。[注：已经可以听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发出的忧虑，即担心拉金会组织爱尔兰独立工党，对此第一届爱尔兰国民议会也不得不加以注意。]

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很久没有听到过的演说。有人提议整个代表大会迁到都柏林举行，并提议在英国各地组织总罢工。矿工工会主席斯迈利说，都柏林的方式将促使英国所有工人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是一定能够学会掌握武器的。

英国工人群众正在缓慢而坚定地走上新的道路——从维护工人贵族的区区特权转到工人群众自己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进行伟大英勇的斗争。通过这条道路，英国无产阶级凭着自己的毅力和组织性，将比任何地方更迅速、更坚决地实现社会主义。

载于1913年8月29日《北方真理报》第23号和1913年8月30日《我们的道路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3卷第400—404页

注释：

[1]这里说的是爱尔兰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取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政治自治的斗争。爱尔兰自治法案曾不止一次提交英国议会讨论，均未获通过。1912 年，在爱尔兰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爱尔兰自治法案第三次提交议会。该法案于 1914 年 9 月 18 日为英国国王批准。——424。

[2]《独立报》即《爱尔兰独立报》(《Irish Independent》)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机关报（日报），1891 年起在都柏林出版。——425。

哈利·奎尔奇

列宁

（1913 年 9 月 11 日〔24 日〕）

9 月 17 日（俄历 9 月 4 日），星期三，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哈利·奎尔奇（Quelch）同志在伦敦逝世。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成立于 1884 年，称为“社会民主联盟”。1909 年起改称“社会民主党”。而从 1911 年起，一些单独存在的社会主义团体并入之后，又改称“英国社会党”。

哈利·奎尔奇是英国社会民主党内精力最充沛也是最忠诚的工作者之一。他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即党组织的活动家，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的活动家。印刷工人工会伦敦分会曾不止一次选他为主席。他还多次担任“职业理事会”（“Trades Council”）工会联合会伦敦局的主席。

奎尔奇曾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正义报》（《Justice》）[1]的编辑，同时也是党的月刊《社会民主党人》杂志[2]的编辑。

他十分热心地参加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各项工作，经常在党的会议上和民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奎尔奇不止一次代表英国社会民主党出席国际的代表大会和参加社会党国际局。顺便提一下，奎尔奇在出席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时曾遭到符腾堡政府的迫害。符腾堡政府因为奎尔奇在民众集会上称海牙会议为“athief's supper”（直译为：强盗会议）而把他驱逐出斯图加特（未经审讯，按警察局命令，作为一个外国人被驱逐）。他被驱逐的第二天，大会又复会了，英国代表让奎尔奇坐过的椅子空着，在这张椅子上挂了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这是昨天被符腾堡政府驱逐出境的哈利·奎尔奇的坐位。”

德国南部的人常常自夸说，他们厌恶普鲁士人的官僚习气、官僚主义和警察制度，但是一旦问题涉及无产者-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们自己却象最凶恶的普鲁士人那样行动了。

以奎尔奇为领袖的英国社会民主党进行活动的历史条件是极其独特的。在这个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自由的程度来说是最先进的国家里，英国资产阶级（它早在 17 世纪就以相当民主的方式收拾了无限君主制）在 19 世纪就使英国工人运动分裂了。19 世纪中叶，英国几乎完全垄断了世界市场。这种垄断使英国资本获得难以置信的巨额利润。因此有可能从这些利润中拿出一点点给工人贵族——熟练的工厂工人。

这些当时有较为可观的工资收入的工人贵族，封闭在狭隘的、自私的行会性的联合会中，与无产阶级群众隔绝，在政治上站在自由派资产阶级一边。甚至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任何地方象英国那样在先进工人中有这么多的自由派。

但是，19 世纪最后 25 年的情况却有了变化。英国的垄断被美国、德国等所破坏。英国工人中的狭隘的、市侩式的工联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社会主义又重新在英国抬头，日益深入人心，而且不顾英国貌似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极其恶劣的机会主义的阻挠，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向前发展着。

在那些不屈不挠、满怀信心地反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人们中间，奎尔奇走在最前列。诚然，脱离群众有时使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沾染上一些宗派主义的习气。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创始人海德门甚至滚进了沙文主义的泥潭。但是社会民主党对他进行了反击；同时，在全英国只有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十年内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进行系统的宣传鼓动。这是奎尔奇及其同志们的极大的历史功绩。马克思主义者奎尔奇的活动的成果将在最近几年的英国工人运动中充分表现出来。

最后，不能不指出奎尔奇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情和支援。11 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3]不得不在伦敦出版。以奎尔奇为首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非常乐意地让出自己的印刷所。奎尔奇本人不得不因此“挤一挤”，在印刷所里用薄木板给他隔出一个小角落作为编辑室。在这个小角落里安放了一张非常小的写字桌，桌子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摆满书的搁板，还有一张椅子。当时，当笔者到这个“编辑室”拜访奎尔奇的时候，已经没有地方再摆另外一张椅子了……

载于 1913 年 9 月 11 日《劳动真理报》第 1 号和 1913 年 9 月 12 日《我们的道路报》第 16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23 卷第 438—440 页

注释：

[1]《正义报》(《Justice》)是英国一家周报，1884 年 1 月—1925 年初在伦敦出版。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 1911 年起成为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1925 年 2 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1933 年 12 月停刊。——463。

[2]《社会民主党人》杂志(《The Social-Democrat)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1897—1911 年在伦敦出版。——463。

[3]这里说的是《火星报》。该报于 1902 年 6 月—1903 年春在伦敦出版。关于《火星报》，见注 106。——465。

第二国际的破产

列宁

（1915 年 5—6 月）

对于第二国际的破产，人们有时单从形式方面去理解，认为是交战国社会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中断，国际代表会议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无法召开，等等。持这种观点的，有中立小国的某些社会党人，大概甚至还有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正式的党，以及机会主义者和他们的辩护人。在俄国报刊上，弗·科索夫斯基先生以值得深深感谢的坦率态度在崩得的《新闻小报》第 8 号上出来维护这种看法，而《新闻小报》的编辑部连一个字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这位作者的意见。可以预料，科索夫斯基先生这样维护民族主义，以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辩护，定将促使许多工人彻底认清崩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质。

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而不是便于掩饰各种小市民调和派和民族主义反对派意图的东西。觉悟的工人认为，国际的破产就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决议等等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这种背叛，认为看到这种背叛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种背叛。如果以科学的态度，也就是从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就应当说，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它们中间为首的、第二国际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党，已经倒向自己的总参谋部、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所以，不能不对它尽量全面地加以分析。人们早就认为，战争虽然会造成种种灾祸和苦难，但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战争会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过时和僵死的东西。1914—1915 年的欧洲大战也开始给人类带来明显好处：

它向文明国家的先进阶级表明，在他们的政党身上一种令人恶心的脓疮已经成熟，从某处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

一

欧洲主要的社会党是否确实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信念和任务呢？这一点，不管是叛徒自己，还是那些确切知道——或者模糊地猜测到——自己将不得不同叛徒友好和和解的人，当然都是不喜欢谈论的。但是，不管第二国际的各种“权威”或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同伙会感到多么不愉快，我们还是应当正视现实，直言不讳，向工人说明真相。

有没有可以说明社会党在战前和在预测这次战争的时候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和策略的事实材料呢？无疑是有的。这就是 1912 年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现在把它和同年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决议[1]一起翻印出来，让大家回忆一下“已被忘记的”社会主义“言论”。前一个决议总结了各国大量的反战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在昨天的国际和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权威中，无论是海德门或盖得，无论是考茨基或普列汉诺夫，没有一个敢向自己的读者提起这个决议，他们不是对决议只字不提，就是引用（象考茨基那样）其中次要的地方，而回避其全部重要内容；单是这一事实，就不能不叫作背叛。起先通过了最“左的”最革命的决议，后来又最无耻地忘记或抛弃这些决议，这是国际破产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证明今天只有那些无比幼稚、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地想使以往的虚伪永世长存的人，才会相信单靠一些决议就可以“纠正”社会主义运动，“矫正它的路线”。

可以说就在昨天，当海德门在战前转到维护帝国主义的时候，所有“正派的”社会党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没有一个人不是用轻蔑的口气来谈论他。可是现在，

各国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全都完全滚到海德门的立场上去了，他们之间只是在色彩和秉性方面稍有差异而已。因此，对于象《我们的言论报》的作家们这样的人，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在议会里使用的那种比较文雅的词句来评价和刻画他们的公民勇气，因为他们用轻蔑的笔调描写海德门“先生”，而用恭敬的（或者说谄媚的？）态度谈论——或者说避而不谈——考茨基“同志”。难道这种态度能够同尊重社会主义、尊重自己的整个信念相容吗？既然你们肯定海德门的沙文主义是虚伪的和极端有害的，那么，难道不应该把批评和攻击的矛头指向这种观点的更有影响、更加危险的辩护人考茨基吗？

最近，盖得分子沙尔·迪马在他的《我们希望什么样的和平》这本小册子里，可以说是最为详尽地表达了盖得的观点。这位“茹尔·盖得办公厅主任”（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他是这样署名的）“引用”的当然是社会党人过去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声明（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大卫在其最近那本谈论保卫祖国的小册子中也在引用这类声明），而不是巴塞尔宣言！对于这个宣言，普列汉诺夫也默不作声，却洋洋得意地宣扬沙文主义的庸俗观点。考茨基也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引用巴塞尔宣言时略去了其中所有革命的地方（即其全部重要内容！），——大概是借口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警察和军事当局通过书报检查来禁止谈论阶级斗争和革命，这倒“正好”帮了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忙！

也许，巴塞尔宣言不过是一个丝毫没有直接涉及当前这场具体战争的确切的历史内容和策略内容的空洞的宣言吧？

正好相反。巴塞尔决议比起其他决议来，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巴塞尔决议谈的正是这场已经发生的战争，正是 1914—1915 年爆发的这场帝国主义的冲突。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为争夺巴尔干，奥地利和意大利为争夺阿尔巴尼亚等地，英国和德国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俄国和土耳其等国为争夺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而发生的种种冲突，——这就是巴塞尔决议在预言目前这场战争时所

谈的内容。巴塞尔决议正是针对目前“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时指出，“丝毫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然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我们就拿这两个最典型的、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用俄文写作，另一个的著作已由取消派译成俄文）、有威望的社会党人来看——现在却在寻找（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帮助下）各种“人民的”（或者确切些说，从资产阶级街头小报上抄来的所谓老百姓的）“理由”来为战争辩护，他们作出博学的样子，搬出大量经过歪曲的马克思的话，援引 1813 年和 1870 年的战争（普列汉诺夫）或 1854——1871 年、1876—1877 年、1897 年的战争（考茨基）的“实例”，——说实在的，只有那些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信念、没有一点社会主义良心的人，才会“认真”对待这些理由，才会不把它们称之为闻所未闻的狡诈、伪善和对社会主义的糟蹋！让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因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的新杂志（《国际》）如实地评价了考茨基而咒骂它吧，让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海德门之流在“三协约国”警察的帮助下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对手吧。——我们只须用翻印巴塞尔宣言来回答他们，因为这个宣言能使人们看清这些领袖的转变，——这种转变只能称之为叛变。

巴塞尔决议所谈的不是在欧洲曾经发生过的、在 1789—1871 年这一时代甚至是具有典型性的那种民族战争，人民战争，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反对过的革命战争，而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即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王朝利益”的基础上，在两个参战大国集团即奥德集团和英法俄集团都奉行“侵略政策”的基础上发生的战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公然欺骗工人，他们重复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一己的利益而编造的谎言——资产阶级竭力把这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的战争描绘成人民的、防御性的（对于任何一方都是防御性的）战争——并从历史上寻找非帝国主义战争的先例来为这场战争辩护。

关于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早已越出纯理论问题的阶段了。帝国主义就其所有主要特征而言，在理论上已被确定为垂死的、衰朽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为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斗争；这些结论在所有国家的社会党人的大量报刊上已经成千遍地重复过；我们“盟国”的代表法国人德莱齐在《行将到来的战争》（1911 年出版！）这本小册子里已经通俗地说明：这次战争从法国资产阶级方面来说也是掠夺性的。不仅如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已经在巴塞尔一致地正式地声明，他们确信行将到来的战争只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并由此作出了策略上的结论。因此，所谓民族策略和国际策略的区别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参看《我们的言论报》第 87 号和第 90 号上阿克雪里罗得最近的谈话）等等，这些论调都是应该断然加以驳斥的诡辩。这是诡辩，因为对帝国主义作全面的科学的研究是一回事（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它实质上是没有止境的，就象任何科学都没有止境一样），而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成百万份报纸上和国际的决议中阐明了的、社会党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另一回事。社会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而决不要“轻信”那些假话，说什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说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沙文主义者库诺都能够在这方面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等等，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一切表现，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的研究，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究们）是永远不会停止争论的。“根据这一点”就不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去反对背叛了这一斗争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库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不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吗？

在战争爆发后的今天，谁也不敢试试，剖析一下巴塞尔决议并证明它是不对的！

二

但是，真诚的社会党人当初也许是预见到战争会造成革命形势才赞成巴塞尔决议的，而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革命已不可能发生，是吗？

库诺（在《党破产了吗？》这本小册子和许多文章中）正是企图用这种诡辩来替自己转向资产阶级阵营的行为作辩护的；而且我们看到，以考茨基为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通过暗示的形式提出了类似的“论据”。库诺断言，革命的希望已成幻想，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死抱住幻想不放的。可是这个司徒卢威主义者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所有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的人抱有“幻想”，而是装作一个非常高尚的人，竭力把事情都推到潘涅库克和拉狄克这类极左派身上！

现在我们就从实质上考察一下所谓巴塞尔宣言的作者曾真诚地预期革命会来临，但后来的事态推翻了他们的想法这种论调吧。巴塞尔宣言说：（1）战争将造成经济和政治的危机；（2）工人将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一种罪恶，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王朝的野心，为了履行秘密外交协定而互相残杀”的犯罪行为；战争将激起工人的“憎恨和愤慨”；（3）社会党人的责任是利用上述危机和工人的上述情绪来“唤起人民和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4）任何一个“政府”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对自身造成危险”；（5）各国政府“害怕无产阶级革命”；（6）各国政府“应当回想一下”巴黎公社（即国内战争）和俄国1905年的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明确的思想；它们没有保证说革命必将发生；这里的重点是准确说明事实和趋势。谁根据这些思想和论断就说预期的革命的到来已成幻想，谁就暴露了他对待革命采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司徒卢威主义的、警察加叛徒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

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 1905 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 60 年代的德国，在 1859—1861 年和 1879—1880 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已多次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而且被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了，面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已经特别明显地为 1905 年的经验所证实了。试问，1912 年巴塞尔宣言在这方面所预料的是什么，在 1914—1915 年到来的又是什么？

当时所预料的是革命形势，它被简略地表述为“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一革命形势是否到来了呢？毫无疑问，到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他在维护沙文主义方面要比库诺、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这些伪君子表现得更直率，更露骨，更诚实）甚至这样说：“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特殊的革命”（他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战争》1915 年柏林版第 6 页）。政治危机已经存在：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敢担保明天会怎样，任何一个政府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割让领土、被逐出自己国

家（就象比利时政府被逐出比利时一样）的危险。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政府都自己在要求群众表现出主动性和英勇精神。欧洲的整个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已进入了（并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战这天写到这一点的）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如果说考茨基在宣战两个月之后（1914年 10 月 2 日在《新时代》杂志上）竟说什么“政府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强大，各政党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软弱”，这不过是考茨基为了讨好休特古姆们和其他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历史科学的例证之一。政府从来没有象战时这样需要统治阶级各政党意见一致，这样需要被压迫阶级“驯顺地”服从这种统治。这是第一；第二，即使“在战争开始时”，特别是在预期迅速取得胜利的国家内，政府仿佛具有无限威力，全世界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对革命形势的期待仅仅同战争“开始”时的情况联系起来，更不会把“仿佛如何”和实际如何等同起来。

至于说欧洲大战将无比残酷，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看到和承认的。战争的经验愈来愈证实这一点。战争正在扩大。欧洲的政治基础日益动摇。群众处于极端的困苦之中，政府、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为隐瞒这种困苦状态而作的种种努力，愈来愈多地遭到失败。某些资本家集团从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惊人的高额利润。各种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内心忿忿不平，闭塞愚昧的阶层模糊地期待着友善的（“民主的”）和平，“下层”中开始发出怨声——这一切都已存在。而战争拖得愈久，打得愈激烈，各国政府本身就愈是会鼓励而且一定会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号召他们作出非凡的努力和自我牺牲。这次战争的经验，也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人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一次大灾难和任何一次转折的经验一样，使一些人茫然失措，意志消沉，却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大体说来，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除某些国家衰落和灭亡的个别情况外，后者的数量和力量要比前者更大。

缔结和约不仅不能“立刻”中止这一切灾难和各种矛盾的这种极度尖锐化，相反，在许多方面会使最落后的民众都能更加深切地感到和特别明显地看到这些灾难。

总之，革命形势在欧洲大多数先进国家和列强中已经存在。在这方面，巴塞尔宣言的预见完全得到了证实。如果象库诺、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否认这个事实或者不谈这个事实，那就是当面撒谎，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效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4、40、41 号）上，我们曾引用一些材料，说明那些害怕革命的人，那些基督教的小市民牧师、总参谋部、百万富翁们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革命形势的种种征兆已经存在于欧洲。[注：见本卷第 96—97、182—183、206—208 页。——编者注]

这种形势是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还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幻想”，也谈不上什么幻想被推翻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保证过，正是目前这次（而不是下一次）战争，正是现在的（而不是明天的）革命形势将产生革命。这里所谈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和负责的社会党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敢怀疑以上这些就是各国社会党的任务；巴塞尔宣言并没有散布和抱有丝毫“幻想”，它所谈的也正是社会党人的这个任务，即唤起人民，“激励”人民（而不是象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那样用沙文主义麻痹人民），“利用”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效法公社和 1905 年 10 月—12 月的榜样。当今的各个党不执行自己的这

个任务，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它们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它们已经放弃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倒向资产阶级。

三

但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和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这种事怎么会发生的呢？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谈，现在先考察一下“从理论上”为这种背叛辩护的言论。下面我们试就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作一评述。普列汉诺夫（他主要是重复英法沙文主义者海德门及其新信徒的论据）和考茨基（他提出的论据要“精致”得多，表面看起来理论上要充实得多）可以算是这些理论的代表。

在这些理论中，最浅薄的恐怕就是“祸首”论了：人家进攻了我们，我们进行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进行反击。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黄色报刊的滥调的翻版。连如此陈腐庸俗的论调，普列汉诺夫也要狡猾地引用“辩证法”（这是这位著作家惯用的手法）来粉饰一番，说什么为了估计当前的具体形势，首先须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见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1914 年巴黎版；并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第 86 号和第 87 号上对这种论调的重复）。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抽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的一句话，说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党人多次揭露沙皇政府对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等地的侵略计划，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对于经济史和外交史，哪怕是最近 30 年来的，他也一点都没有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目前参战的大

国集团，双方都是以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就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作为他们政策的主要轴心。[注：一位不惜假装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布雷斯福德所著《钢和金的战争》一书（1914 年伦敦版；书内标明的日期是 1914 年 3 月!），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作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已不占突出地位，已经解决了（第 35 页），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现代外交的典型问题”（第 36 页）是巴格达铁路[2]、供给这条铁路的铁轨、摩洛哥的矿山等等。作者很正确地认为，“现代欧洲外交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事件”之一，就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一起反对凯约（在 1911 年和 1913 年）想同德国在共同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允许德国证券在巴黎交易所流通的协议的基础上讲和的企图。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阻止了这种协议（第 38—40 页）。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向较弱的国家输出资本（第 74 页）。英国依靠这种资本而获得的利润在 1899 年是 9000—10000 万英镑（吉芬），在 1909 年是 14000 万英镑（佩什），我们得补充一下：劳合－乔治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说中把利润算成 2 亿英镑，将近 20 亿卢布。卑鄙的伎俩，收买土耳其贵族的活动，替自己的子弟在印度和埃及觅取肥缺——这就是事情的实质（第 85—87 页）。一小撮人从扩张军备和战争中大发其财，拥护他们的是社会和金融家，而跟着拥护和平的人走的则是分散的民众（第 93 页）。一个今天还在高谈什么和平和裁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完全依附于军火承包商的政党的党员（第 161 页）。如果三协约国占上风，它们就会夺取摩洛哥并瓜分波斯，三国同盟将会夺取的黎波里，巩固自己在波斯尼亚的地位，征服土耳其（第 167 页）。伦敦和巴黎在 1906 年 3 月借给了俄国数十亿的贷款，帮助沙皇政府镇压解放运动（第 225—228 页）；英国现在正帮助俄国扼杀波斯（第 229 页）。俄国已经燃起了巴尔干的战火（第 230 页）。——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难道不对吗？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人所共知并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报纸重复过一千次的吗？一个英国的资产者在大战前夕就已经清

清楚楚地看到这点了。而在上述这些简单的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前，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关于德国负有罪责的理论，考茨基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前景”的理论，是多么不成体统的废话，多么使人难以忍受的伪善，多么娓娓动听的谎言啊！]

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克劳塞维茨全集》第 1 卷第 28 页。参看第 3 卷第 139—140 页：“大家都知道，战争只是由政府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以为，战争一开始，这些关系就告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状态。我们的看法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在另一种手段介入的情况下的继续。”]。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

普列汉诺夫的拙劣的沙文主义与考茨基的比较精致的、心平气和的、动听的沙文主义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完全相同的。考茨基在颂扬各国社会党人倒向“自己的”资本家的行动时说道：

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包括同我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这种权利……（见 1914 年 10 月 2 日《新时代》杂志和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这种无与伦比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枚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要知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工人应当向德国工人开枪，德国工人应当向法国工人开枪！

但是，假如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这种论调的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这正是克劳塞维茨在大约 80 年以前所嘲笑的观点：战争一开始，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之间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关系就会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时，“只有”进攻者和防御者，“只有”对“祖国的敌人”的抵抗！帝国主义列强对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许多民族的压迫，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为分赃而进行的竞争，资本分裂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意图——这一切都一下子从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他们自己在战前数十年中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政治”。

这两位社会沙文主义领袖还歪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普列汉诺夫回忆起 1813 年普鲁士民族战争和 1870 年德国民族战争，考茨基则作出最博学的样子证明说，马克思解决过在 1854—1855 年、1859 年、1870—1871 年的战争中哪一方（即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还解决过 1876—1877 年和 1897 年的战争中的同样问题。一切诡辩家向来都爱采取这样的手法：引用一些情况分明完全不同的例子作为论据。他们向我们举出的以前的战争，都是历时多年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即反对异族压迫和反对专制制度（土耳其和俄国的）的运动的“政治的继续”。那时，除了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预先号召各国人民进行这类战争，燃起民族的仇恨，正如马克思在 1848 年和 1848 年以后曾经号召去同俄国作战那样，正如恩格斯在 1859 年曾经燃起德国人对他们的压迫者拿破仑第三和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仇恨那样。[注：顺便说一下，加尔德宁先生在《生活报》[3]上说，马克思在 1848 年曾经赞成进行一场革命战争来反对欧洲那些事实上已证明是反革命的民族，即“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这是“革命的沙文主义”，但毕竟还是沙文主义。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会主义（或十足的轻率，——更正确些应

当说是：和十足的轻率）罢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始终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民族。例如，如果社会主义 1920 年在美洲或欧洲取得胜利，假定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促使本国的俾斯麦分子来反对我们（哪怕起初是在外交上反对），那我们就要赞成向它们进行一场进攻性的革命战争。加尔德宁先生，您觉得这很奇怪吧？那您就是罗普申一类的革命家了！]

把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正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同已经衰朽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了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相提并论，这就等于是把长度同重量相提并论。这就象是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相提并论。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同时，如果不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在勾结起来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社会沙文主义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主义理论的，在我国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有伦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拙劣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伦施，也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致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

我们不必花许多时间来分析这种拙劣的理论。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是在1894 年出版的，20 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的这种“手法”，熟悉他们怎样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贯彻自己的观点和愿望。最近的事态特别明显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这种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很多，形式也很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种：（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在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造”，使它能够为对机会主义作出各种让步进行辩护。（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论述国际破产的原因时还要谈到。

四

一种最精致的、用科学观点和国际观点精心伪装起来的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就是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下面就是他本人对这个理论所作的最明白、最确切和最新的说明：

“英国保护主义运动的削弱，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军的意图，战前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锐减，以及各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1915 年 4 月 30 日《新时代》杂志第 5 期第 144 页）

“……目前这场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可能在这方面具有决定的意义。它可能使金融资本家之间的民族仇恨也达到极点，使军备和军备竞赛的意图加强起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必不可免，从而完全毁掉超帝国主义的嫩芽。到那时，我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预见，将在极大程度上得到实现，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与之俱来的资本主义的道义上的衰亡〈直译是“经营失败，Abwirtschaftung”，破产〉都将大为发展……〈应当指出，考茨基用这种精心雕琢的词儿所指的不过是“无产阶级和会融资本之间的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甚至小资本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敌视”而已〉……但战争也可能有另一种结局。它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请注意这一点！〉可能加速在和平时期要等很久才能达到的那种发展。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即发展到各国之间达成协议，发展到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地步，那么战前曾使资本主义道义上日益衰亡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资本主义的新的阶段自然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新的灾难”，“也许是更大的灾难”，但是“超帝国主

义”“暂时”“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造成一个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期待的纪元”（第 145 页）。

他用什么办法从这个“理论”中得出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根据呢？

他用了下述这样一个对“理论家”来说是相当奇怪的办法：

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说：帝国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战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金融资本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必须转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为比较和平地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则露骨地宣称：既然帝国主义是“必然的”，那我们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考茨基扮演“中派”的角色，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

他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这本小册子（1915 年纽伦堡版）中写道：“极左派”想用社会主义同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对立起来”，就是说，“不仅要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针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进行这种宣传），而且想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看来是很激进的，然而只能把那些不相信能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人统统推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第 17 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考茨基说什么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利用在德国——特别是在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不可能谈论革命行动的机会，“实现”断章取义。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是要求党立刻进行宣传并准备革命行动，而绝不是“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

左派根据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得出革命行动必然性的结论。考茨基却用“超帝国主义论”为机会主义者辩护，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仿佛机会主义者根本没有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只是“不相信”能立刻实现社会主义，期待着在我们面前“可能出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新“纪元”。这种“理论”可以归结而且也只能归结如下：考茨基是借助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新纪元的希望，来为机会主义者和各

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严声明而在目前风暴时期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辩护！

请注意，考茨基在这里不仅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会产生而且必定产生这个新阶段，恰恰相反，他坦率地承认：就连这个新阶段“能否实现”的问题，我也还不能做出判断。确实，让我们看看考茨基所指出的那些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吧。令人惊讶的是，作者竟把“裁军的意图”也算作是经济事实！这就是说，他想在天真的小市民空谈和幻想的掩护下回避那些同矛盾和缓论丝毫不相容的确凿事实。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顺便提一下，这个词根本表达不出他所要说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大和缓。据说：“英国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削弱了。”但这里哪有一点点走向新纪元的趋势呢？美国那种走到了极端的保护主义是削弱了，但保护主义却仍然存在，正象英属殖民地给英国的特权即优惠税率仍然存在一样。让我们回想一下，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完毕。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都确实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只有当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地的无主的土地，而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整个一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种垄断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个过程在英国和美国大概都还没有停止吧？就连考茨基也未必敢否认战争加速和加剧了这个过程）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了，破坏了这种竞争立足的基础，而对世界的瓜分又迫使资本家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武装斗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果认为两个国家中的保护主义的削弱就会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那就太可笑了。

再来看看几年来两个国家资本输出的减少问题。根据统计，例如根据 1912 年哈尔姆斯的统计，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各自在国外的资本约为 350 亿马克（约

170 亿卢布），而英国一个国家就比它们多一倍以上［注：见伯恩哈德·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1912 年耶拿版。乔治·佩什《大不列颠在各殖民地……的投资》，载于 1910—1911 年《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第 74 卷第 167 页。劳合－乔治在 1915 年初的一次演说中估计英国在国外的资本是 40 亿英镑，即约 800 亿马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长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由于例如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大为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会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个国家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

“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这是唯一真正普遍的和确凿无疑的趋势，它不是近几年来才有的，也不是两个国家才有的，而是全世界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趋势。但是为什么这个趋势一定会产生裁减军备的意图，而不是以往那种扩张军备的意图呢？我们可以举任何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炮”公司（和生产任何军事装备的公司）为例。就拿阿姆斯特朗公司来说吧。不久以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15 年 5 月 1 日）报道说，该公司的利润从 1905—1906 年度的 606000 英镑（约 600 万卢布）提高到 1913 年的 856000 英镑和 1914 年的 94 万英镑（900 万卢布）。这里金融资本的交织甚为密切，并且在日益增强；德国资本家“参与了”这家英国公司的事务；英国一些公司为奥地利制造潜水艇等等。国际上互相交织的资本正在做扩张军备和战争的大好生意。谁要以为各国资本联合和交织成统一的国际整体就可以产生裁减军备的经济趋势，谁就等于用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的小市民愿望去代替阶级矛盾的实际上的尖锐化。

五

考茨基以一种十足的庸人的态度来谈战争的“教训”，他把这些教训说成是对战争灾难的一种精神恐惧。例如，他在《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里写道：

“无庸置疑，也无须证明，最迫切地关心世界和平和裁减军备的阶层是存在的。小资产者和小农，甚至许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并不能从帝国主义中得益，对这些阶层来说，战争和扩张军备带来的祸害会大于可能获得的利益。”（第 21 页）

这是在 1915 年 2 月写的！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站到帝国主义者一边，而考茨基却和套中人[4]一样，做出一副异乎寻常的洋洋自得的神态，用一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不断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推翻。这正和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以那些赌咒发誓说现存制度充满基督教理想的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样。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抽去它的一切内容，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意义的“利益”一词，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关于普遍幸福的天真愿望。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和高谈矛盾的和缓，并提出“论据”说，矛盾的尖锐化会招致“不良的后果”。帝国主义就是有产阶级各阶层屈服于金融资本，就是五六个“大”国（其中多数现在都参加战争）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意味着，它们的一切有产阶层都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获得利益，都从压迫其他民族、因自己属于“大”国和压迫民族而身居大有收益的职位和享有特权中获得利益。[注：恩·舒尔采说，到 1915 年，全世界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家的和市政的公债、工商业公司的典契和股票等等在内）总值是 7320 亿法郎。在这个数目中，英国占 1300 亿法郎，美国占 1150 亿法郎，法国占 1000 亿法郎，德国占 750 亿法郎，——这就是说，这 4 个大国共占 4200 亿法郎，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超过其他各国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和掠夺的那些领先的大国民族，获得了多么大的利益和特权（恩斯特·舒尔采博士《在俄国的法国资本》，载于 1915

年柏林出版的《金融文汇》第 32 年卷第 127 页）。对于大国民族来说，“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掠夺其他民族而获得赃物的权利。俄国的帝国主义，如所周知，资本的色彩较淡，可是军事封建的色彩却较浓。]

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资本主义平稳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金融资本可以把某一个国家排挤出而且必将排挤出大国的行列，夺走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英国开战的德国就在这样威胁着英国），夺走小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大国的”特权和额外的收入。这是已由战争证明了的事实。这是早已得到公认的、同一个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那本小册子中也承认过的那些矛盾尖锐化的实际结果。

而现在，当争夺大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却规劝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事情，裁军才是好事，这和基督教牧师在布道的讲坛上规劝资本家说，博爱是上帝的教诲、是灵魂的归依、是文明的道德规范如出一辙，其结果也一模一样。考茨基称之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去为非作歹的规劝。

靠资本输出吗？但是，输出到独立国家（如美国）去的资本已多于输出到殖民地去的资本。靠抢夺殖民地吗？但是，殖民地已全部被抢完而且几乎都在争取解放：“印度可能不再是英国的领地，而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帝国，将永远不会落在另一个外国的统治之下。”（上引小册子第 49 页）“任何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想使自己成为不靠国外供应原料的殖民帝国的任何企图，都一定会使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把它卷入无尽头的消耗战，不让它接近自己的目的。这种政策肯定会导致这个国家整个经济生活的破产。”（第 72 一 73 页）

这难道不是象庸人那样规劝金融家放弃帝国主义吗？用破产来恐吓资本家，就等于劝交易所经纪人不要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因为“许多人都是这样倾家荡产的”。资本就是靠同它竞争的资本家和同它竞争的国家的破产获利，以实现

更高程度的积聚，因此，经济竞争即在经济上促使对手破产的斗争愈尖锐、回旋余地愈“狭窄”，资本家就愈是力求辅之以军事手段来促使对手破产。向土耳其之类的地区输出资本，可以象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那样十分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家比向自由的、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如美国输出资本要多获两倍的利润。这样的地区剩下的愈少，为控制和瓜分土耳其、中国等国的斗争就愈加剧烈。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理论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而考茨基却把一切都变为庸俗的小市民的“说教”，说什么用不着大发脾气，更用不着为瓜分土耳其或抢夺印度而大动干戈，因为“反正长不了”，所以最好还是让资本主义和平地发展……自然，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和扩大市场，那就更好了：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按这种精神来劝导金融家，便成了牧师布道的一个最适当的题目……好心的考茨基几乎完全说服了和劝住了德国金融家：用不着为争夺殖民地而同英国兵戎相见，因为这些殖民地反正很快就要获得解放！……

从 1872 年到 1912 年，英国对埃及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就进行说教：“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第 72 页）“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最好”。（第 70 页）

这是多么严肃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呀！考茨基出色地“修正了”这段不合理的历史，并“证明”说，当初英国人完全不必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埃及，德国金融家也根本用不着发动战争，进军土耳其和采取其他的措施来把英国人赶出埃及！所有这些都是误会，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只是因为英国人还没有领悟到：不对埃及采用暴力，而转向（为了按考茨基的办法扩大资本的输出！）“和平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认为，自由贸易能完全消除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矛盾，这当然只能是他们的幻想。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民主制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但是，我们大家关切的是，这些矛盾能用劳动群众遭受痛苦和牺牲最少的斗争形式来消除”（第 73 页）……

天哪，行行好吧！天哪，饶恕我吧！拉萨尔曾经问道：什么是庸人？他引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回答说：“庸人是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5]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成了不折不扣的牧师。这位牧师在规劝资本家转向和平的民主，并且说这是辩证法：假如起先有过自由贸易，后来又有垄断和帝国主义，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有“超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有自由贸易呢？这位牧师在安慰被压迫的群众，把这个“超帝国主义”说得天花乱坠，尽管这位牧师甚至还不敢说这个东西能否“实现”！有些人维护宗教的理由是宗教可以安慰人，费尔巴哈正确地向他们指出了这种安慰的反动作用，他说：谁要是安慰奴隶，而不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奴隶制，谁就是在为奴隶主帮忙。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1909 年，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资本主义矛盾在尖锐化（这一点谁都没有驳倒过而且是无法驳倒的），承认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即新的“革命时期”的临近。他说，这不会是“过早的”革命，并且说，即使在

战斗开始以前不能否认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是不考虑到起义有胜利的可能，那就是“直接背叛我们的事业”。

战争到来了。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在持续下去，战场在日益扩大。考茨基正在一本又一本地写他的小册子，他驯服地遵从书报检查官的意旨，在小册子中不引用关于掠夺领土和战争的惨祸、关于军火商大发横财、关于物价高涨、关于被动员的工人遭受“军事奴役”等等方面的材料，却一味安慰无产阶级，——援引资产阶级还是革命和进步的阶级的那个时期，即“马克思本人”曾希望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获胜的那个时期的战争作为例子，用一行行一栏栏的数字来证明资本主义“可以”不要殖民地和掠夺，不要战争和扩张军备，证明“和平的民主”更为可取。考茨基不敢否认群众的苦难加剧和革命形势眼看就要真正到来的事实（这一点谈不得呀！书报检查机关不允许……），于是向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献媚，描绘出一幅会使人们“遭受牺牲和痛苦少”的新阶段的斗争形式的“前景”（他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弗·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由于这一点而称考茨基为娼妓是完全正确的。

※ ※ ※

1905 年 8 月，俄国曾出现过革命形势。为了“安慰”愤懑的群众，沙皇答应召开布里根杜马[6]。如果说可以把金融家放弃扩张军备以及他们彼此间达成“持久和平的”协议叫作“超帝国主义”的话，那么布里根的立法咨议制度也就可以叫作“超专制制度”了。我们暂且假定，“交织”在几百个大企业中的成百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家，明天会答应各国人民在战后裁军（我们暂且作这种假定，以便探究从考茨基的拙劣的理论中可以得出哪些政治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劝告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也是对无产阶级的直接背叛，因为没有革命行动，一切诺言、一切美好的前景只能是空中楼阁。

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利息更高的债款等的灿烂前景。不仅如此，它还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很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分裂和腐蚀了无产阶级。考茨基正在助长这一腐蚀，他为了同“自己”国家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们实行统一而赞美战斗的无产者的这种国际分裂！可是竟有人还不了解，老党统一的口号意味着一国的无产阶级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一”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分裂……

六

当上面这段文章写完时，5 月 28 日出版的一期《新时代》杂志（第 9 期）上发表了考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破产”的总结性的议论（他的一篇驳斥库诺的文章的第 7 节）。考茨基把他维护社会沙文主义的一切旧的诡辩和一个新的诡辩加在一起，并且自己作了如下的总结：

“有一种非常荒谬的说法：似乎这场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似乎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似乎德国的、法国的、往往还有英国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对事情不加思考，只听到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了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破产。”

这是一个新的诡辩和对工人的新的欺骗：这场战争——请注意！——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

在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的动摇简直令人吃惊，这位党的领袖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巴塞尔和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明确的正式的声明，就象小偷躲开他刚刚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考茨基在 1915 年 2 月写的《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中曾经断言，这场战争“归根到底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第

64 页）。现在却作了新的保留：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请问，还有别的什么性质呢？

原来还带有民族的性质！考茨基是借助下面这种“普列汉诺夫式的”所谓辩证法得出这种令人惊奇的结论的：

“当前这场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且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他，考茨基，早在 1904 年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使泛斯拉夫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起来，“民主的俄国必然会强烈地激起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那时波兰问题也将尖锐起来……那时奥地利就会崩溃，因为目前把彼此趋向分离的分子束缚起来的那个铁箍将随着沙皇制度的崩溃而断裂”（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考茨基自己从他 1904 年的文章中引来的）……“俄国革命……给了东方的民族要求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得在欧洲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亚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当前这场战争中都正在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 273 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范例！因为“民主的俄国”会激起东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当前这场战争，虽然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不管谁胜谁负都会使许多民族遭到奴役，那也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为“沙皇制度的崩溃”将意味着奥地利由于其民族结构的不民主而瓦解，所以暂时巩固起来的反革命的沙皇政府掠夺奥地利，使奥地利各民族遭受更加惨重的压迫，就使得“当前这场战争”不具有纯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利用所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目的的童话来欺骗愚昧的小市民和闭塞麻木的农民，所以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第二国际的代表，就有权用下述“提法”使群众容忍这种欺

骗行为：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而“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有“民族的”要求。

辩证法变成了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

当前这场战争的民族因素仅仅表现在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点在我们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过[注：见本卷第 164 页。——编者注]）。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如果德国获胜，它就会灭亡比利时，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法国的一部分等等。如果俄国获胜，它就会灭亡加里西亚，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以及亚美尼亚等等。如果“不分胜负”，那么以往的民族压迫就会继续存在。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即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百分之一左右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的继续”。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即只能腐蚀各民族而不能解放各民族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三协约国“解放”塞尔维亚，其实是在把塞尔维亚的自由出卖给意大利帝国主义，以换取它对掠夺奥地利的帮助。

这一切是众所周知的，而考茨基为了替机会主义者辩护，竟无耻地加以歪曲了。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

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的、小市民的或其他的东西掺杂其间。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有人却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这种人不是愚蠢透顶的学究，就是吹毛求疵者和骗子。问题的整个实质就在于考茨基在帮助帝国主义者欺骗人民，他说，“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是民族问题，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 273 页），同时他还援引了“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第 274 页）这个似乎是辩证的论据来“充实”这一论点。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有两股主要的和根本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

考茨基一再重复一种陈腐的诡辩，说什么“左派”把事情描绘成“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这种诡辩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是无耻的故意曲解，因为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所提出的是另外的选择：要么是党参加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骗，要么是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且考茨基还知道，只是书报检查机关保护了他，才使德国的“左派”无法揭穿他那些为了逢迎休特古姆之流而散布的无稽之谈。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群众”和“一小撮议员”的关系问题，考茨基在这里提出一个陈腐不堪的反驳意见：

“我们不谈德国人，免得为自己辩护；可是谁会郑重地断言，象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了社会主义呢？我们先不谈议员和‘领导机关’……〈这里考茨基显然是暗指罗莎·卢森堡和弗·梅林的《国际》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对领导机关的政策，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领导，如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国会党团等等的政策表现出理所当然的轻蔑〉“……可是谁又敢断言，只要一小撮议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 400 万觉悟的德国无产者在 24 小时之内一起向右转，去反对他们从前所追求的目标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件事所证明的当然就不仅是我们党的可怕的破产，而且也是群众〈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可怕的破产了。假如群众真是这样一群无主见的傻瓜，那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来埋葬我们了。”（第 274 页）

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最高权威卡尔·考茨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和一整套可怜的遁词把自己埋葬了。谁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在社会主义方面就毫无希望；正因为这样，梅林和罗莎·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在《国际》杂志上把考茨基之流当作最卑鄙的人物来对待，是做得唯一正确的。

不妨想一想：当初能够多少自由地（就是说不至于立即被捕入狱，不会有被枪毙的危险）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的，只有“一小撮议员”（他们有权自由地投票，他们完全可以投反对票——即使在俄国也不会因为投反对票而遭到殴打和迫害，甚至逮捕），一小撮官吏及记者等。现在考茨基却慷慨地把这个社会阶层的叛变和无主见推到群众身上，而正是这位考茨基多年来数十次地写文章谈到这个阶层同机会主义的策略和思想之间的联系！一般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条首要的最根本的准则，就是要求著作家去考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即大声疾呼地唤醒人们反对叛变的派别和不认为有叛变的派别）之间现在的斗争同过去整整数十年的斗争的联系。考茨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提到，甚至根本不想提出派别和思潮的问题。过去有过一些思潮，现在再也没有了！现在只有奴性

十足的人一向当作王牌来使用的那些“权威”的鼎鼎大名了。因此，可以特别方便地互相援引，并以互相包庇的原则友好地掩盖自己的“罪过”。尔·马尔托夫在伯尔尼的一次讲演会上惊呼：既然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都……那怎么能说这是机会主义呢！（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6 号）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呼声报》第 86 号和第 87 号）：指责象盖得这样的人是机会主义者，应当格外慎重。考茨基也在柏林随声附和道：我不打算为自己辩护，但是……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杜鹃恭维公鸡是因为公鸡恭维了杜鹃。

考茨基象奴仆一样献殷勤，甚至去吻海德门的手，把他描绘成只是在昨天才投身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可是，在同一家《新时代》杂志和全世界数十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关于海德门的帝国主义，已经谈论多年了！如果考茨基有兴趣认真研究一下他提到的这些人物的政治履历，那他就一定会想起：在这些人的履历中不是有一些特征和事件足以表明，他们倒向帝国主义不是“一天之内”而是几十年内酿成的结果吗？瓦扬没有当过饶勒斯派[7]的俘虏吗？普列汉诺夫没有当过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的俘虏吗？盖得派[8]不是在典型的死气沉沉、庸碌无能、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独立见解的盖得派的《社会主义》杂志[9]上当众死亡了吗？在米勒兰主义问题上，在开始同伯恩施坦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以及在其他方面，考茨基本人（我们给那些十分恰当地把考茨基同海德门及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的人作个补充）没有表现出无主见吗？

但是，他丝毫也没有兴趣以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领袖的履历。他甚至也不打算考察一下，这些领袖现在是用他们自己的论据，还是捡起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论据来为他们自己辩护？这些领袖的行为所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特殊的影响，还是因为他们附和了别人的、真正“有影响的”、得到军事机构支持的派别即资产阶级派别？考茨基根本就没有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蒙蔽群众，用权威的鼎鼎大名来震聋群众的耳朵，不让他们明确地

提出有争论的问题并全面地加以研究。[注：考茨基举出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象伦施和亨尼施之类的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者（更不用说机会主义者了），他们举出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就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们是有权举出这些人的。他们说他们与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所采取的实际上是相同的政策，这是事实。然而，考茨基却是以轻蔑的口吻谈论伦施和亨尼施这些已经投靠帝国主义的激进派的。考茨基很感谢上帝，因为他不象这些税吏[10]，他不同意他们，他仍然是个革命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事实上，考茨基的立场同他们是一样的。满嘴甜言蜜语的假仁假义的沙文主义者考茨基，要比呆头呆脑的沙文主义者大卫和海涅、伦施和亨尼施可恶得多。]

"……400 万群众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一起向右转……"

这里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 400 万，而是 100 万，况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象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当时人们是向这一小撮人征询意见、号召进行投票表决的；只有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不仅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驱散和赶走，这完全不是"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军事机构现实地存在着，这个机构里面没有领袖叛变的事，它把"群众"一个个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们的劝告），要么被枪毙。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

考茨基竭力想击败自己的对手——左派，硬把一些荒唐的东西加在他们身上，说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应当"在 24 小时之内"制造出一个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

“无主见和叛变”。这纯粹是胡说，资产阶级和警察用他们编撰的文理不通的小册子“打击”革命者的时候，向来就是借助于这种胡说的，而现在考茨基却拿它来炫耀。考茨基的左派对手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的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注：顺便说一下，为此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都停办，用这种办法来回答不许写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禁令。象《前进报》那样接受不写这类内容的条件，是卑鄙和怯懦的表现。《前进报》由于这样做而在政治上死亡了。尔·马尔托夫的这句话是说对了。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公开的报纸，只要我们声明这些报纸不是党的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它们只是为一部分工人的技术性需要服务的即非政治性的报纸。可以有评价战争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可以有不作这种评价的公开的工人报刊，它不说谎话，但也不谈真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

考茨基知道得很清楚，德国的“左派”所指的正是这样的行动，或者确切些说，类似的行动，但他们在实行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无法直接地公开地谈论这些行动。不惜一切代价为机会主义者辩护的愿望，使考茨基干出了前所未有的卑鄙勾当：他躲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背后，把明显的胡说硬加在左派头上，相信书报检查官会保护他不被揭穿。

七

考茨基要尽各种手腕，故意避开一个学术上和政治上的重要问题，以此博得机会主义者的无限欢心，这个问题就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怎么会背叛社会主义的呢？

当然，我们不应当从某些权威的个人履历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将来为他们写传记的人研究问题应当包括这个方面，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现在所关心的绝不是这一点，而是要研究社会沙文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源、条件、意义和力量。（1）社会沙文主义是从哪里来的？（2）什么东西给了它力量？（3）怎样同它作斗争？只有这样来提出问题才是严肃的，而把目标转移到“个人”身上，实际上不过是回避问题，要弄诡辩家的手腕。

要回答头一个问题，就必须研究一下：第一，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否同社会主义运动中原先的某种思潮有联系？第二，从事实上的政治划分来看，社会党人现在分为社会沙文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这种划分同历史上原先的划分有什么关系？

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肯定在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场战争中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十分明显，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政治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属于同一种思潮。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 1914—1915 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战争使这种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并且把在促成这种思想的一般的因素和起因中又加进了一系列特殊的因素和起因，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普通的分散的群众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这种情况自然使拥护机会主义的人增多，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许多昨天的激进派倒向这个阵营。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战争使这种联合具有特别突出和强制的性质。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自然的继续，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注：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者多么重视“大国的”民族特权对于分裂工人、引诱他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意义。英国帝国主义者柳卡斯在《大罗马和大不列颠》（1912 年牛津版）一书中，承认在现代的不列颠帝国中有色人种没有充分的权利（第 96—97 页），并且指出：“在我们的帝国中，当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之间并不是同等的关系，白种工人倒象是有色人种工人的监工。”（第 98 页）——反社会民主党人帝国联盟的前任书记埃尔温·贝尔格尔在《战争爆发后的社会民主党》（1915 年版）这本小册子中，赞扬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并且声称他们应当成为“纯粹的工人政党”（第 43 页），即“本民族的”、“德国的工人政党”（第 45 页），而不要有“国际主义的空想的”、“革命的”思想（第 44 页）。——德国帝国主义者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论述国外投资的一本著作中（1907 年版），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民族福利”（第 438 页），即抢夺殖民地，而称赞英国工人讲“现实主义”，例如，称赞他们反对外来移民。——德国外交官吕多费尔在一本论述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的书中强调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资本的国际化丝毫也不能消除各国资本为争夺权

势、争夺“股票的多数”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第 161 页），而且指出，这场激烈的斗争把工人也卷了进去（第 175 页）。书上注明的日期是 1913 年 10 月，当时作者很明白地谈到：“资本的利益”（第 157 页）是现代战争的起因，“民族趋势”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的“难题”（第 176 页），各国政府用不着害怕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主义的游行示威了（第 177 页），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已经愈来愈成为民族的了（第 103、110、176 页）。如果国际社会主义能使工人摆脱民族的影响，那么它就会取得胜利，因为单靠暴力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民族感情占了上风，它就会遭到失败（第 173—174 页）。］自然，习惯的力量，比较“和平的”演进所养成的墨守成规，民族偏见，对于形势的急剧转折的恐惧和怀疑，——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用假话加以掩饰的同机会主义的怯懦的调和（借口所谓同机会主义调和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得到加强。战争改变了数十年来所形成的机会主义的面貌，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使它的流派数量更多，种类更加五花八门，使它的信徒的队伍扩大了，用许多新的诡辩丰富了他们的论据，可以说是使许多新的支流和小溪同机会主义的主流汇合起来，但主流并没有消失，而是相反。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以致这个资产阶级脓疮已经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了。

不愿意正视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人，抓住个别情况和“特殊案例”，说什么某某机会主义者成了国际主义者，而某某激进派分子倒成了沙文主义者。但是，这一点在各种思潮的发展的问题上根本不是什么郑重的论据。第一，工人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即无产阶级和小市民中从“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中分享一点油水的少数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群众，反对全体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第二，两种思潮的思想政治内容也相同。第三，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 年）社会党人分为机会主

义派和革命派的旧的划分，大体上是与现在分为沙文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新的划分相一致的。

为了认识刚才提到的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应当记住一条原则：在社会科学中（如同在整个科学中一样），研究的是大量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情况。就拿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法国和比利时这 10 个欧洲国家来说吧。在前 8 个国家中，社会党人的新的划分（按国际主义）是与旧的划分（按机会主义）相一致的：在德国，机会主义的堡垒《社会主义月刊》杂志（《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堡垒。国际主义的思想得到极左派的支持。在英国，英国社会党内国际主义者约占 3/7（根据最近的统计，赞成一项国际主义决议的有 66 票，反对的有 84 票），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工党＋费边派＋独立工党）中国际主义者不到 1/7［注：人们通常只拿“独立工党”来同“英国社会党”作比较。这是不对的。不应当看组织形式，而要看实质。拿日报来说吧：日报有两种，一种是英国社会党的《每日先驱报》，另一种是机会主义联盟的《每日公民报》。这两种日报是进行实际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基本核心——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成了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虽然叫喊得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即使根据 1910—1914 年这 5 年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在俄国群众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的。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是“真理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他们是 1912 年 1 月重新建立了党的先进工人的代表。

在意大利，比索拉蒂之流的纯粹机会主义的党，已经成了沙文主义的党。代表国际主义的是工人的党。工人群众都拥护这个党；机会主义者、议员、小资产者则拥护沙文主义。在意大利，人们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自由地进行了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与普通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阶级地位的差别相吻合的。

在荷兰，特鲁尔斯特拉的机会主义政党对沙文主义一概采取调和态度（不要被如下情况所迷惑：荷兰的小资产者同大资产者一样，特别憎恨最可能“吞掉”他们的德国）。培养出彻底的、忠诚的、热忱的和信念坚定的国际主义者的则是以哥尔特和潘涅库克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瑞典，机会主义者的领袖布兰亭，对于人们斥责德国社会党人为叛徒这件事大发雷霆，而左派领袖霍格伦却宣称，在他的支持者中间，有些人正是这样看的（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在保加利亚，反对机会主义的“紧密派”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11]）上撰文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干了坏事”。在瑞士，机会主义者格雷利希的支持者乐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辩护（见他们的机关报——苏黎世的《民权报》），而激进得多的罗·格里姆的支持者则把伯尔尼的报纸（《伯尔尼哨兵报》）变成了德国左派的机关报。10个国家中只有法国和比利时两个国家例外，然而我们看到，就在这两个国家里，其实也不是没有国际主义者，只是国际主义者（部分地是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力量过于薄弱，受到压制；我们不要忘记，瓦扬自己在《人道报》上也承认，他从自己的读者那里收到过许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

总的说来，就思潮和流派而言，不能不承认，正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机会主义派在正式的党中的那种力量，那种貌似的强大从何而来？考茨基是很善于提出历史问题的，特别是在谈到古罗马之类的同实际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事情时更是如此，可是现在，当事情涉及他本人的时候，却假惺惺地装作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事情是最明显不过的。给了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以巨大力量的是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的联盟。在我们俄国，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常常这样看问题：机会主义者是社会党的一部分，在社会党内一向就有而且将来还会有处于两个极端的派别，

问题只在于避免“走极端”，等等，等等，——一切庸人的箴言录中都是这样抄写的。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在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当象赫罗斯特拉特[12]一样出名的机会主义者休特古姆明显地昭示了这个社会的、阶级的真理的时候，许多好心肠的人都惊叹不止。法国社会党人和普列汉诺夫也指责起休特古姆来，——可是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如果照一照镜子，那么在镜子中看到的正是休特古姆，只是民族面貌稍微不同罢了。赞扬考茨基而又为考茨基所赞扬的德国中央委员们（“执行委员会”）也急忙谨慎、谦虚和客气地声明（没有指休特古姆的名），他们“不同意”休特古姆的路线。

这是可笑的，因为事实证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中，在关键时刻，一个休特古姆的力量要胜过一百个哈阿兹和考茨基（正如一家《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力量要胜过害怕同它分裂的布鲁塞尔联盟的所有各个流派一样）。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休特古姆背后有一个大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它们千方百计地支持休特古姆的政策，而对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政策却用尽一切办法，直到监禁和枪杀，来加以阻挠。休特古姆的声音可以通过千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传播出去（正象王德威尔得、桑巴和普列汉诺夫的声音一样），而休特古姆的反对者的声音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报刊为人们所听到，因为有战时书报检查存在！

大家都同意，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但是对这一真理的意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好想过的。机会主义是由合法主义培育起来的。1889—1914 年时代的工人政党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是应该的。而当危机到来时，就必须转向秘密工作（要实

行这种转变，必须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还要有各种军事计谋）。要阻止这一转变，只要一个休特古姆就够了，因为，用历史哲学的语言来说，整个“旧世界”都支持休特古姆，——因为，用实际政治的语言来说，休特古姆会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一切作战计划泄露给资产阶级，过去一向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

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党（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所做的只是休特古姆喜欢的事情，或休特古姆能够容忍的事情。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合法地去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有正当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都是违背它的中央机关的意见，背着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进行的，都是违反组织纪律进行的，都是用派别活动形式以一个新党的匿名的新的中央机关的名义进行的。今年 5 月 31 日《伯尔尼哨兵报》上登载的德国“左派”的匿名的呼吁书[13]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一个新的党正在发展、巩固和组织起来，这是真正工人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列金、休特古姆、考茨基、哈阿兹、谢德曼之流的旧的腐朽的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党。[注：有历史意义的 8 月 4 日投票之前所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典型的。正式的党用官场式的谎言掩盖了这一事件，说多数作出了决定，说大家一致投了赞成票。但是施特勒贝尔在《国际》杂志上揭穿了这一谎言，道出了真情。当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为两派，他们都准备好了最后通牒，即派别性的、分裂性的决定。一派是机会主义者，约 30 人，他们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投赞成票，另一派是左派，约 15 人，他们决定（不太坚决）投反对票。当没有任何坚定立场的“中派”即“泥潭派”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投票时，左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就服从了！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统一的”，这纯粹是谎话，它实际上掩盖了左派不得不服从机会主义者的最后通牒的真相。]

所以，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保守的《普鲁士年鉴》[14]上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他说，假如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了，对于机会主义者（应读作：资产阶级）反倒有害，因为那样工人就会离开这个党了。机会主义者（和

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这样的党，即把右派和左派联合起来的、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圆滑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把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精神，这是说给人民群众，说给工人听的；行动上是休特古姆主义，即在出现任何严重危机的时刻投靠资产阶级。我们说任何危机，是因为不仅在战争的情况下，而且在每次发生严重的政治罢工时，无论是“封建的”德国，还是“自由的议会制的”英国或法国，都会立刻以各种名义实行戒严。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怀疑的。

上面提出的如何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由此就可以得到解答了。社会沙文主义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它经过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的漫长时期已经如此成熟，如此巩固，如此厚颜无耻，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如此明确，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如此密切，以致人们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派别在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继续存在了。如果说在外省的小城市的平坦的人行道上行走穿薄底软鞋还可以将就的话，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时候就非穿有铁钉的厚底鞋不可了。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越过了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比较和平的阶段。它随着1914—1915 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除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

当然，这样规定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新时代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任务，从中还不能直接看出，在各个国家，工人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究竟会有多快，究竟会采取何种形式。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分离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政党的全部政策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1914—1915 年这场战争是个非常巨大的历史转折，使人们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对待机会主义。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变成没有发生的事情，机会主义者在危机时刻成了工人政党内那些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分子的核心这个事实，既不能从工人的意识中，也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经验中以及整个当代

的政治成就中抹掉。从整个欧洲来说，机会主义在战前可以说是处于少年时代。随着战争的爆发，它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不能重新回到“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了。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长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既不能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不能使它停住，——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做的，就是勇往直前，从预备性的、合法的、做了机会主义俘虏的工人阶级组织，变为革命的、能够不限于合法活动的、能够不受机会主义叛变的危害的无产阶级组织，发动无产阶级“为政权而斗争”、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

由此可见，那些用怎样对待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最有名的权威这一问题，来模糊自己的意识和工人的意识的人，对事物的看法是多么不正确。事实上，这里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这些人理解不了新的任务，那他们就只好站到一边去，或者象现在这样做机会主义者的俘虏。如果这些人能够摆脱“俘虏”的处境，那么他们要回到革命者的阵营未必会碰到什么政治上的阻难。想以个别人的作用问题来代替各种派别的斗争以及工人运动的时代的更迭问题，无论如何是荒谬的。

八

工人阶级的合法的群众性组织，也许是第二国际时代社会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德国党内，这些组织曾是最有力量的，所以 1914—1915 年这场战争在这里造成了最急剧的转变，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很显然，要转向革命的行动，警察就会解散合法的组织，而旧的党，从列金起到考茨基都包括在内，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不管怎样否认这一点，事实终究

是事实。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组织，为了这碗红豆汤[15]，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

就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卡尔·列金的《为什么工会的官员应当更多地参加党内生活？》（1915年柏林版）这本小册子来说吧。这是作者1915年1月27日在工会运动官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列金在他的报告中宣读了而且在小册子中也转载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文件，这个文件在其他场合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绝对不会通过的。这个所谓“为下巴尼姆区〈柏林近郊〉讲演人提供的资料”的文件，阐述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表示了他们对党的抗议。文件中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预见到、也没有可能预见到下面的一个因素：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竟会站到进行战争的政府的一边，这全部力量竟会被用来压制群众的革命劲头。”（列金的小册子第34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文件中的下面这样一个论断也是正确的：

“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投票表明，另一种观点，尽管它已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也只有不受经过考验的党的领导，只有违背党的机关的意志，只有在克服党和工会的反抗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贯彻。”（同上）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组织从外表看可能会被消灭，但其精神会继续存在，这种精神在实行非常法期间曾经鼓舞了党并且帮助了党去克服一切困难。”（同上）

列金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提到，他召集来听他的报告的那一伙“领袖们”，即那些被称为工会领导人、官员的人，听到上面这些话哄堂大笑起来。在危机的时刻可以而且应当建立秘密的（象在非常法时期那样的）革命组织——这一思想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而列金这条资产阶级最忠实的看家狗还拍着胸脯叫嚷说：

“这显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破坏组织，以便让群众去解决问题。我毫不怀疑，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说得对！”——自称为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袖的资产阶级奴仆们齐声喊道。（同上，第 37 页）

这个场面是颇有教益的。这些人竟被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弄得如此腐败和神智不清，他们甚至不能理解必须有另一种组织即秘密组织来领导革命斗争的思想。他们竟至于认为似乎得到警察许可而存在的合法组织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似乎在危机时刻完全可以保存这种组织作为领导机构！请看，这就是机会主义的生动的辩证法：合法组织的单纯发展，愚蠢而诚实的庸人单纯记流水帐的习惯，使得这些诚实的小市民在危机时刻成了奸细、叛徒，成了群众革命劲头的扼杀者。这不是偶然现象。向革命组织过渡是必要的，已经改变了的历史情况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时代要求这样做，但是这种过渡只有越过旧领袖即革命劲头的扼杀者，越过旧的党即摧毁这个党，才能实现。

反革命的小市民自然会嚎叫：“无政府主义！”正如机会主义者爱·大卫在责骂卡尔·李卜克内西时曾经嚎叫“无政府主义”一样。看来，在德国，只有那些被机会主义者责骂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才仍然是忠诚的社会党人。……

我们可以拿现代的军队为例。它是组织的一个好榜样。这种组织好就好在它灵活，同时能使千百万人具有统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一声动员令下，他们就会集合在指定的地点。今天他们还趴在战壕里，有时一连几个月，明天他们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冲锋陷阵。今天他们奇迹般地避开枪林弹雨，明天他们又会在短兵相接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埋设地雷，明天他们又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示向前推进几十里。有着同一目标、受同一意志鼓舞的千百万人，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

而不断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他们的工具和武器，——这才是真正的组织。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不具备足以引起群众的激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的是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筹划，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用来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抓住安乐椅不放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你被剥夺了选票，而有人把步枪或精良的最新式的速射炮给你，那你就把这些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理睬那些害怕战争的感伤主义者的嘟囔抱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必须用火与铁来消灭，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如果群众中愤恨和绝望的情绪日益强烈，如果具备了革命的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用的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

不用说，这是不容易的。这须要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这须要付出重大的牺牲。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同样必须学会，而不经过错误和挫折是学不到本事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同参加选举之间的关系，犹如冲锋同演习、行军或趴战壕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这种斗争形式被提到日程上来并不是常有的事；但它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将延续几十年之久。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的那几天，会等于其他历史时代的几个二十年。

……拿卡·考茨基同卡·列金对照一下吧。

卡·考茨基写道：“当党还小的时候，任何反对战争的抗议，在宣传上所起的作用都相当于一次勇敢的行动。……最近俄国和塞尔维亚同志的行为就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党愈是强大，在它的各项决议的动机中宣传上的考虑和对实际后果的估计就愈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给这两种动机以同等的重视就愈是困难，而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因此，我们愈是强大，在每次出现新的复杂的形势时我们中间就愈是容易发生分歧。”（《国际观点和战争》第 30 页）

考茨基的这种议论同列金的议论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的虚伪和怯懦。考茨基事实上是支持和袒护列金之流背弃革命活动的卑鄙行为的，不过，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不明确表示意见，用种种暗示来敷衍，只是不断地既向列金鞠躬，也向俄国人的革命行为致敬。这种对待革命者的态度，我们俄国人只是在自由派那里才经常看到：自由派时刻准备承认革命者的“勇敢”，但同时他们丝毫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策略。有自尊心的革命者决不会接受考茨基的这种“赞扬”，他们一定会愤怒地唾弃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如果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如果当时没有必要宣传革命行动，那么，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行为就是不妥当的，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正确的。但愿列金和考茨基这样的骑士们至少有勇气来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愿他们把它直率地谈出来。

如果说俄国和塞尔维亚的社会党人的策略值得“赞扬”，那么为德国、法国等“强大的”党的与此相反的策略作辩护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行为，犯罪的行为。考茨基故意用“实际后果”这个含混不清的用语掩盖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些强大的党当时都害怕政府解散它们的组织，没收它们的经费，逮捕它们的领袖。这就是说，考茨基是用革命策略会引起令人不快的“实际后果”这一理由来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的。难道这不是糟蹋马克思主义吗？

据说，有一位 8 月 4 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柏林的一次工人集会上说：不然我们就会被逮捕起来。而当时工人们大声回答他说：“啊，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假如没有别的信号向德国和法国工人群众传达革命情绪和必须准备革命行动的思想，那么，一个议员因敢于讲话而被捕这件事，就会起很好的作用，成为要求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号召。要达到这种团结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站得高、能看到政治全局的议员就更应当带头做起了。

不仅在战时，而且无疑在任何政治形势尖锐化的时刻（更不用说群众起来采取某些革命行动的时刻了），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也总是要用解散合法组织、没收经费和逮捕领袖以及诸如此类的“实际后果”来进行威胁的。那该怎么办呢？能象考茨基那样以此为理由去为机会主义者辩护吗？但这样做就无异于赞美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行为。

对于社会党人，结论只能有一个：“欧洲”各党的纯合法主义、唯合法主义已经过时了，帝国主义以前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这种合法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的基础了。必须建立秘密的基地，即秘密的组织和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作为合法活动的补充，同时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合法的阵地。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只要我们愿意走这条路，只要我们意识到必须走这条路，那经验会告诉我们的。俄国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 1912—1914 年已经证明，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在法庭上比别人表现得更加坚定并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工人代表穆拉诺夫清楚地表明，除能当部长的（从韩德逊、桑巴、王德威尔得到休特古姆和谢德曼，这后两个人也完全“能当部长”，只是人家没有让他们由门厅再往里走罢了！）议会活动外，还有非法的和革命的议会活动。让科索夫斯基和波特列索夫之流去赞赏或容忍奴才们的“欧洲式的”议会活动吧，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诉工人说，象这样的合法活动，象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这样的社会民主党只应该受到鄙视。

九

现在我们来作一个总结。

第二国际破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欧洲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令人触目惊心地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庄严的决议。但是，这种意味着机会主义完全得胜、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变成了民族主义

自由派工人政党的破产，正是第二国际整个历史时代（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产物。这个时代——从西欧完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代——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育了机会主义。这个时期，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总的说来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而发生的（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俄国）；我们在欧洲的另一些国家中看到各个派别之间由于同样的原因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瑞士）。这场大战所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常规，割破了早已熟透了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因此，在组织上把这种成分从工人政党中彻底清除出去，已经不可避免了。帝国主义时代不容许在一个党内同时存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和工人阶级中由于“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的特权而分享一点油水的半小市民式贵族。说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党中的“合法派别”，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的欺骗和妨害工人运动的最大的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露骨的机会主义，不象这种中庸理论这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为机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用种种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最著名的代表和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权威考茨基，已经表明自己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在拥有百万党员的德国党内，凡是多少忠诚、多少有觉悟和多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不愤懑地唾弃这种为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之流所热情维护的“权威”。

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旧领导层大概有将近十分之九的人已经投靠了资产阶级）在沙文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在戒严和战时书报检查的压力下，处于四分五裂和束手无策的境地。但是战争所造成的日益扩大、日益深化的客观革命形势，正在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情绪，正在锻炼和教育一切最优秀、最有觉悟的无产者。象俄国 1905 年初由“加邦请愿事件”引起的那种群众情绪的急速转变，在今天

不仅是有可能发生，而且可能性愈来愈大；当时俄国在几个月里，有时甚至在几个星期里就从落后的无产阶级阶层中涌现出跟着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前进的百万大军。我们不可能知道，在这次战争之后不久或在战争期间是否会爆发强大的革命运动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只有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的工作，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工作。国内战争的口号是能够概括和指导这一工作的口号，是能够促使一切愿意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反对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人联合和团结起来的口号。

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分子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分裂，是由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准备好了的。一些人无视这个历史，激昂慷慨地反对“派别活动”，因而无法理解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的多年斗争中形成的这一实际的建党过程，这种人是在给工人运动大帮倒忙。在参加目前这场战争的所有“大”国当中，俄国是在最近经历了革命的唯一的国家。尽管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革命的资产阶级内容不能不造成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派别同无产阶级派别的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有联系的组织（而不象 1883—1894 年那样仅仅是一种思潮）已存在了大约 20 年（1894—1914 年），在这整个时期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别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一直在进行着斗争。1894—1902 年这个时期的“经济主义”[16]，无疑是属于后一种派别。它的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论据和特征——“司徒卢威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用“群众”作借口来为机会主义辩护等等——同现在考茨基、库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极为相似。提醒现在这一代社会民主党人，让他们能看到过去的《工人思想报》[17]和《工人事业》杂志[18]同现在的考茨基的类似之处，是大有好处的。

以后一个时期（1903—1908 年）的“孟什维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是“经济主义”的直接继承者。在俄国革命时期，它所奉行的策略，客观上

等于让无产阶级依附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倾向。再往后一个时期（1908—1914 年），孟什维主义思潮的主流产生了取消主义，当时这个思潮的阶级作用变得非常明显，就连孟什维主义的优秀代表也不断地反对《我们的曙光》集团的政策。而就是这个最近五六年来唯一在群众中不断进行活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派别，在 1914—1915 年的战争中成了社会沙文主义派！而且这种现象是发生在专制制度依然存在、资产阶级革命还远未完成、百分之四十三的居民还压迫着大多数“异”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极少数工人贵族能够“享受”“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特权的这种“欧洲”式的发展，在俄国也不能不表现出来。

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整个历史为他们实行“国际主义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彻底革命的策略做好了准备。

附言：这篇文章排完字的时候，报上发表了考茨基和哈阿兹同伯恩施坦的联名“宣言”[19]。他们看到群众在向左转，于是便准备同左派“讲和”，当然，讲和的代价是同休特古姆们保持“和好”。真不愧为娼妓！

载于 1915 年 9 月《共产党人》杂志（日内瓦）第 1—2 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26 卷第 209—265 页

注释：

[1]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于 1912 年 9 月 20 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决议。该决议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强调争取和平的重要性。决议指出：“虽然只有通过铲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才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物，但不能放弃任何旨在减少其一般性危险作用的工作。党代表大会决心尽一切可能促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保卫和平。党代表大会要求通过国际协定来结束军备竞赛，因为它威胁和平，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党代表大会希望，党员同志要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为扩大觉悟了的无

产阶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组织而奋斗，以便更强有力地反对专横跋扈的帝国主义，直到它被打倒为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保障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独立和自由”。——[224]。

[2]巴格达铁路是20世纪初人们对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波斯湾的铁路线（全长约2400公里）的通称。1903年土耳其把修建这条铁路线的租让权给予德国，曾大大加剧了各大国之间的矛盾。这条铁路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尚未建成，它是由英法两国的公司于1934—1941年最后修建完成的。——[235]。

[3]《生活报》（《жизнъ》）是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于1915年3月在巴黎开始出版，以代替当时被查封的《思想报》。该报后来迁到日内瓦出版，1916年1月停刊。——[237]。

[4]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此人对一切变动担惊害怕，忧心忡忡，一天到晚总想用一个套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244]。

[5]出自德国诗人约·沃·欧德格言诗集《酬唱集》中的《悭吝》一诗。在这首诗里，歌德劝诫年轻人不要犹豫不决，不要成为灵魂空虚的怯懦的庸人。——[247]。

[6]布里根杜马是俄国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由以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拟定，于1905年8月6日（19日）和沙皇的诏书一起公布。按照法令和条例，多数居民，包括工人、妇女、军人、学生等，没有选举权；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49]。

[7]饶勒斯派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 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 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255]。

[8]盖得派是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 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 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 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 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盖得、马·桑巴参加了法国政府。1920 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56]。

[9]《社会主义》杂志（《Le Socialisme》）是法国社会党人茹·盖得创办和主编的刊物，1907 年至 1914 年 6 月在巴黎出版。——[256]。

[10]这里是借用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 18 章的话，其中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象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象这个税吏。……’”法利赛人在圣经中被认为是伪善者。——[256]。

[11]《新时代》杂志（《ново време》）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紧密派的科学理论刊物，1897 年在普罗夫迪夫创刊，后来迁到索非亚出版。1903 年起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的机关刊物。该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是季·布拉戈耶夫，撰稿人有加·格奥尔吉耶夫、格·约·基尔科夫、赫·斯·卡巴克奇耶夫、瓦·彼·柯拉罗夫等。杂志曾于 1916 年 2 月停刊，1919 年复刊。1923 年被保加利亚政府查封。自 1947 年起，《新时代》杂志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月刊。——[263]。

[12]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 4 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 356 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264]。

[13]指卡·李卜克内西写的呼吁书《主要敌人在本国!》。该呼吁书刊登于 1915 年 5 月 31 日《伯尔尼哨兵报》第 123 号，标题是《强有力的警告》。——[265]。

[14]《普鲁士年鉴》（《Preuβische Jahrbücher》）是德国保守派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月刊，1858—1935 年在柏林出版。——[266]。

[15]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 25 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268]。

[16]经济主义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

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4—156 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6 卷第 1—183 页）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276]。

[17]《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мысдь》）是经济派的报纸，1897 年 10 月—1902 年 12 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 16 号。头儿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 5 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276]。

[18]《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 年 4 月—1902 年 2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12 期（9 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276]。

[19]指爱·伯恩施坦、胡·哈阿兹和卡·考茨基的联名宣言《当务之急》。该宣言发表于 1915 年 6 月 19 日《莱比锡人民报》第 139 号，俄译文发表于 1915 年 6 月 25 日《我们的言论报》第 123 号。——[277]。

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列宁

（1915 年 8 月）

看一下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情况，以便学会把总的情景中的民族变异和民族特点同根本的和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这对于说明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问题，是不无好处的。人们常说，旁观者清。所以，意大利和俄国相同的地方愈少，在某些方面把两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以比较也就愈有意思。

本文只打算谈谈战争爆发以后出版的资产阶级教授罗伯托·米歇尔斯的《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 T．巴尔博尼的《国际主义还是阶级民族主义？（意大利无产阶级与欧洲大战）》[注：罗伯托·米歇尔斯《意大利的帝国主义》1914 年米兰版。——T．巴尔博尼《国际主义还是阶级民族主义？（意大利无产阶级与欧洲大战）》1915 年坎皮奥内·迪·因泰尔维（科莫省）版。] 这两本书所提供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饶舌的米歇尔斯仍然象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那样肤浅，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方面一掠而过，但是，他的这本书收集了有关意大利帝国主义的产生以及民族解放战争时代向反动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时代转变的宝贵材料，这种转变构成目前时代的本质，并且在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亲眼看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即革命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推翻了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加里波第时代的意大利，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压迫其他民族、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意大利，变成粗野的、反动透顶的、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意大利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因为也能参加分赃而眉飞色舞，馋涎欲滴。自然，米歇尔斯同任何一个体面的教授一样，认为自己替资产阶级效劳的行为是“科学的客观态度”，把上述的分赃称之为“分配至今仍属于弱小民族的那一部分世界”（第 179 页）。米歇尔斯轻蔑地把那些反

对任何殖民政策的社会党人的观点斥之为“乌托邦”观点，他重弹意大利就人口密度和移民运动的势头来看“应当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殖民大国”的滥调。至于意大利有40％的人是文盲，直到现在还有十分猖獗的霍乱等等，对于这种论调，米歇尔斯则用英国的例子来加以反驳。他说，当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前半期成功地奠定了他们目前这种强大的殖民势力的基础时，英国不也是一个工人群众极端穷苦、备受凌辱和大量饿死，城市贫民区充满了酗酒、赤贫和肮脏景象的国家吗？

应当说，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议的。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可以医好的病变（象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庸人们所想的那样），而是资本主义基础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或者是自己破产，或者是使别人破产；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只能这样提出问题：或者是居于末等地位，永远摆脱不了比利时那样的遭遇，或者是使别的国家破产并征服它们，从而使自己跻身于“大”国之列。

人们把意大利的帝国主义谑称为“穷汉帝国主义”（I′ imperia-lismo della povera gente），因为意大利很穷，意大利侨民也都穷得要命。意大利沙文主义者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同他从前的对手格·普列汉诺夫的不同之处，只是他比普列汉诺夫略早一些暴露了他的社会沙文主义，并且是通过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走到社会沙文主义的。这位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在他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1]的一本书中写道（1912年）；

“……显然，我们不仅仅在同土耳其人战斗……我们也在同财阀统治下的欧洲的阴谋、威吓、金钱和军队战斗，因为这个欧洲不容许小民族有任何冒犯它的铁的霸权的言行”（第92页）。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科拉迪尼则宣称：“正象社会主义曾是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谋求解放的方法一样，民族主义将是

我们意大利人从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北美人和南美人的压迫下谋求解放的方法，这些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资产阶级。”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的殖民地、资本、军队比“我们的”多，就会从“我们”这里夺去一定的特权、一定数量的利润即超额利润。在资本家中间，谁的机器优于中等水平或拥有一定的垄断权，谁就会得到超额利润；在国家中也是如此，哪一国的经济状况优于别的国家，哪一国就能得到超额利润。资产阶级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欺骗（在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人民即老百姓，把争夺抢掠别国的“权利”的帝国主义斗争说成是民族解放战争。

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之前没有掠夺过（至少是没有大规模掠夺过）其他民族。这岂不是使民族自豪感受到不可忍受的屈辱吗？意大利人抑郁不欢，感到比其他民族低一头。在上一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每年约有 10 万人移居国外，现在，每年增加到 50 万至 100 万人，他们都是被名副其实的饥饿赶出自己祖国的乞丐，他们都是工资最低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应者，他们都住在欧美城市的最拥挤最肮脏的贫民窟里。意大利移居国外的人数从 1881 年的 100 万增加到了 1910 年的 550 万，而且大都住在富裕的“大”国里，对于这些国家说来，意大利人是最粗野的、“只能干粗活的”、贫穷的和无权的苦力。下面是使用便宜的意大利劳动的主要国家：法国在 1910 年有 40 万意大利人（1881 年是 24 万）；瑞士有 135000 人（41000 人）——（括号内是 1881 年的人数）；奥地利有 8 万人（4 万人）；德国有 18 万人（7000 人）；美国有 1779000 人（17 万人）；巴西有 150 万人（82000 人）；阿根廷有 100 万人（254000 人）。“光荣的”法兰西曾在 125 年前为自由而斗争，因此把自己目前这场为本国和英国的奴隶主的“殖民权利”而进行的战争称为“解放”战争。就是这个法兰西把几十万意大利工人圈在特划区里，这个“伟大的”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坏蛋们尽量把他们隔离起来，百般侮辱和

歧视他们。人们用“通心粉”这个侮辱性绰号来称呼意大利人（请大俄罗斯的读者想一下，我国流行着多少侮辱“异族人”的绰号，他们不幸生来就没有权利享受高贵的大国特权，这些特权是普利什凯维奇们用来既压迫大俄罗斯人民又压迫俄国其他各族人民的工具）。伟大的法兰西在1896年曾经同意大利缔结一项条约，规定意大利不得在突尼斯增加意大利学校的数目！但是从那时以来，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增加了5倍。在突尼斯，意大利人共有105000人，法国人共有35000人，但是前者中只有1167人是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83000公顷，而后者中则有2395人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地掠夺了70万公顷土地。是啊，怎么能不同意拉布里奥拉和其他的意大利“普列汉诺夫派”呢？他们认为意大利有“权利”把的黎波里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压迫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瓜分小亚细亚等等。[注：指出意大利转向帝国主义和政府赞同选举改革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真令人受益匪浅。这次改革使选民人数从3219000名增加到8562000名，也就是说，“差不多”实现了普选权。同一个卓利蒂，现在实施了选举改革，而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以前却坚决反对这种改革。米歇尔斯写道，“政府〈以及温和派政党〉对改变方针的理由的说明”本质上是爱国主义的。“尽管在理论上殖民政策一向令人嫌恶，但是完全没有料到，产业工人特别是粗工却很有纪律地很顺从地同土耳其人作战。这种奴隶般顺从政府政策的行为受到了褒奖，为的是鼓励无产阶级继续走这条新的道路。内阁总理在议会中宣布，意大利工人阶级已经用自己在利比亚战场上的爱国行动向祖国证明，他们从此在政治上达到了极其成熟的程度。一个人能够为了崇高目的而献身，也就能够作为一个选民来保卫祖国的利益，因此，他就有权使国家确认他有资格充分享受一切政治权利。”（第177页）意大利的部长们说得真妙！但是说得更妙的是“激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现在重复这样的奴才腔调：“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帮助了“你们”掠夺其他国家，但是“你们”却不愿给“我们”在普鲁士的普选权……]

正象普列汉诺夫支持俄国进行“解放”战争，反对德国变俄国为其殖民地一样，改良主义政党的领袖莱奥尼达·比索拉蒂声嘶力竭地反对“外国资本侵入意大利”（第 97 页）：反对德国资本侵入伦巴第，英国资本侵入西西里岛，法国资本侵入皮亚琴蒂诺，比利时资本侵入电车公司，等等，等等。

问题已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并且不能不承认，欧洲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为它确实向各国千千万万人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要么用枪杆或笔杆，直接或间接地，不管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大国的乃至一般的民族特权，即优越地位，即野心，从而做资产阶级的追随者或奴才；要么利用各国为争夺大国特权所进行的一切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依靠团结一致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来揭露和推翻各国政府，首先是自己的政府。这里没有中间道路，换句话说，试图采取中间立场，实际上就是偷偷地转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

巴尔博尼的整个小册子实质上就是为这种行为打掩护。巴尔博尼同我国的波特列索夫先生完全一样，硬充国际主义者，说什么须要从国际的观点来判断哪一方获胜对无产阶级益处较大，或者说害处较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自然是不利于……奥地利和德国的。巴尔博尼完全按考茨基的精神，建议意大利社会党[2]庄严宣告世界各国——首先当然是交战国——的工人应当团结一致，宣布自己的国际主义信念，宣布以裁军、各民族独立和成立“相互保障不受侵犯和保持独立的国际联盟”（第 126 页）为基础的和平纲领。正是为了实现这些原则，巴尔博尼宣称，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寄生”现象，而“决不是必然”现象；德国和奥地利是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的侵略政策“始终是欧洲和平的威胁”；德国“始终拒绝俄国〈原文如此！！〉和英国提出的关于限制军备的建议”等等，因此，意大利社会党应当赞成意大利在适当时机出面干预，支持三协约国！

德国在 20 世纪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其他欧洲国家，而在瓜分殖民地方面特别“受委屈”；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则缓慢得多，它已经抢得大量殖民地，在那些地方（远离欧洲的地方）往往采取比德国人毫不逊色的残酷镇压手段，并用几十亿巨款从大陆大国雇用几百万军队去掠夺奥地利、土耳其等国。令人不解的是：什么原则使得巴尔博尼不喜欢德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而喜欢英国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原来，巴尔博尼的国际主义实质上同考茨基的一样，口头上是维护社会主义原则，实际上却在这种伪善的幌子下维护自己的即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指出，巴尔博尼是在自由的瑞士出版他这本书的（瑞士的书报检查机关仅仅删掉了第 75 页上的半行字，看来是一句批评奥地利的话），但他在这本长达 143 页的书中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引用巴塞尔宣言的基本论点并认真地加以分析。可是对现在所有亲法资产阶级推崇备至的俄国两个从前的革命者的话（第 103 页），即无政府主义的小市民克鲁泡特金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庸人普列汉诺夫的话，我们的巴尔博尼却深有同感，一再引用。那当然啦！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诡辩同巴尔博尼的诡辩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不同的只是，意大利的政治自由更无情地撕下了巴尔博尼的诡辩的外衣，更清楚地揭穿了巴尔博尼作为资产阶级在工人阵营中的代理人的真正立场。

巴尔博尼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缺乏真正的革命精神”这一点表示遗憾（完全和普列汉诺夫一样）；他热烈地向卡尔·李卜克内西表示敬意（正象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木块[3]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热烈地向李卜克内西表示敬意一样）；但是他断然宣称“根本谈不上国际已经破产”（第 92 页），德国人“没有背叛国际的精神”（第 111 页），因为他们是按照保卫祖国这一“诚挚的”信念行事的。巴尔博尼和考茨基一样伪善，只是更多了一分罗马语系语言的华美辞藻，他宣称，国际准备（在战胜德国之后……）“象耶稣宽恕彼得[4]那样宽恕德国人一瞬间的信仰动摇，

以不咎既往来医治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造成的严重创伤，并准备为真正的兄弟般的和好而伸出手来”（第 113 页）。

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情景啊！巴尔博尼和考茨基（大概还会有我们的科索夫斯基和阿克雪里罗得参加）互相宽恕了对方！！

巴尔博尼对考茨基和盖得，对普列汉诺夫和克鲁泡特金十分满意，而对自己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却不满意。你们看，在这个党里（这个党有幸在战前就已经抛弃了改良派比索拉蒂之流）造成了一种使那些不赞成“绝对中立”（也就是坚决反对意大利介入战争的主张）这一口号的人（象巴尔博尼那样）“无法呼吸的气氛”（第 7 页）。可怜的巴尔博尼伤心地哭诉说，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把他这样的人叫作“知识分子”，叫作“已经失去同群众的接触、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已经离开了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正路的人”（第 7 页）。巴尔博尼愤慨地说，我们党“狂热有余，而教育群众不足”（第 4 页）。

老调子！俄国的取消派和机会主义者曾经叫嚷凶恶的布尔什维克进行“蛊惑宣传”，“嗾使”群众反对《我们的曙光》杂志[5]、组织委员会[6]、齐赫泽党团[7]的优秀的社会党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这种熟悉的论调的意大利翻版！但是意大利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了多么宝贵的自供：在人们可以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纲领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纲领进行几个月的自由讨论的唯一的国家里，工人群众、觉悟的无产阶级恰恰站到后者的一边，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则站到前者的一边。

说中立是一种狭隘的利己主义，是对国际形势的无知，是在比利时问题上的一种卑鄙态度，是“缺席回避”，而“缺席回避者总是不对的”，巴尔博尼的这些论调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论调如出一辙。但是，由于意大利有两个公开的党——改良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8]，由于在这个国家里无法欺骗群众，无法用齐赫泽党团或组织委员会的遮羞布来掩盖波特列索夫之流、切列

万宁之流、列维茨基之流以及和他们一伙的先生们的真面目，巴尔博尼就坦白地承认：

“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的行动比正式的革命的社会党人的策略更有革命性，因为他们很快就懂得，政治形势的更新〈由于战胜了德国军国主义〉对于未来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会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因此，他们坚决站到三协约国一边，而正式的革命的社会党人却拿绝对中立做挡箭牌，象乌龟一样缩起头来。”（第 81 页）

读了这段宝贵的自供以后，我们只有希望那些了解意大利运动情况的同志，收集并系统地研究意大利两个党所提供的有关下述问题的极有意义的大量材料：是哪些社会阶层、哪些人在谁的帮助下用什么论据捍卫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是哪些人对意大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我们收集的各国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愈多，觉悟的工人对第二国际破产的真正原因和意义也就会看得愈清楚。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巴尔博尼由于面对工人政党，便极力借助诡辩冒充具有工人的革命本能。他把反对实际上旨在谋求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的战争的意大利国际主义社会党人说成是胆小怕事的人，是想逃避战争灾祸的利己主义者。“对战争的灾祸心怀恐惧的人也一定会被革命灾祸吓倒。”（第 83 页）巴尔博尼一方面恬不知耻地企图伪装成革命者，一方面又露骨地用生意人的腔调引用萨兰德拉部长的“明确无误的”话：“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护秩序”——试图用总罢工来破坏动员，就只能引起“毫无益处的大厮杀”；“我们没能制止利比亚〈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更无法去制止对奥地利的战争”。（第 82 页）

巴尔博尼同考茨基、库诺及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怀着蒙蔽一部分群众的卑鄙打算，硬说革命派有一个“立刻”“使战争打不下去”、使资产阶级在最适当的时机枪杀革命派的愚蠢计划，想以此回避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明确提出过的任务：

利用革命危机系统地进行革命宣传并准备群众的革命行动。至于欧洲目前正处在革命的时期，巴尔博尼是看得很清楚的：

“……即使会使读者厌烦，有一点我认为是必须坚持的，因为不弄清这一点就不能正确估计目前的政治形势。这一点就是：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灾变的时期，行动的时期，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阐明思想，拟定纲领，确定未来的政治行动路线，而在于使用积极的有生力量，争取在几个月内，可能甚至只在几个星期内做出成绩来。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不是高谈无产阶级运动的前途，而是面对当前局势确定无产阶级的观点。”（第 87—88 页）

又是一个冒充革命性的诡辩！从公社到现在已经过去 44 年了，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聚集和准备群众力量的欧洲革命阶级，在欧洲处于灾变时期的时刻，应当考虑的却是如何赶快变成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奴仆，帮助它去掠夺、压迫、毁灭和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如何大规模地开展直接革命的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

载于 1915 年《共产党人》杂志第 1—2 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27 卷第 14—23 页

注释：

[1]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也称意土战争，是意大利在 1911—1912 年进行的一场掠夺战争。通过这场战争，意大利夺取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两省，把它们变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两地后来合称为利比亚）。——21。

[2]意大利社会党于 1892 年 8 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 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 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 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 1915 年 5 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

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 年 12 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 1914 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 年）和昆塔尔（1916 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基本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 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24。

[3]出自一句形容明于察人、暗于察己的谚语：“看得见别人眼里的草屑，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木块。”——25。

[4]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之一，曾发誓效忠于耶稣，但在耶稣被捕时却不敢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在受盘问时三次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见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 22 章）。——25。

[5]《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 年 1 月—1914 年 9 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6。

[6]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 1912 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杂志、《我们的事业》杂志、《事业》杂志、《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 年 8 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

关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 年 2 月—1917 年 3 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10 号。——26。

[7]齐赫泽党团指以尼·谢·齐赫泽为首的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党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团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对齐赫泽党团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见《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泽党团有自己的路线吗？》（本卷第 270—275 页）、《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8 卷）等文。——26。

[8]指莱·比索拉蒂 1912 年被社会党开除后建立的改良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党。——26。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1975-02-18

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毛主席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不久将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也请你们认真学习，并且要努力多读一点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这个学习可以同批林批孔紧密地结合起来。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在学习中，注意联系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亲自对目前实际状况做一点调查研究。同时，要领导并帮助党员和群众学好。注意总结学习中的先进经验。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

本通知和毛主席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

学习的情况和问题，望及时报告中央。

毛主席指示

毛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6）

（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

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1966-06-18　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六月十三日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且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这个决定，是彻底搞好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的重要措施。

目前，北京和各地的许多大中学校，广大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资产阶级保皇党的重重阻挠和压制，正在向教育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但是，这场斗争，还是刚刚开始，许多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还没有攻破。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是按照常规进行升学考试，势必使教育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势必挫伤左派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助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气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个决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对左派学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资产阶级右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学生和教师，早已对旧的招生考试制度，表示无比愤慨，迫切地要求把它彻底扔到垃圾堆里去。今天，本报发表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以及没有发表的大量群众来信，提出了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的强烈要求。这两封信，充满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洋溢着高度的革命豪情，表现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精神。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

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选拔录取。高级中学的招生考试也采取这种办法进行。

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出，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种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危害极大的。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实行这种制度，是严重地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这个制度大大阻碍青年的思想革命化，鼓励青年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白专道路。

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长期以来，抗拒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以旧的招生考试制度作为武器，来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对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实行专政。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资产阶级保皇党，又以"妨碍功课、荒废学业"为借口，以"不能升级、不能升学"相威胁，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压制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事实证明，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

无产阶级要通过学校来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资产阶级也要通过学校来培养他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重视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历来重视教育制度的革命。毛主席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一系列指示，对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的指路明灯。

钻到教育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怀着刻骨仇恨，对广大工农兵的文化翻身深恶痛绝。他们利用所盘踞的教育阵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教育路线。如果不搞掉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是贯彻不了的。

现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要进一步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把那些违背毛泽东思想，严重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宣扬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一切旧教材统统埋葬。新的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不论是初级学校、中级学校还是高等学校，都要把毛主席著作列为必修课。

这次以招生制度的改革为开端的教育制度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它是一个铲除资产阶级“苗圃”、挖掉修正主义毒根的革命。正如北京四中革命同学在信中所说的：“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精神贵族和高薪阶层的温床，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阶石。我们这一革命行动是给资产阶级的致命打击。”教育制度的改革，归根到底，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问题，关系到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代代传下去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问题。

教育制度的彻底革命，将要摧毁从孔夫子以来统治了几千年的剥削阶级旧的教育思想影响，将要从根本上推翻资产阶级“权威”和学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宝座。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是决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总是要顽固地守住自己的反动阵地，一步不让，寸土必争。他们是不斗不倒的，倒了还想爬起来。因此教育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我们要随时准备迎击来自反动阶级和他们的代表人物的各种挑战，给他们以坚决的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要正告那些盘踞在教育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你们吃的是劳动人民的饭，穿的是劳动人民的衣，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干的是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你们对那些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对劳动人民的子弟却排斥打击，百般刁难。你们伙同和怂恿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素。你们干了那么多坏事，对人民欠了那么多账，难道可以不揭露，不批判，不斗争，让你们继续为非作歹吗？你们不要指望搞几个保皇党，就可以保住你们的“宝座”。你们也不要梦想可以拖延下去，蒙混过关。你们更不要妄想，过一阵子，你们就可以旧态复萌，依然故我，再把你们那一套反动阶级的传家宝从棺材里搬出来。这是万万办不到的。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之下，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你们的老根统统挖出来，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的传家宝统统砸碎。

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摧毁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使教育制度的革命取得全胜。

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上高高地飘扬！永远地飘扬！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　第二部分：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育制度

1967-07-04

十六条明确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编者按：十七年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教育阵地的领导权，他们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极力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把教育阵地变成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

特别是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在刘邓及其爪牙的把持和操纵下，成了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试验田”，成了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反革命组织联动就是这种旧教育制度产生的恶果。

为了彻底铲除联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我们遵循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对干部子女学校作了一些初步的调查。这里整理了有关八一学校，育英小学，十一学校等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的材料。这些材料，有力地揭露

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恶，强烈地控诉了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腐蚀害青少年一代的滔天罪行。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把学校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景山学校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腐蚀青少年，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景山学校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床。

一、大肆贩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在"修养"（一九三七年版）中说："学习历代圣贤的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也说："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现在不抓。老专家死了，就要受到一些损失。"景山学校以陆定一、童大林为首的旧中宣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下推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学领域里大搞复古崇洋，大肆贩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毒害青少年，把教学领域变成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

触目惊心的语文教学

语文课是学校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的重要战场。六年来童大林操纵了语文教学，一手把古文大量搬入课堂，一手抓住三十年代文艺，大肆向青年灌输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

一九六二年，童大林之流打着："提高语文水平"的旗号叫嚷："接受传统教材，大量熟读古文""初中要过古文关。"一时大批古文铺天盖地向广大师生压过来。在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就开始在教师的带领下，摇头晃脑地吟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后，随着年级的增长，古文数量越来越重，到六年级就要学完《桃花园记》等六十多篇古代寓言和短文，一百多首《游子吟》之类的古诗，还有那本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被反革命急先锋吴晗誉为"儿童启蒙的必读的《三字经》"；中学则要熟读，背诵大量的《古文观止》；高中毕业要求读一百首，还要念《史记选》《三国志》《资治通鉴》……名目繁多，举不胜举。为了学古文，学校不惜国家资金，先后购买《古文观止》五百多套，《左传故事选译》《春秋故事》等古典文学三四千册。

毛主席说："对古代文化遗产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绝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但是童大林等借口"先入为主"趁着年青记忆力好，多背些古文，以后再批判，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例如六一年最先试验古文的现在高三年级，共学了一百多篇的古文，一百多首古诗古词，但是没有批判过一篇古文，一首古诗古词，而是从思想到文学都"兼收并蓄。"

童大林还叫嚷："要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干脆复古。"让教师"咬文嚼字"地教，同学滚瓜烂熟的背，学校还特地请来过去教过私塾的老先生教课。老先生唱古诗时抑扬顿挫，忽高忽低，神气活现。同学们跟着象念经一样，哼哼唧唧，又背又唱，简直和旧社会的私塾一模一样。

为了配合教古文，童大林从社会上请来了许多反动学术"权威"来校讲课。如早在一九五四年就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红楼梦研究》

作者俞平伯、被鲁迅斥为“生长在旧道德和新的不道德”中国封建余孽魏建功，以及吕叔湘、叶圣陶等被学校尊为“专家”“大师”请上讲台，向师生大肆兜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黑货。

为了更好地更顺利地向同学灌输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学校大搞物质刺激。每学期末都给古文学得好的人发奖品。六一年为了敲响大学古文的开台锣鼓，举行了一次背诵古文的比赛会，把线装的《四书》奖给背诵古文的优胜者。

几年来，童大林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完全控制了景山学校的教学，对革命师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充满了腐朽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的文言文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读了《赤壁赋》有人夜里去北海划船，对月抒情；读了《秋声赋》有人哀叹自己“不得志”，变得暮气沉沉，闷闷不乐，读了《滕王阁诗》竟有的师生称兄道弟，饮茶赋诗；读了《陈情表》有人说：“如果毕业时把我分配到外地，我就要写张《新陈情表》说祖母有病，要尽苦心，组织上也不能不照顾我”；读了《苏秦》《边横说秦》有人哀叹，莫不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要发奋读书，猛攻尖端；有的说“即使我将来成不了科学家，只要说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就一辈子知足了。”甚至有人学苏秦“头悬梁锥刺骨”，发明了三条腿的凳子；还有人用圆规刺自己的腿，刺激神经……有的同学苦读《三国演义》至深夜。第二天上课时迷迷糊糊，还想着“走麦城”“甘露寺”，整天想当诸葛亮，赵云，只恨自己生得太晚，不能披甲戴盔，走马斩将……。

这就是童大林所宣扬的“学习古文无害论”!!!

童大林曾毫不掩饰地说：“教古文有什么了不起，顶多牺牲两千个孩子。”好一付狰狞的面孔，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嘴脸！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童大林在景山学校实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六年间革命师生牢记毛主席教导，进行了坚决斗争。63 年初二同学反对学习古文的斗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时同学们说“我们批判能力不够，学那么多

古书容易中毒。”“将来我们要和工农相结合，学这么多古文对工人、农民、对工农业生产有什么用？”他们学了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主要的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的教导认识到大学古文只能使学生中毒，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坚决不背古文，以实际行动对学古文进行抵制和反抗。

尤其令人愤怒地是童大林还在古文教学上大搞反革命活动。借古诵今，疯狂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积极配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准备，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一九五九年，反共老手吴晗狂热歌颂海瑞的“刚直不阿”“反抗精神”。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二月，景山党校的语文书上就出现了吴晗的《海瑞的故事》《海瑞传》为三家村干将呐喊助威。

童大林在一次语文教师会上还十分恶毒地说:“吕祖兼善于写翻案文章”。“学生读了可以活跃思想”“要让学生学会写翻案文章。”这不是直接配合邓拓、吴晗，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又是什么？

从一九五九年起，旧中宣部阎王陆定一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子，猖狂攻击毛主席。他特别卖力宣传“魏征精神”以古喻今反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公开提倡搞“反对派”。他用心恶毒地说：“唐太宗有个魏征，就是专门同他作对立面的。”六二年底，童大林遵照陆定一的命令，在党校免费分发由陆亲自决定出版《魏征传》，让老师辅导初三古文尖子阅读。这分明是含沙射影要党中央接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见”，和邓拓骂我们党“主观武断”“一意孤行”完全是一个腔调！

翻翻景山学校的语文教材，毒草丛生，毒液四射，有赞颂叛徒哲学的《报任安书》，有拼命鼓吹施“仁政”的《谏太宗十思疏》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的《关汉卿》，有宣传“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受到陆定一极口赞赏的《五人墓碑

记》，有鸣冤叫屈的《窦娥冤》……借教古文为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这就是童大林等人的鬼蜮伎俩。

泛滥三十年代文艺，毒害青少年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童大林却发明了一套“三家半”的反动理论。他胡说什么在语言方面“朱自清一家，鲁迅一家，毛主席一家，赵树理还没定型，只能算半家。”他阴险地把我们最伟大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与资产阶级文学家朱自清并列，并把毛主席排在最后，这是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的极大污蔑！在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儿童现代文学》出笼了。此书共收集文章 50 篇，前面 33 篇是朱自清、巴金、夏衍、赵树理的作品。毛主席著作只有八篇，被排在最后，而且其中的《愚公移山》被砍掉了三分之二，真是胆大包天，凶恶到极点！

请看他们在《儿童现代文学》中贩卖了什么货色。什么记述渲染士大夫放荡享乐生活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啦，什么满篇是旧知识分子逃避现实政治生活的《荷塘月色》啦，还有大毒草评书《连升三级》《程咬金出狱》，总之是一批杂七杂八的资产阶级作品。内容极其反动糜烂，这就是童大林心目中的“散文经典”“永恒范文”，把如此淫秽的东西给小学生整天去熟读背诵模仿。这就是童大林标榜的对儿童“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他们成长”的内幕，这完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为了引起学语文的积极性，学校大搞物质刺激。组织背诵比赛，让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大背资产阶级杂家的作品。把那本恶毒攻击毛主席，汇集着许多反动学术权威作品的《儿童现代文学》奖给学生。

朱自清的散文严重摧残着同学们的思想。学了《春》，有人写道：“我迎着迷蒙细雨；站在北海琼华岛上，背依白塔，纵览着满园春色”。纯粹是一派资产阶级

情调。学了《匆匆》有人才三年级就产生了空虚、惆怅的感情，叹息光阴似箭，天天忧心忡忡；学了《背影》有的同学说：“我真替朱自清难过，何年我自己也不能与父亲见面了”。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学了《荷塘月色》，有人写道：“在今天的社会上热闹是你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多少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就这样一天天走向消沉、颓废，以至反动！最后成了资产阶级接班人。

大量地学习三十年代“老头子”的作品，遭到广大革命师生抵制和反抗，许多教师对大量朱自清的文章极为反感，认为他那些文章情调低沉，感情颓废，不应该向学生讲，要求停教。但童大林等对老师的这样正当要求却是软硬兼施，百般压制，一方面他们打着“只学习语言文学”幌子；另一方面则用名利作诱饵强迫教师教下去。童大林曾公然对教师说：“教好朱自清的文章，可以当红色朱自清。”对学三十年代文艺，许多同学进行坚决抵制。有的同学就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一个小同学一针见血地说：“《背影》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我们坚决不学这样的文章。”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唤醒了全校革命师生，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大造阎王殿的反，大造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反，奋起千均棒把景山学校这个旧中宣部的试验田摧毁砸烂了。

二、奴化教育大肆泛滥崇洋思想，全盘西化，毒害师生无孔不入

童大林之流，除了直接利用课堂教学毒害青少年一代外，还通过种种渠道使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在景山学校到处泛滥。

毛主席说：“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但童大林之流却唾涎于资产阶级的东西，完全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专家的脚下。他们胡说什么：“我们的教学都是封建的老一套，应该学习西方的先进教材。”把资产阶级的作品奉为“圣明”，让学生学什么《维

佳、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父亲和儿子》《两个同伴》等修正主义作品，名目繁多，不计其数。

一九六四年童大林竟滥用中宣部的名义动用大批外汇，购买了许多国外教科书。这些书不仅大谈作生意如何赚钱，如何算利润，宣扬成名成家，理论脱离实际，而且充满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有宣扬苏修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宣扬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政策的；有吹嘘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长崎广岛掷投的原子弹威力无穷，为美帝的核讹诈效劳的；有宣扬美国垄断资本家“汽车大王”福特是自学和勤劳起家的。

还有赞颂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和反共老手罗斯福、蒋介石、尼赫鲁的。书中大肆污蔑中国的政府对人民是冷酷无情的。污蔑和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同志，说什么：“斯大林和希特勒是一伙的，共同屠杀波兰人民。”看到这些书，真使人万分愤慨不能容忍！童大林如此狗胆包天，竟敢把这些反动透顶的书籍拿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校中来，恶毒攻击和污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是反动至极！童大林还非常赞扬丘吉尔的演说，要老师去读，甚至还想让老师教“圣经”。

这些欧美课本的字里行间散布崇洋思想，大力宣扬“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人性论”，宣扬如何做生意，多得利润，多赚钱等剥削阶级思想，宣扬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学生头脑中，大树特树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博士”的形象，大讲特讲他们的发明创造并鼓励学生有雄心壮志向他们学习，有的学生从此沾上了严重的成名成家的思想，“专家”“学者”“教育部长”为了红榜题名，名列前茅，而日夜奋斗，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解放，在学生的头脑中逐渐淡薄。

外语教材全盘西化。

所谓“外语环境”

“外语环境”是童大林之流用来达到“全盘西化”，合法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黑货的一条渠道。

让我们看这个“外语环境”到底是什么货色？

这个“环境”要求把学校搞得象个“教会学校”，使人有如到了“外国租界地”一样的感觉。

这个“外语环境”要把学校的一切标语甚至于校牌得用外国文字写。

阅览室内要求一切摆设都是外国式的，外国画、外国唱片、外国画报、外语录音机等等，使人一进阅览室就象到了外国一样。甚至于要求不许说中国话。在中国土地上不让说中国话，真是混蛋透顶！

这个“外语环境”要求老师的宿舍和办公室整理得跟外国人的一样，在这个“外国环境”的招牌下，有个教师竟然在房间里挂出了低贱下流的外国女人半裸体像。童大林之流就是在这个外语环境的幌子下大肆贩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进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毒害。

小学一年级刚入学起就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规定师生平时见面要说洋话，就连学生做操也得用外语，更有甚者，童大林之流竟给每个学生起一个洋名，叫什么：“卡秋沙”“列娜”“瓦夏”“阿辽沙”……当时许多同学对此教学很不满，气愤的说：“我们堂堂中国人，干吗要起洋名，我们不干！”有的外语老师叫惯了洋名，竟把一些同学原名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外语会”是童大林用来毒害青年的一个得力工具。

每年“六一”，童大林之流都要不惜花费巨款租借剧场，举行大型外语晚会。演出的都是些十八、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臭玩艺儿，什么“灰姑娘”“小红帽”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宣传资产阶级颓废没落的生活方式，宣传“资本家发家致富的剥削阶级思想”，宣传“资产阶级调和论”，演的是才子佳人公主王子，流氓阿飞。

而对于一些政治思想内容好的节目，却被童大林之流用种种借口进行压制、禁演。在六三年一些革命师生辛辛苦苦用了很大精力，排演成功的俄语大合唱《斯大林颂》，童大林之流出于反动本性，禁止上演。反对歌颂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每次晚会，他们都要请一批洋人“光临”，洋人一点头，童大林之流就象哈巴狗得到了主人的一块牛骨头那样，高兴得摇头晃脑，肉麻地到处吹捧说：“外国专家夸奖咱们的一个外语教师的语言象英国贵妇人似的。”真是可耻到了极点，好一付洋奴才相。

童大林之流除了外语晚会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奴化教育。

六三年办了个什么“外语夏令营”，带着同学游山逛水，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请外国记者来采访，拍电影，参加大型观摩课等等。

总之，童大林之流是从不放过一个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学生灌输资本主义货色，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来毒害同学。

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毒素，广大革命师生早已抵制。他们一次一次地起来反抗，但每次都遭到童大林之流的疯狂镇压。

高中学生从一开始学莎士比亚、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作品，就牢骚不断，怒气冲天，要求改换内容，学习毛著、九评、反修文章，援越抗美的公报等。学校不但置若罔闻，反而对学生提出的革命倡议百般压制。学生们不顾童大林之流的阻挠，冲决了学校的束缚，自己办起了外语报刊，用外文写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和政治口号。有的同学去买毛著外文版来看，对于学生的这一革命行动，童阎王恨之入骨，说什么：“翻译的东西总不如原文版”“学习原文版是参加世界革命要掌握的工具”。这纯粹是欺人之谈。

外语世界革命斗争的工具，要进行世界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童大林之流不但没有把学生压住，反而暴露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直到文化大革命风

起云涌的一九六六年，小学的外语仍旧在学什么“半只鸡一条腿”等臭玩艺儿。用这些东西怎么参加世界革命？

每当同学起来造反时，童大林和他的得力打手干将就破门而出，凶神恶煞到班上镇压，声嘶力竭地向师生狂吠：“你们学风不正！”“怕苦”“没有事业心”“没有甘当老黄牛的精神”。并强迫老师顶住，说什么：“硬着头皮干到底，出土才看两腿泥”。他们还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难道我们无产阶级就办不到吗？肯尼迪还让他们的学生研究中文呢？我们要和帝国主义争时间。”学生们骂道：“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什么跟帝国主义争时间，明明是在跟帝国主义搞和平竞赛！”

六年来，以童大林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完全统治了景山小学，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外语教学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在这场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站起来造反了！当他们回忆起外语试验时，纷纷愤怒控诉，什么“甘当革命的试验品”分明是要我们做修正主义的牺牲品！他们大造阎王殿的反，把旧景山学校砸得稀巴烂，决心成立起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三、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指出“把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的大学校，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都要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从来就是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的加剧阶级分化，扩大三大差别，阴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针锋相对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童大林等在景山学校试验的就是刘少奇的这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六年来，童大林坐阵景山、打着“教改”的旗号，大搞资产阶级的“天才教育”。为资本主义复辟培养骨干人材，对大批工农子女进行排斥打击，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什么："我们的目标应该培养到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当厂长，车间主任，党委书记，市长、县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童大林按照主子刘少奇的腔调疯狂叫喊："我们的毕业生绝不能成为象雷锋那样头脑简单的人，如果都那样头脑简单中国就要亡国了。""景山中学要出天才出专家，要培养一大批有名的大人物。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工程师，大作家"，"培养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国家干部的骨干，掌权的人""培养县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央委员、总理、领袖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要培养硬笔杆子制造舆论的人"，甚至歇斯底里地叫嚣："培养不出马克思，培养出个希特勒也不错。"真他妈的反动透顶！

在这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指导下，学校在《教改试验的几个问题》中明文规定："各种教师都要注意发现在本门课程中有才能或者有天才的学生，精心加以培养……使他们的才能能有充分发展的天地。"就这样，学校在学生中"拔尖"再"拔尖"，把拔出来的"尖子"视为"宝贝""神童"，进行单独编班，精心培养，享受着各种特权。企图把这些人培养成骑在"低等人"头上的精神贵族。学校公开鼓励"尖子"走白专道路，公然鼓吹"不能怕专，不能因为红而丢了专，应该越来越好。……将来即使有些学生只专不红，但是只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也是完全允许的。""原校长方玄初对九（一）班的'五虎将'说'你们是块好材料，好好干是有发明创造的'"。说什么："你们尽管放心钻进去，（政治）方向错不了，错了我给你们纠正"。

于是学校提出"勤勉学习是共青团的一次战斗任务"，要团员事实带头学好功课"语文通过一关"，"数学要斩六将"，"外语要水淹七军"，要学生"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校不但为"尖刀班"配备数量多"水平高"的教师，

还用大量外汇购买大批的原文版教科书，录音机，买价值高达 4880 元的熊猫牌收录机。陆定一、童大林之流，还感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不能尽快的实现。1965 年底陆定一在给童大林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制度，这样就安心了。"童大林之流为了讨好黑主子，于一九六六年 2 月份，在景山学校又开办了三个大学班即政治班（综合文科）化学班、英语班。政治班是重点，其他班是陪衬。现在以政治班为例，从他们培养目标和挑选人材来看童大林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如何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直接迅速地培养人材的吧。

政治班中 16 名学生是童大林亲自从高中七个班 200 多名学生中挑选出来的，16 人中工人出身者二人，干部出身者十二人，黑帮子女五人。挑选的标准为（一）笔杆子过硬。（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次讲"政治班的学生收来是掌握笔杆子的，毕业后作农村基层领导工作"。"政治班学生毕业后可以当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妇联主任"。还说："你们当中个别有才华的将来可以当中央委员嘛！"他们极力反对政治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公开对抗林付主席的指示，向同学们说："学毛选要死学活用"，号召同学们："只要通读毛选四卷就行了"。从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不难看出，政治班培养的人可以归纳为两种人：一种是掌权的，一种是掌握国家宣传机器制造舆论的。

通过文化大革命，许多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班就是要培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如果让他们培养的这些人去掌握大权，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出现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复辟！！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同学谈到这五个月来的思想变化时说道："五个月来我认为自己已经不象一个工人子弟，倒象个干部子弟了，小少爷作风在我身上有点影子了。多么危险啊！这五个月中他们根本不抓阶级斗争，不进行阶级教育，我渐渐有点儿忘本了，忘记自己是什么阶级的后代，忘了阶级苦，忘了血泪仇，发展下去，谁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由此看来，这样的政治班到底是什么货色？到底是突出哪个阶级的政治？到底是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

“千道关，万道关，关关都是鬼门关，入景山学校比登天难”，这是广大工农群众对景山学校的评价。

童大林之流贯彻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对资产阶级苗子视若珍宝，对广大工农子女却是打击排斥。六年来，从招生、升级、毕业设制重重关口，把大批工农子弟拒于大门之外。

第一道关：入学关

在童大林亲自审阅的“招生简章”中明文规定招生条件是：“智力发展条件较好，求知欲强，并有较好的生活习惯，身体健康，发育良好，无残疾及其他慢性病。”并从资本主义国家里搬来一套“智力测验”，对六、七岁的孩子考听力，口齿发音，认识汉语拼音，模仿外语发音，看相貌，试灵敏程度，考唱歌、跳舞，观察走路姿态等，还要经过初试和复试等二关。凡是营养不好，或穿着破烂的孩子，不经考试就被淘汰，对工农子女还要调查家庭，灯光设备如何，兄弟姐妹多少，家长能不能辅导，有没有好的生活环境……等。更可恨的是有的工农子女符合了他们的“智力测验”只因家庭是工农出身，学校就千方百计地制造种种借口不予录取。

一九六二年从报考的 1300 儿童中招收 120 名，其中没有一个工农子女，而其中却有 40 人通过后门进入学校。

一九六三年，从十一个高级幼儿园选送来的 358 名“尖子”中挑选了 109 人，其中工农子女只有 2 人，仅占 1.8％。

六年来，该校共招收了一年级新生 907 名，其中工农子弟仅有 78 名，占总数的 8％。

相反，对一批有“靠山”有“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子女则大开方便之门。反共老手吴晗的儿子要读书，一个电话就进了景山学校。

这种贵族学校的招生制度，激起了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愤怒地质问：“景山学校是中宣部的子女学校还是什么学校？”有工农家长说：“这学校是培养高干的，我们的孩子他看不上。”有的说：“景山学校门坎太高，我们的子女登不上。”

第二关：调班关

学校借口：“要承认人的才能有高低，不能每个人都成为专家，”建立了一套毒辣打击排斥工农子女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的“制度”。他们把学生强行分成三、六、九等，把“尖子”集中编成为“试验班”，这是第一等人，剩下的编为“普通班”，这是第二等人，把所谓“学习差”“纪律不好”“又脏又笨”的学生及留级生凑在一起组成“收容班”，这是第三等人。不同的等级分别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和政治权力。在被视为上等人的尖子班里，工农子女少得可怜。有的只有一二名。有的甚至连一个也没有，而被他们视为低等的收容班里，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女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这样幸运入学的工农子女被看成低等人，他们就是这样打击工农子女，压迫工农子女。

第三道关：甩包袱关

过了两天，所剩下的几个工农子弟，在这所贵族学校里，又面临着第三道关——甩包袱关。为了把“不理想的学生”赶出学校，他们就乘升级和初中毕业之机，把工农子弟大批砍掉，还美其名曰：“革命的需要。”革命教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校的用意就是牺牲一大批，培养少数精神贵族。”连童大林之流也不得不承认：“把这些学生交出去为教改扫除障碍。”用心何其毒也！

1962年六年级275人只留下80人，195个被甩掉，同年级初三326个只留下38人，被甩掉288人（工农子弟131人，一般劳动人民子弟100多人），63年初三的300余人，只选拔了30人，其余被踢出学校。

六年来，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建校时的1797人甩去1300余人，逐渐把工农子女排挤走，把一个原由工农子女为主体的九十一中和东高房小学组成的景山学校演变成为一个修正主义的贵族学校。

童大林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仅采用种种手段排斥工农子女入学，而且用种种法西斯手段，歧视打击迫害工农子女，剥夺他们的各种政治权力。

童大林之流把选拔出来的“尖子班”视为宝贝班，而把这第三种人视为什么“收容班”“破烂班”“，普通班”和“收容班”的同学在政治上受歧视！每当“十一”“五一”等重大节日，学校嫌他们“脏”、“衣服破”，都剥夺了他们参加庆祝的权力，离天安门这么近的学校，这些班的绝大多数同学却一次也没有见到过毛主席！他们对于我们工农子女歧视到了何等地步！

外宾来时，实验班的同学穿红带绿在楼下唱歌跳舞，而“收容班”“破烂班”的同学却关在楼上教室里，并派老师“看守”，连往窗外看都不准。同学们愤怒地质问：“我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实行集中营管制？”童大林在景山学校完全是执行的资产阶级专政。

劳动也分贵贱

试验班劳动，从来就是安排作木工，排字，而普通班只能打扫院子，扫厕所，抬煤球。普通班把挣来的钱交给学校，这些同学一般家庭经济较困难，学校不但不给以补助，反而将这些钱给实验班同学买钢琴、手风琴、录音机，给实验班同学买了大批书，实验班每人一本，而“收容班”，“破烂班”一共才给几本，真是欺人太甚！

残酷虐待

工农子女家庭经济条件差，有时交不上学费和书本费，学校不但不帮助解决，反而不叫同学进教室，迟交一天，罚站一天。有的同学不守“纪律”和老师顶撞，接连要罚站半个多月，四个墙角轮流站！

普通班同学和实验班同学打了架，便让普通班同学给实验班小孩鞠躬，一连十几个，且要九十度，其用心何其毒也！更令人可气的是“收容班”一同学跳了一次窗户，竟勒令他给窗户鞠躬十几次。

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事啊！这就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治下的景山学校！同学们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控诉道：“进了景山学校好象掉进了火坑，这里不是我们工农子女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吃到了旧社会才吃到的苦头！”

现在我们彻底清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陆定一、童大林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行的时候了！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砸烂这个修正主义的温床！

结束语

从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如何在景山学校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怎样对工农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陆定一、童大林之流高叫“要闯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这条“路”不是别的，就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一条资本主义的路！景山学校走的就是这条路。

透过该校工农子女受到种种迫害的事实，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情景，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阴影。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影山学校欠下的一笔血债！这样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八·一”学校的“和平演变”

“八·一”学校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产物，是最早推行苏修一套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样板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八·一”学校成了联动黑窝，联动思潮大肆泛滥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造成的恶果。

“八·一”学校的光荣历史

“八·一”学校原名“荣臻子弟小学”。属晋察冀军区领导，它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创建的。没有课本，他们就学单字，到边区政府教育处找刘凯丰借了两本书作教材。没有教室就在野外上课。没有桌椅，就用石块当凳子两腿当桌子。没有黑板使用锅烟子涂块墙壁代用，没有教具，便到山上采植物自做。种地养猪样样都干，棉衣、蔬菜都可自给。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帮老乡送粪种地推碾子、为老乡演出文艺节目。

在河北平山古贤村的时候，一次敌骑兵偷袭石家庄，上级通知学校转移到八十里外。孩子们发扬三八作风闻风而动，大孩子背小孩子连夜行军。那时敌机经常来轰炸，大孩子就背着小孩子去防空洞隐蔽。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那时的孩子政治热情高，很能吃苦耐劳，同学之间相亲相爱亲密无间。孩子们学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老乡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们是“小八路”。

革命老前辈也十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徐特立同志还去给孩子们作过报告。这个学校为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接班人。

从上面这些情况看，那时的干部子弟学校是贯彻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的，做到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但那时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黑帮分子罗瑞卿原为晋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就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反对学校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一次学校领导给

他汇报孩子如何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搬石头打蒋介石。罗瑞卿勃然大怒，骂道："你不要老讲政治政治的，孩子们将来要建设国家了，那时不打仗了。"

"和平演变"后的"八·一"学校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八·一"学校搬进北京城。一年以后，军区花了一千五百匹布买下了"乐家花园"（即北京大资本家乐松生的花园）作为新"八·一"校址，从此以后，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八·一"学校逐渐"和平演变"，变成了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

一、领导权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

毛主席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八·一"学校一进城领导权就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篡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彭真、罗瑞卿、薄一波等不仅经常来校作"指导"，而且派出得力心腹直接控制"八·一"学校。第一任校长边××一进校就全面干净地抛弃了"八·一"的光荣传统大搞"正规化"，胡说什么"山沟里的一套不能用了"。

第二任校长李玉章完全继承了边××的衣钵。上任不久就立即下令把"八·一"学校的校史展览拆除。把"八·一"学校的光荣传统抛得净光。

付校长刘晓春毕业于国民党通州师范。醉心于古诗古画，是邓拓的得意门生。教员选择完全是量材录用。对教师调动频繁，通过"人工淘汰"选择他们意中的教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名利刺激毒害教师，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八·一"学校落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后，就开始了"和平演变"。

二、贩卖苏修黑货

苏修"专家"在教育部做报告拍卖凯洛夫黑货，边××与刘晓春回来忠实传达。他说：要向苏修教育"一边倒"，"要跟上去"，"把八·一办成第一流学校。"还污蔑道：山沟里那一套不能用了，要正规化。

学校组织教师到旅大"苏军官子弟学校"取"经"。请苏修专家崔柯夫和晋希金做报告。

五四年，还特地请来苏修专家戈林娜来"八·一"做"关于苏修如何办好托儿所"的报告。戈林娜则大放其毒，胡扯什么"吃饭要放桌布、摆花瓶、使儿童养成文明的习惯，讲故事要使动物人格化。吃饭不用铁碗……"

所谓"正规化"实际上是全盘苏修化，全盘资产阶级化。

三、排斥工农子女

"八·一"学校属军区干部福利科领导。学生入学要经军区组织部（后由干部部）批准。入学条件起初规定是团级以上子女方可入学，后因入学人数多，后又规定师以上干部子女方可入学。一般工作干部子女和广大工农子女就根本无权进入"八·一"。

有的教员提出"八·一"学校应向工农子女开门，李玉章竟说什么"贫下中农他们连被窝也准备不齐呀"，看他们把广大工农子女摆在什么地位！

为了装饰门面，十七年共招收了二个工农子弟，中途还被他们以种种借口给赶出去了。

本校工作的教职员工的子女因为出身既不是团长，也不是师长，照样也不能在"八·一"学校上学。

"八·一"学校完全成了高干子弟的乐园。

四、大搞特殊化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职权，把"八·一"学校完全办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乐园"。

整个校园是由一个留学西方的工程师按照西方标准设计的。建筑面积达三万五千平方米，校园占地面积二十万平方米。校内有一个三十亩的果园，有奶牛场、动物园、花房。冰棍房，设备齐全的校医院，藏书二万八千册的图书馆。此外还有电影机一部，电视机七部，大小汽车六辆，摩托三辆，洗衣机三台，价值二万元的乐器一百八十八件，跳舞衣裙八百多件，大小沙发三十二个，各种医疗器械二千六百多件，各种球类一百九十二个……。

学生早晨起来先喝牛奶，吃的是大米白面鸡鱼肉蛋，饭后吃水果，午后吃点心。有的学生因为太胖或太瘦还要送医院疗养。

学生住的是"大观园"式的宿舍。园中有亭台楼阁，名花异草，假山古木供学生欣赏。

学生出出进进坐的是小汽车，有一天下午，接学生的汽车竟达三百多辆次。可见他们的生活特殊化到了何等程度！

此外学校还配备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侍候这些学生。全校共有职工三百零六人，平均每五个学生就要有一个职工为他们服务。保育员要给学生叠被子，剪指甲，拿草纸。学生出了事，不管什么原因，班主任都要挨整。学校教职工完全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的活动工具。

五、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剥削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除了从物质上腐蚀青少年之外，更毒辣的是以封资修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灵魂。

1）他们猖狂抵抗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不准教师向学生传达毛主席的"七·三"指示，有的教师把七·三指示写在黑板上，李玉章怕学生不好好念书，叫擦掉，他们还提出什么"思想积极，行动稳妥"能破就破能立就立的方针，实际上是抗拒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可是他们对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和陆定一的"两个互相溶化"，"两个传下去"的修正主义议论

却大加吹捧，说是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们反对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学部主任吴燕说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无效劳动”，他们根据刘邓与旧市委的指示，强令学生解散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付校长刘晓春说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没有用，要求教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要对照黑《修养》。她还要师生每天练字贴，要学生进行文明休息，吹口琴，散散步，有空再学习毛主席著作。

2）提倡读古书，用名利思想毒害学生。他们宣扬封建的苦读思想，用古人苦读成名的小册子作学生的政治教材，向学生灌输成名成家思想，他们还让学生背《爱莲说》《桃花源记》《陋室铭》《捕蛇者说》等古文，他们不是教育学生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为人民学习，而是为了名利。他们宣扬什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以此鼓励学生追求名利。有些学生竟把它当作座右铭写在铅笔盒上。

3）宣扬反动血统论：新教师一来，八一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向他们宣扬八一特殊，说我们的学生都是高干子女，解放军的接班人，在国际上是有名的。他多次给学生教师讲：“我们学校的学生是接班人的核心，是天生的接班人，是血统的接班人，长大以后要接爸爸妈妈的班”，还说“在我们的孩子中要出将军，部长、总理”，甚至恬不知耻地说：“那时我就成为总理的校长了”。他们还说：“枪杆子我们的孩子不去掌握谁去掌握，科学尖端我们的孩子不去搞谁搞。”

4）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他们经常用当劳动者来恐吓学生，而不是提倡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他们说“×××不好好读书现在升不了学，后悔也晚了”。校长李玉章常对学生说：“你们不好好念书，将来有你们哭的日子。”

六、鼓吹白专道路，追求“四个第一”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狂热地追求“四个第一”，即智育第一、分数第一、升学第一、考好学校第一。

智育第一：他们一直抹杀学生中也有阶级斗争，完全否认学生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一味强调读书，在晚自习时，不让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同学复习功课。他们主要抓语文、算术，其他课认为是附课，对一些重要的政治文章，甚至毛主席著作也当作知识去教学生，而不是当作革命的武器。

分数第一：他们先提出每班达到平均 95 分到 98 分为教学指标，后来又提出超过平均 95 分到 98 分。这对教师和学生都形成压力。他们尽一切办法刺激学生追求分数。如发金、银质奖章。有一年一个班考试平均 98 分。让他们到军区报喜。评优秀班集体从不提突出政治，而以成绩为最主要条件。有一年，海淀区中学考试，共考了十八门，其中有十五门是八一学校得了第一名，谁成绩好进行广播表扬或登光荣榜。

升学第一：学校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升学。要求达到 100％的升学率。毕业班的工作是压倒一切的。

第一届初中毕业生里，为了打响第一炮，把历史、理、化、生物、外语停了半年，用来突击数学与政治，另外还用“抱娃娃”的方法，从军区调来文化教员，一个包一个，保证使这些学生能升学。

八一学校五届初中毕业生都是 97％升了学，升不了的就留下年再考。

校长李玉章对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他曾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对外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对内是一颗红心（应读作一颗私心）一种准备（升学）。”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我们的孩子是“血统的接班人”，是“接班人的核心”，要让他们“接爸爸妈妈的班”，不能让他们去“卖酱油醋”。他们说，“上山下乡是给那些出身不好的提的”，“科学尖端你们不去攻谁攻”，“出身好的不升学谁升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影响之下，有的教师在上课指着外面扫地的说：“你们如果不好好学习就象门外扫地的那样。”

考好学校第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仅不让学生上山下乡去劳动，而且不愿学生去考师范学校，他们认为当教师没出息。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为了使 100 多初中学生升到理想的高中，他们还在国家考试时弄虚作假，有的教师在考试时临场指点。

七、宣扬活命哲学

刘晓春说："我们学校不仅是北京而且是全国的高干子女学校，我们学校不能出问题，否则很快就传到中南海去了。"

学校当权派怕学生发生人身事故，不让学生爬山，滑水，游泳，搞国防体育（跳伞、射击）。

六五年，毛主席畅游长江之后，学校不得已，组织了少数学生到颐和园去游泳。怕出事故，主任以上都去保护，又从航海俱乐部借来橡皮船和救生圈还有担架，保护人比游泳的人还多，兴师动众，影响极坏。为了便于保护，后来花了 75000 元钱，修了一个游泳池。初中学生十五、六岁了，平时不让擦楼上玻璃，怕摔坏。有一次外宾参观，事先罗瑞卿派了一排解放军给他们擦玻璃。

八、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恶果

八一学校的大多数同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要革命，坏是极少数。但是受到资产阶级特权思想和封建的反动血统论的毒害的则很多，在不少学生中有"自来红"思想，有优越感，瞧不起别人，瞧不起劳动人民。

有一些学生追求名利思想很严重。例如一个学生在废兵役证上填上"坦克兵元帅，每月薪金 700 元"，学生杜××对同学说，若干年后你就可以成为天安门前的阅兵司令了。

有的学生违法乱纪，平时打骂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死一个工人，把一个农民小孩的牙齿打掉一个。

有一些学生傲视劳动人民。八一学校的工人反映：他们用手掏厕所，有的学生嫌他们脏，骂他们臭德性，有的捂着鼻子，甚至这样说;“你们就是为我们服务的。没有我们，你们干嘛!”饭若有点不好，就骂炊事员。还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爸爸警卫员比你强。”有的骂保育员是夜猫子(保育员夜里值班、看护他们，却遭到了谩骂。)

有些学生浪费、损坏国家财产很严重，馒头成筐丢掉，肥肉往桌上扔。文化大革命中破坏得更加严重。电影机被砸毁，五部电视机被拆掉，上百的垫子被烧掉，几千元的标本室被毁掉。

八一学校成了“联动”的黑窝。有几十个联动分子。有不少反动头目是从八一学校出去的，如贺鹏飞、赖锐锐、陈小伦、董良阁、姜晋南、赵占平、项东平、陈小香、杨安军、郝小平、郭济玉都是从八一学校毕业的，中共中央党校红战团的一些头头也是从八一毕业的。

结束语

“八·一”学校解放前后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和平演变”的反面教材。无产阶级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资产阶级也要寻找自己的后继人。学校就是双方争夺的重要阵地。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整个教育阵地。培养千千万万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美梦彻底破产。

看，刘少奇的黑手，是怎样拉着育英小学“和平演变”的？

刘少奇黑手伸入　育英开始变颜色

北京育英小学的前身，是中直育英小学，原属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领导。于 1948 年，建立在解放区——河北省山县夏东峪山沟里。当时仅有学生 109 名。全校师生，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过着艰苦的战斗和学习生活。

全国解放后，育英小学迁到北京。这时，刘少奇这个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给他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便千方面计地把黑手伸进教育阵地，也伸进了育英小学。

在刘少奇的背后支持下，黑帮分子杨尚昆亲自出马，窃据了育英小学校董委会董事长的职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中直党委副书记曾×、刘××、刘×等，都是育英小学顶头上司，直接参与和领导学校工作，控制、独揽学校一切大权。当时，学校的党团工作，各种工作计划，规章制度，人事安排，干部调动，财政开支等等，每学期都要上报中直党委，由杨尚昆、曾×等人审查批示。杨尚昆深知办学的重要关键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他于 1950 年曾下令："要找一个懂教育、有能力的人来办学。"在他的黑批示下，通过黑帮分子，大叛徒安子文所把持的中央组织部，选中了韩××这样一个"懂教育"——忠实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革命主义分子，把韩从中央组织部调到育英小学当校长，并被选为中直党委委员。

从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黑手，便通过这些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伸进了育英小学。育英小学也就开始走上了"和平演变"的道路。

挥霍浪费一心建成"世外桃源"　富丽堂皇苏修海校望尘莫及

育英小学校舍的修建，正值我国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顾国家的困难，肆意挥霍浪费，一心要把育英小学修建成让青少年和平演变的"世外桃源"。由杨尚昆亲自指挥当时的副校长孙××，大兴土木。楼房建筑，力求富丽堂皇，地面用花砖、水磨石和地板铺设。除教室、宿舍外，还有大礼堂、体育馆、仪器室、资料室、成绩室、保健室、理发室、玩具室、洗澡房，洗衣房等。所有这些，都有风雨走廊连成一气，使学生一点也受不到风吹日晒雨淋寒侵之苦。他们从外地订购几百张钢丝床，几百个单价 20 元

一个的棕床垫，成套的苏式课桌椅。他们还从南方运来马尾松和龙松，校园内绿树成荫，杨柳成行，还有喷水池，几十亩果园、花房、动物园。一所小学如此的奢华和富丽，使曾经到这里来参观的苏修专家都惊叹地说：“比我们苏联的海军学校还要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让这些少年儿童在“柳暗花明”的“世外桃源”里，在这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温室”里，脱离社会，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被资产阶级侵蚀、俘虏。

养尊处优，腐蚀多少少年　一场春游，引出如此奇闻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他们那反动“血统论”的思想指导下，对学生大搞特殊化，使学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黑帮头子彭真就说过：“不怕我们的儿子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也曾说“我们这里都是中央委员、将军的儿子，他们都是豆芽菜，嫩得很，出了问题我们不好交代，负不了责任。”学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韩××，欣然领会主子的授意，他也跟着鹦鹉学舌地说：“老子打天下有功，儿子就应当照顾得好一点。”他竟然荒唐地提出“安全健康，保证教学为我校的教育方针”。又抛出“在安全健康的基础上发展教学，在严密护导下开展活动”的黑指示。公然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相对抗。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简直把育英小学办成了一个贵族式的学府，把学生当成“公子哥儿、少爷、小姐”来精心护理、百般照顾。“只要学生长高了、增磅了、学生满意、家长放心、我们的工作也就做到家了”。这就是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对学校工作的极端错误的出发点。他们让学生睡钢丝床，上面还垫着棕垫。吃大米白面，鸡鸭鱼肉。为怕学生减磅，很少让学生吃机米，经常吃的是小站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买高价点心，糖果给学生吃，偶尔吃窝窝头，还要放上大量的枣，糖精和桔子汁。在生活上，由班主任、生活老师、保育员对学生“全面负责”，精心照顾。吃饭，有人给端上、分好；洗脸洗脚有人催，衣服脏了有人洗；

缝衣针扣有人做；回家返校，有大小汽车接送。学生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就这样，学校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忠实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了迎合一些家长的心意，还唯恐对学生照顾不周，生怕“不安全”、“出事故”。组织学生春游，必须坐大面包车，认为这种车较安全。出发以前，先派人侦察地形，看路上要拐多少的弯，过多少桥，察看路基是沙子的还是泥土的，还要数一数沿途有多少交通岗。认为交通岗多的路线才安全。还要派出接待人提前到达春游地点。春游时，学生爬山怕摔着，还让学校工作人员从山下到山上排成一行，保护学生。学生下水怕淹着，要先用竹竿量量水的深浅，计算一下水的流速。看，这是多典型的“保命哲学”!

学校里生活这样优秀，待遇如此特殊，有些家长，还不满足，还要来个“锦上添花”。还提出那样那样的苛刻要求。有一个黑帮分子的女儿，从外校转入此较，这个黑帮分子的老婆，借口女儿是第一次住宿，要求班主任每天早上八点钟用电话向她汇报，她孩子晚上是否尿床了。有一个家长，要求班主任每晚给她的孩子做按摩；又一个家长，每天派保姆来给他的三个孩子送牛奶、苹果。有的家长提出自己的孩子要住小宿舍，不住大宿舍；黑帮分子×××的老婆在安排自己孩子的床位上提出：夏天要靠近窗子，凉快但不能被风吹着；冬天要靠近暖气，暖和，但不能被暖气烤着。

试想，在这样“世外桃园”似的环境里，过着这样养尊处优的特殊化的生活，怎么能够培养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刘少奇这个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心要使我们的第二代和平演变，一心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从这里，不也看得清楚吗？

这个员那个工，浪费多少人力　一比七与一比二十，这是多大差距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在育英小学推行其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们不惜违犯国家的人事分配制度，滥用职权，大走后门，从各处调来大

批的教学人员和非教学人员，设置繁杂的机构，造成人力浪费，机构重迭。在这所仅有 800 多名学生的小学校里，就有 120 余名工作人员，平均每班有六个工作人员为他们服务。工作人员和学生比例为一比七，而一般小学，则是一比二十。在这大量的工作人员中，除领导干部、教职员而外，还有保育员，炊事员、公务员、打字员、理发员、洗衣员、医生、护士、水电工、花工、锅炉工、木工等等，除此以外，每年还要招些临时工整理果木和园地。当别人提出，在这里人太多，调到别处工作时，韩说什么："这与一般学校不同，我们要办'机关式的学校'"。象这样一所特殊化的小学校，每年都要耗费惊人的国家资财。工资的开支不算，仅房产税，每年就要上交五万余元。在这个学校里，一个学生一年所需要的正常经费除家长负担部分之外，国家平均每个学生每年要补贴二百一十四元六角，而普通走读学校，国家平均对每个学生的补贴只需要 37 元。这是何等的悬殊！

全盘照搬模仿苏联　修字黑货大肆泛滥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对抗毛主席关于教育问题的英明指示，而主张"全盘地，系统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并胡说什么"先搬过来再说"，"先教条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刘少奇的黑指示下，黑帮分子杨尚昆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韩××等，积极行动，大力贯彻，要使育英小学成为学习苏联的典范。曾带领教师到北京的苏联小学去参观。杨尚昆亲自批准韩××带领教师去旅大苏联式学校去参观学习，回来后，韩××就亲自做观摩教学，推广苏联的"五个环节教学法"。当时学校里从教学到课堂教学，到五级记分制，全是苏修那一套。他们还请苏联专家和德国专家来学校亲临指导。杨尚昆来指点韩××，大抓对苏修教育学的学习，什么《凯洛夫教育学》、《岗察洛夫》、《叶西彼夫教育学》、《马卡连柯教育学》、《苏联新道德教育》、《综合技术教育》、《我的儿童教育工作》、《女教师笔记》、《各科教学法》等等，都列为教师的必读之书。甚至连课堂桌椅，也追求苏修式的。一时间，苏修的黑货在育英小学大肆泛滥，不知坑害了多少教师和少年儿童。

兜售封、资、修黑货千方百计　制造修正主义温床煞费苦心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便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曾罪恶地发出“小学不提倡、不组织、不领导学习毛著”的黑指示。在他们的支持下，学校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胡说什么“学生年龄小，学不懂，每周只学一、两条语录就行了。”抵制毛泽东思想在学校的传播，污蔑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校园里，看不到毛主席语录，教室走廊却挂满了洋人、古人的画象。

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们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是一心要把学生培养成只专不红、脱离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强调智育第一，鼓吹成名成家，大肆贩卖封、资、修的黑货。黑帮分子杨尚昆曾对韩××说：“抓生活和健康不是长远的办法，要抓点学习。”于是韩就拼命大抓教学，提倡智育第一。他们一方面鼓励青年教师大抓业务，说什么“业务好了，政治也就好了。”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用“名牌教师”“提级增薪”去腐蚀青年教师。一方面，又鼓励学生，大抓学习，通过“升学”这条渠道，达到成名成家。为了宣扬成名成家，韩还亲自写小说《二千里行军》，鼓吹“一本书主义”；为了宣扬成名成家，他们绘制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发明家、文学家、科学家的象，作为学生追求的样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贯彻他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现其资产阶级教育目的，让学生通过“升学”的渠道，为成名成家而奋斗，他们就拼命追求升学率，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欺骗国家，欺骗人民。每年毕业班，都是提前一个多月就把“副科”停止了，而专门复习作文和算术，让学生加班加点，为分数拼命。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把学生塑造成他们所理想的资产阶级接班人，甚至对教学环境的布置，也煞费苦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在 1952 年和韩××专门交谈中，指示韩“校园内一切动物、植物、花草、树木都应该分种分类，挂牌子，经常让学生看，丰富知识。”还说：“地理模型可以搞大一点嘛，学生看了记忆才能深刻。”又说：“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和盖棺论定的文学家、科学家，可以搞人物象和人物传。”他还建议在课外阅读中让学生读《爱的教育》，说这本书可以培养“同情心”和“人道主义”。韩××对胡的指示奉若圣旨，立即身体力行，于是育英小学里大忙一阵，做了半间屋子大小的地理模型，做大地球仪，专请师大美工系绘制大型历史挂图和历史上的“名人”肖象。于是洋人古人，充斥了教室走廊。后来胡乔木还亲自到学校检查这项工作的落实，他还不满意地批评说：“你们办是办了，但是办得不够彻底！”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千百计来设计和制造修正主义的温床，来让我们的革命后代，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和平演变。其用心，何其毒也！

刘邓教育路线罪恶滔天　青少年受毒害一言难尽

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育英小学，十七年以来，积极执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育英小学成了腐蚀坑害青少年一代的“危险乐园”。

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在育英小学上学的高干子女享受种种特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奉行其主子的旨意，把他们培养成“血统的接班人”，从政治上，生活上，教学上加以百般照顾，精心培育，相反对工农子女和一般干部子女却不择手段地进行打击，排斥。一九六五年育英小学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着“学校面向工农开门”的幌子，招收了学校附近公社的几个孩子上学，后来这几个公社的孩子竟也都被他们以“成绩不好”的借口赶出育英小学，

在处理降班学生问题时，一般干部子女成绩稍差一些，要降就得降，一降三年也没什么，而高干子女就一个也不能降，总要想方设法“带上去”。

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育英小学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力反对学生参加劳动和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因为“怕出事”从来不敢组织学生下厂下乡劳动。这样，学生长期脱离劳动，逐渐产生了轻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

有一个学生不愿意完成每周分配给他的打扫教室的义务劳动，竟拿出一角钱给另一个同学，要他代为打扫。

有的学生自视血统高贵，鄙视工农和一般教师。对一般教师说：“你挣的钱还没有我爸爸的零头大！老师住的宿舍还没有我家里的地毯大！”还大言不惭地说：“我爸爸是大象，你是蚂蚁，蚂蚁怎能和大象比”！有的学生到了农村，看到农民的房子就说：“你们的房子还没有我们厕所亮”。非常鄙视劳动人民。

总之，育英小学——这所在战火纷飞年代诞生的学校，自从刘少奇黑手伸入以后，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控制下，一步一步走上了和平演变的道路，成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苗圃。育英小学的演变，使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为满意。刘少奇之流把育英小学视为珍宝，当作全日制小学的样板。黑帮分子杨尚昆曾得意地说：“学校办得不错嘛！谁说我们的学校办不好，换一个校长，不是办得很好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晗在参观育英小学后也说：“全国的学校都办成育英这样就到共产主义了。”

但是，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兴的太早了，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辗碎了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

风雷起，修正主义温床风雨飘摇　鬼蜮怕，求主子出来打气撑腰

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在育英小学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搞资产阶级特殊化，早就遭到学校的革命的职工，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家长和社会上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不满

和抵制。正当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们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就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尖锐批评。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赶紧在黑帮分子杨尚昆召集的研究学校工作的会议上向主子求援，杨马上给韩打气说："房子已经盖子，东西已经买了，非拆不成？"并表示给韩撑腰："这些都是我批准的，钱花了多少我可以检查嘛！"他们不但置广大革命群众于不顾，而且变本加厉地在这次会上，作出了大抓吃穿住，进一步大搞生活特殊化的黑计划。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攻击"三反"、"五反"运动中，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育英小学推行的修正主义，又一次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冲击。这一次，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韩××吓慌了神，他"感到精神负担很沉重"，惶惶不安。就在这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从幕后的支持，跳到台前指挥，赤膊上阵，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接见了韩××，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谈话。刘少奇为韩打气，说什么"凡是做一件好事，总是有人反对的，要顶住，不要怕反对，要按照一定的教育原则办学。有意见可以打官司，一直打到教育部"。当时的教育部党组书记正是刘少奇的忠实爪牙董××。很显然，刘少奇是借用职权，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对。在这次黑接见中，刘少奇的臭婆娘王光美也竟然恶毒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她说："不仅外面有人反对，就连中央也有人反对，最近人家还攻击很厉害！"就这样，刘少奇，王光美，为这个反革命修正义分子韩××打了气，鼓了劲，撑了腰，使他"怀着不平静的极其兴奋与鼓舞的心情走回学校"，更加卖命地为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报答刘的"光顾"与撑腰之恩。

在这次黑接见之后，育英小学更变本加厉地朝着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滑去。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迅猛异常地冲垮了被资产阶级所盘踞的一个又一个的顽固堡垒。在这滚滚洪流的冲击下，育英小学——这个被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支持下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控制的阵地，也更加集中、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正是由于那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刘少奇的支持下，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大力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兜售封资修黑货，宣扬“自来红”和反动血统论，大搞特殊化，加上学生家庭特殊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影响，这就严重地培养了一些学生的“特权思想”。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许多学生很容易接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大骂“狗崽子”，大搞武斗。在育英小学的一百二十多名工作人员中，被打的就达50％之多，被打入“劳改队”的，就有十五、六名。他们都是一般群众。他们对被打入“劳改队”的人，不仅肆意打骂，而且还施行种种迫害和污辱，让他们喝泥汤、唾沫、吃烂水果渣、吞鸡蛋皮、吃虫子、让他们互相打嘴巴、相互辱骂，让他们为学生洗衣、刷鞋、倒尿盆，服各种劳役。一些学生，毫不顾及无产阶级的国家法纪，大肆抄砸和勒索，使国家财产和教职工的私人财产，都遭到严重损坏和损失。体育馆、保健室、仪器室、音乐教室、图书馆、成绩室、资料室、队委会，……都被砸毁，两万多册图书，损失了绝大部分；钢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胡琴、留声机、唱片（200多张）都被砸毁。其他，教学设备也损失严重。有的以破坏公物来取乐，竟在五分钟内打碎二十八块玻璃。大小库房多次被盗，连教职工宿舍也不能幸免。二十多名普通教职工被抄家，有的被抄砸十五、六次之多。他们把抄走抢走的钱财，手表、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料子裤、皮鞋等据为已有。

有的学生，借“革命”之名，任意挥霍国家财富，满足个人享受，他们向公家大量借款，向公家报销种种不合理的开支。有的借条上还写着“如不借给，格杀勿论”！画着骷髅，来进行威胁。据统计，他们借款已达一千多元，报销的开支达八百多元。

反动的“联动思想”在育英小学泛滥。有的为“联动”站岗放哨，给“联动”送东西，配合“联动”抄砸革命组织的办公室。当社会上，广大革命造反派围抄“联动”的时候，有一部分学生便同“联动”站在一起，叫喊“联动就是好，联动是高干子弟的组织”。大骂“三司坏”“三司是混蛋”，并且攻击中央文革，谩骂驻在我校的参加了抄“联动”的解放军。

在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统治学校的日子里，不仅许多革命教职员工遭到迫害，而且一些革命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学，也受到种种歧视和污辱。但是，革命的师生员工同志们坚持斗争，在斗争中他们更加怀念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终于，无产阶级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攻的时刻来到了。

林彪同志在去年十月一日的讲话，敲响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

刘少奇，这个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被揪出来了！刘少奇伸进育英小学的黑手被抓住了。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目前，育英小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和全国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投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誓把刘少奇的黑《修养》批倒、批透；誓把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透。彻底斩断刘少奇伸进育英小学的黑手，彻底挖掉刘少奇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根子。要把育英小学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阵地！

十一学校调查报告

十一学校是高干子女集中寄宿制学校。十几年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互相勾结，阳奉阴违，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十一学校变成一所条件优越，待遇特殊的贵族式的学校，变成了刘、邓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的基地。

培养精神贵族的"乐园"

十一学校建于一九五二年，它是在"前辈出生入死、该让后辈享享福了"的修正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办的。

十一学校选择的是"家庭出身好、有条件培养"的军队高级干部子女，而把普通干部子女、广大工农兵的子女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就连该校的教职工子女也必须到校外上学。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眼里，高干子女是"天生上学的，不是劳动的。"

为了修这所九百人的高干子女寄宿学校，投资竟达 400 多万元，一切设备高级豪华。建筑面积三万平方米，校园占地二百五十亩，楼房建设钢筋水泥，瓷砖铺地。每平米造价高达二百六十元。学校内有容纳一千一百多个座位的富丽的大礼堂。有六十多张病床的"小医院"，有水磨石铺地的大饭厅。有水晶宫似的图书馆。学生宿舍楼内有从上海订购的千张高级钢丝床，从湖南买来的高级棕质床垫，还有机器洗衣房，理发室、汽车、花房、果园、喷水池。以及供学生玩乐的动物园。校园内种植各种各样的花木，四季常青。学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八、九年。"和平演变"就在这里发生。学生生活特殊。学校最初几年，每月伙食费十四元，鸡鸭蛋肉不断，每顿饭两个菜，一个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使学生不受"苦"，还设法从各地弄到黄豆一万斤，鱼一万斤及大量的糖和黄羊肉，甚至连战备储存的海带也弄到一万斤。

学生由保育员全面包干，精心照顾。五年级以下的学生吃饭分菜有人帮，保育员帮洗脸，洗澡。缝衣钉扣有人管，衣服脏了有人洗，回家返校汽车接送，有时接送学生的高级轿车竟在学校里停不下还要调两个交通警指挥。

在这样的学校里，一个学生一年经费达三百六十元左右，而普通走读学生则每年花费三十七元。两者相差何其远也。

学校编制庞大。现有一千五百多名学生，而领导人员、教职工达到二百四十多人，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比例是七比一（开办初期，曾是三比一）而普通学校则是四十比一。

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几十年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极力推行刘、邓的教育路线，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在这种修正主义教育下，他们只关心学生升学问题。他们公然声称："他们不同于工农子女，他们不升学谁升学，他们不升学让他们干什么去？""学校有这样好的条件，学生考不上学，不好交代，要打屁股的"。

为了升学，毕业班不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体育活动，甚至连平日劳动也取消了。

平时，学校没劳动任务，更谈不到到农村、工厂去、参加劳动锻炼，有时在校园里种花草，也不过是应付一下。

有的学生主动地帮助保育员擦擦地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在大会上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保育员说："你们知道这些孩子是干什么的吗？怎么是干这个的呢？"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学校开办初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参军"为名骗来一批十四、五岁的女青年，专做学生的保姆，要这些十四、五岁的女青年服待这些学生。甚至要年纪轻轻的保育员给十四、五岁的学生洗澡，有的孩子

不让保育员洗，而当权派却大骂保育员："照顾学生不热心、不周到"。保育员在这所学校成了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的工具。

这种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产生的严重恶果

学校从小就受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严重毒害，逐渐滋长了特权思想。

他们经常比爸爸妈妈官大小、比吃比穿，狂妄自大。有的打碎了玻璃，别人批评他时还说："我爸爸有钱"。据统计 64 年－65 年的一学期之内，全校损坏的玻璃就达 34 箱半。

有些学生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骂工农出身的学生是"小市民"、"土瘪"，而自己则血统高贵得很。

该校学生赵小曼，偷盗成性，某学生问他："你敢杀爸爸吗？"他说："逼急了，就敢杀，逼急了毛主席也敢杀。"可见思想是何等反动！教师要求开除他，但是上面的根子硬，后来被送新疆建设兵团。

还有些学生平常胡闹，在他们看来，闹得再厉害，最后也不过到建设兵团，实在不行，找个后门还可以参军。

由于长期脱离工农，脱离阶级斗争，所以根本培养不出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有的学生看表现劳动人民受地主压迫的影片，不但不同情不愤恨，反而说："这是小说加工"。有的竟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生活方式大加模仿，学西方电影里的阿飞。

综上所述，"十一"学校就是实现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温床。在这样的学校里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黑苗子，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了反修防修，为了保证我国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必须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彻底砸烂这个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

芳草地小学调查报告

一、修正主义的建校方针

1.入学条件：

芳草地小学于一九五六年建校，原名外交部干部子弟小学。招收的学生大都是外交部干部子女，区委机关、工厂企业干部（厂长、书记）子女，市卫生局、教育局、园林局、财贸统计局等干部子女。一九五七年转交地方后收了一部分附近的工农子女。干部子女（310 人）大都住校，其中外交部干部子女 93 人；工农子女（300 多人）全部走读。原规定住校条件是：父母双方在外工作，家里无人照顾的可以住校。实际上很多干部子女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就拉进来了。有个学生苏华说："学校向工农兵开门，工农兵哪里住得起，最后还不是咱们干部子女！我们有钱！"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分别编班，而把"好学生"（标准是长得好、穿得好、吃得好。）挑选到"国际班"，精心培养。

2.人员编制：

五六年办校时，学生 190 人左右，教职工人员达 25 人，教职工与学生人数比为 1：8，至六七年，学生达 600 多人，共十八个班，教职工与学生人数比为 1：7。而普通学校为 1：40 或 1：50。

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教师分成等级，将所谓"管得住学生的，穿得好的"教师挑选到"国际班"，如果没有就向外借。对于教得不好，没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就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调走。老师生活是最低的，什么权也没有，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眼里，他们是拿钱雇来的，打扫卫生是应该的。

3.生活条件：

学校环境非常优越舒适。学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吃的是细粮，白面、鸡鸭鱼肉。由从国外回来的厨师给他们做饭。每星期六由生活老师给学生梳洗打扮，下午家长坐着小汽车陆续到校，把他们接回家去。

学生伙食，量足、样多、质量好。偶尔吃点放糖的枣窝头，有的学生还破口大骂：“又他妈的吃黄金塔！”因此，每星期六还要改善伙食。在困难时期，每天还要吃到超过定量的糕点、水果。近几年，伙食费还逐渐提高，但有些家长和学生仍不满足，部分学生还要订牛奶，吃营养品。有一个班竟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吃营养品。甚至个别学生每星期一回校从家里带来整个的熏鸡，满口袋的糖果、葡萄糖、鱼肝油，还带着在课堂上大吃。

学生在生活上由生活老师全面负责，精心照顾。吃饭时生活教师把盛好的饭菜放在桌子上，吃一碗，盛一碗；生活老师还要做到“四快”（眼快、手快、腿快、嘴快），稍有一不快，就要挨骂。学生的碗筷也由工作人员洗刷。平常洗脸洗澡有人催，甚至还要老师洗。缝衣钉扣有人管，衣服脏了有人洗；小病有医务室，大病有人陪送到医院。有的学生连吃橘子也要由老师剥了皮。建校初期，个别学生因为家长在国外工作，星期天不能回家，学校就派几个老师陪着学生坐小汽车到动物园去玩。

学校成了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世外桃源”，学生在校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小姐”生活。但有的家长还嫌不满足。×××家长说：“你们尽给学生白菜帮儿吃，我的孩子在家里连白菜心儿都不吃。”

在这种修正主义的办校方针下，干部子女享受着种种特权，广大工农子女受到了排斥，甚至连厕所也分成两等；干部子女的厕所不准工农子女使用。两相对照，足见干部子女的特权享受达到了何等地步！

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芳草地小学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住校生说：“学校三座楼，你们占了两座半，今后，全部是你们的，还不好好学！”对教师说：“这些学生都是干部子弟，得好好教。”

“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老革命，长大了要接爸爸妈妈的班”。他们就是这样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改造干部子女的思想，极力把干部子女培养成血统的接班人。

他们还提倡资产阶级的所谓“妈妈式的教学”——“要象妈妈一样地照管学生。”

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芳草地小学提倡白专道路，追求三个第一。他们以教学任务压老师，以作业压学生，以考试压学生，一天要上九节课。另一方面，家长也对学校施加压力，住校生每天有晚自习，但有的家长嫌学习时间不够，题目出的不难。为了让自己孩子考上理想的“好”学校，每天晚上要把孩子叫回家去，增加学习时间，甚至有的家长要求教师每星期给孩子增加两篇作文。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忠实地按某些家长的意图办事。如：五年级有一个学生，还未毕业，家长为了试验一下孩子的水平有多高，强行要求学校批准他的孩子参加升学考试，结果考上了一个普通的中学，家长很不满意，为了让孩子考上“一○一”等“第一流”的学校，又将孩子送回学校，继续上学。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用种种物质的办法来引诱学生追求智育第一。如每学期给学习好的学生颁发奖状、奖品，也不管学生的思想品德好坏。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味追求学校的升学率，每学年末精心安排毕业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为毕业班让路。提前一个月就结束毕业班的科任课。为了增加复习时间，不让学生参加劳动，不过少先队的活动，甚至连一周一次的校会也不让参加。当权派对青年教师施加压力说：“学校的希望就寄托在住校班的身上，考不上第一流的学校可不行。”这样的结果，干部子女都能保证升入到满意的学校。个别的学生虽然毕业时成绩不够××学校录取标准，但通过内线可以进入这个学校。

由于智育第一，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学生只知道埋头读书，对国家大事置之度外；使学生对待毕业问题不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而是“一颗私心、一种准备”，想的是读书，升学、搞尖端、当官发财。

3.脱离工农群众，脱离劳动。

芳草地小学根本没有把学生参加劳动锻炼放在重要位置。学生在优越的环境里生活，只是埋头读书，什么劳动也不参加。有的学生积极要求参加劳动，主动帮助教师打扫厕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骂生活老师：“你们什么都让学生干了，你们干啥？学生到厕所得了痢疾怎么办？”他们借口“学生小，父母又不在家，去劳动碰坏了不好办。”从来不让学生参加劳动；他们对学生参加劳动有“四怕”：“春天怕得传染病，夏天怕中暑，秋天怕风吹，冬天怕寒冷。”甚至连春游也不组织，怕学生“碰破皮。”

三、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在芳草地小学的恶果

1.浪费现象极为严重。

有些学生对劳动人民辛辛苦苦收下来粮食毫不爱惜，成盆成盆地倒掉了；一些学生用菜打架玩；有个别学生不爱喝菜汤，把菜汤往老师身上泼，把不爱吃的肉往房顶上扔；有的学生打坏了学校的玻璃，损坏了床铺，还说：“我有钱赔”!

2.小偷小摸事件不断发生。

一些学生小偷小摸的行为很严重。据统计，有一个班共有男生20名，只有3个同学没有发现偷窃行为，其余都不同程度的偷窃行为。

3.目空一切，卑视劳动人民。

据革命师生揭发，芳草地小学有些学生认为自己出身好（革军、革干），常在一起比吃比喝，比父母官大小，钱多少，比家庭设备好坏。×××学生对老师说：“我爸爸盖一个章就枪毙你！”有个学生说：“我爸爸还管着咱校长呢！”学校里经常出现破口大骂老师的现象。一些干部子女学生对一般劳动人民子女极不尊重，

嫌他们“脏”、“笨”、“难看”。学校成了住校生的天下，他们可以任意欺侮打骂走读生。

4.腐化堕落，思想变坏

有个学生父母都在某电厂担任领导工作，因为他怕人家说他的父母官小，欺骗老师同学说：“我爸爸是付市长，妈是党委书记，我跟爸爸妈妈都能坐小汽车。”他看到有的干部家里有电视机，怕人家说他家里没有，就撒谎说，他家里也有电视机。他还要别人替他人打水，当马骑，叫他“孙二爷”。

有个学生卢××，用糖果拉笼一批小孩，自称为头头，让这些人去打别人。问他为什么想当干部，他说：“当干部钱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将来当干部穿皮大衣，骑摩托车……”

有个学生借给同学一毛钱，要同学还他两毛钱。

有的学生不愿看阶级教育的红色书籍，却在小说中寻找低级趣味。

有的学生说：“刘文学真傻，因为一把辣椒死了，多不值得！要我就先向地主投降，然后再逃跑。”甚至有极个别的学生产生反动思想，特别羡慕从国外投诚回来的敌人，说：“我将来去投诚蒋介石，也给我一大批钱，穿着大皮靴，跨着大洋刀，多威武！然后我再投诚回来，又给我一大批钱，这样我一辈子什么也不干了，也花不完。”

芳草地小学是刘邓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统治的一所干部子女学校，在这学校里，青少年受着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毒害。这样的学校制度就是要把它彻底砸烂！

（全文完）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一九六七年七月）

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

师延红

1967-07-18　人民日报

建国十七年来，教育战线同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一样，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毛主席为无产阶级制定了一条革命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凭借窃据的党政大权，顽固地推行一条又粗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前一条要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后一条要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前一条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后一条要为地主、资产阶级传宗接代。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在十七年中，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把教育作为他实现篡党篡军篡政阴谋的工具，纠集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直盘踞着教育界，疯狂地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现在，是我们彻底挖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打倒这条路线的总后台的时候了。

旧教育制度的护法神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象巨人一样在世界的东方站起来了。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只能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叫嚣资本家“剥削有功”，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反映到教育战线上，同样也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尖锐斗争。

建国初期，全国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教育。一种是老解放区的新教育。这种新教育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抗日战争时期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以及各解放区继承这些学校的革命传统所办的许多学校，都是崭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这些学校造就了大批的革命干部。早在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这个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个方针的核心，就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服务。

另一种是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接收过来的旧教育。这种教育是为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剥削制度而服务的。

当时，这两种教育在数量上十分悬殊。以高等教育为例，解放区的新教育只占百分之十五，而国民党统治区的旧教育则占百分之八十五。

这样，教育战线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是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去改造旧教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为实行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效劳呢？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应该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的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改革“旧有学校教育事业”。毛主席明确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建国初期，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教育事业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发展，同时也作了一些改革。

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他一方面极力贬低老解放区的新教育，诬蔑抗大式的学校是“训练班性质”，“不算正规的大学”；甚至攻击毛主席亲手制订的抗大办学方针“过时了”，“必须加以抛弃”。

另一方面，他又大肆吹捧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文化侵略而在中国举办的学校，胡说什么“按照西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的经验办起来”的大学，“对于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科学水平和认识水平是有很多成绩的”。他无耻地说：“不论外国人、资本家及一切有钱的人，凡愿拿钱办学校、维持学校的都欢迎，……办学校是有功劳。”这充分暴露了这个自称“红色买办”的奴才的丑恶嘴脸。他还说什么“历史课本没有教材，《资治通鉴》也可以读”，要我们向封建主义学习。以后，他又在“学习苏联”的旗号下大肆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他指使教育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全盘苏化”当作改革教育的“不可动摇的方针”。这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的一套破烂，从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以至考试方法，就在“学习苏联”的绿灯下，改头换面，畅通无阻。

中国的赫鲁晓夫还公然抗拒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指示，恬不知耻地向青年灌输“向上爬”的市侩哲学。他要求学生“认真钻研业务”，“努力使自己成为‘红色专家’”。又说：“只要学好一门专业，将来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教育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按照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指示”，草拟了《学位、学衔和荣誉称号条例》、《培养副博士、研究生条例》，企图以名利为钓饵，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他所需要的资产阶级接班人。

在这情况下，连一些原来具有老区办校传统的学校，也逐渐地丢掉了老传统，搞起封、资、修的一套。有的抗大式的革命大学，就被“改造”成为莫斯科大学那样的所谓“最科学、最先进的新型正规大学”。这些现象的发生并不奇怪，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利用教育这个工具的真实目的。

建国以后在教育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是反动的旧教育吞掉了革命的新教育。这正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充当了旧教育制度的护法神，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

反攻倒算的司令

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这是在毛主席提出的三面红旗号召下，政治、经济战线上起了深刻的变化，“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打破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束缚的结果。就在这一年，毛主席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于是，一场教育大革命就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地爆发了！

这场教育大革命是工农兵史无前例地英勇地占领教育阵地的第一次尝试，他们创办的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教育的严重局面被打破了。这场教育大革命，对在“学习苏联”的遮羞布下，集封、资、修之大成的旧教育制度，进行了大批判；统治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顿时颜面无光，威风扫地。这场教育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教学改革运动，对学制、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师生走出书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学习，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非常仇视教育大革命。还在教育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之际，他就煽阴风、吹冷气，给教育大革命加上了“学习质量也可能下降”等罪名。他甚至还攻击教育大革命的指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叫嚷“过去教育方针、教育目的不明确”，要“进行批判”。以后，他又不断地恶毒攻击文教战线上的大革命是“空谈革命，带引号的革命”，是“偏向”，并且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咒骂党“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

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的赫鲁晓夫趁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掀起一股反华反共的逆流的时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在教育战线上，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等一伙，在“纠”教育大革命之“偏”、“提高教学质量”的幌子下，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煞费苦心地“总结”了北洋军阀时代和国民党时代“名牌”学校的经验，东抄西袭地搬用了美英等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的教育经验，把封、资、修的教育破烂精心地熔为一炉，把它披上马列主义外衣，冒充为新中国十几年教育的理论总结。他们从学制、课程、教材以至规章制度等搞了一系列的措施，配套成龙，强行推广。这集中表现在《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上。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被中国的赫鲁晓夫钦定为“根本大法”，强迫各级学校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这样，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旧教育制度，就完全理论化、系统化、具体化、法令化了。

这些条例强调必须“保持学校的正常秩序”，否定教育大革命的成果，大搞“智育第一”、“技术至上”，根本排斥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的一切阵地，根本反对人的思想革命化，根本不提在学校里进行灭资兴无斗争。

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的爪牙密谋策划，在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体制上，提出所谓“小宝塔”的谬论。这个“小宝塔”，就是资本家开学店的翻版和“发展”。资本家开学店，采取淘汰制，把大批青少年刷下来，只让越来越少的人步步高升。中国的赫鲁晓夫大搞什么“重点学校”，主张“搞一两个大学，招一些优秀生深造”，“读几年，就几年，总之质量不要降低”，这无非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一批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精神贵族。八年制的大学就是这种学校的样板之一。它“点滴不漏地继承了”美帝国主义的一套办学经验。八年制继承下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继承下来了，淘汰制、导师制、天才教育等一整套帝国主义的教育制度也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结果，这所学校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只培

养出五十多名学生。在这种教育制度毒害下，这些学生中有些人为了追求个人名利，为了当“专家”、“教授”，就是不愿意下乡下厂去为工农服务。

在教育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农举办的各类学校，因为不符合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要求，便遭到了大斧砍杀。例如，据一九六二年的不完全统计，农业中学从二万二千六百所，二百三十万名学生，一举砍到只剩下三千七百一十五所，二十六万六千名学生；小学也被大批砍掉，学龄儿童入学率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八十点三，猛降到百分之五十六点一。这样，大量的工农子弟又被推出了教育禁地。

按照中国的赫鲁晓夫钦定的教育法令，党在学校里只起“监督、保证”作用。他曾经凶神恶煞般地说：“就是要撤掉（党）支部的领导职务”，把教育大权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他，把教育大革命中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诬蔑为“戴帽子乱斗”。还是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了“脱帽”、“加冕”政策，一律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知识分子”的桂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顿时身价百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狂妄地叫嚷：“一九五八年以来学校唱小生戏，现在又该我们老生出场了！”这些牛鬼蛇神窃踞了教育界的大权，残酷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学校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前哨阵地。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假共产主义教育的祖师爷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击战开始了！

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特别

是列宁亲自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向全世界革命人民敲起了警钟。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内也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中国怎样才能不变颜色？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不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向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

由我们天才的领袖毛主席领导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能够圆满地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毛主席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毛主席指出，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九六四年春节以后，毛主席亲自狠抓了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教育工作做了多次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长期以来，隐藏在幕后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眼看形势不妙，气急败坏地跳了出来。他在毛主席的春节指示以后不到三个月，抛出了他的贴着共产主义商标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企图和无产阶级继续顽抗，保存教育阵地上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中国的赫鲁晓夫把他所炮制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吹嘘成是"防修"的三大措施之一。另一方面，他又采取组织措施，成立一个由自己挂帅的"教育办公室"，还企图自成系统，要各级相应建立"第二教育部"、"第二教育

厅”、“第二教育局”。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赤膊上阵，周游全国十几个省市，作了二十多个报告。一年之内，由教育部、高教部、农业部、卫生部分别出面，召开五次全国性会议。他的一群狐群狗党如彭真、陆定一、蒋××之流，更是四处奔波，扬言要使“两种教育制度”这个“发明”家喻户晓。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大树自己威信的同时，凶相毕露，放肆地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叫嚣：“就是要造成一个形势，将他们的军。”“你当权，我也可以当权。”看，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气焰，达到了何等嚣张的地步！

所谓“两种教育制度”，到底是什么货色呢？中国的赫鲁晓夫自己有一个解释：“我们的国家应该有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这种全日制学校不能缩小”，“大概要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另一种是要“大力发展”的“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显然，“两种教育制度”就是全日制加半工半读。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搞这套玩意儿呢？他说：“上全日制上不起，就得上半日制，而全日制就这么多，要读书就只好上半日制学校嘛。”他的爪牙蒋××说得更露骨：“上得起的，进大学；上不起的，下农村。”原来这是要在全日制培养少数精神贵族的同时，由半日制学校来应付“上不起”学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女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为被驱使的“普通工人农民”。

半工半读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篡改了毛主席关于半工半读的伟大指示，推销他自己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

中国的赫鲁晓夫所谓的“半工半读”，等于全日制砍掉一半，补上劳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些指示。“半读”，还是象全日制一样，让学生死啃违背毛泽东思想、脱离三大革命实践的死书；“半工”，只是让学生作为一个劳动力参加劳动。如此半工半读，还是承袭一

套旧教育制度，还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还是大搞“智育第一”、“技术至上”等等，哪里有一点共产主义教育的气味呢？

有的半工半读学校，根本不提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根本不搞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宣扬什么“学习猛钻、劳动猛干”的“校风”。大半时间，要学生作为劳动力到工厂里劳动；小半时间，讲授全日制教材上的支离破碎的书本知识。培养目标，就是成为“几级工”。而这样的学校，竟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大肆吹捧、亲自树立的半工半读“红旗”！

一句话，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半工半读，就是资产阶级的职业学校；“两种教育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才教育”和“劳动者教育”的“双轨制”的翻版。中国的赫鲁晓夫把“两种教育制度”冒充为共产主义教育，吹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最好货色，岂不叫人笑掉了牙！

由于他的“两种教育制度”，是让有钱的人上“全日制”，“培养专家”，经济比较困难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上半工半读，培养“普通工人农民”，这就不但不能缩小三大差别，反而加剧了阶级分化。

由于他的“两种教育制度”，根本不谈要学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自觉地实现思想革命化，而只要求学生“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都能搞”，这样的学生根本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新人”，而是只懂得技术、借技术向上爬的修正主义苗子。

由于他的“两种教育制度”，闭口不提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提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谈什么“半工半读本身就是阶级斗争”，引诱人们埋头去搞教育，这就不但不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正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拓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一再鼓吹、一再推行的“两种教育制度”，“消灭三大差别”是假，扩大三大差别是真；培养共产主义“全面发展的新人”是假，造就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是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的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政治路线在教育上的具体表现。

显而易见，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共产主义教育的“祖师爷”。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在给林彪同志的信里指出：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我们办教育的最高纲领。它正式宣判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两种教育制度”的死刑，宣判了解放十七年来他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旧教育制度的死刑。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一股汹涌澎湃的巨流，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中国的赫鲁晓夫所控制的教育阵地，连同他所控制的其他阵地，一个个被无产阶级夺回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被揪出来示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斗倒斗臭，批深批透，彻底摧毁从孔夫子以来统治了几千年的剥削阶级教育制度，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使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变质，使我们的江山永远红，红到底！

戳穿“两种教育制度”的反动本质

教育部　延安公社

1967-07-19　人民日报

编者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贯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他妄图利用教育阵地来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六四年春节，毛主席对教育工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提出了改革教育的极为重要的指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抗拒毛主席的指示，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个“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纲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纲领。

所谓“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不过是资本主义教育的“双轨制”的翻版。即一方面原封不动地保存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妄图把少数人培养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另一方面推行不要革命、不讲政治、片面强调劳动技术、单纯追求经济收益的“半工半读”制度，妄图把大多数人培养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技术工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推销他的所谓“半工半读”，给它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把它说成是“防修反修”的重要措施，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他到处招摇撞骗，并利用职权和通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贯彻推行。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决战阶段。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向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猛烈开火，把他的所谓“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一九六四年五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之后，抛出一个“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修正主义教育纲领，公开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为了推销这个修正主义教育纲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鼓吹说：“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制度”，是“共产主义的教育制度”，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消灭三大差别，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他的忠实爪牙们也把这个修正主义教育纲领捧上了天。他们胡说什么，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重大的革命措施，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果真是这样美妙吗？不，这全是欺人之谈。恰恰相反，它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名为缩小三大差别，实为扩大三大差别

所谓“两种教育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货色呢？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我想，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即：“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整天都是读书”，这种学校“是国家办的，质量要求高”，“大概要搞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这种学校“有经济目的，个人和国家都有经济目的，因为第一类学校吸收不了这么多学生，家庭也供不起，自己又考不取，因此，就要不靠家庭，不靠国家，自己做工读书，优秀的考上第一类，次一些的就进入第二类”。

这就是说，他主张家庭供得起的、“优秀”的学生，上第一类学校；家庭供不起的、“次一些”的学生，上第二类学校。这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我们设计的“消灭三大差别”、“建成共产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蓝图。

这完全是一个骗局。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推销的“两种教育制度”，绝不是一种“缩小”或“消灭”三大差别的“革命措施”，而正是一种极力保留和扩大三大差别的反动措施。

他提出“两种教育制度”，本来就不是从缩小三大差别的目的出发的，而是从有利于保留这种差别、有利于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和特权阶层出发的。他从解放初起就大肆鼓吹举办“正规”的大学。直到一九五六年，他还坚持中国“普及教育当前还不是那么紧，当前还是高等教育，还是专家问题”的谬论。但是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后，劳动人民子弟的升学要求越来越强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表面上装出一副关心劳动人民子女入学的样子，乘机抛出他那套半工半读的黑货，企图把大多数劳动人民子女培养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劳动力。而他真正关心的，还是那种“由国家办的，质量要求高”的全日制学校。在全日制的学校体系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一伙又选择和重点举办一整套“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做为重点中的重点，称之为“小宝塔”系统。

什么人才能够进入这个“小宝塔”呢？“家庭供得起的，上第一类学校，家庭供不起的上第二类学校”，“优秀的考第一类学校，次些的进第二类学校”。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规定的这个入学标准，实际上使得劳动人民的子女进入“重点学校”比登天还要难。他们即使被录取，也往往受到种种刁难，甚至以种种借口把他们“淘汰”出去。这样，进入“小宝塔”便成了少数人的特权。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公然篡改这个方针。他为第二类学校规定了一个培养目标，即所谓“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而凡是列入“小宝塔”系统的“重点学校”，则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培养目标。例如在清华大学，蒋××提出的培养目标是“红色工程师”，是“几十年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骨干”；在中国医科大学，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美国和旧协和的教授、博士做为自己的培养目标；在景山学校，陆定一及其一伙居然公开提出要在这个学校培养“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妇联主任、中央委员、总理、领袖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这样，进入半工半读学校的，就决定了他们只能一辈子当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而进入“小宝塔”系统的，便决定了他们要当“领导”，当“专家”，成为特权阶层。

这两类学校的培养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学校基本上是“整天都是读书”，脱离劳动，脱离政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把大量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灌输给青年一代。另一种学校则把学生参加劳动，解决“教育经费”，“赚钱”，训练劳动力，列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一方面，通过第一类学校、特别是“小宝塔”，培养统治人材，培养特权阶层和精神贵族，培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骨干”；另一方面通过第二类学校，即半工半读学校，培养掌握生产技术的被统治者，培养他们的“驯服工具”。这就是“两种教育制度”的本质。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此卖力地推销“两种教育制度”，其目的是妄图通过它选择和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权，使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

用资本主义半工半读冒充社会主义半工半读

搞“两种教育制度”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但是，提倡半工半读总没有错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能想从这里捞半根稻草。

但这是徒然的。

半工半读这种学校教育形式，资产阶级可以搞，无产阶级也可以搞。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掌握熟练生产技术的后备劳动力，是需要给工人以必要的受教育的机会的。通过半工半读这种形式来训练工人，这是符合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半工半读就可以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因此，我们从来并不否定半工半读这种教育形式。相反地，毛主席一向提倡通过半工半读这种教育形式，来促进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但是，离开了半工半读的阶级内容，违背了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以为半工半读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搞了半工半读就可以“消灭三大差别”，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在理论上是十分反动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提倡的半工半读，是资产阶级的半工半读，是为了按照他的《修养》的要求培养“驯服工具”的半工半读。

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四年以来二十多次的报告，就可以证明这点。他在这些讲话中，根本不提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根本不提用毛主席的著作去武装青年一代。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去搞半工半读，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半工半读。

他在这些讲话中，绝口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绝口不提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绝口不提争夺青年一代的阶级斗争，反而大讲什么“半工半读本身就是阶级斗争”，只要搞了半工半读就可以“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如果按照他这个荒谬的逻辑，那末，美国在许多年前就实行了半工半读，岂不是它们早就“消灭”了阶级，“消失”了“三大差别”。这真是最大的欺骗！党内最大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意抹杀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是给资产阶级占领教育阵地、争夺青年一代大开方便之门。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政治是灵魂，要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大讲技术挂帅，说什么“工人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才能发展，到那时候，就可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说什么学校“经营管理好了”，“人的精神面貌就会好，群众热情就会高”。他在讲话中还要大家在半工半读中“打算盘”，使之赚钱而不亏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的半工半读的学校领导人把学生当成了无偿劳动力，把半工半读学校办成了资产阶级的营利机构。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半工半读的性质归根结底也是决定于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些讲话中，有意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其目的是要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巩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说到底，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阶级斗争，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单纯搞一个“半工半读”的教学形式，这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消灭三大差别的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阴谋。我们必须戳穿“两种教育制度”的反动本质，把它批深批透。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精神，继承和发扬“抗大”的教育传统，办好社会主义的“半工半读”，把整个教育战线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反面教员的“教育理论”可以休矣

山西大学中文系　反修兵

1967-09-17　人民日报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我们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我们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不断成长壮大。

我们的革命行动，吓坏了克里姆林宫里的老爷们。他们如临大敌，赶忙发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极尽其诋毁诬蔑之能事。在一片骂声里，这些家伙胡说什么今天在中国，“知识在被禁之列”，人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还说什么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之一”是“关闭所有学校”。

苏修集团彻底背叛了马列主义，他们成天做的是卢布、利润的梦，干的是出卖革命的事，现在，竟然装腔作势大谈什么知识问题，对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真是恬不知耻！

“知识在被禁之列”吗？苏修老爷们真是世界上最可笑的“知识里手”，竟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知识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知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知识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实践中我们深深懂得：这知识，那知识，毛泽东

思想才是最宝贵的知识；千重要，万重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重要。我们革命青年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当然，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也有属于“被禁之列”的“知识”，那就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一套所谓“知识”。阶级敌人妄图利用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玷污我们的肌体，腐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和平演变”。对于这些“知识”，我们就是要大批特批，大禁特禁。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宣判了旧教育制度的死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砸烂旧教育制度，资产阶级的什么“学者”、“权威”和“教育家”所兜售的那一摊子破烂货，统统在被禁之列。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地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毛主席还强调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受教育的最好机会。我们的千百万青年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冲破了千百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束缚在我们头上的枷锁，走出课堂，冲向社会，横扫四旧，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我们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改造自己，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正如列宁所说：“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我们今天不上课，正是为了明天更好地上课；一年不上课，正是为了今后千年万年上好课。苏修领导集团恶毒诬蔑我们“关闭所有学校”，不要“知识”，不要“学问”，我国青年“没有实行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其实，他们攻击的，正是我们所主张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列主义的教育方针。在他们看来，青年只有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去听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鬼话才是天经地义的事。

苏修《教师报》诬蔑说什么中国“对青年一代的教学和教育，不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利益考虑的，而是从上层集团的私利考虑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在阶级社会中，教学和教育都是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我们中国青年一代的教学和教育，就是要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就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忠于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真是不打自招。苏修领导集团的教学和教育，正是地地道道从苏修“上层集团的私利考虑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为了培植替他们一小撮上层集团效劳的奴才，他们利用“物质刺激”和“个人名利”为诱饵，腐蚀青年的灵魂，消磨青年的革命意志。苏修领导集团是毒害苏联青年的罪魁祸首。总有一天，苏联革命青年会向列宁的叛徒发起猛烈的冲击。

考学之道

1967-09-17　人民日报

稀奇的“商行”

库拉什斯基农村医疗站主任的儿子林果·格格希泽象贵族的公子一样地长大。从小时候起，他的各种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孩子不愿去学校学习，家里就请家庭补习教师。多情的爸爸还给儿子“弄到”一个小学毕业的金质奖章。

可是，到了要上高等学校的时候，林果跺着脚，不容反驳地坚持：要在莫斯科学习。儿子的意志就是法律。爸爸带着儿子来到了莫斯科，把儿子的命运，委托给一个一九五八年夏天成立的名叫“布哈拉泽—K”的“商行”。“商行”的领导人是莫斯科某精神病科学研究所营养媒介实验室主任，他的助手是一伙大学生。这些人联合起来的目的是：找人替公子哥儿们考试，把他们“安插”在各个不同的高等学校里，从中赚钱。

替林果·格格希泽考试的是奥·沙尔基索夫，为此，“商行”得到了预定的四千卢布。

在三年内，这个“商行”将大约四十人“安插”在十三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高等学校里，每个人单独受贿三千到五千卢布。那么，行贿者从那儿来的那么多钱呢？毫无疑问，这样大规模地行贿，是和占用国家和社会财产密切相联的。（据苏联《农村生活报》）

卢布保送

卡兹加兰捷列雅供应站营业员基姆的女儿伊斯克拉打算考学校。爸爸认为地毯神通广大。妈妈相信钱的力量。为了保险起见，全家一致决定：也送地毯，也送六百卢布。事情托给大学生克拉尤什金。

“这个事你能办吗？”

“能办。”大学生连眼也不眨地说。

“亲爱的，拿去吧，六百卢布，交给应该交的人。”

克拉尤什金刚跑去找过了“自己人”，伊斯克拉就考了两个五分啦。六百卢布生效了。应该快点。克拉尤什金找到他认识的教师们，给他们三百，另外三百自己留下。这些教师们也不是傻瓜，一百五留给自己，一百五交给考试委员。（据苏联《共青团真理报》）

苏修在教育方面全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　为苏修反动统治服务

1967-09-17　人民日报

编者按　苏修领导集团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教育方面全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进行的所谓教育“改革”，已把苏联教育改成完全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了。

从本报今天发表的一些材料中就可以看清楚，苏修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是培养精神贵族、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的温床。

苏修领导集团经常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来掩盖苏联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什么“以共产主义教育青年”呀，“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建设者”呀，这些通通都是骗人的鬼话。苏联的学校向学生灌输的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其目的就是把苏联年青的一代培养成为脱离劳动人民、高居于劳动人民之上、满脑袋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修正主义者，来维护和巩固他们的修正主义统治。

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苏联的教育中，明显地存在着贫富悬殊，存在着极端的不平等。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弟享受着种种优越条件，为所欲为，飞黄腾达，一方面是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弟遭受排挤和打击。在苏联的教育界学术界，学阀垄断知识，飞扬跋扈，割据纷争。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反映。

苏修领导集团在复辟资本主义和毒害苏联青年一代方面犯下的滔天罪行，必将受到苏联人民的清算。

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苏修统治集团通过“改革”教育，在教育中大肆贩卖修正主义货色，使教育成为他们在苏联搞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的重要阵地。

鼓励走白专道路

苏修大力宣扬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者”。在苏修教育思想上，处处表现为“智育第一”，学习成绩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使学生走上脱离实际、脱离劳动，单纯追求书本知识的白专道路。

苏修把助学金制度作为对学生进行物质刺激，鼓励白专的手段。成绩不好，就不给助学金，成绩愈好，助学金愈高。这样，文化基础好的特权阶层子女，只要稍加努力，取得较好的成绩，就能获得高额助学金和“优等生”的称号，并且在毕业分配时能够享受种种优惠待遇。

在知识是“最高仲裁者”的口号下，苏修高等学校极力排斥劳动人民子女。苏修报刊甚至公开贬低劳动青年，说他们是“既没有能力，又不愿献身于科学的人”。此外，苏修还利用淘汰制，把工农青年赶出学校。据《苏维埃俄罗斯报》透露，乌拉尔大学最近五年淘汰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二倍，其中“有工龄的人占多数”。

灌输修正主义思想

苏修以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苏共纲领为纲，向学生灌输修正主义思想。

苏修集团编辑出版了大批修正主义的教科书，篡改苏联历史，大反斯大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把“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货色一古脑儿塞了进去。其中，《苏联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是他们精心炮制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苏修集团继一九六三年决定在中学毕业班开设《社会学》之后，一九六四年又决定在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原理》课。这种课程大肆宣扬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猖狂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修在教育中还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鼓吹“把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当作青年们永远遵循的原则”。他们甚至宣称“共产主义，我们认为也就是仁慈。”此外，苏修集团还极力向青年灌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的修正主

义黑货，公然无耻地说："苏联决不容忍把宣传战争的教科书给儿童看，因为凡是战争都会给人民带来灾难"等等。用名利地位腐蚀青年

苏修的教育制度使社会差距扩大，是特权阶层子女登上上层社会的阶梯。大学文凭是升官发财的通行证，有了文凭就有了一切。苏修高教部长叶留金公开宣扬"劳心者治人"的资产阶级观点，说什么"高等学校的任务培养生产组织者和专家"，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决定了青年未来社会地位的差别。

大学毕业生可以爬上科学家、教授和经理阶层，他们的待遇与工农相差悬殊，工程师工资每月一百至三百卢布，厂长三百至一千卢布，教授三百五十至二千五百卢布。而一般工人工资每月仅三十五至九十卢布。

苏联的大学生在熬过两个学年以后，从三年级开始，就得跟一个导师开始作学年论文，为以后的毕业论文作准备。如果被认为有"天才"，以后就会被提为作研究生。只要研究生毕业，得到副博士学位，则"天才"的培养阶段就算结束，以后就可以靠自己的"本领"努力向上爬了。

苏修统治者就是这样用名利地位来腐蚀青年，把他们所谓的"天才"培养成继承他们衣钵的、为他们的修正主义统治服务的"人才"。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青年人只知道千方百计地为追逐名利而"努力"。考试作弊现象是普遍而且公开的。莫斯科大学有些班级的共青团支部还领导团员有组织地作弊。

苏修反动的教育制度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具有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终将起来推翻苏修统治集团，砸烂现行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

鲜明对照

1967-09-17　人民日报

在苏联的大学里，特权阶层子女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的地位和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某高等学校有个大学生，是将军的儿子。这个年轻人整天吃喝玩乐，最喜欢干的事情是穿上黑色礼服，捧上一束鲜花，去玩弄女同学。

一个名教授的儿子，每天早晨总是领着一条狗去逛马路。他经常不上课，作业完不成，实验报告写不出，论文也不能按时交卷。但是，他却能照样一级一级地升上去，最后居然毕业了。因为在苏联，只要有两位教授保送，就可以免试进莫斯科大学，而在平时考试中，谁也不敢给一个教授的儿子打"两分"，让他留级。

苏联的助学金制度是按"成绩"评定的。考试分数越高，助学金就越高，不管家庭经济情况如何。老老实实不会作弊的工农子弟，永远只能得很低的助学金。莫斯科大学有一个穷学生，家庭有负担，他每天下课后还得出去做"零活"，干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赚取一点工资维持生活。寒假和暑假期间，他还要去干重体力劳动，赚一笔钱准备下一学期的费用。他能有多少时间去复习功课呢？

一个集体农庄庄员的儿子，考入了门氏化工学院。助学金维持不了生活，他在电话局找到了个看电话的差使，每周从星期六到星期日连续工作四十八小时。他有心脏病，每次下班后，就累得瘫在床上起不来。

电工萨沙已经三十多岁了，工作了十多年，每月工资不过八十至九十卢布。他考入了高等学校，本人的助学金加上妻子的工资和老母的养老金，不够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萨沙只好经常去医院卖血。

在苏修集团大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　苏联高等学校一片乌烟瘴气　苏修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激起苏联人民和学生的满腔怒火

1967-09-20　人民日报

据新华社讯　莫斯科消息：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的统治下，今天苏联的高等学校是一片乌烟瘴气。不久前，苏修《列宁旗帜报》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的莫斯科商业学院的混乱情景，正是目前苏修高等学校的一个缩影。

在那里，特权阶层的子女靠着父母的权势和金钱，酗酒作乐，逛咖啡馆，横行霸道，甚至杀人行凶。

在那里，歪风邪气日益泛滥，主持正义的学生受打击，被迫害。

特权阶层少爷横行霸道

据苏修《列宁旗帜报》的文章透露，苏联特权阶层的少爷、莫斯科商业学院的学生巴加耶夫，在公共宿舍里，猖狂地把不愿受他凌辱的女同学塔马拉从五楼的窗户推下去跌死。

塔马拉对苏修领导集团倒行逆施带来的恶果，满怀强烈的仇恨。她在入学自传中曾写道："我的祖父，老布尔什维克，教会我区别真正的人和败类。"

资产阶级分子的儿子巴加耶夫及其一伙"游手好闲的人"，经常对塔马拉进行挑衅，并恫吓她和她的朋友。塔马拉对女同学们说："你们怕这些败类干吗？"

塔马拉同苏修领导集团培养的特权阶层的败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今天在资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新显贵及其后代可以仗势欺人，任所欲为；而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子女则毫无保障，塔马拉终于被杀害了。

领导勾心斗角　学阀丑事百出

“对于塔马拉之死”院长认为主要是“社会组织的罪过”，党委认为“主要罪过在于行政部门”，彼此一推了事。

文章透露，这个商业学院的院长和党委书记长期以来彼此攻击，割据纷争，互相进行“秘密战争”。“内讧在最高一级进行得十分激烈。”

“成年人、学者互相中伤，仿佛这就是他们的专职。”有的“教师收了学生的贿赂”；有的“干脆在饭馆举行考试”；“某人与某人由于嫉妒而发生争吵”……

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活标本

文章接着透露：“在学院的公共宿舍里，热闹地进行着进口女用上衣的投机买卖。酗酒成为许多学生的必不可少的特点，亲密的关系是同这些轻浮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已经不使任何人感到奇怪。公共宿舍成了游手好闲人的方便的庇身之地，他们在这里酗酒作乐，甚至胡作非为，有时竟在女生宿舍过夜。”

“这里有一些学生处于特殊地位。他们每月从父母那里获得巨额‘学费’，在饭馆和咖啡馆跟气味相投的姑娘们消磨课余时间，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条获得高等教育的道路是最不吃力的。在会考中，他们很快发现考试证和菜目表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不及格的课目超过可允许的界限的时候，他们就被开除出学院。可是，过了一两年，他们拿着有关共和国消费合作社联合会的出色鉴定，重返莫斯科商业学院……曾被学院开除的三十九名学生中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由于经常不及格和道德败坏而两度被逐出学院大门的巴加耶夫也是这样。父亲无限的资助使他可以走遍天下……新年前夕他到了佩尔洛夫卡（莫斯科商业学院宿舍的所在地），在那里，象他一样的文凭的热烈追求者们牢牢地筑起了安乐窝。”

“莫斯科商业学院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的某些方面”是使学生们“把个人的幸福看成是宇宙的主要内容”。

文章还透露说："基亚契夫持刀打架的事件几乎造成死人的结局。医生抢救了受害者，而凶犯仅判一年徒刑。当基亚契夫服满刑期回来的时候，他在学院复学了。现在，他又犯了罪，受到通缉。卡塔马泽的丑恶行为也是大家所记得的。他在公共宿舍常常酗酒，拦住女学生不让走。而在莫斯科，在'清池塘'咖啡馆，他大吃大喝，殴打女服务人员。可是法院这一次又只对他进行了实际上是象征性的惩罚。受害者在法院突然成了被告的辩护人，其真正动机如何，只能加以猜测。……"

"这是一些不能无视的事实。然而只要稍微作些努力来使这些放肆的流氓就范，就会引起某些人的纷纷责难。""他们并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发出的威胁。"

苏联人民决不饶恕苏修的罪行

从苏修《列宁旗帜报》这篇文章中透露的种种情况可以看出，塔马拉被杀害及莫斯科商业学院一片黑暗情景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这正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在莫斯科商业学院过去曾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女英雄沃洛希娜建立了一个纪念馆。当年这位年青姑娘，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勇敢地参加了反法西斯游击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最后她面对希特勒法西斯的绞架，毫无惧色，壮烈牺牲。沃洛希娜的英雄壮举，体现了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的年代教育培养出来的苏联青年的优秀品质。

二十五年前，沃洛希娜是被希特勒法西斯匪徒杀害了。而今天，曾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苏联劳动人民的儿女、老布尔什维克的后代塔马拉，却被苏联特权阶层的流氓少爷所杀害。这些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的流氓，醉鬼，游手好闲的人，作投机买卖的能手，正是苏联领导集团推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所培养出来的活标本。

铁的事实，鲜明的对比！苏修领导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行径和滔天罪恶，激起了苏联劳动人民和广大学生的“满腔怒火”。曾经推翻沙皇统治和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苏联人民，绝不会饶恕苏修领导集团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

新北大　萧灼基

1967-11-19　人民日报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教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育界的要害问题。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贩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旧北大是中国赫鲁晓夫直接控制下的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堡垒。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在北大根本没有树立起来。全校理科、语言科各系，根本没有开设毛泽东思想课。文科各系虽开设一些毛泽东思想课，但比重少得可怜，只是作为点缀罢了。相反，他们极力加强资产阶级教育，大力散布资产阶级毒素，腐蚀青年一代，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一九六○年以来，宣扬“封、资、修”的课程大大增加。例如，中国文学、汉语、古典文学、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图书馆等八个专业，共有专业基础课一百二十七门，其中浸透着封建主义毒素的“史类”课三十七门，占百分之二十九。哲学系哲学专业的专业课共四十门，其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课程有三十门。中国哲学史方面由《论语》到《谭嗣同》共有十六门。其它乱七八糟的资产阶级货色，应有尽有。

在陆平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怂恿、鼓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课堂上大肆放毒。反动学术“权威”、封建遗老冯友兰，在课堂上狂热地歌颂孔子，胡说什么“孔学是新生事物，具有远大前途。”有的反动文人胡说什么“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是因为有了孔子!”真是狂妄已极。

解放以来，北大被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统治，成为他们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他们一方面大肆打击和迫害工农兵出身的革命干部，一方面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插到全校各个重要岗位上去，控制全校大权，在北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家伙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学生对他们提意见，有的资产阶级教授甚至公开叫嚣："在课堂上，我讲的话就是法律！""我的课就是帝国主义课，霸道课！"

请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多么严重，旧教育制度的罪恶是多么触目惊心啊！

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有权。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把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不但在组织上，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我们新北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狠批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学，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教育阵地上高高飘扬！

苏修集团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形形色色

1967-11-19　人民日报

编者按：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巩固它的反动统治，为了培养修正主义的接班人，在教育方面大力推销资产阶级货色，实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

争夺青年人，一直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搏斗的一个重要内容。代表苏联新资产阶级的苏修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更是十分注意霸占教育这个阵地。他们把学校作为贩卖修正主义思想的重要场所，采取各种方式腐蚀和毒害青年一代。

列宁说过："青年们只有把自己学习、教育和训练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旧的剥削者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苏修集团打着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招牌，实际上却对青年进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和训练。

苏修集团为了把青少年教育和训练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使学生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同时拼命向他们灌输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一句话，他们极力要把青年"教育"成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者，来继承他们的衣钵，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

但是，苏联人民和青年正在日益认清苏修集团的反动面目，他们一定会起来推翻苏修集团的反动统治，砸烂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真正按照列宁的遗训，努力学习共产主义。

苏修领导集团为了适应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在教育方面全面推行资产阶级办校方针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专家治校”

苏修集团竭力推行资产阶级的“专家治校”的办校方针，使学校成了资产阶级学阀统治的天下。这伙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同苏修集团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完全合拍，他们是苏修集团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忠实工具。

在学校中，资产阶级“专家”们独断专行，垄断一切。据苏修报刊透露，“在莫斯科大学的三十九人组成的党委会中，有三十名委员是教授和副教授。各系的党组织的情况也是如此。”而执掌大权的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等职位，更是非教授、博士之类人物就不能担任。

这伙人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学衔和职衔越多，特权就越大，他们的收入要比普通工人高几十倍。

“智育第一”

为了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苏修集团在学校中大力推行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智育第一”的方针。苏修头目之一马祖罗夫今年在全苏高等学校工作人员会议上鼓吹，苏联学生的任务就是“熟悉业务”。苏修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叶留金还说什么“在入大学的时候，向青年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具有深刻而牢固的知识”。这也就是说，录取新生的唯一标准就是分数。

苏修集团在学校中推行“智育第一”的同时，竭力排斥劳动教育。《真理报》刊载的一个副教授的文章，就公然反对劳动教育，说什么“难道脑力劳动就不锻炼意志和性格吗？”这家报纸的一篇社论还公开宣扬：“小学生参加季节性劳动的作法，对教育是有害的。”

灌输毒素

苏修集团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在教学中向学生大量灌输修正主义毒素。他们编制的《苏联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等教科书，以及他们新开设的《社会学》、《共产主义原理》等课程，都是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黑货。这些教科书鼓吹什么共产主义就是"人道"，大反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贩卖"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理论"。

苏修集团在学校中设置的一些"专业"课程，也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例如，一九六五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了大力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管理体制"以后，苏修立即决定在苏联各高等院校开设数十个新的经济系，在好几个大城市开设高等经济学校，大量培养能够贯彻这种复辟资本主义方针的"经济师"。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们也纷纷响应，编制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新的经济教科书和参考书。

追逐名利

苏修集团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毒害青年一代。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公开鼓吹，上学就是为了当"专家"，当"干部"。柯西金还说什么，青年要当"名列世界科学史册的杰出科学家以及天才的青年科学家"。

苏修集团采取了不少措施，大搞"物质刺激"来鼓励学生追名逐利。他们用资产阶级的"学衔"制度来"刺激"科研人员。写了一篇得到苏修集团赏识的所谓"学术论文"，就有可能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学衔"。一有了"学衔"，工资马上可以大大增加，名利双收。苏修集团为了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还开设了专门培养"天才"的所谓"试验性中等学校"，在全西伯利亚进行由三轮考试组成的"西伯利亚奥林匹克"来选拔所谓"天才"学生。《真理报》刊载的一位大学校长的文

章，公开鼓吹以“经济刺激”来提高“高等学校教育质量”。在苏联，学生的助学金、奖学金就是根据分数发的，分数高的得钱多，分数低的得钱少以至扣发助学金。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去年决定为五所师范学院设立奖学金时明确规定，奖学金“根据考试结果”颁发。

但是，即使苏联报刊也不得不承认，苏修集团的这种修正主义教育，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苏联青年已对苏修集团产生了“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苏联人民和青年一定会奋起将苏修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连同苏修叛徒集团一起统统砸烂。

（据新华社讯）

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革命联合总部

1967-12-06　人民日报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伟大号召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响应，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高潮。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首先要破字当头，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划清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界限，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绝对权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获得彻底胜利。

十七年来，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学阀陆定一，利用他们窃取的大权，把持了教育的领导岗位，抵制、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党中央所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把社会主义的学校变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温床，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舆论、准备干部。

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育界影响很深，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批判。

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

教育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在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无产阶级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资产阶级也要培养他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接班人。

早在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就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一九五七年以后，毛主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理论。按照毛主席的方针去做，就一定能够迅速地提高我国青少年一代的社会主义觉悟，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一定能够逐步地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一定能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在我国和全世界取得最后的胜利。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九五八年，中国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出马，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他叫嚣："过去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不明确，要进行批判。"到了一九六一年，陆定一配合国内外反动势力，向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发起了猖狂进攻。他恶意煽动说："在教育上想搞一个传至万世的东西不可能，对教育方针有不同意见，在党内是可以的，在党外也允许反对。"看，一个咬牙切齿地要"批判"，一个张牙舞爪地要"反对"，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陆定一大肆攻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为的就是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即他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意旨提出的所谓"双重教育目的"论。陆定一把青少年一代划分为两种人，其中大多数被训练成为只有初步读写能力的，能够种地、做工的劳动力，即"治于人"的人，而少数所谓"尖子"则享受较高的教育，被精心培养成为具有"高深知识"、"治人"的精神贵族。陆定一选择一些大、

中、小学作为“重点学校”，建立所谓“小宝塔”的系统。他大搞“天才教育”，选拔少数所谓“尖子”进行“重点培养”。陆定一还硬说这是“客观规律”，是无法改变的。他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可避免的要存在，那么就有人要读的高一点，你们不能把他降下来。”陆定一就是这样无耻地为培养精神贵族作辩护。

陆定一的“双重教育目的”论，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出的教育方针的。陆定一说：“劳动者有各种各样，一种是行业的不同，一种是程度的不同，有工程师、工人。什么培养千篇一律的劳动者，世界上是不会有的。……通通一样是不行的，把学生看成都是一样，这个先生就是官僚主义”。他明目张胆地污蔑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伟大的教育方针是“行不通”的，是“官僚主义”，真是反动透顶！

陆定一的“双重教育目的”论，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扬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陆定一公开宣称：“智育第一，片面追求升学率，恐怕不能扣资产阶级帽子。”他说：“中小学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我想中小学的培养目标，最主要的是掌握学习的工具。一个是语文、文学；还有一类，数学、物理、化学，也是基本工具。”他还说：“思想教育不要搞那么多。”陆定一甚至把教学中贯彻思想教育，污蔑为“简单化”、“生搬硬套”和“好高骛远”等等。他胡说什么：“按照教科书进行教学就是了，要联系政治就要产生非驴非马。”在陆定一看来，中、小学生根本不要学习政治，不要参加劳动，只要“掌握学习的工具”就行了。

陆定一还故意用“智育第一”的口号，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全面发展的学说，胡说什么“有了基本工具就是全面发展”。他叫嚷：“要上天，就要念书。”他反对又红又专，胡说什么“两者兼备于一人是不行的，是办不到的”。

“智育第一”、“业务至上”，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

班人的时候，首先关心的是他们是不是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站在毛主席一边。所谓“智育第一”、“业务至上”，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也不是真的不要政治。陆定一说：只要搞好“学问”，“思想上拥护铁托，……也是可以的”。这就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陆定一之流只是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他们企图利用这个虚伪的口号，诱骗青少年一代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工农，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而效劳。

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

陆定一为了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因此，我们整个学校教育事业都应该紧密地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青少年一代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亲身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把他们真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以后，毛主席又发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教学要少而精，课程门类要减少，教材分量要减轻，考试方法要改革，教学方法要废止注入式，采取启发式，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但是十七年来，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采用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抵制毛主席关于改革学制、课程、教材、考试和教学方法的指示。

中国赫鲁晓夫一贯宣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谬论。陆定一也叫嚣“教育这个东西很清楚，叫做传授知识，学习知识”，污蔑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是“不务正业”，妄图把学生引向死读书本的邪路。

在学制上，陆定一之流维护从外国抄袭来的一整套资产阶级货色。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缩短中、小学的学习年限，并延长高等学校的学习年限为五年、六年甚至八年。按照这个学制，学生长期闭门读书，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势必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陆定一之流在极力维护旧教育制度的同时，还一再增加课程门类、教材分量和学习时间，抵制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削减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的时间。

建国之初，为了配合中国赫鲁晓夫鼓吹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需要，陆定一之流在教育上强调“保护”、“继承”旧东西，抵制社会主义改造，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要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本的指示，而大量地采用国民党时期的旧课本。至于课程设置、规章制度，也是沿袭了国民党时期的那一套。后来，陆定一之流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指使下，又完全照搬外国的一整套教材，乃至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陆定一还吹捧苏修的《教育学》是“社会主义”的，并把这本书作为维护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工具。

一九六○年，陆定一更打着“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幌子，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开展的教育革命进行了猖狂反扑。他污蔑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如北洋军阀、国民党时代，竭力鼓吹在课程、教材、教法方面向国民党时期所谓名牌学校看齐。一九六一年，陆定一之流把小学的课程增加到十一门，初中课程增加到十三门，高中课程增加到十门（外加四门选修课）。中学每周学习时间增加到三十

四至三十六节。他们采用突然袭击的考试方法，使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他们还在学生中颁发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在选拔优秀生和优秀班级时把分数放在第一位，在评价学校好坏时按高考录取人数为标准，等等，引诱学生拼命追求分数。这样，就全面地恢复了资产阶级的教学秩序。

毛主席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无产阶级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上摧毁了一切旧制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就必然要立即开展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革命，摧毁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陆定一一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教育革命。他大肆宣扬"未立不破"、"先立后破"的谬论，鼓吹改良主义。他说："教学还不是改革问题，就是改良一点，是改良主义。"他恶毒地污蔑教育革命是"乱、糟、偏"，咒骂"这样搞下去要垮台"。这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就是妄图利用这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抵制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为了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竟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提出"国共合作"的反动口号，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陆定一疯狂地咒骂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的指示是"宗派主义"，"垄断想法"，必须"去掉"。他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说："有个口号叫'一杆子插到底'，就是党委决定一切，系总支决定一切，支部决定一切，这样就乱了。"他恶狠狠地说："一切组织都由党员领导，我不同意。"他公开为资产阶级争权，提出"非要国共合作不可，非要与资产阶级合作不可"。他极力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鼓吹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他甚至说，象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可以“起主导作用”。到了一九六一年，陆定一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支持下，进一步要在全国高等学校里立即建立“三、三”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中间派）的领导班子。他把这个领导班子定名为校务委员会，赋予极大的权力，实际上使它凌驾于学校党委之上。陆定一一贯公开宣扬党不能领导学校教育。他说：“小知识分子（指在学校做党的工作的同志）领导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他不服的。”

在陆定一的“国共合作”、“三、三”制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被篡夺了。所谓“国共合作”、“三、三”制，其实质就是让资产阶级专我们的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陆定一居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搞什么“国共合作”，这正说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陆定一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他搬出了一个“有教无类”的反动口号，来为他的这种反革命行径作辩护。他说：“孔子说，‘有教无类’。对不对？我说对，还是‘有教无类’。”

真的是“有教无类”吗？这是弥天大谎。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有教无类”一直都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阶级私利的虚伪口号。封建阶级、资产阶级都曾经利用过这个口号来欺骗麻痹劳动人民，掩盖阶级社会里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压迫和剥削的关系，掩盖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的罪恶事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陆定一从历史垃圾堆里拣起这个破烂，来抵制党的阶级路线。在各级学校招收新生和进行毕业生分配时，他孤立地强调“重在表现”，根本不看政治条件。事实说明，陆定一的“重在表现”，就是重在业务，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毛主席早在一九三四年就指出:“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但是，在陆定一的“有教无类”、“重在表现”的口号下，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大量地进入各级重点学校，而大量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却被排斥在校门之外，即使进入学校也要受到种种歧视和排挤。

让我们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所提出和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摧毁修正主义教育的“小宝塔”制

山东省教育厅革命造反指挥部

1967-12-17　人民日报

“小宝塔”的出笼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伟大方针。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革命师生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猛烈地冲击着旧的教育制度。

面对着这场教育革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吓得要死，恨得要命，极力抵制和反对。一九五九年，中国赫鲁晓夫亲自跳了出来，发出“要认真读书”的黑指示。陆定一猖狂地攻击教育革命使“质量普遍下降”，叫嚷要“办好一批学校”。一九六一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叫嚷什么“有了重点学校就有了希望，大、中、小要形成小宝塔形”。窃取教育界领导岗位的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纷纷鼓吹：“小宝塔是普通学校的骨干，教育事业的基本建设。”“少谈点普及，多谈点提高，必须掌握重点，大力提高，大、中、小学都要办好一批重点学校，着重提高质量”，等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他们就正式向各省、市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立即选定一批大、中、小学作为重点学校，建立修正主义教育的“小宝塔”制。

山东省教育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接到“通知”，立即积极贯彻执行。一九六三年五月，他们专门召开了专署文教局长会议，炮制了建立“小宝塔”的规划，制定了“小宝塔”学校的标准。他们按照这个标准挑选了一批学校：中学二百三十

五所，占全日制中学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小学一千四百七十二所，占全日制小学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在上述学校中，又精选中学三十六所、小学一百六十二所，作为首先集中力量办好的所谓“尖子学校”。

“小宝塔”的反动实质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赫鲁晓夫说：“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整天都是读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又说：“优秀的考上了第一类学校，比较次一些考上了第二类学校。”“谁优秀，国家就培养谁。”这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教育的双轨制。修正主义教育的“小宝塔”制，就是以此为根据的。陆定一曾不止一次地叫嚷：“要搞国家办的全日制中小学。这象宝塔一样，逐步升到高等学校去，培养各种专家。”又说：全日制中小学“应是双重任务，上天入地，上天是主要的，入地是处理问题”。这就不难看出，他们在全日制中小学搞“小宝塔”的目的，就是要集中人力物力办好一批学校，对成绩“优秀”的学生加强培养，让他们一级一级升上去，让他们“上天”，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这就是他们为“小宝塔”学校所规定的培养目标。至于一般全日制中小学，他们则认为可有可无，这些学校毕业的所谓“不合格”的学生，只能充当“劳动后备力量”。

教育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煞费苦心地为全日制中小学炮制了两类教学计划。第一类教学计划是供“小宝塔”学校用的。全年教学时间，中学不得少于九个月，小学不得少于九个半月；中学全年劳动一个月，小学全年劳动半个月。这一点劳动时间，实际上只能用于打扫环境。第二类教学计划是供一般全日制中小学用的。全年教学时间减少一个月，课程比较少，教学要求也比较低，并规定不开设外语课，而不少“名牌大学”对外语不及格的考生是不予录取的。这样，全日制中小

学就被人为地分成两种不同的学校："小宝塔"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让他们"上天"；一般全日制中小学的毕业生考不上学校，就成为"劳动后备力量"。

为了保证"小宝塔"学校实现第一类教学计划，他们对招生、干部和教员配备、校舍修建以及经费、设备的分配等，都做了特殊的规定。

山东省教育界党内的走资派不惜动用国家大量资金，改建重点学校。例如他们把一所重点学校的平房教室拆掉，改建成两层、三层楼房；把院墙扒掉，修建花墙、铁门；把刚刚用了不到一年的桌椅拨给其他学校，换上铁架桌椅；教室里是苏式讲台，玻璃黑板，六只日光灯。光改建这样一所重点学校，就花了二十余万元。

严重的后果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们所炮制的"小宝塔"制，给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一、扩大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小宝塔"学校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把学生紧紧拴在物质条件优越的学校里闭门读书，让学生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爬上宝塔尖，成为精神贵族。而广大工农子女则不得不进入设备简陋的学校，被训练成为只有初步读写算能力的做工、种地的劳动力。陆定一在兜售"小宝塔"时曾非常露骨地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会长期存在，一天差别存在，一天就有小宝塔。"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大搞"小宝塔"的目的，是要维持和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二、确立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地位。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们反对政治挂帅，实行业务挂帅。他们挑选“小宝塔”学校领导干部的标准是：“能亲临教学第一线，脱鞋下田，实行田间指挥，最好能教一门课，能熟悉教学业务，摸索工作规律，逐步变外行为内行，成为专家。”挑选教师规定的标准是：“教龄长，学历高，文化科学知识丰富，有专长，基本功过硬，有教学经验，教学质量高，效果好，最好有几个本地区拔尖的教师（权威）。”他们只看“业务”水平，而不看政治条件。这样，一些未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篡夺了学校的领导权。

三、把青少年学生推向修正主义的泥坑。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们通过他们控制的“小宝塔”学校，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教导，以极端腐朽的个人主义腐蚀毒害青少年一代，把青少年学生引向只专不红的道路。

有的重点学校还搞什么“传统返校日”，邀请考入“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和大学毕业后当上干部、工程师等的校友返校欢聚，把他们待为“上宾”，并号召在校同学向这些老校友学习，起了很坏的影响。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十分关怀，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们却以繁重的课业负担强压在学生的头上，使不少学生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

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必须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粉碎修正主义教育的“小宝塔”制，把我们的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苏修叛徒的铜臭教育

装甲兵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8-01-08　人民日报

苏修叛徒集团的喉舌《消息报》最近公然大肆鼓吹要填补“少年和钱”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个空白点”，要求学校和家庭“把子女的挣钱看成一种教育计划”。《消息报》还狂热地、不厌其烦地鼓吹采用两种办法：一种是埋头读书，一个少年在暑假就能“完成数百道数学题”，积累所谓“献给社会的知识”。据说此种办法虽然“暂时还不是用现金付酬”，但“在银行里放着”，“过一个时期，就可能拿到加上不少利息的劳动报酬”；另一种是到大街上去，“从事以卢布和戈比计价”的“卖花、卖冰激凌”的生意。据说这能使学生“具有劳动能力”，“有助于选择道路和职业”。

自称“列宁的继承者”的苏修叛徒，竟然明目张胆地把利润、金钱作为教育的原则，大声疾呼要把懂赢利、会赚钱、能剥削等这些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伎俩，列入“教育计划”，歇斯底里地鼓动学生去“选择”能够“挣钱”的“道路”，真是可谓堕落到极点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内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在为哪个阶级服务，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

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伟大的列宁指出：苏维埃的教育，要“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列宁和他的继承者斯大林，为在苏联建立起苏维埃自己的教育事业作了巨大的努力。

赫鲁晓夫及其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伟大列宁的遗训，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共产主义教育”的幌子下，不遗余力地推行资产阶级教育的破烂，向苏联青年灌输整套整套的资产阶级思想，大肆宣扬“求知识就是为了赢利，受教育就是为了赚钱”。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成了苏修教育的中心内容。

在这一伙叛徒宣扬的卢布第一的思想腐蚀下，今日苏联的学校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学生酗酒作乐，有的学校成了进口女用上衣投机买卖的“闹市”。学生到处设法挣他们“想要”的钱，学生学业水平低劣。苏联的教育事业完全被这伙叛徒糟塌得不成样子。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用金钱、利润毒害苏联年青的一代，把他们抛入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就是为了维护它们在苏联的资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他们修正主义的罪恶统治。他们疯狂地鼓吹金钱挂帅的资产阶级教育，就是为他们这伙叛徒培植资本主义的继承人。

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思想。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对于破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结束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夺取教育领域的领导

权，建立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新型的学校。毛主席为无产阶级开拓出一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明大道。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篡夺了政权，实行了资本主义全面的复辟。这一严酷的事实，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使他们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育革命思想，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才能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七·二一指示）

1968-07-22　人民日报

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

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

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象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以各种借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

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头，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哪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

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这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

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际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

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

1968-09-10　红旗

红旗杂志编者按：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是好

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那篇调查报告中，曾经提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它是现在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它创办于一九五二年，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来，搞“正规化”，变成机械学院。从这个学校的变化过程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学校创办的时候，为了从劳动人民中培养技术人才，适应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工农学生经受了“三反”、“五反”和土改等阶级斗争的

锻炼，又有一定的生产实践经验。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有如下几方面的优点：

第一，工农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明确。他们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骂我们，'工农文化低，不懂 ABC，哪能学设计'，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劳动人民要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他们进校后提出了"要为毛主席争气"，"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战斗口号，自觉地组织"互助组"，提倡"小先生"，三人一组，能者为师，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比如教化学，许多学生记不住元素符号，大家编起了化学元素歌，又唱又背，很快就记牢了。

第二，工农学生阶级觉悟高，敢于藐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校里有一个留德的电学"博士"，曾被一些迷信洋教条的教师当作偶像来崇拜。一次这位"博士"带了厚厚一叠书来教电学，他照本宣科，严重脱离生产实际，工农学生不要听，就向这位"博士先生"提出了两个有关电动机的生产实际问题，将了"博士先生"一军。他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就用那套别人听不懂的"理论"企图把工人提出的问题搪塞过去。但工农学生不买他的账，继续追问，结果这位"博士先生"只得吞吞吐吐地说："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看技术杂志了！"后来，工农学生把这个"庞然大物"轰下了讲台。

第三，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当时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及方法还是旧的，教育大权基本上被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操纵着。但是，由于当时工农学生数量多，占全院师生员工百分之九十以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于工农学生包围之中，所以旧的一套教育制度还是受到了不断冲击。当时，学校领导设立了班主任制度，企图用这一套把工农学生管起来。工农学生不吃那一套，结果班主任制度等于虚设。而在学校中最有威信的却是学生党团支部和学生会组织。一次全校数学期中考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用出难题怪题的办法，使全校

二千多学生有近半数不及格，工农学生很气愤，各班级都派代表到教导处去说理斗争，迫使校方宣布这次考试作废。

第四，学以致用。这个学校的工农学生到无锡某工厂进行生产实习，一到工厂就穿起油腻的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劳动，讨论生产技术问题，很快就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上去，帮助该厂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项技术革新建议，其中立即被工厂采纳的就有三十多项。而同时在该厂参加生产实习的上海某大学的一批学生，却整天拿着本本到处抄录一大堆工艺操作规程，无所创造。该厂的工人反映："工人学生学了就是顶用。"他们回到生产单位后还有许多创造发明。上海机床厂主持设计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平面磨床的王德法同志就是该校的毕业生；在上海机床厂对精密磨床的液压操纵箱进行了第四次重大技术革新的工人技师，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负责试制我国第一台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工作的，也是该校工农班的毕业生。

一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但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击中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十多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工农学生的问题，在教育阵地上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

一九五二年，当第一批工农学生进校时，上海工人阶级一片欢腾。他们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要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我们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当时，几乎每一个工人到学校来，工厂都要敲锣打鼓开欢送会，给他们戴了大红花，象参军一样光荣。

可是，学校里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跳了出来，狂叫"糟得很"，"这样做不可思议"，大放厥词，说什么"工农学生脑子笨，入学程度又不一致，难以培养"、"工农学生好提意见，对师长不尊敬"、"培养工农学生得不偿失"，等

等。他们利用手中的教育大权，猖狂地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走资派千方百计反对和限制工人、农民入学。这个学校一共只有三次招收工农学生，一九五二年招收了二千一百八十一人。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它当成“包袱”，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份工作总结中，百般攻击和诬蔑工农学生。于是采取了“大大收缩”的方针，这一年工农学生只招了一百七十三名。一九六○年，在“以考试成绩入学，一视同仁”的幌子下，实际上对工农子女关门、为资产阶级子女开门，仅招收了十七名工农学生。从此，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要想入学比登天还难。

他们在教学上故意刁难、打击、迫害工农学生。例如制图课，这对于机械工人来说应该是容易掌握的。可是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硬要工农学生先学习投影几何，用玄妙的相贯体、相贯线来刁难工农学生，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考试中，使一百七十多位工农学生有四十多位留了级。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劳动模范、五级技工的学生，资产阶级老爷们费尽了心机，给他批了五十九分，硬是以“一分之差”要他留级。工农学生说：“分数线，分数线，是对工农的封锁线，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线。”一九六○年入学的十七名学生，受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的迫害，先后有十四名学生被迫退学，他们怀着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深仇大恨，愤然离校。市印三厂一位优秀工人，入学才一年半，因为体育、外文、物理三门课不及格留了级，后来又被迫退了学。他曾向学校领导提出对升留级制度的意见，可是学校的走资派恶狠狠地说：“升留级制度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工农学生不能例外。”但是，另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有五门课不及格，学校走资派却用种种手法准其升级。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这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学校里出现了许多革命的新事物，如工人

上讲台，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搞教学，学校办工厂等。十一月十二日，康生同志来校视察。他强调指出，工人要上讲台。学校里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他们；真正有本事的，是他们。有些大学毕业生，只会动口，不会动手。柯庆施同志在这一年对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也作过重要指示，并指示从工人中抽一批人去搞尖端的科学研究。这些指示，都大长了工农学生的志气。但是，就在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中，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到这个学校大发黑指示，为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目，鼓励他们胆敢拒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他们不让工人上讲台，仍然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我们的政。他们疯狂地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反对抽调政治业务兼优的工农学生去搞科学研究，从已调去的三十名学生中，强行调回了十名。一九五九年毕业留校的二十一名工人学生，都是党团员，而只有一名当教师，绝大多数到附属工厂当工人。党员学生李复兴入学前已是五级技工，学了四年却分配在工艺实验室当辅助人员，连当实验员都没资格，更谈不上教学工作了。

同时，他们排挤工农干部。一九五六年留校的四十四个工农毕业生，大部分是党员，后来被排挤出去的竟有二十九个，走资派指着毕业后在校当政治指导员的工农干部说："你们中专毕业的不行啊，大学生指导员要大学毕业的才行。"

在教育制度方面，他们还照搬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妄图将工农学生推入修正主义泥坑。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请来了不少外国专家，全面学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中国赫鲁晓夫"把它统统搬过来再说"的黑指示，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规章制度，统统照搬苏修那一套，什么"六个环节"，"七种计划"，"二十四种表格"，"升留级制度"等等。最典型的是体育课，学苏联后，大跳其交谊舞，硬把工农学生往修正主义道路上拉。

同时，他们紧跟黑主子陆定一的旨意，提出"学交大，赶哈工大"，学习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办学传统"，强调"高精尖"、"大洋全"，把学生培养成为"三脱离"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些家伙又以"求大、求全、求新"为名，把机构体制搞得庞大、臃肿、官僚化。学生同样是二千多，机构从一九五二年只有二处二室到一九六○年增加到七个部、处，二个室，二十二个教研室；教职员工从原来三百多人，猛增到八百多人；教学设备从价值一百万元骤增到八百多万元；学校的附属工厂，在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是为教学、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以后大搞资本主义经营，利润挂帅，成为走资派挥霍浪费的摇钱树。

怎样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上海机械学院建校以来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

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同志和广大革命师生，在总结了建校以来的正反面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一、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为理工科大学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他们认为，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组织上的"权"。毛主席派工人阶级进大学，占领教育阵地，这是保证学校领导大权永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的关键，是保证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不断进入大学的关键。上海机械学院曾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后来为什么向工农关门？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权"的问题。这

个教训必须吸取。其次，是思想上的“权”。不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教育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势必会泛滥。上海机械学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对工农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训说明，必须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批判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反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要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否则，教育阵地会得而复失。

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至三年为宜。课程设置要打破过去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界限，可以采用实际生产中的典型机械、典型零件作教材，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废除脱离生产实践的空洞理论和烦琐哲学。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抓住精华，学得精通。广泛开展现场教学，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革后的理工科大学，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工厂，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学生应当带着生产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难题进入学校，生产部门和科研单位也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校提出课题，使学生在边生产、边学习、边研究中着重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

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方针是厂校合作，厂办校助。这是坚持群众路线，大量培养工人阶级工程技术队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根据无产阶级工业革命的需要，从生产实际出发，采取“要什么办什么，做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教学原则，大量地办好各种形式的业余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

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他们认为，现有的教师队伍不能担当起教育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的任务，必须加以整顿、改造、重建。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这一批担任教育任务的工人可以是

专职的，也可以是兼职的，但绝大部分是兼职的。专职教师的主要作用应当体现在组织学校和工厂、科研部门的有机结合上，帮助学生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苏修的所谓教育“改革”是什么货色？

河南开封师范学院　任反修

1968-10-23　人民日报

正当我国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开展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无耻地大肆宣扬他们的“高等学校正处于改革之中”。

苏修叛徒集团是怎样来“改革”他们的教育的呢？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要“把卢布拿来为高等教育服务”，让卢布“恰当地提出实践对高等学校不断变化和越来越复杂的要求”，让卢布“促使高等学校面向生活”。总之，“卢布挂帅”是苏修当前的所谓教育“改革”的基本纲领。

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改革，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服务的，总是反映了一定的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我国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措施，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与要求。而苏修的所谓教育“改革”，则是苏修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苏修为了进一步促使经济资本主义化和加强修正主义统治的一种手段，完全反映了骑在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与要求。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在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同西方文化合流。苏联的教育，实际上早已开始“改革”了。近年来，苏修在国内拼命推行“经济新体制”，竭力加强法西斯专政；在国外加紧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它已经彻底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为了与上述情况相适应，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方面也就彻底撕掉过去那点残余的伪装，赤裸裸地用“卢布挂帅”的原则来进行“改革”。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主宰一切，教育也不例外。苏修要“把卢布拿来为高等教育服务”，也就是让卢布支配整个教育，使整个教育彻头彻尾资本主义化。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说过，苏修要“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柯西金也说：高等学校是培养“专家和生产组织者”的。很明白，苏修的教育方针就是为了“培养”维护他们修正主义统治所需要的“专家”。现在苏修用“卢布挂帅”的原则“改革”教育，实际上使学校变成为了追求卢布而进行自由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念书时想的是卢布，毕业后想的也是卢布，为了卢布什么都可以干，为了卢布可以把自己出卖。苏修想要“培养”的，就是那么一伙唯卢布是图的人物，就是那么一批用卢布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这样，苏修叛徒集团就可以收买到为他们的统治效劳的工具，得到继承他们修正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苏修叛徒集团所谓的教育“改革”，同我国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对于反修防修有着多么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具有十月革命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和苏联青年从对比中也可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他们一定会奋起造反，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　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

1968-11-24　红旗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篇材料生动地描写了贫下中农热爱“土专家”的情形和培养“土专家”的途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加上各个公社都注意培养一批自己的“土专家”，贫下中农子弟就不会“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识爹和娘”了！

“土专家”是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开放出来的花朵，不少年青的“土专家”是贫下中农的好后代。这是江苏省靖江县大兴公社贫下中农对不脱产农业技术员的赞美称呼。

一九五八年，大兴公社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引下，全社各大队纷纷办起了红专学校。学员全部是土生土长，队来队去，他们学政治，学文化，拜贫下中农做老师，在田头做功课。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全公社二十个大队共培养出“土专家”一百五十多人，对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正当这支队伍蓬勃发展的时候，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了一整套信“洋”不信“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鼓吹“专家治农”，“大老粗”不懂科研的谬论，一刀砍掉全部红专学校，妄想把这支新生的农技队伍扼杀在摇篮之中，使茁壮成长的农业技术队伍遭到了摧残。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教导，为群众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全公社闻风而动，从大队到生产队都设立了群众科学实验网。一时被修正主义路线整下去的“土专家”又重新活跃起来了。几年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公社有社办农技站，大队有五到七人、生产队有三到五人的科研小组，全公社

有八百多个农技员。这支科研大军，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迅速成长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变得更加坚强了。

贫下中农最欢迎“土专家”

“土专家”大都是无限热爱毛主席，并有着丰富实践经验、有革命干劲的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经过几年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加重群众负担，既是社员又是技术员，又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有不少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他们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土专家”同贫下中农心连心。他们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种田为革命，一心为革命。一九六五年夏天，七一大队松柏堡生产队的棉花刚出土不久，就遭到了虫害。在两三天内，有十三亩棉苗死去百分之七十。生产队的“土专家”看到集体经济受到损失，贫下中农辛勤培育的绿油油的棉苗成片死去，非常着急。“土专家”薛美芳急得哭了。为了找出病根，她和其他几个“土专家”一连几天蹲在受害的棉苗旁，象伺候生病的亲人一样，废寝忘食地观察虫害的情况，终于找到了危害棉苗的象鼻虫。他们拿着捉到的象鼻虫请教县农技站和县农业局，想不到有的技术员却不以为然地说：“书本上没有讲到这种虫子”，“就是有这种虫子，也不会危害棉苗。”“土专家”听了这些没有一点贫下中农感情的“洋专家”的话，肺都气炸了，他们坚定地说：“我们自己搞，一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迅速扑灭虫害。”救苗如救火。他们经过反复试验，用六六粉治虫、糖酸诱杀等方法，终于制服了虫害。公社立即进行了推广，使全公社二千五百多亩受害的棉苗都脱了险。老贫农顾炳生激动地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薛美芳他们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土状元’。”

从两个农技站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群众爱的是“土专家”，厌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设备条件好的县农技站，有皮尺、喷雾器、天

平等一大堆测验仪器。一个是一无设备、二无“洋”本本的公社农技站。在分工上两个农技站各有不同。县站是敲锣卖糖，各管一行。管棉花的不管稻，管稻的不问棉花。公社农技站是样样管，行行抓，分工不分家。县农技站的一些技术员，出门手里拿着一根尺，骑上一部脚踏车，到一个地方就是测测，算算。群众说他们脚踏车骑骑，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公社农技站的“土专家”出门带的是毛泽东思想，搞的是三大革命，摆开两条泥腿子，深入田头，到一处就是学学、干干，动嘴又动手。今年春天水稻育秧时，县农技站的人在田头指手划脚，提出这个规格，那个标准，夸夸其谈讲了一大套，就是不动手，贫下中农要他们做个样子，他们傻了眼，贫下中农说他们是“嘴上种田”。公社“土专家”就不同，他们赤脚下田，同贫下中农一起干，秧田做得很合标准。贫下中农说：“’土专家’说到做到，他们的话我们一听就懂，他们的学问，我们一学就会。’土专家’最符合实际，最能解决问题。”

专区农科所的一些技术员也同样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一九六七年，这个农科所有两个技术员到七一大队搞点，当时，群众曾经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那知，他们一到，就是指手划脚，大路跑跑，田头转转，很少参加劳动。在棉花开花结铃时，五一生产队有四十亩棉花田田底差，急需追肥。他们说，追了要疯长，不让追，而薛家生产队同样的田底和苗情，“土专家”根据往年实践经验，认为追上这次肥是保证棉花早熟迟衰产量高的关键，因而立即带领全队男男女女浇粪追肥。结果，薛家生产队比五一生产队每亩增产皮棉三十五斤。贫下中农说：“大学生有名气，就是摸不到庄稼的脾气，照他们的方法种田，产量要降低。’土专家’和我们是土对土，谈得拢，说在嘴上，做在手上，为我们做出了好样子。这样的‘土专家’我们就是欢迎。”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和提高“土专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大兴公社培养“土专家”的主要途径：

一是放手让“土专家”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到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去，锻炼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大兴公社的贫下中农把提高“土专家”的无产阶级觉悟，帮助他们树立为革命种田、为革命研究农业科学的正确的政治观点，放在首要地位。公社农技站的“土专家”朱玉芬刚离开学校参加生产时，捧着“洋本本”，死啃洋教条，结果越学越糊涂。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上了十几年学，不要再捧洋本本了，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到劳动中去锻炼自己。”朱玉芬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自觉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成了县和专区群众科研战线上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刮起无政府主义妖风，煽动公社农技站的个别农技员离开工作岗位。朱玉芬同志一眼看穿了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的阴谋，勇敢地挑起了公社农技站的重担，积极指导全公社的农业科学实验，作出了很大贡献。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又把朱玉芬同志放到对敌斗争第一线去，领导“老大难”单位的斗、批、改。贫下中农称赞这样的“土专家”说：“‘土专家’脸黑心红立场稳，技术大权掌得顶呱呱，这样的技术员才能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

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在生产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土专家”的技术水平。公社农技站有三个同志，主要任务是到各大队搞点，帮助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交流推广。各大队、生产队农技员在每一个季节里，都专门研究几个当前生产中的课题。去年跃进大队刘西生产队的几个“土专家”，对红萍如何越夏、冬保进行了研究，解决了

"洋专家"不能解决的难题。公社立即组织"土专家"到刘西生产队取经，那里的"土专家"就是教师，其余农技员就是学生，河边就是课堂。全公社的"土专家"都学会了这个技术。

三是将外地的经验，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试验和推广。如搞山芋蒸汽育苗，刚开始，部分群众不相信。鞠家垈的"土专家"和县农技站几个技术员共同研究推广了蒸汽炉搞三床苗，既节约用煤，又不浪费劳力，全公社很快发展到四十二个蒸汽炉子。中技毕业的技术员陈善德同志说："实践最重要，象我们这些从旧学校出来的人，只有和有实践经验的'土专家'结合在一起，才能作出一点贡献，否则将一事无成。"

四是让"土专家"学习必要的农业技术理论知识，使他们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再回来指导生产实践。公社农技站经常印发一些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科研材料，供"土专家"学习应用。以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土专家"，由县农技站一些同贫下中农结合得比较好的技术员讲授农业理论知识。大兴公社采取各种培训方法，在四年中共举行田头现场会、讲用操作会三百五十多次，培养了一支思想、技术都过得硬的技术骨干力量。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有七个县到大兴公社请了三十八名"土专家"去帮助搞技术革新，深受各地广大群众的欢迎。

从"土专家"的成长，看农业教育革命的方向

一、农业教育和农业技术大权就是要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来掌。今后，农业院校要统统搬到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过去农业院校的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坑害了许多工农子弟。这个公社有一个学生，过去在家时样样都干，考上农学院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从脸黑心红的贫农儿子，变成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公子"。贫下中农说："考上了大学

后，一年一读，就看不起在家种田的同学，二年一读，不认得父母，三年一读，私心通天。真是‘雾迷天放鸽子，有去无来’。”因此，只有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握农业教育大权，才能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培养出一大批又红又专的新型农业科技人员。

二、农业院校的招生对象，要从心红眼亮，脚踩污泥，手上有茧的“土专家”中挑选。贫下中农说：“这样的苗子选去学习，我们才称心，放心。”教学内容要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要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要把“土专家”在第一线上遇到的实际问题带到学校里去研究，在理论上提高。到学校学一两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来。学生的毕业证书要由贫下中农考核发给。

三、原有的教师队伍，要进行彻底整顿，要由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土专家”和同工农结合得好的知识分子组成。知识分子要走同工农结合的道路，分批下放劳动，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靖江县革命委员会　靖江县大兴公社革命委员会

揭穿排斥我们入学的阴谋

七里营大队贫下中农学生　黄建军　黄格忠　吕印江

1969-01-09　人民日报

解放以来，大叛徒刘少奇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刘少奇还叫嚣什么“谁优秀就培养谁”，千方百计地排斥我们贫下中农子女入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给地、富子女入学大开绿灯，而把我们贫下中农子女排挤在学校门墙之外。

一九六三年，我们七里营有六个初中毕业生。其中四个地、富子女都升入了高中；两个贫下中农子女，一个没有被录取，另一个被录取入学不久，就被用“分数线”推出了校门。我们贫下中农最恨旧学校，诅咒它说：“学校，学校，是保护地、富利益的‘关帝庙’。”

什么样的学生算是优秀呢？刘少奇所谓“优秀”，就是能按他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做，读死书，考分高。他以考分掩盖其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以考分来框住学生的思想。例如一九六三年，在七里营中学，一个地主子弟，天天加班加点地死读书，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认为他特别优秀，对他进行重点培养。结果他毕业回家后不会干活，不但不觉得可耻，而且还在贫下中农面前故意说外国话，显示他有“学问”。

七里营中学有一个贫农学生，政治思想好，不死读书本，放学回家就积极帮助生产队劳动。只因为他考分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他“呆笨”，对他讽刺、排斥。由于他无限忠于毛主席，他出了学校仍然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劳动，被选为生产队会计。我们贫下中农都称赞他是好管家，好后代。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刘少奇提出所谓“谁优秀就培养谁”，只不过是他排斥我们贫下中农子女入学的代名词而已。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们贫下中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自己把学校大门打开，掌握了文权，管理了学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们这些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赶出校门的"呆笨"学生，又重新获得了学习的机会。毛主席为我们贫下中农子女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决心做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农村的教育阵地我们贫下中农占定了

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七里营大队教育革命委员会主任　吕书墨

1969-01-09　人民日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我们七里营人民公社十周年的光辉日子里，我们七里营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并管理了设在我们大队的两所学校。从此，我们贫下中农给自己打开了学校的大门。我这个旧社会的长工，居然当上了大队的教育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是我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贫下中农的最大信任、最大鼓励和最大鞭策。

在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祖祖辈辈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一家七口，奶奶和爹娘都被狗地主逼死了，哥哥被国民党匪帮杀害了，两个妹妹给了别人，一家人就剩下我一个。那时，我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整天挨打受骂，连生命都难保，哪能谈到上学，更提不上管理学校了。是毛主席把我们贫下中农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翻了身，我们的孩子才有机会进学校。

但是，大叛徒刘少奇及其黑干将陆定一之流，代表地主、富农的利益，看到我们贫下中农子女上学就眼红。他们长期以来，利用窃取的职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招降纳叛，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对我们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考试”这个鬼门关，利用“分数”这条封锁线，把大量的工农子女堵在学校门墙之外。我们大队有三个大学生，其中就有两个是地、富子女。考中学，我们贫下中农子女二十个只被录取一个，而有的地、富一家就有两个中学生。贫下中农的子女即使进入学校，不是受到打击迫害，

就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而忘了本。个别人甚至连自己亲爹娘都不认，一心想当官做老爷，成了修正主义的黑苗苗。这种旧教育制度坑害了我们多少贫下中农的好后代！我们贫下中农看到这些，就象割了心头肉一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旧的教育制度必须彻底批判！

大叛徒刘少奇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胡说什么：“教育就不能那样简单，不能依靠工人、贫下中农来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也跳出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我们要靠他们”。他们散布这些反动谬论，疯狂地排斥工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拼命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想叫我们把学校这个阵地让给他们。办不到！

大叛徒刘少奇污蔑我们工农“知识低”“不懂教育”。其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什么知识？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有的只是一套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的“学问”。这种“学问”，我们贫下中农一点也不需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懂得什么“教育”？他们只懂得“劳心者治人”的“教育”。这种“教育”，我们贫下中农坚决反对！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毛主席又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我们贫下中农人人都有一部血泪史，这阶级苦、血泪仇，我们永远忘不了。我们贫下中农有丰富的三大革命的实践经验，真正有知识的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和毛主席最亲。因此，我们贫下中农就最懂得如何教育好后一代。

毛主席最近指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字字句句说到我们贫下中农心坎上。只有我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才能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我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把长期被剥削阶级霸占的教育阵地夺回来，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

化，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生死搏斗，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阶级敌人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定要向我们进行疯狂的反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定会反对。社会上旧的习惯势力也必定会进行抵制。但是，只要我们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政治觉悟，真正把学校管起来，在学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把学校办好。从三个多月来我们管理学校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当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刚进驻学校时，除了阶级敌人进行造谣、污蔑以外，有旧思想的人对我说："你管生产就行了，还管什么学校。"有的旧教员当面说"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后却到处散布"贫下中农不行"，在教学上刁难我们。他们有的人老和我们打圈圈，总想利用修正主义教育的一套把我们圈住，要我们照他们的办。这是绝对不行的！学校中的党、政、财、文大权，我们贫下中农要统统管起来，不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家。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克服各种困难，把学校管理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三个月来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贫下中农不管理学校，资产阶级就要去管理；教育战线的权我们不去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要去夺。我们坚决执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议，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同伙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把我们的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们就是要登上学校讲台

七里营大队老贫农　吕延立　吕明岐

1969-01-09　人民日报

在旧社会，我们都是拾柴禾、割野草，上不起学的穷孩子。今天，我们竟然管理了学校，并登上了讲台，这是过去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

解放十几年来，大叛徒刘少奇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极力打击、排挤工农子女入学，大肆鼓吹教授治校。贫下中农别说管理学校，就是进学校的门也比登天还难。大叛徒刘少奇的黑干将陆定一，为了帮助他主子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竟公开扬言："农民没知识……对我们有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刘少奇及其同伙的庇护下，一批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钻进了教师队伍，在学校中专了我们的政。

"农民没知识。"这是胡说！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俺贫下中农！俺贫下中农缺少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假学问。但是，俺头脑中有毛泽东思想，有非常丰富的三大革命运动的真知识。

请看那些所谓"专家""学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底有些什么知识吧！

一九五九年我们七里营来了个棉花栽培"专家"，专门来解决棉花脱铃问题。他根本不进行什么调查研究，就主观地认为棉花脱铃是因为通风透光不好，并且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合实际的办法，吹嘘说这样做了就可以使棉花不脱铃。于是，他选择了一块棉田来作"示范试验"，要公社提供大批材料，并派出大批社员为他干这干那。结果，费尽了人力物力，这片棉花却全被糟蹋了。但是，同样的问题却被老贫农用在实践中摸出的水肥管理办法解决了，使大面积棉田亩产皮棉达二百多斤！还有一个"专家"，为了创高产一鸣惊人，竟在一亩棉花地里施化肥四百

多斤，造成棉田严重缺水，大量棉苗被烧死。这个“专家”根本找不出原因。可是两个老贫农一眼就看出是棉田缺水，连续给棉田灌了三次水，才使棉苗免除大面积死亡。请问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贫下中农相比到底谁有知识？这些人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洋教条、假学问，我们贫下中农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科学文化的真正主人。毛主席早就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陆定一污蔑我们农民“没知识”，只不过是暴露他顽固的反动立场而已。

“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更是明显不过的反动谬论！难道资产阶级的所谓“专家”、“学者”真的能培养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吗？请看事实：有一年，一个棉花“专家”来七里营搞研究。他整天坐在屋子里抽烟喝茶、抄资料、记数字，强迫他的助理员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到处给他找材料。而他管的棉田的棉蚜不但没消灭，反而越治越多。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为了得出自己的“试验结果”，竟然眼看着棉蚜危害棉花，不许贫下中农除治。试问，这个“专家”哪有一丝一毫贫下中农的感情？哪有一丝一毫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心意？这种人又怎么能给我们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他们只能培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精神贵族！在这里，大叛徒刘少奇和陆定一之流，散布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谬论，其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俺贫下中农的最大支持和信任。毛主席给俺贫下中农撑腰，俺一定为毛主席争气！俺有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有不图名、不为利、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有经过多年生产劳动积累起来的丰富实践经验，再加上俺对贫下中农子女充满了阶级的爱，因此，俺完全能够教育我们贫下中农子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沿着毛主席指引的

革命道儿往前闯！并给他们传授农业生产知识，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大叛徒刘少奇鼓吹教授治校的目的，就是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俺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俺凭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学校的讲台，俺贫下中农是占定了！

“厂办校，两挂钩”——甘肃省兰州市关于城市中学走工厂办校道路的调查报告

1969-01-27　红旗

编者按：城市小学及中学的教育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此件较全面地介绍了一所厂办中学的初步经验，供参考。

兰州铸造厂“五·七”中学，原名兰州市第五中学，学生一千六百多人。一九六八年十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局面。他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组织师生在兰州铸造厂定厂劳动，以后又发展到由铸造厂领导和管理，实行“厂办校，两挂钩”。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这个学校的革命师生一致认为：城市中学走工厂办校的道路就是好。

工厂办校的几点做法

一、工人阶级直接领导学校，实行革命三结合的管理。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厂革委会成立了一个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老工人、驻校解放军和革命师生组成的三结合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革命。以后，他们逐步充实校革委会，由厂革委会主任（革命干部）兼任校革委会主任，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军训连负责人以及原校革委会主任担任副主任，厂革委会还选派了三名老工人任校革委会委员。这样，就把校革委会完全置于厂革委会领导之下，实行统一领导。

二、以毛泽东思想为办学的根本，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走政治建校的道路。厂革委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广大工人群众、革命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深入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习解放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废除了班主任负责制，按年级组成班、排、连，连队设政治指导员，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担任。开展了创造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每周一检查，每月一小结。

三、实行“厂办校，两挂钩”。学校以工厂为学工的基地；与附近的皋兰山人民公社挂钩，建立学农的基地；并和当地驻军的一个连队挂钩，由连队派指战员帮助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军训。进厂学习的师生，分为两班，一班上午劳动，早晨上课一节，下午上课三节；一班上午上课三节，下午劳动，晚上上课一节。两个班每周各劳动三天，上课三天，一周对调一次。根据实践经验，最近作了改进，增加了上课时间：每周上课四天（两个全天，四个半天），劳动两天（四个半天）。上课和劳动以排为单位，交叉进行。除全天上课外，其余上课和劳动时间：上午上课三节（八点二十分至十一点四十分），下午上课三节（两点半至五点半）；上午劳动（九点至十二点），下午劳动（一点半至五点半）。每周上课二十四节，其中，毛泽东思想课十二节，工业基础课四节，革命文艺课四节，军事体育课二节，机动时间二节。安排学生劳动时，根据年龄和体质有所区别。劳动中，固定班组，固定师傅，学习操作，实行现场教学和课堂教学相结合。在农村，则根据农事活动安排劳动和学习，农活紧张时，全天劳动。课程内容，除把工业基础课改为农业基础课外，其他大体相同。这样，一部分师生在农村，一部分师生在工厂，一年一轮换，都“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四、遵照毛主席关于“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的伟大教导，建立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教员队伍。他们在厂内选拔了四名老工人为专职教员，并邀请二十三名工人、十九名贫下中农、二名解放军战士和一名与工人结合得较好的技术员为兼职教员。原来的五十九名教员，留下二十四名同学生一起到工厂、农村参加三大革命斗争，边工作，边学习；其余的大多数教员，分期分批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五、遵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的伟大教导，将中学六年三三分段制，改为四年二二分段制，并准备逐步过渡到四年一贯制。在课程设置上，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联系实际，力求少而精的原则，将原来的十七门课精简合并为五门课。

毛泽东思想课。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一系列最新指示，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进行阶级教育。

工业基础课。学习毛主席关于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光辉思想和工业学大庆的伟大指示，学习“鞍钢宪法”。密切结合本厂生产，结合机械、电工、化工等，讲授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工艺。

农业基础课。学习毛主席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光辉思想和农业学大寨的伟大指示。以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为纲，结合农时季节的变化，讲授经济地理、气象、生物知识；结合化肥、农药、土地丈量、水利建设、测绘、农业机械等，讲授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还讲授农业会计。

革命文艺课。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的五个文件为基本教材，学习《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还学点语法和练习写作。开展各种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歌颂工农兵的创作活动。

军事体育课。学习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学习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学习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开展体育活动。

工厂办校后的新变化

第一个大变化是：工人阶级全面地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教育师生。

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师生，妄图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不仅不安排毛泽东思想课，还把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砍掉。工厂办校后，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建校的灵魂。以前有个班主任曾对一个学生说："你有培养前途，将来可以当个大干部，出门卧车送，进门有人迎。"现在工人教育学生："我们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要听毛主席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把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扔到粪堆里去。"同学们深有感触地说"工人、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最忠，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第二个大变化是：学校师生拜工农为师，与工人、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增强了劳动观念。

师生们把工人、贫下中农当作最好的老师，虚心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无产阶级感情越来越深。一个同学在劳动中不小心砸破了右手，工人师傅买了一条新毛巾，亲手缝成手套给他戴上，让他好好休息。他闲不住，便又去上班，用左手在废料堆里拣回许多螺丝帽和废铜。有个女同学原来怕脏怕累，经过贫下中农教育，自觉地斗私批修，争者干重活，抢着干脏活。她说："我决心在这所新型的学校里努力锻炼，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九六八年，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就有五百零五人。

第三个大变化是：彻底克服了过去教育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现象。

这所学校，爬一座山就是皋兰山人民公社，过一条马路就是兰州铸造厂。但是，过去学校很少与工厂、人民公社发生联系，对工厂、农村里的阶级斗争不闻不问。学生关在大楼里，长期不接触社会上的三大革命斗争，思想空虚，写一篇作文，“咬破笔杆，搔破头皮”，弄些“五泉山游记”之类的东西。

工厂办校后，他们经常请老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忆苦思甜的报告，直接参加工厂和人民公社的对敌斗争，狠批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使学生们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迅速得到提高。

过去，讲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脱离实际，讲了炼铁，认不得铁矿石；讲了小麦，却把麦苗当草拨了。现在，工人和贫下中农教员密切结合生产，讲授工农业基础知识，使学生一听就懂，学了就会用。例如，有的学生提出认不清钢和铁，一个大学毕业的教员，讲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讲清楚，而工人教员结合生产实践教学，只用一节课的时间，就使学生懂得了钢和铁的化学元素和识别要领。学生们说：“过去听课，听不懂，用不上；今天工人和贫下中农讲课，听得懂，学得快，记得牢，用得上。”

第四个大变化是：改善了师生的健康状况，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过去，旧的教学制度摧残青年，把学生束缚在教室里，课程多，负担重，使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体质不断下降，视力逐年减退。工厂办校以后，师生经过劳动锻炼，体质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有四个排的学生，过去下乡劳动九天，就有不少人生病不能坚持，现在他们在皋兰山人民公社学农的八十天中，经常坚持劳动，生病的人极少。有一个女学生，原来身体很弱，上一趟山很费劲，经过

两个多月的锻炼，现在已经能够往返三十余里从半山腰把水车拉到山顶。广大师生反映说：“工厂办校就是好，既炼红了思想，又练好了身体。”

工农兵齐赞工厂办校好得很

“五·七”中学实行“厂办校，两挂钩”以后，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师生齐声称赞：好得很！

工人群众认为：这是城市中学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好办法，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根本保证。工人同志说：“工厂办校后，学校的大权我们工人阶级就掌得更牢了，就可以按照我们工人阶级的面貌培养下一代，培养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了。”他们表示：毛主席要我们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只要我们上靠毛泽东思想，下靠广大革命群众，团结广大革命师生，我们工厂不但能够办学校，而且一定能办得好！

工厂办校，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赞扬。一位贫农老大爷说：“城里的娃娃跑到农村来念书，这是祖祖辈辈都没有过的事。以前，我们山上有几个娃娃到城里去上学，好娃娃一上洋学堂，就给教坏了。现在你们这个路子走对了，真合我们贫下中农的心意。”

当地解放军战士对这所新型的学校称赞说：“工厂办校，又跟人民公社、连队挂钩，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带到学校里去。”

广大革命师生更是无比欢欣鼓舞，他们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坚定地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日益发展和完善。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兰州市革命委员会　联合调查组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

1969-01-29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月二十五日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很好。这个报告是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去年七月二十七日以来，经过半年的斗争和实践写出来的，不仅对各大专学校，而且对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和单位都很有用。现在把它发给你们，供参考。

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

清华大学是一九一一年由美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筹建起来的。工人宣传队进校时，在校学生八千一百六十六人，教职员三千九百三十五人，校内工人二千一百六十二人，共计一万四千二百六十三人。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全校一百六十五名处长、部长、系主任、总支书记等中层以上的干部，百分之八十八是解放前受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七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各个教学的基础单位——教研室，几乎全部被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教授、副教授、讲师把持着。

我们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进校以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包括“给出路”的这一无产阶级的政策，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争取、团结、教育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给予适当的处置。”我们的基本作法是：

一、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在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中，一种是在解放前受资产阶级培养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种是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总的看来，前一种人比较复杂，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多，有历史问题的多，有海外关系的多（因为留学的多），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有封、资、修学术思想的多，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后一种人虽然与前一种人有所不同，但长期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其中多数人也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世界观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土建系材测教研组三十九个人，就有二十五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只有三个人家庭、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没有多大问题，却也犯过某些错误。宣传队员扒拉来又扒拉去，觉得都不可靠，都不可信。有的甚至说："干脆一窝端到农场劳改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的伟大教导，从思想上解决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大多数的问题。同时对他们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和辨证的分析。如根据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正确对待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本人交待清楚以后，要根据他们的现实表现加以信用；要把一般的海外关系同里通外国区别开来；对一部分学术思想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还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要团结、改造他们；等等。那个曾经被看作是"一窝黑"的材测教研组，我们这样重新考察和分析，发现三十九个人中的大多数还是革命和要革命的，从中选拔了十五名教职员积极分子。讲师刘彤，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但他历次运动中表现不错，工人宣传队进校后他带头斗私、批修，并能大胆揭露其父的罪恶。我们就把他选定为积

极分子，在运动中大力培养他、使用他。与此同时，我们在全校范围内迅速建立起占师生员工总数三分之一左右的积极分子队伍，通过他们又争取、团结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

但是相信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并不能代替对他们的再教育，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政治上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深入人心的伟大时代，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的形势下，改造知识分子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几个月来，我们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工作，主要是引导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狠挖隐藏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宣传队各连普遍组织了作忆苦报告，吃忆苦饭的阶级教育课，不少老工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痛斥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和其它反动谬论，激发师生员工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痛恨刘少奇的阶级感情。基础课讲师赵静安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向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深有感触地说："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拯救了我，工人师傅教育了我，我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做一个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从此精神振奋，在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表现积极，大胆揭露阶级敌人的罪行。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经常有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不动摇相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基本原则，二是把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工作坚持下去，决不让他们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因此，每次出现反复的时候，我们都紧紧抓

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一条纲，针对一些知识分子在反复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

一个贫农出身的教师解放前家庭很苦，解放后村子里贫下中农把他送到大学来读书，可是他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把当工程师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不问政治，埋头搞业务，因此，被蒋南翔立为“标兵”。工人宣传队进校后，对于同工农兵相结合，理论上他说：“这是必经之路”。表现积极。但是，后来当动员知识分子下农村劳动时，他就想不通了。说什么“十年寒窗苦，为的把名出，早知当农民，何必来读书”。宣传队又反复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使他的觉悟大大提高。他说：“现在才真正认识到我的思想境界是空虚的，世界观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我一定要痛下决心，把立场转过来，要和工农兵一条心，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最近我们还组织了一部分师生到工厂、农村和工人、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斗、批、改。

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清华大学这个过去被称为有名望的高等学府，许多所谓有“地位”的人物，都把自己的子女送来深造，这样就使得这个学校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特别多。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被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揪斗的有一千四百二十四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七。这些人和其他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区别。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都以革干子弟自居，自称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在群众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反动血统论的信奉者。后来老子出了问题，又觉得一落千丈，抬不起头来，有些人甚至有严重的对立情绪。

如何对待这些人的问题是在知识分子中贯彻毛主席的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新课题。

宣传队进校后，有些同志对这部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反感，称他们为“黑种子”，不敢沾边，不重视做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不重视，一小撮阶级敌人很重视，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引入歧途。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女儿——自控系学生刘涛为例，我们进校前后，阶级敌人就曾不断利用写反动信，登门拜访，以交朋友、谈恋爱等各种方式，对她进行引诱和毒害，想把她拉上反革命的道路。类似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争夺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习了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的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伟大教导，认为宣传队在这场争夺战中，必须打主攻战，加强对这些人的教育工作，争取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几个月来，我们的工作时紧紧围绕着一个“拉”字进行的。我们发动和组织他们参加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帮助他们认清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老子的罪行和错误，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帮助他们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时，我们经常针对他们的问题和活思想，通过大会、小会和谈心活动，向他们交待政策，指明出路，对他们进行热情、耐心、细致、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最终使他们能够作到“划”（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清”（肃清刘少奇和反动老子对自己的影响）、“站”（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比如刘涛，我们进校后，及时了解她的活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启发教育她。当发现她有悲观的“宿命论”时，宣传队就给她讲明父母不能由自己选择，走什么样的

道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道理，教育她彻底地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划清界限。当发现她因为一部分群众歧视自己而产生同群众对立的情绪时，老工人又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群众的教导，使她正确看待群众对刘少奇的革命义愤，并自觉地与群众一起批判和声讨刘少奇的罪行。当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党时，老工人又和她一起学习全会公报，共同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在老工人的帮助下，刘涛写了八份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刘涛毕业离校时，宣传队还同她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谈话，教育、鼓励她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刘涛感动地说："工人师傅对我的教育，使我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不仅挽救了国家，而且也挽救了我自己，我要彻底揭发批判刘少奇的滔天罪行，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事实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英明指出的，"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我们深深体会到：同敌人争夺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最根本的一条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使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遇到什么情况，都有"免疫力"，使敌人现在拉不动他们，将来也不能把他们拉过去。经过我们的工作，现在清华大学"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除极少数坚持顽固态度外，大多数都有显著进步，表现较好。工化系有六十九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工人宣传队刚进校时，一片消沉，如今都投入了革命的大批判、对敌斗争的革命群众运动，其中有二十人成了积极分子。如王芹珠的父亲原是一个地委干部，历史上曾叛变革命，运动中被群众揪出后畏罪自杀。王为此曾一度产生悲观情绪，经过教育后，现在不论在大批判中，还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都是敢打敢冲，并积极起来批判老子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后来被群众选为班长，发挥了骨干作用。

三、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

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清华的代理人蒋南翔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在清华大学把许多教授、讲师安插在各系的党政领导岗位上，全校十一个系和一个基础课，正副总支书记和正副系主任共有九十八人，其中属于“双肩挑”的（即同时担任教学任务）有九十五人。冶金系各教研组支部书记、正副主任以上共有三十四人，“双肩挑”的就有三十三人。这些人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支基本力量。正确处理这些人的问题，是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如工化系主任汪家鼎（三级教授）、基础课总支书记李卓宝，十几年来都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他们还重用过一些坏人，并犯有一般右倾言论的错误。过去他们是蒋南翔重用的“红人”，同蒋南翔来往较多。他们在运动中都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批斗，群众认为他们是蒋南翔等“一小撮”里的人物，因此两年来谁也没有去考虑要解放他们。

宣传队遵照毛主席“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的伟大教导和“一二·一”“一二·二六”重要批示精神，首先，引导革命师生员工在深入批判的同时，对他们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为他们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又都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十几年来他们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也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因此，不能算是坏人。

其次，在最后处理他们的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注意分寸，运动中革命群众起来大揭大批，上纲上线，是完全必要的，对他们是有益的。但定案落实的时

候，就要慎重甄别情节的真实程度和严格区分问题的性质。这里特别要区分如下四种情况：（1）把工作关系上的来往同蒋南翔等一小撮搞阴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开来；（2）把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同蒋南翔等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力推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3）把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散步的一般右倾言论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区别开来；（4）把由于不突出政治，坚持业务第一重用了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少数坏人）同出于反革命目的招降纳叛、网罗重用坏人区别开来。经过群众分析研究，认为他们是属于前者，即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而不属于后者，即一小撮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家。

对于这些人，态度很重要，改悔与不改悔关键在于对自己的问题或群众的批判抱什么态度。汪家鼎在工人宣传队进校后，能主动斗私批修，找宣传队和革命群众汇报活思想，找对自己意见大的师生徵求意见达五十余次。能够彻底检查批判自己的问题；能够正确对待和诚恳接受群众的批判、帮助；能够同蒋南翔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能够大胆揭发别人，在实践中确有改悔的表现。他在批判自己的同时，还积极参加革命的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因此取得了群众的谅解。但是李卓宝由于抱着过关的思想连续检查了两次，群众都没有通过，不过群众仍然坚持一方面对其错误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充分地给她留有觉悟的机会。后来，李卓宝在群众的批判、教育下，有了觉悟，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她痛哭流涕地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我从泥坑中挽救过来，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今后，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对于他们两个人以及类似这样的人，群众还打算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按其专业特长，给予适当的工作，以便在实践中继续考察他们，教育他们。

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批判，要给以出路。

在清华大学被群众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大小小有一百余人，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十四人。

这些人不是特务、叛徒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在学术领域内大搞封、资、修和“三脱离”的一套货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重要支柱。由于他们长期受蒋南翔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重用和吹捧，占踞要位。他们人数不多，流毒很广，影响较大。其中原土建系主任、一级教授、建筑学反动权威梁思成，原副校长、一级教授、机械学反动权威刘仙洲，力学反动权威钱伟长（曾任副校长、一级教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被撤销一切职务，降为三级教授，一九六一年摘帽）尤其如此。经过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政治上是不那么香了，但也不是那么臭。有些师生还把这些人比作臭豆腐，说“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政治上臭，业务上香”；另有一些人则主张将这些人全部来个“吹灯拔蜡”，当作“废物”处理算了。

宣传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教导，选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三个典型，发动师生员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住他们的要害问题，紧紧围绕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集中批判了他们的学术是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这样就打中了要害，充分揭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肃清他们的流毒，使他们没有放毒的市场。使师生员工受到了很大教育，认识到“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的伟大真理。有的人说：“现在再来看他们那一套货色，就不是‘臭豆腐’，而是‘臭狗屎’了。”

同时，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一是在批判中，要注意把他们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区别开来。可以背靠背地批，面对面批的时

候，可以让他们坐在凳子上听，要重在触及灵魂。刘仙洲说：“虽然让我坐着，却如坐针毡。”二是在批了之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了，但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个别部分上还有用，应有所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著作反面教员。对他们的生活不要太苛刻。对于准备用的人，要多给他们创造锻炼改造的条件，钱伟长要求下工厂劳动改造，十一月份开始就让他同一部分师生到特钢厂劳动，最近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了旧思想同新时代的矛盾，我如果不走这样一条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从政治思想到生活习惯上同时代格格不入，好像辛亥革命后的满清遗老一样，发展下去太危险了。”他表示要一边劳动锻炼，一边研究教改问题。

宣传队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字当头、给予出路的处理，不仅使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受到了很大教育，表示要在晚年多为社会主义出把力，也使其他不少老教授看到了自己的出路。他们感到有了奔头，也活跃起来了，主动清理自己的问题，表示要争取“一批、二用”。

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

混在清华大学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有两点值得注意：

（1）历史的多，现行的少。所谓历史的，即解放前参加特务组织、反动党团和担任敌伪官员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既无联系，又无活动了（个别人也有现行问题）。所谓现行的即披着学者外衣从事特务活动和进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家伙，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两种人在教授和一部分讲师中属于前者的占多数。

（2）他们多是一些搞理工科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掌握某些有用的学识和专长，如数理化知识和外语能力等。在他们“一清二批”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酌情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无产阶级服务。

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和分析出发，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在发动群众狠揭狠批和搞好内查外调工作的基础上，普遍开展政策攻心战，给他们交待政策，指明出路；在他们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和决心重新作人之后，则给予从宽处理，能不捉的尽量不捉，能不戴帽子的尽量不戴，给他们以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机会，借以立功自赎。去年十二月五日以来，全校开了三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从宽处理了教职员中包括历史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企图叛国分子在内的五个反革命分子。这五个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要戴帽子是完全够格的。但是，在毛主席的“给出路”政策的感召和革命群众强大的政策攻心战的压力下，他们能够低头认罪，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态度较好，宣传队便决定不给他们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只是因为他们问题轻重、态度好坏还有差别，决定对其中三人仍然实行群众监督，以观后效。对于死硬的反革命分子，则给予无情的揭露和狠狠打击。如直至去年三月还为美帝国主义送情报的现行特务王振通、拒不交待罪行的历史反革命刘玉泉都经过群众路线，给予严惩。我们还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充分利用每次大会以后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矛盾、动摇心理，不失时机地展开群众性的政策攻心战，使一小撮阶级敌人迅速分化、瓦解。有的说：“现在出路给摆出来了，我要‘竹筒倒豆子’，争取从宽处理。”结果三次大会有一千零六十五人坦白交待问题，其中交待重大问题的一百四十七人，从而大大扩大了坦白面和教育面。正是：宽严了几个，争取了几百，动摇了敌人的营垒，把极少数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可抗拒的威力。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

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

1970-05-09　人民日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锻炼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回顾历史的经验，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迫切要求以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去年，两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在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满怀革命豪情，到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了教育革命的试验农场，在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上，奋勇前进！

近一年来，这两个学校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通过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和艰苦的劳动锻炼，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熔炉里，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清扫修正主义的流毒，荡涤自己身上的污浊，决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这里，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和许多革命干部，团结一致，精神振奋，焕发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的战斗青春。通过革命的实践，他们深深地体会到，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道路，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

拜贫下中农为师　一点一滴从头学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来到试验农场以后，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的伟大教导，恭恭敬敬地拜贫下中农为老师，对照贫下中

农找差距，一点一滴从头学，变立场，变思想，变感情。他们的这种自觉改造的态度，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

清华大学青年教师周子寿，有一次劳动后，把铁锨一扔就走了。和他一起劳动的一位老贫农，却把自己的铁锨擦得干干净净。后来，这位老贫农给大家谈起一把铁锨来得不易的故事。解放前穷人没有劳动工具，借地主的还要交利钱，损坏了不仅要赔偿，还要挨打受骂。老贫农的话，触动了这位青年教师，他本来是贫农出身，在旧社会是个孤儿，毛主席把他从火坑里救了出来，给了他上大学的机会。当初，他离开家乡的时候，村里的贫下中农对他嘱咐了一遍又一遍，希望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苦，要为毛主席争气，为贫下中农争气。可是，在修正主义旧教育制度毒害下，他慢慢地变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因公到家乡出差，贫下中农的饭，他吃不惯；贫下中农的床，他睡着不舒服；贫下中农为他打的洗脸水，他嫌不干净。想起这些事，他猛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逐渐地丢掉了贫下中农的感情。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狠批了旧教育制度对青年一代的毒害。从此，不论劳动多么疲劳，不论事情多么繁忙，他都坚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第一位，自觉改造世界观。后来他被大家选为全农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去年冬天，这两个学校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和当地的贫下中农一起，参加了修固鲤鱼洲圩堤的大会战。北京大学有一位女教授，从来没有挑过担，她看见有的贫下中农比自己的年龄还大，却精神焕发地和青年人一起挑土。她想：老贫农能为革命挑重担，我为什么不能呢？她勇敢地拿起扁担挑土上大堤，立即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她感动地说："我大半辈子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现在刚从头学起，贫下中农就鼓励我，我一定要把革命的重担挑到底。"

在修固圩堤的共同劳动中，两个学校的革命知识分子与贫下中农结成了战斗的友谊。在工程结束的那天晚上，他们要同贫下中农分别了，鲤鱼洲上出现了十分动人的场面，他们和贫下中农促膝谈心，直到天亮。贫下中农千叮咛，万嘱咐，

希望他们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不少贫下中农给他们写了告别信，并送来珍贵礼物。有的老贫农送来了一家三代当长工用过的铁锹、镰刀、扁担和竹筐。扁担上写着：“《五·七指示》放光芒，主席教导记心上，小小扁担五尺长，革命重担挑肩上。”老贫农激动地抚摸着扁担说：“在旧社会，我们担着它，给地主阶级做牛做马；后来，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我们拿起扁担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用它砸烂了万恶的旧社会；现在把这条五尺扁担送你们，表示我们贫下中农的一片心意，这是革命的传家宝，你们可永远别丢啊！”

革命师生们接过这珍贵的礼物，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们说：这珍贵的礼物，凝结着阶级仇，民族恨，凝结着贫下中农的深情厚意。看着它，忆苦思甜不忘本；看着它，革命到底志不移！

彻底改造世界观　一颗红心为人民

两个学校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通过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他们体会到，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懂得了“老三篇”的威力，好象是第一次认识了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这三个光辉形象。他们带着一身泥巴，坚持天天读“老三篇”，越读越感到亲切，越读越体会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共产党员徐雅民，是北京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他父亲和哥哥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敌人杀害了，解放后贫下中农送他上了大学，行前贫下中农嘱咐他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做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当时，他带着革命的激情来到北京，进了北京大学，放下行李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他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仰望天安门，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他又跑到烈士纪念碑前，回忆起父亲和哥哥牺牲的情景，更加激起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激发了革命的斗志。当时，徐雅民下定决心，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誓

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也就从他走进这个“最高学府”的第一天起，资产阶级向他伸出罪恶的黑手，他对资产阶级那一套一年看不惯，二年跟着变。开始他经常写信向贫下中农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后来他不写了；开始他想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后来他埋头业务，一心想成名成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这个青年人猛醒过来，他沉痛地说：我本来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使我忘了本，忘了革命先烈。他表示决心要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坚决要求做第一批“五·七”战士。当徐雅民到了鲤鱼洲以后，他刻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有时为了突击完成紧急任务，夜间劳动到两三点钟，回到宿舍还打着手电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斗私批修的战场上，他无情地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青年一代的毒害；在劳动中，哪里艰苦，他就到哪里去，处处以身作则，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清华大学一位副教授张礼，曾经留学三个国家。过去他错误地认为，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改造思想，是“舍我之长，用我之短”。到了鲤鱼洲以后，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几十年来所走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他算了这样一笔账：解放前，我留学一年的费用，相当于四十个贫下中农一年辛苦劳动的果实；解放后，党和人民又两次送我去国外学习，要我学了知识为人民服务，可是，我却把劳动人民给我的知识，当成自己成名成家的资本。他反复想自己过去的经历，看着睡在身旁的和他同年龄的工宣队老赵师傅，自己久久不能入睡。夜深人静，他脑子里“过电影”了，同龄人的不同遭遇，一幕幕展现在他的面前：旧社会，当我上大学的时候，老赵师傅是一家玻璃厂的学徒工，我在做着成名成家的美梦，他却在受冻挨饿，受资本家剥削；当我出国留学的时候，老赵师傅失业流落在北京街头，拉三轮糊口度日；解放后，我沿着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继续滑下去，老赵师傅却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现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通过算账和对比，这位副教授明白了一个简单的真理：知识从哪里来的？他认识到，自己的知识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几十年寒窗苦读得来的，而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是劳动人民给的。他狠批了“知识私有”的反动谬论，坚决表示，一定要把知识还给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坚决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从此，张礼下定决心，要在艰苦的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有夜盲症，仍旧积极参加夜战；过去他怕脏怕臭，现在专门挑大粪。农历除夕之夜，在风雨泥泞中，他参加了抢修排灌站工地的战斗，他说：“这是我四十五年来第一次最有意义的春节！”就在这天晚上，他参加了工地上的大批判会。他豪情满怀地表示决心说，我要在鲤鱼洲用黄泥水洗刷自己的旧思想，在踩过的烂泥里走出一条革命的路，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不忘历史的经验　永葆革命的青春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许多革命干部，经过近一年来的艰苦锻炼，他们的共同体会是：只有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才能深刻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两个学校的许多老干部，过去跟着毛主席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挽救了他们。他们说，今天来到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是毛主席对自己的最大关怀。有些过去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的老干部，在鲤鱼洲上重新挑起了放下二十多年的扁担，心情万分激动。他们说：三十年前，“抗大”培养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是重进“抗大”，重新学习。有的老干部，在艰苦的劳动实践中，批判了“劳动省心论”，有的说：“无产阶级省了心，阶级敌人就

要开心。”有的说：“省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责任心，就一定增多了资产阶级的私心。”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的教导，掀起了自觉革命的新高潮。

北京大学原党委监委副书记孟林，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多次亲自听过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她在陕北公学毕业的时候，毛主席来到学校，谆谆教导他们，毕业以后一定要和民众打成一片，要学会做群众工作，为人民服务。但是，她进城以后，房子越住越大，讲吃讲穿，逐渐走了下坡路。她来到试验农场，这里的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使她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回想起毛主席当年的教导，她决心把这历史的教训化做继续革命的动力，一切从头做起。有一天夜里，大家到排灌站工地劳动，本来留她在伙房做饭，但她坚决要求去工地参加紧张的劳动。在工地休息时，她把自己的思想转变编成快板给大家演唱，鼓舞大家的斗志，群众说她“恢复了革命的青春！”

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健，当年在解放区曾经两次进“抗大”式干校学习。当他来到鲤鱼洲吃上糙米饭的时候，就想起当年住窑洞、吃黑豆的艰苦生活；当他拿起镰刀和扁担时，就想起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想起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反扫荡、一起斗地主的峥嵘岁月；当他拿起革命红宝书的时候，就想起过去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景。过去，是毛主席指引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联想自己进城以后的变化，他心头万分沉痛，感到对不起毛主席。他说：“千错万错，不读毛主席的书，背离毛主席的教导，是我过去最大的错。”他认识到：共产党员的一生，应该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一生，是斗私批修的一生，是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一生。他在劳动锻炼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后来被群众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并推选他为农场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委员。在革委会成员办的学习班上，群众送给他三件最珍贵的礼物：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希望他永远听毛主席的话。一根青竹扁担，上面刻着毛主

席的最新指示“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群众还在扁担上给他写了一首诗：“青竹扁担挑在肩，主席教导记心间，历史经验不能忘，继续革命永向前。”第三件礼物是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群言堂”三个字，希望他永远执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他接过这些礼物，万分感动，坚决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一定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一辈子人民的勤务员。

广阔的天地　灿烂的前程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一年来的实践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世界观，从根本上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恶习，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刚来到鲤鱼洲的时候，不少人由于长期“三脱离”，出了不少“洋相”。讲力学的，挑担子找不到平衡点；学水利的不会打井；学土建的垒不起猪圈；学化学的不会使用化肥；学哲学的不会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问题；学文学的写不好总结。实际斗争是最好的考试，他们决心从头学起。

有一次，北京大学一个教育革命小组，了解到饲养家畜、家禽很需要土霉素。他们在学校试验农场党组织的支持下，和当地一个农场的工人一起组成了土霉素试制小组，白手起家，土法上马，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没有接种针，就自己做；没有灭菌锅，就用蒸笼代替；没有恒温室，就自己拣煤核，生炉子造起土恒温室；没有摇床，就和工人师傅一起做了土摇床。经过二十七天的紧张战斗，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试制成功，建立了一个土法生产土霉素的车间。农场工人同志高兴地说：“你们听毛主席的话，走‘五·七’道路，才和我们走在一起，想在一起，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欢迎！”他们回想起过去在高楼深院，整天穿着白大褂，拿着试管在高级实验室里研究什么蝌蚪尾巴、果蝇遗传等，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家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在'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的专业才能真正为工农兵服务。"

去年十月，清华大学在初建试验农场的时候，有两位教改小组的同志，看到在农村架设电线要花费国家大量资金。他们本着毛主席关于"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伟大教导，提出推行"两线一地"的送电建议，就是把原来需要架设三根电线的送电方法改成只架设两根电线送电，另一根用大地来代替，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输电方法，使原来的三根电线、三相开关、三相刀闸等相应的三相设备，一下子革掉了三分之一。按照这种供电方法，在现有输电设备的情况下，可以大大扩大农村的供电线路，可以节省大量铜、铝、白金、钢材、水泥等物资。"两线一地"的输电方法，一九五五年在个别地区曾经试验过，受到工人、贫下中农的欢迎。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工交战线上的代理人推行洋奴哲学，胡说什么："外国杂志早有介绍，至今不见外国农村推广，这里边总有道理"。就这样，这件新生事物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当他们提出搞"两线一地"的建议后，受到了试验农场党委的大力支持。他们走出农场，先后调查了十六个地区的二十七个单位，受到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支持和帮助。今年四月十二日，他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输变电工程，在试验农场开始供电了。他们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只要改变了旧思想，端正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就有广阔的前途。

鲤鱼洲日新月异地在改变着面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随着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飞速发展，在革命化的大道上，向前迈进了可喜的一步。他们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有一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路越走越宽广，越走心里越亮堂，越走革命信心越强。他们在鄱阳湖畔，鲤鱼洲上，遥望北京城，

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决心：在今后的革命征途上，我们将永远沿着光辉的“五·七”道路，风吹不转向，浪打不回头，继续革命，奋勇前进！

（新华社七日讯）

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70-07-22　红旗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开展。一年多来，工人阶级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遵循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以《五·七指示》为纲，“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正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从“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和巩固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教育阵地，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伟大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否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巩固，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伟大教导，我们深入持久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的和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各个学术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批判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经常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利用知识分子世界观上的弱点，散布毒素，妄图夺回他们丧失了的“世袭领地”，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公开叫嚣：“工人阶级领导不了尖端科学”，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散布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让知识分子靠边站”，妄图把知识分子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进行反夺权。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坚决揭露和批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和动摇工人阶级领导的罪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所有这些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彻底批判，陈旧的东西就会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会大权旁落，教育革命就会走上改良主义的邪路。实践说明：击破旧的习惯势力，比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要困难得多。

反动的精神堡垒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武器去摧毁。只有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彻底批臭，肃清流毒，才能真正把它们打倒，从根本上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造成人们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的空气。必须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大胆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否则，就是自己孤立自己，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架空。教育革命同其他一切革命工作一样，“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压倒一切，使知识分子处于“推一推，动一动”的地位。依靠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恰恰是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坚决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宣传队员要向再教育对象学习，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掌握文化教育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要艰苦奋斗，经常参加劳动，联系群众，拒腐蚀，永不沾；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认真总结经验；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错了就改，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是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创建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他们敢于创新，破除迷信，富有批判能力。同时把社会生产的先进经验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也带进学校中来，密切了厂校挂钩。他们讲的课，学员反映：学了就能懂，懂了就能用。一年来，我们在三大革命第一线选拔了一批工农兵做专职、兼职教员，使他们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参加教学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教学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动了教学改革。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是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走着瞧”、“看笑话”的态度，有的企图把封、资、修的一套塞给工农兵教员，搞什么“我装药，你放炮”。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事实上，工农兵最懂无产阶级教育，过去，旧大学把工农兵排斥在外，是历史的颠倒。今天，工农兵登上社会主义大学讲台，是历史的必然。

原有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又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师队伍也是这样，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反革命分子，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对于广大教师，既要看到他们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又要看到他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教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

悟有了提高，要充分估计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旧体系必须破除，又要看到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些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充分发挥一切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才智，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只要抓紧政治上的再教育，业务上的再学习，原有教师的大多数就能继续任教，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对极少数实在不行的，也要给予出路，进行教育，安排适当工作，继续考察。

为了帮助教师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必须坚持在使用中对他们团结、教育、改造。那种“改造好了再用”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着重解决教师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针对他们过去长期“三脱离”的弱点，组织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参加创办试验农场，对口下厂，轮换劳动，进行教改实践，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改造思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往往在对业务知识的看法上反映出来，必须彻底改造各个业务领域。教师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必然深刻地触及他们中间一些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知识私有、理论至上、洋奴爬行、个人名利等旧思想，这有利于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不能自发完成的。环境的变化只是为他们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还必须本着抓紧、抓严、抓细的原则，针对活思想，进行再教育，用他们中的先进典型教育他们自己，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他们思想上的动摇和反复，因势利导，做耐心的认真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加以纠正。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效地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积极参加教育革命，但思想还有旧框框，暴露出一些“三脱离”的问题，与坚持走老路区别开来。

二、把真心实意与工农兵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

三、把带着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问题，积极钻研业务，查阅有关国内外的书本、资料，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至上，崇洋复旧区别开来。

四、把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和填补空白，有分析有鉴别地向国内外学习我们所不懂的和没有的东西，同洋奴、爬行思想区别开来。

即使有少数人拒绝接受再教育、坚持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对他们那些旧思想，在教育革命中进一步深入批判，抓紧教育、改造就是了。

五、对那些政治历史问题审查清了的人，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和现实表现，吸收他们参加教育革命，在使用中进行教育和改造。

六、对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过群众批判后，有所转变，就要不断引导他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封、资、修的学术思想，促使他们自觉革命。同时，还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七、在教学改革中，对于自然科学上某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尊重客观规律，通过实践去解决。

通过教育革命实践，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工农兵反映："这些知识分子，过去与我们心隔心，谈不拢，现在是心贴心，谈得亲。"广大教师深刻体会到，再教育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决心一辈子做工农兵的小学生，永远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也有很大进步，不少人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一个教授，对他过去编的一套在国内传播很广的教材，认为无需改革，"从货架子上拿下来掸掸土就能用"。我们让他参加教育革命分队，针对他在给工人讲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他和群众一起批判封、资、修教育体系，对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逐步认识到："我那套理论至上、故弄玄虚的旧教材不符合工农兵的需要，掸掸土不行，即使改头换面也不行，必须彻底改革。"后来，他与其他革命师生同工人结合，在解决工厂一项重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向工人学习，提高了觉悟，做出了成绩，受到工人的表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重要的革命力量。现在，一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立起来的三结合教师队伍正在成长。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新体制，决不是简单的组织变动，而是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

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公开反对学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鼓吹"清华园是工程师的摇篮"，"实验室里就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使得许多师生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身体也搞坏

了。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宣传队引导广大师生深刻批判这条修正主义办学路线，带领他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试验农场，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大学班、短期培训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多种途径，开展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各单位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决然搞不好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闭门读书，工程师的摇篮，摇得我们晕头转向；现在开门办学，三大革命的熔炉，炼得我们心红眼亮。”社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创造，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而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又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厂校挂钩为教育革命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学校办工厂”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决策。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这是学校办工厂的指导思想。在办厂的过程中，充满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我们批判了贪大求洋、向国家伸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批判了把生产与教学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就是一切”的错误思想。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学为主”，把培养人放在首位。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教学需要，考虑各专业相互促进和发展，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先后办起能带动多种专业

的中小型工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汽车制造厂等，承担国家一些科研、生产任务。如电子综合试验厂就是在原有实验室设备的基础上，利旧创新办起来的，它带动了自动控制、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生产多种电子工业产品。校办厂在订生产计划时要考虑教学需要，留有充分余地。选择的产品，具有先进性、多样性、典型性，既是工业、国防急需的，又要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既有一定的批量生产，又大力进行研究试制，不断采用新技术。

根据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我们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打破过去系的界限，或者合并，或者增设，都按科研生产实践的联系，把有关专业纳入校办工厂、科研单位和厂校挂钩系统，实行厂带专业。同时，建设一支新型的基础理论队伍。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这样就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如压力加工专业的师生，在汽车厂锻压车间参加劳动，结合生产汽车上的各种锻件，学习“锻造工艺”等课程，既掌握了生产技能，又学到了科学理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工人参加到各个教学环节，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师既进行教学，又参加生产，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保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学实验是理工科大学必须担负起的重要任务。在办工厂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校办工厂与实验室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培养学员科学实验能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突破尖端技术，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探讨新理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基地。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我校多数专业以校办工厂为主要基地；部分专业以厂校挂钩为主；有的专业主要利用实验室，结合科研进行教学。校办工厂和实验室

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一年多来，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技术人材，完成了一批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还为国家试制和生产了一些工业、国防急需的产品。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从去年三月起，我们先后招收了近六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对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员进行了初步实践。今年计划招收二千五百名学员，目前已招八百多名。

工农兵学员一走进学校，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积极投入教育革命大会战，同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创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还同教师一起制定教学方案，编写新教材，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对于这样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怎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试点班开始，有人认为：“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高，学校用不着再转变学员的思想”；有的教师觉得“自己是再教育对象，没资格转变学员的思想”，因此，个别人想“只讲数理化，不管革命化”。有的学员由于“自来红”的思想也有“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错误观点。我们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了

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结合文化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教业务，不管政治，必然引导学员走向资产阶级道路。原有教师不仅要努力改造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同时还要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工作，大胆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说：“我们参加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要求学员，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把不断提高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坚持学习解放军，经常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工农兵学员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业务教学活动，却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环境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理论水平提高了，联系实际的作风不变；工作能力提高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变。

为了培养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者，理工科大学在业务上必须使工农兵学员能够解决当前生产实际问题，能够担任设计、

科研任务，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员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

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一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其科学内容。被资产阶级专家吹嘘为“千锤百炼，天衣无缝”的《高等数学》，我们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批判它

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和公式。例如，我们从生产实践出发，以微分和积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转化为线索，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积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人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改革教材还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满腔热忱地用心总结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提出新课题，进行新概括。过去，中外的农田水利教材，都把山洪说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张家口地区贫下中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天斗地，对山洪一分为二，创造了引山洪淤灌农田，变洪害为洪利的宝贵经验。教育革命分队的革命师生亲身参加这一斗争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编出《引洪淤灌》新教材。贫下中农说：“从这本书学到了征服洪水的办法，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在实践中边教边改，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不断更新，紧紧跟上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

教改试点刚开始，由于没有破除旧教学方法，有的教师上课“本本不离手，公式不离口，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尽管他们备课很用心，讲课很热心，辅导很耐心，工人学员仍然不称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过去从理论到理论、烦琐庞杂的教学体系，同时又适应了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点。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按照完成不同类型的几个典型任务划分阶段，本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把理论课程有计划地安排在各个阶段内，进行系统学习。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穿插学”和“集中学”等灵活机动的方式。某一时期以完成生产、科研任务为主，有计划地边学边干，典型深入，举一反三；某一时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提高理论水平，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注意加强自学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重视在理论指导下的再实践。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掌握一般规律。事实上每一个典型任务，总是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注意使典型选得恰当，另一方面注意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根据教改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力求按照以下原则选择典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当前我国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

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通过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典型任务，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对那些后续课程用得较多，前面不学后面就不懂的基础课，还要单独设课。

实行这种有步骤地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方法，是解决生产的综合性与教学的分科性、典型任务的局限性与教学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把实践和创造结合起来，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把学文和学工结合起来，做到了少而精，大大精减了课程，缩短了学制。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实践的能力，因此，教员必须向学生进行学习和调查。工农兵学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有锐敏的批判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一经同教学实践接触，便一眼看出封、资、修的余毒和右倾保守、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对学校同社会有着深刻的比较。在比较和鉴别中有力地批判了长期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洋奴爬行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讲课方法，充分发挥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一个试点班在结合某项设备的设计讲“公差配合”课时，教师讲了基本原理后，工人学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当过车工的学员分析了材料和加工条件对公差的影响；当过钳工的学员提出了装配条件对公差的要求，讨论得十分热烈。课堂上不仅讨论清楚了原理，而且对设计方案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新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造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肩上。教育革命是一场硬仗。"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依靠群众　开门招生

同济大学“五·七”公社

1970-08-22　人民日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光辉指示的指引下，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亲切关怀下，去年七月份，我们从工农兵中选拔了二十八名学员，开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工农班。

招生工作，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实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由少数人包办代替？这是招生工作中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招生工作也是这样。旧同济大学招生时，大肆宣扬“牌子”老、教授多、设备全、学校大，是“工程师的摇篮”，“建筑师的苗圃”，用“读书做官论”诱惑学生。今天，我们在招生工作中必须彻底批判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肃清它的余毒；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大造革命舆论，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中招生的重大意义。

我们在川沙县招生时，一开始就向县的领导介绍这次招生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召开了贫下中农和选拔对象的座谈会，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这样做了之后，这个县各级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对招生工作非常重视和支持，他们把选拔学员上大学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作为对全县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机会。贫下中农在忆苦思权会上揭发，过去挑选学生的权，捏在资产阶级手里，大都是地富的子女能上大学，贫下中农子

女上大学的很少；即使贫下中农的子女进了大学，不是被排挤出来，就是由“土”变成“洋”，上了几年学，回来和贫下中农好象隔了一堵墙。

我们在某些工厂招生时，虽然也举办了招生工作人员学习班，也在招生单位作了宣传，因为革命大批判不深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余毒仍然有所反映。有个家长对子女去山区搞教育革命不放心，有的同志就说：“放心好了，一年半很快就会过去，回来就是技术员了。”又如有个学员，原来他想象中的“大学”还是高楼深院，闭门读书，根本没有想到“五·七”公社就办在工地上。当他去报到时，看到教室是个草棚，上课就在工地上，越看越不象“大学的样子”。当时他想：“怎么来到一个工程队报到，是不是跑错了门？”

这些情况说明，如果我们在招生工作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低估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就会给招生工作带来不良后果。

旧招生制度是“高分录取”、“不分阶级”，“一张考卷定终身，工人农民莫进门”。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题、打分、说了算的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废除。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川沙县的招生工作，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贫下中农非常高兴，选拔非常认真。他们说：“我们最了解啥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啥人阶级感情深，路线斗争觉悟高。现在毛主席把选拔学生的权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牢牢掌好这个权。”他们积极热情参加评论，把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推荐出来。在入学时，贫下中农还再三嘱咐他们：“毕业后，不要鸭眼望天不认人，要回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他们牢记一个无产阶级的“权”字，保持一个“土”字。学员入学后，贫下中农仍关心他们的成长，用通信等方式，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这些学员，牢记贫下中农的嘱咐，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革命大批判，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余毒没有肃清，有的同志又很容易走上旧招生制度的老路，不深入基层，不依靠群众，而坐等看材料，在档案、登记表上圈定名单，由少数人包办。因为没有经过群众评论，学员在入学前既未受到教育，群众也很有意见。

实践说明，招生工作必须彻底走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招生工作才能做好，学员的质量才能有可靠的保证。同时，通过群众评论，学员在入学前就会受到一次为革命而学的教育，为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创建新大学，打下较好的思想基础。

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

李志华

1970-09-19　红旗

今年秋季，全国一批高等学校即将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进行新的招生工作。大批工农兵学员将豪迈地跨进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

这次高校招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经过四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摧毁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文化教育部门的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局面。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用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使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带领他们积极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大批知识青年踊跃地走上毛主席所指引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经受了锻炼，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所有这些，都为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个纲领性指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整个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在学校这个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几千年来，学校大门都是朝着剥削阶级开的，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它翻过来了。按照无产阶级的要求进行招生，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招什么人、用什么办法去招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教育路线。

社会主义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控制下的旧大学，不仅千方百计排斥工农子女进大学，而且实行了一套完全

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教育制度，使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没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际知识，脱离劳动人民，结果越读书越蠢。这样搞下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能巩固？革命前辈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怎么能后继有人？

毛主席早就尖锐地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就要求大家都来关心这次招生工作。无论招生单位还是输送单位，都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指示，把招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大事来抓，决不能用单纯业务观点，把它看作仅仅是“学校招几个人，单位派几个人”的事，一定要挑选工农兵中那些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表现好的青年积极分子上大学。从招生单位来说，必须深入工农兵，做过细的工作。输送单位，要正确对待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的利益应当服从全局的利益。那种认为招生是“学校的事，与己无关”的思想，那种马马虎虎送几个人或者搞“留一手”、舍不得送骨干出去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这次高校招生，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招生工作的全过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群众路线，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真正把工农兵和上山下乡以及回乡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推选出来。应当象有些试点单位那样，把招生的过程变成学习、宣传和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过程，变成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总结、大评比的过程。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家长给新学员办学习班、吃忆苦饭、送革命传家宝的动人景象。这样，不仅保证了招生的质

量，而且推进了输送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高潮。在招生过程中，要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毛主席教导我们："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要确立新的招生制度，必须以革命大批判开路，要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资产阶级的招生考试制度，批判旧大学招生中用成名成家做诱饵，甚至抬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做活广告的反动做法，特别要批判"读书做官论"及其翻版"读书无用论"，什么青年上大学是"跳龙门"，什么工厂青年上大学"不合算"，等等，彻底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余毒。

我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青年对高校的招生工作十分关心。当高校招生的消息传到各地以后，他们非常激动，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广大革命青年十分感激党和毛主席对年轻一代的关怀，纷纷要求党和人民根据革命需要来挑选。他们正确地处理劳动、学习与革命的关系，响亮地提出：我们去工厂农村是为了革命，我们上大学也是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和创建社会主义新大学，是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工农兵学员要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坚持不脱离工农兵群众，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中国青年，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多少热血青年为了到毛主席亲手创办的延安抗大去，翻山越岭，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为了什么呢？为了能读上毛主席著作，谋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比比过去，今天我们的条件好得多了。但是，这种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这种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措施。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没有被批准上大学的知

识青年，一定要安下心来，继续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环顾世界，“风景这边独好”。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已经彻底腐朽没落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立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招生，将以它全新的面貌载入革命的史册，并为创建社会主义大学创造良好的开端。只要我们按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去实践，就一定可以把旧大学改造过来，把教育文化战线上的革命进行到底。

改造教育阵地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关于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工农兵讲师团的调查报告

1970-09-22　光明日报

编者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要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教育阵地，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必须把工农兵请进学校来。只有工农兵占领教育阵地，才能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使学校的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香厂路小学工农兵讲师团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

两年来，香厂路小学工农兵讲师团所以能坚持下来，并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学校领导和工厂领导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们抓得紧，抓得细，抓得扎实，使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广大工人群众不但关心生产，也积极关心和支持学校的教育革命，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香厂路小学的实践雄辩地说明，工农兵最懂无产阶级教育。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他们是埋葬封、资、修教育制度，创造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工农兵讲师团，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建立到现在，走过了将近两年的战斗历程。这些来自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战士，遵循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创造了新经验，作出了新贡献。

（一）

香厂路小学的工农兵讲师团，共有三十七人，其中包括三十三位工人师傅（十一个工厂）、两位贫下中农社员和两位解放军战士。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最新指示发表以后，香厂路小学革委会，联系学校实际，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发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批判了“智育第一”，一些教师不愿意讲文化课；批判了“师道尊严”，又有人对学生放任自流；有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新教材，但一些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的教师，在教学中仍然流露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说明，要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教育阵地，必须把工农兵请进学校来。

于是，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全校广大革命师生，到附近的工厂、农村去请兼职教师。广大工人群众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到了咱工人阶级的心坎上。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教育阵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变不变质、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各厂派出的兼职教师大都是工厂的骨干，其中有党支部委员、革委会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这支新型的工农兵兼职教师队伍，怀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肩负着毛主席交给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任务，登上了小学的讲台。广安门火车站的何厚文老师傅，一辈子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深深懂得掌握文权的重要。他一进校门就说：“我活了 60 多岁，头一次进学校。旧社会我们上不起学，是因为我们没有权；今天我们进了学校，是因为我们掌了权。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

（二）

工农兵讲师团，是彻底摧毁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他们开进香厂路小学以后，就像在粘土里掺进了沙子，带来了新鲜的政治空气，使这个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成为香厂路小学兼职教师和专职教师的共同目的。

工农兵讲师团，非常懂得怎样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培养青少年一代。他们强调，每一堂课都要起到转变学生思想的作用。

兼职教师、北京市革制品厂党支部委员牛海师傅和一位专职教师，共同准备语文课《父女同唱东方红》（辽源一老矿工和女儿忆苦思甜的故事）。事先，他们了解到有些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爱"面子"，不愿谈自己的家史。他们认为，这种思想，有可能使一些学生忘本，必须通过教育使他们扭转过来。那天，在专职教师讲了课文以后，牛师傅怀着对万恶旧社会的深仇大恨走上讲台，讲述了自己的苦难家史，讲他从小流浪到北京，在资本家的鞋厂里日夜绱鞋，十几岁时他的手就被绳子拉变了形，并针对学生的活思想，深刻地说明了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牛师傅的讲课，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一个个举起手来，在课堂上一边讲自己的家史，一边高呼"打倒刘少奇！""剥削有罪！罪该万死！"

为了转变学生"浪费点没啥"的错误思想，北京市制本厂的工人师傅，就带学生到厂里参加劳动，了解制本过程，然后请几个工人师傅和他们座谈，讲述做一个本子需要十几道工序，以及工人师傅节约闹革命的生动事迹，从而使学生学得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一个同学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我撕个本子，像压死个蚂蚁那么容易，却不知道这些本子是工人阶级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件事说明自己缺乏工农兵的感情！"

第二，工农兵讲师团坚决落实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伟大指示，使教学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工农兵兼职教师，有丰富的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他们把书本和实践、小课堂和大课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工人师傅结合工厂的斗争实际讲课，贫下中农在田间、地头给学生讲活的农业基础知识课，效果都较好。

制本厂的工人师傅给学生讲《工人阶级忠于毛主席》这一课时，就介绍了厂里的工人同志，怀着对毛主席的一颗忠心，日夜奋战，把印制红宝书封面所需要的电化铝制造出来，粉碎了帝、修、反对我们的封锁。课后，又带学生到厂里参观，给学生讲电化铝的制造过程，大大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增长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真理的理解，更具体、更深刻了。

工农兵兼职教师在教学的全过程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联系实际。有一次，革制品厂张淑惠师傅给高年级一个班级上算术课，出了这样一道题：去年冬天，厂里规定早晨七点半钟上班，某车间因为生炉子，屋子里有烟，到八点才能开始工作。后来，有的工人同志六点半就到车间把炉子生起来，保证了七点半准时开工。这个车间有一百四十四个工人，准时开工后，每天用于生产的时间增加了多少？如果每个劳动日按八小时计算，每天等于增加了多少个工人为国家创造财富？同学们说，做了张师傅这道题，我们学到了工人阶级忠于毛主席的崇高品质。这一课以后，班级里出现了很多好人好事。

第三，工农兵讲师团遵照毛主席关于“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的伟大教导，把对专职教师进行再教育的重担子担了起来。

讲师团认为：转变学生的思想，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专职教师的头脑，帮助他们逐步改造世界观，才能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好。

对专职教师进行再教育，工农兵讲师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举旗把关，狠抓根本。他们和专职教师同学习，同讲用，同批判，同开生活会。他们还经常参加专职教师的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校政治工作会议，制定教学计划，和专职教师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

有一位女教师，几年来一直不安心工作。和她结成了“一对红”的工人师傅，就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伟大教导，批判“教师倒霉论”，对她说：“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关系到中国命运、世界命运的大事，这副担子可不轻啊！要是让私心压弯了腰，担子就挑不起来了。”工人师傅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她进行帮助，使她感动得热泪直流，她说：“工农兵把孩子交给我：对我抱着无限希望，我却天天围绕着个人利益打算盘，不把党的教育事业放在心上，这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认识提高了，她主动到学生家里访问，斗私批修，征求意见，带着学生到工厂、农村搞社会调查，受到群众和学生的欢迎和赞扬。

为了抓教师的活思想，转变教师的世界观，工人师傅就深入到课堂上去听课。师傅们在听课中发现，有一些介绍英雄人物的课文，教师只注意讲生字、生词，没有讲出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来。

工人师傅指出，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些教师的思想感情还是旧的，不能深刻体会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这样，就使教师们懂得了只有自己首先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才能讲好社会主义文化课，要转变学生的思想，首先要转变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条真理。

第四，工农兵讲师团进校以后，建立了工农兵、教师、革命小将三结合备课、讲课的新制度，改变了知识分子独占讲台的现象。

这种三结合备课、讲课，把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发挥了各自的优点，对教育革命是个很大的推动。

不久前，有一个班级的工人师傅、教师和红小兵一起准备张秋菊写的《毛主席救了我》这一课。教师原来打算通过这一课，教育学生进一步明确为革命而学的目的。工人师傅说："我看过关于张秋菊的展览，听过解放军的讲解，这一课要突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害了张秋菊多少年，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救了张秋菊！"后来，教师又重新做了准备，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上好了这堂课，对同学进行了活生生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实践证明：三结合备课、讲课，是工人师傅对教师进行再教育的好办法，是工人阶级对教学领域实行政治思想领导的好形式。

（三）

香厂路小学工农兵讲师团，在将近两年的战斗历程中，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一、如何正确对待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和支持学校的教育革命的矛盾？

香厂路小学的经验是：学校要主动争取工厂领导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为要使工厂领导重视，首先学校领导对这项工作要十分重视。

香厂路小学革委会认为，工农兵讲师团搞得好不好，是直接关系到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这一伟大教导是否真正落实的大问题。校革委会的负责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他们为了争取工厂的支持，多次邀请各工厂革委会负责人来校共同研究教育革命，反复宣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及时汇报兼职教师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为了使工厂的广大工人群众共同关心学校的教育革命，他们还经常组织革命师生带着大字报、表扬信，到各工厂去宣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介绍兼职教师的工作情况。为了使兼职教师更好地领导和参加学校的斗、批、改，革委会定期向他们汇报学校每一阶段的中心工作，和专职教师、学生的思想情况。

在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引下，许多工厂的领导，把教育革命提到了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他们说："毛主席支持，我们就支持"，"搞好教育革命是学校和工厂的共同任务，不分份内份外"。为了使兼职教师能够更好地工作，许多工厂适当地安排了他们在厂内的工作和生产任务，发动全厂工人群众支持他们的工作。北京市第一印刷厂由革委会的一个成员和两个工人师傅，组成了兼职教师小组，每周研究一次教育革命。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支援学校办小工厂，有的工厂把用不着的旧机器送给了学校。

二、兼职教师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怎么办？

香厂路小学的经验是：遵照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伟大教导，对兼职教师加强继续革命的教育。学校革委会多次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和兼职教师共同开展忆、比、想、看的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比新社会的甜，想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关怀，看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忆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刘少奇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巨大变化，想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伟大，看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意义。这一活动，大大提高了兼职教师对于搞好教育革命的责任感，决心完成毛主席交给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工人师傅们说："我们耽误点生产，回去加班加点可以补上，可是培养接班人出了问题，就不是加班能补上的了！"

学校领导还十分注意帮助工人师傅总结经验，解决具体问题。阶级教育课是学生的一门主课，为了上好这门课，学校领导及时帮助工农兵教师总结阶级教育课常讲常新的经验，例如有的师傅结合批判"读书无用论"；给学生讲过去没有文权的苦；结合纪念六一儿童节，组织学生和师傅比童年；结合战备教育，讲帝国

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的师傅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用学生的苦难家史来教育学生。许多师傅的共同体会是：只要抓住了学生的活思想，阶级教育就会常讲常新。

由于不断地加强继续革命的教育，解决具体问题，工农兵讲师团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三、工农兵讲师团开进学校以后，怎样处理好和原有教师的关系？

香厂路小学的经验是：积极开展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断提专职教师接受再教育的自觉性。

在最初一个阶段，有的专职教师每到工人师傅进了学校，就产生了“换班”思想；有个别人甚至出难题，笑话。

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多次举办专职教师学习班，不断提高接受再教育的自觉性。兼职教师也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资产阶级旧习惯势力和资产阶级惠想，突出一个“斗”字。同时，工农兵兼职教师也注意向革命知识分子学习，共同提高。

这样，专职教师接受再教育的自觉性逐步提高。他们和兼职教师结成一对红，积极主动地亮私斗私，争取工人师傅的批评帮助。现在他们感到不和工人师傅一块备课，讲课心中就没有底。他们还积极主动地帮助兼职教师讲课，总结经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为教育革命不断地做出贡献。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彻底批判“知识私有”观

沈阳金属研究所革命大批判小组

1971-03-19　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科技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停止。科学知识、科学技术为“公”还是为“私”，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刘少奇鼓吹的“知识私有”这个反动观点，在科技界里流毒很深。文化大革命前，“知识私有”主要表现为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目前，公开叫嚷“知识私有”，宣扬个人成名成家的人虽然已经不多，然而“知识私有”的余毒尚未肃清。什么“一技之长是看家本领”，“搞科研工作没奔头”，“为本单位争光”等，就是“知识私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表现。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这种思想。

有一些科技人员认为有了“一技之长”，就象“关公耍大刀”，有了看家本领一样。他们不是利用“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作为取得个人名利的资本。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知识、技术，从来都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我们国家里，如果科研工作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走上邪路。刘少奇鼓吹“知识私有”，就是妄图使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我们金属研究所电子显微镜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所走过的道路，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组拥有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可是，文化大革命前，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有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把先进的设备看作是“私有财产”，把掌握的先进的技术视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他们只为自己“写论文”

追求个人名利，对国家和人民急需的科研任务却置之不理。有一个单位从某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一批镀锡铁板，发现镀锡层的表面不正常，怀疑质量有问题，亲自找上门来要求用电子显微镜鉴定出准确数据，以便同对方谈判。对这样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却被某些“专家”、“权威”以“检验工作没水平”，“科研部门应多做‘理论’性的工作”为借口，而拒之门外。

经过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这个小组的革命科技人员把知识、技术献给工农兵，主动为工农兵服务。一次在鉴定一项进口镀锌铁板表面质量的任务中，他们为革命刻苦钻研技术，终于在较短时间内，鉴定出镀锌表面质量不合格的准确结果，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同样的工作，一个为“私”，一个为“公”，立足点不同，态度不同，结果就不同。事实证明：那些把科学知识、技术作为追逐个人名利的资本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非但不能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服务，反而帮了资产阶级的忙，危害了革命事业。知识分子只有一心为革命，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作用。

“搞科研工作没奔头”，“多动手，少动脑”等说法，是新形势下坚持“知识私有”的另一种表现。有这种思想的人，恰恰过去以搞科学研究为荣，把完成科研任务做为攫取个人名利的垫脚石。他们认为科研为个人名利才有“奔头”。今天所谓“没奔头”，只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个人成名成家思想碰了壁而已。过去刘少奇一伙鼓吹有了技术“就有了一切”，是利用“知识私有”观念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今天有的人又散布“没奔头”仍然是维护“知识私有”，阻挡革命的知识分子把知识献给劳动人民，为无产阶级服务。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为一切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科学技术人员充分发挥才智，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广大革命科学技术人员和工农兵肩负着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重任，怎能说“科研没奔头”呢？我们金属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与工人相结合，在

科学研究上突破了某些“专家”、“权威”设置的高温合金领域不可逾越的“禁区”，他们研究、试制成功了多种立足于我国丰富资源的新型高温合金，改造了那些被外国人吹得神乎其神的“最先进”产品，打破了美帝、苏修的技术封锁，为我国金属材料领域填补了空白。我们从来没有感到象今天这样大有作为。事实证明：科技人员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才有广阔的前途。那些至今还有严重的“知识私有”观念的人，如果不加速改造思想，确实对无产阶级毫无用处，到头来只有被人民所抛弃。

“为本单位争光”。这是“知识私有”在新形势下的又一种表现。这种谬论在一部分人中间很有市场。他们往往把本单位局部的利益凌驾于全局的利益之上，把他们掌握的技术，拥有的设备，搞出的科研成果都据为“本单位所有”。在大协作中“抢龙头”，争“成果归属权”，甚至说什么：“科研单位是导演，生产和使用单位是演员”，“发明权应该归科研单位”。这种本位主义即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同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是完全不相容的，它对无产阶级的科技事业起着阻碍作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所广大科技人员，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走出实验室，拜工农兵为师，组成了研究、生产、使用单位的“三结合”小组，进行社会主义大协作。在研究一种国家急需的新型合金钢的扩大实验中，工人师傅带头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研究成功了这种“争气钢”。它取代了某些外国人极力吹嘘的“王牌钢”，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高速度、高质量地发展的新钢种，若不是发挥“三结合”的作用，进行社会主义大协作，单凭科研单位搞“学院式研究”是根本办不到的。实践中，他们深深体会到，知识分子如果不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则将一事无成。

我们批判“知识私有”，并不意味着不要知识，更不是说知识分子无用，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革命知识分子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无产阶级不但需要掌握

知识，而且必须成为知识的主人。我们批判的是那些把“一技之长”作为“看家本领”的个人主义思想。而象白求恩同志那样，把自己的专长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人，则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广大科技人员，只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抛弃“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观点，把知识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能不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人民作出较大的贡献。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批判刘少奇、陆定一反对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行

钟慎

1971-09-01　红旗

当前，教育革命正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通过各种试验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取得的胜利。但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结合斗争实际，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叛徒、内奸陆定一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教育战线的指挥官。他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反对工人阶级对教育的领导，罪行累累，谬论很多。进一步深入批判刘少奇、陆定一的种种谬论和罪行，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任务之一。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抹煞教育的阶级性，使教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根本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超阶级的教育，脱离政治的教育，是根本不存在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思想。毛主席明确地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

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刘少奇、陆定一一伙，完全继承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教育家的衣钵，采用隐蔽狡猾的手法，制造种种谬论，抹煞教育的阶级实质，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这种谬论很多，其中有两个特别带有欺骗性：一个叫作“有教无类”；一个叫作“教育就是传授知识”。

早在三十年代，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就从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无耻地吹捧孔丘的“有教无类”“应该大书特书”。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又不断宣扬“有教无类”的荒谬主张，妄图使学校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特别在一九六四年春，毛主席深刻地揭露和严厉地批判了旧教育制度，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教育必须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后，陆定一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老调重弹，要无产阶级把“有教无类”作为指导教育工作的“方针”，叫嚷什么：“孔子说：‘有教无类’，对不对？我说对，还是‘有教无类’。”①再一次借历史上反动的剥削阶级的亡灵来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刘少奇、陆定一一伙，一方面把“教”说成是单纯的“传授知识”；另一方面把“类”解释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完全抹煞“教”和“类”的阶级性。这纯粹是欺人之谈。

事实上，无论是“教”还是“类”，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任何阶级的教育，都是按照本阶级的世界观和政治路线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根据唯物论的反映论，“教”的内容在实现教育为本阶级政治服务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把工农子女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必须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教育，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如果对工农子女施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教”，他们也会被腐蚀，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甚至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

正是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时的许多罪恶之一。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鼓吹的那种抽象的不为一定阶级政治服务的“教”，今天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教育是为一定阶级政治服务的，因此，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绝不可能有什么教育上的平等，而只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一直被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除了精心培养本阶级的子女外，也让部分工农子女进入学校，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他们，同时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以便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工农青年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青年团的任务》）翻开有文字以来的人类历史，从来都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哪里有什么象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有教无类”呢？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做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主人，彻底打破剥削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无产阶级教育必须保证工农兵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使工农兵成为无产阶级教育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可能实行什么超阶级的所谓“有教无类”。

刘少奇、陆定一一伙那么起劲地鼓吹“有教无类”，其险恶用心是要让资产阶级继续垄断学校，不让工农兵当文化教育的主人。正是在这个极其虚伪的口号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这伙政治骗子及其在学校的代理人，一方面诬蔑工农子女“脑子笨”，把许多工农子女或者关在学校大门之外，或者利用“考试”、“评分”等关卡，把他们赶出学校；另一方面，不问政治表现，把很多资产阶级子女拉入学校，捧为掌上明珠，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们推行的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党和政府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给工农兵优先入学

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工农兵学员源源不断地进入学校。就在这时，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怀着对工农兵的刻骨仇恨，又跳出来疯狂反对党和政府采取的英明措施，恶狠狠地叫嚷什么："上大学就得自己拿钱"，"不来就算了，不怕没人来"。现实的阶级斗争有力地说明，什么超阶级的教育，什么"有教无类"，什么"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统统是骗人的鬼话，都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遮羞布而已。

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为了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高唱"有教无类"的同时，还极力宣扬"教育就是传授知识"的谬论。陆定一喋喋不休地说："教育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叫做传授知识，学习知识，把知识传给别人，把知识学进来。教育就是这么一回事。"②胡诌什么学校就是要培养"有各种知识"的"能手"。这同凯洛夫鼓吹的教育就是"年长的一代"把"经验和知识传授给新一代的工作"③，完全是一路货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无产阶级教育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把培养学生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摆在第一位。这是实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关键问题。抓住了这中心的一环，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造就出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陆定一一伙抽去了无产阶级政治这个灵魂和统帅，把教育说成是单纯的"传授知识"，就是为了取消政治思想教育，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转变学生的思想，反对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教育青年一代，就是要从根本上把无产阶级教育变质成资产阶级教育。

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还侈谈"应该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什么是他们所说的"全面发展"呢？陆定一说："一个是完备的知识，一个是广博的知识，这就是'全面发展'啦。"④请看，左一个"完备的知识"，右一个"广博的知识"，

就是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毛主席教育方针中的“德育”、“社会主义觉悟”这个灵魂，被他们抡起板斧，统统砍去了。“体育”也不要了。“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被他们篡改成“天文知识”、“地理知识”、“数学知识”等单纯智育上的“全面发展”。一个具有强烈党性原则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竟然被他们歪曲为资产阶级的“通才教育”。这是他们为了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玩弄的一个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所谓“教育就是传授知识”，完全是一个幌子，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旧学校总是说，它要培养具备各种知识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青年团的任务》) 他们所谓“知识”，实际上是歪曲客观实际的骗人的假知识，是灌输反动的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工具。刘少奇、陆定一、周扬一伙在“教育就是传授知识”这个谎言掩盖下，大量贩卖封、资、修的黑货，毒害青年的灵魂，极力教唆青年依靠“个人奋斗”，掌握各种知识，成为“宇宙间之伟人”、“一批又一批的灿烂的群星”。

这哪里是什么“传授知识”，这不是要青年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待价而沽，作为升官发财的门径吗？

这哪里是什么“传授知识”，这不是引诱青年爬上特权阶层，当“精神贵族”，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这哪里是什么“传授知识”，这不是公开煽动青年去做资产阶级的野心家，使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吗？

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鼓吹的“教育就是传授知识”的路线，不折不扣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的路线，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毒害下，有的人追求“一本书”，说什么“有了一本看家书，就可以终生受用不尽”；有的人向往“一手好技术”，说什么“这是个胶皮饭碗，掉在地上蹦个高，拣起来还不用哈腰”。结果，学校培养出来的不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

文化的劳动者，而是一心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接班人。这些严重教训，难道不是对“教育就是传授知识”这个骗人货色的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吗？教育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第一位，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必须坚持同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作斗争。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就是装知识，“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想法，正是中了刘少奇、陆定一一伙鼓吹的“教育就是传授知识”的毒害，因而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很危险的。

无产阶级并不一般地笼统地反对传授知识，而只是反对在“传授知识”的幌子下，贩卖封、资、修的黑货，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无产阶级一贯主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向学生传授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因为它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武器。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鼓吹“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的谬论受到批判以后，他们又竭力否定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的必要性，鼓吹“读书无用论”，以极“左”的面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我们决不能上他们的当。立志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青年学生，要下定决心，克服学习上的种种困难，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有用的知识，同时，学习和总结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新经验，更好地学到有用的知识。忽视这一点，同样是错误的。

十分明显，只有彻底批判“有教无类”、“教育就是传授知识”这类修正主义黑货，不断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才能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把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早在一八七五年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就已指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列宁捍卫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他说："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毛主席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五·七指示》中，毛主席又进一步提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马克思、列宁、毛主席这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教育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关系，指明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实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途径。

古今中外的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教育家，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无不反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无产阶级要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然要遇到资产阶级的拚死反抗。刘少奇、陆定一一伙，代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从他们的反革命本性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出发，竭力贩卖唯心论的先验论，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顽固推行"三脱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为了反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陆定一卖力地鼓吹"学校认识规律特殊论"，叫嚷什么："实践——理论——实践，这个公式是就整个人类认识规律来说的，而对学校教育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并且公然抛出一个"理论——实践——理论"⑤的唯心论反动公式，作为学校教育的"认识规律"。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大肆宣扬人的认识先于经验、先于实践，胡诌什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靠"心灵手巧"的中小学生。这伙政治骗子的谬论，归结到一点，就是认为学

生根本不需要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只要“死读书，读死书”，关在学校课堂里“思索”，“一酝酿成熟便会豁然贯通”，“有伟大的发明创造”。所谓“理论——实践——理论”，本质上就是坚持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究竟对学校教育是否有效？这是涉及到两条根本对立的教育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论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离开了实践，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的认识是后天才有的，而决不是先天就有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必经过程，学生的认识过程也不能例外。学生要得到比较完全的知识，必须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学生学的书本知识，假定都是真理，也是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学生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因此，只有实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经过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样反复的过程，才能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真正理解、印证和运用前人总结的理论，使片面的知识变为完全的知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只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实践发展的成果，这些成果是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学生只有反复地参加社会实践，才能不断地产生认识上的飞跃，掌握人类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如果按照陆定一的“理论——实践——理论”，实际是“理论——理论——理论”的所谓认识规律，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那就不可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学到真正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认为关在学校课

堂里“思索”，就能掌握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只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梦呓而已！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实践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唯心论者；然而在一定条件下，理论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机械唯物论者。坚持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我们在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和参加革命实践重要性的同时，坚持学习革命理论有巨大指导作用。

“理论——实践——理论”这个公式的反动实质，就是它既对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又反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

陆定一一伙鼓吹“理论——实践——理论”，完全抽去了理论的阶级性。他们究竟要学生学习什么“理论”呢？他们所极力提倡的旧学校所教的理论，旧学校的书本知识，充斥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充斥着封、资、修的反动理论。他们鼓吹学习这种“理论”，就是要学生学习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即伪科学。陆定一曾提出“唯心主义万岁”这个口号对抗毛主席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指示，完全说明了他所谓的“理论”是什么货色。这种“理论”，不但不能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反，它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来阻止、对抗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这个公式中所谓“实践”的真正含义。因此，这个公式中的第二个“理论”，根本不是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科学理论，而是使歪曲客观实际的反动思想进一步深入学生的头脑，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腐蚀青年，使他们越来越深地受到毒害。

刘少奇、陆定一一伙，曾经极力宣扬“劳动即学习”，把学生单纯当作劳动力使用。他们反对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学生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获得的感性认识需要上升为理性认识，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这种反对

学习革命理论的论调，同反对参加社会实践的论调一样，都是违背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都是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相对立的。

毛主席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学说，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哲学基础。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其险恶用心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反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将三大革命运动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继续保持“旧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使学校变成培养“三脱离”的“精神贵族”，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摇篮”。

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反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更加狡猾的另一个手法，就是抬出资本主义的“双轨制”，大叫要在我国实行“全日制”加“半工半读”的“两种教育制度”，并且把它吹得天花乱坠，妄图以此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

“两种教育制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只要读一读陆定一的两段“奇文”就清楚了。

其一：“两种教育制度，过去叫两条腿。”⑥“封建社会是两条腿走路，……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两条腿走路，一部分人升上去了，当官的当官，当资本家的当资本家；还有一条是为了就业的，读过几年书就就业了，当工人或者农民。……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要两条腿走路。”⑦

其二：“办一些准备让你去调劳动力的职业中学，反正这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你就不要去动我全日制中学，你要动就动这些职业中学好了。”⑧

这两段“奇文”，赤裸裸地暴露了刘少奇、陆定一一伙反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的反动本质。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那就必然是一部分人关在书斋里，“死读书，读死书”，爬上陆定一所精心设计的“小宝塔”的塔尖，成为修正主义者，即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资本家”、“当官的”，为资产阶

级利益服务；一部分人进入他们所谓“为了就业”的学校，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但学生头脑里只有“职业”，变成单纯的“劳动力”，完全抛弃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十分清楚，他们鼓吹的“两种教育制度”，根本不是为了实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是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加剧阶级分化，扩大三大差别，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实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必由之路。同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革命灵魂，阉割了这个革命灵魂，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各级学校开门办学，厂校、社校挂钩，校办工厂、农场，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阶级觉悟、路线觉悟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提高。教育战线上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对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反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推行“三脱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最有力的批判。

教育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在教育战线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一斗争，随着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异常尖锐激烈。

长期以来，刘少奇、陆定一一伙，交替使用各种反革命手法，制造种种反革命谬论，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指示，千方百计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解放初期，毛主席就指示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当时对旧学校进行了一些改革，办了一些抗大式的学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毛主席亲自发动对反动电影《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的批判，在教育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此，刘少奇、陆定一一伙惶恐万状，极端仇恨。他们提出学校应当“基本照旧”，就是说不要触动国民党的教育制度。陆定一竭力为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鸣冤叫屈，甚至疯狂叫嚣：“中国最有文化的是资产阶级，包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坐天下。”⑨公开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霸占教育阵地制造反革命舆论。

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对学校的领导，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天下”，陆定一炮制了发展党员可以“先接收后审查”等反革命谬论，在很短一段时间内，把某些未经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国民党的特务、反共老手，拉入党内，给他们披上红色外衣，安插到教育部门各级领导岗位。他还搬来了凯洛夫的《教育学》，大肆推销“专家治校”、“一长制”，强行规定“校长和党委的意见不一致时，可按行政意见执行”⑩，使他们可以放肆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无产阶级实行残酷的专政。一九五七年教育战线上右派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就是刘少奇、陆定一一伙千方百计反对党的领导，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的大暴露。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的胜利，使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一九五八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

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生长，一些工农党员干部被派到教育战线的各级领导岗位。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领导权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陆定一一伙破坏了。他们一方面拼命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捧上学校领导宝座，另一方面，把一些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他们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或者以“文化低”为借口，或者加以“简单粗暴”等莫须有的罪名，把工农同志赶出学校，竭力使学校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陆定一为了取消党对教育的领导，竟然篡改党的性质，大搞“业务党”。他叫嚷：“党委在学校里边，首先的任务是领导好教学”?，疯狂反对党组织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抓阶级斗争，抓政治思想工作。更为荒唐的是，在他直接控制的“样板”学校里，在党的支委会内不设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竟然设了什么“数学委员”、“语文委员”和“外文委员”，把战斗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蜕变成资产阶级学术俱乐部。陆定一一伙还通过各种条例，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等修正主义黑货更加系统化，妄图让资产阶级永远霸占住教育阵地。

事实证明，解放后十七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教育方面有一些进步。但是，由于刘少奇、陆定一一伙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组织路线，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造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严重局面。

但是，不管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施展多少阴谋诡计，都阻挡不住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光辉指示，宣告了陆定一一伙反对无产阶级对教育工作领导的阴谋彻底破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令指引下，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工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占领了教育阵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充分证明：工人阶级不但能够占领教育阵地，而且能够用毛泽东思想把学校改造过来，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完成毛主席赋予他们的伟大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上的领导权，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党委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狠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狠抓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丢掉根本，就教学抓教学，就业务抓业务，就会越抓越糊涂，就会走上“业务挂帅”、“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老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这种修正主义路线流毒而造成的严重恶果，我们要永远记取。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整个教育战线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教育阵地过去被剥削阶级长期垄断，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资产阶级的偏见和它的传统势力十分顽固。它渗透到各个学科的领域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旧体系。不是有的地方当教育革命深入到教学领域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跳出来叫嚷：“你们占领礼堂，我占领课堂”，妄图同无产阶级再做一番较量吗？事实说明，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结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占领和反占领、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陆定一一类政治骗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基础，即唯心论的先验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

坚决抵制来自右的或“左”的方面的破坏和干扰，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

注：

①⑦ 陆定一：《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

②④ 陆定一：《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会议上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

③ 凯洛夫：《教育学》（新本）

⑤ 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

⑥ 陆定一：《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扩大）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⑧ 陆定一：《在中央文教小组召开的教育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

⑨ 陆定一：在旧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二日）

⑩ 《宣传通讯》（一九五五年第二十三期第十一页）

⑪ 陆定一：《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结束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的深远意义

朱研

1973-08-01　红旗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表了重要的“七·二一”指示，为大学教育革命指明了道路。毛主席指出：“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五年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在“七·二一”指示的指引下，教育革命的形势大大发展了，大学的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一九七〇年开始，大学陆续招生。成千上万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和革命的教师一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今年，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已经或者即将毕业；同时，又将招收更多的工农兵学员到大学里来。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这几年实践，贯彻执行“七·二一”指示已经初见成效，人们对“七·二一”指示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

改革招生制度是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学生从工农兵中来，再回到工农兵中去，为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开辟了道路，对于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新部队，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深远的意义。

大学招收什么人，培养什么人，直接体现了教育的政治方向。招收一批人，会影响到一代人，关系到引导青年走哪条路。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旧的高考制度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重要关卡。表面上叫做“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是为了把广大工农兵及其子女排斥在大学门外。它活象一根指挥棒，驱使青年去走“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的邪路，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精神贵族的阶梯。那样一套高考制度、

一条教育路线，同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而且在这场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红卫兵在广大工农兵支持下，很快造了旧高考制度的反，这决不是偶然的。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发表以后，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兵的愿望。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这是教育史上的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成果。

坚持招生制度的改革，必然要经过反复的斗争。要注意“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按照“七·二一”指示选拔学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政治质量放在首位，充分重视实践经验的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辅之以适当的文化考查，是需要的。但怎样进行文化考查，不只是个方法问题，里面有路线问题。必须划清文化考查同旧的高考的界限。选拔学生主要是看政治条件和实践经验。文化考查也是为了了解推荐对象的实践经验，运用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便更好地从德、智、体诸方面选拔学生，而不是去测验他们死记硬背了多少中学课本的内容。这样做，会进一步鼓励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地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鼓励他们踏踏实实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近几年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选拔唯一看文化，文化完全凭考试，考试又专门考书本，那就很容易把青年引到“闭门读书”，同工农相脱离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们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推荐对象的思想、文化的实际水平，决不能再采用那种森严壁垒、突然袭击式的考法，决不能单凭一纸考卷来衡量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的聪明才智和他们的思想觉悟。十七年旧高考的教训，难道还少吗？过去资产阶级拿它当一个法宝，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抛弃掉呢？古时候考状元，考出几个真有才学的人？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我们只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革旧的考试制度，才能促进教育革命，有利于广大青年的健康成长。

新的招生制度，要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学生，必须紧紧依靠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从封建时代的科举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高考，都是“考官”主事。“考官”的权力，象征着剥削阶级在教育领域的专政。我们把大学招生的权力交给群众，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对教育事业的监督。群众推荐是基本的一环，决不能走过场。谁符合上大学的条件，谁不符合，群众最了解；谁应当推荐，谁不应当推荐，群众最有发言权。背着群众，少数人说了算的做法，是错误的。广大工农群众怀着革命的责任感，认真做好评议推荐，既能按照党的政策挑选出优秀青年上大学，又能对青年进行一次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使被推荐的和没被推荐的青年都更加明确方向，焕发精神，沿着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向前。

在大学招生的过程中，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决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那种利用职权“走后门”的做法，是资产阶级特权思想的反映。它损害党的优良传统，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同无产阶级的党性不相容的。毛主席教导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职位和权力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丝毫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许多老干部，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定不移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今天我们应该用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自己的下一代。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安排自己的子弟上大学，实际上还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在作祟，把上大学当作脱离劳动、做官享福的阶梯，这对教育革命是一种干扰，对下一代是一种腐蚀，貌似爱之，实则害之。广大群众积极执行和维护党的政策，抵制和批判了这种不正之风，这是爱护党、爱护干部、爱护青年的表现。这种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是极可宝贵的。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就要发扬这种精神。革命的

同志，都要以大局为重，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对于一切不符合党的原则的思想行为，都要保持距离，划清界限，坚决斗争。

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已经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推动了整个大学教育的革命，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向上。新的大学生在工厂、农村参加过几年生产劳动，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是大有好处的。其首要意义，还不在于为学习专业准备了一定的实际知识，而在于通过学习社会、学习工农，提高了觉悟，充实了头脑，逐步懂得了青年人成长的方向。在二十上下的年纪，由工人、贫下中农给他们的思想打上烙印，这对他们世界观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上大学，是靠阶级的培养，受阶级的委托。这样，就为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人学习的问题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基础。他们毕业后，绝大多数人牢记着"工农兵需要我们"，朝气蓬勃地回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仍然和群众打成一片。工农兵称赞这样的大学生是"面向着我们，而不是背朝着我们"。比一比旧大学，引导青年脱离工农，甚至有的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变得同工农兵格格不入，这两种景象，不是发人深省的吗？毛主席历来强调："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工农兵欢迎新型的大学生，证明毛主席指出的教育革命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工农兵学员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来，再回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和过去相比，大学的教育对象不同了，培养目标不同了，这就促使大学的教学必须来一个根本的改革。工农兵学员进校后，推动着教育革命的不断发展，越来越深刻地触动教学方针、内容、方法以至教师队伍等各个方面。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是要贯彻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实行"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恶习。许多教师体会到，工农兵学员的学习路子往往和旧教学方法所

要求的不同。因为工农兵学员接触过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他们要求从实际出发，采取启发式教学。这样，教学中一些陈年老规矩就不能照样下去。近两三年来，革命师生共同研究，大胆改革，开始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主要是下功夫引导学员在实践基础上向理论方面学习，学了理论能够应用，“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在革命教师的帮助下，充分发挥学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组织和引导他们自学，使他们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事实证明，凡是朝这个方向改革得比较好的，学制就能够缩短，课程就能够精简，质量就能够提高，效果就比较明显。

有的人对工农兵上大学，头脑里总有个问号，怀疑的焦点是教学质量，特别是知识质量。这些同志的观点、方法不对头，他们是用旧观念思考新变革，用旧尺子衡量新事物，所以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我们不能离开路线来讨论教学质量问题。看质量，首先要看政治方向，学的东西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就从文化方面来讲，究竟什么叫知识？怎样来分知识的高、低、深、浅？这些问题也只有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才能正确回答。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宣布：“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旧教育制度把学生关在学校里，许多人十几年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成年累月地背条条，越读越蠢，遇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问题，就暴露出他们的浅薄、无知，这能谈得上什么“理论深度”呢？我们不能培养书呆子，而要培养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实际作用的人材。学生在学校里学几年，不是要他们把一辈子用得到的知识都装到肚子里带回去，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培养运用这些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提高。现在的工农兵学员比较重视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从丰富的源泉中吸取营养，每到一地能较快地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向广大群众学习，学到的书本知识能够运用，许多人回到工作

岗位上去，已经做出了不少可喜的成绩。这就证明，他们的知识不是浅了，而是深了。当然，高、低、深、浅总是相对的。并不是说我们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也不是说我们的教学质量就到此为止、再也不发展了。我们的教育革命正在向前发展，我们的教师队伍正在随着这场伟大革命的深入而得到改造和提高，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材正在不断地完善起来，我们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规律性的认识正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因而，我们的教学质量也必将不断地得到提高。

贯彻执行“七·二一”指示，工农兵上大学，不仅在学校中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且在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震动。这是大好事。因为，震动，从根本上讲，是震动了资产阶级，震动了旧的习惯势力。它表明我们没有因袭剥削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而是在改革，在革命。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事业，正是“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革命的同志切勿自觉不自觉地让传统观念支配了自己，而应当迈开双脚去做点调查研究，问一问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听一听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的声音，呼吸呼吸教育革命的新鲜空气，这样就会头脑清醒，信心倍增。同时也要看到，在我国教育领域里，剥削阶级搞了几千年，修正主义搞了十七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从根本上进行革命还刚刚开始；资产阶级的影响是相当顽固的，两个阶级的较量仍然是激烈的、长期的。弄得不好，复辟的可能是随时存在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会借我们不断完善新生事物的过程，偷偷地搬出旧的一套来“纠正”新的制度，把人们引到老路上去。我们决不能对这个领域的斗争掉以轻心，而必须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坚持斗争的哲学，继续向旧制度、旧观念开战，热情地扶植和发展革命新事物，大家都来做教育革命的促进派。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上层建筑。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在实践中加深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理解。无产阶

级教育革命还在试验的过程中，还有大量新问题要我们去研究。我们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有决定意义的是，这场革命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为指导，方向是正确的。只要坚持革命，大胆进行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奋斗，我们的工作就会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教育水平也会一年比一年更高，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改革招生制度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谈张铁生同志的“答卷”

上海师范大学　葛明文

1973-09-22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发表了张铁生同志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议论。不同的人对张铁生同志在这份“答卷”里提出的问题，又都交了不同的“答卷”。

大学招收什么学员，是关系到培养哪一个阶级的接班人，引导青年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因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不是什么具体的方法，而是体现着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从历史上看，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考试制度；在社会主义时期，不同的路线决定了不同的招生考试办法。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实行科举取士。那时，谁能滚瓜烂熟地背诵孔孟那一套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四书”、“五经”，作一篇“代圣人立言”的刻板的八股文，谁就能“禄在其中”，去做官了。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凡是通过层层考试中了状元的，一般都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这样的考试制度，只能够为封建统治者物色愚忠愚孝的官僚和鹰犬，驱使青年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所以，封建王朝换了一代又一代，而科举考试制度却一直实行到清朝末年。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推行诸如“证书考试”、“学位考试”之类的考试制度，鼓吹“靠文凭吃饭”，把青年训练成资本家的代理人和代言人。总之，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考试制度。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了考试制度的阶级内容。那套万变不离其宗的旧的考试制度，是剥削阶级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重要的社会支柱之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着的。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妄图继续霸占这块世袭领地，竭力维护旧的一套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刘少奇一伙正是这样干的。他们打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破旗，实施按高分“择优录取”的手法，其目的是培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精神贵族，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社会基础。这种“一张考卷定终身”的考试制度，用分数线把广大工农子女封锁在学校大门之外。这是在教育领域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文化专政的一种表现，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工农兵的反对。

无产阶级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这为大学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这一指示奠定了无产阶级大学招生制度的基石，堵塞了剥削阶级通过考试垄断教育的道路。经过几年的实践，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兵的愿望。这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根除剥削阶级几千年来在考试制度方面的影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正当我们注意在招生工作中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充分重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辅以适当的文化考查的时候，一些陈旧、腐朽的东西，又企图在文化考查的新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说什么“在推荐的基础上，最终由文化考查的成绩来决定录取与否”，就是一例。正是在这个时候，张铁生同志写了“一份答卷”，从大学招生考试这一个角度，提出了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办好社会主义大学，是为培养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创造条件的。应当按照什么标准，选拔什么样的人进大学，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呢？

毛主席早就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

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我们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大学生，就必须从广大知识青年中挑选那些真正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工农打成一片的优秀青年。他们之中，有的被工人、贫下中农称为“红色的好管家”；有的被称为工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象这样既富有远大革命理想、又扎实苦干的革命青年，如果进入大学，对于改变旧大学“三脱离”的状况，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该有多大的意义啊！与此相反，有一些人到了工农中间，也能参加一些劳动，做一些工作，但他们并没有长期打算，和工农还有距离。如果因循旧考试方法，让这些人大批进入大学，再从学校和社会上接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他们会被培养成为什么样的接班人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我们主张的文化考查，就是要了解被推荐对象的实践经验，了解他们运用基础文化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他们在学校和劳动锻炼期间掌握了哪些比较完全的知识。我们的大学生，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是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而不是那种在书本上讨生活、在概念上兜圈子的“儒生”、“院士”。因此，实践经验是入大学学习的必要基础。象张铁生同志那样的广大知识青年，他们在农村种田、养猪、兴修水利等等，都有十分宝贵的实际知识，这对于他们进一步掌握有关的专门知识，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条件；就是学习其它专业，也同样是有益的。人们的知识、才能，是在各种实践中累积起来的。那种以为记得书本知识就是“基础”好的看法，是旧的传统偏见。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书本知识。我们提倡书本知识应同实践经验互相结合起来。因此，对于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努力给他们创造学习条件，提供精神食粮，鼓励他们结合实际搞好自学，走又红又专的

道路。那种认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不要文化基础知识的说法，是一种恶意的歪曲。

那么，文化考查应该如何进行呢？这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实践，需要我们用力去做。

是少数人说了算，还是由工人、贫下中农把关，这是两种招生考试路线的一个根本区别。要从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必须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有人说，群众把政治关，考试把文化关，在推荐基础上凭分数录取。这种把政治和业务截然分开，最后靠分数把关的做法，实质上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谬论的变种。难道工农群众只能把政治关，不能把文化关吗？广大知识青年学习、战斗、生活在工农群众之中，他们政治觉悟的高低，实践经验的多寡，能力的强弱，文化基础的好坏，工农群众（包括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本身在内）是最了解的。保证政治质量，固然要由群众推荐，反复比较；就是进行文化考查，也要把权力交给群众，让群众审查、评议。几年来，不少地方在对被推荐对象进行文化考查时，有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实行干部、工农群众代表、学校招生人员几方面的结合，对报考对象进行全面考查，以政治统帅业务，政治和业务统一，向社会主义大学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

几年来，在群众中也正在试验一些新的考核办法。比如有的单位用座谈会的形式进行考查，在会上由选拔对象汇报自己的成长过程，由“三结合”文化考查小组成员询问选拔对象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认识，由老农或老工人和选拔对象共同研究工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由选拔对象讨论运用数理化有关基础知识解决工农业生产问题等。会上，可以翻书查资料，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插话，选拔对象之间也可提问；同时，鼓励选拔对象发表各种创造性的见解。不少青年穿着工作服，从生产现场赶到文化考查的会场，完了之后，有的又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上班了。这种办法固然不能说已是尽善尽美，但考场气氛活跃，考生心情舒

畅，对于了解选拔对象的实际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特别是许多青年在这种考查面前，丝毫没有旧学校学生那种把分数当作命根子的庸俗气息，成了考场的主人。

尽管改革文化考查方法的经验还不多，但是事实证明，新路子越走越宽广。

巩固和发展大学教育革命的成果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1974-01-01　红旗

我国各族人民满怀革命豪情，迎接一九七四年的到来。放眼祖国，到处是一派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兴旺景象。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形势大好。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大学教育阵地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领导斗批改，成千上万的工农兵上大学，一批工农兵教师登上大学讲台，这样，就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为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从根本上改造大学教育阵地创造了条件。几年来，北大、清华两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真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决走《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的光辉道路，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开门办学。文科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各系科在缩短学制、精简课程、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正在积极进行试验，不断取得新的经验。广大工农兵学生同革命教师一起，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一代新型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正在茁壮成长。大学教育阵地的这场深刻变革，虽然开始只有几年，但已显示出无产阶级教育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大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教育阵地处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之下，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现象十分严重。那时的北大和清华，封、资、修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曾多次对旧的教育进行了冲击，但是攻也攻不动，包括一九五八年那样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也被扼杀了。一九六六

年，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毛主席的伟大号令下，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和它的可靠同盟军贫下中农，配合解放军战士，开进了学校，冲破了剥削阶级对学校的统治，开始了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教育阵地的历史新时期。这个革命的行动，是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潮流，是防止出修正主义、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措施。

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学校，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顽强反抗。当前，随着教育革命的不断深入，资产阶级又拿起"业务"这个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有人散布什么"斗批改进入了业务领域，不通晓业务就没有领导权"的谬论，妄图排挤、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对抗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业务工作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思想所指导，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业务领域"是不存在的。学校的斗批改是一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几年来，我们围绕着教育方针、办学道路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在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难道仅仅是什么"业务领域"的问题吗？毛主席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离开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指导而"进入业务领域"，就是取消党的基本路线，就很可能会进入修正主义的"领域"。学校从来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阶级斗争的阵地。办好教育，关键在于方向路线正确与否。而这些事关大局的问题，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正确解决。文化大革命前后教育阵地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这一伟大真理。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形势，就不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的政治方向和办学道路，使学校成为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阵地。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教育制度，存在着两个颠倒的现象：一个是阶级路线的颠倒。工农群众创造了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但大批工农及其子女却被拒之于学校的大门之外。另一个是认识路线的颠倒。人的知识、才能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旧学校却按照唯心论的先验论，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进行教学，使学生越学越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这条办学道路的反马克思主义、排斥工农兵、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实质。一九六八年，毛主席指出："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样，就把被封资修旧教育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了。毛主席在《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中所指出的道路，是堵塞资产阶级通过大学这个渠道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是同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一类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道路；是彻底破除"三脱离"的旧教育制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结合起来，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

坚持《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的道路，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对于这场革命，资产阶级极其恐惧和仇视，而一些受旧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则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有些人挖空心思在所谓"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说什么"现在培养的不算真正的大学生"，蓄意贬低工农兵学生。他们在所谓"提高教育质量"的借口下，搬出一套所谓"老经验"，要搞什么"正规化"。他们的所谓"经验"，其实是旧教学方法的翻版；所谓"正规"，其实是旧教育制度的陈规；所谓"提高"，不过是向资产阶级的老路倒退罢了。无产阶级是决不能照这一套办事的。社会主义大学固然要使学生受到各种专业教育，但首要的是让学生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使他们在学校期间就成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这一伟大斗争的参加者，并在斗争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把他们培养造就成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讲质量，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看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就是从业务情况来看，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在学习期间又坚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这就有利于学生掌握比较全面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看方向、路线，不看学生的政治觉悟，离开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只看死读硬记了多少本本和条条，这是资产阶级的质量观。

广大工农兵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健康成长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资产阶级质量观。几年来，北大、清华的工农兵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立场坚定，冲锋在前，敢于反潮流，成为无产阶级改造大学的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开始改变了过去学文学的不会为工农兵写小说的状况，通过下厂下乡，深入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与有关单位共同创作并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和小说作品。学习电子计算机的工农兵学生，不再象旧大学那样，只能从本本上学原理。他们参加了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的试制，有的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改进意见。最近，两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在校内外参加各种科研项目和实际战斗任务，普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清华大学电力系锅炉专业十五名学生，设计改建某电厂油炉，在设计中处处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反复试验，上马不到一个月就突破了原来由教师作的设计方案，缩小炉膛体积三分之一，节省了材料。这项设计任务的难度和所达到的水平，都超过该专业文化大革命前六年制学生的毕业设计。北大化学系石油化学专业和高分子化学专业，不久前向燃化部提交了十份学术报告，都是学生参加科研的成果。有些项目，如从渣油中直接制取苯酐，在全国专业会议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他们赞扬工农兵学生在学习期间就为社会

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显示出一代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要培养的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的“三脱离”的大学生根本不能相比的。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已经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可以相信，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的教育质量必将有更大的提高。前景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刻触及了广大教师的灵魂，有力地推动了他们世界观的改造。几年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广大教师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反对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罪行，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两校已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教师到工厂、农村参加了一年左右的劳动锻炼。大多数教师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路线觉悟有了较大提高，在教学、科研和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也刻苦改造和磨练自己，在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中焕发了革命青春。清华大学水利系有位教授，研究了三十年的泥沙，过去只在玻璃槽里找论文数据，对我国最大的泥沙河流——黄河却望而生畏，成效甚少。文化大革命后，他决心改造世界观，背起行装，沿着黄河步行踏勘五千余里，跨越五省五十一个县市，与老船工同坐一条船，同睡一张铺，同拉一副纤。经过这样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和同志们一起为治理黄河泥沙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共同编写了一本理论与实际结合较好的新教材。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鼓舞他决心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教师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会有反复的。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仍然占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个估计是根据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实际表现，进行阶级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承认不承认这个估计，实质上是承

认不承认教育阵地上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坚持还是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有的人不肯正视自己世界观上的问题，不去主动改造自己，这是不对的。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社会实践是检验世界观的标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工人阶级领导学校、走《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的道路采取什么态度，是对一个人世界观的最好鉴别。许多同志正是在这些斗争风浪中自觉改造自己，取得了很大进步。如果不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认真改造思想，却硬说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没有问题了，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吗？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有人鼓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要"团结百分之百"。结果怎么样呢？害得许多人放松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无限膨胀，而有的右派分子却得到纵容、包庇。这种历史教训，决不应当忘记。党的十大指出，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全面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就必须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分析研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严格区分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反动的思潮，要敢于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对于世界观、教育观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要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实践中逐步解决。这样，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中来。

几年来教育战线的巨大变革，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坚决拥护和热烈欢呼这场伟大的革命，积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则颂古非今，颂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之古，非文化大革命后教育阵地深刻变革之今。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摇头派。近几年来，教育战线上围绕着如何对待工人阶级领导、《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的道路，如何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

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教育要不要革命等问题展开的尖锐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每一次大的革命之后，人们不仅有一个理解和消化的过程，而且必然伴随着一场肯定还是否定这场革命的斗争。可以预见，随着这场斗争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将展示得越加明显，大学教育必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革，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必将在斗争中完善和巩固起来，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必将在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起来。我国教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和灿烂前景，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腐朽不堪的教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们那里，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在试图“改革”教育，但是，任何灵丹妙药都无补于反动社会制度的必然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实行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学校才能获得新生，教育事业才大有希望。

斗则进，不斗则退；斗则胜，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这是一条普遍的经验。我们要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继续发扬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领域时那种反潮流的英雄气概和调查研究、谦虚谨慎的革命作风，放手发动广大工农兵学生和革命教职员工，经常运用“四大”武器，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秦怀文

1974-01-05　教育革命通讯

一

当前，教育战线形势很好，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批林整风不断深入。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发展壮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革命接班人茁壮成长。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在大好形势下，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尖锐、激烈的。当前教育革命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指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教育，经过党的十大精神的学习，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认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但是，现在看来，有的人，包括有的干部，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是没有过。个别的则自始至终都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时刻刻都在伺机反攻倒算，在一定气候下，他们就大刮翻案风。这种人怀着深仇大恨，用《"571工程"纪要》和胡风黑信一样的语言，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把

这些阴暗角落里的东西清扫出来，是一件大好事。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一次很好的反面教育，可以帮助他们从活生生的现实中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阶级敌人的顽固性。对那些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也可以迫使他们想一想：如不迅速改变错误立场，就会同什么样的人走到一个队伍里去。

有的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害得好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的是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烧的是修正主义；坚持搞修正主义，“害”得好苦，理所当然。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他们不“苦”，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就要重受二遍苦，这难道是能够容忍的吗？谁要继续坚持修正主义，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可以断定，他们的前景决不会美妙的。

有的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不是有所得，而是有所失”，“后遗症很大”。对于这种攻击，人们并不陌生。1957 年我们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不就有人叫喊什么“有后遗症”吗？彭德怀反党，攻击大跃进，不也是诬蔑说：“后遗症太大”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根本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就是妄图实现历史的大倒退。跟他们唱一个调子，难道不觉得危险吗？

有的人，怀念十七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他们叫嚷什么：“为工农兵学员服务，地富子弟怎么办？”怨恨“书香子弟上不了大学”。我们绝不要书生气十足，以为他们讲的是关于剥削阶级子女、知识分子子女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党对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是十分明确的。至于知识分子子女，应当同工农子女一样上山下乡，劳动锻炼，表现好的，一样选送上大学。他们是不了解这些吗？不是。有的人就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仇视工农兵上大学，妄想让剥削阶级及其子女重新垄断学校。

还有的人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经验骂成是“白开水一杯”，甚至恶毒咒骂是“害死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否定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现阶段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向我们反攻倒算的集中表现。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难怪批林整风搞了两年多，有的人不愿意批林贼的极右，偏要批极“左”，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或者不肯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其中，有的是顽固地把自己所喜欢、所习惯的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当作真理，力图使旧事物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有的则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他们是借批极“左”来批文化大革命，借否定新事物来恢复旧制度。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是对一个人阶级性和党性的检验，是判断左、中、右的重要标准。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反动谬论，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和批判。持这种论调的人必须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世界观决裂，否则，无产阶级就要同他们决裂。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的深刻性、彻底性，决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围绕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十分激烈的。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不难，在革命高潮中，各种各样的人都被潮流卷进来了。但是要真正认识这场大革命却很不容易，要在革命中正确地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就更不容易。列宁曾经说过，在一场大革命之后，人们总要做种种工作，“好‘消化’那些极其丰富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列宁选集》第 2 卷 401 页）文化大革命的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是人们继续革命必须经常温习、反复消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当前正是消化、理解这些经验教训，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有利时机，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去完成党的十大提出的继续抓好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战斗任务。

二

当前揭露出来的许多事实，使我们再一次看到，资产阶级拿起了所谓“业务”的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

有人说，“斗、批、改进入业务领域了，不懂业务就没有实际的领导权”，“我同不懂业务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这种谬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原理完全对立。斗、批、改是一场阶级斗争，怎么会变成纯业务问题了呢？难道无产阶级同你们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加强还是取消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上，在坚持还是反对“七·二一”道路等问题上的尖锐斗争是什么“业务领域”的问题吗？说穿了，你们所谓的“业务领域”，就是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不要工人阶级掺砂子，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的领域，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领域，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领域。

文化大革命以前，修正主义“业务党”的谬论，在学校中的流毒是非常之深的。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整党运动中，广大党员和非党员对修正主义“业务党”的谬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两年“业务党”的幽灵在有些人身上又还魂了，汇成一股逆流，潮水般地向无产阶级涌来，首先冲击的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面对这股逆风恶浪，我们必须硬着头皮顶住。事实说明，同这种势力作斗争，比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还要难得多，因为它不仅存在于党外，更危险的是存在于党内，存在于某些党员干部身上。有的地方不抓大事，教育革命推不动，原因就在于此。

有人说，“抓大事是说空话，板着面孔训人”。把无产阶级政治叫作“说空话”，这是“三家村”的黑话。无产阶级政治，非讲不可，而且要天天讲、月月讲，不讲就是失职。对于向工人阶级挑战进攻的人，我们何止是“板着面孔”，在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中，我们从来是铁面无私！否则，就是丧失了斗争的原则性。

有人说，“外行领导内行，理论上好解决，实践上不好解决。”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在我们这里，理论上、实践上都好解决。在你们那里，理论上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实践上就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也是解决了的。两家都解决了，不要混淆视听。不过补充一点，想让工人阶级放弃领导，绝对办不到。

有的人以“业务”为资本，摆出一付身价百倍的姿态，说什么，“要我当干部，就得照我那一套办。”似乎无产阶级就缺他那么个宝贝似的。你那一套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工农兵就是不买你的账。

那些大吹大擂“业务实力”的人，那些自命为“内行”、“专家”而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人，是否有真才实学呢？不见得。别看他关在屋子里头象个霸王，一到实践之中，尾巴就露出来了。即使有的人真懂得那么一点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门、两门而已，就是在一门专业里，也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有的人企图用那点知识，学着孔老二“待价而沽”，在工农兵面前逞威风，把自己标榜成“万能”、“权威”，想把什么都统起来。全国千门万门、千行万行，你那一门就能统得起来吗？但工人阶级有一门，就是无产阶级政治，它就能管千门万门，千行万行。毛主席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就是你有点真才实学，如果不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服务，那就要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超阶级超政治的业务是没有的。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努力用自己的业务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那些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人，用业务为资本，向无产阶级讨价还价，以为离了他们，无产阶级教育就办不下去，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照样前进，而且会干得更好。

三

解放后十七年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

套。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两个估计”，是根据党的基本路线，对十七年教育阵地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知识分子在路线斗争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从文教阵地开刀，工人阶级所以开进学校的重要依据；是制定教育革命一系列方针、措施的重要前提。否认这“两个估计”，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从根本上取消教育革命。几年来，广大干部和教师从这“两个估计”出发，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经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断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但是某些知识分子却把这“两个估计”当成一块心病，他们处心积虑地加以反对，一有风波，就妄图加以否定。因此在教育阵地上讲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决不能回避“两个估计”的问题。

有的人说，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也要“一分为二”。好一个诡辩学家！竟想用“有功有过”、“有成绩有错误”来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一分为二，首先要分清“延安”与“西安”。是“延安”才谈得上“成绩与错误”的两分法。如果把这种两分法用到“西安”头上，那不是搞“延安”与“西安”的“合二而一”？十七年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旧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次抵制和斗争，教育方面，也有一些进步。这种进步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力图加以破坏和扼杀的，今天怎么可以反过来把它记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成绩簿”上？至于真正用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么，它是真老虎，吃人害人，又是纸老虎，一戳就穿；它盘根错节，又倾刻瓦解；对它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要不断肃清它的流毒。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有的人说："我们大多数都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这种人以为给自己贴上个标签，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恩格斯说："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马恩选集》第 1 卷 579 页）判断一个人的世界观，就是要从实践斗争中去看。看你对待文化大革命、对批林整风、对工人阶级领导、对"七·二一"指示、对《五·七指示》、对教育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等等一系列问题，采取什么态度。一句话，看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采取什么态度。这些正是对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最好鉴别。我们有相当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经受了考验的，是有很大进步的，而且这个队伍在不断扩大。在实际斗争中去改造、去锻炼、去检验，岂不比争一个标签重要多少倍吗？贴一个标签有什么用呢？贴上去了，风一来会刮掉，雨一来会淋掉，说明不了本质问题。那些争着贴标签的人，应当好好学习恩格斯的这段教导。

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形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有的人一听到讲改造世界观就嘟嘟囔囔，大发牢骚。似乎无产阶级世界观可以靠发牢骚"发"来，向无产阶级进攻"攻"来，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实践表明，越是发牢骚，越是攻得厉害的人，恰恰暴露了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自己把自己放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有个别知识分子党员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怎么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种不顾起码的常识而提出的如此尖锐的问题，很值得注意。在这里，要特别警惕有的人由于不承认自己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却别有用心地把我们党的整个队伍都说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企图用个别性的前提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对于每个党员的世界观状况，要作具体的分析。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人贵有自知之明"，每个党员都应当经常严格解剖自己。有的党员不正视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不去改造它，还不许人家讲它，请问这是按“五十字大纲”办事吗？这是按党章办事吗？这是搞马克思主义吗？

四

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有人就说：“这是矛头向下，整群众”。他们以为这么一嚷嚷就抓住什么“理由”了，其实，连一根稻草也捞不到。毛主席早就说过：“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难道只许他们放毒，不许无产阶级反击吗？任何想封住无产阶级的嘴巴，捆住无产阶级手脚的企图都是办不到的。他们这样进攻，我们不斗争，广大革命群众能答应吗？在那些右倾翻案势力猖狂活动的地方，好人受气，好人受压，这一切都表明，恰恰是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广大革命群众。我们坚决地进行批判斗争，正是保护和发扬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有一些同志，跟着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同那种肆意放毒、恶毒攻击的人是两回事，但也应该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尤其是共产党员。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写进党章的，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难道可以有这样的共产党员：自己有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别人批评他，就说人家“整群众”？

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有人又说：“这是整干部”。这种恶意的挑拨，是不能得逞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干部，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绝大多数是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积极投入当前的斗争，奋战在最前线上。但也有少数干部，又犯了文化大革命前犯过的错误，错上加错。这些人有的是没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有的则暴露了他们自始至终是站在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检讨，但事隔几年，他们对待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对待党和毛主席的态度，又完全同文化大革命前一样了。对于这种人，只能说明他们当时在革命群众面前的检查，流下的

几滴眼泪，是何等的虚伪。只能证明他们根本没有转变立场，没有触动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而是迫于形势，用两面派的手法，蒙混过关，革命的高潮刚刚一过，就又原形毕露了。这样的人在广大干部、包括那些犯过错误但是愿意认真改正错误的干部中，也是十分孤立的。他们打算怎么办？请他们自己回答。反正，想造出一股“整干部”的舆论，来为他们一小撮人打掩护，是办不到的。

至于有的干部这几年有些反复，走点老路，是难免的，因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是要有个长过程的。我们允许这种反复，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他们克服这种反复和动摇，继续前进。但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是不允许的。

教育阵地的深刻变革，必然要引起知识分子队伍在政治上的不断变化。几年来，知识分子队伍中涌现了一大批革命的左派，同时也暴露了一小撮右派，这是客观存在，是正常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左派不是自封的，右派也不是人们强加给他的。都是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给自己写上一个字，或者是一个左字，或者是一个右字，或者是一个中字。大家知道，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只有一样，就是尾巴变不了，不免要暴露，有什么办法呢？变不了就不要藏，割掉就是了，这才是好办法。我们对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应该注意阶级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我们相信，在党的十大精神的指引下，在深入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教育战线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教育革命的滚滚洪流将更加波澜壮阔，奔腾向前！

评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英雄——切什科夫

刘青锋

1974-03　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近年来，德伏列茨基的话剧《外来的人》，轰动了苏修的戏剧舞台和整个文坛。苏修的一些主要报刊《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文学报》，以及《戏剧》、《文学问题》等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吹嘘这个剧本是“苏联好久没有上演过”的好戏，剧本主人公切什科夫的出现是“时代的命令”，切什科夫是所谓“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的“旗帜”，是“戏剧在塑造当代英雄的高大形象道路上的一个有意义的预兆”；声称要通过《外来的人》及其所描绘的主人公体现出来的“当代苏维埃英雄主义”去“喂养人民”，“对读者施加不可抗拒的影响”。在一支乱哄哄的啦啦队中，不仅有苏修文艺界的头目马尔科夫之流，群起鼓噪，争相喝采，而且有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工业巨擘和托拉斯寡头，引颈举臂，大声叫好。真是一片喧嚣，好不热闹！

为什么勃列日涅夫“修”字号店铺的老板和伙计们对一个无名作家写的一个蹩脚话剧要如此不惜血本地狂热吹捧、高声叫卖呢？他们到底有什么货色呢？对此，我们有必要鉴别清楚。

一、什么“时代的命令”

为了说明苏联社会已到了勃列日涅夫一再宣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时代”，剧作者突出地强调了二十六号车间是从一个“低矮的、熏的黑黑的、规模不大”的工棚式的车间变为一个“拥有六座现代化厂房”的联合企业，是“建筑与铸造的奇迹”。在这个“新时代”，由于发生了所谓的“科学技术革命”同“经营方式的复杂结合”过程，象原车间主人格拉莫特金这样的“经验丰富的”、“有功的人”

就不能再胜任领导生产的重任。剧本写道，格拉莫特金“过去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而现在“忙的团团转”、“竭尽全力”，搞了“整整三年”，却“多少年来就没有利润”。在上级的威逼下，他开枪自杀未遂住进医院。这时，涅列日的老板们便从季赫文市请来了受过“高等教育”、“从27岁起就成为颇受经理尝识”的“最年轻的车间主任”切什科夫。格拉莫特金这个“善良的”老混蛋搞不出利润来，就得滚开；切什科夫能做到使“车间盈利”就要请来。这在苏修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唯利是图的老板看来，就是象3+2=5一样简单的“真理”。

问题十分清楚，剧作者强调二十六号车间科学技术和生产的现代化，就是妄图用所谓技术“进步”和科学“文明”的表面变化来掩盖苏联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本质的变化。列宁格勒涅列日某工厂二十六号大型铸造车间，就是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企业。

为了强调在二十六号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中必须由切什科夫这样的新型企业主取代格拉莫特金、波鲁埃克托夫之流的旧企业主，剧作者引人注目地把切什科夫所代表“以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为目标的先进的现代的领导方法”同以格拉莫特金、波鲁埃克托夫为代表的“传统秩序”和“过时的领导”方法的“尖锐冲突”，作为戏剧的基本冲突。

剧中有这么一段戏：有一次：厂部生产科科长波鲁埃克托夫和工厂副经理里亚宾宁不通过切什科夫到车间召集会议，布置惯例性的突击任务，当他们赶到车间来开会时，切什科夫就早已解散了与会者。里亚宾宁气愤地质问他：“您的示威有什么用意？”切什科夫反而示威似的回答：“我已经命令各工段负责人不要执行生产科的指示”、“一切指示都应该通过我！”他俨然以二十六号车间的“小彼得大帝”自居。同样是“实干家”，在切什科夫干瘪的前胸挂着“革新”的招牌，在波鲁埃克托夫肥胖的臀部盖有“保守”的印章。切什科夫主张要有“严格的工作

节奏”、“精确的工作进度表”和生产的“严格纪律”，而波鲁埃克托夫的“主意总是来自非常精确的一套陈腐的公式”。勃列日涅夫曾经说过：“过去的经验是个坏参谋”。他所咒骂的“过去的经验”正是指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革命传统，而他所谓的创新也不过是站在“西方文明”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生产管理方式的技术新贵切什科夫，就这样把他的对手撵下舞台了。

近年来，苏修叛徒集团制造出一个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时代”，借以掩盖其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实质。为了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权利益，勃列日涅夫曾利用各种场合一再狂吠“认为党的纪律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时期失去尖锐性，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叫嚣“要利用社会影响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措施”来镇压劳动人民，大力推进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反动法令和“纪律”。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到底是什么货色？切什科夫做了形象精采的表演。

在一次每日生产汇报会上，一位“爱开玩笑的”工段长正在油腔滑调地汇报生产是“不好不坏”的时候，切什科夫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他“突然地、极度激怒地”狂叫：“制止他！”又马上“嘟囔着”、“狂怒地”跳起来，跑过去抢喇叭，大叫：“工长们在汇报会上没有事情干，工人们现在在厂房里却没有人管！”这就是说，工长们不应该在会上扯皮，而应该到车间里去“管”工人，当好监工！在切什科夫的“按每分钟计算的工作进度表上”，每分钟都应该用来榨取工人的血汗，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的用“科学”、“精确”之类字眼武装起来的“经济改革”的阶级内容。为了秉承勃列日涅夫要为“争取消耗最少资金而获取最大的国民经济效果”“表现高度的党性责任感”的旨意，苏修党的“优秀党员”切什科夫就在舞台上高喊“要计划每一昼夜、每一小时”，“一切都要计算、一切都要分析”，工厂副经理也声称“改革明确地肯定一点，就是实际生产量和利润”，为此，切什科夫采取了一系列的“科学管理”措施。当切什科夫做到“开始廉价地生产产品”，

使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二十六号车间有利可图了，他也就从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变成了二十六号车间的全权主子。切什科夫的言行为勃列日涅夫关于经济改革的讲话做了更为直接的注解——追求残酷剥削工人而来的最大利润。

剧中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当一位切什科夫的前任领导问他的“改革”“究竟指望什么呢”？他回答：“目前我不掌握着无限的权力。”当他攫得并凭借这种权力，这位二十六号车间的“严厉的大老板”便对工人们狂吼：“得制服他们！”“得卡住他们的脖子不放！”对稍不合他意愿的技术同僚，他叫喊：“我只得处罚你！”在他当权的短短的头二三个月里，就有二十来个技术人员受不了他的欺压而被迫离职了。这就是切什科夫表现的勃列日涅夫所鼓吹的“对工作消极的各种现象持布尔什维克的不调和的态度。”说穿了就是，切什科夫利用苏修叛徒集团授于他的“无限权力”，在二十六号车间对工人实行希特勒式的专政，残酷剥削压迫工人。使切什科夫这种肆无忌惮、毫无理性的残暴行为合法化，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的用“严格要求”、“不留情面”之类字眼武装起来的“民主改革”的实质。另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切什科夫又懂得还必须经常实行“奖金罚半”和“要用卢布鞭策他们”的奖金挂帅、物质刺激一套。为了维护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切什科夫就是这样自觉地使用刽子手和牧师的反革命两手统治策略。

毛主席深刻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濒于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绝境的苏修叛徒集团，“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就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公然实行法西斯专政，把苏联变成各族人民的监狱。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科学技术革命新时代”“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新时代”，所谓“时代的命令”就是要求苏修的整个上层建筑都要服务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疯狂推行的反革

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苏修作协头目马尔科夫夸奖德伏列茨基在话剧《外来的人》中“有意识地、引人注目地显示出自己的立场，在提出重大社会问题方面充满激情”，这正好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外来的人》是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机械的传声筒。

一位苏修评论家还咄咄逼人地叫嚣：“不论我们对此乐意不乐意——切什科夫来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当代英雄”切什科夫就是这样应服务于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时代的命令”而来了。

好吧！就让我们分析一下切什科夫这个形象，看一看为这一“时代的命令”所召唤出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当代英雄”吧！

二、什么“当代英雄”

前不久，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授奖大会上宣称，苏联经济的发展要求有自己的实干家，或称实业家。剧本《外来的人》中的主人公切什科夫正是一个这样的具有所谓“公民积极性”的“实干家”。他不同于苏联阿飞文学中的男女主人公，他除了偶尔带其情妇谢戈辽娃到国营公寓住几夜外，其他时间昼夜都泡在车间对他手下的“三个付主任、二百多个工程技术人员发号施令”。就是老婆死在莫斯科了，他也只匆匆去了一趟。切什科夫的“实干”被苏修评论家誉为是他所具有的“人的英雄品质”中的首要品质。其实这个“实干家”、“英雄”切什科夫，正是一个骑在工人群众头上的巧取豪夺、逞凶作恶的技术贵族，是一个新型资本家。

受过高等教育、精通现代化生产技术和压榨工人的手段，就是切什科夫成为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企业中的代理人的必要条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高等教育出的切什科夫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精通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到二十六号车间讲的首要条件就是“月薪二百八，一套三间的住房，给老婆安排工作”。有一个苏修评论家为他们的“英雄们”做过这样厚颜无耻的辩

护：切什科夫之流的英雄“不愿过，不去过，也无权过不舒适的生活”，他们的精力没有必要浪费在“进行生存的生物斗争”，不用说这种“精力”应该用于争取最大限度榨取工人血汗的“经济改革”！很明显，为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工人卖命、并且自己也身为特权阶层的一员，就是切什科夫这位“实干家”的阶级性。

剧中，切什科夫这位“实干家”成了二十六号车间的“救世主”。极端仇恨劳动者的剧本炮制者,在全剧里没有安排一个有工人群众的场面，在台上打过几句哈哈的唯一一个工人卢奇柯，后来也被打发给死了老婆的切什科夫看孩子去了。就是有那么些个苏修评论家直言不讳地狂叫，在这个“以科学和技术为旗帜”的“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量就是智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所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就是为了在历史舞台上让位给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看到，充斥戏剧舞台的也正是这一大堆乌烟瘴气的经理们、主任们、科长们、秘书们、工头们。但是这一大堆知识分子都无力扭转二十六号车间生产的落后局面。于是，他们之中的疯狂仇视人民、疯狂崇拜强力和“金发野兽”的“超人”——切什科夫，便成为舞台上颐指气使的主人公。切什科夫冒着受苏修党纪处分的威胁，置病危的老婆于不顾，单枪匹马到二十六号车间当“救世主”来了。他一离开季赫文；原工厂生产就下降了。真是一个工厂离了他机器就不转了的了不起的人物！堂·吉诃德尚有一仆一马一驴一剑方敢出征，切什科夫光杆一个“来了”，他的救世秘方又是什么呢？这就是：现代化工业设备加上对工人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于是就必须有切什科夫这样“年轻有为的”、“热情充沛的”、“有才干的”、“积极主动的”、“不屈不挠的”等等等等一大堆形容词的“天才”！

随着苏联社会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也就必然给其文学典型形象中的“英雄”打上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化的阶级烙印和性格特征。作为苏联

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后产生出来的“第四代”人中的“英雄”切什科夫，正是以其气焰嚣张的法西斯分子形象在舞台上张牙舞爪的。

“一切指示都要通过我！”“我掌握着无限的权力”，“在联合之前，应当分清权限”——这表现了切什科夫无止境的权势欲，“在这些厂房里我可以干一番大事业！”——这是切什科夫掩盖他无餍足的政治野心的遮羞布。冷酷无情，动辄挥舞警棍大棒处罚人——这是切什科夫专横独裁的作风。凡此种种，构成了切什科夫法西斯性格的主要特征。

恩格斯说：“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剧中对切什科夫言行所下的提示性的形容词都是：“狂怒地”、“嫉妒地”、“突然冷淡地”、“耐着性子地”、“不耐烦地”、“毫无笑容地”……等等，等等。当年法西斯德国的纳粹分子不就是这样一付付嘴脸吗！剧中的切什科夫不仅对其下属异常专横暴戾，就是在其情妇面前，这种法西斯气焰也毫不收敛。谢戈辽娃抽烟不知怎么不对切什科夫的劲了。他便“夺下她的烟，扔在地上，用脚踩灭”，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强迫你听话！”“在我这里你得不到平等！”法西斯的血腥味无时无刻不从切什科夫的每一个毛孔中散发出来。

剧作者安排的谢戈辽娃是作为起初对切什科夫抱有怀疑态度，后来变得“非常喜欢他”、死心踏地跟他走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让谢戈辽娃自己无耻声称甘愿做切什科夫的“一只狗一只猫”供他玩弄，当他的婊子。但是，就是这样一类人在切什科夫那里也得不到丝毫怜悯和半点“平等”。谢戈辽娃为切什科夫的法西斯性格做过这样的辩护：“自己象马一样干活的人，有这个权利。”我们姑且不论切什科夫这个为苏修政治路线卖死命效大劳的“实干家”，是一个从未参加过任何体力劳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只要问，苏修统治集团为什么要给切什科夫这种权利？一位苏修评论家回答得对：“不仅是生产，而且是整个社会都不能脱离切什科夫要求的纪律而存在”，“否则事业就要完蛋！”是的，腐败透顶的苏修

叛徒集团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不得不乞灵于最反动的，公开实行恐怖手段的法西斯专政，不得不使切什科夫之流的法西斯分子在苏联掌权。

极端仇视马列主义、仇视革命传统的切什科夫，当人们给他讲当地卫国战争的情况时，他不是异常冷淡的沉默，便是极其粗暴地打断说话者："我感兴趣的是未来！"作者用心险恶地安排了格拉莫特金这个卫国战争时期有功的指挥员作为切什科夫的夺权对象，强调了他软弱的好心与无能，并让他向切什科夫摇尾乞怜。第二幕中有这么一段戏：在车间办公室"出现了【一个陌生人】（着重号作者原加），他身材魁梧、和蔼可亲、仪表堂堂、一头白发"。格拉莫特金这位车间过去的主人变成了陌生人，而坐在办公桌前的切什科夫却成为主人。"我们不是敌人！"切什科夫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迸出这么一句话。格拉莫特金马上低三下四地恳求切什科夫给他安排"任何一个付职"。"我决不同意"，切什科夫用资本家对雇员的口气说："我决不用您。"当格拉莫特金发现自己的"善良"已经变成法西斯分子的笑柄时，他"勃然大怒"，骂道："这些下流坯！乱扣帽子！我并不善良！"剧中，"善良"竟成为咒人的恶语！切什科夫更是口口声声说什么自己不明白"人道是什么"、"人性是什么"。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豺狼本性的进一步暴露。恰如伟大的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财政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格言，它要尽量多榨油水，最好能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

剧作者笔下的切什科夫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他一个亲人也没有。"他的亲人"全死了"，是"在围困中死的"。一方面，作者恶意攻击斯大林同志指挥的苏联人民反法西斯侵略自卫战争是灭绝人性的。另一方面，作者好象是为切什科夫法西斯性格的形成抓到根据。其实，这正好从另一个角度供出背叛了革命传统的切什科夫，完全是苏修统治集团精心"喂养"出来的。列宁同志曾写道："这种主要靠平民知识分子补充的官僚，按其出身及其活动的使命和性质来说，都带有极浓厚的资产阶级性质，但专政制制度和高贵地主的巨大

政治特权却赋于他们特别有害的品质。”“他们是最危险的伪君子，拥有西欧反动专家的经验。”切什科夫就是这样一个由苏修叛徒集团精心“喂养”出来的，“拥有西欧反动专家的经验”的，具有“特别有害的品质”的，“最危险的伪君子”，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

在文艺上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占领舞台，实质上就是社会上哪个阶级实行专政。《外来的人》这样一部艺术上粗制滥造之作，之所以能在苏修文坛上风行一时，就是因为剧本主人公切什科夫是一个在经济上适应了苏修加强集中、垄断，对劳动人民巧取豪夺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是一个用“现代化”加紧对工人剥削的“实干家”；在政治上他是适应了为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法西斯分子。一句话，苏修极力吹捧、美化的所谓“当代英雄”，就是理想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苏修叛徒集团大肆吹捧话剧《外来的人》，就是妄图用它们“喂养”出来的“当代英雄”切什科夫去“喂养”人民，利用文学来为其对内加紧法西斯控制，推行“新经济体制”，对外疯狂侵略扩张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

三、打倒苏修叛徒集团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话剧《外来的人》在苏联的出笼，并在苏联引起广泛强烈的社会反响，剧本主人公切什科夫成为苏修当代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典型形象，这一切正是反映了苏联社会在政治上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在经济上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历史大倒退势必反映为苏联文学的大堕落。高尔基长篇小说《母亲》中的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巴维尔和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青年英雄保尔·柯察金，是当时苏联社会的主人，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光辉形象。今天，切什科

夫之流的形形色色的新型资本家、法西斯分子成了苏联社会的主人，在苏联堕落的修正主义文艺垃圾中成为名噪一时的“当代英雄”。这是不足为怪的。

无耻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空前巩固和强大充满了刻骨仇恨和无比恐惧。他们大肆尊孔反华，大骂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极权主义”。但是，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和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剧本《外来的人》受到苏修统治集团的如此重视，切什科夫这个法西斯分子成为苏修统治集团的掌上明珠，这正是莫斯科新沙皇打在自己“人道”“仁政”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

剧本《外来的人》是苏联社会的真实写照。德伏列茨基的点睛之笔就点在标题上：《外来的人》“两幕现代纪事剧”。这一个“现代”，一个“纪事”是剧本的两只眼睛。整个剧本浸透的法西斯主义情绪，整个苏修社会的白色恐怖，就透过这两只眼睛闪着冷酷凶狠的目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看过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后说：“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好象我自己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一样。”《第六病室》是在农奴制行将崩溃时，诉诸反动暴力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生活的一幅图画。同样的，从二十六号车间及其“全权主子”切什科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莫斯科新沙皇统治下的苏联社会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法西斯专政全面推行，法西斯分子全面篡夺了各级领导权，肆意横行的血雨腥风的图画。历史上，军事封建独裁没有挽救圣彼得堡老沙皇的腐朽农奴制的崩溃。可以断言，法西斯专政同样也挽救不了莫斯科新沙皇彻底覆灭的可耻命运！

剧本《外来的人》是莫斯科新沙皇霸权主义的产物。当前，美苏两霸在激烈地争夺世界霸权。苏修统治集团疯狂扩军备战，随时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于 1968 年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动了飞机、坦克、大炮强行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占领军成了不受欢迎的“外来的人”。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它声东击西，加紧争夺欧洲、中东并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扩张；它掠夺东欧国家，陈兵中国边境；在许多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莫斯科新沙皇霸权主义的侵略本性决定了它要“喂养”、保护、重用切什科夫之流的法西斯军犬。当年的法西斯战争狂人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在世界各地扮演了“外来的人”的可耻角色，最后葬身于世界人民的革命烈火之中。可以断言，当今的勃列日涅夫拾起了希特勒疯狂的扩张主义的破旗，它也一定会葬身于世界人民的革命烈火之中！

剧本《外来的人》的炮制者为什么对“外来的人”如此津津乐道？“外来的人”切什科夫之流的法西斯分子究竟从何而来？显然，切什科夫绝不是从列宁故乡的光荣的十月革命传统上来的。国内资产阶级和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存在，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国家政权，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外来的人”切什科夫正是从华尔街的老板，白宫的政治寡头，从希特勒的阴魂，从杜勒斯垂死时寄托在苏联第三、第四代人身上的复辟希望中而来，正是在莫斯科新沙皇的羽翼下孵化出来的。

剧本《外来的人》的炮制者煞费心机地为全剧设计了这么一个结尾：同切什科夫鬼混在一起的谢戈辽娃问他：“我们上哪儿去？”切什科夫回答：“我不知道我们向哪儿去……。”接着，“照明全暗”，“在黑暗中传出”切什科夫指挥生产的“脆亮声音”，最后是象征切什科夫取得胜利的“一片光明”。

作者给剧本生硬地加上去的这个“光明的”尾巴，反映了作者是一个阿谀莫斯科新沙皇“刑棍皮鞭政府”的政治小丑。整个剧本的反动内容及切什科夫的塑造都说明作者是在为切什科夫之流的法西斯分子篡夺苏联的各级领导权大唱赞歌，是为勃列日涅夫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疯狂推行全面法西斯化的反动路线鸣锣

开道的。可是。到了剧本结束时，剧作者偏偏要让切什科夫说："不知道上哪儿去"，偏偏要打几点省略号。这一个"不知道"恰恰说明了法西斯分子切什科夫之流是多么色厉内荏；这几点省略号，恰恰点出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莫斯科新沙皇，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们，对自己行将就木的前途是多么恐惧！"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苏修豢养的大大小小的切什科夫们也逃不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列宁故乡的英雄们，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决不会也没有坐视苏联社会的历史大倒退。苏联的人民革命终有一天会把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新沙皇、切什科夫之流的法西斯分子这些历史罪人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招生路线

蒲心文　骆永林　罗贵华

1974-05　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学校为谁开门，招收什么人入学，历来是教育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总结了我国教育革命的实践，明确地指出："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为我国社会主义大学规定了一条无产阶级招生路线。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它的伟大意义，并在斗争实践中排除干扰，不断划清它与修正主义招生路线的界限，才能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线奋勇前进。

"七·二一"指示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教育思想的光辉发展

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一条无产阶级的招生路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的光辉发展。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领域的革命，始终把教育革命当成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与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教育路线进行斗争中，批判了剥削阶级形形色色的超阶级、超政治的反动教育观，同时提出了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教育的光辉论断，与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划清了界限。

早在一八六六年，马克思就英明地预见到工人阶级"他们的阶级的未来，也就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给临时中央委员

会代表的关于几个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以及争取工人阶级的教育权力的斗争中，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旧大学的反动招生路线，指出：资产阶级“只允许‘上层阶级的子弟’上大学”（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在俄国则“采取一系列纪律措施和财政措施来剥夺贫苦学生（占学生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还总结了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革命中，因为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而不得不把一些重要的工作交给资产阶级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培养“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恩格斯：《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以他们毕生的精力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建立无产阶级的宏大知识分子队伍而奋斗了一生。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始终把教育革命和社会革命联在一起。列宁提出了“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俄共（布）党纲草案》）的战略口号，并领导了苏联二十年代的教育革命，废除了沙皇时代封建军事帝国主义性质的旧学校，第一次创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学校教育。列宁首先从招生制度上进行革命，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亲自写了《关于苏俄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取消入学考试，“首先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为大学招生制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在列宁领导下，还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有四万工农青年进速中学习，其中百分之七十五都进入高等学校，有力地改变了高等学校的阶级成分。但是，在当时由于教育大权落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卢那察尔斯基之流手里，一批资产阶级教育“权威”从美国搬进杜威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现代教育”的黑货，严重地干扰了二十年代的教育革命。三十年代，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开始纠正卢那察尔斯基之流的错误路线，克服杜威实用主义“现代教育”的影响。而凯洛夫之流和盘踞在苏联高等

学校的资产阶级顽固派，则利用苏维埃政权对建设人才需要的迫切性，扯起了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黑旗，大肆攻击二十年代工农学生“知识水平低下”。他们大搞什么“学制改革”，在招生制度上采取了竞争性考试，取消了工农及其子女入学的优先权。后来，甚至规定学业成绩优良获得金质和银质奖章的中学毕业生，可以免试升入高等学校。这就逐步复辟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使三十年代的苏联大学教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的滋生地。苏共二十三大选出的中央主席团十一个委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八个都是三十年代苏联大学的毕业生。正是他们一伙叛徒，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苏联的高等学校，完全背叛了列宁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成为一小撮特权阶层训练“天才生”的修正主义接班人的场所。广大工农子女长期被排斥于大学门外。苏修《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五年发表的一个调查报告，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百分之九十想升大学，其中百分之八十二达到目的；农民子女有百分之九十落了空。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激起了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在招生制度上，早在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就提出了“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建国初期，毛主席又明确地提出学校“向工农开门”的阶级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亲自为教育战线制定了一整套无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陆定一一伙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招生路线上，刘少奇、陆定一一伙把孔子的“有教无类”说成是“打破阶级界限”招收学生，大叫“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行按统一高考成绩分段录取的资产阶级高考制度，把大批工农及其子女排斥在大学门外。以我院数学系一

九六四级新生为例，当年入学二百二十七人，出身剥削阶级的一百四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二；而出身工人贫下中农的仅十五人，占百分之六点六。刘少奇一伙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挥舞修正主义招生制度的大棒来专无产阶级的政。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并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伟大历史任务。毛主席英明地决定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师生起来造了旧高考制度的反。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九六八年，毛主席总结了上海机床厂工人阶级的创造，在"七·二一"指示中规定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无产阶级招生路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古以来学校为剥削阶级所垄断的局面，堵死了资产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道路；也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小学不是为了培养普通劳动者，而是为了升学、升官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保证了工农及其子女有优先上大学的权力。这对于培养和造就工人阶级自己的宏大知识分子新部队，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贯彻"七·二一"指示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革命

贯彻执行毛主席光辉的"七·二一"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大学生，彻底改变了旧的招生办法，这是整个教育制度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改革，必然要经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必将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革命。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从孔老二到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历代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把学校教育作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工具。大学历来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今天无产阶级要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要反占领。文化大革命以来是坚持还是反对"七·二一"指示，就成为这场占领与反占领的斗争的焦点之一。

林彪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祭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这条反动纲领在教育战线上的集中反映，就是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的一系列革命变革和新生事物。在学校为谁开门，招收什么人入学这个招生路线问题上，林彪一伙猖狂反对"七·二一"指示，攻击工农兵大学"坏得很"，并效法孔老二招学生要收十条干肉作敬见礼的办法，恶狠狠地嗥叫工农兵"上大学就得自己拿钱，……不来就算了，不怕没人来"，妄图从经济上卡工农兵的脖子。林彪一伙到底要谁上大学？他们露出一付大恶霸的咀脸，公然对其子女们宣称"大学就是为你们办的嘛"，"你们是当然的接班人！"妄图把大学作为他们"复礼"的反革命工具。社会上一小撮地、富，反、坏、右也无耻漫骂工农兵上大学是"黄泥巴脚杆糟踏圣贤"。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乘机反攻倒算，大肆攻击工农兵学员"脑子笨"，诬蔑我们贯彻"七·二一"指示会使"科学技术断代绝种"。林彪一伙和一切阶级敌人对"七·二一"指示的攻击，就是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要"复"那个"学而优则仕"和把工农兵排斥在学校门外之"礼"，要"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之"礼"。说到底，就是否定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复"整个资本主义旧制度之"礼"。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依反动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指引下，广大工农兵昂首阔步地跨进了我国高等学校的大门。

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 孔子早已死去两千多年，刘少奇、林彪同孔老二一样也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反映在招生制度上的腐朽思想，还在通过各种渠道毒害着人们。例如，在孔子宣扬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的影响下，有的人总是望子成"龙"，而不是望子成"牛"。他们利用职权或拉关系，通过"走后门"把子女搞到大学读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些人总是认为：不经过森严壁垒的考试，就考不出过硬的"真本领"。他们扬言只有凭考场分数高低录取，才是"公平合理"的。这种对无产阶级招生路线持怀疑态度的议论，貌似公允，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鼓吹的"以分选优"、"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动招生路线的复活。这些人象《封神榜》中的申公豹一样，只会向后看，不会往前看。说穿了，还是留恋十七年的那一套。

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的旧高考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宝贝"呢？它是从隋唐至清末一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的延续，只不过近百年增添了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考试制度的色彩罢了，实质上是一个封、资、修考试制度的大杂烩，即书本第一，鄙视实践，死记硬背，突然袭击，凭一纸考卷定取舍。这种办法，在哲学上，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在考试制度上的反映；在政治上，是以"学而优则仕"为诱饵，诱惑青年走"三脱离"的邪路，为剥削阶级培养接班人。这种高考制度，完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实行文化专政的精神枷锁，势必把优秀的工农兵卡在大学门外，让资产阶级继续统治他们一向霸占的教育领地。照这样搞法，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就没有希望。去年高等学校招生时修正主义考试制度在一些地区的表现和影响，难道还不该认真吸取教训吗？

贯彻“七·二一”指示的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集中反映在如何看待工农兵上大学的质量问题上。正当广大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促进了教育革命不断深入的时候，社会上又跳出一些所谓“关心大学教育”的人，胡诌什么贯彻“七·二一”指示，使“大学教育质量下降了”，攻击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教材，小学的基础。”在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压力下，我们一些同志由于党的基本路线在头脑中没有扎根，也被“质量低”的叫嚷搅昏了头脑，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对贯彻“七·二一”指示产生了动摇。

到底如何看待“教育质量”的高低呢？在阶级社会里，教育质量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东西，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标准，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质量观。从孔老二的“博学于文”到叛徒、卖国贼林彪的“五分多，尖子多”，无不用“智育第一”的破旗掩盖其剥削阶级政治第一的实质。资产阶级出于本阶级反动的政治目的，把书本知识的多少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这种“质量标准”，说穿了，就是“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列宁：《青年团的任务》），把朝气蓬勃的青年变成政治上稀里糊涂的书呆子，变成资产阶级的恭顺和能干的奴才；“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这就是资产阶级所谓“教育质量”的实质。事实证明，“智育第一”完全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培养所谓“人才”的法宝！同一切剥削阶级相反，在我们看来，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服务的。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因此，无产阶级的质量标准，最根本的是看学生有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和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问题的能力。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甚至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教条主义者、

修正主义者。苏联卫星上天、红旗倒地的惨痛教训，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今天，广大工农兵学员来自三大革命实践第一线，有较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一定的生产斗争经验。在入学基础方面，就是旧大学生所不能比拟的。入学后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农兵学员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又是过去那些学工的不会开机器，学农的不会种庄稼，学文的不会写文章的旧大学生所不能比拟的。赵兵同志那份难于用分数评定的好答卷和北京、上海首届工农兵大学生胜利毕业，在政治质量和专业理论水平方面，都超过文化大革命前任何一届大学生的事实，就是对林彪反党集团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诬蔑文化大革命后大学教学质量“今不如昔”的论调的有力回击！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我们不能忘记：苏联三十年代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逐步复辟，正是从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降低了教学质量”开始；我国在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之后，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攻倒算，也是从所谓“降低了教学质量”发难。今天，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攻击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也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攻击工农兵学员，实质上是否定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制造舆论。

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为我国社会主义大学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的招生路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我们必须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条路线。

在贯彻执行“七·二一”指示的过程中，遵照毛主席“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教导，我们要加强党对招生工作的领导。要在选拔和录取工农兵学员时，坚持把政治质量放在首位，执行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要充分重视实践经验，重视工农兵学员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实际能力；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群众，贯彻“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发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广大群众对招生工作的监督，杜绝“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要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对于资产阶级开倒车的企图，对于违背“七·二一”指示的各种错误倾向，不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且要以张铁生同志为榜样，出以公心，敢于批判和抵制。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沿着“七·二一”指示的道路，夺取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

初澜

1974-08-04　人民日报

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坏戏。它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的大好形势下，联系教育战线和文艺战线的斗争实际，把这个坏戏作为反面教材，提供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批判，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划清两条教育路线、两条文艺路线的界限，巩固并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很有必要、很有现实意义的。

《园丁之歌》的剧情，说的是一个工人的孩子陶利，本来很有生气，因为想当火车司机，爱玩小火车，就被教师方觉斥为“不守纪律、不爱学习、不讲礼貌”，甚至是不能成“材”的“锈铁”；但在另一教师俞英的“循循善诱”之下，终于“悔悟”过来，“进步了”。这出戏通过它的剧名和全部情节，特别是对俞英这一主要人物的塑造，向观众宣扬了如下的观点：一、培养我们青少年的“园丁”是教师；二、没有文化就不能承当革命的重担；三、学生如不循规蹈矩地死啃书本，就是“糊不上壁”的“稀泥”。十分明显，这些观点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一系列革命变革的反攻倒算。对此，必须坚决批判。

“花红要靠育花人”，“培育还靠好园丁”，这是贯穿《园丁之歌》全剧的主调。这个主调，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培育青少年一代的“园丁”。俞英、方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

这就不只是一个剧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事业的领导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的学校，竟然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的这块“世袭领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开进了学校，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与广大革命师生一起团结战斗，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了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胜利。毛主席指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因此，如果把我们的青少年比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幼苗”，那么，培育革命幼苗的“园丁”，就是我们伟大的党！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着革命幼苗茁壮成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青少年一代前进的方向！

两个阶级争夺教育阵地的斗争，必然要在领导权问题上进行长期的、激烈的反复较量。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资产阶级对于失去这块“世袭领地”，是怎么也不会甘心的，他们总是要用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资产阶级的“教师治校”等谬论，来排斥和对抗工人阶级的领导。《园丁之歌》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树人”的“园丁”，甚至称之为什么“引路人”，大加美化和颂扬，其实质就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而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

革命的教师，是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我国有一支很大的教师队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涌现出许多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

极分子。同时由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不断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自觉性。在党的教育事业中，一个革命教师的职责是光荣而又重大的。教师在组织、进行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应当发扬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但是，作为教育者，又“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革命的教师和革命的学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和同志，应当互教互学、共同前进。《园丁之歌》否定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恢复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园丁”和“桃李”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否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园丁之歌》在俞英的最后一个唱段中，唱出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谬论，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强调文化的重要。这是在文艺舞台上露骨地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至上”论，贩卖“智育第一”这一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在这出戏出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鼓噪一时，胡说什么“教育质量下降”，要走“关门教学”的老路，妄图迫使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死啃书本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个新生事物。联系这一现实的阶级斗争背景来看，《园丁之歌》宣扬这样的谬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出戏的全部剧情，集中到一点，就是围绕着解决所谓“学生不好学”的问题，渲染俞英同方觉的“矛盾”。其实，俞英同方觉在维护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鼓吹“文化至上”，贩卖“智育第一”的黑货，配合默契，殊途同归。他们的争吵，不过是“方法”之争。《园丁之歌》就是以这种“方法”之争，掩盖了宣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质。方觉用“停课”、“没收”等“管、卡、压”的“行政手段”来推销“智育第一”，俞英却认为这是出于

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只是不如她那样“夫子善诱”，“水往根上浇”罢了！她可以同陶利一起玩小火车，然后搞了个“突然袭击”，用一道难题把这个“不好学”的学生憋得“脸上发烧汗直淋”。她还善于进行这样的“忆苦”教育：以陶利的祖父在旧社会因“望儿成长”，宁可乞求地主的阎王债，也要送儿子去进学堂的家史，来诱使这个爱玩小火车的孩子——“淘气”，“晓得没文化开车也开不上”，服服帖帖地当“智育第一”方针的俘虏！请同志们想一想，象陶利的祖父那种行径，不也颇有点武训那种“穷人若是能识字，就不会受人欺负”的味道吗？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时代，不去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根毫毛，反而做着“望儿成长”实即“望子成龙”的迷梦，请问，这是哪个阶级的“家史”教育？剥去这个戏所谓“教改新篇”的包装，原来还是武训那个“念书好！念书好！”的腐烂货色，是宣扬“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的孔孟之道。

“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它完全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承当革命重担、推动历史前进的，难道不是创造文化却不能占有文化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反而是那些奴隶主、地主阶级的“圣贤”和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吗？在我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史上，不是也有成千上万从未进过校门的工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勇挑革命重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吗？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虽然一切剥削阶级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但是为推翻那些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承当革命重担的，恰恰就是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广大劳动人民。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普及教育和工农兵上大学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文化，只有掌握在革命人民的手中，才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所以，决不是没有文化就不能干

革命，而是掌握了文化更好地干革命。《园丁之歌》鼓吹这种“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然挑战，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对《园丁之歌》中陶利这样的学生持什么态度，反映着究竟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来教育青少年一代的斗争。陶利本来不错，朝气勃勃，热爱劳动，立志要当工人。他的行为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种抵制和反抗。但剧本却硬说他“错”。他究竟“错”在哪里呢？无非是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的轨道。把陶利这样的学生视为“糊不上壁”的“稀泥”、“不成材”的“锈铁”，却把小玲那样“五分加绵羊”的学生，树为“桃李”的标本，这就清楚地表明《园丁之歌》所鼓吹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时而贩卖“读书做官”论，时而又散布“读书无用”论，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问题从来就不在于读书是否有用，而在于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所用。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必要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死读书、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方式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为着把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校学生必须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必须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并使这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书本知识，同阶级斗争的实际，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果依着《园丁之歌》宣扬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只讲脱离实际的文化知识，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又红又专，那就是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即使培育出有“高度的文化知识”的“桃李”，也不可能承当无产阶级的革命重担，而只能成为修正主义

的“社会栋梁”和“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由他们去驾驶“时代的列车”，就会象苏修出现的那种情景，大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园丁之歌》所唱的，就是这种“克己复礼”的调子。它要复“师道尊严”、“智育第一”之“礼”，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之“礼”，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礼”。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象这样的调子，现在有人在唱，今后也还会有人要唱的。但是，教育革命的小闯将黄帅说得好：“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肃清其影响，这是教育战线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必将在这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中，夺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如此“全民教育”

1974-11-12　教育革命通讯

在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下，苏联的教育被一小撮特权阶层及其子女所垄断，广大工农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今日的苏修教育成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治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越来越反动、腐朽和没落。他们极力标榜“全民教育”、“教育平等”，也终究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

大搞“天才教育”

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苏修教育界大力鼓吹“天才论”，竭力宣扬“特殊天资”和“先天素质”，大搞“天才教育”。为了培养“天才”，苏修叛徒集团费尽心机，不惜工本。在全西伯利亚，他们通过由三轮考试组成的“西伯利亚奥林匹克”来选拔所谓的“天才”学生，专门为特权阶层子女开办军事、政治、物理、数学、艺术等方面的“天才”学校。这种学校不仅有较好的设备，“较高水平”的师资，学生还享有优厚的生活待遇。下面这个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苏修的“天才教育”究竟是什么货色。

从新西伯利亚城市中心乘车往北约两小时，在白桦树林中有一座巨大的科学城。居民大部分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博士。动员这些具有优秀头脑的人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来到这个极寒冷的地区——西伯利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把工资提高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工资标准的两倍，甚至三倍。同时提供一幢有暖气设备的、有庭院的楼房住宅。再有，上班或去讲课，得用小汽车接送。日常生活用品比任何地方的供应都要丰富。他们过着如同沙皇时代的贵族一般的生活。在这里学习的大学生，也受到比莫斯科各方面都优厚的奖学金。

在这座科学城中，大学的数学科与物理学科进行天才教育实验，这是很有名的。在全苏境内选拔初中一二年级中有天赋才能的学生送到科学城进行大学程度的教育。“采用什么办法招收这样的学生？”他们回答说，“听到哪一个城市或哪一个村谈论有天才少年时，马上派道我们的专家对他进行考察和面谈。之后，建立二至三年接触，在接触过程中确认这个学生是具有天赋的才能，那么，就允许让他上科学城的大学。”

这里的少年大学生确实很用功。听说十五岁的数学系学生彼佳，在宿舍熄灯之后，靠月光或蜡烛默默地在学习，象得了失眠症一样。人眼看着就消瘦下去了。负责本班的保健医生几次劝他：“晚上可要好好睡觉”，而彼佳每次都很生气地说：“不要跟我开玩笑！加罗迪与高斯（天才数学家）都在十七八岁时就有了伟大成就。数学家的生命在于十几岁。再过两三年我也到加罗迪、高斯的年龄，可我还没有一点成就，时间是多么宝贵啊！夜里实在不能安安稳稳睡大觉啊！”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苏修所鼓吹的“天才教育”完全是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货色，它实际是在毒害青年，残害儿童。苏修叛徒集团正是通过大搞“天才教育”的手法，来达到他们在教育领域里排斥工农，对工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反动目的。

排斥工农及其子女

在今天的苏联，普及教育已成为空话。广大工农群众所受到的教育是极为有限的，他们的子女为生活所迫，常常不得不中途退学，同时，在“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大棒的挥舞下，大批的工农子女被诬蔑为“智力落后”，“知识水平低”而被赶出学校大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切马索夫不打自招地说：“农村地区中途停学的学生最多。其中一些人是由于学习成绩不好。”下面这个调查材料可以说明，工农子女升入高年级的比重是很少的。

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顺利地升入十年级，这样就可为日后在社会阶梯的晋升上谋求较好的职位。一九六四年对高尔基州普通学校毕业班学生的社会出身调查结果是：专家的子女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八；技术工人的子女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一；一般工人的子女只占百分之一点五。

工农子女就业后也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苏修一区委书记承认："在我们所调查的工厂中只受过初等教育的工人有百分之七十，他们现在没有在任何地方学习。"苏修报刊透露："青年工人夜校中的学生中途退学现象依然是很严重的。去年秋天开始学习的托姆斯克轴承工厂的一百八十名青年工人，只有六十五人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图拉'红十月'工厂三百六十七名不满三十岁的工人都没有受到中等教育。"

苏修的农村教育更是一团糟。在辽阔的农村不仅没有高等学校，连普通中小学的处境也极为不妙。学校的数量少，学生常常因为路远而不能上学。这种情况与设在城市里的学校，特别是"重点"学校和"天才"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广大群众对此极为不满。

在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广大工农及其子女能入大学的更是寥寥无几。除了经济上的压力外，"入学考试"是一道鬼门关。事实正如下面材料所揭露的：

"苏联的大学考试，对各阶层的子女赋予客观的'教育平等'的权利。不满三十五岁的青年都可以投考大学，但是入学考试艰难。因此，知识分子的子女几乎全部考上大学了，而农民的子女几乎全都考不上。这是当然的。也就是说，生来就有读书条件的孩子与被牛羊围绕着的环境下的农村孩子接受同样一道考题，其结果当然是最明白不过的。在入学考试之前家庭环境给苏联青年造成了不平等的差异。"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把工农赶出大学校门，而且还诬蔑工农入大学是“白费钱”，“会降低教育的一般水平，也就等于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话充分暴露了苏修垄断资产阶级欺压工农子女的丑恶嘴脸。

与广大工农及其子女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的情形相对照，近几年来，适应特权阶层子女独霸大学的需要，什么造假文凭的“商行”，什么办假大学的“企业”应运而生，行贿、舞弊等现象极为严重。不论是道德败坏、腐化堕落，还是吃喝玩乐、游手好闲的人，只要有钱，都可以进入大学或是买到大学文凭。对考生要求的“高深的知识”，也失去了它的威力，一切骗人的外衣都被丢掉了，统统只服从一个“原则”——卢布。

实行森严的教育等级制

苏修叛徒集团继承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所实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衣钵，在苏修教育中，实行着森严的等级制，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去向都有着严格的界限。广大工农子女上了几年小学、中学或职业学校之后，只能去当工人、农民、服务人员，从事所谓“低贱”的体力劳动，成为廉价劳动力；而特权阶层子女，可以沿着学校的金字塔不断往上爬，从事“专家”、“领导”的“高贵”工作，世袭父母的统治地位，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高等学校则是资产阶级子女升官发财的阶梯。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总之是培养为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服务的统治者。

今日的苏联，即使在统治阶级子女内部，也仍然存在着看谁爬得高，谁的官做得大的问题，因此，入大学的竞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永久考生”、“高考流浪

者”的怪现象。有些人连续几年、乃至十年不干事，一心只想上大学。这些人静悄悄地在家中吃着父母的饭，准备大学考试。苏联的劳动群众把这类人称作“安静的白吃饭者”。

上述种种事实真相，完全戳穿了苏修“全民教育”的伪装。它反映了苏修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深重危机，反映了苏修教育的日益反动、腐朽和没落。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供稿）

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谈点看法（反面教材）

1975-02-24

“工大毕业当普通工人”这是现在众口皆传的一句话。同是一句话，但对它的解释却各有不同。

虽然是对一句话的解释，它反映出来的却是对我们党的教育方针的理解，是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态度，是对我们国家前途的态度，是一个世界观和事业心的反映。

“工大毕业当普通工人”这个口号是广大工农兵学员为了“跟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而提出来的。在旧的“十七年”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着教育界的大权，把封、资、修的“成名成家”、“轻视工农”的剥削阶级思想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使培养出来的人脱离劳动、脱离工农，成为新的精神贵族。针对这种现象，针对有的人把上大学“当做向上爬的阶梯”的思想，广大工农兵学员提出了“工大毕业当普通工人”的口号。

我们毕业所以要当一个工人，是因为我们本身是来自工农的一个成员，我们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培养，回到工人队伍中去是理所当然的。

树立毕业当一个工人的思想，是为了使我们在思想上不脱离工农、不当精神贵族，不把上大学当做向上爬的阶梯，不把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教育当做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的本钱，不向党和人民伸手要待遇，要物质享受。

是不是完完全全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就可以呢？不！决不行！

在政治上，工农兵学员入学前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取得了成绩，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受到了党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的信任，经过选拔，来到了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学习。他们在原单位就是先进的一员，经过在校三年所受到的无产阶级新型大学的教育，经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

进一步的学习，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必然会有进一步的提高，他们回到生产岗位都要成为坚持“工业学大庆”的社会主义方向、敢于向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工人群众的带头人。这是一般普通工人吗？不！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

在业务上，工农兵学员在入学前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三年的社会主义文化课学习，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到了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样，当他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的时候，必须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虽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而他的贡献必须要比普通的工人要大，而决不可以划等号。不然，就是对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教育的否定，就是辜负了党的培养，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后工农兵上大学的新生事物的否定，就是给毛主席教育路线和思想抹黑！

而当前却有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歪曲“工大毕业当普通工人”的口号，对抗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拼命反对社会主义文化课的学习。说什么：“出去当工人，学那么多干啥？”有些糊涂人也随波逐流说什么：“学学拉计算尺，毕业当个修理工就行了。”这是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的肆意歪曲，是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破坏，是对我们工农兵学员的诬蔑！

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要做大量的技术工作，要搞许许多多的技术革新，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我们必须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来完成这一任务。现在我们必须有思想上和业务上的准备。

可能有人会跳出来对我们横加指责：“你想当技术员！你想成名成家！”我们不禁要问：是谁规定只有技术员和什么名家才可以做技术工作和搞技术革新？我们当一名工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多学一点科学知识，参加技术工作，搞技术革新呢？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今天，有人还抱着“上智下愚”的观点，还把技术视为“名家”的禁地，不免有些可怜、可悲。

无产阶级要不要培养出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材，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今后前途和命运的严肃问题。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时，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是不成的。

这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部队由谁来组成呢？由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我们工农兵学员来组成。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不培养出我们无产阶级的技术队伍，文化科学领域的阵地我们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难道还要永远留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吗？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宏伟计划！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要实现这个宏伟计划，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技术队伍能行吗？单纯靠现有的人员够用吗？几十年以后依靠谁呢？难道还要到外国去进口资产阶级培养的专家吗？

我们提出这么多问题，并不是想要挤进知识分子的队伍，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学生，一个工农兵学员，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主人，工人阶级的一员，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责任感，为祖国做出更大贡献的主人翁的态度，使我们对这些问题不得不有所考虑。我们将来要当一个工人，要当一个劳动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来要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在少学点没关系，以后到实践中再学嘛！”是，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是很有限的，大量的东西要靠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去学习，去解决，但是我们应该想到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用这么大的力量来培养我们，我们如果不把这段时间和条件充分利用起来，又能对得起谁呢？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和充分利用条件，进行合理安排，对于我们今后有用的东西还是远远学不完的。如果头脑中再有“现在少学点没啥”的观点，结果会怎样，就值得考虑了。我们不仅应该考虑现在学多少将来能够用，而更应该考虑学哪些有用，用什么方法学习的问题。

可能有的人要问：“那么我们毕业后到底要当个什么？”我们说：“当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过多考虑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当什么”的个人问题。只要我们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有甘当一名不图个人名利和得失的劳动者的思想就可以。而我们现在应该加以考虑的是将来我们能为党和国家做出多大贡献和怎样才能为党和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不管你将来当什么，做什么工作，只要你能为人民做出贡献，而不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之，你对人民做不出贡献，或向人民讨价还价，要名利待遇，不管你当个什么，你都是一块辜负党和国家培养的废料。我们无产阶级的学校决不培养这样的蠢材。

最后有必要让我们来重温一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教导。伟大导师列宁说：“我们决不能象旧学校那样，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斯大林同志也指出："共产党员大学生和全体苏维埃大学生应当明确而肯定地给自己提出如下的当前任务：掌握科学，从新的苏维埃人中间造就新的换班人来接替旧教授。我决不是说大学生不应当研究政治。决不是这样。我只是说共产党员大学生应当善于把政治工作和掌握科学的事业结合起来。"

同志们，在轰轰烈烈的普及、深入、持久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四届人大胜利召开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加深对毛主席教育路线和思想路线的理解，识别形形色色的谎言、诡辩和错误观点，以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以为革命事业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以敢于和一切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坚持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而努力奋斗。为使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努力奋斗。

沈阳机电学院自动化 03 班七名学员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也来谈点看法

1975-02-26

《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见了题目，吃惊不小。细细看了一下大字报的内容后，我们认为大字报所代表的一种思潮是错误的，有害的。应当结合当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来一番争论，批判修正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

同大字报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我们就是要做普通劳动者，并且越纯越好！毛主席早已指出过："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四届人大文件中用到的一个名词，——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也明确表达了做普通劳动者的意思。不管干什么工作，只要你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人民服务的，就应当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反之，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就是精神贵族。现在还没能达到人人都自觉地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这是由于社会主义阶段还有旧"痕迹"，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及法权观念。"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我们称它为一句口号——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做介于普通劳动者和非普通劳动者之间的一类人。这种培养目标充其量只是半社会主义的，在今天提出来难道不令人吃惊吗？！在社会主义新型大学里，要培养普通劳动者，决不培养"高级"劳动者，"不平凡"的劳动者，半普通劳动者。这一点应当是毫无疑义的，坚定不移的。

写大字报的同志表示，毕业到工厂后，"虽然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而他的贡献必须比普通的工人要大，而绝不可以划等号。"让我们设想一下这是怎样一种情景，当他毕业走到工厂时，和"普通的工人"已经"绝不可以划等号"了。因为"他的贡献必须要比普通的工人要大"。这样，他就要"决不单纯"再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仅仅准备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了。出现什么呢？严格地说，出现了"学而优则仕""上智下愚"的残余幽灵。谈到贡献，我们认为，首

先，不论你是什么行业，什么身份，都有为革命做出较大贡献的可能，起决定作用的是路线而不是身份。绝对肯定地说一个刚毕业的（即使是工农兵）学员的贡献必须比普通的工人要大，未免有失自知之明，言过其实了吧？其次，普通的工人，就是工人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千千万万这样的工人，阶级斗争姑且不论，就生产斗争包括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而言，在工业战线其贡献也必定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再没有比他们的贡献更“要大”的贡献了。如果说有，大约只能存在于唯心史观中。另外，写大字报的同志还发挥出这样一个观点：毕业后“是不是完完全全当一个普通工人就可以呢？不，完全不行！”这比“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说“鞍钢宪法”吧，其中规定：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试问，能不能将普通的工人排除在外，显然绝对不能。那么，我们当一个普通的工人为什么“完全不行”呢？雷锋是一个普通的战士，“王大学”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王君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普通有什么不好呢。当普通的工人，我们认为完全行！

写大字报的同志在后面忧心忡忡地问道：“单纯依靠现有的人员够用吗？几十年后依靠谁呢？难道还要到外国去进口资产阶级的专家吗？”并且出于这种忧虑，担心提当普通劳动者、当普通的工人会出现放松文化课学习的倾向。我们不妨反问一下：不提工大毕业当工人、当普通劳动者就会促进文化课学习吗？这种促进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吗？现在“学而优则仕”“智育第一”的倾向是主要危险，还是放松文化、业务学习的倾向是主要危险？反对这两种倾向主要靠什么，应当怎样提出问题、喊口号？几十年后社会主义中国依靠普通劳动者还是依靠半普通劳动者？依靠“专家”还是依靠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工人？无产阶级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要造就，但这决不会因为提农大毕业当农民、工大毕业当工人、培养普通劳动者所贻误。相反，只能有益。因为这样的培养目标抓住了事物最重要的方面，即培养工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只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再

说造就这样一支宏大队伍甚至主要不是依靠大学，三大革命第一线是比十所、百所、千所大学更为重要的。如果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培养出的是纯普通劳动者，那才可以骄傲地宣布：它砍掉了——彻底砍掉了——“向上爬的阶梯”。

大字报在前边评价了工农兵学员，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而后边重点提出了应当抓好业务学习，为此还引用了一些语录。但如果不真正地领会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便会造成漏洞，给错误思想开绿灯。我们认为，不管工农兵学员来自哪里，基础如何，到校后都必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把转变思想、同旧观念决裂放在首位。也许我们上面评论的都不是写大字报同志的本意，但作为口号提出来，却在客观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含混的口号更容易引起思想混乱，更有必要进行辩论，加以澄清。

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行上面的争论会不会损害这个大方向呢？不会！我们正是联系实际学习才进行这个争论。因为“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的思想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要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理论，在实际上也不利于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建议上级党组织，广大的学员、教师、干部重视这场争论，这决不是多余的！

沈阳机电学院铸 02 班十二名学员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把学校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战略措施

中文系七三级教学组

1975-03　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刻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保留者旧社会的痕迹和资产阶级法权，它是林彪一类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向我们指明了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于我们认识教育战线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本质和规律，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的全面专政，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是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初步体会。仅就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学校中的主要表现，教育战线究竟应该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两个问题，谈谈我们一些不成熟的认识。

一、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校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究竟来自哪里？

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而强制人们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在日常生活里，资产阶级法权总是表现为一种特定的个人私有的权力关系，因此，就其维护对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私人占有关系和私有观念的内容来说，它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无产阶级革命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宣告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其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灭亡，基本上结束了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的统治地位。但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不可能立即消灭所有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等方面，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客观事实上

的不平等关系。高等学校作为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资产阶级法权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上。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用脑力进行复杂的劳动，而领取的社会消费品要比一般的体力劳动者优厚一些。也就是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被当成是不同等的劳动，“它同任何权力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因此，他们从社会所领得消费品就事实上是不等量的，是存在着差别的。如果把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教师的工资级别和工矿企业部门的工人工资级别拿来比较，就可以看出：前者的最低工薪与后者的最低工薪比例是七比四，前者的最高工薪与后者的最高工薪的比例是三比一。也就是说，从最低工薪看，知识分子比工人高零点七倍，从最高工薪看，知识分子比工人高两倍。这个实例明显地表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从而被大大缩小了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在修正主义国家里，其差别就更加悬殊了。

可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仍然“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默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不等量的，默认脑力劳动者应该比体力劳动者取得较多的社会消费品。所有这些就包涵着等级差别，就是事实上的不平等，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必然表现。

还应该看到，即使在脑力劳动者之间，在分配制度上，也是按照上述“按劳分配”的同一原则进行的，资产阶级法权也同样是占统治地位的。高等教育部门的工资差别，除了资历、实际贡献等条件而外，其中脑力劳动的熟练程度与复杂程度正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不同人所得的报酬是不同的，所给予的社会消费品是不等量的。这一问题是资产阶级法权在高等学校里的基本反映，由此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种种表现。

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高等学校的主要表现

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它在道德、精神方面对资产阶级法权起着宣扬和维护作用。为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抵制衰亡的资本主义，发展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就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我们认为资产法权法权观念在知识分子中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傲视工农。

傲视工农，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反映。这种观念形成的基础，就是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造成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某些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的人们身上，就要形成尊、卑、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有许多人羡慕脑力劳动而轻视体力劳动。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直到今天仍有一定市场，原因就在这里。林彪反党集团正是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思想影响向党进攻的，他们大肆贩卖“变相劳改”、“变相失业”的谬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妄图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经过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以及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仍有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比如：为什么有人把自己应该下乡的子女放在城市这个所谓“保险箱”里，或把已下乡的子女千方百计地弄回城市？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想法给自己的子女学上“一技之长”，而逃避走“五七”道路？为什么有的干部不愿与工农相结合？为什么有的教师在开门办学问题上有思想障碍，躲躲闪闪，找各种借口逃避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去？为什么实行“社来社去”这条对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在一些同志中有阻力？

这些问题的产生，关键就在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参加社会分配上有差别，这种差别决定着人们产生了傲视工农，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

第二、智育第一。

智育第一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之一。资产阶级为培养出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合格劳动力和企业管理人员，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智育第一”这一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必将是无限地扩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从而也就无止境地发展与维护着资产阶级法权。这便是这个口号的政治实质。

无产阶级的学校是为本阶级培养可靠的接班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阵地。我们的学校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政治第一，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与资产阶级学校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反对“智育第一”这个资产阶级口号。但它至今仍有一定市场，比如七二年社会上刮起一股“提高知识质量”歪风时，就有很多人象墙头草一样地随风倒过去，甚至有人对党的教育方针掐头去尾，只强调“有文化”的一个方面，也有的人口里不说，而在行动上明里暗里鼓吹“智育第一”，等等。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影响。

刘少奇、林彪正是抓住了资产阶级法权，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极力鼓吹“智育第一”，通过“智育第一”来培养精神贵族，形成特权阶层，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过去刘少奇搞的“小宝塔”，“奖学金”都是这一类黑货。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垮了修正主义这一套路线、制度，但在学校中，在社会上，“智育第一”的阴魂还存在，还在毒害着人们，侵蚀着无产阶级专政。比如社会上比较普遍地流行着的“业务吃香”，“技术至上”的思想，就是同“智育第一”的教育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智育第一”思想，在高等学校里，更多

地则反映在对工农兵学员的质量观方面，说工农兵学员的质量不如十七年的大学生的论调，也时常吹到我们的耳朵里来。

“智育第一”，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则是片面强调“三性”（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以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则是继续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维护“三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以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总之，“智育第一”的思想，在高等学校里乃至社会上是普遍存在的，“智育第一”思想的存在则是由资产阶级法权决定的。因为人们受着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支配，认为知识是捞得较多社会分配的资本，于是不能不拼命去搞“智育第一”。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说穿了，就是要钱，要钞票，要捞得更多的消费品，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在作祟。

第三、知识私有。

知识私有，个人占有精神生产资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这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产物。在旧社会，他们把知识作为商品向资本家出售，在今天，他们又把知识当作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

脑力劳动者没有物质生产资料，在旧社会，他们是凭借知识来参加社会分配的，这就形成了他们知识私有观念。因此，知识私有、待价而沽、封锁资料、著作专权、文人相轻等恶劣思想作风和投机取巧的手段就孳生而起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知识私有这一旧传统观念也就作为一种顽固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上存在着。这在我们高等学校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不必说，即使在红旗下长大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出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而如同老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背着“知识私有”的

因袭重担。他们不认为自己掌握的知识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党和人民给予的，而把它当成商品和资本，闹名誉地位，以图捞得较多的社会分配。

在知识私有的思想影响、支配下，有的人对精神产品的生产采取了极端自私的卑劣手段。比如，个人写的稿件，不容许任何人改动一个字，即使改得好也不行，因为这将会证明别人比自己高明，有的甚至因为让别人改动了一个字而大吵大闹。又如有人拼命夺取所谓著作权，把组织交给的写作任务，竟然当成“个人的选题”，初稿形成后，狂妄地向组织提出要由个人处理稿件。还有的人在集体写作组织中，不愿提供个人成果，否则就认为是集体摘了他个人的“桃子”，因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拆集体写作组织的台。可见“知识私有”观念在我们队伍中是颇有市场的，个别人甚至已经陷得很深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解放以来，那些闹个人名利，以知识私有，“一本书主义”，与党分庭抗礼、讨价还价的，有几个不是最后走上反党反人民道路的？

刘少奇、林彪正是抓住了知识私有观念，以“三名三高”为诱饵，来腐蚀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在教育阵地上培添滋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在刘少奇、林彪一伙的毒害下，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我们一些人的头脑里就泛滥起来，写一篇论文就可以升讲师，写一本书就可以当教授，赤裸裸地向人们显示：知识就是换取名利的资本，从而使“知识私有”观念在社会上到处泛滥。

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及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是阶级敌人用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有人坚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坚持甚至鼓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那他就势必在阶级斗争中站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而帮了敌人的忙，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要提高警惕，切不可等闲视之。

三、在学校里究竟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在教育阵地上，究竟应该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呢？

我们认为，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是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根本战略措施。

一、从根本上来说，在学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坚持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是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根本措施。因此我们必须彻底解决那种认为学校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的糊涂观念，必须解决重知识，轻劳动，重理论，轻实践的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必须把教育同三大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破除“三脱离”、“三中心”、培养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二、根据开门办学、面向农村的办学方向，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要学习朝阳农学院革命经验，进一步破除封、资、修的教学体制，总结我们现在试行的师生混编的年级党支部和三结合教学组织形式的经验。彻底改变旧的工作方式，知识分子习惯的工作方式。打破八小时的工作观念，提倡“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共产主义精神。

三、注意调整人与人的互相关系，进一步打破“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在工作分配和人员安排上，都要考虑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问题，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堵死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

四、坚持三结合的编书原则和三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把个人贡献融汇在集体劳动之中。以共产主义精神自觉地为集体贡献力量，坚决批判个人名利思想，培养集体观念和群众观点，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贡献力量。

五、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改造世界观。“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因此，教师必须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在当前，特别要学习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改造世界观，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必须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南景

1975-03 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搞清楚什么是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为什么必须限制它和怎样限制它，这对于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中，消费品的分配基本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种分配原则，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不是按照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价值进行分配，不具有剥削和被剥削关系的性质，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相比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所谓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说，它所实行的仍然是调节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按照这一原则，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关系上的平等，在消费品分配方面表现为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平等。由于劳动者在体力强弱、文化技术水平高低、赡养的人口多少等方面各不相同，按劳分配的原则给予劳动者的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来说，必然在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上带来实际上的不平等。尽管这种不平等同旧社会的阶级不平等有着不同的性质，但是，"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集中表现为不平等的分配等级制度。按劳分配要求以劳动作为分配尺度，它把各类劳动者按劳动上的差别（例如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与轻易劳动，等等）区别开来，从而把占有消费品份额上的差别区别开来，这样，就需要采取一定形式的分配等级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在农村是工分制）。工资等级制度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那里，它把劳动力当作商品，按照它的价值大小，分成不同的等级，“按质论价”地进行买卖。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工资也不是劳动力的价格，但是，按劳分配仍然沿袭着资本主义工资等级制这种旧的形式，并通过它来反映出劳动者之间在劳动和工资方面的差别性，就这一点来说，同旧社会并没有多少差别。

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反映和维护了旧的劳动分工和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工作能力不同以及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不同，是和旧的劳动分工和三大差别的存在直接相联系的。由于按劳分配只把每个人当做劳动者来对待，只承认不同劳动者在提供劳动量上的差别，而不管这些差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它必然会在工人与农民之间，尤其是一部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造成在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的明显不平等。按劳分配就它反映并维护旧的劳动分工这一点来说，和旧社会也没有多少差别。

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实质上承认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文化、技术和经验等等属于他个人所有，承认熟练的劳动者应该获得更多的报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原则。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把生产资料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现象，但并没有消除千百年来遗留在人们头脑里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劳动仍然被许多人当

作一种谋取个人生活资料的手段。而按劳分配恰恰在事实上承认了熟练劳动是属于个人私有的。这一点和旧社会同样没有多少差别。

按劳分配的上述种种弊病，对于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痕迹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是，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必然成为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再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按劳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扩大，必然造成消费品分配方面等级差别的扩大和不平等的加剧，产生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现象。恩格斯在以原始公社的解体为例，阐明分配上的差别和阶级差别之间的内在联系时，明确指出：“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片面强调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必然性”、“合理性”，把它绝对化和凝固化，看不到分配上的不平等必然会产生阶级分化，不是加以必要的限制并逐步创造消灭它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是巩固、扩大、强化它，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下列社会现象：在一端，一小部分人凭借自己在社会分工、生产技术和工作能力等方面的某种有利条件，在分配上通过合法的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侵吞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在思想上政治上蜕化变质，同劳动人民处于利益尖锐对立的地位；在另一端，大部分人所得的工资收入却只能维持或难于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然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按劳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扩大化，必然反过来影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使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定的分配方式总是从属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既然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末它就不可能仅仅局限在分配领域内发生作用，

恰恰相反，它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列宁曾经多次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又说："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社会主义社会还实行商品货币制度。因此，在分配上占有大量商品、货币的某些人，就会进而在交换领域以至生产领域，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牟取私利，发财致富，使资本主义的活动猖獗起来。例如"以物易物"、"走后门"等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的资本主义活动，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制度，破坏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流通，瓦解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又如，有少数掌握大量商品和货币的人，就会进行投机倒把，放高利贷，开地下工厂，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历史现象就会重演。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也就会有少数人蜕变为富农、高利贷者和工厂主，即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所有制就会蜕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

按劳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扩大化，必然会造成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泛滥，使一部分工人、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资产阶级化。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革命队伍中少数分子出现资产阶级化的现象，其重要根源之一，正是在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也就不可避免地"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种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实质就是劳动私有观念，即从金钱关系和用雇佣观念看待革命工作，"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对于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不是限制它而是强化它，那么，作为它的观念形态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利己主义、等级观念、名利思想、特权思想等等，就会泛滥起来，到处和无产阶级争夺思想阵地，腐蚀无产阶级队伍

中的意志薄弱者。其结果，在工人中，就会出现象列宁所说的“坚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继续用旧眼光看苏维埃国家（替‘它’做的工作要少些，坏些，从‘它’那里捞的钱要多些）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在党员中，就会出现一些“徒有其名的”，“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在机关工作人员中，就会出现脱离群众、轻视劳动、当官做老爷，搞特殊化的人。发展下去，他们就会从生活方式到政治思想上完全资产阶级化，完全堕落成为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今天苏联已经发生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事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后，大搞物质刺激，极力扩大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和特权阶层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大搞商品货币经济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大肆泛滥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因而大大加剧了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新资产阶级分子是苏修叛徒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而苏修叛徒集团正是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代表。

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然会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但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大量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决定的因素是党和国家实行什么样的路线。

多年来，我们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同刘少奇、林彪一伙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我们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开展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批判，采取若干措施对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某些限制，例如，逐步缩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工人、农民之间的工资差别，实行公费医疗，合作医疗，发展其它的集体福利事业等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农商学兵坚持五·七道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这一切，有利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利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有力地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无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措施，刘少奇、林彪一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别有用心地污蔑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批判。在反革命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中，林彪反党集团疯狂攻击我国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是什么"变相受剥削"。林彪还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那套"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黑货奉为至宝，在他的黑笔记中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这清楚地表明，林彪反党集团紧步苏修的后尘，企图用高官厚禄，用几个臭钱，在党员、工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培植和收买一小部分人，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从反面证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更加激发起革命人民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坚持缩小工资差别。"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有它的历史作用，现在还不能取消；但是，必须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对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恰当的限制，"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宝贵历史经验，必须继续坚持这样做。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事物，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也必须满腔热情地大力支持和扶植。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从根本上说，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搞清无产阶级

专政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由于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由于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因此体现资产阶级法权的“等价交换”原则、修正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很容易侵入一些人的头脑，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警惕，任其泛滥，那么一些人就会在所谓“等价交换”的原则里面打转转，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按酬付劳”，“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就会被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刺激起资产阶级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最后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因此，在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中，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苦岁月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五次反革命围剿，消灭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美帝支持下的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这些伟大胜利是怎样得来的？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靠革命精神的鼓励。今天我们肩负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一切革命同志，不管职位高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抵制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都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发扬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讲艰苦奋斗，讲为人民服务，讲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讲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而不讲什么“物质刺激”。总之，“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逐步消灭三大差别

齐力　史学青

1975-03　广西师院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谈到资产阶级法权时，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搞清楚存在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这三大差别问题，认识三大差别产生和消灭的过程，看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限制、缩小还是扩大、强化三大差别，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正确对待三大差别，对于我们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三大差别也是这样，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上产生，也必将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上消灭。

恩格斯指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只有共同协作，共同劳动。劳动所得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没有剩余产品，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那时候没有分工，没有阶级划分，当然也就没有三大差别。从原始社会后期到奴隶社会形成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始的采集和狩猎向农业和畜牧业过渡，出现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接着，由于纺织业，轮制陶业和原始冶铜业的出现，需要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劳动，因而又出现了手

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形成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分工的出现产生了交换。“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手工业需要自己的一些生产基地，产品交换也形成了一些集散地，于是产生了最初的城市，出现了城乡差别。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随着这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和发展，使人类社会逐步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产生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商人、高利贷者占据城市，剥削乡村，形成了城乡对立。由此可见，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场所，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发展生产力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也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在原始社会，脑力劳动还处于萌芽状态，它和体力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到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剩余产品，使少数人不必直接从事体力劳动也可以维持生活。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劳动，过着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专门从事奴隶制国家事务的管理和文化、科学、艺术活动。于是，又出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

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产生于原始社会走向崩溃、奴隶社会开始出现时代。到了封建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不断激化，使这种对立更加发展和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资产阶级为了强化和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把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推向了顶峰。他们拼命扩大城市，集中了所有的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文化，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起来，乡村则成为资产阶级推销商品，榨取高额利润，获得廉价劳动力和掠夺工业原料的场所，“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资产阶级残酷地掠夺和剥削乡村农民，加速了农民的阶级

分化，加剧了城乡的尖锐对立。他们还豢养了一批精神贵族，专门为其反动统治服务，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也达到了顶点。资产阶级还通过法律的形式，把私有制和三大对立固定下来，加以神圣化，从而把三大对立和维护这些对立的资产阶级法权，作为统治和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然而，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尖锐对立，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产阶级在给自己准备了灭亡条件的同时，也给消灭这些对立准备了物质前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消除了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不断贯彻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必将最后消灭三大差别，消灭阶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二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消失，但三大差别仍然存在。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除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对立的经济基础，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相互支援，共同促进和团结互助的关系，是与资本主义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农村，脑力劳动剥削、统治体力劳动，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这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工业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农业主要是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工业的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与大工业相联系的工人和长期从事小生产走上集体化道路不久的农民在觉悟程度上也有不同，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城市和农村也有差别。脑力劳动者参加体力劳动还不普遍，其中一些知识分子还存在较多的资产阶级思想。体力劳动者由于历史原因，目前的文化水平一般还比较低。这些差别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这一重要指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三大差别的根源。

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生产力极大发展，造成足以消灭三大差别的物质条件。现阶段我国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集体单位所有，不象全民所有制那样，由国家统一调配。这种差别，从根本上说来，是由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现代工业中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集体所有制同目前农业中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力相适应。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差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差别存在的经济条件。要消灭这些差别，就要高度发展生产力，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但从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集体所有制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因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将长期存在。

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我国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了统治地位。特别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了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荡涤了社会上的污泥浊水，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国际帝国主义、修

正主义影响还存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他们的反动腐朽思想影响还很强大，旧的习惯势力也还很强大。这些都是三大差别存在和可能扩大的政治思想根源。它们每日每时都在侵蚀人们的头脑。社会上一部分人旧的思想意识还很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旧的知识分子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还根深蒂固，他们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思想意识形态是从经济基础产生的，反过来又起维护经济基础的作用。旧思想的存在必然维护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影响着三大差别的消灭。这种旧思想的改造和克服，需要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因此，三大差别将长期存在。

列宁指出：“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的三大差别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

由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决定了我国现在还需要进行商品交换。作为商品交换，它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是为了促进工农业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不同了，但是，商品交换毕竟是私有制的产物，是旧社会的痕迹。因此，在我们的国营企业中有的人就利用商品交换套购倒卖，走后门，甚至发展到破坏国营企业生产计划，改变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城市中还有的人利用农村对工业品的需要，进行投机倒把，甚至组织地下工厂和包工队，牟取暴利。农村一部分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也与城市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串通，进行资本主义活动。对此，如不及时揭露、批判和打击，资本主义就会泛滥成灾，社会主义经济就有被瓦解的危险。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之前，在我国目前还存在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的情况下，某些集体单位为了片面追求本单位的利益，不服从国家种植和收购征购计划，搞非法协作，自由买卖，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泛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目前农村还存在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个体经济的残余，农民也就不可避免地保留者小生产者所固有的某些特点。尤其是“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这种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必然严重地影响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必然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矛盾。如果不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集体经济就可能变质，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在农村复辟。

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知识分子主要是从事脑力工作，如果不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认真改造世界观，在头脑里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而是贪图安逸，追求享受，就会脱离工农群众，成为官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蜕化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特别是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还很严重，他们不愿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种人，如果发展下去，就会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反映三大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如不加以限制，任其扩大，那就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少数人在分配方面，就会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合法的和大量非法的手段聚积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权夺利的思想就会因此泛滥起来。这样，在党员、工人、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就会产生少数完全背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压迫和剥

削劳动人民。经济上的暴发户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就会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如不限制、缩小和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及反映三大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工业上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在农业上搞资本主义经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在脑力劳动者中搞高工资、高津贴、高稿酬，致使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的工资相差上百倍甚至几百倍，从而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断扩大，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这一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限制、缩小三大差别，还是强化和扩大三大差别，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为了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三大差别，逐步缩小、消灭三大差别。革命导师列宁指出：“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最后消灭阶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革命措施。如：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缩小工资差别，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决走五七道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工农兵上大学，培养赤脚医生等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

春笋，层出不穷，茁壮成长。所有这些，对于逐步消灭三大差别，“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一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巩固、强化、扩大三大差别。因而他们极端仇恨我国无产阶级限制三大差别的措施，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刘少奇、林彪一伙疯狂反对我党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他们极力鼓吹“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大砍合作社，大刮单干风，公然叫嚷“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污蔑“农民缺吃少穿”，煽动农民“分光吃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扩大城乡差别，破坏工农联盟，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照此办理，其结果必然是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倾家荡产，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旧中国那种悲惨的情景又会在农村重演。

刘少奇、林彪一伙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狂热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胡说什么物质刺激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污蔑工人是“变相受剥削”，煽动青年工人闹工资待遇，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挑拨工人内部团结，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如果照这样去做，工人思想就要受到腐蚀，国营企业的性质就要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要遭到破坏，这是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所梦寐以求的那样一种局面。

刘少奇、林彪一伙拼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肆贩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孟之道，污蔑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干部走五七道路是“变相失业”，鼓动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当官做老爷，引诱青年走“读书做官”的邪路，变成新的精神贵族。如果这样下去，其结果，势必要扩大三大差别，出现一批官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形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新的社会基础，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会全面复辟。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三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的这一指示，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出发，指明了共产党人对待三大差别的正确态度以及消灭三大差别的根本途径。

无产阶级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每一个胜利都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继续革命的起点。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和交换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这一指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伟大学说，进一步指明了限制、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重要任务。

列宁在谈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时指出："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就告诉我们，要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具备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缩小、消灭三大差别，必须高速度发展生产。

为了高速度发展生产，我们要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发挥无产阶级专政领导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速生产的发展。为了高速度发展生产，我们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农业放在首位，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把工业转到为农业服务的轨道上来。列宁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

加全国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了，农业机械化提到很高的水平，“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消灭三大差别的物质前提就具备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缩小、消灭三大差别，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我们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我们要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和群众参加管理，使干部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使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发展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同志式关系。在分配关系方面，我们要逐步缩小工资差别。这样，生产关系方面的差别逐步消失，三大差别的经济条件也就逐步消失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缩小、消灭三大差别，必须极大地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

为了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就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为了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就要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进行教育革命，逐步做到劳动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为此，就应当坚决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坚持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这样做，才能做到缩小和逐步消灭三大差别。

为了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就要大力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提倡共产主义精神。革命导师列宁高度赞扬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一种共产主义事物，是伟大的创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树立共产主义思想，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要象白求恩、张思德那样，不图名，不图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我们要大力支持和积极扶植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促进派。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象初升的太阳，还很年轻，大有希望。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最后消灭三大差别，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朝阳农学院委员会

1975-05-01　红旗

我们朝阳农学院，校址在距离朝阳镇几十里远的两处山沟里。设有农学、果林、畜牧兽医、农田水利等专业。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我们在农村办学，坚持学生“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农民。从一九七〇年建院以来，通过办短期班，已为社队培训近万名农业生产技术骨干。长期班学生已毕业一百六十七名，绝大部分回到社队当农民。我们这样办学，贫下中农非常支持，他们说：“农大毕业当农民，太可咱们的心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我们联系教育革命实践，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深深体会到，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要不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斗争。我们的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院发展壮大的过程，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过程。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是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工具的根本标志。早在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切切实实地落实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一个伟大历史任务，就是要逐步造成使资产阶

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可是长期以来，教育这块阵地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要拆掉这个滋生资产阶级的温床，使学校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熔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我们一些同志没有搞清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懂得学校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根本道理，所以也就没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却一拍即合，积极执行。资产阶级农业大学美其名曰培养“农学家”、“农艺师”什么的。为了“区别”于资产阶级学校，我院前身沈阳农学院就冠之以“红色”二字，也就是培养“红色农学家”之类，好象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然。由于仍然鼓吹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一套，结果只能使工农子弟仍然朝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路上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有力地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深入农村进行调查，许多事实使我们吃惊。贫下中农说：“沈农毕业的学生架子大，本领小，农村不愿呆，农活干不了。”的确如此，办学十几年，沈农毕业了七千多人，真正志愿到农村干社会主义农业的微乎其微。来自农村的贫下中农子弟，经过大学四年教育，有的变得同工农格格不入，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正象列宁在批判旧教育时所指出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广大工农气愤地说：“学农不爱农、不务农，这样的大学早点黄了好！”

总结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提高了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路线的自觉性。我们认识到旧农业大学走过的路，无论如何不能再走了。农业大学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就必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农民。一九七〇年，我们搬到农村搞斗批改，迈开了教育革命的第一步。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我们办了“社来社去”

的短训班，即学生从社队农民中来，毕业后再回到社队当农民。后来又办三年制，仍然坚持“社来社去”。

农业大学培养新农民，是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许多来自旧的传统观念的攻击与非难。有的说“这是毁灭教育”，有的说，“念了大学当农民太可惜了！”这些论调对不对呢？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旧大学培养的学生，轻视工农，轻视农村，轻视体力劳动。培养这样的学生，只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这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农业大学培养新农民，造了“学而优则仕”这个剥削阶级旧传统的反，拆毁了通过读书爬上特权阶层的阶梯，为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搭上了桥梁，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需要的。如果说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工农中去是“毁灭教育”，那毁灭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不破不立。”资产阶级教育的毁灭，意味着无产阶级教育的新生，这是值得庆贺的。“社来社去”的大学毕业生，不论是社会主义觉悟，还是运用农业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比旧农业大学的毕业生高得多。有一个学生回公社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现有人搞什么“产量固定到组，多产多分”，走回头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一个老贫农在我校学了一年后，继续革命的觉悟更高了，在棉田被雹子打得平均每株不到一个桃的情况下，由于把所学的科学理论同丰富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采取有效措施，仍使皮棉亩产达到三十斤。这些事例说明，大学由培养精神贵族变为培养新工人、新农民，为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开拓了广阔前景。这有什么“可惜”？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啊！

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

我们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仍然沿袭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是不行的。旧瓶可以装新酒，但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不仅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会把工农子弟变成资产阶级接班人。这是因为，封建社会几千年、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形成的这一整套教育制度、方针和方法，从招生、考试到分配，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方式，都体现着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志，都是为造就剥削阶级的精神贵族和奴仆服务的。它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手段。继承它、沿袭它，就意味着继续在教育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一伙在教育方面提出学校应当“基本照旧”。旧农业大学就是按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办在大城市，把学生关在大院里，大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使教育严重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使学生受到严重腐蚀的。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

毛主席不但为我们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战略任务，而且在光辉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等一系列指示中，指明了实现这一任务的具体道路。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就是要老老实实地走毛主席指引的办学道路。

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指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是错误的，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多少年来，不管什么大学，都一窝蜂似的挤在城里，农业大学也挤进去，好象大学非办在城里不行。毛主席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指示信中，表扬了他们学校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的做法。这不单是个办学地点问题，而是为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创造条件的伟大战略布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不仅把学校搬到了农村，而且在全地区六个县的重点公社建立了科教基点。这样一

来，课堂大了，老师多了，科研课题也多了，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和改造原有教师队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学校办在农村，仅仅为改造旧学校提供了条件，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还必须从招生开始就要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位。学校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决不能单纯地理解成为提高生产力服务。重要的问题是培养的学生愿不愿意回到工农中去，回去了，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招生，把立志当一辈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作为录取新生的主要标准。学生到学校来不带户口。他们认为自己还是生产队的人，生产队也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社员。但是，能不能认为经过选拔的农民学员进校后就没有任何思想问题了呢？不能。学校不是真空。社会上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一定要在学员的思想上反映出来。何况办这种培养新农民的大学是新生事物，学生产生各种想法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这就必须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帮助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他们能够扎根农村干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士。同时也教育他们努力掌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做出贡献。在教学上，我们打破旧大学“三中心”的框框，实行“几上几下”。“上”，就是学生在学校结合科研、生产任务进行学习，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下”，就是回到选送社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经受全面锻炼。在“几上几下”过程中，始终贯穿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普及与提高结合，教学与科研、生产结合。农学院既是学校，又是科研所，也是生产队。学员，又是实验员，又是工人，又是农民。这样做，工人、贫下中农成为教育革命的主力军，打破了知识分子对教育阵地独霸的一统天下；这样做，按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学，打破了唯心论、形而上学对教学的长期统治。随着学生回队实践的时间逐年增多，到毕业时便自然过渡回社队。

正因为在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上采取了这样一系列的改革，才使从贫下中农中来的学生能够回到贫下中农中去，而且能够坚持乡村干社会主义。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搞什么“智育第一”、“关门办学”那一套，学生就难以回去，回去了也不能扎根，或者因为有技术而“拿把”，贫下中农指望不上。我院第一届毕业生回去当农民，许多人遇到了旧习惯势力的围攻。有的说：“大学毕业不当干部，算那号大学生。”“大学毕业当农民有啥出息！”有的家里给他们在城里找了工作。但这些都被他们顶住了。他们在社队，“一点不贪污地”把知识贡献给贫下中农，誓叫家乡变大寨。所以，实行学生“社来社去”，单从招生、分配上作简单规定是不行的，必须对农业大学的整个教学进行根本的改造。

关键在党委坚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学校要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根本的一条，是党委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教育革命实践，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党委“一班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上糊涂，工作上就会犯错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农业大学也有党委组织，但让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提高了我们看书学习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中，我们坚持“学、批、干”。即：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扎扎实实地干社会主义，把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落到实处。

回顾五年来的办学过程，每前进一步都是战斗。大的斗争有三次。第一个回合，是学校搬到农村后，过了半年，刮起了一股回城风。有人说什么办学不决定

于地点。这是办学路线上的分歧。我们认为农大扎根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的需要，是农业大学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一个起点。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农业生产，而要培养新农民，那岂不成了空话？我们组织全校师生重温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指示信，大家发出了“举抗大旗，走共大路，誓叫农大变共大”的钢铁誓言，进一步坚定了在农村办学的决心。

第二个回合是在一九七二年。有人说，学校培养“社来社去”的农民大学生“超越了农村的现实需要”，是“极左路线的产物”，甚至叫党委检查。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在我院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深入农村调查，贫下中农热烈欢迎“社来社去”。他们说，早就该这么办。农业大学毕业当农民，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毛主席说：“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农大不面向农村，不培养农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那种对学农不下乡、不务农的旧大学不气愤，却对大学培养新农民横加指责的人，实际上是主张倒退到修正主义办学道路上去。在省委领导下，我们带领师生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坚决顶住了这股风。

第三个回合，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出现了水利专业“特殊论”。有人提出：水利专业是面向全省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县以上”，不能搞“社来社去”。我们农学院的水利专业虽有特殊性，但它的服务基点同农学专业一样，依然在农村，在社队。毕业生回到农村社队，也是完全应该的。“特殊论”，说穿了是不赞成大学生回到工农中去，为“读书做官“开一个后门。我们借批林批孔的强劲东风，对“特殊论”进行分析，提高了师生的革命觉悟。水利专业学员纷纷表示决裂旧观念，誓做新农民。

两条路线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学校党委是无产阶级在学校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战斗指挥部，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革命师生，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只有这样，才能当社会上刮起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邪风时，顶得住，不迷航，不断夺取教育革命的胜利。

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几年来，我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一点经验，但还很不成熟，还要经受斗争的检验，逐步完善。艰苦的斗争还在后头。我们决心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

钟实

1975-05-01　红旗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教育战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重要战线。我们只有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朝阳农学院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上，开展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无比的战略任务。作为上层建筑重要部门的教育战线必须为完成这一任务而斗争。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为在教育阵地上逐步铲除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指明了道路。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极力推行他们的一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反对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教育学生，反对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而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腐蚀学生，鼓吹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用知识私有的观念引诱他们把知识当成商品，作为捞取个人名利的资本。刘少奇一伙反对大学毕业生当劳动者，做工人、农民，鼓吹"读书做官"，把上大学、留城市、当干部制度化，致使许多青年经过大学几年学习变得轻视工农，嫌弃农村，厌恶体力劳动，成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林彪也用"耕馁学禄"的孔孟之道毒害青年，疯狂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刘少奇、林彪一类，都是妄图强化资产阶级法权，

扩大三大差别，扩大他们的社会基础，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是要彻底摧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肃清它的影响，从根本上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改造教育阵地，把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教育革命中，朝阳农学院认真实践了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初步创造出一套办好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经验。他们把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放在第一位，用马列主义教育学生，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他们到农村办学；根据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实行分散办学；实行“社来社去”；教育学生回到农村后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敢于批判资本主义。他们这样做，使大学教育能够为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他们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促进了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有利于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他们的学生毕业后，自觉自愿地当农民，这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勇敢挑战。朝阳农学院的办学道路不但对农业大学适用，而且对于整个教育战线如何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当前，教育战线形势大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新生事物，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得到了巩固，正在茁壮成长。革命师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在教育阵地上，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加强，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削弱。但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斗争的实质，仍然是谁专谁的政的问题。由于学校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剥削阶级的传统偏见很深，在许多方面，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同时，社会上还存在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的指示，还没有完全落实。在这种形势下，认真学习朝阳农学院那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不是很有必要吗？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时候，各个学校都应该象朝阳农学院那样，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出发，认真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不断创造自己的新鲜经验，使我们的教育革命再向前跨进一步，努力把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是多方面的，要抓住它的精神实质，要结合各类院校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具体情况，从方向、路线上学习。“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后当农民，正是毛主席指示的“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的主要之点。有的人也说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却竭力回避学生从工农中来，回到工农中去。这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不愿意走毛主席倡导的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另一方面，“社来社去”，又不是朝阳农学院经验的全部。孤立地学这一条，把招生、分配制度上的改革和整个教育革命割裂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如果还是搞关门办学，固守高楼深院，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课堂搬家，不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办学，不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方法，不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是不可能做到学生从工农中来，又回到工农中去，达到无产阶级的培养目标的。

有人担心，学习和推广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会“使知识分子队伍后继无人”将“影响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首先要看说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队伍。如果说的是那种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样做，的确将使它后继无人，这正是我们教育革命要达到的一个目的。至于说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那么，这样做，促进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紧密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紧密结合，必将大大加速这个宏大部队的建设。从历史上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曾经对科学文化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剥削阶级极力扩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

差别和对立，则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这种差别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我们不去逐步缩小它，而是维护它，扩大它，那么，不但是在增添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而且也会不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生产实践是科学的源泉，只有与生产密切结合，科学研究才能获得强大生命力。大量事实证明，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脱离工农，只靠少数知识分子关在高楼深院里闭门研究，很难获得什么成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壮大起来的科学文化队伍，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大学毕业生回到工农中去，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必将加速这支科学文化新军的成长与提高，必将推动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至于科学文化部门需要增加一些专业人员，完全可以从工农中选拔，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由大学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工农。同时，专业队伍也要进一步同广大工农群众的科学文化队伍结合，深入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才能为攀登科学文化高峰作出更大贡献。那种认为大学生回到工农中去就将妨碍科学文化发展的观点，是轻视工农，轻视实践，是恩格斯早已批判过的杜林那种妄图把拉车夫与建筑师的职业永久化的资产阶级观点，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科学文化阵地的垄断。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鲁迅说："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那些保守派"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象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这段话说得多么深刻！朝阳农学院的教育革命，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学习和推广朝阳农学院的经验，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一步，必将是一场更大范围的更加尖锐的斗争。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热情欢迎这一宝贵经验。一小撮阶级敌人，无疑地极端仇视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要跳出来加以疯狂攻击和反对。我们队伍内部的一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也提出各种非议，

特别是少数仍然想把上大学作为向上爬的阶梯的人，很容易受阶级敌人的挑动，充当他们的传声筒。那些各式各样阻挠改革的“口实”，也“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但唱这种反调的，多半是担心象朝阳农学院那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恐怕于自己不利”的人。因此，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的过程，不能不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过程，想不经过斗争而推进教育革命，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曾指示省、地、县委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党委要管好教育，必须首先自己学好、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切实解决好教育战线出现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解决好各行各业都来关心和参加教育革命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造就出更多的能够自觉地为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工科院校要为工业生产服务——山东工学院的调查报告

1975-05-01　红旗

山东工学院为了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教育革命的过程中，把面向地方工业生产，坚持为中小工业服务为主，作为开门办学的一条重要途径。近几年来，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地方工科院校要为工业生产服务，就必然涉及到要不要为中小工业服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山东工学院党委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斗争过程的。

早在一九五八年的教改中，这个学校就曾有过为地方工业服务的设想。但是，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干扰、破坏，这种设想未能实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党委对旧教育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兵群众的实质和危害有了一定的认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在一九七〇年，即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学之前，组织干部、教师进行了一次比较广泛的社会调查。通过调查，他们认识到，地方工科院校面向中小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建国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小工业发展很快。在山东，中小工业占整个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产值占百分之七、八十。这些中小工业多数担负着支农任务，尤其是地、县以下的许多中小工厂，更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从发展的观点看，现在的中小工业将来也会变成大工业。中小工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热处理专业调查发现，全省有五千多名从事热处理的人员，只有七百多人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还有四千多人虽然能够进行一般操作，但缺乏理论知识，因而影响了工作水平的提高。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在中小工厂，急需培养和提高。中小工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要求地方工科院校在向大工厂开门的同时，要更多地考虑中小工厂的需要。

但是，有些人却从陈腐的等级观念出发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工业企业。他们瞧不起中小工业，说它们是“又土又穷”，“向中小厂开门办学，不符合大学的方向”。工学院党委认为，我们讲方向，首先要讲政治方向。技术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技术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社会主义的大工业和中小工业，只要它们认真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办企业路线，尽管它们在规模上、分工上有所不同，但却没有贵贱之分。作为地方工科院校，如果对大量存在和迅速发展的中小工业漠不关心，那它就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正确的方向了。

为了逐步适应整个工业特别是中小工业日益增长的需要，工科院校必须冲破旧大学的框框，使教学从高楼深院里解放出来。这是为工人群众掌握现代工业技术，加速劳动人民知识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短训班紧密结合中小工厂生产中急需解决的课题组织教学，灵活多样，时间短，收效快，是多快好省地提高工业技术水平的一个很好的办学方式。山东工学院自一九七一年以来，举办为地方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类短训班一百五十四期。仅三年的时间，就培养学员一万一千二百二十多人，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几年这个学校毕业生的总和还要多。机械制图短训班，从济南一些小厂招收了一百零三名学员，经过一个半月的学习，大部分回厂后担任了制图测绘工作，有些成为技术骨干。在数字程序控制线切割机短训班上，来自济南、淄博、德州、菏泽等四个地、市的二十多名学员，一边学习理论，一边进行试制，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不仅掌握了程控技术理论，而且试制成功五台程控机，结业后带回本地区作为样机推广。

开始的短训班，是根据个别单位的需要一个个举办的。尽管短训班象滚雪球一样地发展起来，广大中小厂和人民公社仍然觉得“不解渴”。怎么办呢？学校党委主动同省和地区有关工业部门协商研究，在他们的支持下，有计划地在全省分

地区举办各类专业短训班，由学校派出教师，提供教材，帮助地、县训练技术师资，再通过他们到基层办学。几年来，热处理、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已分别为九个地、市举办了短训班；内燃机专业也在一些地、县举办了短训班。按照现在的速度，这几个专业可在最近几年内按地、县把急待训练的技术骨干轮训一遍。此外，他们还积极帮助工厂举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帮助地、县举办“五·七”大学，并从十个地、市的工厂中招收了八十多名学员，专门为厂办大学培养数学、力学、制图、机械设计基础等方面的师资。这样，就可以促进在全省范围内逐步形成一个工业技术教育网。

普通班的大部分专业克服了过去那种只求“大、洋、全”的倾向，在专业方向、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作了相应的改革。学员进校后，一、二年级有二分之一的时间，直接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学工，学农，学军，进行现场教学；三年级有三分之二时间到中小厂开门办学和进行毕业前的综合实践锻炼。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也都注意联系地方工农业生产实际，考虑到中小厂的要求。汽轮机锅炉专业过去的教学内容只适合大电厂的需要，而对中小厂大量需要的工业锅炉很少考虑。这个专业的师生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了解到工业锅炉生产的现状和需要，立即修改了原来的教学计划，增设了工业锅炉内容。结合典型任务组织教学，是改革普通班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铸造专业了解到潍坊发动机厂急需一种高效混砂机，就以这种混砂机的设计作为典型任务组织教学，既帮助工厂解决了生产中的问题，也较好地完成了理论教学任务。现在，山东工学院已同七十多个工厂挂了钩，扩大了校外教学基地。工厂把教育革命当作自己份内的事，厂校关系越来越密切。去年一年，山东工学院绝大部分师生，分赴挂钩厂和其他中小厂，结合教学，参加和完成的工业设计、试制项目达三百个。通过这些初步改革，学校党委认识到：只有使各个教学环节，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

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学员在校学习期间，摆脱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的束缚，进行生动活泼的学习，才不至于把朝气蓬勃的工农子弟培养成书呆子。

但是，有些被旧学校“正规化”束缚着头脑的人却不赞成这么做，说什么大学是搞“提高”的，这样搞法“不正规”，“哪象个大学样子”。这种论调曾迷惑了一些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师生批判了林彪和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并结合开门办学过程中的斗争实际，对这种思想和其他因循守旧的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使更多的人坚定了改造旧大学的信心。广大师生认识到，怎样看待正规和不正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资产阶级认为那种关门办学的学院式教育“最正规”，但是，无产阶级就是要打破这种把人们训练成资产阶级奴仆的所谓“正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工科大学也是很讲究“正规”、很强调“提高”的，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学的是工，却缺少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实际本领并不多。他们学得一些书本知识，就自以为高人一等，鄙薄生产劳动，一心向往当工程师。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执行“智育第一”、“技术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搞关门“提高”，背离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提高”到资产阶级的方向上去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我们的工科院校并不是不要提高，而是要不断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关门提高，不是把学生“提高”到资产阶级那里去，而是要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提高，把工农兵学员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把面向中小工厂普及科学技术的任务放在重要位置，我们的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中小工业有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专门的科学研究才能解决。坚持为中小厂服务为主，既能提高教学质量，又能提高科研水平，一句话，是完全能够搞好提高的。这个学校的师生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科研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山东地方工业生产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中，选择若干研究项目，经过教师、学生和工人的共同努力，突破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技术问题。如超高压输电线路半导

体继电保护成套装置、1.5 瓩轻型发电机组等，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推广。厂校合作完成的高铝耐热铸铁、密齿端铣刀、精锻锥齿轮和半封闭250瓦拖拉机用发电机等项目已在生产中应用。几年来，这个学校承担的科研项目，有百分之六十是直接为中小工业和农业服务的。这些项目大都是与中小厂的产品和技术改造的方向对口，与学校的专业对口，不但使一些中小工厂获得了先进技术武装，也有力地促进了专业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山东工学院党委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在开门办学中注意克服那种单纯从专业课教学的需要出发，忽视政治的错误倾向。他们除根据一定的政治任务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以外，还特别注意引导结合教学任务下厂的师生，和工人群众一同参加生产劳动，一同批判资产阶级，使广大师生在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不断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和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许多中小工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了“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精神，同修正主义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这种革命精神使师生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进一步激发了他们为革命而教和为革命而学的积极性。

一九七四年八月，这个学校的六百五十多名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绝大多数分配到中小工厂。许多工厂反映，这批毕业生同旧大学的毕业生相比，有显著的不同。从政治思想上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较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敢于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观念较少，较多地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们不因为上了大学就高人一等，而是愿意回到基层去，回到工人中去。他们较少保守思想，勇于实践，敢于创新，有奋发图强、改变地方工业面貌的决心和干劲。机床制造专业一位工人学员毕业回厂后，刻苦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参加劳动，加班最多，但是从来不计报酬。厂里要他脱产当干部，他仍坚持当工人。工人们称赞他上了三年大学，

工人阶级的本色没有变。从业务水平上看，这批学生既能动口又能动手，具有一定的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电机制造专业的八十一名工农兵学员，在第二学年就参加了一项重要的电机设计工作。在工人和教师的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天的奋战，每个学员拿出了一至三个设计方案。经过有关部门举行的大型审查答辩会，又从中选出了一部分方案进行试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设计任务。这些都是旧大学无法比拟的。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过去这个学校的不少教师，只注重书本理论，轻视实践经验，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格格不入。开门办学初期，思想阻力较大。学校党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注意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引导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进行业务上的再学习，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个教研室副主任，过去专从书本里找研究题目，一心想成名成家。在开门办学的实践中，他有了广泛接触工农群众的机会，加强了思想改造，树立了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思想。三年来，他参加办短训班，跑了全省不少地区。一些中小工厂要求他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他从不推脱，而是满腔热情地和工人一起并肩战斗。广大教师还通过各种形式办学，初步扭转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局面，开始树立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增强了感性知识，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教学本领。开门办学，也促进了教师队伍成分的变化。凡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进行的教学活动，都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工人担任教学工作。同时，还聘请了一部分工人到校内担任专职教师。几年来，这个学校从挂钩厂中聘请了二百三十八名专职和兼职教师，给教师队伍掺了沙子，这对用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学校，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东工学院的党委和革命师生员工决心以朝阳农学院为榜样，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使学校更好地适应社会主

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调查组

苏修教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

1975-05-19　教育革命通讯

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明确地指出：必须“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蜕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苏修现行的政治路线，决定苏修教育必然成为他们维护资产阶级专政、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工具。苏修利用教育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事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反面教材。揭露它，批判它，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对于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于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都是有益的。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垄断教育领导大权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竭力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窃据了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关、宣传机构和高等学校等方面的领导职位，把教育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教育的控制，是通过一大批顶着“共产党员”帽子，披着“专家”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来实现的。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曾宣称：“苏联工人阶级要同我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一道起领导作用”。一个苏修御用文人说得更加露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就是为了在历史

舞台上让位给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成为革命领导阶级”。苏修教育界的现状正是这样。

就拿苏修中央一级的教育界头目来说，他们有的既是苏修中央委员，又是具有院士、教授称号的资产阶级大学阀。一般高等学校执掌大权的校长、院长，非教授、博士之类人物就不能担任，连教研室主任也必须是“具有教授学衔或博士学位的人”担任。

为了进一步加强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对学校的统治，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一九七四年做出了《关于进一步改善科学干部和教育科学干部鉴定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其中规定：“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应由各主要科学部门的著名学者和专家组成”。苏修还相继成立了“高等学校委员会”、“综合大学委员会”和“高等学校校长委员会”等全国性的组织，研究什么“有根据地提出关于改进高校的教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专家的长远培养计划、他们的分配使用、提高科学教育干部的技能等问题”。戳穿来说，也就是研究如何培植出更符合苏修统治集团需要的人。这些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苏修精神贵族，即所谓“名教授”、“名博士”。

今日的苏修，从中央的教育领导机构到学校的各级领导机构中，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占统治地位，他们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的代理人。

卢布和权力——进入大学的通行证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实行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一九一八年八月，列宁为人民委员会起草的《关于苏俄高等学校的招生问题》决议中规定：“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取消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而侈谈什么“苏联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

等”，用形式上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来掩盖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及其子女垄断教育，在教育上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严酷现实。

苏修鼓吹考试面前人人自由，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虚伪论调，来竭力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上大学表面上靠的是什么“知识”、“分数”，而实际上却是依仗特权阶层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在金钱拜物教的苏修社会中，知识已完全成为一种商品。特权阶层有足够的金钱雇到私人教师为子女补习功课，保证他们的子女能应付高考而升入大学。苏修《文学报》透露，“根据去年在列宁格勒调查的材料，几乎有百分之六十的应届毕业生和三分之二被招收到高等学校里的人，都上这种预备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数学和物理方面求教于课外辅导教师。”上这种“补习班”、“预备班”和课外辅导都要付出昂贵的学费。据统计，私人授课的学费有的学一小时要花五个卢布，等于一般工人一天半的工资，有的多达七至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广大工农群众非常愤慨。一个农村青年到城里看见四处贴着私人补习功课的广告时，无限感慨地说：“城里的晚报上也充斥着同类广告”，“然而我们住在乡村的居民怎么办呢？”他对这种高考的卢布竞争十分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

在这个自称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招生考试中行贿之风真可谓发达至极！正像苏联《东方曙光报》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所披露的那样，一批中学生进大学各行贿一万至一万三千卢布。第比利斯市一家大工厂的厂长，花了一万三千卢布的巨款，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年工资的数目，买通第比利斯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和“教授”，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高等学府”。这种大做肮脏交易的事，在今天的苏修，屡见不鲜。

适应特权阶层垄断教育的需要，今日苏联替资产阶级子女解决入大学的“服务行业”、假造文凭的“工厂”和办假大学的“企业”以及各种营私舞弊的行当应

运而生，应有尽有。你要作弊吗？小抄影印卡片为你做好了一切准备，只要你用大量卢布买一套这种卡片，就能保证你考得好分数。你要雇人代你参加入学考试吗？雇工代考的“商号”就可以为你办理一切，只是考取后你得交五百卢布给“商号”老板。你想得到一张大学文凭吗？假大学可以用“快速教学”使你很快“大学毕业”，“文凭工厂”也有假文凭可买，代价是一千卢布。这一切都是以卢布为后盾的。分数、文凭、考试，全都变成了商品。

苏修《共青团真理报》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报道，有个叫做叶弗根尼•列文的中学生，因流氓犯罪被判处八年徒刑送去劳动教养。列文的父亲瓦西里（苏联公路建筑工程和公用机器制造部计划司的司长，部务委员会的委员）和母亲伊凡诺芙娜（苏联无线电工业部的首席专家）串通部长、莫斯科市法院和劳动教养营等有关部门，将判决改为五年徒刑并设法提前释放。列文的母亲又利用职权把列文安插到她所在部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指使“单位的几个社会组织领导人一起，给列文签署了一个优良的鉴定书”，并“接收他入了团”。这一对家长就这样“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不仅“把自己的犯罪的儿子从劳动教养营里救了出来”，而且将他安置在莫斯科无线电技术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学院学习。

这就是今天苏修教育的现实！列宁在揭露老沙皇时指出：“做工的无产者和种地的农民，无论在沙皇尼古拉的统治下，或者在共和国总统威尔逊的统治下，都没有可能上大学，科学和技术是为富人，为有产者服务的；资本主义只把文化给予少数人。”你看，苏修新沙皇同当年的老沙皇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区别吗？

高等学校——繁殖新资产阶级的温床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巩固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竭力鼓吹“智育第一”，驱使青年走“读书做官”的邪路，把他们培养成鄙视劳动、鄙视工农的精神贵族。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在苏修共青团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称："提高文化水平……进行体育锻炼等——所有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本。"他无耻地吆喝道："这些在青年时代赚来而以后又不断添加的资本，将终身为你服务。"他赤裸裸地鼓吹上大学就是为了捞取更多的"资本"。教育界的头目也跟着叫喊："高等院校中的主要东西是学习"，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国家最宝贵的一部分人"。一些御用学者甚至狂叫："成为社会主要生产力量的就是智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学得好，就可以"爬上官职"，就"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在今天的苏联，把知识当成私有财产，把掌握知识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当作走向暴发户的阶梯，把提高智育当作提高交换价值，抬高商品等级从而卖高价的现金交易，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公开反对劳动群众。"

他们还以"物质刺激"为诱饵，来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有个哲学博士写文章指出，为了使学生好好学习，应当在学习中实行物质刺激。他说："在学习中，应当有一定的、具体的刺激。如果一个人看不到他的学习有什么意思，他就以冷淡态度对待学习"。于是，五花八门的"学习刺激"在学校中也就应运而生了。苏联高等院校的高额助学金就是其中之一，学生能否获得助学金完全由考试成绩来确定，卢布成了刺激学生学习的动力。助学金按照不同的考试成绩分为不同的等级，有所谓"基本助学金"和"命名助学金"。此外，著有"优秀"科学论文的学生还可以获得一枚奖章，每枚奖章带有二百卢布的金币。这样的高额助学金，大大超过了广大工人农民的工资水平。苏联高薪阶层的高薪在学校的学习期间就已经扎下了根。

学位、学衔制度是高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苏修在高等学校大力推行学位、学衔制度，刺激学习“积极性”。获得学位的人就获得卢布与特权。一个院士的月薪加额外收入与普通工人相比，相差七十多倍。

列宁说过，“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苏修统治期间，大量地侵占了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通过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从高等学校这个温床上，不断地产生出来，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造成的严重恶果

今日的苏联，广大工农子女上了几年小学、中学或职业学校之后，只能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顺着高等学校这个升官发财的阶梯不断往上爬，从事“专家”、“领导”工作，世袭父母的统治地位。苏修通过教育把大批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输送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维护和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苏修教育制度是建立在严重的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推行这种教育制度，反过来必然要加深苏修社会的阶级对立，加剧苏修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

苏修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固然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但是苏修教育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加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和城乡对立，驱使青年读书做官、鄙视体力劳动，鄙视工农，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据一份对二十二所莫斯科学校进行的调查材料表明：当要求高年级的学生说明他们喜欢哪种职业并说明原因的时候，“三千多名被询问的学生中只有三十个人想成为从事生产的工人”。“在乌拉尔西部的彼尔姆市，十个高年级学生中只有

一个人想当工人。在列宁格勒，百分之八十七的高年级学生想进技术学院或研究所。”

“当有人问到各种职业的声誉时，学生们把钢铁工人列为第二十位，车工职业列为第三十九位，拖拉机手的职业被列为第五十一位。五种最有威望的职业都是属于脑力劳动。”

在农村，缺乏劳动力的现象极为严重。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的文章说，“有的地方，从事农业者的平均年龄为五十多岁。”这是对苏修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一个辛辣的讽刺。

苏修教育带来更为严重的恶果是，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年轻一代深受腐蚀和毒害。苏修头目公开鼓动青年要当“名列世界科学史册的杰出科学家，以及天才的青年科学家。”苏修官方刊物也不能掩饰：“卢布、卢布、金钱、生意……从报纸上看到和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只是这些字眼。”与此同时，他们更是疯狂地鼓吹要使“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居于特别重大、特别主要的地位。”苏修教育制度的反动、腐朽和没落，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和各种错误的教育理论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想消灭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只有奋起推翻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才可能实现。

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永放光芒——兼评“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个口号

肖戈

1975-05-25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四月二十三日辽宁日报发表了沈阳机电学院工农兵学员的两张观点针锋相对的大字报（一张是《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另一张是《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展开了“社会主义学校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讨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战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建国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今天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教育路线在新形势下激烈斗争的反映。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发表了伟大领袖的光辉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彻底批判和否定了旧学校培养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实现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和造就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今天，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重温毛主席这段教导，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它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锐利武器和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

七年来，教育战线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涌现出象朝阳农学院这样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教育方针的典型。朝农学生“社来社去”，毕业之后当农民，向资产阶级法权发出了勇敢的挑战，引起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强烈的反响。广大工农兵和学校中决心把教育革命进行到

底的积极分子，热烈赞扬“好得很！”但如同任何新生事物在成长中的遭遇一样，朝农的经验也受到了资产阶级顽固派和习惯势力的种种攻击和抵制。“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实行这一条是经历过斗争的，今后还会有斗争。有些人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投了“赞成票”，但赞成的出发点并不相同。由于目前还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着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总之，还存在着滋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因而，有些人总希望通过大学这个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幻想“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从而和农村告别，和锄头把子、榔头把子告别。所以，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们，对工农兵“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是明里暗里想不通的。在某些人眼里，我们的国家还“需要进口资产阶级专家”，怎么能让为数不太多的大学生去当工人、农民呢？不过是说说罢了。可是，如今果然一批又一批大学毕业生打破“老规矩”去做工人、农民了，这就触及了这些人的灵魂，他们感到有话要说，力图要证明大学毕业做普通劳动者是不对的。《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张大字报恰好迎合了这股思潮，说出了这些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为什么大学毕业就不能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做普通劳动者呢？这张大字报说：大学毕业生与工人之间，“决不可以划等号”，“不然，就是对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教育的否定，就是辜负了党的培养，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后工农兵上大学新生事物的否定，……”。简直完全把问题弄颠倒了！

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到底新在哪里？工农兵上大学这个新生事物到底新在哪里？我们认为，说到底，新大学就是新在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学员就是新在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士。这是旧学校根本做不到的。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学校始终是奴隶主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是社会阶级划

分的工具。在奴隶社会里，奴隶根本没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在封建社会里，也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而地主的文化是农民的血汗造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教育的程度往往是由占有资本的多少来决定的，资本家学校也让一些工农子弟入学，但正如列宁所揭露的，他们“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几千年来，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服务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因为，无论是奴隶主阶级的精神贵族如孔老二之流，还是地主阶级的“秀才”，资产阶级的”博士””“教授”，都依赖于剥削者的钱袋生活，他们这些“毛”是紧紧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张“皮”上的，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这张“皮”，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就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因而他们与工农之间的确是“决不可以划等号”的。社会主义教育区别于一切旧教育的重要标志，就是学校“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小学是这样，大学更是这样。由于工农兵学生从生产实践中来，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所以，他们与工农群众之间不再是那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立的关系，而是工农劳动者之间的同志关系；他们是工农群众的一员，不是群众的“上司”；他们把自己所学得文化科学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而并不以此来傲视工农和伸手多要报酬；他们可以根据需要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但并不脱离劳动、脱离工农。总之，从阶级地位来看，从生产实践过程中与工农群众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工农兵大学生完全应当与工人、农民之间“划等号”。不然的话，那才真正是“对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教育的否定，对工农兵上大学新生事物的否定”！

可是，有些同志（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同志）却说：大学“单纯为了培养‘普通劳动者’，就失去了大学存在的实际价值。”那么，“大学存在的实际价值”是什

么？站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路线上，会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在这些同志心目中的“实际价值”，说穿了不外六个字：“培养红色专家”。这种看法很不新鲜，是个“老调子”。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大学，总是以“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红色农学家的基地”等等来标榜的。这种招牌果然对工农大众有什么“实际价值”吗？没有。由于旧大学把培养目标定在“专家”这条线上，这就自然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扩大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青年人一进大学门便套上了资产阶级等级观念的枷锁，许多人进了大学之后，不但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去当工人、农民，甚至以学得的技术和知识作为商品向党向人民要高价。所以这类“摇篮”里培养出来的“专家”，往往是“架子大，本领小”，“红色”不过是个标签。因为，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懂得打仗，工农兵不欢迎。许多从旧大学出来的同志是深有感触的。他们要为工农兵服务，改造起来真不容易，立场上要来个大转变，世界观要动大手术，十年八年还难于与工农之间“划等号”，那教训是够深刻的了。至于为数不少的人出了大学门，更热衷于搞资产阶级法权，以至跌进修正主义的泥坑，那就更充分地说明旧大学不是什么“红色专家的摇篮”，而是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这样的旧大学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的确没有“存在的实际价值”，应该“寿终正寝”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掉了旧大学这个修正主义的“温床”，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断了资产阶级妄图继续利用大学教育扩大三大差别、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老路，使封、资、修统治了多年的大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始走向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消灭三大差别而斗争的新轨道。当前，教育战线形势喜人，毛主席的指示愈来愈深入人心，出现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工大毕业当工人”这样值得大书特书的共产主义新事物，显示了大学教育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这怎么能说大学“没有存在的实际价值”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阶级、政党等等都是要消亡的，但劳动者却存在，共产

主义世界必定是普通劳动者的世界，人人都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走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道路，正是向着这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前进。

提出和支持“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个口号的同志，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如果强调“工大毕业当工人”，那么，就会有人说：“出去当工人，学那么多干啥？”学习积极性没有了，从而降低大学质量，影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建成。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某些人的学习专业的劲头吓跑了呢？是“做普通劳动者”这几个大字？果真是这样的话，他那股“劲”显然是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为靠山的。而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为学习动力，希望通过积累知识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的人，怎么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一员呢？“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是普通劳动者。如果一个从生产实践中来，学了几年又决心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成为无产阶级自己知识分子的同志，只能从“普通劳动者”这个崇高的称号中汲取力量。正如列宁所指出：“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老贫农王贵彬五十二岁上朝阳农学院的动人故事是生动的一例。他为了迅速改变家乡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是那样热情地、艰苦地钻研农业科学，当他毕业回到生产大队之后，又是那样百折不挠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发展社会主义新农业中去，创造出了“农学家”们想象不到的棉花高产奇迹。工农兵大学生回到生产实践中之后所取得的许多成绩，有力地证明：大学培养普通劳动者决不是降低了大学质量，而是提高了大学质量；不是影响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而是加速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

“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个口号，是历史唯心论的表现。持这个口号的同志力图说明大学毕业做技术工作，贡献要比工人大，似乎我国科技的发展决定于大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诚然，社会主义大学应该为发展科学技术、为培养科技队伍做出贡献；但必须认识到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伟大动力不是来自大学的

讲坛和科学家的头脑，而是来自工农群众，是工农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大学毕业生只有走与工农相结合、与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使自己成为工农群众的一员，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正如《国际歌》所唱的：“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劳动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科学技术的主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一个人的。”“在专门制造蒸汽机、走锭精纺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精纺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经出现了，这正象在裁缝出现以前人就已经穿上了衣服一样。但是，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可是，工农劳动者创造科学技术的历史却被地主资产阶级长期歪曲了。他们以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进步来源于科学家的“天才”，劳动群众不过是阿斗。这种历史的颠倒，至今仍然束缚着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以为大学毕业做技术员的贡献“比普通工人大”，从而不愿意与工人“划等号”。正如许多同志所正确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工农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飞跃发展证明，历史唯心论是荒谬的。比如我国突飞猛进的石油工业，是少数科技人员的功绩吗？不是。它是成千上万“铁人”式的石油工人伟大创造的结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群众已经开始掌握打开科学技术大门的钥匙，再不允许少数人把掌握这把“钥匙”当成专利。工农群众掌握这把“钥匙”，用以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反之，少数人垄断这把“钥匙”，则会用以扩大三大差别，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一伙鼓吹培养所谓“红色专家”，实质上是要让少数人垄断科学技术，从而造成一小撮新的精神贵族，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

者”这个口号，不是打破资产阶级对文化科学技术的垄断，而是有利于恢复这种垄断，所以这个口号是一个十分有害的口号。

正是基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社会主义大学必须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工农兵学员在学校中首要任务是学政治，其次才是学文化技术。必须用政治统帅业务，达到红与专的统一、政治与业务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在学习期间不脱离工农，不脱离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学几年之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改造旧的大学，创办新的大学，工厂办，农村也办，一代一代办下去。千千万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农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科学技术，这就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彻底铲除少数人垄断文化科学技术部门，把它作为世袭领地这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样，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断巩固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便愈来愈小，直至最终填平这个几千年来造成的鸿沟。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大学的光荣任务。让我们坚定地沿着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评苏修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

许桂亭

1975-05-25　天津师院学报

苏修的一部中篇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国内已经有了批判文章。但是，从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从而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一角度上来谈谈它，仍是有很多话可说的。

据了解，普隆恰托夫这个文学人物形象，已被苏修的某些评论家吹捧为“历史的真正主体”，“文学中的当代英雄”。这是颇不寻常的现象。苏修官方如此垂青，想来其中必有奥妙。于是，我们认真地读了它。掩卷之后，觉得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此书于一九六九年出笼，写的是一九六二年的事。故事情节很简单：西伯利亚最大的塔加尔木材流管处的经理死了，总工程师普隆恰托夫“象一只抓跳蚤的狗”，“准备啃地皮，掉脑袋”也要争来经理的位置。他使出种种手段，最后终于把经理位置搞到手，故事到此结束。

此书的内容表明，所谓《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发家史，是他对工人残酷压迫、对同伙凶狠倾轧的自供状。在今日之苏联，普隆恰托夫的形象是相当典型的。通过这个典型，人们可以看到苏修叛徒集团怎样无限制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经济上复辟了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贩卖了最腐朽的资本主义黑货。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及其描绘的主人公，正是苏修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

（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等级制度等等，都是这种旧社会的痕迹，亦即资产阶级法权。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它们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它们加以限制，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它们。与此相反，在苏联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权以后，他们用“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等一系列措施，造成资产阶级法权的恶性膨胀和发展。

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描写的正是这个反革命复辟时期。当时，苏修领导集团把符合他们搞复辟需要的所谓专家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去，用以贯彻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普隆恰托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着强烈的权势欲望，十分自觉地想要充当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为了争夺到经理的肥缺，他背离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疯狂地去推行一条他认为是“新”的办企业路线。

这是怎样的一条办企业路线呢？

一曰“专家治厂”。偌大的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拥有三千多名工人。但普隆恰托夫认为，其中只有“五个能决定管理处未来的人”。这五人中没有一个工人，而都是“象总机械师奥戈尔楚夫一样”的技术贵族。他认为，现代化企业规模巨大，技术复杂，工人是管理不了的，只能由专家来领导。当他听说让青年工程师参加值夜班时，他大喊道：“我需要他们的是脑力工作”，下命令给禁止了。与此相反，他把工人群众看成是浑浑噩噩，无知无识的群氓，是一群围着饼干转的“苍蝇”；工人们的职责只是“应该懂得干活，干活！”据说，塔加尔木材流管处之所以取得了许多“成绩”，正是由于这批“专家”治厂的原故。

二曰“物质刺激”。在塔加尔木材流管处，存在着一种累进计件工资制，这是普隆恰托夫管理企业的一件法宝。他动不动就拿“取消累进计件工资”来威胁工人。在他看来，调动工人积极性不需要别的，只依靠工资和福利就行了。甚至对一批刚调到木材场的“大赦犯”，他也是拿物质刺激来鼓动：“亲爱的，……把你的伙伴们送去装木材，每人每月保证可得三千个卢布。每两人分配宿舍房间一间，过一年以后发津贴，给两个月的假期。施耐尔明年，可以到克里米亚去！”——就是这一套：工资、津贴、房间、假期、外带上旅游疗养。据说，普隆恰托夫依靠这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有效地调动了工人“积极性”。

三曰“奖金挂帅”。谁干得好，就从利润提成里发给谁奖金，用金钱来引诱工人。小说描写了一次工会总结选举大会，会场秩序十分混乱。但当计划科长发言时，顿时鸦雀无声，“因为每个人和计划科长的纸都有关系，假如波里亚柯夫说，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不能完成月度计划，那么坐在这里的所有的人就得不到奖金”。当听到本月可以超额完成八千立方米木材时，全场立即“响起了鼓掌声和叫喊声，粗硬手掌的拍击声，姑娘们的尖叫声……”。据说，普隆恰托夫手中掌握的奖金就有这么大魔力，能把工人们引诱得手舞足蹈，如醉如狂。天晓得，这是对苏联工人阶级多么严重的诬蔑！

四曰“等级差别”。普隆恰托夫利用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观念，来分化工人队伍，扩大等级差别。在塔加尔木材流管处，工资的级差很大。普隆恰托夫不只拿高工资，而且拥有特权，可以多吃多占。他拥有专用的汽车和三驾马车，拥有专用的汽艇，漂亮得“在阳光下象一只孔雀”；他还住着带花园的别墅式的一套房子。等级差别，造成了苏修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仅从小说中描写的这个木材流放管理处，我们已经看得很明显了。

上述几点，再加上苏修叛徒集团利用目前流行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雇佣劳动、家庭副业等等，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之恶性发展，并且成为普隆恰托夫

办企业路线的中心内容。普隆恰托夫硬说这条路线是“新”的，何尝有一点新意？揭穿实质看，它完全是最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它所造成的恶果，是无庸待言的。便是小说本身，也承认普隆恰托夫的王国里集着一批“财主、塔加尔的贵族，享有特权的上层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有零点七公顷的菜园”，“养着不干活的肥胖的女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幢几乎不花什么钱盖成的宽敞的房子。”阶级的鸿沟划开了，寄生虫们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了——这就是《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第一点印象。

（二）

根据列宁的深刻分析，无限制地扩大和发展资产阶级法权，不仅要导致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还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项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在《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普隆恰托夫一方面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一方面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他象恶狼一样狂嚎：“我绝不把管理处交给任何人”；“我认为我有这个权利！”这正表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坚决要求取得政治统治权，以便维护和加强他的既得利益。普隆恰托夫如此狂热地追求权势，决不单纯是个人性格使然，而是有强烈的阶级利益要求的。

小说中的塔加尔木材流管处，实际上是普隆恰托夫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个人王国。他声称：“我在生产上贯彻一长制”。利用“一长制”，他可以包揽全权，独断专行。

为了强化新资产阶级的统治，用普隆恰托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善良应该和拳头为伴”。重点当然是“拳头”，亦即是他建立的那一套“关、卡、压”制度和强迫实行的纪律。他把“加强劳动纪律”挂在嘴边上，动不动以“违犯劳动纪

律”为名苛罚职工。他任意解雇工人，甚至找来警察把无辜的工人逮捕入狱。他有一个对付工人的“哲学”：“工人们喜欢的不是那种对他们象哄小孩子一样的人，不是那种拥抱他们的人。”意思就是：工人是吃硬不吃软的。他还有一个口号：“但愿最强的人得胜”。这所谓强，就是指的暴力统治。小说里形容说：“普隆恰托夫的脸变得凶狠了，象乡间小道上嘴里衔着刀的强盗一样。”真是传神之笔！在用暴力镇压工人时，普隆恰托夫正象一个强盗。

对于自己的上级和同事，普隆恰托夫则是大搞政治权术，要弄政客手腕。为了争夺经理位置，他懂得找靠山，以隐而不露的神情去逢迎州委书记和区委书记。他懂得走后门，以少有的谦恭态度去拜访塔加尔地区的“地头蛇”涅哈莫夫一家，使他们充当自己的奥援。他懂得结私党，以封官许愿方式拉拢计划科长等人，来充当自己的羽翼。他懂得下暗绊，茨维特柯夫是唯一能和他竞争经理位置的人，他到处对人说茨维特柯夫的坏话，以便击败自己的对手。一旦他当上了经理，他就肆无忌惮地弄虚作假，打击报复。他故意把四月三十日就已完成的数字放到五月三日去上报，以便捞取更多的奖金；他还把已故前经理遗留下来的一万八千立方未入账的木材匿而不报，充作自己升官发财的一项重大资本。——所有这些卑劣行径，普隆恰托夫是非常自觉地在干的，甚至为自己的手段得意洋洋。在这方面，他不仅具有狼的残暴，而且具有狐狸的狡猾。

当然，普隆恰托夫有时也表现出某种“善良”，例如对工人拍拍肩膀，说句笑话，和工人在一起喝瓶伏特加，等等。但都是假相，不过是对于普隆恰托夫“拳头”的一种甜蜜的补充。小说中有一节很能说明问题：非常能干的流送工人谢姆卡·别兹罗特内犯了错误，普隆恰托夫先请他喝了一顿酒，为他的成绩干了杯。然后把脸一变说：“酒喝过了……现在要谈事情了！”当场派警察把别兹罗特内捕走。普隆恰托夫就是这样，诡计多端，软硬兼施，一打一拉，心狠手辣。可以说，在他身上集中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全套伎俩。

然而，普隆恰托夫却说他在“捍卫神圣的事业”。什么“神圣的事业”？不过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事业罢了！极度的贪婪和两面派的作风，是一切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共同特点。同中国的林彪反党集团一样，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打着“红旗”反红旗，真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开始，在经济上复辟了资本主义后，又建立了严酷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这是我们对《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的又一点深刻印象。

（三）

《共产党宣言》教导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普隆恰托夫这个人物的思想和作风，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修统治者思想作风的缩影。

普隆恰托夫的人生观，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曰唯我主义。“我要当经理”；“我绝不把管理处交给任何人”……处处从“我”出发，而又把一切事物归属于“我”。当“我”的愿望没有充分得到满足时，他要为“我”的利益不懈奋斗，“牙齿咬得咯咯响”，恰象一只磨牙吮舌的狼。小说的最后一章写道：“他，普隆恰托夫，为塔加尔流送管理处担了多少心思，为了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想了多少办法，度过了多少个短短的夜晚和长长的工作日啊！”这是不假的。普隆恰托夫自己也承认，他为了这个目的曾经“激动，耍花枪，骗人，忙忙碌碌”过。小说把普隆恰托夫刻画为一个精力过人的人，过人的精力正来源于极端的唯利是图思想。到小说的末尾，他确实达到了“我”的目标，攫取了一个“普隆恰托夫之国”。这个国土很大，他坐着“安-2”飞机在上空飞了一个小时。“法国、瑞士和卢森堡王国可以很容易地容纳在这个国度的领土之内”；“……飞机下面的土地确实是他的。”请看，这就是普隆恰托夫的内心世界！也是勃列日涅夫集团扩张主义的绝妙写照。

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怎样，生活作风也就怎样。普隆恰托夫既然满脑子浸透着资产阶级思想，则小说描写他经常饮酒作乐，旅游兜风，特别是处处渔色，和女人吊膀子，也就很可理解了。由此可见，“醇酒、妇人”这些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苏修新资产阶级分子那里，已经不是什么丑事，而是人人可行的时髦了。

但是，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同历史上任何反动阶级一样，他们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普隆恰托夫不是常常感到“他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吗？他不是常常感到“孤单”“空虚”和“危险”吗？生活的苍白，灵魂的空虚，也正是一切反动阶级共有的特点。

这样，我们就从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得出了又一点深刻印象：苏修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们，已经从思想上到生活上完全腐烂了。他们自以为是在“上升”，实际上却正在堕落；他们自以为是在“新生”，实际上却正在腐朽。他们正在走向无可挽救的灭亡！

是的，这是铁的历史法则。普隆恰托夫之流感到“危险”的，就是这个历史法则。小说中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写出广大劳动人民对苏修统治集团的革命斗争，但是，它却写了普隆恰托夫之流已经预感到的那种“危险”。这就表明：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不平静的，大地正在摇动，地火正在运行。现在已经预感到的初震，终将会变成火山的喷发。彼时，工人巴威尔和农民雪特林将高举红旗，把大大小小的“普隆恰托夫之国”摧毁捣烂。在熊熊火光中，人们将再次看到冲击冬宫时所展开的那幅标语：——“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也将再一次听到那响彻云霄的无产阶级战歌：——“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苏联教育的演变及历史经验

教育系写作组

1975-06　广东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全国人民正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教育战线的同志在认真看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苏联教育是怎样演变的，它对修正主义上台起了什么作用？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记取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很有意义的。

（一）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教育革命的问题，作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列宁反复强调，要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他明确地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应当同劳动人民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结合起来”，“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为了在教育领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列宁着重地指出：“一定要注意承认党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一般无产阶级组织，应当最积极地作为最主要的成分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路线指引下，联共（布）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作顽强斗争的同时，开展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教育革命，对旧教育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十月革命刚刚胜利，苏维埃政权就紧紧抓住高等学校这块阵地，1917 年底便统一由国家举办。从 1918 年——1921 年初，又连续进行了两次学制改革，废除了沙皇时代的旧学制，为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作出了可贵的革命尝试。在二十年代里，苏联的教育革命，尽管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破

坏，改革还不彻底，但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当时在这个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废除了沙皇旧学制；在普通教育，工农子女有入学的优先权，并为他们入学提供物质保证；大学招生，遵照列宁的指示："首先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还作出取消入学考试的规定，使工农及其子女有实际可能受到高等教育，以改变高校学生的阶级成分，从而较好地贯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据 1931 年的统计，高校学生的工农成分占了优势，工人和工人子弟占 45.9%，农民和农民子弟占 19.4%，职员和知识分子占 30.3%，其它占 4.4%。另外，先举办了大量的新型学校，如工农速成中学（为工农青年进入大学作准备，毕业生是大学招生的主要对象），青年农民学校（吸收青年贫雇农入学，培养渴望合作化的革命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把普通教育和农业合作化、农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工厂艺徒学校（培养技术熟练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由工厂企业举办，毕业生归工厂使用），七年制工厂学校（是附设在工厂的普通学校）等等。当时苏联的许多地方还把九年普通教育的最后二年改为职业技术学校。这些革新措施，为当时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各方面急需的人材，使当时苏联的教育部分地适应了政治和经济基础的要求。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无产阶级要把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资产阶级则负隅顽抗，妄图继续霸占这块"世袭领地"，把它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在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焦点，一开始就如此明朗、集中，而且在激烈地展开。

正当苏维埃政权着手改造高等学校，使工农子弟读上大学，占领大学阵地时，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赤膊上阵，污蔑这场刚刚兴起的教育革命是"混沌"的，"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在莫斯科等地煽动部分教师罢课达三个多月之久，躲在

幕后的老奸巨猾的银行家亚布申斯基之流还从经济上支持罢课教师。他们的阴谋被粉碎后，1918 年 7 月和 9 月，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召开的两次高等学校改革会议上，资产阶级教授们又一次跳出来，鼓吹“大学自治”，叫嚷教育改革是“教授们的事情”，公然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对教育的领导。当时，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窃取教育人民委员职务的托洛茨基“区联派”人物卢那察尔斯基，竟不顾许多同志的反对，接受了“大学自治”这一反动口号，和资产阶级一个鼻孔出气。联共（布)中央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0 年，列宁在一次讲话中尖锐指出：“在这个机构的工作中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没有其他的形式，也没有一个国家创造了其他的形式。”党的组织派出了大批共产党员到高等学校学习和工作，以增强党的力量，直至 1928 年，还规定派一千名党员到高等学校去。

这个时期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说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1918 年末，莫斯科商业学院进行学生代表机构选举，为了壮大工农学生的队伍，以粉碎反动学生对学生权力机构的把持，学院党组织号召附近工厂的青年工人加入大学生行列，随即创设了工农速成中学，帮助工人做好上大学的准备。这是为全面夺取高教阵地的一项革命措施。而卢那察尔斯基却又一次扮演了维护资产阶级对高等学校统治的反动角色，他要尽种种阴谋去扼杀工农速成中学这一新生事物，反对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用推荐方法招收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的招生路线，并妄图把工农速成中学引入歧途，他别有用心地说：“与旧的统治阶级残余，与教授们的旧世界观的顽固积习作政治上的斗争，这完全不是工农速成中学的事”，“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的事就是学习，就是每天吃饱那些对我们的相当无知的无产者特别必要的知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劝说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教育，争夺青年所惯用的伎俩。

1920年，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工农速成中学》的法令，积极支持和扶植这一新生事物，正式确定举办和推广工农速成中学。到1929年为止，已有4万名工农青年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其中75%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改变了大学生的阶级成分。卢那察尔斯基的阴谋没有得逞。

卢那察尔斯基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二十年代教育战线上推行错误路线的头子。列宁在世时，他常常背着列宁，贩卖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列宁逝世以后，他更变本加厉地推行错误路线。这位被称为“最熟悉杜威的苏联教育家”，在他窃权期间，曾经请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到苏联去考察教育。他们一伙还大量翻译出版杜威的著作，并竭力推销以杜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派的黑货，推行美国的“设计教学法”（它是以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的，使学生通过“做”掌握适应资本主义生活环境的点滴经验，并养成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德行”），“道尔顿制”（这是1920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州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创行的，它是一种以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思想为指导的教学制度）等，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干扰和破坏。卢那察尔斯基不打自招地供认：“我们能够设立最好的学校，将是接近于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的教育学所主张的最好的学校”。一语道破了他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极右实质。

二十年代的苏联，出于联共（布）党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核心，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因此，能够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卢那察尔斯基也在1929年被苏联人民赶下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路线的重大胜利。

（二）

阶级斗争在继续。1928年起，苏联开始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材。同年，在顿涅茨矿区，一小撮资产阶级专家及原企业主，

勾结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制造了大规模破坏矿区生产和设备的“沙赫特事件”。联共（布）中央责成各级党组织从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出加速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了实现这个任务，1931 年至 1933 年，联共（布）中央连续发布了几个有关教育问题的《决定》，肯定了二十年代教育改革的巨大成绩，同时又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必须与“向资产阶级的学校开倒车的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建议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对学校的领导”。这些，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闪耀着列宁主义的光辉。但是，《决定》未能抓住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极右实质，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批判，忽视了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而片面地强调了“基本知识”的传授。以致资产阶级的复辟势力未有受到多大的打击，他们甚至接过某些口号，为他们在教育领域里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打掩护。三十年代初，那些仍窃据教育部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利用联共（布）党总结教育革命经验，克服受错误路线干扰所发生的缺点错误的时机，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肆意喧嚷二十年代学生“知识水平低下”，给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戴上“实用主义”的帽子，统统加以否定。他们主张延长学制，突出“正规”学校的地位，采取竞争性考试，取消工农及其子女入大学的优先权。1933 年的学制改革，贯彻了“智育第一”的方针，这是教育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又逐步抬头的信号。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基本观点，分析苏联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才能正确地观察教育上的问题。到 1936 年，苏联在所有制改造方面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取消，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

治地位。不但老的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每日每时在产生着。因此，苏联当时存在着变修的危险。如果不是逐步地缩小三大差别，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尖锐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教育领域里来。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了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往往首先从资产阶级长期盘据的、剥削阶级政治思想影响最深和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的文化教育领域对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利用资产阶级还占优势的教育阵地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培植人材。当时，那些混进联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这样干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凯洛夫，1917 年于莫斯科大学毕业，是沙皇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年混入了苏联共产党，1933 年又混进联共（布）中央机关，不久就当上了联共（布）中央学校教育部处长，以后长期窃取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和教育部长等要职，成了继卢那察尔斯基之后，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头目。三十年代初，凯洛夫一伙打着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派的旗号，肆无忌惮地把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派的反动理论搬过来。他的修正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派理论的翻版。

在这样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战胜修正主义，关键在于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当时，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曾作了坚决的斗争，处理了一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使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因此，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前，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但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缺乏经验；在思想认识路线上，受到形而上学的束缚，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

义辩证法，过早地宣布在苏联已经消灭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没有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经济建设，忽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不当口号。那些把持着教育部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接过口号，乘虚而入，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干着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勾当。1936 年，高等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规定“只有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充当校长，各教研室的领导人，以竞选的方式选拔，只有“具有教授学衔或博士学位者，始得参加教研室领导者的竞选。”，这不但从制度上维护了资产阶级法权，而且确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学校的一统天下。1937 年，重新颁布了学位、学衔的命令，确定高等学校的学衔为教授、副教授、助教三级，学位为博士、副博士两级，这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阶加冕的制度，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大学里头的资产阶级专政，也因此在大学里刮起了一股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资产阶级妖风。此后，苏联教育上的许多变化，都明显反映出逐步变修的特点。高等学校招生片面强调追求知识标准，规定“中学毕业生有优先进入高等学校的权利”，工农子弟上大学受到诸多限制。教学计划多次修改，文化课的时数和门数越修越重，而劳动课和政治课时数越改越少。1936 年甚至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在上课时间内，绝对禁止各种社会活动性质的会议和集会。二十年代教育改革的新生事物，如校办工厂，深受工农欢迎的各种类型的新学校先后被砍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而创办的工农速成中学，也于 1941 年取消了。因此，1936 年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国家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占了统治的地位，教育战线上出现了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的严重现象。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钻进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他们同老资产阶级分子同流合污，成为五十年代修正主义上台的社会基础。

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对以凯洛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在战争期间，学校里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的教员和学生参军参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作出了贡献；为适应卫国战争的需要，创建了多种新型学校，还缩短学制，改革课程，使教育基本上能为革命战争服务。但是，在战后，凯洛夫一伙以“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为借口，完全恢复旧的一套，使教育重走老路，在修正主义的轨道上越滑越远。1948 年，采取措施，强令“彻底消除使学生在学习时间内去执行社会任务的现象”。在 1947 年——1948 年的教学计划中，取消了政治课，取消了劳动课，中小学课程数从 17 门增至 20 门。并实行了毕业考试和毕业证书考试的制度，以及颁发金质奖章、银质奖章的制度，奖学金按分数高低发放。大学毕业成绩优异者，国家考试名列前茅者，给以“超等毕业证书”，享有选择工作地点的特权。总之，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原则已经严重地侵入到教育领域中。

1936 年以后，虽然联共（布）中央也曾多次作出决定，批判了资产阶级伪儿童学，批判了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但是，对于那套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教育理论却缺乏警觉。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教育学》，就是苏联三十、四十年代教育界资本主义复辟经的总汇，是封、资、修教育思想的集大成，它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培植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修正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完全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基础上的，它是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派理论的翻版，它“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完整地保存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又巧妙地用马列主义词句加以伪装。这本《教育学》于 1939 年、1948 年、1956 年三度出笼。大力宣扬了否定教育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全民教育”论；贩卖了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智育第一”论；大肆鼓吹排斥工农，培植精神贵族的“天才教学”；极力宣扬赞美资产阶级法权，追逐名利的

"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谬论。这个反动理论体系还设计了一套"三中心"（即"书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教学体制。他们把学校说成只是传授所谓"系统知识"的地方，因此，唯有具备"丰富知识"的"专家"才是"一长制"下的当然"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一套反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体系，从根本上阉割了学校必须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革命灵魂。其实，凯洛夫之流并不是否定一切专政，他极力反对的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在 1956 年再版的《教育学》里，把原来所引列宁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统统砍掉，就足以看出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到了何等的地步！他所要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他对苏修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死心塌地地为苏联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就是明证。

苏联三十年代后的教育制度，正是在这种教育理论支配下逐步形成的。请同志们想一想，在这样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支配下形成的教育制度，怎能不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所谓红色专家，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教育领域内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培养出来的人成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个历史经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

（三）

斯大林逝世后，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走资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搞了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在苏联，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是血腥镇压苏联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世界上第一

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教育也就堕落为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

在今日的苏联高等学校，已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统治人才的豢养所，大学的领导权已经完全落在那些资产阶级学阀、专家、教授手里。在莫斯科大学三十九人组成的校党委中，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占了三十名，大学党委会成了新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苏修叛徒集团对各级学校党组织大肆清洗，排斥异己，招降纳叛，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党组织进行大规模改组，许多大专院校的原有领导人被撤换，开除或逮捕，大学设立了大量的“监察组”、“监察哨”等特务网，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师进行监视和审讯，苏联的大学已成了社会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新的资产阶级垄断了教育大权，苏联大学已成了特权阶层的世袭领地，精神贵族的利禄阶梯。据苏修某杂志供认，在新西伯利亚州，百分之八十二的大学生出身于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其它富裕家庭，特权阶层子女读了大学，捞个副博士之类的学位以后，可以入党做官，发财致富。现在苏联从高等院校出来的有副博士以上学位的人，多数已被拉入党内，各级政权机构极力排斥工农干部，而代之以大学培植的所谓红色专家。苏修 15 个中央政治局委员，7 个候补委员全部是大学毕业生，“三驾马车”全是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据 1966 年《政治自学》杂志透露，格鲁吉亚二百二十一个党的州委、市委、区委书记中，就有二百一十七个也是这样的人。在苏联，大学教授的工资一般超过普通工人几十倍，有的竟达二百倍，大学生在校享受的助学金也比普通清洁工工资高三倍、四倍，此外，还有高奖金、高稿酬，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等等，这一套，扩大了三大差别，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特权阶层子女为了读书求仕，在利禄途上狗苟蝇营。在莫斯科，出现了一种新的“商行”，专门替这班公子哥儿经营代考生意，三年内，“商行”成员单独受贿三千至五千卢布。甚至学位审查的有关机构也串同舞弊，

弄虚作假，把所谓博士、副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商品交易、追求名利的手段。这幅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的图景，正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腐朽本质的一种反映。

苏修叛徒集团还加紧复辟“双轨制”，大搞“天才教育”，在教育制度上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实行一套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即读小学为了升中学，读中学为了升大学，读大学为了进研究院考副博士、博士，少数人取得了博士、副博士学位以后，就有资格进入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极乐世界”；而大多数工农子女读完小学或中学后只好去做“增加社会财富的一代”，即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压榨的劳动力，所以，这种教育制是资本主义“双轨制”的变种。

1968 年，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声嘶力竭地叫嚷：“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重要源泉”。为了培养“天才”，在西伯利亚，他们通过由三轮考试组成的“西伯利亚奥林匹克”来选拔所谓“天才学生”，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为具有“优秀头脑”的特权阶层子女开办政治、军事、物理、数学、艺术等“天才”学校，使他们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在“天才教育”大棒的挥舞下，那些幸而进入了大学的工农子女往往被诬蔑为“智力低落”而被赶出大学门外。“天才教育”实质上是特权阶层在教育领域里对工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学校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人文学科的基调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为“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现在，新沙皇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在学生中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1972 年苏修教育部长叫嚷：“我们正面临着完成进行初步军事训练的巨大计划。”他们妄图使青年成为驯服的奴仆和新沙皇对外侵略的炮灰。

毛主席教导我们：“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

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修叛徒集团的罪恶行径，是苏联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不能容忍的。我们坚信，苏联无产阶级将会起来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开创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事业，将会在苏联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联教育堕落演变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果不在教育领域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不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资产阶级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在教育领域里还比较有力量，时刻梦想恢复这块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会从这里一批批地产生出来，进入社会的四面八方，腐蚀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我们掉以轻心，在教育战线上忽视了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放松了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阵地得而复失将是随时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把需要几代人努力奋斗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它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斗争的焦点一直是领导权的问题。对学校领导权的问题，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实际上为哪个阶级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就决定了这些学校实际上成为哪个阶级的专政工具。文化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就是因为这条战线被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实际领导权落在刘少奇一伙的手上。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斗争，摧毁了以刘少奇和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才把教育战线的领导权夺回到

无产阶级的手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教育才开始了从根本上进行革命。所以，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就谈不上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也不可能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无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上，必须全面地夺取教育的领导权，打掉资产阶级一个个的土围子，才能使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反修防修的一条重要战线。

它又告诉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排除各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干扰，要十分警惕资产阶级接过革命口号，加以割裂、歪曲来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也要警惕资产阶级打着各种漂亮的旗号，兜售封资修思想，使陈旧的东西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复活。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马列、毛主席教育思想，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不懈地批判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修正主义的教育对着干。

它还告诉我们，教育阵地上，修正主义仍然是主要的危险。在大好形势下，不能忘乎所以，必须清醒地看到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和尖锐的，资产阶级还会用旧的偏见和传统势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顽固地同我们较量。只有加强工人阶级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发挥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的政治作用，造成无产阶级力量的优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才能把教育阵地占领下来，使它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让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努力把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而努力奋斗！

破除分配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济南市工人业余政治学校写作组

1975-06-05　文史哲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按劳分配制度的问题，尖锐地摆到人们面前。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这个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指明了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几千年来，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多数人处于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地位。我国“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在旧中国，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依附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毛主席在分析我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时曾经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当时必然是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了几十年的英勇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消灭了帝国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收了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

土地改革，引导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步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否定了几千年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建立，是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我们劳动人民是从未有过的平等，因为实现这种分配原则意味着我们劳动人民获得了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在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内部平等占有生产资料，平等的劳动，并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平等的领取报酬的权利。意味着我们劳动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当牛做马的悲惨命运，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发了劳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我们应当看到：在我们这个刚刚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社会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产品还不丰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只有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消除；私有制和剥削制的某些残余还存在；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还将长期存在；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遗留下来的那些好逸恶劳、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等等旧的思想垃圾还在侵蚀毒害着人们的头脑，劳动还没有被社会成员都当做生活的第一需要，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还没有普遍树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消费品分配，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因此，我们还要继续正确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制度。正如列宁所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

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以利于进一步清除剥削制度造成的丑恶现象，以利于社会主义生产顺利进行，以利于安排人民群众的生活。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同时按劳分配也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产品的丰富，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水平的提高，随着人们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分配方式也要随着改变，要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逐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时说：“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会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因此，决不能想象，社会主义社会“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 年 8 月 5 日）。毛主席最近指出：“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按劳动分配消费品的制度为什么“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或者象马克思、列宁讲的那样，“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什么不加以限制，势必成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我们的体会是：

（一）按劳分配虽然否定了地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占有他人劳动的特权，但它承认“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这就肯定了那些体力较强、文化水平较高、技术较熟练的劳动者，有权从社会领取较多的消费品，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别人富裕一些。这实际上就是“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默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在现阶段所存在的差别。但是，我们知道，三大差别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旧社会的分工。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剥削阶级享有脑力劳动的特权，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技术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财富，劳动人民则被剥夺了学习技术和文化科学知识的权利，这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

最重要的根源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财产权，但他们一般都还具有较多的技术、文化科学知识和某些管理的经验，按劳分配默认了个人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也就默认了他们的工作能力有取得较高报酬的特权，这当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就是在劳动人民中间，个人技术、知识、经验上的差别，也并不是天生，而是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原因形成的。恩格斯说："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反杜林论》）恩格斯在这段话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在劳动人民内部，个人工作能力上的差别在旧社会也往往是私有制造成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里训练劳动者的费用则是由社会负担的。因此，这种特权也是不合理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指出过："'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光辉的"五·七指示"，号召各行各业都要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培养有高度政治觉悟，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发展、壮大。所有这些都是缩小三大差别，逐渐消除旧的分工，最终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重大措施。

我们应当看到：既然按劳分配“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就给“技术私有”、“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泛滥，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经济条件。容易使一些人把在某些工作中的特长、技术、知识和经验当作资本，付出一定的劳动，就计算报酬，滋长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思想；使一些人追求“一技之长”，产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技术学到手，可以满天走”的修正主义思想；有的人把自己拥有的一点技术、知识、经验变成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甚至变成向党进攻的工具，因此，不破除技术、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和工资等级差别，逐步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而任其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就会被阶级敌人利用。林彪不是在那儿鼓吹什么他的“脑袋特别灵，是爹妈给的”，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干部下放是“变相失业”，极力煽动人们扩大三大差别，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服务吗？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工人阶级难道不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吗！

（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这就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等量劳动可以互相交换的原则。虽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发达的商品生产社会）中交换商品时的“等量劳动相交换”，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按劳动分配消费品时的“等量劳动相交换”是有很大区别的，但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这个原则是相同的。在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基础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法权所特有的平等思想，即形式上平等的思想，列宁说：“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资产阶级法权“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压被压迫阶级。”（同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人民在生

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本来是互相合作关系，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但是，实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分配原则，容易使得一些人象商人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产生“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干多少活，要多少钱”的雇佣思想，有的人还振振有词地辩护说只有这样才算“合理”，才算“平等”。其实，这种所谓“平等”和“合理”，正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服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完全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人那样，把自己当做商品，认为奇货可居，总想贱买贵卖，追求什么“工作少少的、报酬多多的、生活好好的”。象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等价交换受市场供求关系支配一样，有的人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好象是带资本入股，他们也受“市场供求关系”支配，不但要求“等价交换”，而且要求“不等价交换”，或者漫天要价，或者躺倒不干，完全成了一个买卖人。

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等价交换的平等关系掩盖阶级压迫和剥削这种不平等关系。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也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按劳分配是用劳动这个同一尺度去衡量不同的人。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就会换取不同数量的消费品，就会出现富裕程度的不同，即使能力相同，收入相同的人，由于赡养的人口有多有少，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就会出现差别。这说明在形式平等的后面，依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因此，马克思指出：“在这里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

由于实行按劳分配，客观上存在着贫富差别。对这种贫富差别如果不加以限制，不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和等级差别，让贫富差别任意扩大，就会造成两极分化，产生新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就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国家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对贫富悬殊的情况，采取某些措施加以限制是完全必要的。

（三）实行按劳动分配消费品的制度时，劳动者以等量劳动领取的消费品属于个人所有。我国新宪法第九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只要还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就会存在这种个人消费资料所有权，如果取消消费资料个人所有权，实际上也就等于取消了按劳分配。虽然，这里讲的只是消费资料，而且还是公民的劳动收入，与地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剥削他人劳动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但是这种所有权，按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

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社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都是属于私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了，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再归地主资本家，而是归劳动者集体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生产单位了。但是，由于实行按劳动分配消费品的制度，在生活资料方面仍然保留者个人私有权，个体家庭还是一个消费单位。同时，由于私有制和剥削制的某些残余还存在，农村的社员还保存着少量的自留地和经营着家庭副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不接受国家的必要限制和监督，“小田”就会冲击集体大田，家庭副业就会削弱社会主义大业，个体消费单位就会重新分解成为独立的、个体的小生产者。更有甚者，化公为私，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放高利贷，办地下工厂，个体消费单位就会演变成暴发户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这难道不是正在发生的现象吗？

我们还应当看到：既然存在个体消费单位就存在个体消费同集体生产之间的矛盾。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逐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列宁说：必须“把琐碎家务劳动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因此，在《伟大的创举》一文，列宁热情赞扬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是共产主义的幼芽，我们应当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在我国，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水平还不高，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逐步加以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四）由于在消费资料的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统治地位，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够正确地对待消费和积累的问题，认为消费是个人的事，而积累则是国家的事，甚至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国家利益之上。因此，在消费和积累的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散布了种种谬论，他们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富民穷”，鼓吹“多分多拿”，妄想分光社会主义积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有些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比较严重的人，对社会主义的积累没有正确认识，说什么“要不折不扣地收回劳动产品”，这不过是马克思早就批倒的冒牌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任何社会都要有积累。但是社会制度不同，积累的性质也就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表现为资本的积累，资本家把从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装进自己的腰包，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财富的积累，工人却是贫困、劳动折磨的积累。

社会主义社会的积累却是另一回事，它完全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而进行的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建国二十多年来，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已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在工农业生产日新月异的发展情况下，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要使我们的国家进一步繁荣昌盛起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总理：《政府工作报

告》）就要经常保持一个较高的积累水平，艰苦奋斗它几十年。“艰苦奋斗”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政治本色。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综上所述，可见，在“按劳分配”中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我们知道，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但分配形式对所有制也有反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利用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作为一个重要工具，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应当记取。马列主义者历来警惕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资产阶级法权的腐蚀、破坏作用，反对在分配问题上扩大差别。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的历史经验，指出，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因此，对待资产阶级法权，是逐步限制它，还是扩大它？对待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彻底破除它，还是维护它？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头子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尚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竭力鼓吹“物质刺激”，叫嚷“利己多欲乃规律”，大肆散布“干劲是从物质刺激中来的”等等修正主义黑货，妄图扩大分配中的等级差别，培植特权阶层，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扩大社会基础。所谓“物质刺激”，无非是以金钱为诱饵，刺激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列宁说：“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在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有些人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热衷于资产阶级法权，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企业领导工作人员中，有人总想用“物质刺激”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殊不知，以此调动起来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职工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主义思想。这种“积极性”越高，对社

会主义制度的危害就越大。“物质刺激”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

所以，在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时，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职工有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了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就能够发挥冲天的革命干劲，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有人说：既要实行按劳分配，就不能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要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就要取消按劳分配。这是把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与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

毛主席早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就教导我们：“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在社会主义阶段，在按劳分配中资产阶级法权仍占统治地位，如果我们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不但不能做好当前按劳分配的工作，而且也不能逐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渐实现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呢？列宁说：“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实际上，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就是毛主席要我们学习的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张思德同志那种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精神；就是雷锋、王杰、王进喜等同志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的精神。事实证明：尽

管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只要我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就能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说明了无产阶级是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阶级。大公无私，不计报酬，勇往直前的共产主义精神，正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革命先辈过的是每天一钱油、二钱盐、一斤半米的生活；长征路上，吃草根树皮，虽然生活苦、战斗多，但是大家都努力工作，前赴后继，英勇杀敌，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今天，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们应当看到：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在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中，在反对一切旧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中，产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指引下，“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搞清楚，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不断批判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新乡化学纤维厂工程技术人员联系实际学理论，在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

1975-06-12　人民日报

据新华社郑州电　河南新乡化学纤维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密切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他们决心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新乡化学纤维厂有工程技术人员一百七十多人，其中绝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大专院校学习过，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他们在工厂各级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他们当中许多人已被选进工厂各级领导班子，有的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他们同广大工人一道，对全厂生产进行了一系列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自制、改造各种技术设备一百五十多项，使化学纤维产量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增长了一倍多。最近，这个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深刻变化，总结了几年来坚持走与工人相结合道路的经验，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努力破除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刻苦改造世界观，坚持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这个厂的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更加认识到“知识私有”、“技术私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一个防腐技术员谈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在参加厂内空气调节设备方面的基本建设时，把一些有关资料收集在一起，关起门来写论文，醉心于搞个人的“积蓄”，而对厂里生产中提出的技术课题

和工人群众的技术革新活动，则漠不关心。结果，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在生产技术上也长期无所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工人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从此以后，在进行设备防腐新技术试验工作中，他和工人们一起边参加生产劳动，边搞科学实验，虚心向工人学习，同时主动把学到的理论知识，通俗易懂地介绍给工人群众。他和工人一起，用了两、三年时间，先后革新成功了三十多个设备防腐技术项目，为发展化学纤维生产作出了贡献。最近，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他深有体会地说：一切科学技术知识都是劳动人民从事三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总结，劳动人民才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真正主人。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却成了私有的东西，并用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我们一定要认真改造世界观，批判“知识私有”、“技术私有”等资产阶级思想，坚定不移地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新乡化学纤维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他们更加自觉地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在去年每个工程技术人员平均每人劳动二百一十多天的基础上，今年头三个月，平均每人又劳动了六十九天。在工作中，全厂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技术小组，技术人员同工人一道进行技术设计，虚心听取工人的意见。他们表示，要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

童新

1975-06-15　吉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在我们这支向共产主义挺进的队伍中，为什么会时时地“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大量的事实表明：生产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及其在精神、道德领域中的反映——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滋生修正主义的肥壤沃土。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腐蚀无产阶级队伍的精神鸦片。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红色航道朝着共产主义前进，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限制以至于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偏私观念”。当前，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仅在那些被推翻的剥削者的脑袋里仍然根深蒂固，而还影响和束缚着知识分子，腐蚀着工人、农民和干部队伍，也侵袭着战斗的共产党。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要自觉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为迫切，更为艰巨。它是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重要课题。

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政治立场看，“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毛泽东选集》第 604 页）知识分子的这种小生产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必然带有小生产者的心理和习惯。他们也同其他小生产者一样，“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275 页）一九五七年，即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无产阶

级立场的，是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道路的人，也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所做的这种基本估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对的，是符合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进步，在世界观的改造方面有了收获。但是，传统的所有制观念，特别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是年深日久的，使一些人积重难返。彻底挣脱这个精神枷锁，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完全决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不仅要经过痛苦的磨炼，而且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目前，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仍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它的核心是私有观念。这种私有观念，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主要的有：知识私有，轻视工农，雇佣思想和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怀疑态度，等等。

知识私有，是旧社会留给知识分子的痼疾，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反映。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象奴隶主占有奴隶，地主占有土地，资本家占有资本、货币和股票一样，知识分子也把知识当做个人的财产，象历代剥削阶级按照财产的多寡来划分等级一样，知识分子也用占有多少知识作为区别等级的标志，向社会索取不同的报酬。“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是几年来依附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所恪守的格言。特别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私有制发展到顶点，知识私有观念也更加象乌云一样笼罩着知识界。资产阶级的法律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浑身沾满铜臭和无产者鲜血的资产阶级，不仅垄断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而且垄断了科学文化。他们通过物质刺激，金钱收买等等手段，竭力“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

人民的统治的武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 394 页）知识成为商品，知识分子也成为商品，到处都是商品、货币的花花世界。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具的，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文明”带有讽刺味道的特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从这样一个社会中脱胎出来，并且接受了一大批从这个社会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大批人中，除了极少数愿意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绝大多数人当中的大多数，头脑中仍然是一个私有观念的王国。他们总习惯于按照传统的方式，把知识当做私有物，当做“铁饭碗”或者“塑料饭碗”，醉心于什么头衔，向往优裕的地位。甚至有人把积累起来的资料加以保密，不让别人看，把知识当成商品，囤积居奇，待价而沽。这种知识私有观念，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逐步解决，并且事实证明有不少的人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有一些人还解决的不大好，甚至很不好。这些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者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个阶段，由于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有某种共同利益，或者没有什么根本冲突，因而跟着大队“同路”走过来了。然而由于他们的剥削阶级世界观在顽固地起作用，因而在每一个重要的关头或者每一场大的政治运动中，总是有一些人从飞驰前进的革命列车上跳下来。其中有的人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充当无产阶级的“同路人”，对于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所有制，还是逐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和个体小生产者的所有制，他们都可以是拥护的，甚至对于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其他战线，其他部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可以不反对。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特别是行将触动到他们所经营的那块世袭领地和他们头脑中的知识私有观念的时候，他们就不高兴了。在这些人看来，他们自己把持的那块地盘和脑袋里的知识私有观念永远也动不得，总想凭借着“知识”优势，在自己所在的那个学校，那个系，或者那个教研组里说了算。因此，革命每向前推进一步，他们都要坐下来抱着脚叹

息，甚至会有人急剧右转，与无产阶级分道扬镳。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当教育革命深入发展，尤其是逐步深入到学科领域的时候，少数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跳出来公开攻击教育革命，不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吗？这类的情形，在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队伍中也有。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资产阶级从政治、思想到生活等各个方面来的影响，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抓住教育战线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学校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当中，有相当一批人的头脑里知识私有观念严重。“一招鲜，吃遍天”，“知识就是力量”等等，在中年的和青年的知识分子队伍中，还有一定的市场，甚至在某些来自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员身上，也有所反映。旧的招生制度、分配制度等等，虽然已经废除了，但是陈旧的东西还在以新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知识私有观念的游菌，还在以各种孔道向工农兵学员进袭。这种思想的腐蚀作用极大，万万不可低估。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有的人，明明是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当他们有了些什么本事，或者有了一点小小名气的时候，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就把这一切当做招财进宝的“摇钱树”和升官晋级的“阶梯”，甚至凭着这“一技之长”，向国家要高价，向人民要特权，向党闹独立性，结果有的闹到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了，堕落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知识私有观念，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它既是没有改造好的老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也是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诱饵。因此，我们广大的知识分子必须努力破除这种知识私有观念，化私为公，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决不能在头脑中保留它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跟上亿万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轻视工农，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又一重要表现。这种思想是等级观念的一种重要形式。等级观念是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反映。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不仅在统治阶级内部、脑力劳动者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等级，而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互对立，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中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孔家店里的唯心主义说教流毒很深，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来，广大劳动人民是科学文化的真正主人，是他们创造了灿烂的科学文化。但是，正象伟大导师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做工的无产者和种地的农民，无论在沙皇尼古拉的统治下，或者在共和国总统威尔逊的统治下，都没有可能上大学”。（《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 49 页）在几千年漫长的阶级社会中，劳动群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被看做卑贱者，“野人”和“愚氓”。这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的情形，是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灭了，但是差别还存在着，妄图扩大这种差别，恢复旧社会那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的反动派也还存在着。我们无产阶级，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有一支革命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然而，这个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本身，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有差别的表现，它反映为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现在就来彻底消灭这种差别，消灭这种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必须逐步地缩小这种差别和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积极地为最后消灭它们创造条件。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六·二六”指示等等，为广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学习社会和学习工农的过程中改造世界观，为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指出了无比正确的道路，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强有力措施。但是，刘少奇、

林彪一类骗子却拼命扩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妄想恢复旧社会那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他们用唯心主义的“修养”经毒害知识分子，用“下乡镀金论”破坏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长期结合，用“劳动惩罚论”煽动知识分子脱离劳动，甚至把知识分子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诬蔑为“变相失业”、“变相劳改”。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妄图让某些知识分子变成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精神贵族，变成为他们的复辟活动进行舆论准备的吹鼓手，变成他们所梦寐以求的那个反革命小王朝的特权阶层。目前，虽然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康庄大道上迈出了可喜的步子，但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确实也有那么一些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这样极其深刻的政治大革命和思想大革命，知识分子当中公开站出来说工农群众不行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真正树立了唯物史观，从思想深处承认工农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承认自己要向工农群众学习的人，还不是很多。个别人对走光辉的五·七道路总觉得低气，牢骚满腹，还有的人仍旧迷恋过去那种“一张桌，一支笔，一杯茶”的书斋生活……。这些人与工农群众若即若离，还没有最后下决心附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有的即使已经附上来了，但是很不牢固，大风一吹又要飘到天上去。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有些人本来是工农出身，其中有的还从组织上入了党，但是，“称号并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按世界观和习惯来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资产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 53 页）由于长期脱离工农群众，在他们的身上已经看不到或者很少能看到工农本色和共产党人的影子了。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现象，难道还不应当引起警惕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从工厂，从农村，从沸腾的军营走进社会主义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尤其要警惕！在我们的社会里，有那么一批大大小小的政治教唆犯。只要谁脱离了工农基本群众的队伍，滋长了轻视工农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就立刻会看到他们在那儿笑眯眯地向你招手，把你引到修正

主义的泥泞道路上去。我们必须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决裂，一刻也不脱离工农群众，毕业后要高兴地回到工农当中去。只有永远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知识分子才能获得丰富的政治营养，才能具有生气勃勃的力量，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雇佣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也表现得比较突出。知识分子只有依附于一个阶级才能存在。在旧社会，当着他们依附资产阶级的时候，大多数人实际上处于一种被雇佣的地位，因而在他们身上带有一种浓厚的雇佣思想。这种雇佣思想的特点是：没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国家与革命》第 86 页）这种思想，被一些人带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来了。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生产、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雇佣思想产生的经济基础还没有消灭。因此，雇佣思想在一部分人中间，尤其是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还表现得比较顽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歪曲“按劳分配”的原则，大搞“物质刺激”，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在科学、文化、教育等部门中，搞什么“高工资”，“高稿酬”，实际上把知识分子仍旧当成商品，当成雇佣的脑力劳动者。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下，有一些知识分子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样的信条来鞭策自己，沿着大学生——技术员——工程师，助教——讲师——教授这样的多级阶梯努力向上爬。这种被货币和特权刺激起来的“积极性”，就是雇佣思想的一种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取消了“物质刺激”，有一些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立刻没那么高了，干劲也不那么足了，在工作中拈轻怕重，躲躲闪闪，甚至有个别人小病大养，无病也养，对无产阶级实行怠工。产生这种倾向的重要根源之一，也是雇佣思想。由此可见，雇佣思想严重的人，只能有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不会有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积极性。这是非常有害的。广大的知识分子，必须彻底

批判这种雇佣思想，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树立共产主义劳动观。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是为革命忘我工作的模范。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永远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习鲁迅。

此外，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个通病，就是伟大导师列宁所指出的那种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任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冲击，都是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挑战。因此，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那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必然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千般挑剔，万般指责。在这种人的行列里，就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而因为他们具有狂热性和空虚性等等特点，又往往吵得最厉害。例如在教育战线上，伴随着风雷激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农兵上大学，厂校挂钩，开门办学，实行“社来社去”等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力扶植。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一直站在旧制度立场上，抱着旧偏见，认为可以保持旧制度基础上的教育”（《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386页）。这种人，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和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上，一会儿说什么“粗瓷器雕不了细花纹”，一会儿又说什么“乱、糟、低”，“一代不如一代”，总是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还有的人嘴上什么也不说，或者有时说的比别人还要“好”，但是对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态度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种一心想走旧路的人虽然为数不很多，但是习惯走旧路的人却为数很不少，于是形成了一种旧的习惯势力。当前，在教育战线上，不少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阶级手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并没有完全结束。旧的习惯势力在某些方面盘根错节，还占优势，顽强地阻碍着新生事物的成长。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每前进一步，都得

经过战斗。已经取得的教育革命成果，还不巩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还有卷土重来的危险。这种状况，是必须改变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革命就意味着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诞生。革命者必须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伟大导师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曾经谆谆告诫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他们去研究部队，工厂和农村里的新事物，要他们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反复教导我们："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 202 页）我们广大的知识分子，必须按照革命导师的这些教导去做，认真看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当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和旧事物的掘墓人，不能当新事物的绊脚石和旧事物的殉葬者！

以上种种，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几种主要表现。这些，都是必须破除的。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是共产主义觉悟的表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改造世界观，绝不可能自发地实现，必须依靠自觉。目前，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联系自己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作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有力地促进了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党和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把他们当作革命的财富，对他们寄予殷切的希望，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 581 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在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怀和爱护。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抓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是完全一致的，不是互相矛盾的。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正是为了使他们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没有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殷切希望，他们正在努力前进。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有人在那儿停顿不前，甚至在向后倒退。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有人还公

开说什么："这样的基本估计调动不了我的积极性"。这是非常错误的，极其危险的！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必须继续前进，"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不能把技术当成私有财产

1975-06-19　人民日报

“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党和人民教给的技术，用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绝不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用来扩大同其他社员的差别。”这是河北省怀来县新保安公社西园子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李洪启同志联系自己的经历，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体会。

一九六二年初，李洪启响应党的号召，从县建筑队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当时，他下了很大的决心，表示要把自己学到的技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可是，由于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引诱，不久，他就放下了队里的农活，只顾外出做工赚现钱。当时有人曾提醒他说，你钱挣多了，可是路走错了。他还不以为然，心想：咱凭技术吃饭有啥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一次忆苦会上，李洪启回忆了自己苦难的家史：旧社会，父亲当木匠几十年，盖起新房千百间，自己却落得个“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他明白了，自己错就错在把党和人民教给的一点技术，当作私有财产；错就错在被“私”字迷住了心窍，走错了道路。他决心改正错误，用自己的技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一九六九年，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根据“立足长远、狠抓当前”的安排，决定抽出少量劳力在村北沙坡上建库房、学校和饲养棚。李洪启主动挑起了这副重担。他和专业队的同志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干苦干了六年。这六年中，他和社员们采用土办法绘了一张张图纸，盖起了一栋栋新房，而拿的工分报酬，却和同等劳力一样多。

这六年中，不断有人请李洪启出外做工。他们说：“凭你这份手艺，到哪里也比西园子强。”李洪启却说：“西园子的贫下中农需要俺，俺留在这里是铁心了！”

李洪启同志用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着西园子大队的赤脚医生、木工、铁工以及电工、机手等有专门技术的人们。他们自觉地同轻视农村、鄙视农业劳动和技术私有等旧的传统观念作斗争，争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

本报通讯员

让思想冲破“知识私有”的牢笼

池伦

1975-06-20　延边大学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进一步指明了教育革命的方向。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搞清楚在现阶段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问题，搞清楚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表现，实质和根源，并开展革命大批判，推动教育革命的蓬勃发展，是有其深远而重大的意义的。

“教育要革命”，革命的目标就是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学校这块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十七年被修正主义统治的资产阶级专政工具。不批十七年教育革命就寸步难行，不批十七年强化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资本主义就要复辟，要跟十七年对着干，就要象朝阳农学院那样，让思想冲破“知识私有”的牢笼，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我们无产阶级要用自己面貌改造学校，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抵制和反对。这场改造和反改造的尖锐而复杂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斗争中，资产阶级赖以顽抗的精神支柱，是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知识私有”。“知识私有”这个旧社会的痕迹，是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的“土围子”，是资产阶级的框框，是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再产生的条件。无产阶级在学校这块阵地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

政，就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知识私有”这个资产阶级牢笼砸个稀巴烂，使一部分教师的思想，从这个牢笼中彻底解放出来。

私有制度是产生私有观念的物质基础，私有观念又是滋生私有制度的重要条件。反映旧的传统所有制的传统观念“知识私有”，是剥削阶级的精神武器。列宁指出：“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武器。”事实正是如此。在剥削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实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同时，便把“知识私有”作为统治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当他们被推翻之后，妄图恢复失去的“天堂”，又把“知识私有”作为开倒车、搞复辟的武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阶级矛盾简单化，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达到空前尖锐化，在那种商品成为社会普遍形式的制度下，知识也变成了商品，“知识私有”者也成了“待价而沽”的特种商品，按知识与按资本共同参加分配，知识也成了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资本，于是把入学作为投资，把升学作为阶梯，把毕业文凭作为竞争的执照，把垄断的知识作为称阀称霸的手段，这样把精神生产资料窃为私有，与把物质生产资料霸为私有是相并而行的。有资本垄断就有知识垄断，有财阀就有文阀，有买办资本就有买办文人，有汉奸资本就有汉奸文人，有经济投机商就有政治投机商。买办文人胡适就是把自己作为特种商品卖给帝国主义的，充当帝国主义的叭儿。在这些“金钱拜物教”的信徒的心目中，一切都溶入金钱买卖关系之中，把知识当成资本，把自己作为商品，充当政治投机“小贩”，这种反映“劳心者治人”的“知识私有”，乃是维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旧学校里，疯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极力鼓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从“知识私有”这个传统观念出发，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把

“知识私有”的祖师爷孔老二那套“学禄耕馁”倾销得淋漓尽致，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成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大染缸，几乎跟解放前的学校没有两样。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从前的一切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青年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在这样的旧学校里的学生所接受的知识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都是封、资、修的破烂货，灌了一脑子成名成家的迷魂汤。被“知识私有”牵着鼻子走，在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侵蚀下，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从旧学校毕业的学生，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学工的不会开车床，学农的不愿务农下乡，利禄薰心走上了脱离工农兵的邪路。有的已经走上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知识私有”给予猛烈的抨击，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对“知识私有”又进行了反复、深入的批判，广大革命师生自觉地用无产阶级专政铁扫帚，清除这个旧社会的垃圾。但是作为传统观念的“知识私有”，仍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头脑里是盘根错节的，而且，客观上还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又是滋生“知识私有”的条件。尤其是林彪反党集团疯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拼命鼓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以“官、禄、德”为诱饵，一度使“知识私有”又泛滥起来。“读书作官”、“智育第一”、“轻视工农”这些破烂货，又倾销于市，散发着臭气。在被“知识私有”牢笼禁锢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顽固地抱着资产阶级偏见，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新生事物，评头品足、百般挑剔，什么“工农兵学员质量低，基础差”、“大学不象大学样！”“我当教师我不教谁教？”等等，谰言纷纭，留恋“三脱离”、“三中心”的旧学校的那一套。被“知识私有”这个资产阶

级牢笼束缚的一部分教师，象“套中人”一样，用资产阶级狭隘的眼界，来抵制教育革命。“知识私有”在这部分人身上已经化为习惯力量，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按着商品交换原则办事，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无名不起早，无利不贪黑，重视科研，轻视教学；重视教学，轻视劳动；重视书本，轻视实践；重视自己，轻视工农，总觉得开门办不了学，勉强地走出去也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兴味去做，一味追逐搞出点名堂来，至于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和学生思想的转变，则是挂在咀上，抛于脑后。

时代在前进，革命在深入。“知识私有”这个资产阶级牢笼崩溃之势已定。因为它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有一种让“知识私有”迷了心窍的人，总是把自己思想锁在这个资产阶级牢笼之中，把自己作为商品，在那里窥伺行情，待价而沽，而还想拉人进牢笼。还有一种人感觉到靠“知识私有”过日子是靠不住的，但又没有勇气冲破它，在那里观望、徘徊。与这两种人相反，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尤其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认清了“知识私有”的阶级本质，下定决心，从改造世界观入手，跟“知识私有”这个传统观念来个彻底决裂。对“知识私有”抱着什么态度，是一个人世界观的体现。对“知识私有”这个资产阶级牢笼，是冲破它，还是固守它，是铲除它，还是强化它，这是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分野，也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说到底，这不只是对旧的传统观念的态度问题，也是对旧的传统所有制的立场问题。“知识私有”并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紧密相联的。它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反映，又是滋生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条件。这种维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知识私有”，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反动，是跟无产阶级思想相对抗，是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腐蚀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绊脚石，是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拦路虎。必须仇恨它、批判它、铲除它，不给它半点喘息之机。

因此，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什么是知识，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知识应该归谁所有，这一连串的问题搞清楚。

什么叫知识？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知识应该归谁所有，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不同阶级有其不同的答案，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必然得出两种对立的结论。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实践完全脱节”，“旧学校总是说，它要培养具备各种知识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因此，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实践的“书本知识”，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产物，都是孔老二“生而知之”的骗人鬼话。至于林彪鼓吹的孔老二，董仲舒、朱熹那套“经典”，都是没落阶级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说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两种对立的知识观。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书本知识，那是不完全的，有了书本知识不去实践或实践不了，那是主观片面的，拿着灌注剥削阶级的阶级精神的说教去撞骗，那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反动的。因此，什么才是知识，决不在于主观的夸张，决定于客观实践的检验。

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代表林彪，说是他爹娘给他生了个特别灵的脑袋，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跟孔老二鼓吹“生而知之”。是同出一辙的，还有一种来自资产阶级偏见：“知识是学校传授的，是专家、教授教给的”什么“先觉觉后觉”，这同样是为剥削阶级辩护的谎言。知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脑子里固有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是从工农群众三大革命斗争中来的，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化科学

知识是生产实践的结晶。谁教育谁和谁养活谁？本质上是一致的，劳动人民不仅是社会的主人，也是文化科学的主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差别和对立，既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万世永存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手工业和农业的大分工，出现了商品交换。“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由于阶级的出现，阶级对立便成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的基础。脑力劳动者便从属于剥削阶级，成为剥削阶级的卫道士和代言人。从孔老二到董仲舒，从韩愈到朱熹，都是剥削阶级豢养起来的寄生虫。孟轲站在奴隶主阶级反动立场上，叫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所谓“通义”，也就是捏造永恒不变的原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小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一批脑力劳动者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享有各种特权，把知识作为专利品，把知识变成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由于阶级的对立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那些效忠剥削阶级的文人食客，便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捏造知识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知识是他们维护“劳心者治人”的资本，知识是他们奴化劳动人民的特权，知识成为他们升官发财的手段。资本主义在发展大工业的基础上把技术科学和文化向前推进了，但却被垄断寡头及其豢养知识分子所垄断，成为奴役劳动人民的手段，在他们把持下的学校变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灌注资产阶级的阶级精神的学校，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子女截然分开，由于学校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关在学校外，使学校成为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培养精神贵族的工具。这样的学校是只能偏重书本知识，它强迫学生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这种知识堵塞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些照章办事的官吏，这样学校的教育目的，也只能是为资产阶级训练称心如意的奴仆，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事实

证明，把学校说成是传授知识的地方，纯属捏造。阶级斗争历史证明：学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社会主义学校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十七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历史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路线所以统治学校，这是与“知识私有”观念的泛滥息息相关的。“知识私有”这个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大祸害，是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就是利用它来扩大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不认识这一点，我们丧失警惕，就会上当受骗；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力量，去战胜它，把它彻底砸烂！把劳动人民创造的知识，窃为己有，这是私有制的罪恶。知识归谁所有？说到底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所有制的问题，谁是知识主人的问题。知识是属于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的。《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说得好：“我们的头脑接受了光明，劳动人民变得更加伟大，无论在工场，还是在茅屋，他们更加优秀，更有文化。”只有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才能把知识引向光明之路，把知识从书本里解放出来，引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受到检验，辨其真伪，给予知识应有的地位，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发挥历史主人的作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儒法斗争史，把被孔老二及其孝子贤孙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貌，使封建统治阶级的圣人——孔老二现了原形。他是“克己复礼”的吹鼓手，是什么知识也没有的大草包。那些把他作为敲门砖的历代大儒，都是篡改历史，捏造书本“知识”的政治骗子。孔老二立论的那套“经典”，被我们批个底朝上，把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跟现实阶级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促进教育革命蓬勃向前发展，对“知识私有”这个资产阶级牢笼，给予致命的打击，一些迷恋“知识私有”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巨大的触动。但是必须看到“知识私有”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资产阶级法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对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只有靠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对它批判;“知识私有”这个资产阶级的牢笼，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大批判铁扫帚，才能把它扫除干净。因此，我们要跟“知识私有”实行彻底决裂，关键在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变立场、变思想、变感情，刻苦改造世界观，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有了这种自觉，就能在自觉地改造学校的同时改造自己，自觉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自觉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一句话就是要自觉地让自己思想冲破“知识私有”的牢笼，跟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宣战，战斗到底。

封闭“苏哈列夫卡”和改造教师队伍

郑伊

1975-06-20　延边大学

一九二〇年底，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一文中指出，为使资本主义不回到俄国来，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封闭“苏哈列夫卡”。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市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它是资产阶级投机倒把的黑市的中心。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国内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人未死，心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在经济上利用苏哈列夫卡市场进行投机倒把，贩卖粮食，配合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白匪的武装叛乱，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苏哈列夫卡”由此而成为投机倒把的同义语)，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对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这种猖狂进攻，给予了迎头回击，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前夕，根据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立即封闭了“苏哈列夫卡”。

在客观上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来封闭“苏哈列夫卡”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在主观上即“心灵上和行动中”封闭“苏哈列夫卡”却要费很大的气力。正如列宁当时讲的那样：“‘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但可怕的并不是已经被封闭的‘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的是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旧时的‘苏哈列夫卡’，封闭它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列宁这一教导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在新形式中继续。无产阶级决不能因为胜利而停下脚步，而是要继续努力作战，这就是在一切领域、一切阶段中，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领域，尤其是要封闭活在小业主心灵上

和行动的“苏哈列夫卡”，即那种发财致富的投机心理。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联系教育战线上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与改造教师队伍的必要性结合起来，学习列宁这一论述，是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

事实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在政治上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在经济上剥夺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有。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毕竟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而这些痕迹的存在，就给“苏哈列夫卡”留下了得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列宁指出：“我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它没有立刻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它让现有的力量有发展的自由，而这些现有的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它们的口号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恶的资本主义口号，除了有利于高尔察克和旧资产阶级复辟以外，不会有任何好处。”情形也正是这样。你看，千百万小业主正在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就是他们自身每天都有变成资产阶级的可能。而这些正是无产阶级所不能允许的，这就使他们那种发财致富的心理受到了很大刺激，活在他们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使他们不甘心这样地下去，而是用那种投机的心理去找机会捞一把。“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当他们带着这种目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对社会主义不能不起危害作用。所以，“必须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否则，资产阶级就会利用它来向无产阶级挑衅，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列宁指出，要使动摇于两个阶级之间，与小业主阶级相适应的知识分子不起有害的作用。他说：“新式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经有可能去镇压剥削者，有可能去镇压这些因旧日的钱包和旧有的知识而显得强有力的极少数人的反抗。教授、教师、工程师将自己的知识变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他

们说，我们愿意以自己的知识为资产阶级效劳，不然我就不做工。”知识分子人数虽然很多，但是不能构成一个阶级而独立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依附于资产阶级，成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的奴仆。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我”的做人“诀窍”在这些人的心灵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因循守旧地把知识作为资本，他们总是被“劳心者治人”的资产阶级偏见束缚着。他们读书就是要做大官，发洋财，进而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为了达到这样目的，他们不惜一切，挖空心思地想把知识垄断为己有。因为“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在这些狭隘的眼界里，知识就是商品，知识就是货币，占有知识的人本身也是商品，这个商品价格的高低按掌握知识多少而定。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那当然会被资产阶级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知识私有”观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无产阶级还不可能马上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的教育体系，也没有一支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因此，就必须“要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的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这就在客观上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另外，“教师群众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浸透了这种文化的缺点，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教师”。因而，他们决不会把自己的那片毛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相反，而是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和“为我”等资产阶级的毒菌去传染人们。另外，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尤其是“知识私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是千百年来就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剥削阶级传统偏见，不可能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立即消失，这也决定了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毒害我们。当然，革命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是热爱党，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但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那种惯有

的争名逐利的投机心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来。当老奸巨猾的资产阶级分子实际上“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公开反对劳动群众”的时候，就鼓吹起“知识私有”、“文化至上”的口号。这时，活在这些知识分子心灵上的“苏哈列夫卡”立即和这个口号一拍即合了。他们虽然在社会主义的学校里，却用小生产的方式去工作，靠那一桌一椅，关起门来抠书本，把知识做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互相保守，文人相轻，争名逐利。这种“知识私有”观念就是资产阶级在教育阵地上的土围子，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也就是活在这些和小业主阶级相适应的知识分子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我国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资产阶级就是利用了这个土围子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知识私有”这个资产阶级的土围子遭到了无产阶级的猛烈冲击。广大的知识分子在这样一场革命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这些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仍然给活在某些知识分子心灵上的“苏哈列夫卡”留下了继续生存的土壤。这些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些人还跳不出资产阶级的小圈子，他们往往把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看成是按“知”分配的根据。他们自以为有了一点知识，就觉得了不起，昂首翘尾，待价而沽。某些教员把课堂当成商场，自己当商品，拿知识做买卖。有些身为马列主义政治课的教员，居然把自己的理论也作为“经商”的资本，当成商品来出售。某些教员不爱参加政治活动，却热衷于搞学术研究；给学生讲课时漫不经心，外出作什么学术报告却劲头十足，他们要用“知识私有”这块砖敲开名利的大门。这种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也侵入了在文化大革命后进入大学的青年教师当中，有的开始羡慕起那些垄断知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了，只顾钻研业务，却忘记了世界观

的改造，对教育革命漠不关心。在一些工农兵学员中，还认为到大学来就是拿着红口袋装知识，认为有了知识才算有真本事，到哪里都吃得开，用得着。

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战场进行斗争并且顺利地取得了胜利，使我们的精力增加十倍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就是对于危险的认识。现在，我们对“知识私有”观念也必须当做危险来认识。不能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经过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使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有很大提高。但是必须看到，还有一部分人象“套中人”似地迷恋在“知识私有”的土围子中。“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放弃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知识私有”观念在教育阵地上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资产阶级正是利用它来作为恢复自己统治的尝试。要看到“知识私有”观念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产生出来的，同时又为私有制服务。私有观念表现在经济领域里是资本家占有的大量的生产资料，表现在教育文化领域里是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科学文化知识。它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着破坏瓦解作用。它用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企图维护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因素，使私有制复活起来；它毒害教师队伍，是束缚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它腐蚀人们的灵魂，诱使人们去追求名利地位，升官发财；它严重地破坏了教育革命，阻碍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扩大了三大差别。所以，“知识私有”观念是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上实行反革命专政的有力工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

毛主席最近指出，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知识私有”观念指出了一条明确的方向。不限制，那就势必会产生一小撮精神贵族，就会由知识上的垄断进而谋取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那时，旧时的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的状况又会重新出现。我们不能听任这种“知识私有”思想再继续泛滥下去，必须

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否则，资产阶级就会从教育阵地上打开缺口，资本主义的逆流就会冲进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有被颠覆的危险。

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封闭教师心灵上的“苏哈列夫卡”，首先要遵照毛主席“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伟大教导，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对教育革命的领导作用。认真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知识分子要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在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斗争实践中，努力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士。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毛主席一贯关心、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进步问题，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从教育革命发展的需要来看，原有的教师队伍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都还不能适应。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组织广大教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搞清楚。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去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广大教师要坚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知识分子只有走到工农中间去，才能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来改造他们自己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的谋生条件，才能跳出商品经济的框子和资产阶级个人的小天地。“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师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才能搞好教改。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把三大革命当作课堂，联系实际进行教学。要进行社会

主义教育，努力缩小三大差别。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劳动人民要知识化，大力普及文化教育。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只有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才能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开辟前进的道路，无产阶级也只有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创造新世界。我们相信，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认真学习，一定会在把学校改造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斗争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调查报告

1975-06-22　人民日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发表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在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指引下，两个月以后，上海机床厂办起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创办的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它的出现，掀开了无产阶级教育史上的崭新的一页。

七年来，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这所工人大学认真实践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今天，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推广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创办更多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教育事业，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招收三期学员。它设有机床设计制造专业，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选拔学员，到学校学两年半到三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已经毕业的两期学员共有一百四十九名，其中有四十名是为外厂培养的。目前在校学员一百零九名，他们的平均工龄八年，平均年龄二十六岁。

人们说："改造旧大学得派工宣队去'掺沙子'，这所工人大学就办在'沙窝子'里。"它直接置于工厂党委的领导之下。全厂五千多名工人是"不走的工宣队"。工人们团结愿意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知识分子，共同按照无产阶级的标准来办好这所新大学。

这所学校的教师，主要也是工人。搞机床的，搞液压的，搞电器的优秀工人，都登上了大学的讲台。现有工人专职教师八名、兼职教师几十名，他们同十八名知识分子出身的教师一起，形成了一支以工人教师为骨干的教师队伍。他们所用的教材，由工人教师为主，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总结生产经验和发明创造来编写，既有实践性，又力求反映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新教材《磨床设计和制造》，就是这样由八十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编写而成的。学校师生到哪个车间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哪个车间的工人和干部就积极支持，热情帮助。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旧学校那种"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劳动，脱离工农）现象，在这里受到清除。七·二一工人大学决心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作为最好的课堂，让学员在斗争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学员不仅学习专业，首先要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学习曲线直线，首先要懂得党的基本路线。他们在学习期间，"身上不减油泥味，两耳不断机器声"。工厂生产大忙的时候，学员们回班组参加生产劳动，工人流多少汗，学员也流多少汗。

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把学校作为追求名利，爬上特权阶层的阶梯。如今，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七·二一工人大学坚决地拆掉这把梯子。它的毕业生一不发毕业证书，二不增加工资待遇，三不要工程师、技术员的称号。他们毕业以后，仍然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二）

上海机床厂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坚持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在技术领域里的优势。由于七·二一工人大学两期毕业生先后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由于工厂继续通过“三结合”设计等途径培养新的工人技术人员，现在这个厂工人技术人员总数比一九六八年增长了一倍多；工人技术人员在全厂技术队伍中的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大批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培养，在厂里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技术部门过去那种技术保守、关门设计的倾向改变了，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密切了。在工人技术人员的带动下，许多原有技术人员也积极地下车间参加劳动，与工人一起搞设计，搞革新，增强了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自觉性。

人们称赞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的政治觉悟高。他们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带头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林批孔以来，有百分之八十的毕业生都参加了工人理论小组。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他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表现作斗争。这些工人大学毕业生，造机床，搞革新，拿起笔杆能设计，开动机器会做活。据初步统计，以第一期毕业生为主，或由他们参加完成的比较重大的新产品设计和技术革新项目就有五十多项，其中包括大型高精度油膜轴承磨床、全自动双端面磨床、宽砂轮高效率磨床等许多具有先进水平的新产品。

从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按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办好工人大学，能够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群众评论工人大学毕业生是“知识化的工人，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能文能武，而且能上能下，党叫干啥就干啥，摆到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第一期毕业生吴永章，由于工作需要，几年之间调换岗位七、八次，都干得很出色，设计，施工，车、铣、镗、磨，样样都行，被人称为“万能师傅”。他当普通工，主动打扫垃圾。有

人问他："大学生还扫垃圾？"老吴说："都是革命工作，不能分高下。"老木模工徐宝源，入学前是木模车间的领导成员，毕业后当一名普通工人，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变，共产党员的革命斗志不减。他边劳动边参加精密机床的设计和制造，产品制出以后，还和包装工人一起装箱出厂。工人们说："这样的大学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安在哪里都顶用，走到哪里都受欢迎。"

（三）

上海机床厂创办这样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培养出这样的新人，这是同旧传统观念的决裂，是对旧教育制度的无情的批判。在它的诞生和成长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斗争往往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

工人大学要不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工人学员还要不要改造思想？这是首先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

有人认为，工人学员根红苗壮，政治条件好，上大学主要是学技术。有的工人学员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也认为自己是带着"红口袋"来装知识的。工厂党委和学校党支部认为：七·二一工人大学是新型的大学，但不是"红色保险箱"。文化大革命前，也有工人进大学的，但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有一些工人进了大学以后，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变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如果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麻痹大意，也可能"技术到手，人被夺走"。因此，他们从办学以来，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他们不断地端正学员的入学思想，引导学员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学员，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学员的头脑。厂里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师生们都参加。有一次，师生参加运动，有人说："又停课了。"学校领导上及时指出："这不是停课，而是上主课，一定要上好。"学校还注意组织学员定期向原班组汇报学习情况，依靠工人群众做好学员

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位老工人入学后，一门心思钻技术，因为怕耽误自己学技术，不肯做社会工作。他想，“阶级兄弟送我上大学，就是要我掌握技术大权的，不学好技术回去怎么交账！”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工人知道后，关心地向他指出：“我们送你上大学，是希望你不仅在技术上有所前进，更要在政治上迈出新步子，做出新样子！”原单位同志们语重心长的话，对这位老工人触动很大。他在学校里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愉快地承担了社会工作。毕业的时候，他总结自己的体会说：一个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要掌握一点技术理论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学好马克思主义，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教育与生产劳动，是相结合，还是相脱离？这是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又一个问题。

七年来，这所工人大学利用办在工厂里的有利条件，认真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不但定期组织学员回班组参加生产劳动和到农村去学农，而且一直坚持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使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第一、二期工人学员在校学习期间，就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完成了四十多项比较重大的新产品设计制造和科研项目，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对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

这样的大学好得很。但是，资产阶级却说它“不正规”，“学不到多少理论”，“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后劲”。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同这种论调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指出：理论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实践中来！教学结合生产劳动，怎么就是“不正规”！修正主义路线下旧学校的那一套，要害就是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践，培养出来的学生，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地，三不懂社会，不懂阶级斗争，毕业后还得在实践中“补课”，到工农兵群众中“回炉”，这才是真正的没有后劲。在工厂党委的领导下，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师生们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更加意气风发地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车间派老工人和工人技术人员对师

生进行政治上的帮助和技术上的辅导，师生们也在车间跟班劳动，整个教学工作搞得生动活泼，卓有成效。

大学毕业是不是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当一个普通劳动者？

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工人群众欢欣鼓舞。但是，有人却认为这是“屈才”，“岂不是白念了几年书？”上海机床厂党委领导广大工人和学校师生，以毛主席《七·二一指示》为指导，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广大工人指出：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我们工人是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才上大学的。党培养我们上大学，学到革命理论和科学技术知识，只是增长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决不是有了向人民讨价还价的“本钱”。那种认为上了大学就可以高人一等的思想，是“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它同我们工人大学的培养目标格格不入。大学毕业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工人学员们说：我们就是要坚决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当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四）

七年来的实践说明，在教育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时起时伏，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按哪个阶级的面貌办学、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工人大学办在工厂里，对无产阶级掌握这场斗争的主动权十分有利。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七年，就是在教育这个上层建筑领域里依靠工人阶级，不断加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七年；就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办学，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七年。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如今，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已经传遍全国。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各地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办起了一所所新型的工人大学。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在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光明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工人技术队伍的生力军——记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

1975-06-23　人民日报

上海机床厂创办的我国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已经毕业了两期共一百四十九名工人学员。他们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以后，能文能武，朝气勃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为工人技术队伍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这才是自己的大学生

一九七一年七月，女行车工王彩彩从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回到二车间来了。

这个车间运输大型加工件，过去全靠手推平板车，在一百六十米长的轨道上推来推去，占用劳动力多，体力消耗又大，工人们迫切希望改成电动的。可是，对这种笨重体力劳动有切身感受的工人，自己不会设计；而懂得设计的一些技术人员却又缺乏这样的切身感受，认为这种改装设计“没啥油水”，“搞成功出不了名，失败了还要丢面子”，不肯设计。就这样，工人们盼了一年又一年，愿望没能实现。

王彩彩本来就是这个车间的普通行车工人，推过平板车。一回来，她就和另一位工人大学生一起，主动承担了把手推平板车改装为电动平板车的任务。从讨论设计方案到找材料加工、安装，他们日夜同工人并肩战斗，短短一个月，就把它改装成功了。工人们操纵着电动平板车，又方便，又安全，不禁心里乐滋滋。

为了减少装卸次数，王彩彩还同车间几位女工一起，设计了一台大型电动平板车，能够把几十吨重的整台机床直接运到铁路边，装上火车出厂。

从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以来，王彩彩抓紧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自觉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她回到车间劳动一段时间后，因工作需要，被调到车间技术改造小组，但仍然坚持参加劳动，生产忙时还顶班干活。她搞技术工作，不

图名，不图利，全心全意为生产斗争服务，同工人们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块流。工人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都说："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大学生！"

工作越干越出色

老工人吴继洲，解放前十一岁便进工厂做工，被资本家压榨得骨瘦如柴，吃尽了阶级苦；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到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了几年，思想"淬火"，斗志更坚，回来担任二车间修理组组长，工作越干越出色。

吴继洲毕业回来以后，没有一点大学生的架子，工作哪里艰苦，他就在哪里战斗，经常为修好一台机床而日夜连班地干。今年三月的一天下午，工人们正在为完成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而紧张地劳动。下班铃已经响过了，突然车间里大行车出了故障，行车工人非常焦急。吴继洲闻讯后，向几位修理工人说了一声"抢修！"拿起工具就赶到现场。他第一个爬到十多米高的行车顶上修理，连晚饭都顾不上吃，直到修好行车，保证了生产。

他们这个修理组，担负着全车间几百台机床设备的维修工作，任务繁重。吴继洲常对小组同志说："我们机修工人应该象医务人员关心人民健康那样关心机床，做到小毛病早发现，早修理，不影响生产。"他们经常访问操作工人，听取意见和要求，做到对每台设备心中有数，安排好维修时间。需要拆换部件停车修理的，就事先准备好零件部件，利用工人休息日突击抢修，尽量使机器少停转一分钟，为社会主义多贡献一份力量。

过去，维修大型复杂精密的机床，要等厂里安排，缺少的零部件要等技术人员测绘、工人加工。现在，吴继洲自己懂得设计，能自己测绘、自己加工，取得了修理机床的主动权。他还运用在工人大学学到的关于机床设计与制造的知识，同小组工人一起研究各种机床的结构原理，对原来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就自己动

手画图设计，加工配件，大胆加以改造。有一台六米龙门刨床，过去一年要修十几次，他们便解剖分析这台床子经常出故障的原因，对症下药，给加上了一个附件。到现在，这台刨床已经正常运转半年多了。刨床工人非常满意，热情称赞工人大学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是“知识化的工人”。

安到哪里都起作用

工人大学毕业生徐宝源，人们称他是一颗“革命螺丝钉”，安到哪里都起作用。上大学前，他是上海机床厂木模车间革委会委员，抓革命、促生产走在先；工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时，车间工人敲锣打鼓地送他上大学，他在学校里担任党支部委员，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大学毕业回到车间，徐宝源又干起了木模工。有人问他：“你怎么上了大学，反而成了一名普通工人？”徐宝源爽朗地回答说：“当工人并没有减少我的革命责任，我们革命工人只能由革命工作来挑选我，绝没有为个人去挑选革命工作的权利。”他干起活来，哪里艰苦就在哪里干，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后来，厂里交给他设计转塔式组合机床的任务，徐宝源愉快地接受下来。这是一项援外任务。他怀着捍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支援世界革命的决心，搞好这项设计。本厂没有做过这种产品，外单位也没有现成的图纸和资料，他就和别的设计人员一起，先后到十几个兄弟工厂去取经。经过仔细计算，认真试验，在半年时间内就设计出了四个品种的转塔式组合机床。接着，他又投入施工，在现场和工人一起解决加工制造中的问题。总装配和试车时，他和另一位工人大学生两人顶三班，日日夜夜和工人一起战斗。试车的结果证明，这四台机床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

搞完了设计与制造，徐宝源还感到没有完成任务。他又把这些机床的性能特点，怎样使用调整，怎样维修保养，写成了六千多字的详细说明书，文字说不清

楚的地方还画上了图。出厂的时候，包装活儿紧，徐宝源放下笔杆，又拿起了榔头，和工人们一起包装钉箱，直到妥善地运走。

知识属于人民

我国第一台数字控制凸轮曲线磨床试制成功的消息，很快在厂里传开了。当大家知道这台机床是由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生沈关松担任电器部分总体设计时，无不为之高兴，说他为工人阶级争了气。

工人们热切地对沈关松说："你是工人大学生，能不能把数字控制新技术，也给我们讲上几课？"沈关松高兴地说："我能上大学，这是党的培养，工人阶级的委托，我的技术知识是人民给的，属于人民所有；只要大家需要，我随时都可以讲！"

当过十年钳工的沈关松，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搞技术改造的热情很高。上工人大学以前，他和工人改革动平衡机的结构。那时，请一位工程师帮助出出主意，工程师不肯讲，反而冷言冷语地说："搞机床改造可不是变戏法，没那么容易！"过去，厂里有几个工程技术人员也曾研究过数字控制磨床，但关门搞设计，不与工人结合，相互之间又不交流技术，结果试验多年，半途而废。沈关松对资产阶级的"知识私有"观念深恶痛绝。他在负责数字控制凸轮曲线磨床的电器部分总体设计时，坚持走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搞技术民主，开门设计。他们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为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同志们讲好数字控制新技术，沈关松利用业余时间，进一步查阅有关技术理论书籍，总结这次设计制造电器部分的经验教训，认真地进行了准备。他先后在本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工人业余学校，以及上海市的有关单位，讲了十多次数控技术课。每次讲课，他不但毫无保留地讲，而且和听课的同志一起讨论，热情地回答问题，把讲课作为向别人学习的一个良好机会。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毕业生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一支工人技术队伍的生力军。随着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成长，这支工人技术新军更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新华社记者

资产阶级的领地　修正主义的染缸——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苏联教育

北京变压器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师范大学　岩文

1975-06-23　人民日报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阶级社会里，总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明确地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把苏联教育蜕变为复辟资本主义和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利用他们篡夺来的党政大权，把持了教育的领导权，在教育领域里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叫嚷要"以二十大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等货色，为在苏联强化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效劳。那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窃据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职务，而劳动人民却根本无权过问教育事业。教育这块阵地成了苏联新老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今日苏修之教育，实质上也是如此。苏修叛徒集团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需要，赋予教育以双重目的：一方面为资产阶级训练供其驱使的奴仆，

另一方面培养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为此，苏修对各级和各类学校的任务以及毕业生的去向，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例如，有的学校的任务确定为培养"有技能的工人"，也就是培养大批能为他们提供剩余价值的熟练的雇佣劳动者；而有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任务则是培养"明天的生产指挥者"和所谓"有渊博理论知识"的"专家"，充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替他们去压榨和剥削苏联广大劳动人民。

苏修在《教育法令纲要》中标榜，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互相衔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高等学校。然而，苏联的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幅图景，在享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着极其明显的阶级对立。在今日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深重的苏联社会里，人人有权升入高等学校只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苏修公然胡说劳动人民的子女"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手工业者"，甚至污蔑劳动人民受更高的教育是"在沙土或石头上播种的无效劳动"。寥寥数语，已把这伙叛徒敌视和愚弄人民的丑恶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尽管苏修当局多次宣布要普及中学教育，然而至今仍未兑现。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读几年普通学校或职业技术学校，只能成为廉价劳动力。

可是，对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子女开设的高等学校，苏修统治集团却关怀备至，在经费上和师资上都是优先照顾。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沿着学校的金字塔向上爬。据苏修自己的调查称，在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升入高等学校，毕业之后成为"专家"，并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可见，苏修的教育实际上成了维护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变相世袭的一种手段。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领地

苏修侈谈什么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而实际上他们取消了工农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在高等学校招生问题上，他们玩弄在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花招，鼓吹“知识是最高的仲裁”，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识”。《真理报》还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制造声势。他们胡说什么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可见苏修鼓吹“知识仲裁”，正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子女有父母的资本和权力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据苏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五个到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自然只能望洋兴叹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这种知识商品化的丑恶现象极其愤慨，他们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事实早已戳穿了苏修所谓“教育平等”的谎言。什么“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都不过是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因此，苏修教育方面的阶级对立只是苏修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缩影。今天，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苏修教育的真相。

培养精神贵族的场所

苏修叛徒集团大力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宣扬学生的任务就是“获得牢固的科学知识”，叫嚷“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甚至胡

说“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量是智力劳动”。苏修鼓吹“智育第一”，装出一副只谈知识不谈政治的样子。可是，“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事实上，苏修以“智育第一”作幌子，在学校中不断加紧进行军国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教育，使教育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服务。

为了适应修正主义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苏修还费尽心机大搞“天才教育”。苏修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和选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选拔为“尖子”，或者在中学里从优施教，或者送进各种专门设立的“天才学校”。在高等学校里更是把“筛出”来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所谓西伯利亚“科学城”，就是进行“天才教育”的一个典型。他们挑选了一批“天才生”，封之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由“天才教师”按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特殊教育。他们还为资产阶级的子女开设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有的军事学校公开规定只收军官的孩子，有的学校不公开招生，只在上层人物的子女中选拔。这种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同当年老沙皇开办的贵族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叛徒们还把“物质刺激”原则搬进学校。特别在高等学校里，他们巧立名目，实行高额助学金、奖学金和学位、学衔制度。表面上是刺激学生钻研书本的积极性，实际上是用金钱进行收买，引诱青年追名逐利，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从而把他们培养成鄙视劳动、压迫工农的精神贵族。

苏修拼命宣扬读书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勃列日涅夫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这就是说，苏修的党和国家的权力主要控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手里。在苏修“二十四大”的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

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苏修一个头目还宣称：“现在，所有的州委书记，绝大多数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主席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以此炫耀苏修“社会主义”的“发达”，其实这正表明他们把高等学校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他们把知识变成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残酷地欺压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由此可见，苏修教育在维护和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苏修教育，已经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和修正主义的染缸。但是，苏联劳动人民决不会容忍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倒行逆施。他们必将奋起斗争，推翻苏修的法西斯统治，夺回垄断资产阶级霸占的一个一个领地，包括教育这块领地，使苏联重新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苏修教育

焦平

1975-06-23　解放日报

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一文中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后，完全背叛了列宁的遗训，他们使教育为培植精神贵族和巩固苏修的反动统治服务，使学校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高喊“普及教育”，追逐最大利润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喋喋不休地高喊要“加快普及教育的步伐”，并且经常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统计数字，吹嘘教育“发达”的程度。这实际上是把教育作为对劳动人民榨取最大利润的工具。早在五十年代，凯洛夫之流就已经给苏联学校贴上了利润原则的标记，提出“培养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一代，这就是新学校的任务”。他们公然说什么“工人为掌握职业即使从初等教育中所获得的东西，也比在车床旁从事同样长时间的实际工作获得的东西多”。到了七十年代，他们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教育是最有效的投资部门”，要把经济效果作为考察学校的标准。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眼里，办学校不仅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它“比建筑道路、水坝、发电站等方面的投资的回收要快”。恩格斯说过:“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恩格斯当年揭露英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给工人后代也受一点教育的这句话，用来分析苏修“普及教育”的反动本质是十分恰当的。

大搞“天才”教育，资产阶级霸占学校

赫鲁晓夫上台给学校提出一个新任务，叫做“发掘和关心少年天才”，勃列日涅夫也叫嚷“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主要源泉”。苏修叛徒集团如此为“天才”教育大造舆论，目的就是要让官僚资产阶级垄断教育，让他们的子女霸占学校。他们大搞“天才”教育，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在一些大城市，把经他们选中的所谓“天才生”集中起来，开设了多种类型的特殊中学，如数学中学、物理中学、外语中学等等。在这些学校里有优越的师资配备和实验室，还有其他许多专门教学设备。这些“天才生”可以用科技活动代替生产劳动。其次，在一些重点中学里，他们又为所谓的“天才生”，设立扩大教学内容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等科的特别班，增加学习时间，配置专门教师指导，加以破格培养。另外，还规定高等学校招生，要优先录取这些“天才生”。近年来，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搞什么大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大会”，在大学生中寻求“天才”人物，这种“奥林匹克竞赛大会”中的优胜者可以戴上“象征着荣誉与胜利”的“月桂帽”，荒诞到了极点。苏修大搞这一套“天才”教育，完全是为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这一点，连西方资产阶级也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指出，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借助卢布刺激学生，培植新的精神贵族

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总是“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在今日的苏联，苏修头目公然宣称“知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竭力向学生灌输“知识越多，身价越高”的陈腐观念，在学校里，大搞卢布刺激。学生的奖学金仿照工资制度，分为“基本奖学金”和“个人奖学金”两种。“个人奖学金”相当于工资制度中的“个人津贴”，是专门发给那些学业成

绩特别“出色”的学生。一九七二年，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采取了一项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奖学金的新措施。这个新措施，以“注重学业成绩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来决定奖学金的获取。对所谓“成绩优秀，在社会和科技工作上表现良好的学生”，可以除发给奖学金的规定数额外，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另外，校长“有权在已批准的学生奖学金的总数额内，对那些学业成绩优良，在社会工作和科技工作方面表现良好的学生，再增发百分之十五的奖学金”；同时校长也有权对“几门学科考试不及格，和考期过后而补考及格的学生，不发给奖学金”。苏修在学校中以搞这一套卢布刺激为诱饵，驱使学生拼命把自己培养成符合苏修统治集团需要的新的精神贵族。

加强军国主义教育，把学校绑上争霸世界的战车

为了适应争霸世界的反革命需要，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来，还大大加强了学校的军国主义教育。苏修教育部门的一个头目宣称，“对青年学生的初等军事训练，将从九年级开始进行，共一百四十小时，包括三十五小时学习公民国防原理。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学习初等军事训练学科的时间，十年级每周为二小时，九年级每周为一小时”。

他们对苏联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肆渲染火箭——核武器的所谓威力，妄想用这种唯武器论训练学生，给自己壮胆打气。苏修报刊无耻地吹嘘什么“苏联武装力量拥有火箭——核武器，这本身就是加强我国军队的精神潜力的强大因素的源泉”。

苏修在学校中把反动的军国主义教育作为一门“基本课”，要“考试”和“记分”，规定军训课不及格者则不予毕业。他们要求“每一个教师应当善于从教育上论证所教学科跟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任务的联系”。同时，还由国防部向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派遣了大批军官，直接控制这些学校的军事训练。到一九七四年，

全国四万七千七百所中学已经全部配备了军事教官，许多学校还拥有自动枪、卡宾枪等武器。苏修大搞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为它对外侵略扩张，妄图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服务的。

推行“专家治校”，维护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苏修的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校长被捧到极高的地位。这些校长实际上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学校中的代表。他有权决定干部的选择和使用，有权对学校课内外一切活动进行安排，直到决定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在校长控制下设立的教育委员会和教师教学法协会，则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对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苏联高等学校中，从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到系主任为首的系务委员会，上上下下都为教授、专家所霸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结果就是一小撮特权阶层垄断教育。在这样的学校里，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女越来越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一九五八年在莫斯科高等学校中，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子弟只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其他都是职员和知识分子子弟。另据苏修报刊透露，一九六三年在新西伯利亚州，农民子女在读完中学后有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希望上大学，但只有百分之十能如愿以偿。此外，苏修学校还通过种种卑鄙的手法为一小撮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苏修各级党政头目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子女进高等学校开假证件。西阿赫麦塔市苏维埃前副主席给自己女儿写了一份假鉴定，证明她是市苏维埃代表，轻而易举地进入了高等学府。这就使苏联的学校完全变成了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缩小和消灭是历史的必然——兼斥林彪对干部走“五·七”道路的诬蔑

施钟文

1975-08-15 甘肃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马克思教导我们：“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以铁的历史的必然性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已几千年了；它是造成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它一定要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消灭。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促进它的最后消灭，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苏修叛徒集团、林彪反党集团却要极力扩大这种差别，用种种努力使它免于消灭，维护这个造成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辩证地认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自觉促进它的逐步消灭的过程，无论在理论方面或者在实践方面，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人类在通过生产劳动作用于自然界、并改变自然的同时，改造着人类的本身。是生产劳动使手变得自由起来，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生产劳动推动着猿的脑髓朝着人的脑髓的方向发展；是生产劳动使原始的人们感到彼此之间

有些什么非说不可，从而使语言和思维从生产劳动中并同生产劳动一起产生和发展起来；是生产劳动使人类学会了捕鱼打猎、利用火、驯养动物和种植庄稼；是生产劳动使人类了解了诸如日月星辰和风晴雨雪等自然现象、自然界水火雷电的性质、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等自然界的规律、自然和人类的关系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本身是生产劳动创造的。人类自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是由生产劳动推动的；人类从野蛮时代通向文明时代的道路，是由生产劳动铺成的；没有生产劳动，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实践论》）

在人类童年时代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从事着原始的集体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既是人们的权利，又是人们的义务，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谁都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把自己在集体中应担负的一分劳动加到别人的身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是结合在一起的，谁都是在自己的头脑支配下进行生产劳动，而不屈从于别人的意志。那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程师、科学家，人们用以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武器，只不过是原始的粗陋的石器和弓箭，他们既是这些武器的发明家、设计师，又是这些武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那时，也没有专业的作家、演员、音乐家，作为当时人类社会生活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的文艺作品，是集体的创作。例如共产主义者鲁迅所指出的"杭唷杭唷派"的诗歌，就是从集体劳动中产生，并为生产劳动服务的。

历史走着辩证法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本身的生产劳动和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劳动人民的伟大作用，在进入文明时代的私有制社会以后，被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一部分人否定了。人类在跨进文明时代的门槛之前，由于生产劳动实践的经验的积累，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的劳动力已经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在生产劳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类的头脑，已经能够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头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来执行它所

计划的生产劳动。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并造成它们的对立状态的，是以下的情况。主要是由生产劳动所推动的迅速发展的文明，被处于襁褓中的向上的奴隶主阶级，歪曲地完全归功于人的脑髓的发展和活动，而战争又开辟了新的劳动力的来源，俘虏免除了被吃掉或被杀戮的命运，通过肉体强制被迫成了生产奴隶。于是，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性的战争，是比从事创造性的生产劳动更容易和更豪迈的英雄事业，绞尽脑汁用有形的鞭子和无形的锁链驱使奴隶劳动，榨取奴隶的血汗，是比进行物质生产劳动更高贵和更荣誉的活动。这种野兽般的行为，在当时促进了童年时期奴隶制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也就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而发展。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为古代奴隶制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没有这种分工和对立，就不会有古埃及的金字塔文化，也不会有我国古代的青铜器文化。这种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不是别的，乃是奴隶的血泪和尸骨造成的。奴隶制的发展，造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统治着社会，即生产劳动被认为是只有奴隶才配搞的，比掠夺更为可耻的活动，发号施令役使奴隶，则被认为是荣誉的高贵的行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下面的这一段话，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说：“主人不是通过获得奴隶，而是通过使用奴隶，来证明他自己是主人。这种学问并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那不过是，凡是奴隶必须会做的事情，主人应当会命令。在主人不必自己操心的地方，这种荣誉就由管家来承受，而主人自己则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政治学》，贝克尔编，第一册第七章）

奴隶社会以来的几千年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日益发展，对立日益尖锐，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为了他们一小撮吸血鬼的私利，把从事生产劳动、推动历史前进的劳动人民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恣意践踏，与此相适应地，他们还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强制推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是永恒

的自然法则的思想，和轻视生产劳动的观念，狂热地宣扬颠倒历史的唯心史观，毒害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精神上的统治。

资产阶级“实际上不会劳动，他们由于自己的条件可以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来生活，或者靠这样一种劳动来生活，这种劳动只有在可鄙的生产方式下才能称为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七页）因此，他们极力维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用他们所榨取的工人的血汗，培养和豢养一批片面的知识分子，为其对内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对外侵略和掠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服务。他们付给这些片面的知识分子以优厚的待遇，使之依附于资本家的钱袋，依附于资产阶级吮吸工人血汗的机器，而为资本家效劳。这些知识分子，有的专门为剥削制度辩护。美国奴隶制度的维护者奥康瑙尔律师，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在纽约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如下的最妙不过的高论：

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经决定黑人要处于这种奴隶状态。他身体强壮，干活有劲，但是，给他以这种强壮身体的自然，却既没有给他以统治的智慧，也没有给他以劳动的意志。这两样东西他都没有！而没有给他以劳动意志的同一个自然，却给了他一个主人，把这个意志强加于他，使他在适合于他生存的那种气候条件下，成为一个既对他自己又对统治他的主人有用的仆人。我认为，使黑人处于自然安排他所处的那种状态，给他一个主人来统治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如果人们强迫黑人再去劳动，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这并没有剥夺他的任何权利。

这真是登峰造极、无与伦比、最最厚颜无耻的胡言乱语。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另一部分则用他们的知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减少资本家榨取剩余劳动的费用，增加剥削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上的新成就，必然地转

变为资本家奴役工人的新手段；科学文化的发展，是靠牺牲工人阶级来实现的，是由工人的血汗造成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实质上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这个时代的错误中，孕育着纠正这个错误的客观的历史的铁的必然性。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是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消灭则是现代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一种历史生产方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方式消灭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对政治统治和精神领导的占有，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严重障碍。摧毁这种生产方式以及现代社会不平等最重要根源之一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属历史发展的必然。“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九二五——九二六页）这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消灭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统一起来了。把这种必然性和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则是无产阶级的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使命。

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要消除这个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决定性的第一步，是用革命的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本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

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在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基本消除，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它们的本质差别仍然存在，这种差别仍然是产生新的精神贵族的最重要的根源。逐步创造缩小这种差别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要经过长期的多方面的不懈的努力奋斗。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轻视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是永恒的、天经地义的等等谬论，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类，并不会因为它们所由产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已经变更，而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列宁说得好：“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不仅要破坏和捣乱，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而且还会变换各种旗号来鼓吹和维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的精神贵族。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仍旧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说的，“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的知识分子，就其大多数来说，虽然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由于深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知识私有观念特别顽固，把他们的片面的知识看作自己的财产，待价而沽，轻视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积习很深。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扩大至少是维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旧社会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采取有力措施，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也还要一个长期的战斗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阶级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反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观念，已作为一种传统凝固下来。它象梦魇一样顽固地纠缠着人们的头脑，严重地阻碍着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新事物的成长。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还需要高度发展，社会产品还需要极大丰富，人类还有待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改造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劳动还没有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的第一需要。

“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因此，用暴力夺取了政权的胜利的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镇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打击新生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必须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和分配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必须抓紧对知识分子改造这个极大的问题。必须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发扬共产主义精神，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劳动人民知识化。这样，我们才能逐步清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限制以至最后铲除资产阶级生存和产生的条件，逐步缩小和最后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朝着使生产劳动由“奴役人的手段”变成“解放人的手段”，“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反杜林论》）和“生活的第一需要”（《哥达纲领批判》）的方向阔步前进。

对于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视。早在我国民主革命初期，毛主席就亲自创办工人夜校，热情赞扬和支持农民的文化运动。

后来，多次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世界观。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了“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方向；制定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必须走“七·二一”道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并且指引广大干部和各行各业走“五·七”光辉大道。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切对于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实践还证明：如果不实行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而是维护和扩大这种差别，那么，就必然会重新发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抗性的矛盾，新资产阶级就会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一小撮人的出身并不坏，差不多都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成长起来的，并且在组织上入了党，经过高等学校的学习而取得了“红色专家”的头衔，实际上却是党阀、学阀、精神贵族，而同无产阶级根本对立。他们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使今天的苏联成了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专政的国家。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就是明显的证据。

然而，作为帝修反、国内地富反坏右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总代表的林彪，对于我们党采取的一系列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政策和措施，十分恐惧，极度仇视。林彪出于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竭力维护和扩大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和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他们一伙在《“571 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竟然恶毒诬蔑干部走“五·七”道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变相失业”。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生产劳动的极端鄙视，对劳动人民的刻骨仇恨。其实质就是反对破除在生产关

系中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业”，就是要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全人类获得解放，实现无限美妙、无限光明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终身。无产阶级革命干部来自群众，代表群众，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现实斗争中胸怀伟大的革命理想，在革命的理想鼓舞下和群众一道前进，在革命实践中把理想和现实统一起来。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作风以及旧的传统观念，不分昼夜不择地点场合地在向无产阶级及其干部侵袭。解放前，我国的小生产占有很大的优势；解放后，虽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是，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的特性，仍然严重存在。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因此，无产阶级干部必须坚持反腐蚀、防演变的严重斗争。干部走“五·七”道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实质，就是避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拒腐蚀，永不沾，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破除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保持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同志式的平等关系。有的“五·七”战士说得好：“拿起放羊鞭，官气就打掉了一半。”实践证明：在“五·七”道路上，干部失去的是官、暮、娇、骄之类的歪风邪气，得到的是生气盎然的革命青春；失去的是剥削阶级泼来的污泥浊水，得到的是反修防修的免疫力；失去的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桎梏，得到的是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可见，干部走“五·七”道路，正是广大革命干部所从事的无产阶级反修防修，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一环。林彪一伙却把它诬蔑为“失业”，正说明了他们所谓干部的“业”，是同无产阶级的“业”根本对立的。

在他们眼里，干部的所谓“业”，就是身脱离生产劳动，心轻视劳动人民，做官当老爷，成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贵族，保持剥削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那种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就是在红灯绿酒之前，欣赏劳动人民双手供奉上来的奶油面包。已经揭发出来的林彪反党集团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内部的法西斯纪律，以及他们“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之类的黑话，都是他们的干部的所谓“业”的最好注解。他们认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有损于他们“天才”的脑袋，高贵的神经，怕见太阳的肌肉和一见群众就“感冒”的器官，有损于他们那浸透了剥削阶级意识的官架子。他们宁愿在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臭水坑中打滚洗澡，也不愿在生产劳动中呼吸一丁点儿新鲜空气；宁可投敌叛国，也不接近人民群众。因此，干部走“五·七”道路，在他们眼里就成了“失业”。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远一点说，这不过是贴上了林记商标的最黑暗、最反动、最野蛮、最腐朽的奴隶主阶级鄙视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坚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理论”。例如，我国奴隶制的复辟狂孟轲，不仅把从事生产劳动看成是陷入黑暗深渊，即所谓坠入“幽谷”，无耻地把奴隶主阶级及其帮闲挖空心思用以敲骨吸髓地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勾当，吹捧为无上光荣的贡献最大的神圣事业，而且把鄙视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坚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的剥削压迫经“理论”化、永恒化、普遍化。他声嘶力竭地叫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近一点说，乃是曾遭到马克思彻底揭露和无情批判的美国奴隶制的辩护律师奥康瑙尔的胡言乱语，和曾遭到恩格斯彻底揭露和无情批判的江湖骗子杜林把职业的建筑师和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谬论的借尸还魂。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这种特殊的历史的暂时的社会现象，已产生和存在几千年了。在世界上，现在还存在，在我国这种差别也还存在。在历

史上产生的东西，必然要在历史上消亡。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为逐步缩小和最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而努力奋斗。朝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中的“传动零件”

外语系　何卓

1975-09　广东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今年四月，苏修《文学报》抛出了一篇小说，名曰《传动零件》①。小说写得十分蹩脚，读来乏味异常，作者却是颇负“盛名”的全苏作协书记瓦·柯热夫尼柯夫。这个苏修御用文人近年来多次得过主子的奖赏，被捧为“写工人题材称著”的作家。“传动零件”就是他秉承苏修叛徒集团的旨意而炮制出来的新作。今年二月中旬，苏修党中央为了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作出了加紧培植工人贵族，收买工贼的《关于化学及石油机械制造部提高师傅在生产的作用》的决议②，规定：“师傅”是“基层劳动集体的直接领导者”，“工人的组织者和教育者”，“生产中的核心人物”，“党的政策的传播者”，并要求党、政、工、团全力发挥这些“师傅”的作用，“对师傅的卓越工作找出新的，有效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形式，创造使师傅的威信不断提高，师傅的权力得到遵守的条件”。这个用法律形式规定“师傅”的特权的《决议》出笼不到两个月，作者就按《决议》的口径，塑造了一个居于这个特权阶层的人物——罗勃夫师傅的形象，形象地说明作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机器中的“传动零件”——“师傅”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人。



小说写的是罗勃夫为机械设计工程师朱耶夫所发明的一项新技术铣制一个关键性的“传动零件”的前后过程。它的题目寓意师傅这个阶层，在当今的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中要起“传动零件”的作用。就是说，他要按照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控制住他“领导”的那个工区，使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苏修社会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机器得以“传动”起来。

这样一个脚色，不是别的，正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揭露过，鞭挞过的工头、监工、工人贵族的脚色。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造成一些特权阶层”③。随着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种趋势已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收买工人贵族；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要收买工人贵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代表了掌握着政权和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反对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被苏修叛徒集团收买的工人贵族，则代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拼命维护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已经复辟了的资本主义制度。你看，小说中的罗勃夫为朱耶夫铣制那个“在铣床上加工时难于铣到它的各个部位的特别复杂”的“传动零件”时是多么卖力。他用他掌握的那部分权力，下令他“直接领导”的“基层劳动集体”的工人都来搞那个使朱耶夫能够获得更多名利的复杂的零件，“造成了莫名其妙的混乱”，“连累了制造工厂”，“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苏联，挂着“全民所有制”招牌的国家工厂里，生产不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来进行，而是为了一个精神贵族的一项发明获得成功，使他在向上爬的阶梯上又多一块垫脚石，而“混乱”起来，这样的工厂不是实质上的私人所有制又是什么！当然罗勃夫师傅这样做还有他个人的打算，因为朱耶夫这个极为复杂的“传动零件”使他“联想到也要制造一把组合多面铣刀”。铣制零件的过程也是他试制铣刀的过程，零件制成，铣刀也制成。罗勃夫沾沾自喜地说：“科学和生产都瞄准到一个点子上，我为这种吻合而感到非常高兴”。都瞄准到那一“点”上？就是朱耶夫将拿到发明新式“传动零件”的奖赏，而罗勃夫则拿到制成新式铣刀的专利，两人都瞄准在维护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点”上，都瞄准在金钱、地位这一“点”上。苏修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已经成为一个空壳，工厂的工人只不过是为这些精神贵族、新工头创造私人利益的会说话的工具。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是通过罗勃夫这些大大小小的“传动零

件”开动着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对广大的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和统治的。

二

苏修叛徒集团要着力培植的“师傅”（即工人贵族）这个阶层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小说通过罗勃夫形象的塑造回答了这个问题。用罗勃夫的话来概括，就是“不仅在自己的技艺方面应该是够格的，而且在其它做人的数据方面也应该是够格的”。

罗勃夫有较高的技术，而且把干复杂的活计看作一种“嗜好”。在一切已经商品化了，包括技术和良心都已经成为商品的苏修社会，罗勃夫的技术当然是被收买的对象，苏修叛徒集团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收买他们成为工贼。但是，仅有熟练的技术还不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够格”的“零件”，他们必须在“做人的数据”方面也“够格”，而且这方面是主要的。小说以主要篇幅描写罗勃夫怎样和朱耶夫一起追求和保卫资产阶级的法权——专利权，集中说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工人贵族在“做人的数据”方面是否“够格”的主要标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人的发明创造由国家给予专利权，用法律保证归他个人所有。这种专利权可以作为遗产传给儿子，也可以作为商品转卖给别人。其他人如果不付钱而使用这项发明，那就犯了盗窃罪。如果你靠自己的智慧也作出了同样的发明而使用它，那也会被人怀疑是剽窃而引起诉讼。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围绕着专利权经常发生生死的搏斗。现在，这种生死的搏斗在苏修的社会中也不断上演，并且成为这篇小说所歌颂的政治主题。

罗勃夫的儿子伊利尤沙自己搞出了磁场磨光的技术。他不知道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发明了这项技术，并取得了专利权，便冒冒失失地提出了专利申请。这就冒

犯了私有制。朱耶夫这个浑身浸透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反动学术权威，不作调查，甚至不经考虑，盛怒之下，作出了“剽窃，或者是出于无知”的结论，把伊利尤沙判为盗窃犯。罗勃夫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也不分青红皂白地骂自己的儿子，在“家里闹翻了天”。“既然做父亲的都这样痛骂他，那他对别人还能抱什么指望呢”？伊利尤沙在朱耶夫和罗勃夫的内外夹攻之下，戴着“盗窃犯”的帽子，完全失去了做人的信心。他“离开了大学，跟妻子也离了婚，他把自己的生活撕成了碎片。他自尊心受到打击而自己摧残自己”，只身出走，跑到西伯利亚当电工而触电烧死。一个有才能的青年就这样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牺牲品，被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工人贵族残酷地杀害了。罗勃夫并没有因为儿子死去而对朱耶夫疏远，他“自我牺牲地”承担了朱耶夫那个“零件”的铣制任务，煞费苦心地同朱耶夫一起追求资产阶级法权。他对朱耶夫说：“您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不幸归罪于自己”，“我是尊敬您的，我尊敬您，因为您总是把事业放在首位。”好一个“把事业放在首位”！他们的这个“事业”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法权！就是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罗勃夫，这个苏修叛徒集团培植的“工人贵族”在政治上确实是“够格”有余了。

读者别以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竟因专利权而闹出了人命案，有点不好理解。其实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是靠巩固、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侵吞劳动人民的果实，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他们必然要拼死保卫包括专利权在内的资产阶级法权来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罗勃夫如此坚决地保护资产阶级的法权，连逼死自己的儿子也不手软，完全暴露了他作为工贼的丑恶咀脸。

三

小说写道：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苏联，科研人员与工人的关系“不是定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为了共同使命而奋斗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实，只要对小说中所反映的人与人的关系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在一切已经成为商品的苏修社会，资产阶级的一切丑恶都得到了充分的表演。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因为对他们来说“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④。罗勃夫和朱耶夫的关系，就是如此。

朱耶夫对罗勃夫的态度是根据罗勃夫能否替他制成“零件”而发生变化的。这个“零件”制造成功就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名利、地位。这是他性命交关的事情。为了请罗勃夫替他制造“零件”，他不惜放下权威架子，一反威风凛凛的常态，低三下四的哀求罗勃夫：“亲爱的列昂基·勃利索维奇，我求您就好象求神拜佛一样，您就搭救搭救吧！”可是当他私下断定罗勃夫因他儿子的事不会替他制成“零件”时，他对罗勃夫就“冷淡地打着官腔”说话了。“零件”的制成又使他恢复了对罗勃夫的亲热态度，向罗勃夫提出要给他儿子“一个极为吸引人的好主意”，来作为对罗勃夫的“厚意”的交换。朱耶夫随着他的“零件”从有制成的希望，到没有希望，到出乎意料之外竟制造成功，由于兴奋、失望和喜出望外而三次心脏病发作，并且一次比一次厉害。第三次心脏病发作时他“脸色发白，咀唇发抖，气都喘不过来”，差点送掉了老命。但是当他知道罗勃夫的儿子因他的判决而死于非命时，他却不会心脏病发作，而只是假惺惺地感到有些心情“沉重”而已。一切为了自己的私利，那管他人的死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格言，就是朱耶夫遵奉的人生信条。

至于罗勃夫，正如小说所说的，他和朱耶夫“在内心上却是亲近的。”他们同属于为夺取从未占有过的一切的那一帮，因而表现得特别贪婪。为了保卫和谋取

专利权，他背叛自己的阶级，豁出自己儿子的性命。因为要利用朱耶夫这个反动权威在科学上给他的启示，把特种铣刀研制出来，他就一再奴颜婢膝地向朱耶夫表示忠诚，并为此弄得头昏脑胀，头发一团一团地往下掉。在小说末尾，当铣刀终于制成，他和朱耶夫并肩站在铣床前面欣赏自己的发明创造时，是何等的踌躇满志。铣刀的专利给他带来了欢乐，他向朱耶夫宣布："您问了，我说了——事情就完了"，儿子的死就此了结，不必再放在心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⑤《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些话，多么正确地说明了罗勃夫和朱耶夫，罗勃夫和他儿子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正反映了今天苏修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普遍状况。

苏修叛徒集团妄图在工人中间培养和收买一部分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上层贵族作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传动零件"，以维护其法西斯统治。但是，他们能够收买到的只不过是象罗勃夫那样的一小撮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这样的走狗绝对支撑不了苏修那摇摇欲坠的社会帝国主义大厦。列宁曾经指出："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并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象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⑥苏联的广大无产阶级，决不会容忍这种恶性脓疮，他们终将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认识到他们自己才是一支伟大运动的力量，而起来把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连同它的一切"传动零件"砸得粉碎，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注：

①《传动零件》，瓦·柯热夫尼柯夫作，载苏修《文学报》1975 年 4 月 2 日

②载苏修《真理报》1975 年 2 月 12 日

③《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824 页

④⑤《共产党宣言》第 26 页

⑥《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843 页

附:《传动零件》(苏修短篇小说·梗概)

罗勃夫是个技术非常惊人的铣工师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实验车间的工长。他对非常复杂的活计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并且把完成这种繁难的任务看成是自己生命中的大事。他喜欢劝导大家：“不仅在自己的技艺方面应该是够格的，而且在其它做人的数据方面也应该是够格的”。和罗勃夫不同，机械科学研究所的设计工程师朱耶夫则是个孤僻的拥有显赫学位的人。他性格很固执，不讨人喜欢。但是，尽管二人的性格各不相同，他们“在内心上却是亲近的”。

现在，朱耶夫象个胆怯的、耐心的乞求者一样站在罗勃夫身边，低声下气地恳求他看个人情面帮帮忙，替他制造他所设计的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性的传动零件。设计的成败就取决于在工艺上能否把它成批地制造出来。朱耶夫一再哀求：“亲爱的列昂基·勃利索维奇，我求您好象求神拜佛一样，您就搭救搭救吧！”当罗勃夫同意制造这个零件时，朱耶夫兴奋地大叫起来，脸也涨红了。他由于过份兴奋而引起心脏病发作，马上坐到凳子上去吃药。二人商定，“零件”由罗勃夫个人不声不响地试制，不搞什么正式的工程单，算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协定。

但是，回到车间，罗勃夫却把工人都调动起来参加试制。工作发生了困难，影响了正常生产，打乱了生产计划，造成了混乱。研究所副所长不得不出面干涉。他认为“零件”的设计太复杂，超出了现有制造工艺的水平，是不现实的，要求朱耶夫简化“零件”的设计，朱耶夫怀着极其抑郁的心情回到自己科里，叫来工作人员扎哈罗夫了解厂里的情况。扎哈罗夫告诉他，罗勃夫在工厂里故意制造莫明其妙的混乱，因为朱耶夫曾经否定过一份关于使用磁场磨光的专利申请，而申请者原来是罗勃夫的儿子伊利尤沙。朱耶夫由于这项技术早已取得专利权并为一些工厂所使用，在心情异常愤怒的情况下，在申请书上写下了“剽窃，或者是出

于无知”的结论。为了这件事，罗勃夫家里闹翻了天，儿子中途辍学。朱耶夫听了之后顿时瑟缩了一阵，接着心脏病又发作。

朱耶夫称病在家简化零件的设计。

有一天，他决心到工厂去向罗勃夫亲自证明自己的结论。他准备把专利手册拿给他看，并举出使用这项专利的工厂的名字。朱耶夫来到工厂。这时罗勃夫正为了制造传动零件而在试制第十二把铣刀。为了试制这种铣刀，罗勃夫伤尽了脑筋，搞得头发都开始掉了，他早晨梳头，一看梳子，梳齿里尽是一团一团的头发。朱耶夫对罗勃夫说：“我应该向您声明，我可以亲自向您证明我的结论”。罗勃夫温和地问道：“既然这个结论是对的，那又何必呢？我根本不需要证明”。他说：“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是我自己当时对他发了火，因为我不知道他通宵达旦地工作，靠自己的智慧搞出了发明。他根本瞒着别人，……后来，他一下子就递了一份申请，接着接到回文，叭的一声挨了一记耳光。打那以后，他就对自己灰心了，离开了大学，跟妻子也离了婚，他把自己的生活撕成了碎片，他自尊心受到打击而自己摧残自己”。罗勃夫还特地对朱耶夫说：“我是很尊重您的，我尊敬您，因为您总是把事业放在首位”。当朱耶夫“冷淡地打着官腔”向罗勃夫宣布取消原来“零件”的订货时，罗勃夫只是忧郁地说：“好吧，您瞧着办吧！”他向朱耶夫说：“铣刀我横竖要搞到底的。内燃机厂已提出使用这铣刀的专利申请。铣刀的事，我还多亏了您呢。……这个零件是一整套的组合。这就使我联想到也要制造一把组合多面铣刀。科学和生产都瞄到一个点子上，我为这种吻合而感到非常高兴”。临别时，罗勃夫说：“要和您分别了，我想送点东西给您留个纪念”。他把朱耶夫领到自己的工具柜前，打开柜门，出乎朱耶夫意料之外，只见上面一层放着的正是已铣制好了的“传动零件”。这是罗勃夫靠耐心和技巧在铣床上一个部位一个部位把它做出来的，罗勃夫认为，如果能用一种特别的组合铣刀一下子就铣到零件的各个部位，那才算妥当。这时，朱耶夫“脸色发白，咀唇发抖，气都

喘不过来了”。他被感动得又一次心脏病发作。罗勃夫惊慌失措地给他拿药倒水，并轻微地责怪道：“你呀，应该保重自己的身体……”

从此，朱耶夫经常一清早便到工厂去，两人并肩欣赏特种铣刀铣制传动零件。有一次，朱耶夫有所暗示地向罗勃夫挤了挤眼睛说：“最好让我和您儿子结识结识，我准备给他一个极为吸引人的好主意”。这时罗勃夫才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在西伯利亚触电烧死了。罗勃夫懊悔地说：“要是当时我不发火就好了，既然做父亲的都这样痛骂他，那他对别人还能抱什么指望呢？不过您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不幸归罪于自己。您问了，我说了——事情就完了……”

此后，朱耶夫就尽量不再去工厂了，因为和罗勃夫见面，对他来说，是太沉重了。

（俄语专业学员：谢锦坤　邢伯伟　张杰明　梁怀懿翻译）

从小说中的农学院看苏修教育

外语系俄语专业教学组

1975-09-02　江苏师院学报

在认真学习大寨、朝阳农学院的教育革命经验，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高潮中，我们看到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苏修短篇小说《文凭到手的姑娘想出嫁》。这篇小说取材于苏修教育的现状，写的恰恰也是发生在农学院的故事。因此很值得一读。这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是弄清楚在教育领域内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以及进一步认识大寨、朝农经验的战略意义，很有益处。

小说写到的农学院，办在苏修统治的中心莫斯科。主要人物索妮契卡是这所农学院的毕业班的女学生。她刚参加过实习，又交掉了毕业论文，只待国家考试完毕，就可以拿到毕业文凭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毕业以后会怎么样？索妮契卡不愿离开莫斯科，她早就拿定了主意不到农村去当农艺师。可是传说这届毕业生都要被派到生荒地去。这个“最最可怕的”分配方案使索妮契卡感到“一切就要完蛋了”。为了免于这场“灭顶之灾”，她决定“勇敢地奋斗一番”。她毅然来到教务处，坚定地对处长说：“我请求留我在部里工作。”理由是：“我有病”，“我的妈妈有病”。但是，教务处长对这一套把戏早已司空见惯，因此索妮契卡的这些谎言，收不到成效。于是她使出了一个绝招：“我要出嫁了！”索妮契卡这下子确是大有成功的希望了，那个教务处长也只能气急败坏地发问道：“既然你们只想嫁人，当初何必投考农学院！”

是啊，不愿意务农，为什么却要进农学院呢？不为其他，单为一张文凭。就象商品要有商标一样，在苏联“每一个有教养的姑娘都应该有张文凭”。当初，索妮契卡曾经想进综合性大学，“前门”和“后门”都走过，但是结果均成泡影。同

时也没有“熟人”帮她进更吃香的档案管理学院或者外语学院。“出于无奈”才进了农学院。在今天的苏联，文凭就象学校一样，也是有等级的。农学院的文凭太低级，也不能保证索妮契卡留在莫斯科。既然“商标”名声不响，又要把“商品”卖高价，那么只得求助于玩骗术、耍无赖这套在苏修社会上颇为通行的伎俩了。最后她终于使出了这一个绝招：嫁人。只要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留在莫斯科，并进而挤进上流社会，就不成问题了。

在莫斯科的这所农学院里，象索妮契卡这样的毕业生还有很多。“每年在一百个莫斯科出生的毕业生中，就有三十个申请留在这个城市”。在和索妮契卡同届的学生中，差不多有五十个姑娘已经嫁了人。其中有一个叫阿拉的，一听说要去西伯利亚，马上就嫁给了某个一级研究员。无怪乎教务处长哀叹道：“还有谁下乡呢？”

据说，下乡的人还是有的。有的学生认为：“只要有中意的工作，上阿尔泰也行，上萨扬也行。”请注意，下乡要有条件，就是要有“中意的工作”！这些人，一无靠山可倚，二无奇货可居。既然在莫斯科没有他们角逐的余地，只好到外地去，那里有“专家”们享受的优厚待遇和各种补充物质报酬；既然不能象索妮契卡那样指望留在农业部工作，那么就到集体农庄去做官当老爷吧！虽说不是一步登天，但同样有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前途”。说穿了，农村也是“市场”。在莫斯科卖不出去的“低级商品”，可以到那儿去卖高价。只要这个“官”当得使苏修头目们满意，有朝一日受到他们的青睐，还可指望“商品”升级，卖更高的价格。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那么，为什么索妮契卡想出嫁，就大有希望留在部里工作呢？她的学业低劣，也没有什么政治靠山，可是她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脸蛋俊俏，身材苗条”，因此她的母亲说她“最适宜当部长的秘书，至少也要当副部长的秘书”。原来索妮契卡就是打算凭了这一“资本”，去挤进新资产阶级的圈子的。

对于索妮契卡一类的女毕业生来说，用这种办法爬进新资产阶级的圈子是行之有效的。须知在莫斯科城内，有多少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在争权夺利之暇需要找个漂亮的姑娘消遣消遣啊！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钱多势大，飞扬跋扈，投身在他们的怀抱里，还有谁敢来把你赶出莫斯科呢！请听教务处长对索妮契卡说的话："只有丈夫是军官，或者他的职位比您毕业后能得到的职位高，您才可以跟丈夫走，并且有权自找工作。"这意味着，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制度对那些有靠山的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见在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学校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权是至高无上的。莫斯科的新资产阶级老爷们正是依靠了特权的力量，把索妮契卡一类女学生占为己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而索妮契卡们也懂得，只有依靠特权才能为她们打开方便之门，帮助她们挤进新资产阶级的圈子，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所以才这样不择手段而在所不惜。

然而，在索妮契卡的同学中，也有人不必用"嫁人"的办法，就能摆脱到穷乡僻壤去的命运。这些人比索妮契卡"高级"些，他们本来就是属于特权阶层的。有一个女学生，刚踏进农学院的大门不久，就提交了一份患肺结核病的证明，因此肯定不会被分配到农村去。她所以这样走运，"因为舅父是医学教授，在她即将被揭露的危险时刻，舅父亲自出马，参加了审查委员会"，从而搭救了她。你看，只要有个掌握着特权的亲戚，什么都能办到！可以想像，如果有比这个"舅父"地位更高的亲戚，那恐怕连装病也没有必要，更用不着匆忙地嫁人，只消依靠他的权势，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留在莫斯科了。

伟大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国家的学校"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小说《文凭到手的姑娘想出嫁》中的莫斯科某农学院正是这样。这儿发生的一切可笑的事情，哪一件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起作用呢！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在今日之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资产阶级法权变成特权已经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恢复了统治作用。对于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

徒集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们，资产阶级法权和特权本来就是传宗接代的法宝，因此他们一上台，就拼命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特权。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长期以来没有按照列宁的有关指示进行革命的改造，使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在这块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上，又长出了一批新毒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都受过它的培育。因此，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内更是大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竭力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培植他们所需要的修正主义后继人的温床。小说中的莫斯科某农学院，就是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和修正主义温床的具体写照。

莫斯科的这所农学院，还害着一切资产阶级学校的通病，“就是书本与实践完全脱节”。它所进行的教学基本上是与农村隔绝的。从入学到毕业前夕的“实习”这几年，学生们根本接触不到农民，因而他们实际上对真正的农业知识毫无所知，至于农业生产实践更是一窍不通。就拿索妮契卡来说，在去“实习”以前，她除了同送牛奶的集体农庄女庄员攀谈过以外，还没和农民谈过话；关于集体农庄的知识，都是从小说、教科书和课堂笔记中得到的；至于莫斯科以外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也“仅仅在和妈妈去疗养地时从火车的窗口或者在她家别墅的篱笆缝里看见过”。试想一下，这种办学道路和办学方法怎能培养出对农业生产有用处的人材？如果说学生在这类学校毕业后拿到文凭，并到农村去当上了一名农艺师，也无非是徒有一个空名罢了。这是修正主义学校造成书本和实践完全脱节的必然恶果。

诚然，索妮契卡和她的同学们在毕业前也要到集体农庄去参加一次所谓的“实习”。关于这次“实习”，小说中有一段描写。起初，实习生们白天游泳、晒太阳，晚上跳舞、看电影。索妮契卡还靠着她的外貌卖弄风情，分配给她的任务

也十分简单，管管收割时机械的调配。可是“好景”不长。下了一星期的雨，把所有的快意都冲光了，剩下的只是懊丧。甚至在回到学校以后，索妮契卡一想起在农村吃到的“苦头”，还是毛骨悚然。你看她站在镜子面前，一边端详着因为风吹日晒变得粗黑的面孔，一边唉声叹气，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真是令人作呕。这种“实习”既无正确的思想指导和政治教育，又无明确的专业要求，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对于学生来说，也只不过是到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去尝尝生活风味罢了，其结果当然使学生感到一切不如莫斯科。于是原来就没有到过农村，也根本没有接触过农民的学生，就十分自然地对农村更害怕、更厌恶，并驱使他们以加倍的努力逃避去农村工作。

当农学院的教务处长在哀叹“还有谁下乡呢”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个状况正是农学院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相反地，他却正言厉色地责备索妮契卡。然而索妮契卡并不买他的账，反问道：“你们为什么把农学院办在莫斯科呢？”虽然索妮契卡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苏修教育制度的罪恶，但是她根据这一点不肯下乡。索妮契卡只不过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而已，首先应该受到指责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正是苏修教育界的统治者们。因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用资产阶级的人生观腐蚀学生，才把学生变成了轻视劳动、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精神贵族。不说别的，一所农业专科大学办在莫斯科城内，不就是活见鬼吗！有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才有了这一类农学院，有这一类农学院，才有这样的农学院毕业生，这一必然的联系是十分清楚的。发生在这个学校里的各种丑恶现象，无不根源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请看，学生不愿离开莫斯科，不正是苏修头目用资产阶级的花花世界熏陶青年一代的结果吗？不是他们自己拼命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言行为青年一代造成一个个可以效法的楷模吗？学生胸无真才实学，要无赖、搞欺骗却很有一套，

不正是苏修社会上颇为吃香的做人诀窍吗？因此象教务处长那样一古脑儿地责怪索妮契卡是毫无道理的。

可笑的是，这位教务处长在把学生赶向农村的同时，自己却因为风闻学校可能迁出莫斯科而惶惶不安。不言而喻，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即使这所学校要迁出莫斯科，也只能是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同样是远离农村、脱离实际的。尽管如此，处长先生还是不愿跟学校走，因为他绝对不肯离开莫斯科。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在莫斯科有个工作和职位，其他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这就十分清楚地证明：学校让这样的人把持，不出索妮契卡这样的学生，倒是咄咄怪事。

列宁曾经多次指示在教育工作中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他说过："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可是苏修的那些学校早就背弃了列宁的告诫。它们把学生禁锢在高楼深院之内，从思想上进行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使之成为与广大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资本的走卒和奴隶"，在业务上则灌输"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使之成为不学无术的庸人。从索妮契卡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产生出来的一个活标本。

也许有人会问：莫斯科某农学院的学生都同索妮契卡一样吗？苏修搞"天才教育"，难道在这个学校里就没有"高材生"了吗？不错，"高材生"是有的。但是这种"高材生"只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农村进一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爪牙的代名词。我们知道，在苏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现实是息息相关的。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又服务于经济基础。如今，苏联农村经济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在这个过程中，莫斯科某农学院一类的学校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谓予不信，有例为证：近年来苏修忙于用"熟练的专家们——总农艺师，总畜牧师"取代那些"最多只受过中等教育"的农庄主席，并依靠他们来推行"新经济体制"。这些"专家"们不就是莫斯科某农学院

一类学校培养出来的吗？不就是那些“高材生”吗？他们是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变集体所有制为私有制的行家。苏修的农业越搞越糟，也应该给这些“专家”们记上一笔功劳呢！

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强调“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此，他还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可是，曾几何时，就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列宁的教导却被抛到九霄云外，苏维埃政权对旧教育进行改造的成果已经付之东流。这个历史的悲剧给了无产阶级许多深刻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教育领域内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读了小说《文凭到手的姑娘想出嫁》以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从小说所透露的苏修教育现状，我们还进一步看清楚了修正主义教育的反动、虚伪和腐朽没落。这从反面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朝阳农学院要同修正主义教育对着干。我们不妨把朝农和莫斯科某农学院比较一下。朝农从城市搬到农村“分散办学”，把学校和农村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实行“社来社去”的方针，学员“一颗红心进农大，农大毕业心更红”；它规定了“几上几下”教学制度，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在朝农，不仅是学员扎根农村意志坚，这儿还有睡土炕的党委书记，拿工分的大学教师，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教授。这一切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挑战。朝农的经验，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经验，就是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经验。而在莫斯科某农学院，我们看到的情景则都是和这些经验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这就更加说明，朝农的经验好得很！

两种学校，反映了两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经过比较，我们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

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一所特别的大学

方锷

1975-09-28　人民日报

上海，经历了二十六个社会主义春天，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上海，到处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气。

每天，火车站，飞机场，轮船码头，送往迎来成千成万为社会主义祖国辛勤奔波的人们。

这里是几位从山东、江西、桂林来的旅客。显然，他们素不相识，各自匆匆地走向岗亭，用不同的口音向人民警察询问：

“同志，到常德路乘几路车？”

“同志，到上瓶十厂怎么走法？”

“同志，上瓶十厂是不是在常德路上？”

哈！素不相识的人们，忽然欣喜地发现，从今天起，他们已成为上海玻璃瓶十厂“七·二一”工人电子大学的同学啦！

但当他们一起来到常德路向这所大学报到的时候，不免惊奇起来：在这个和居民杂处的狭小的弄堂里，几间简陋的厂房，几台陈旧的机床，总共才一百五十多人的小厂，在短短几年里，是怎么做到从手工操作到半机械化、自动化、电子化，又办起了电子大学的呢？

答复这个问题，需要回顾一段历史。

但是，你完全用不着去翻阅厂史，因为童工出身的老吴师傅和被工人们戏称为“万里长征老干部”的老陈师傅，就是一部活的厂史！

十岁刚出点头就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糊口的小吴，第一次颤颤惊惊地来到这条弄堂口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多么不平的世界啊！弄堂两旁是洋鬼子的住宅。殖

民主义强盗们牵着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哈叭狗，狂笑着进进出出。一个拎着一串三寸多厚的木屐鞋的小商贩，来到弄堂口叫卖。几个赤着膊犹是汗涔涔的工人从弄堂里出来。他们的额头裹着浸过冷水用来“降温”的毛巾。他们的眉毛由于粘满玻璃原料的灰粉而变得又粗又白。他们拿出浸透了汗水、不知饿了几个早餐才节省下来的一叠钞票，向小贩去换取一双高底木屐鞋。突然，一阵叮当，弄堂口停下了一辆人力包车。从包车上下来的玻璃瓶厂的老板，俨然以这个小王国的主宰者的姿态挥舞着文明棍：“做生活去！做生活去！不做满规定的瓶子，别想拿工钿！”工人们眼里喷着怒火，拖着高底木屐鞋，走向车间。

车间里，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雾一样的灰粉，在昏黄的电灯光中到处迷漫着，闷得人们透不过气来。挑料工、剪料工、压料工都站在有几百度高温的炉台或火道上，围着有一千五百多度高温的炉子，手脚不停地操作着，热得仿佛置身在火焰山。最后一道工序是送瓶；把瓶子从制瓶机送到烘箱，从火道附近到泥泞的地面，从高温到低温，一天跑到晚，竟要跑四、五十里地！

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当扎着红彩球的公私合营牌子挂到这条弄堂口的时候，这个曾经是人间地狱的地方，就成了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阵地，当然，是一个小小的阵地。

我们的老吴师傅，曾经亲眼看到自己的阶级弟兄，或因受“头脑”（工头）的毒打，或因得严重的矽肺，悲惨地在这座炉子旁死去；自己的双手也还留着累累伤痕。如今，党为他安排了一个最恰当的岗位：工人医生。想起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受的一切，他怎能不以最深厚的阶级感情去关怀每个阶级弟兄的健康呢？

我们的老陈师傅是个老送瓶工，工人们送给他的戏称“万里长征”是有根据的：他跑穿了多少双高底木屐鞋，一年就要跑一万几千里哪！如今，党也为他安

排了一个最恰当的岗位：坐门房间。到这个厂参观访问的人们，最先遇到的就是这位老陈师傅。谈起这个厂的变化，老陈师傅有满腔的阶级激情。他说："这个命非革到底不可哩！"

说得多好哇：革命非革到底不可！

但是，在革命的征途上，除了阶级敌人必然要拼死破坏以外，在我们队伍里，也总不时有人想在半路停顿下来。

一九六五年以前，在党的关怀下，这个厂实现了半机械化，劳动条件有了一定改善，生产效率也有相应提高。工人们迫切要求在这个基础上继续革命。但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有些领导干部却说："现在日产已经达到两三万（只瓶），改得好是'额角头'，改得不好'触霉头'，何必再搞新花样呢？"谁敢再动一动，就挥舞起新式文明棍：扣奖金！

这是典型的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懦夫懒汉哲学。但是，更本质的是他们心目中没有已经成为企业主人的工人。他们只看到"两三万"产品，看不到在高温炉旁操作的工人们脸上的汗水，和他们为尽快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而激烈跳动着的红心。尽管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还是我们的同志，但从只关心产品、不关心工人这一点来说，同当年在这个弄堂口耀武扬威挥舞文明棍的那个老板的某些思想怎么划清界线呢？正因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是我们的同志，问题就更加严重，更加值得人们深思！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刻地触及了思想、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小小的上瓶十厂，在全国亿万人民的革命洪流中，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清理了一小撮坏人，广大干部、群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全厂动手，日夜奋战，人倦了，拿几个草垫子在炉旁躺一会；肚子饿了，啃几口冷馒头。不到两年时间，就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曾经在那个"人间地狱"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老工人，站在新造的机器旁，伸出血泡叠血泡、老茧压老茧的双手，摸了

又摸，看了又看，有的高兴得手舞足蹈，有的激动得热泪盈眶。但他们并没有陶醉在欢庆声中，而是提出了一个继续革命的口号：向电子化进军！

“象我们这样粗手笨脚的人，搞电子化能行吗？”厂里少数人有顾虑。

“要技术没有技术，要设备没有设备，这样一个厂子有条件上吗？”公司里有个别人反对。

顾虑应当解除，反对更是错误；但是，这些顾虑和反对却也反映了部分实际。不错，厂里是只有一个刚进厂不久的技术员，学的专业又是轻工业机械，对电子完全外行。既然公司不批准，那么按照规定，厂里最多只能动用三千元资金。而据有关单位告知，一台这种电子设备至少在五千元以上。正象厂里工人们说的那样：“我们确实是一无所有呀！”但是，“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正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一旦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就一定会成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人！

决心书、保证书，雪片似地送向党支部办公室。一百多双眼睛，眼睁睁地望着党支部。作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级基层组织，一个战斗堡垒，此时此刻的态度具有决定意义。支委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终于做出了决定：上！支部书记老乔在向工人们宣布了这个决定以后，又讲了个苏修、美帝妄想在电子化上卡我们脖子的故事。会场一片肃静。人们思索着一个严肃的问题：不革命就要挨打，这个命非快快革不可啊！老乔望着一百多个黑黝黝的脸膛，一百多对愤怒的眼光，激动地大声说：“同志们，你们大胆搞吧，人手不够，我们支部几个同志来顶，钱不够，就从我们工资里扣！”

一阵接一阵的热烈的掌声。难道仅仅是赞扬党支部的这些具体措施吗？不，人们起劲地鼓掌，是因为党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道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志气！

一场艰苦的学习运动接着开始。

他们派出代表到已经搞了晶体管数字程序控制装置、实现了制瓶单机自动化的兄弟厂去学习。他们把厚厚的一本电话簿上凡有“无线电”字样的单位都抄录下来，全厂来一场人民战争，一家一家去登门访问。有人忽然想起，报上曾经登过上海无线电十九厂帮助一家围巾厂搞自动化的报道，于是就带着这张报纸到十九厂去求援。有人因一个偶然机缘，得知姐夫的同学的同事是在复旦大学搞电子专业的，于是通过转辗相托，就到复旦大学去请教。

在群众性的学习访问的基础上，由四人组成的电子小组正式成立。除了唯一的技术员小夏以外，一个是老工人老孙，两个是初中毕业的青年工人小何和小章，不久前他们都还是红卫兵小将哩！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三工一员”电子化先锋班。

从这一天开始，厂门口小阁楼上那间临时用旧砖块、石棉瓦搭起来的小棚房，就成了电子小组老孙和两个青年工人的研究室兼试验室。为了加快进度，他们日夜战斗。为了节省一分一厘钱，他们不厌其烦地到兄弟厂的废旧料仓库、处理商品中去寻找原材料。也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小棚房成了全厂工人关注的中心。那已是一九七三年的冬季。四面透风的小棚房，被西北风刮得呼呼直响。工人们却觉得这里特别温暖。一下班顾不上洗澡、吃饭，就跑来看看、问问，帮助理理花线，捅捅煤球炉，能够干点什么都感到分外高兴。一次，电子小组的两个青年工人煤气中毒，这可急坏又忙坏了厂里的干部和群众。工人医生老吴又送水又送药。几个老工人焦急地守候着，直到知道是轻度中毒，又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安全，才肯回家。

技术员小夏与金工老师傅一起，负责制瓶机的改制。他牢记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穿上油衣服，制瓶、金工、电工，样样学着干。老师傅说：“我们小夏，做起生活来蛮扎劲，要他讲句话，面孔红得象个大姑娘。”小夏却想：有啥好讲呢？我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才跨了第一步哩！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苦战，试制成功了一台比晶体管更为先进的集成线路数字程序控制装置，花的钱不是五千元，也不是三千元，而是八百九十元；后来又作了几次改进，更降到四百多元。这时制瓶机也已改制好，正好配套成龙。他们又一鼓作气，趁热打铁，改造熔化炉，重造拌料机，搞了激光料液面控制仪、工业用的计算机、电视机等革新项目，从加料到出产品都实现了简易数字程序控制。劳动条件大大改善，劳动力节约六分之一，生产效率提高了七、八倍：日产玻璃瓶从两三万只提高到十六、七万只。

人们赞扬“三工一员”。但是，“三工一员”却说，其实搞电子化的哪里只是我们四个人呢，四百个、四千个也不止啊！事实确是如此。人们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全厂工人提出了“三人工作两人顶，抽出一人搞革新”的口号，就象当年革命根据地乡亲们送子弟参军那样，各小组喜气洋洋地向试制小组输送骨干力量。喜讯传开，工人们的家属、亲友，连同白发苍苍的退休老工人，也纷纷来厂里参加战斗。一位有几个孩子的女工，为了把自动电子秤迅速搞上去，孩子由母亲照管，自己日夜战斗在厂里。不幸，母亲突然患了重病。工人医生老吴得知后，每天下班去送医送药，坚持二十几天，直到母亲恢复健康为止。人们更不会忘记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援。就说上海无线电十九厂的一位技术员和一位工人老师傅吧，风里来雨里去，同他们一起战斗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在进行运转试验的那天晚上，两人还特地从二、三十里外赶来，一直陪着试验到天亮。还不应当忘记，他们在外地学习时住的一个旅馆里，偶然遇到的两位懂得无线电的人民解放军。彼此原来的岗位也许相隔天南地北，但一听说这个小厂志气大，决心实现电子化，两位子弟兵就每天晚上热情地为他们讲解无线电原理。……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国土上才能发生。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人！正是社会主义的阳光和土壤，每时每刻催发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诞生和成长。于是奇迹出现了！走进保持恒温的总操纵室，只见电

视屏幕上清晰地显映着制瓶机的现场运转情况，各种电子设备不断地闪动着众多的红绿“眼睛”，反映着现场在工作中的各种设备肉眼无法看到的内在情况。在这里，工人们的意志，通过数学、电子语言，控制、指挥着整个现场化学、物理的反应过程。人，真正成了机器的主人！

斗争完结了吗？不，新的矛盾随着产生。

譬如，据现场工人反映，半夜里，电子设备出了故障，想动手修修吧，线路多得象一蓬乱发，不懂，只好踏着车子去敲电子小组工人的门，把人家从被窝里请得来。——这还好办：组织电子小组值夜班就是罗！

不久，尖锐的问题终于摆到党支部面前：现场工人要一个掌握了机械技术的工人去修一修，这个工人却要人家讲一番好话，外加一支香烟。现场工人要另一个学懂了电子理论的工人去讲一讲原理，这个工人却说：“讲这一些他们听得懂吗”？

问题虽然还只是苗子，但却多么严重，多么发人深思啊！这就是说，原来握过同一根挑料钢棒、在同一个高温炉旁淌过汗水的阶级弟兄，现在，在有无掌握某一门专业知识方面出现了差别。这种差别，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在已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还严重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及其观念的作用、影响下，如果不加注意，如果把知识视为私有，那就可能转化为阶级差别，甚至出现阶级分化。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啊，过去在我们面前发生的这一类严重教训难道还嫌少吗？

党支部严肃地为此专门开了会议。从革命导师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中得到启示，从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尖锐地向全厂工人提出要警惕“技术到手、人被夺走”的危险，进一步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包括“技术私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了革命大批判。通过批判，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认识到自觉地逐步缩小直至最后消灭三大差别的重大意义，提出了

“全民所有制培养，为全民所有制服务”的口号，有些小组还开展了互教互帮活动。

但是，要从根本上破除“技术私有”观念，必须使技术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为此，在上级公司的支持下，党支部决定举办“七·二一”工人电子大学。规定四十岁以上的工人自愿参加，四十岁以下的工人都必须一两年内分批在大学里轮学一期；第三、四年再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还考虑到，全国许多兄弟厂来人、来信要求代为制造电子化生产玻璃瓶所需要的数控设备，做好了，送去了，但中途一出故障，又只好打电报来要求派人去修。为此，这个大学根据需要与可能，也少量吸收本市和外地兄弟厂的学员。

要问这个大学在哪里？它就在工人食堂的一角，同车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几张课桌，还是借了附近一所中学废弃不用的课桌整修起来的。就在这个不到五十平方米的课堂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济济一堂，学政治、学技术，努力做到革命化加电子化，一支队伍当两支用——既是技术队伍，又是理论队伍。不到一年时间，从这个大学毕业的学员已有八十八名。

亲爱的读者同志！关于学校的教学经验，恕不作具体介绍。因为那样就会越出本文预定的主题。上瓶十厂的工人说得好：“我们的厂有多大，我们的学校也有多大。”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每个工厂企业都是一所学校：既是学习管理经济的学校，又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在这里，既出产品又出人：出正在逐步挣脱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束缚、逐步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过去的人间地狱，今天变成了这样一所特别的大学——上海常德路上这个弄堂口的巨变，在一定程度上不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缩影吗？

二十六年前毛主席指出：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新中国已经写就的历史证实了这个真理，我们即将书写的历史必将进一步证实这个真理！

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大措施

中国共产党红旗造船厂委员会

1975-10-25　力学

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在这里，毛主席既从反修防修的高度讲明了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又从百年大计着眼指出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武装全国人民实现这个专政的根本方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诞生、在防修反修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工人理论队伍，正是实践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战略思想。它的出现，不但为工人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中实现对资产阶级专政培养了骨干力量，而且为逐步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地球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阶级差别是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依然严重存在，这是造成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泛滥、产生精神贵族的一个重要条件，若不加以注意，搞不好就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造成阶级分化，使一部分人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而大多数人则又回到旧社会那种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地位上去。一切新老修正主义分子，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都是拼命维护和扩大这种差别。苏修叛徒集团，打着"贡献不同，分配有别"的旗号，用高薪金、高地位，在企业领导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中收买和培养了一批特权阶层，作为他们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从而把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关系又重新变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林彪一类也是这样干的。他们一方面赤裸裸地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极力扩大脑力劳动与体

力劳动的差别，露骨地把干部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诬蔑为“失业”、“劳改”；另一方面又用“读书做官”、“下乡镀金”之类的毒汁，用“高爵”、“厚禄”、“重权”作诱饵，培植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为他们推行复辟路线的反革命骨干。十分清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旧制度留给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祸害，是产生精神贵族和特权阶层的温床，是损害人们新型的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待这个差别采取什么态度，是不断缩小它，直至消灭它，还是不断扩大它、强化它，这反映了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斗争，这是一场巩固还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大搏斗。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群众深深懂得，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实现对资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差别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没有革命理论是不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虽然“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 年版第二卷第 134 页）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的精神武器武装起来，才能在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过程中，战胜各种习惯势力的反抗，战胜修正主义的干扰，在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应当说，这样的认识，是广大群众更加自觉地学习革命理论的思想基础。广大工人群众正是在这种强烈愿望的激励下，自觉地组织起来，开展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在斗争中形成了一支工人理论队伍。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一出现，就以战斗的姿态向几千年来形成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进行勇猛的挑战！

它冲破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少数人管多数人”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束缚，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革命责任感积极参加企业管理，既管生产，技术，又管方向、路线。事实证明，工人理论队伍，是一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队，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识别、抵制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倾

向，勇敢地冲杀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战场上。例如，我厂职工在试制成功第一台大型柴油机的基础上，曾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自力更生，成批生产船用主机的要求。当这个要求遭到一些“洋奴思想”十分严重的人极力反对的时候，轮机等车间的理论研究小组的同志们，同广大群众一起立即写出了《杀机用意何在？》等革命大字报，送到主管部门，并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坚决抵制了这种错误的思想，捍卫了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方针，两年来，我厂工人理论队伍同广大群众一起，不断地同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错误思想和做法斗，使全厂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群众管路线的自觉性越来越高。目前，一支以工人理论队伍成员为骨干的有四千多人组成的群众管理网已经形成，有效地保证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工人理论队伍破除了“脑力劳动者高人一头，体力劳动者低人三分”这个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用来衡量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为进一步调整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做出了贡献。就拿我们厂来说，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虽然知识分子队伍的革命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传统势力的影响，剥削阶级的等级观念在部分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仍然发生着作用，他们总认为自己从事的劳动是“高级劳动”，把知识作为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把研究成果作为向人民索取特权的手段，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工人理论队伍的出现，本身就是对这种等级观念的否定。他们不仅具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而且能在革命理论指引下，迅速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他们不计报酬，不争名利，拿起榔头能干活，登上大楼可以搞设计，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改造了知识分子队伍，改变了技术领域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创造了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我厂爆炸冲床的诞生就是突出的一例。过去，我厂加工大型空气瓶，需要车、刨、研、磨等多种工序，既费工又费料，生产效率很低，影响了生产的高速发展。爆炸加工班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的工人、技术人员，

以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为武器，不要投资，不要设备，凭着迅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雄心大志，打破常规，研制成功了以炸药为能源的火药冲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为机械加工业的发展闯出了新的途径，两年多来，我厂工人理论队伍和全厂工人、技术人员一道，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先后实现了两千余项技术革新，搞成了大型螺旋桨叶面无余量低压铸造等十几项重大科研项目，促进了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

工人理论队伍回击了“大老粗不能搞理论”的资产阶级偏见，以豪迈的气概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践证明，他们不但能学好理论，而且能研究理论。我们厂的理论队伍成立后，在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斗争的需要，广泛开展了分科理论研究。先后成立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五十余个分科理论研究小组，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学习研究活动，并用研究掌握的理论，从各个方面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这些一向被资产阶级老爷们瞧不起的普通工人，登上了长期以来被学者、专家、教授们独霸的讲坛，辅导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讲解儒法斗争史，有的还担任了大学、市图书馆的业余理论讲师。他们还紧密配合形势，进行“著书立说”，两年来，他们同有关单位合作，先后编写了《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列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国哲学史通俗讲话》、《欧洲哲学史简编》、《柳宗元诗文选》等十几本政治理论书籍和科技、历史读物。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他们一方面努力学习革命导师的论述，另一方面紧密联系本厂现实斗争的实际，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工厂企业里的资本主义倾向》、《小生产者和旧的习惯势力》、《文化大革命前后工厂生产关系的变化》等五十余个调查报告；并带着群众学习中出现的问题，研究了百余个课题，指导了群众的学习，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

事实告诉我们，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工人理论队伍，是一批能文能武，能上能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这些人身上生动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雄辩的事实说明，工人理论队伍不仅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不断巩固和建设这支队伍，无疑是缩小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要最终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毕竟是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事业。因此，我们还必须从各方面付出极大的努力。就理论队伍来说，人数少了是不行的，必须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我们体会到，这里所说的宏大，不仅是个数量概念，而且包含着深刻的阶级含义。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以这支队伍为基础，在工人阶级内部不断扩大它的人数，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能动作用，积极地去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和其它劳动阶层，使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基于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我们注意不断地去扩大这支队伍，使我厂理论队伍由开始的几百人发展到现在的两千九百多人，不但有文化不高的老工人和家务事比较多的孩子妈妈参加，而且也适当吸收了一些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必将日益发展壮大，而当整个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时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就可以消灭，共产主义在这个方面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我们在建设理论队伍，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中所取得的成绩仅仅是迈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我们决心认真学好、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加强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

阳戈

1975-11-01　红旗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

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

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这笔账必得算一算　清一清——评苏修戏剧《账目两清》

外语系俄三师生批修组

1975-11-25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苏修《戏剧》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七期发表了剧作家维·罗佐夫的两幕喜剧《四滴水》。剧本由四个小故事和贯穿于故事之间的作者旁白组成。四个故事的情节、人物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是四个独幕剧。但都是以反映苏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题的，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苏修社会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账目两清》这出戏，通过两个老同学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悬殊以及他们之间由此而产生的一场冲突，使读者清楚地看到了苏修叛徒集团豢养下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丑恶嘴脸。

大学者杰尼索夫是列宁奖金获得者。他家有汽车，住着别墅，钱包永远鼓鼓的，装着花不完的卢布。这个所谓"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分明是新资产阶级的一员，以"合法"和"非法"手段侵吞社会财富的吸血鬼。然而，面对群众的愤懑，他却大肆宣扬什么"幸福不在于有钱"，"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还不能到按需分配"，以此维护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他，杰尼索夫，自认是"天堂的鸟"，"主要人物"，以"救世主"的"慈悲"授人以小恩小惠，以扇耳光来维护自己"沙皇"式的尊严，显然是一个有权有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太上皇。但在面纱待揭，凶相未露之前，他却侈谈什么"人们出世以来就是绝对平等的"所谓"家庭哲学"，用来掩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掩盖自己的法西斯本来面目。杰尼索夫表现得十分贪婪，十分伪善，暴发户和两面派的政治特点，在这个资产阶级分子身上兼而有之，极为突出。

不过，杰尼索夫的贪婪和伪善决不仅是他个人的坏品质，他的财源茂盛和扬名显身，也不是象他所标榜的那样，仅凭个人才能就能猎取到的。他之贪婪伪善，

因为他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豢养的精神贵族的代表，从头到脚浸透这个阶级的本性。他之财源茂盛扬名显身，因为勃列日涅夫集团为犒赏这伙精神贵族的效劳，培植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一直在拼命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确保着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杰尼索夫宣扬："以人类的本质而论，人们从出世以来就是绝对平等的。"但他却横行霸道，对不敬重他的谢列兹涅夫殴打臭骂，拼死保护自己的金钱和权势，表现了极大的不平等，以自己的行动打了自己的嘴巴。杰尼索夫敢施淫威，因为正象谢列兹涅夫点破的，他自认是"天堂的鸟"，"主要人物"，因为在今天的苏联，他这个阶级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恢复资产阶级"天堂"以来，杰尼索夫就是翱翔之中的"鸟"了。从他们经营莫斯科新沙皇的朝廷开始，杰尼索夫就成了他们控制下的苏修社会的"主要人物"，成了鱼肉人民，欺压群众的剥削者、压迫者。正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从出世以来"就是"绝对"不"平等"的，杰尼索夫才狡猾地绕过苏修社会阶级对立的森严壁垒，空谈"人类""本质"的滥调，用这种障眼法迷惑苏联人民，维护本阶级的统治。

杰尼索夫的政治特权是勃列日涅夫集团给的。杰尼索夫的政治手腕也是从主子那里学的。勃列日涅夫不是公开宣称："苏联工人阶级要同我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一道起领导作用"吗？这就是说，苏修豢养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应当而且早就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即统治作用了。至于说到苏联工人阶级，他们虽然早已被赶下历史舞台，但也不妨配上几个拿高薪的"劳动英雄"或当了官的"工人代表"，装点一下垄断资产阶级政权的门面，以便更好地愚弄苏联人民。这才是勃列日涅夫要"一道""领导"的要害。你看，一个一边扇着你的耳光一边喊着与你"平等"，一个早已踢你下台还要表示同你"一道"，一主一仆，从思想到语言何其相似乃尔！

看了《四滴水》的演出后，某个苏修博士说，杰尼索夫“教训”谢列兹涅夫“固然不错”，但又指责他“只是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才扇了”“勒索分子、蛊惑家”“谢列兹涅夫一个耳光”，表现得过分“善良”，“教训”谢列兹涅夫也为时过晚了。在博士看来，这一耳光太不过瘾，太不解气，只有把敢于触动杰尼索夫的人们置于死地，斩尽杀绝，才能平他胸中怒火，解他心头之恨。触动一个杰尼索夫，惹来一场狠狠的报复。苏修御用学者在统一的后台支持下，就是这样串通一气，强化着资产阶级专政的耳光，不过是“沙皇”权力的象征，被挨耳光的谢列兹涅夫，也不是工农群众和社会底层的代表，但透过这个情节，我们还可以部分地看到今日苏修社会的真相：在那里，尽管电视里演的，歌曲里唱的，都是“和谐关系”和“友好合作”（勃列日涅夫语）的高调，讲的也是杰尼索夫所谓的“绝对平等”，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杰尼索夫们的肆意横行和新沙皇镇压群众反抗的刀光剑影。这是“绝对平等”吗？不，这是残酷的法西斯专政！

苏修叛徒集团在分配领域利用“按劳分配”的外壳，按权力和资本大小在资产阶级内部瓜分剩余价值，已经是众所周知了。所谓在“分配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领域”“始终不渝地实行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就是这种骗人的货色。但在他们确保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经济上的特权地位时，制造了一些更为反动的谬论。其一，精神贵族“顺利地劳动”必须有高水平的生活，必须享受种种特权；其二，精神贵族高深的知识来源于个人奋斗，财源茂盛理所应当。我们看看，杰尼索夫怎样利用这些反动谬论保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又怎样充当着大资产阶级特权的辩护士。

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上讲，“人的专业知识，高度的职业训练”是“顺利地进行劳动的必要条件”，“可是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水平，取决于物质和精神需求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充分满足”。这就是说，苏联的工人掐住脖子，农民勒紧裤带，照样要为垄断资产阶级提供剩余劳动，而对具有“专

业知识”、“高度职业训练”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则不同，只有“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种种“需求”，保证他们高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才能“顺利地”为垄断资产阶级效劳。在这里，“按劳分配”这个外壳显得碍手碍脚，因而，勃列日涅夫干脆把它抛开，而赤裸裸地谈起对精神贵族们“个人物质利益”和“需求”的“充分满足”了。毫不奇怪。因为对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按劳分配”不过是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的代名词，而资产阶级本身，早已是按“需求”实行肆无忌惮掠夺的掠夺家。

杰尼索夫“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在莫斯科郊外建造了别墅。须知，在莫斯科附近的松林地带，专供特权阶层及其家属享用的这种别墅有五万多幢，不全是为杰尼索夫这些郊外邻居“需要”“呼吸新鲜空气”而建造起来的吗？在“满足”“需求”的口号下，苏修叛徒集团以高工资、高稿酬、高版税、高津贴和多达百余种的各类奖金制造着苏联知识界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那笔盗用列宁名字的奖金金额竟达一万卢布，相当一个普通工人十年的工资。杰尼索夫恰是这笔巨额奖金的受惠者。可见，这个顷刻间赚取工人十年血汗的掠夺家，无耻宣扬“幸福不在有钱”的饱汉哲学，说穿了，不过是要象他一样的“百万富翁”陶醉于“快快发财”的“幸福”，让沦为雇佣奴隶的劳动人民安贫乐道，饿着肚子去感受“灵魂”的“轻松”。

杰尼索夫为了给他的“饱汉哲学”找依据，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履历和家谱，什么追着妈妈要面包啦，什么晚上“去卸货，去教课”，以劳动来维持自己的学习啦，什么打过仗，是“炮手出身”啦，等等等等。杰尼索夫在不厌其烦炫耀他这一段段“光荣”历史之后又反复提到“鲍曼工学院”。杰尼索夫企图以此说明，他的财富是知识高深应得的报酬，而他的知识是靠个人奋斗得来的。对此你只能羡慕，只能尊敬，而不能稍表不满，稍有不逊。

然而，杰尼索夫的自吹自擂只是画了一幅绝妙的工人阶级叛徒的自画象。它告诉人们，这个出身很好，由劳动人民喂养，上过名牌大学的所谓“红色专家”，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经过苏修叛徒集团的栽培，已经完全堕落成了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专政的“帮办”。至于他的财富因何而得，谜底也是一揭即穿。苏修明文规定，列宁奖金必须“有区别地”使用，为“鼓励”那些“值得国家支持的创作”而颁发，奖金获得者必须取得苏修中央和政府的批准。显然，这笔奖金是专门留给追随苏修叛徒集团有功之徒和御用文人学者的。杰尼索夫能够出人头地捞到它，“区别”于人们的当然不是他的“卸货”、“教课”和“爱学习”，而是那种“知道哪儿该骑马，哪儿该步行，哪儿该青云直上”，“哪儿该匍伏爬行”的“机灵”劲儿，是那种紧紧追随苏修叛徒集团和社会帝国主义路线的“本事”。

作为杰尼索夫的对立面，剧作者塑造了身任电视机修理店经理的谢列兹涅夫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对自己处于卑微地位感到寒酸，对当了新贵的杰尼索夫的伪善说教，感到愤懑，当面加以辛辣的讽刺与揭露。当杰尼索夫给他施舍式的借贷时，他感到莫大的侮辱，“为了社会，为了平等”，深悔童年时代没有及早把他杀死。这是苏联知识界两极分化的折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整个社会矛盾的加深。然而谢列兹涅夫却错误地认为造成他们之间的差别与对立的就是杰尼索夫胸前挂的那块奖牌，因而把一切愤怒集中到它上面，伸出手去想把它揪下来。而当他遭到对方的辱骂和凶狠的殴打后，就立刻软了下来，委曲求全。但又进一步幻想有朝一日在自己胸前也挂上那块奖牌：“这该多棒，奖金获得者！”表现出“彷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并“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的特性。但在苏修社会，谢列兹涅夫这样的“小鱼”，除个别的能爬上去外，绝大多数是要被杰尼索夫这样的“大鱼”吃掉的。正因为如此，当严惩触犯者谢列兹涅夫之后，杰尼索夫得以胜利者的姿态，口念“谁也不欠谁的账”，耸着肩膀扬长而去。

苏修叛徒集团及杰尼索夫们，只能一时吓退懦弱卑微的谢列兹涅夫之辈而获致“账目两清”。但对于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你们是压服不了的，因为“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账必得算一算。”你们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实行惨绝人寰的法西斯专政，难道这笔账能不算一算，清一清吗！？你们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对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残酷盘剥，敲骨吸髓，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笔账能不算一算，清一清吗！？你们把军队开进别国领土，实行殖民统治，你们压迫、剥削第三世界人民，难道这笔账能不算一算，清一清吗！？不行！绝对不行！你们早以自己的倒行逆施激怒了人民，促进着人民的觉醒，你们已经陷入同广大苏联人民尖锐的对抗中。手上长着老茧的苏联革命群众总有一天要和你们彻底算账。

苏联国内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正在日益深化。对于这一矛盾，苏修统治集团是讳莫如深的。在这一条件下，适应资产阶级维持修正主义制度的需要，“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的“社会庸医”也纷纷登场。《四滴水》的作者通过自己的剧本进行的正是一种阶级调和的道德说教。剧本作者说，四滴水就是四滴“滴剂”，它可以使那些“心满意足”的新资产阶级“感到某种不安”，而使“灰心丧气不想活下去”的劳动人民和其他群众“振奋”起来，作者并在旁白中暗示，即使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不必采取开刀的方法，只要有“人类善良的暖流”就可以“医治”一切“创伤”。但处在法西斯血腥统治下的苏联人民最知道这种道德说教具有多少价值。他们通过自己身受的重重苦难清楚地知道：靠对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和规劝来减缓对人民的压榨和欺凌是永远办不到的。“特权者的‘良心’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要从特权者的统治下求得解放，只有对旧制度开刀，只有向剥削阶级算账，只有自己救自己。

苏联人民必将抛开一切“社会庸医”，踢开一切绊脚石，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同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算总账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喜看明日之苏联，必将是赤旗之世界。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将重见光明。

附：苏修剧本《账目两清》

（两个中学时代的同学，一个叫安德烈·谢列兹涅夫，一个叫米哈依尔·杰尼索夫，两人几十年未见面，却偶然在郊区电车上相逢了。安德烈根据小时候和米哈依尔打架在米的脸上留下的一条伤痕，首先认出了他。彼此见面后，不免忆旧谈新。）

杰尼索夫（以下简称杰）：（想改变话题）您……你现在在哪儿？

谢列兹涅夫（以下简称谢）：在这儿，克拉多沃——电视修理店。

杰：当机械师吗？

谢：不，兄弟，当经理，不是小卒了。你呢，我看得出，也混出个人样儿来了。

杰：……

谢：我看得出，看得出！西服是高级的，还有这皮鞋，这小领子，是个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你在哪里做事呢？

杰：是的，我先在鲍曼工学院上学，后来……

谢：可我呢，老兄，打过仗。

杰：我也打过。

谢：大概是当文书吧？

杰：不，BYC-7，当炮手。你能想到吗，我是炮手出身！

谢：是的，挺逗的……那么你佩戴的是什么奖章呢？

杰：这是列宁奖金获得者的奖章。（停顿）

谢：噢，……你看，我忘了，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来着——大概叫费多尔吧？

杰：阿列克塞。

谢：那么你是叫米哈依尔·阿列克塞也维奇，同俄国沙皇一样罗？

杰：沙皇叫阿列克塞·米哈依罗维奇。学过历史吧？

谢：学过，没忘。我是说，象是沙皇，只是倒过来了。对我来说你是米什卡，不是沙皇。……（阴郁起来）住在莫斯科吗？

杰：是的。

谢：大概有住宅吧！三间？

杰：四间。

谢：几口人？

杰：三口。

谢：三口人住四间房，真行！不赖！

杰：（好象要表示歉意）是的，住宅是很好的。

谢：想必有小汽车吧？

杰：有。

谢：这也是了不起的。（短暂停顿之后）常到别墅去吗？

杰：去的。你知道，一天下来脑袋象棉花一团。而在城外，可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到早晨就没事了，又好使了。

谢：别墅也是自己的吗，还是公家的？

杰：别墅是自己的。跟企业要也可以给，但是，你知道，当然是自己的舒适一些。

谢：你那儿有电话吗？

杰：是的，有。

谢：你走运了吧，大概捞了一大把？

杰：捞什么？

谢：红色的，紫色的，咖啡色的，妙极了，一百卢布的票子啊。

杰：啊，是的，我的工资很不少。

谢：可不象我们这些普通人。关于平等我们只能在歌里唱唱，或是在电视里瞧瞧。

杰：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还不能做到按需分配。

谢：你还是不要为自己辩护了吧，算了，别辨护了，我也没有责备你。

杰：我并不是为自已辩护，你知道，安德留莎，幸福不在有钱。

谢：因为你的钱太多了，你才发表这议论。亲爱的，钱虽然不是上帝，可也是半个上帝呀。

杰：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完全真诚地说这些话。你记得我曾经是怎样生活的吗？妈妈送邮件，爸爸早就没有了。一天到晚嚷着："妈妈，给我块面包吧，妈妈，我想吃东西。"而我没有忘。然而我仍然是幸福的。第一批书，第一批朋友，学校，河流，捉鱼。这简直就是整个世界，《外加一双冰鞋》——你还记得安徒生的这部作品吗？——这一切属于你自己。你应该相信，对人来说幸福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

谢：但我对你说，这是饱汉的哲学和它的全部内含。

杰：在大学学习的时候，你也知道，我老是挣点工钱：晚上去卸货，去教课。但心里觉得很温暖，很畅快。幸福不在于有钱，安德留莎。

谢：你从宣传机关出来去给人家作这样的报告，一定会得到好报酬的。也许从前，当人们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时候，这类低级的说教还能安慰人。而现在可没有这种傻瓜了。现在人们已经发展到另一个更高级的阶段，他们的要求也增长了……你讲这些是很不体面的。要是我来说嘛，我，是一个普通人……

杰：而你没有说这些。

谢：我不会说，因为这很蠢……好吧，你从小就很狡猾。常常是老师一问“谁想补充”，你就把手举起来，补充个没完。这就是说，你的一切福气都来自这个补充罗，是吧？

杰：（想笑）看来这点你说对了。我爱学习。从鲍曼工学院毕了业，然后……

谢：……这么说，你很会机灵地生活罗——知道哪儿该骑马，哪儿该步行，哪儿该青云直上，如果需要的话有时也匍伏爬行。我说的，是这么回事吧？我们知道，亲爱的，知道聪明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们知道，但是不会。就象人们所说的，我们乐于升天堂乐园，但是罪过在拖后腿。我坦率地对你说，不愿玷污灵魂。我们重视良心，坦率和真理。这样我们就能睡得踏实。

杰：（试图开玩笑）我觉得你也生活得不坏。你这不是买了满满一网兜桔子。

谢：（已经不高兴了）米沙，我的孩子也是孩子，他们不是昆虫，他们也需要维他命。

杰：你完全曲解了我的意思。

谢：然而一切我都理解，米沙，一切。不要把我当做毛孩子，尽管我不是奖金获得者！

杰：你真是个怪人，安德烈。

谢：世界就是由怪人们支撑着的……正是我们，不是你们，是大地的精华。是我们，群众，人民。你懂了吗？还是早已忘记了？

杰：为什么说我忘了呢？

谢：因为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可能由于空气稀薄而头脑发昏了。说什么我是天堂的鸟，主要人物。但是，米沙，我们在密切注视天堂的鸟。一旦你飞得很高了，唱的不是那个歌子，我们就要从下面给一枪，你就又在地上了。为的使你别忘，使你永远记住。如果翅膀折断了，就请不要生气。我们的手很粗，长着老

茧。我们靠双手养活自已，不靠你们那形形色色聪明滑头的诡计。所以说，虽然你，米沙，是一个奖金获得者，我也不那么简单。懂了吧？没有？

杰：（笑）米沙，你牢固地掌握了这些原理。而且有独特看法。

谢：而且我永远不会忘。否则，你知道，这些不平等我看着难受。你现在太概也在想：坐在你面前的是你中学的朋友，还是那样土里士气的……

杰：（真诚地）你怎么不害羞！我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想法。首先，照我的家庭哲学，以人类的本质而论，人们从出世以来就是绝对平等的。

谢：这是什么意思——照你的哲学？你怎么——有自己单独的而不是我们共同的哲学吗？

杰：我不是那个意思……

谢：那就是说，曲解你的意思罗？你看，米沙！……好吧，别耍滑了，照直说吧，同志式的。只是别说谎，你是诚实地生活过来的吗？象苏维埃人应该有的那样？一点没有走样？

杰：唉，安德留莎，只有个上帝没有罪过呀！

谢：啊，多么坦率呀！我珍视你这一点。我只是谈自已。我不知道你的上帝在哪儿，我没有上帝，但我生活得很诚实。

杰：好啊，灵魂感到轻松。

谢：可是口袋呢，亲爱的，是空的。勉强活下去。举个例子说吧，女儿想买一架竖钢琴。攒钱呀，攒钱呀，还是买不起。小姑娘有才能，人们都说，听觉很灵敏，尽管弹了又弹。但是罗锅上山——前（钱）紧，象目前人们说的。还要凑齐二百卢布才行。我脑袋里就在想着这件事，你大概没有这样的重压吧。把手伸到装钱包的口袋，一打钱包，就取出来了。

杰：我借给你这些钱，可以吗？我身边正好有，我收到的。

谢：愿意给二百卢布吗？

杰：当然。

谢：你也不害羞？

杰：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有的时候再还嘛。

谢：还，还，你别担心，我不赖债，也不会偷。

杰：拿去吧。（掏钱包）

谢：（粗暴地）放回去，放回去，听见了没有？

杰：我是真心的……

谢：但是你有的是黑心，亲爱的，你不害羞吗？

杰：真话……

谢：我问你，害羞不害羞，啊？

杰：（藏起钱包）害羞，安德留莎，请你原谅。但是请你别以为……

谢：难道你不明白吗，米沙，你用自己这种沙皇的手势贬低了……

杰：（胆怯地笑着）我说，你拿去吧。我不会因此垮台。

谢：拿就拿，那么你还说什么呢？

杰：我要说，很好，我将很高兴。（手伸到钱包里）

谢：等等！别掏，别掏，高兴！那么你的良心在哪儿！你别掏了，我再考虑考虑。（停顿之后）喏，好吧，为了急用我拿吧。见你的鬼去吧。

杰：（很快掏出钱包取钱）这就是，请拿去吧。

谢：（不拿）等一等，先别掏，我想，我还没决定呢。我不想让你高兴。但是当我想起孩子将用自己的手指弹那白色琴键的时候……你把钱拿住，掏出来吧。好，给我（拿钱，数）我是违背心意拿你钱的，记住这一点吧。只是为了孩子。而且很快就会还你，别担心。

杰：我不担心。

谢：（笑）要知道，通过眼神我就能看到你的心里，虽然不是那么透彻。哎呀，米沙，米沙，我给你留了个伤疤，可能那时候我应当趁你童年就把你杀了。为了社会，为了平等。喏，我在开玩笑，别生气。你该下车了！（从钩子上摘下网兜）这样的奖牌值多少钱，啊？

杰：不知道，我不想卖，也没估过价。

谢：你就挂上了它，为的是大家都能看到：看，我是奖金获得者，你们都要给我让路！（用手指碰一下奖章，摇动它）

杰：别动！

谢：怎么？（用手指抓住奖章，摇动它）

杰：（激动地）跟你说，把手拿开！

谢：（抓往奖章，脸是凶狠的）我就不拿开。

杰：最后一次跟你说。（谢列兹涅夫去扯奖章，看得出，他想把它从杰尼索夫胸前揪下来）我对你说过了。坏蛋！（突然用力打了谢列兹涅夫一耳光）

谢：你于什么？（由于惊慌失措摔倒在小桌上）你干什么？……（桔子在车厢地板上乱滚）

杰：你怎么，坏蛋，发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吗？那我来教训教训你！（由于狂怒而非常高傲）你不要忘了自已姓什么。无论你是谁，在哪个发展阶段上，你也应当象人一样跟人说话，而不要象个狗。不要象个狗，懂了吗？

谢：米沙，……米哈依尔·阿列克塞耶维奇，你怎么啦？米哈依尔·阿列克塞耶维奇，我只不过闹着玩……你别以为……童年朋友……我……我永远不会反对你……我尊敬你……这是我慌了……我非常高兴——在同班学习过……老朋友……你别以为……这是因为我高兴，我有这样一个朋友……我住在克拉特沃，林业大街 7 号，如果你来的话……要知道哪里顺路。我也有一所房子，紫颜色漆

的……很漂亮。（嘿嘿地笑）中上等的……五间。我有车房。你如果来，我将非常高兴。邻居们会看到，谁来了……阿列克塞·米哈依罗维奇，就是米沙，就是……

杰：（已经冷静下来，但冷淡地）我该下车了。再见，安德烈。就算我还了你那一下，谁也不欠谁的账了。（望着谢列兹涅夫的脸）

谢：你干什么？

杰：看一看，打伤了没有，象你当初打我似的。拿打火机来。（谢列兹涅夫取出打火机照自己的脸）没有，好象还干净。

谢：那时我手里有铁东西。

杰：请原谅我把桔子弄撒了。（帮谢列兹涅夫收桔子）

谢：你怎么啦！不要这样！你会弄脏的。

杰：祝你健康，安德留莎。再次请原谅。（握谢列兹涅夫的手，走向出口）

谢：（在地上爬，收桔子，在杰尼索夫身后）再见吧！非常高兴和你见面，米沙，我真骄傲。（杰尼索夫在车厢通道消失）（摊开双手，几乎狂喜地）这该多棒，奖金获得者！……

坚持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正确路线——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

石凌

1975-12-01 红旗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中，通过对中国革命任务、对象和动力的分析，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了革命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给青年工作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几十年来，我国广大青年在这条路线指引下，坚持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对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正确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千百万知识青年实践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所提出的路线，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满怀壮志豪情，奔赴农村，奔赴边疆，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的热潮，把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大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一起，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战天斗地，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代新人正在茁壮地成长。他们正在逐步使自己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当了农村基层干部，有一大批成了学习理论的骨干，担任了农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农业技术以及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工作，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他们以实际行动，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工农的传统观念，给那些对青年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持怀疑态度的人以很好的教育，给那些反对派以有力的回击。实践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重要措施，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

三大差别，加强农村的建设和推动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应该坚持这样做下去。在当前，重新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对于我们继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做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判和抵制某些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

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就清楚地说明，青年们是不是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一个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问题。任何一个青年人，只要他想投身革命，就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除此没有别的道路。同时也告诉我们，是不是积极引导和努力帮助青年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在青年工作中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革命青年要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主力军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群众的事业，根本的力量是工农群众。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作中，反复强调了工农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虽然不同了，但是革命的主力军，依然是工农群众，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后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广大工农群众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积极引导广

大青年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引导青年走向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他们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他们不是依附于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依附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服务，二者必居其一。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两个阶级都要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把青年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我们坚持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路线，积极引导和努力帮助青年紧密地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就是要使他们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服务。否则，路线不对头，青年们脱离工农群众，就会被资产阶级拉过去。要不要青年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关系到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关系到能不能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我们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把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富有革命的热情，有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强烈愿望。但是，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指出的："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种情况，使一部分青年人容易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阶级敌人则总是利用这一点煽动某些青年人脱离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引导他们到工农群众当中去，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从中学习工农群众坚定的阶级立

场、高度的路线觉悟、崇高的思想品质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就可以使他们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轻视工农的反动世界观的影响，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同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群众服务。工人和贫下中农当中的知识青年，也要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虚心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

坚持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路线，还有助于解决理论同实践的结合问题，使他们把从书本上学来的不完全的知识变成比较完全的知识。知识青年读了几年书，有了一些书本上的知识。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让知识青年到工农群众当中去，把学到的书本知识应用于群众的斗争实践，在实践中对它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这样就可以使他们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掌握比较完全的、有用的知识。那种认为只有在学校课堂里学到的书本知识才算知识的看法，是片面的。毛主席关于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曾经作过精辟的阐述，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整顿党的作风》）要掌握这两门知识，光靠关门读书，是办不到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许多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十几年不接触工农群众，不接触实际，能说是掌握了这两门知识吗？实践证明，那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办法。我们要把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必须让他们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中进行锻炼，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要是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就必须这样做。

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肯定了当时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毛主席指出:“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当时的延安青年，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走同工农结合的道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批判了几千年来旧的传统思想，批判了孔孟之道，成为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把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正确路线永远坚持下去。

要不要坚持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青年要不要上山下乡，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和林彪，都是青年工作正确路线的反对派，都是反对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都是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在青年问题上做文章，竭力散布什么“读书做官”、“下乡镀金”和“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的邪路，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作中，深刻地批判了反对革命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错误倾向，并告诫广大青年说：“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我国广大青年没有忘记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深刻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对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坚持了正确的方向。他们就是在反对“那股黑暗的逆流”的斗争中，“向光明的前途进军”的。但是，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只要有

阶级和阶级斗争，总会有人反对正确的路线，反对革命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我们必须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黑暗的逆流”，同反对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种种错误倾向作斗争。

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大事情，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是并不奇怪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需要我们按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和政策，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因为存在着缺点和问题就看不清主流，对这项工作发生怀疑和动摇，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也是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我们应该为党的事业和青年们的前途着想，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支持青年上山下乡，引导他们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有的青年思想上出现反复是难免的，这就需要我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在生活、学习、工作方面的实际问题，要积极地帮助解决。对于当了干部的知识青年，要注意教育他们继续同群众结合在一块，不要把他们从群众斗争的土壤中“拔”出来，割断了他们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对于每一个知识青年来说，要解决一个真扎根还是假扎根的问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决不能只干一阵子，做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而要树立坚持在乡村干一辈子的思想，做一个铁心务农的革命者。下乡两三年，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难的是一辈子扎根农村。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把现实的革命斗争同共产主义大目标联系起来，把在农村从事的每一项平凡的劳动都看成是实现伟大理想的实际步骤，自觉地同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一起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服从国家的需要。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没有长期在农村干革命的思想，虽然身在农村，也很难同广大贫下中农结合在一块。所以，这个真扎根假扎根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真结合假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同

贫下中农就会有共同的语言，对农村就会有深厚的感情，即使有什么歪风吹来，也不会发生动摇，能够顶得住，在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上走到底。

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在毛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号召。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改天换地的斗争。广大知识青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可以在学大寨的运动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同时，这样一个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又为青年们提供了最好的学习课堂，他们可以在这场斗争中同广大贫下中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毛主席制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

叶新

1975-12-01　红旗

毛主席早就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主席规定的这一方针,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总结了国内外教育领域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刘少奇、林彪一类,为了把教育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都曾经千方百计地抵制、破坏和歪曲这一方针。尽管刘少奇、林彪的阴谋已经破产了,但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很激烈,还会长期存在。教育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这几年才刚刚开始,我们的战斗任务还很艰巨,这条征途是很不平坦的。但在任何时候,无论遇到什么风浪,我们对毛主席规定的教育方针决不能动摇,一定要在斗争实践中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使教育革命在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在阶级社会里,从来不存在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列宁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虚伪。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标榜什么“教育就是传授知识”,好象他们的教育是超政治的,这完全是照抄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他们所传授的知识中,渗透着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观点,其目的是为了把教育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

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我们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要求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它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斗争，使它成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就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德育是统帅，居于首要地位。它决定着智育和体育的方向，是要解决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要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首先应当培养具有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战士，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学好文化，锻炼好身体。智育和体育，就是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解决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只有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他们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对于教育质量，应该从德、智、体三方面来看。但有的人则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口头上也承认要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而实际行动上却仍然习惯于把智育当作第一位的问题来抓，并在智育中又把书本知识教学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抓。教育战线上有一种议论认为，这几年来批“智育第一”批错了，使智育放松了，书本知识教学放松了，总之一句话，教育质量下降了。这种论调究竟对不对？是否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这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深思的问题。

毛主席历来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如果不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怎么可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呢？列宁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

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俄共（布）党纲草案》）如果不把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怎么可能培养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一代新人呢？而“智育第一”，是同列宁的有关教导，同毛主席关于“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把德育放在第一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的。把智育放在第一位，势必要取消德育的统帅作用，取消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以资产阶级政治为统帅。因此，“智育第一”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在这种路线支配下，学生除了整天死记硬背那些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外，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统统不知道，不仅越读越蠢，而且身体也会搞坏。如果说，培养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就叫做“教育质量高”，那么这种“高质量”显然不是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需要的，而是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智育第一”这种修正主义的谬论，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的损失难道还少吗？宣扬“智育第一”，就是要把知识变成个人的资本。从封建阶级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资产阶级所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套反动的传统观念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反对批判“智育第一”，实质上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就是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认为批判“智育第一”就是意味着放松智育，这完全是一种曲解。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在抓好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必须抓好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学好社会主义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文化课，向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这对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从来认为，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为了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和技术上所占的优势，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无产阶级抓好智育是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事业，需要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学到比较丰富的社会主义文化知识。但是，我们抓智育和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抓智育的。我们所要学习的文化，是贯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三大革命运动真正有用的知识。我们抓智育，要特别注意学科的思想政治方向，打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体系，抓好学科领域中的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辩证唯物论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这种学习应当是生动活泼的，不是死读书。如果让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否定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使师生只记得“专业”，忘记了“专政”，忘记了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那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会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学校就会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沉痛教训，我们决不应该忘记。

在我们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决裂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点是妄图利用各种旧思想来腐蚀青少年，这本来是不足怪的。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总会发生对青少年的争夺仗。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搞好教育革命，坚持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方向。如果不是采取加强革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反而否定教育革命，否定青少年学生的大多数，发出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论调，那就站错了立场，是在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有些人曾把学生作文中的错别字、句子不通的现象当作笑话传播，以此证明“教育质量下降”，必须关门死读书。其实，这种手法也不是新发明。嘲笑、打击学生的事情，历来就有。鲁迅曾经针对某些文人学士抓住学生考卷中的笑柄而“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说：“我以为既是学者或教授，年龄至少和学生差十年，不但饭菜多吃了万来碗了，就是每天认一个字，也就要比学生多识三千六百个，比较的高明，是应该的，在考卷里发见几个错字，’大可不必’飘飘然生优越之感，好象得了什么宝贝一样。”在今天，有人还想抓住学生的错别字当作“什么宝贝”，除了想显示自己比青少年“高明”、“优越”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指责

教育革命，为旧教育制度辩护。其实，可笑的不是那些蓬勃向上的广大青少年，而是那些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青少年的人；应该受指责的，不是正在发展中的教育革命，而是那些站在教育革命之外、用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来攻击新生事物的人。

就无产阶级的智育而论，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学生掌握了多少书本知识，主要是看学生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知识学得怎样，其中更要看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什么是知识？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而要教好、学好这两门知识，就必须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继续搞好开门办学。旧学校课程太多，考试对学生搞突然袭击，害死人。近几年来，教育战线根据毛主席关于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广泛实行开门办学，冲破了过去的旧框框，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理论和实际开始结合起来，学生不仅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学到了比较完全的知识，体质也比过去那种埋头读书的时候有了明显的增强。这说明，不仅搞好德育，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要搞好开门办学，就是搞好智育和体育，也需要实行开门办学。不能把抓文化课（包括基础理论课）同开门办学对立起来。学生学的书本知识，即使都是正确的，如果不接触实际，也很难学懂，很难把它们变成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开门办学，学生经过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过程，才能正确地接受前人总结出来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知识。当然，开门办学要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原则，既要合理地安排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也要保证上社会主义文化课的时间。学生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应当结合生产劳动进行文化课教学活动，或承担一些科研任务。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如果不抓好思想教育和教学活动，同样不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知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办学要开门，开门要办学，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有用知识和本领。

实行开门办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重要途径。围绕着开门还是关门，真正的开门还是形式上的开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有那么一些人总喜欢用旧尺子来衡量新事物，认为开门办学这也“不正规”，那也“不象样”。他们寻找借口，企图把青少年学生重新关在校门内死读书。他们要关的是广大师生同工农相结合的门，也就是通向三大革命运动的门。学校的大门，经过这几年教育革命好容易才打开，现在又要关起来，这不是要走回头路吗？但是，别忘了，回头路是走不通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和工农群众是不会答应的。列宁说过：“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青年团的任务》）我们就是要对旧的教育制度、教学体制和方法进行彻底改造，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道而行之，继续把学校办到工农群众中去，办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在毛主席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教育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起来，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教育战线出现的许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珍惜这些新生事物，使它们不断地完善起来。我们要进一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好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坚决批判修正主义，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百折不回地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牢记党的基本路线

上海市第二中学党支部

1975-12-01　红旗

我们上海市第二中学在解放前叫“务本女中”，是一所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学校。解放后十七年，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学校虽然挂上了社会主义的牌子，但走的仍然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老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荡涤了学校里的污泥浊水，使这所老学校焕发出革命的青春。在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下，近几年来，全校组织了近二百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小组，参加人数达一千六百多人，占全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师生员工广泛地参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在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中，他们走向工厂、农村，接触了一百八十多个单位，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在教学领域内，开门办学的路子越走越宽，学生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的劲头越来越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学校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并且有十九人参加了上海市第五届运动会，有两人参加了全运会。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九年，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为什么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些年来为什么我校能出现这样蓬勃向上的景象？我们的体会，关键在于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教育青少年这个问题上来。因此，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引导学生通过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按照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教育青少年树立革命理想，敢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我校七五届的一个红卫兵，在中学一年级时曾经贴出过一张批判

教学领域里唯心主义的大字报，这几年他一直坚持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他又组织了“金训华小组”，准备毕业后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今年八月十八日他向学校党支部递了入党申请书，并提出要去黑龙江插队落户。象这样在政治上、思想上朝气蓬勃的红卫兵，在我校不断涌现。一代新人的成长，本身就是对“一代不如一代”谬论的批判。

为了使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批判“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谓“智育第一”，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罢了。我们这所学校，解放前办了整整半个世纪，它标榜的是所谓超政治的“务本”，可是，从师资的配备、教学的内容到学生的出路，哪一条没有打上资产阶级政治第一的烙印？解放后，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我们这所“重点中学”，大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有的学生毕业后考不上大学就对前途失去信心，这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又是什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智育第一”的流毒也仍然没有肃清。我校有一个红卫兵干部，他原先政治热情蛮高，可后来却变得对班级的红卫兵工作能推就推，十分冷淡，因为他整天脑子里转的是“电子”。他原来是这样想的：“我看到一些有技术专长的人，在社会上蛮吃得开，心想，学到东西，装在脑里，人家抢不走，骗不了；又听人说，技术是敲不碎的橡皮饭碗，因此，就一门心思钻起‘电子’来了。”这个学生在一段时间里的表现，不正是说明“智育第一”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吗？事实教育了我们，要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须坚持在学校的一切工作中，“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我们批判“智育第一”，重要的一条，是要充分相信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威力。只要我们真正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家了，学生为革命而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得到充分的调动。我校七四届有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平时调皮捣蛋，学习不用功，各门功课都差劲。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认为自己反正是独子，

将来笃定留城市工作，学习好坏一个样，乐得优哉游哉。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后，找他谈心，与他一起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谈革命理想，还让他参加马陆公社的社会调查，看看社会主义农村的远景规划。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远大理想，和他原来缺乏革命理想、懒散的样子一对照，使他激动得不得了。我们又启发他：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应该怎样接好革命的班。经过教育，他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还买了不少农业科学小丛书，加紧自学，准备立志务农。可见，抓好政治思想工作，对促进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上文化课本身，决不是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标榜的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而是充满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开展，对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也日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在这方面，我们的体会有以下三点：

第一，要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不应该只满足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高涨，还应当认真地抓好学生为什么而学习，即学习的方向问题。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只有坚持为革命而学，所学的知识才能为无产阶级所用。有一次，一个班级到校办工厂电子车间边学习边劳动，学生们对装收音机可感兴趣啦，到下班时刻，不少同学还留在学校里抓紧学习，不肯回家。但同时也发现，有些学生对承担国家任务的劳动却并不热心，很松垮。这一“紧”一“松”之间，暴露了学习动机上的问题。于是，我们引导大家学习《国家与革命》，又请退休老工人给大家上为国家为人民刻苦研制太阳灶的“思想课”。通过一系列教育，端正了学习动机。他们除了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技能外，还组织了三个小队，到被单五厂试制、安装了光电自动探纬器，到郊区为贫下中农修理电动机，架设电线，还和学校附近的商业单位一起设计了自动控制售酒机。

第二，必须坚持开门办学的方向。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学生关在校内，不懂得工人怎么做工，农民怎么种田，商品怎么交换，脱离实践，脱离无

产阶级政治。我们就是要同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引导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使学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到比较完全的知识。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因为他们毕业后是要上山下乡的，中等学校一定要为此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熟悉农业和工业生产，熟悉劳动人民。开门办学要取得预期的效果，根据我们的体会，必须做到有目的、有计划、有安排。所谓有目的，就是要坚持在开门办学中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同时也要学习一些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所谓有计划，就是在每一学期开学时，对各门学科在这个学期搞哪些主要的开门办学项目，要做到心中有数；所谓有安排，就是在处理校外大课堂与校内小课堂的关系上，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开门办学的各个环节作科学的安排，各项措施要落实，使大、小课堂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几年来，我校各学科都根据各自的特点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教学网，为深入搞教改打开了局面。

第三，必须根据各门学科的特点，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比如教代数、几何、三角，过去讲数不讲形，讲形不讲数，形数分离，结果给学生灌输了形而上学思想。现在我们组织教师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数学〕篇，在数学课中既讲形数之间的差别，又讲二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使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渗透到这门学科中去。过去的物理课讲蒸汽机的发明，归功于个别科学家的天才，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现在着重强调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就使学生学习的过程成为接受生动活泼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过程。

“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为人民服务的知识本领，而且要有强健的体魄。旧教育制度提倡死读书，残害青少年身体，这必须坚决批判。几年来，我们在抓好德育和智育的同时，还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采的体育活动。除了坚持两

课两操活动，有计划地抓好体育教学外，还在普及的基础上，建立了篮球、乒乓球、田径等男女运动队。夏季长游，冬季长跑，春秋两季召开全校运动会，已经成为传统，学生的体质大大增强。在抓体育过程中，我们还注意批判锦标主义、技术第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抓好体育作为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转变学生思想的重要一环。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学校应该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搞教育革命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尽可能充分发挥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每年我们总要在学生中树立一批先进典型，使学生自己教育自己。我们还在学生中广泛开展红哨兵、红宣队、互帮互学等活动。对学生中贴出的大字报，只要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都加以热情的欢迎和支持。同时，我们还注意调动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这样的老学校的特点是老教师多，有些教师过去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对于这些教师，我们根据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针对不同特点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正确吸取经验教训。教育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在业务上也有一个再学习的问题。因此，我们注意组织教师的政治和业务进修，使教师队伍更能适应教育革命形势的发展。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决心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革命大批判，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贡献我们的力量。

开门办学　越办越好

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党支部

1975-12-01　红旗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学校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精神，实行开门办学，使学校开始与沸腾的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一九七一年，师生自己动手，艰苦奋斗，用一口大锅、一个大缸作基础，创建了校办工厂炼油车间，后来又在北京齿轮厂协助下，创建了汽车附件车间。此外，我们每年还组织师生下厂下乡，进行学工、学农，野营拉练。这就使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

新生事物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教育这块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很复杂，很尖锐，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刮起了一股风，说是学校这样办下去，不象个学校的样子，学生的质量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了。在这股风的冲击下，教育战线出现了与挂钩工厂“脱钩”、从学农基地“撤点”的倾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再一次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体会到，要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就必须开门办学。如果象文化大革命以前，把学生关在学校的四堵墙内，整天埋头读死书，教育如何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呢？学生根本不接触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实际，就不能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来，教育还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吗？在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显著变化，我们认识到，开门办学，是改变“三脱离”状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是不是坚持开门办学，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能动摇。

思想认识的统一和提高，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继续搞好开门办学的决心。面对“脱钩”、“撤点”的倾向，我们顶住了这股风，而且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开门办学基地。我们自力更生，对白手起家的校办工厂炼油车间进行了设备更新，并在北京齿轮厂的协助和学校师生的努力下，不断扩大汽车附件车间的机器设备和厂房，使各种机床由建厂初期的六台增加到现在的二十六台；我们进一步巩固了与北京齿轮厂的学工挂钩，还与空气调节设备厂建立了挂钩关系，保证每月有三个班的学生到这两个厂学工。我们还巩固了在顺义县马坡公社的学农基地，并且和我校毕业生插队地点延庆县城关公社以及近郊东升公社塔院大队四队建立了挂钩关系。去年，我校师生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又创建了一所农村分校。此外，为了学军、学商，我们还与一些部队和商店建立了联系。

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我们始终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引导学生参加实践，学习理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大大促进了学生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思想感情的变化。有一个同学，刚下乡时与老贫农同睡一个炕，他嫌大爷脏，不愿挨着睡，总想离远点。第二天，小组的同学开座谈会，请贫农老大爷参加。这位老大爷在会上回忆了苦难的家史和解放后生活的变化，使那个同学受到很大教育，从此他不再嫌老大爷脏了，并主动给他家挑水，扫院子。今年夏季学农拉练，我们组织学生学习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同学们认识到，学农拉练是走毛主席指示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具体行动。大家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冲天干劲，很受感动，决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同学们夜里偷偷爬起来到场里和贫下中农一起夜战，下雨天不约而同地跑去抢场。看到学生这些进步，贫下中农很高兴。

学生们的这些变化，是思想感情的变化，是世界观的变化，这只有在开门办学的大熔炉里才能产生，关在教室里根本不会出现。

有人说，开门办学后，学生学到的知识少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什么是知识？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学习这些知识，读书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根本不接触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书本上的知识就很难学懂，即使死记硬背一些空洞的条条，也不知道如何应用，更不用说根据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原有的知识了。现成的书本知识，对于没有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来说，还是片面的。“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开门办学，正是使学生学到比较完全的知识的重要途径。我校学生通过学工学农，大多数都会插秧、间苗、施肥、割麦、脱粒、开车床、炼机油，在农村分校的学生还会养猪、养鸡、养羊、种菜、脱坯、盖房，难道这些不是知识吗？这些知识，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学校能学到吗？更重要的是，学生有了感性知识以后，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牢固地掌握书本上的理性知识，并把它变成自己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我校学生通过学军，实际参加了一些炮兵测量活动，此后再学习三角、几何等数学课，就不感到那么抽象难懂了。在此基础上，教师带领学生帮助当地社队对水渠改道工程进行实地测量，选出最合理的方案，绘制出工程规划图，计算出工程土方量及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日。贫下中农说：“这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这个例子说明，学生要学习那些真正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用的知识，并且做到学了会用，学校就必须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是不是不要文化课呢？不是。有的人把开门办学与社会主义文化课的学习对立起来，似乎要学文化课，就不能开门办学；要开门办学，就不是以学为主了，这恰恰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门办学，只要有明确的要求、制度和具体的措施，不仅不影响学习文化课，反而能够促进学科的教改，促使小课

堂教学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质量。关门办学时，师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即使书本上有一些联系实际的内容，教师在讲解时也很难讲得生动、具体，结果仍不免是教室里炼钢铁，黑板上种庄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五年级解析几何讲等速螺线，教师举苍绳爬唱片为例来讲轨迹方程，严重地脱离实践。现在，教师用车床上的三爪卡盘为例，引导学生思考卡盘上的三个爪为什么可以同时伸缩，以保证加工零件的中心始终位于卡盘中心线，学生在校办工厂和北京齿轮厂学工时都在车床上干过活，对这种情况很熟悉；教师在课堂拆开卡盘让同学看清内部构造，并且组织学生自己动手拆卸与安装，然后进行分析，用极坐标法写出这一曲线方程，再进一步利用等速螺线的性质，进行几种规格凸轮设计。这种教学，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小课堂的结合，理解与应用的结合，学生看得懂，记得牢，用得活。文科的教学，也注意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三年级语文课作文写商业战线上的新人新事，学生到地安门商场边劳动边调查，写出了内容丰富、语言生动的好文章。这和开门办学以前学生写的那些空洞无物的作文，恰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说明，开门办学不是不要文化课，而是使社会主义文化课上得更加生动活泼，理论和实际联系得更好。

由于实行开门办学，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显著提高，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这就有利于学生毕业后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组织学生学农，比较注意从思想上、文化上、身体上、生活上为将来扎根农村作准备。我们经常请社队干部、贫下中农、回乡和插队知识青年座谈，开展革命大批判，学生受到很大教育。七三届和七四届学生毕业时，绝大部分都能自觉地报名到远郊区延庆县插队落户。有一个学生，他的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当组织上准备留他在城里工作时，他说：哥哥、姐姐上山下乡代替不了我，我们青年人都应该走毛主席指引的路。他坚决到远郊区插了队。学生到农村后，绝大部分都表现出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能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同时，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本领也一届比一届强。一个担任养猪工作的学生，平时刻苦钻研，初步试制成功一种新饲料，既营养丰富，又节省粮食，受到社员的好评。经过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有些学生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学生担任了理论辅导员、拖拉机手、会计、电工等职务，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贫下中农说："这样的学生，来多少，我们要多少。"

新生事物总难免有缺点和不完善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也会走一些弯路。我们对开门办学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从现在的情况看，我校开门办学的步子还迈得不够大，在大、小课堂的结合上，也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这些不足之处，是前进中的问题，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目前，我们学校教育革命的形势很好。师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情很高。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断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不断总结经验，就可以使开门办学越办越好，就可以进一步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委员会

1975-12-26　人民日报

编者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成就，是很大的。这是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清华大学党委领导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同一切错误倾向作了坚决斗争得来的。这篇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也是对教育战线刮的右倾翻案风和那些奇谈怪论所作的明确有力的批判。

当前，我校广大师生员工正在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马列、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教育界攻击教育革命的种种奇谈怪论，进一步总结几年来教育革命的经验，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学校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一、深刻认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断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联系教育阵地的斗争实际，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学校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是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根本保证。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带领师生员工进行教育革命，经过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不断加强。由于大批工农兵学员入校、校内工人队伍成长、教师队伍在改造等，学校的阶级关系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壮大，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这一切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但是必须看到，在教育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还是十分尖锐的。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和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复辟之心不死，妄图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智育第一”、“知识私有”、“读书做官”、“上智下愚”等剥削阶级传统观念，还被某些人狂热鼓吹，并有广泛的市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从世界观来说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极少数人还会凭借他们在知识上的某种优势同无产阶级较量；一些被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统治的旧学科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文化，还可能通过某些渠道侵蚀人们的头脑等等。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占领与反占领、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那种认为“不读书”是“最大的危机”、“轻视理论是当前主要倾向”等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基本条件。资产阶级总是要采取这样那样的策略，向无产阶级进攻，争夺领导权。当前，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的怪论，实质上就是否定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要让那些“热心”搞修正主义的人来把持教育阵地。经过几年来的斗争，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工人阶级必须永远领导学校的重要性，增强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性。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几年来，我们始终抓紧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领导作用，坚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共同战斗，逐步建立和发展工人阶级的优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二、引导学员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毛主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现在，学生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的。他们大都是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从小受到党的教育，是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但是，多数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革命斗争经验也不多。因而，其中一些同志，抵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比较弱。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在他们身上有所反映。特别是上了大学以后，对于这个阵地上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和条件认识不足，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有“自来红”等错误思想，就可能被资产阶级俘虏，在工农兵学员中也有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不到这种危险，把学校当成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不抓阶级斗争，不抓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出修正主义。

要把学员培养成反修防修的战士，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他们。几年来，我们紧密结合国际国内重大政治斗争和党的中心任务，组织学员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现在，我校学员在学习政治理论课的同时，建立了九百多个业余马列学习小组。批林批孔以来，广大学员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注释法家著作、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科技发展史等等。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

要指示以来，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又有了新的进展，学员们提高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认识。

我们积极引导学员在反修防修的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广泛接触社会实际，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向工农兵学习，学会做群众工作，同工农兵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同时发动他们积极投入教育阵地的现实阶级斗争，投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的斗争，搞好“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工作，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逐步学会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开展经常性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广大学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在工农兵学员中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一些问题。我们引导学员反骄破满，斗私批修，大力开展多种多样的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用教育阵地争夺接班人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育学员，开展“解剖十七年旧学校”的活动；许多班级还建立了促进自身革命化的一些制度。通过这些活动，提高学员抗腐防修的能力。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广大学员转变思想，使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一提“上、管、改”的口号，就是什么“只有改造别人的义务，没有改造自己的义务”的论调，完全是恶意的歪曲和诬蔑。

三、抓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充分发挥原有教师的积极作用

毛主席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

是在教育阵地上实现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要任务，也是培养工农兵学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通过教育革命的实践，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校原有教师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少部分人，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在教育革命中能自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发挥了骨干作用。还有不少同志进步很大，正在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一员。广大教师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同工农兵结合，在教育革命中作出了贡献。学校教育革命成绩的取得，工农兵学员的成长，是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但是，还必须看到，现在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还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有些人在教育革命中还会有动摇和反复。其中有少数资产阶级世界观严重的人，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总是格格不入，千方百计地想走回头路，要通过他们来培养新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要做很多的工作。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要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争取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服务。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教师正在努力改变过去那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状况，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有些专业课教师不仅讲业务课，而且给学员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辅导学员的政治理论学习。不仅对一门课负责，而且对学员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负责。

广大教师正在努力改变过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状况，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践。许多人还用自己在旧学校的亲身经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

线，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出发，努力做转变学员思想的工作，敢于从严要求，帮助学员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广大教师和学员一起经常深入工厂、农村、部队，轮流到校办农场劳动，坚持走“五·七”道路，向工农兵学习，与工农兵交朋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不断增强对工农兵的感情。教师和学员逐步建立了新型师生关系。不少同志努力做普通劳动者，并且用自己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际的深刻教训，鼓励学员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广大教师在教育革命中努力工作，一批坚持变革、勇于创新的积极分子同工农兵学员一起，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改革教学，批判旧学科中的反动思想体系，把工农兵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和发明创造吸收到教学中来，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对那种所谓知识分子“无所适从”、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的谬论的有力回击。

应该看到，几年来教师队伍的进步是不平衡的。有的人进步不大，个别人甚至在倒退。我们要进一步抓紧广大教师的世界观改造，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继续严格要求他们，引导他们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当中去，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坚定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要帮助他们深入地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掌握唯物辩证法，克服工作中的摇摆性。要鼓励他们在教育革命中敢破敢立，敢于实践，敢于变革，不仅注意防止走老路，更要积极创造新的经验，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努力钻研业务，对技术精益求精，有所发明创造，为国家多做贡献。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他们为搞好教育革命敢于发表意见，敢于争论，敢于批评，以利于解放思想，分清是非，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促进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注意爱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使用安排，发挥他们的专长，让他们更多地在教育革命第一线发挥作用。

四、坚持开门办学，广大工农兵直接参加培养学员

毛主席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列宁也说过：“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开门办学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坚持“五·七”道路，彻底打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统治的一项根本变革。

几年来，广大师生到一百多个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办学，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办教育，努力做到师生与工农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开门办学中，广大工农兵参加了教育革命的领导和教学的主要环节，并对旧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作了深刻的批判，有的工人说：“旧大学一个专业要学三十几门课，不管有用没用，不学完就不让毕业，好比一个人进了百货公司，不把柜台里所有的东西买全了，就不让你出门一样。如果有的父母，在孩子生下来，就给他配上老花镜，说是反正将来有用，那谁都会说他蠢，旧教育就专门干这种蠢事。旧学校讲课什么都从开天辟地讲起，好比学纺织的非得从摇老太太的纺车学起不可，今天已经用纺织机械了，你摇得比老太太还高明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不能那样干了，我们的教学应该着重教基本的、急需的、近代的内容。”工人同志的批判，使师生深受教育，促进了教学改革。

开门办学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出去以后，也仍然有一个思想路线端正不端正的问题。几年来，我们注意引导师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与工农兵一起战斗，虚心学习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教育，并且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积极改造旧的教学体系。那种把下厂

单纯当作学点业务知识的手段，不与工农结合，不认真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中去锻炼思想的做法，那种形式上开了门，但是不积极进行教学改革，而把旧的一套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照搬下去，不认真组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的做法，都是决然搞不好开门办学的。教育界的怪论把开门办学诬蔑为“不学文化”、“只当劳动力”，实际上就是反对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也就是要把学校拉回到修正主义老路上去。

广大工农兵直接管理教育，教育真正成了整个社会的事业。有的班开门办学，从一个厂到另一个厂时，两个厂的工人互相交接班。工人同志对学员说：“我们不但要管你们来厂的一段，还要管你们的培养全过程，还要参加你们的毕业鉴定。”有的班从工厂回校后，工厂又专门派优秀的老工人来校，继续参加教育革命。在农村、部队开门办学，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战士也参加管教育。校办工厂的工人基本上都参加了培养学员的工作。校内外成千上万的工农兵直接参加教育革命，这就大大地加强了工人阶级改造学校的力量。

五、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促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原则。半工半读是实践这一重要原则的有力措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劳动也是绝对必要的，不然也会出修正主义。半工半读，对逐步消除旧学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现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教育革命中，我们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努力实现师生与工农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我们把半工半

读贯穿在培养学员的全过程，安排学员参加顶班劳动、典型任务的生产和施工、建校劳动等等。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办学，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在半工半读中，我们注意贯彻执行“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方针，对工和读都有明确的教学要求。选择工种尽可能结合专业，兼顾生产和教学的需要。参加辅助工种的劳动要轮换。顶班劳动要计工时，有定额。同时，作为一种培养要求，还要适当安排学员不脱产地参加生产管理工作。半工半读，把学员的培养同工人的提高和教师队伍的建设结合起来，使他们在各方面不断地有所进步。电子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学员，在校办工厂电子仪器车间半工半读，工人、学员、教师混合编班，实行统一领导，共同完成计算机的生产和培养学员的任务。学员在工人同志的言传身教下，进一步认识了劳动者必须在劳动中培养的道理。他们一面学习，一面顶班劳动，承担生产定额，紧密结合生产学习电工学、电子学等课程。经过短短半年多时间，他们就可以测试调整自己生产的计算机。“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工人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并参加教育革命的各项工作，有的正在迅速成长为工人教师。教师一面教学，一面也参加生产劳动，促进了思想改造和业务的提高。

为了适应半工半读和教育革命发展的需要，我们抓紧了对校办工厂和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几年来，我校完成的“130”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分步相机、数控铣床、高压钠蒸灯等二百多种新产品和科研项目，都是充分发挥校内基地作用、校内外基地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成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朝着“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的方向前进。

六、结合生产、科研任务进行教学，在斗争中增长才干

几年来，我们在教育革命中，把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从实践中学习，完成了近千项生产任务、专题研究和较大的技术革新。学员们豪迈地说："打硬仗，做贡献，斗争中长才干。"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是有斗争的。有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实用主义"、"瞎折腾"，否定结合生产和科研任务进行教学这一新事物。我们在结合典型任务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培养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下建筑专业接受了设计"地下水封油库"的设计研究任务。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激发了师生的革命志气。他们攀山越岭，调查研究，取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运用新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分析，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较快地完成了设计，现在即将投产。这样，他们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学习了贯彻执行"鞍钢宪法"，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精神。

在选择典型任务时，我们努力遵循以下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我国当前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的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有力地推动了专业设置和专业方向的改造。我校原有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沿袭苏修的，几年来虽然作了一些改革，但还不能很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适应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适应"要准备打仗"的需要，必须积极、慎重地加以改造。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老三段"旧体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组织教学。学员从一年级开始就接触专业，学会操作技能，能够顶班劳动，边劳动边学理论，不设单纯的集中的文化补习阶段。然后参加典型任务实践的全过程，既搞设计，又参加制造、施工，掌握本专业的

基本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结合科研、技术革新的专题，在理论上学习总结提高，进一步锻炼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边干边学，是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主要环节。“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要积极引导学员善于向实践学习，并抓住时机，及时搞好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学员接触典型任务前，应该安排必要的教学准备，使他们在边干边学中掌握主动权。任务完成以后，必须认真进行总结提高。对于典型任务没有带上的部分教学内容，通过现场教学、实验教学等其它联系实际的形式，让学员学到手。有的班组织师生大搞群众运动，进行总结提高，进一步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不仅有教师讲课，还出现了学员编教材、上讲台、办学报、专题研究等生动活泼的形式。

在教学过程中，要安排一定的检查、考核或考试，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考试改革的一系列指示。

要重视基础课的教学改革工作，积极开展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改造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育界的怪论诬蔑我们“轻视理论”，搞“实践——实践——实践”，那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七、办农村分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理工科大学不仅要面向工业，还要积极为农业服务，为建设大寨县做贡献。

今年春天，我们学习朝阳农学院的教育革命经验，在北京郊区办了农村分校。设有农机、农电、农水、农建等专业，招收了四百九十五名学员，实行社来社去。

农村分校创办以来，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发扬抗大精神，艰苦奋斗，自己动手建基地，盖住房。田野里，大树下，处处是课堂。分校师生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开展对小生产、按劳分配等专题的研究，以及评论《水浒》等。

学员在回队实践中，积极向群众作辅导和宣讲，涌现出大批积极参加农村阶级斗争，自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勇于同传统观念决裂的新人新事。

分校师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指示，以农业“四化”的急需为教学内容，边干边学，亦工亦农，有上有下，学习科学种田，为实现农村“四化”、发展农村的“五小”工业服务，加强了学校与农村的紧密联系。农机专业半年内在几个办学点上装配了二百五十台水泵和六台油压泵，参加联合收割机、割晒机的制造和拖拉机的检修，学习农业机械的基本原理，研究农机具的改革。学员在校学习，时刻想着社队需要，社队遇到困难常找学校协助。农电专业有个学员所在生产队的水塔水位控制问题长期没有很好解决，影响了生产。教学组便把原定八个月以后才学的“自动控制”课提前上，师生一起做了水塔水位自动控制装置，那个学员背着它回队安装，一次成功。附近的贫下中农纷纷赶来观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贫农，拉着学员的手说：“咱们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就使上了。这样办学对头。”那些攻击朝阳农学院经验的人，还是听听广大贫下中农的声音和要求吧！

八、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

我们一方面办好普通班、进修班，同时积极参加厂办“七·二一”大学和农村“五·七”教育网的工作，大力发展短训班、业余大学等，坚持两条腿走路，采取多种形式为工农兵服务。

几年来，我校许多专业，在师资、教材、制订教学计划等方面配合工厂办学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建工系就同七个单位的“七·二一”大学建立了长期挂钩关系，在协助办学中学到了不少宝贵经验，促进了学校的教育革命。

为适应工农兵需要，我们办了业余大学，吸收学校附近的工人、贫下中农和校内工人参加学习，现在已发展到一千七百多名学员。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小工

厂和农村，带着生产中的问题来学习，积极性很高。例如铸工班每个学员都从本厂带一口袋型砂来上课，有的还带着本厂的铸件到课堂，教师和学员一起分析型砂质量，研究提高铸件质量的措施。有一个厂的学员运用学到的理论回厂和工人一起搞革新，使铸件的废品率降低了三分之二。

几年来，广大师生打破了“短训班不正规”的偏见，在工厂、农村、部队和校内举办各种短训班。有脱产的，也有业余的；有普及性的，也有专题提高的；有学习政治理论的，有学习科学技术的；校办工厂结合产品办用户短训班。根据国家急需，学校还及时举办了抗地震短训班、推广数控技术短训班、农田水利短训班等等。工人同志高兴地说，短训班是“马列主义的宣传站，技术革新的交流站，厂校挂钩的联络站”。

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函授教育，举办各种科技讲座，并在校办工厂举办“七·二一”工人大学。

多种形式办学，是教育制度的变革，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有利于打破资产阶级对科学技术的垄断，有利于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学校向社会学习，按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学校。这是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重要途径。

九、受教育者也办教育，在办教育中受教育

学生参加办学，这是近几年来开门办学中涌现出的一个新生事物。在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推动下，广大教师和工农兵学员提出：“受教育者也要参加办教育”，积极参加了校内外多种办学形式的教学工作。今年仅工业自动化系学员就参加了十六个短训班的工作，参加这些短训班学习的工人达一千一百人。

学员参加办学的过程，也是与工农兵结合，向工农兵学习的过程。水利系三年级九名学员和一名教师到河南陕县地区办函授班，向二百多人进行教学，他们定期地背着行李到各社队巡回辅导，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把当地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先进事例集中起来，作为教学内容，既教育了自己，又宣传了群众。各社队提出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是学员没有学过的。他们在教师和函授班贫下中农兼职教师的帮助下，边学边教，总结当地的实践经验，编出了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有地方性的函授教材，深受群众欢迎。

学员参加办学，使普通班和短训班相互促进，推动教学改革深入发展。自动化系六名学员，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参加“热工自动化仪表短训班”的教学工作，同时又给本班学员讲同样内容的课，他们在短训班的教学实践中和工人、教师一起大胆改革，把电子学和电动单元仪表结合起来讲，效果很好。在短训班的促进下，使普通班这部分内容的学时也比过去少用了一半，教学质量比过去有所提高。

受教育者参加办教育，把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同广大劳动人民的知识化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有力地批判了“技术垄断”、“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作出了努力。我们已经把它正式列入教学计划，作为对学员的一项重要的培养要求。

十、努力建设一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高、紧密联系群众、团结战斗、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干部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我校大多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比较有力的领导班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紧

密结合学校斗争的实际，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心研究教育阵地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如果在理论上糊涂无知，就会在政治路线上左右摇摆，丧失对修正主义的战斗力。要在教育阵地上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干部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战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决不能做什么“温和派”、“老好人”。

建设各级领导班子，要注意修正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警惕党内出现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要勇于同修正主义路线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在斗争中促使领导班子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坚强；在斗争中对广大干部、党员进行生动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要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我党在五十多年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党内要进一步树立好风气，党员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要遵守党的纪律。

必须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加强组织建设。几年来，我们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增加干部队伍中的工人成分，充分调动广大原有干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力提拔青年干部和妇女干部，搞好老、中、青三结合。斗争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在建设各级领导班子中，尤其要选好“班长”，把那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密切联系群众的同志，大胆地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上级党组织要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指导他们。这样，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朝气蓬勃。

我们还遵照毛主席“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的教导，努力使机关立足于基层，为基层服务，当好党委参谋，不断改革机关工作。

当前教育战线上形势一片大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反复激烈的斗争，锻炼了我们的队伍，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摆在我们面前的重

要任务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教育革命搞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伟大成果。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在毛主席指引的正确轨道上，乘胜前进。

工农兵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

1975-12-29　人民日报

沈阳机电学院党委以阶级斗争为纲，用两张大字报作活教材，引导师生开展大辩论，明确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不是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有力地回击了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推动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新华社沈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电　沈阳机电学院党委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联系教育战线斗争实际，以两张大字报作为活教材，在全校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批判，对广大师生和干部进行了一场生动活泼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一步推动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目前，这个学院的师生在讨论两张大字报的基础上，又积极地投入了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的斗争。

今年初，在学习和推广朝阳农学院的教育革命经验时，这个学院自动化专业三班有七名学员，在二月二十四日贴出了一张题为《我们绝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的大字报，认为“工农兵学员入学前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一员”，入学后“经过三年的社会主义文化课的学习，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回到生产岗位后，“贡献必须要比普通工人大”，决不可以和工人“划等号”。二月二十六日，铸造专业二班的十二名学员贴出了一张针锋相对的大字报，题目是《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尖锐地指出，前一张大字报所反映的是一种错误的有害的思潮。他们说，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就是要培养“普通劳动者”，决不培养“高级”劳动者、“不平凡”的劳动者，决不培养那种不同“普通工人划等号”的劳动者。他们要求院党委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动群众，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这两张大字报在院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院党委和驻院工宣队认为，《我们绝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张大字报的观点，涉及到教育革命中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它反映出来的“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错误思想，是当前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为了弄清路线是非，推动教育革命进一步发展，院党委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开展了学习、讨论和批判。他们组织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学校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历史教训，并且以社会主义大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还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工农兵学员在大学学几年以后，还要不要回到工农中去；在学校如何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为题，展开学习和讨论。院党委书记张国栋在辩论中，带头学习革命理论，带头开展革命大批判。他在一次辩论中深有体会地说：“文化大革命前，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没有弄懂，对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和任务没有搞明白，没有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错误地认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培养所谓‘红色工程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大搞‘智育第一’。结果，有些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农村和工厂’，学的东西‘书本一大套，实际难对号’。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再也不能只讲专业，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了。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坚决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铸造专业二班工农兵学员徐劲军，在辩论中为了回答第一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学习了几十篇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联系教育战线斗争实际，和同学一起写出了《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坚决和工人划等号，决不做精神贵族》等二十多篇有理论、有事实、有分析、有批判、针对性很强的大字报和文章，狠狠揭发和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许多师生在讨论中指出，在阶级社

会里，学校从来都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社会主义大学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通过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服务。如果从工农中招收的学员毕业后不愿做普通劳动者，不能当工人、农民，那就是在扩大三大差别，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就会倒退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大学。

通过九个月的学习和辩论，沈阳机电学院广大师生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教育革命的步伐更快了。他们进一步明确了“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决心毕业后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原来有些学员认为，“进了大学门，就是国家人”，考虑毕业后留城市，进工厂，当技术员；现在，他们决心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应届毕业的三百四十二名工农兵学员，已有二百六十名主动申请到农村当农民，到五小企业当工人，还有的申请到边疆去。原来有些干部认为，工农兵学员思想基础好，三年两年变不了，一度忽视对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现在认识到，学校是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重要阵地，即使是工农兵学员也必须把转变思想放在首位，因此提高了做好学员政治思想工作的自觉性。原来有些教师认为，教好课是自己的本份，学员的思想如何与自己无关；现在认识到，学员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错误思想，有不少就是受教师的影响而产生的，从而看到了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深入人心，广大师生更加坚定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今年以来，全校师生先后到四十四个工厂开门办学，同一百一十多个工厂建立了联系。他们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学到了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作风，又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先后完成二十七个科研项目和一百零二个技术革新项目，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通过这场辩论，广大工农兵学员、教师和干部分辨路线是非的能力增强了，进一步提高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前一个时期，当教育界的种

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传到这个学院时，许多工农兵学员、教师和干部就能很快地识别，自觉地抵制。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要害搞批判，有力地回击了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铸造专业二班写《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大字报的十二名工农兵学员，经过学习和辩论，现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更高了，对错误路线、错误倾向敢顶、敢斗、敢批。在当前批判否定教育革命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联系斗争实际，相继写出了一批有份量的大字报和批判文章，用实际行动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校师生员工决心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

中国共产党朝阳农学院委员会

1976-01-01　红旗

内容提要：本文旗帜鲜明地回答和驳斥了教育界中攻击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的一些奇谈怪论，具体分析了这些论点的阶级实质。这是在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中产生的文章，可以同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放在一起读。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洪流，正奔腾向前。但是，在一派大好形势下，斗争仍然很激烈。教育界有人发出种种奇谈怪论，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想用这股歪风刮掉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对于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也进行了种种攻击和非难。他们的矛头决不是对着我们一个学校的具体工作。究竟我们走的基本道路对不对？究竟他们那些论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办大学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我们朝阳农学院坚持在农村办学已经六年。六年来，我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教育革命的论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逐步加深了对毛主席教育路线的理解。我们认识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在实践中提出：“社会主义农业大学，首先必须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我们的意思很

清楚，就是说：在学校里，政治同业务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农业大学首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政治统帅业务。这本来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指示精神的。然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农业大学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理由呢？据说是这里没有提业务，“讲一面总是不成”。请不要偷换概念。我们讲的是统帅，是究竟什么占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政治、业务“两面都讲”，把它们都当作统帅，那岂不就取消了统帅？说穿了，那些奇谈怪论制造者的目的正是如此。他们采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衷主义手法，来贩卖“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教育战线经过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之后，在这块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是消失了呢？没有！资产阶级要用教育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无产阶级则要用教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学校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然要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任何专业学校，如果想办什么“纯业务大学”，不坚持政治挂帅，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势必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硬说当前是“政治冲击业务”，不学知识，轻视理论，“是主要倾向”。照他们的说法，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而是知识多与少的矛盾；当前的主要危险不再是修正主义了，而是忽视业务。这不是对党的基本路线明目张胆的篡改吗？

早在一九二一年，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修正主义错误时就尖锐地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毛主席也反复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

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列宁和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我们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政治工作与其他一切工作的关系的指针。技术工作、业务工作，只能为政治服务，学校的专业只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教育界发出奇谈怪论的那些人，一听见把专业学校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学校的说法，就跳起来反对，这说明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他们的奇谈怪论，实际上是与新老修正主义者刘少奇、林彪、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一脉相承的。

教育界发出奇谈怪论的那些人，那么起劲地反对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为了关心我们的专业，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在批判那种所谓“学校可以脱离政治”的谎言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正是这样。我们朝阳农学院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把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作为师生的必读课，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使学生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而且也学到了农业科学技术。无数事实说明，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不但不会妨碍学习业务和技术，反而能够促进它们的提高和发展。如果按照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去做，不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习业务、学习技术，那岂不是又回到旧沈阳农学院的老路上去了？可见，他们的目的，决不是什么关心专业、发展科学，而是要重新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这条复辟倒退的路线，是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坚决不能接受的！

农业大学必须实行“社来社去”

农业大学要满足广大农村对于农业技术人材的迫切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就必须坚持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实行“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当农民，拿工分，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然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是“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超越阶段，步子迈得太快了。这不是和当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唱的同一个调子吗？

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把它叫做旧社会的“痕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一个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洗刷旧社会的“痕迹”，促使共产主义因素逐步增长，迫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只有这样，才能早日迎来共产主义的灿烂明天。我们的教育要为此而斗争，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逐步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实行“社来社去”，反了几千年来“读书做官”的旧传统，正是向资产阶级法权勇敢挑战，正是实现巴黎公社“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的原则，正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坚持继续革命的一个具体步骤。这本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做的事，根本不是什么“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的事。我们和奇谈怪论者的分歧在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向着明天的共产主义前进，而他们则身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却心想过去的资本主义，这就难怪他们总是埋怨革命的车轮太快，总是把任何进步都看作是超越阶段了。

对于我们学校实行“社来社去”，贫下中农有句评语：“这样培养的人，我们养得起，用得上”。可见，农业大学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目前农村占主体的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行的是工分制，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工农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分制，那时还当什么农民、挣什么工分？“社来社去”当农民、拿工分，怎么叫做“共产主义”呢？真是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是以关心“学习质量”著称的，然而看起来他们自己的“学习质量”就不那么高，你看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竟是这样的一窍不通！

奇谈怪论者一面说“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一面又说：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显然，他们这里津津乐道的“干部”和“技术员”，是那种绝对不能当工人农民的人，不然的话，培养这些人的那种“大学”不是也“就取消了”吗？可见他们所要培养的“干部”和“技术员”，绝不是我们那些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广大干部，也不是与工农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与“十七年”旧大学鼓吹的“红色农学家”、“园艺师”、“高级建设人材”一样，都不过是高踞于工农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而已。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那种主张上了大学就一定要比工农高一等的奇谈怪论，完全颠倒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一条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照奇谈怪论制造者们的逻辑，培养工人农民用不着上大学，上了大学就不能再当工人农民，就不能同工人农民划等号了，这不就是说，应当永远保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应当永远由少数的特权者垄断文化科学吗？这种情况，只要看看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就行了。苏修头目毫不掩饰地说，他们的“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在那里，只要一跨进大学的门

槛，就等于爬上了进入特权阶层的阶梯，也即取得了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特权。请问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你们那样起劲地反对大学生当工人、农民，是不是打算步苏修的后尘呢？

农业大学必须办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之中

教育界发表奇谈怪论的人，叫嚷得最厉害的是所谓“质量”问题。他们攻击现在的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的中技高”，“五年要普及大寨县，都象朝农水平能行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妄谈“质量”，实际上是要肯定“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老路，否定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办学道路。

什么是大学水平？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回答。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学，讲质量，看水平，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看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无产阶级衡量教育质量和水平的唯一标准。几年来，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广大师生，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办学方向上，实行“社来社去”；在教学体制上，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几上几下”，使学校初步形成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学校办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根子扎在广大群众之中。“几上几下”，使大课堂和小课堂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学生转变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又有利于他们掌握农业科学知识。正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朝气蓬勃。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称赞他们是“一批实干顶用的庄稼汉”，“领导班子的好参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难道这样的学生不能为农业学大寨服务，倒是过去那种学农不爱农、

不务农、不会农，毕业时还翘尾巴、不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学生，更能为“普及大寨县”做出贡献吗？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还指责我们这样办学只能普及，不能提高。他们说，还是让一些“有条件”的学校去提高吧！事实上，我们把学校分散办在农村，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不仅有利于普及，也完全能够提高。恩格斯早就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毛主席也指出，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源泉。只有与生产密切结合，科学研究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几年来，我们结合教学，进行了大量的科学普及工作，同时在研究工作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已有二十项科研成果用于生产。师生培育的朝谷四号、朝谷六号、高粱 1095 等新品种已开始推广。在象鼻虫的研究上，师生们通过实践，发现朝阳地区危害最重的不是过去书本上记载的两种，而是另外一个新种，叫棉尖象?。经过反复观察、研究，初步摸清了它的生活规律，找到了防治的方法。同时他们还弄清了蒙古灰象?不是一年一代，成虫越冬，而是两年一代，成虫与幼虫两种形态越冬，纠正了过去书本上的错误结论。辽宁省有关研究部门在其他几个省市的调查，也完全证实了这个问题。我院农学系棉花课题组的师生，在实践中看到棉花整枝打杈费工太多，决心培育一种没有枝杈的棉花。经过几年来与贫下中农一起搞科学实验，从零式果枝的棉花里，系统选育成功一个新品种。这种棉花抱着主茎开花，没有枝杈，成熟较早，伏前桃多，适于密植和机械耕作，现在正在繁种。大量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奇谈怪论制造者的谬论。毛主席指出的办学道路，就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研水平最重要的条件。此外还要找什么“条件”呢？难道那种关起门来死读书的“条件”能够造就又红又专的人材、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吗？不管制造什么借口，妄图使学校重新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脱节，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教育界出现的各种奇谈怪论，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在这革命的进程中，总有那么少数人要跳出来反对新生事物，拼命维护旧事物。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在嚣张一时的‘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精神以及诸如此类等等”。现在又有人出来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十七年，哭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哭修正主义的一整套教育制度。但是，历史的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朵朵新花竞相开放，更加鲜艳。让那些形形色色的“哭丧妇”去哭泣吧，去悲鸣吧，胜利永远属于我们战斗的无产阶级！

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吗？

复旦大学大批判组

1976-01-01　红旗

在最近教育战线出现的右倾翻案风的种种奇谈怪论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即所谓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这个论点有一定的欺骗性，似乎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是在那里关心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关心我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其实不然。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教育革命同“四个现代化”对立起来，妄图以此否定教育革命，并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阻碍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首先，对现代化强国必须作阶级分析。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也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后者如社会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它们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垄断资产阶级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能走这条道路吗？不能。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教育界出现的奇谈怪论，对“四个现代化”说不绝口，却根本不谈要的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根本不谈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讲现代化，那结果只能是搞资本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现代化。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一批批工农青年经过没有彻底改造的旧大学的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最后许多人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现在苏联也确实有钢铁、机器、导弹，但就在这个号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不仅丢掉了列宁主义路线，而且在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畸形发展，粮食年年歉收，劳动人民吃

不饱肚子。这种“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不应当忘记。

所谓教育和“四个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对促进还是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这决定于我们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建国以后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十七年中，教育不能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相反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及其后果，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着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这种状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得到了改变。最近几年来，尽管从根本上改造旧学校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但它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方面，已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光辉的前途。

建国以来的实践表明：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根本不是现在的教育革命，而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校物理系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对比，就是回答谁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一个有力例证。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我校物理系办起了一个半导体工厂，试制成了上海第一只半导体三极管。但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有些人认为理科办工厂是“野牛闯进庙堂”，硬是把它一刀砍掉了。这个系有个研究半导体的教授，整天关在实验室里根据国外半导体材料的数据研究砷化镓的能谱，对中国自己不能制造砷化镓这件事却感到束手无策。当时，有些学半导体的毕业生，连最普通的晶体管都不会做。在文化大革命中，物理系打破了从书本到书本的框框，办起了“四·一”综合电子仪器工厂，建成了从材料、元件到整机的生产流水线。这个厂在原材料上，由生产一般的单晶硅、砷化镓，发展到生产新型发光材料，在元件上，由单门集成逻辑电路，发展到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并生产了各种型号的线性电路，形成了线性电路系列，有八种电路填补了国内空白，直接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类似这样的工厂，我校已经办了三个。理科各系实行开门办学，同一百三十多个工厂、研究单位、人民

公社挂了钩，把教学同生产、科研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几年来，我们先后承担了电子技术、激光、新型电光源、石油催化等尖端项目的课题，其中有上天的，有入海的，有为实现生产线自动化提供的数学模型，有在大型合成化学纤维工程中不可缺少的新型催化剂，有在医疗上具有重要用途的小型精密仪器仪表，还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识别、存储装置。一九六九年以后招收的两届理科毕业生所进行的毕业实践项目，有一大批是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军事工业服务的，其中有七十八项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这说明，正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教育革命，改造了旧学校，才使教育为促进“四个现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诬蔑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根据”之一，是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说什么现在的大学是“不要理论”。这完全是在造谣惑众，危言耸听。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当然要不断发展科学理论。但这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旧大学的理科，关门空论，“实际不沾边，牛皮吹上天”。文化大革命前的我校数学系，走的就是“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的关门研究道路，论文写了几百篇，却根本不能说明和解决生产实践中提出的任何问题。这种理论能够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吗？根本不能。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实践是产生理论的源泉，也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正是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数学从书斋和课堂里解放了出来，成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科学。数学系的师生在教育革命的实践中，协同实际工作部门对某地区四百多个点的地质资料进行了计算和分析，不仅为石油勘探提供了准确选择井位的新方法，而且从石油测井的物理模型中抽象出等位面边界条件这种新的边界理论，反过来又将对勘探测量工作的实践发生指导作用。又如我校的电光源实验室，正是通过一系列造灯和

试灯的实践，探讨惰性气体和金属蒸气放电规律，从而推动了化学动力学、光谱学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这种来自实践的理论，在回到实践发生作用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和提高。我校正是在开门办学的推动下，不仅开展了大量与生产实践直接相关的理论研究，而且还开展了基本粒子、天体物理、泛函分析、规范场、微分方程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试问：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究竟是发展了理论还是“不要理论”？究竟是“实践——理论——实践”还是“实践——实践——实践”？只要不是被资产阶级偏见弄昏了头脑的人，是一目了然的。而那种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妄图再走旧大学关门空论的回头路的人，才真正是蓄意要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腿！

诬蔑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人，给理科开门办学加上了削弱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罪名。这同样是荒谬的。理科和工科各有其学科的特点，但就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点来说，理工科应当是共同的。旧大学理科片面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关门又加锁，完全脱离了生产实践。文化大革命前，我校化学系学生学习物理化学这门课，“越学越糊涂，越学越头痛”。现在通过开门办学，师生结合工厂改革甲醛的催化剂开展教学活动，不仅研制出一种具有国际水平的新的催化剂，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甲醇和银，而且使学员较好地掌握了有关专业知识。师生共同努力，还对这门基础理论课的教材进行了改革，编出了两册具有一定水平的新的物理化学教材。不仅理科教学方法和教材的改革离不开实践，理科专业设置的改造和建设，也只有广泛接触了社会实际以后，才能真正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前的理科专业设置，有不少脱离了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学生毕业以后往往是“学的用不上，要用的没有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学校结合社会需要创立了光学、计算机科学两个新系，以及讯息论、半导体材料、电光源、激光等十四个新专业。这些新设置的系科专业，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都说明理科开始同实践结合起来了。这又有什么

不好呢？经过教育革命，理科不再走过去那种为理论而理论的老路，开始考虑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改造理科，怎么反而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呢？恩格斯说过：“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自然辩证法》）这阐明了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理科，背离了在实践基础上发展理论的道路，结果是死水一潭；现在注重在实践基础上向理论方面发展，开始做到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这一点，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人们必将看得更加清楚。教育界有的人断言，理科同生产实践相结合，会使“四个现代化问题解决不了”，还叫嚷“十年八年以后”见分晓。其实，用不着这么神气，你们是输定了的。

在“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对教育革命做否定文章的人，诬蔑现在大学的教育质量“不如过去中技高”，妄图重新贩卖“智育第一”这套黑货。在他们看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学校只要培养有文化的人就行了，不管他有社会主义觉悟还是有资产阶级思想，也不管他成为劳动者还是精神贵族。我们则相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千百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绝不能搞什么“智育第一”即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必须按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生，使他们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毕业以后决心同工人、农民一起做普通劳动者。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要特别警惕有的人企图利用人民要把国民经济更快地搞上去的迫切心情，重新搬出“智育第一”来对抗党的教育方针，篡改教育革命方向。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广大群众，调动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搞。现在培养的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扎根工农，有利于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战斗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去依靠少数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

去依靠书呆子，那是根本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凡是搞修正主义，都要鼓吹“智育第一”，都要鼓吹“唯生产力论”，都要鼓吹“技术挂帅”。我们只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分析这些论点，就可以揭破其欺骗性，显示出它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本质。

当前教育战线的这一场大辩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场大辩论不仅关系到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沿着什么道路前进的问题，关系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过程中能不能始终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们坚信，经过这一场摆事实、讲道理的大辩论，一定能使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同志弄清思想，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团结起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喜看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

北京大学　段学复　黄昆

1976-01-01　红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决心为教育革命作出贡献的年老教师，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和工农兵学员一起，积极参加教育革命实践，亲眼看到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看到北京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工农兵学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迅速、茁壮地成长，感到由衷的喜悦。自己能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觉得无比的幸福。

可是，在这大好形势下，教育界却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出现了种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诬蔑现在学校"不讲学文化"、"轻视理论"。这种谬论的实质，就是妄图从工农兵学员的质量问题上打开缺口，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复辟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因此，怎样看待工农兵学员的质量问题，是一场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之争，不可不辩论清楚。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们对于旧中国的反动教育的罪恶，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危害，都有深切的感受；对于这几年的教育革命，更有亲切的体会。面对着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的奇谈怪论，我们要用切身经历的事实，给予驳斥。

如何看待教育质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标准鲜明对立，评价天渊有别。列宁说："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讲质量，首先要讲政治质量，看方向，看路线，看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的学生，应当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反修防修的战士，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北大，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

下，学校里充斥着“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等一套封、资、修的货色。学生一入学，见到的第一条大标语就是：“欢迎你，未来的数学家！”“欢迎你，未来的物理学家！”给学生指出的是一条“助教——讲师——教授”的道路。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许多青年学生根本不关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拼命去爬那个精神贵族的“小宝塔”尖，把成名成家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毕业分配时，不少人留恋大城市，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学生中有少数人，甚至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代数专门组五四级七个学生中出了三个右派。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专门组一九五六年毕业生十人中也有三人成了右派。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教育阵地开刀，极其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自从工人阶级开进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教育革命以来，我们学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今天的新北大，学员一入学，迎接他们的第一条大标语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经过几年的学习，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们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在政治运动中，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发挥了生力军作用。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勇气和力量，鼓舞我们积极参加现实的斗争。他们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大破因循守旧，坚持革新创新，常常给我们以促进。他们豪迈地提出：“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不少学员要求毕业以后重返农村，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他们来自工农，不忘工农，学习工农，永当工农。这些都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深深感到：工农兵学员的

这种政治觉悟、思想境界，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旧大学的学生无法与之相比的。

如何衡量业务质量，也要从路线上看，而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要看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业务质量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问题，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政治方向问题。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旧北大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公开提倡成名成家。在这种思想腐蚀下，学生被个人的蝇头小利、蜗角虚名限制了自己的眼界，束缚了自己的胸怀。作毕业论文时，往往争导师，争题目，争发表，甚至连点滴的心得也互相保密。这样的指导思想，决定了他们只能从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屁股转。而我们今天的工农兵学员，则总是把自己的学习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他们首先注意科学技术中的方向、路线问题，总是把技术攻关仗当作政治仗、争气仗来打，一心为打破帝修反的科技垄断，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贡献。电子仪器厂半导体物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最后一年多的教学是结合研制一种超高速集成电路进行的。这种超高速集成电路是我国研制大型高速电子计算机急需的产品。在开始选择这项战斗任务时，由于难度较大，不少教师的思想上曾有过动摇。但是，工农兵学员听说帝国主义为了卡我们的脖子，在谈判向我国出售大型电子计算机时，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十分气愤。他们说，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挑战，任务再艰巨，我们也要上，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项战斗任务。在技术攻关战斗中，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口气”，经常连续奋战几十个小时不下火线。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终于拿出了样品，现已小批量生产。这说明，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得工农兵学员在业务学习上能够很快提高，取得丰硕的成果。

旧北大根本不讲理论联系实际，不讲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那时的理科，学制长达六年，课程三十多门，将学生整天关在高楼深院里死读书，严重“三脱离”。

那样名目繁多的课程，正是象列宁批评的那样，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东西。学生念了这么多无用的本本之后，不但没有给他们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本领，相反却在他们思想上打下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烙印。即使一些有用的知识，学生也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衡量，完全是颠倒着学的，学了也不会用。这样关门读死书，使许多学生不会做工、种田、打仗，越读越蠢，成为书呆子、修苗子。数学系学生学了数学，有的竟问：“党的领导为什么是必要的，请用数学公式证明给我看看”。学生毕业到了工作岗位以后，不少人不能把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人群众说他们是“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这一切，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实行开门办学、结合战斗任务和典型产品组织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遵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使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认识上的两个飞跃，因而他们学到的知识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几年来，数学系师生先后到北京和外地的厂矿、农村、科研机关等几百个单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结合战斗任务和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和几十个单位挂钩，承担了五十六个科研项目，九十六个课题。其中有十三项填补了国家空白，二十四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三十七项被工农业生产采用。在应用数学和计算方法方面，有四项属于七十年代国际上刚刚开始的工作。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五项取得重要进展，有的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任务，涉及农业、工业、地质、水文、石油化工、数字通讯、精密仪器、高能物理等方面。学员在内容这样广泛的实践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提高。数学专业三年级学员和教师，在完成某精密仪器的有关计算时，想工农兵之所想，急社会主义之所急，打破洋框框，大胆革新，对电路设计提出了新方案，使仪器精度达到国际水平。一年级概率班一个学员，学习试验设计课程时，主动利用业余时间回到原单位和工人师傅一起，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研制一项电子元件新产品科学试验，使生产工序时间比原来大大缩短

了，质量也有了提高。去年九月，他还出席了全国概率统计工作会议，报告了自己试验和研究成果，受到与会者的好评。电子仪器厂半导体物理专业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三十五个项目，也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有的填补了国家空白，有的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基本上已用到生产、科研上。

工农兵学员基础理论知识学得怎么样？在这个问题上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指责我们“轻视理论”，“根本不要基础科学”。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胡说八道。我们两人中，黄昆是搞半导体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曾和另一位同志一起编写了一本《半导体物理》。当时，我国新兴的半导体工业还没有办起来，书的每章每节都是根据外国资料写成的。就是这么一本教材，一直用到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我国半导体工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这本根据外国资料编写的教材却一直没有修改过。学生学了这些落后于实际的理论，不仅用处不大，反而不知不觉地受了洋框框的束缚。而在近几年的教育革命实践中，师生一起改革旧教材，在教学、科研、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学习，编写出适合生产和科研需要的八种新教材，包括老黄和同志们一起重写的《半导体物理》。这些教材密切结合我国半导体发展的实际，总结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实践经验，并在理论上作了分析探讨，教材内容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实践性，受到学员和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的好评。试问：用这样的教材来教学生，究竟是学了理论，还是不要理论呢？理论教学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这个小小的事例，难道不足以说明那种诬蔑我们“轻视理论”、“根本不要基础科学”的攻击是多么荒唐，那种“今不如昔”的质量观是多么站不住脚吗？

去年九月，一个外国固体物理考察组来北大参观访问，黄昆参加了接待。在参观访问中，物理系四名二、三年级的工农兵学员分别向他们作了有关半导体激光、低温物理和磁学方面的学术报告。报告后，外宾接连提出许多问题，对研究内容、工作进程盘根问底，这实际上是对学员的一场口试。我们的学员当场一一

作答。外宾们反映“分析很透，数学与物理问题结合得很紧密”，承认“这种培养方式效果很好”，培养的学生是“高质量”的。

事实胜于雄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实践，才短短几年，就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它的无限生命力，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是政治质量还是业务质量，都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些都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革了旧的教育制度，改革了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坚持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生，实行了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的结果。

几年来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我们和工农兵学员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同学们常常和我们促膝谈心，满腔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我们，有力地推动了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文化大革命前，段学复搞科研的“最后推动力”，是想在数学史上留名，希望能在海外找到“知音”。作为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却把科研的根子扎在外国，脱离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还以为“海外存知音”。参加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工农兵学员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给了老段很大鼓舞，认识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由于提高了思想觉悟，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老段虽然眼睛高度近视，又患有老年白内障，还动过直肠癌手术，但经常到工厂向工人学习，调查研究，积极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其他师生一起解决了有关部门提出的一项比较复杂的计算课题，计算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一千四百多倍。我们深刻认识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才是科学技术的源泉，工农兵群众才是真正的知音。今天，我们看到大学里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仿佛觉得自己变年轻了。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什么路线培养什么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仇恨，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热爱。我们坚信，教育革命的路

线是正确的，方向是对头的，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迎接我们的将是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评彩色故事影片《决裂》

初澜

1976-01-07　人民日报

正当一场事关路线、事关方向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开展的时候，彩色故事影片《决裂》上映了。它通过创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初期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塑造了龙国正这一在教育革命中敢开顶风船、敢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旗帜鲜明、非常适时地参加到教育战线这场大是大非的辩论中来，有力地批驳了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回击了那股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右倾翻案风，起到了鼓舞人心的战斗作用。

正象影片中龙国正说的那样："在教育革命的征途上，是不会风平浪静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反复较量，总是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尖锐地表现出来：实行怎样的招生制度；是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如何看待教育质量；是"智育第一"，还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等。所有这些斗争的实质，都是一个把学校办成为哪个阶级的专政工具，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影片《决裂》的矛盾冲突，龙国正和曹仲和之间几个斗争的回合，也正是这样展开的，这就使得它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种普遍的教育意义和现实的论战性。它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表明：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劈波斩浪，激流勇进，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旧教育制度宣战，同反映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的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学校的大门为谁而开？这是办学的阶级路线问题，是关系到学校的阶级性质的问题。旧学校的招生制度，用什么"资格"、"学历"、"文凭"之类的条条框框，把工农子弟排斥在校门之外，实际上是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是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从有

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正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和胜利成果。影片中招考那场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它让我们记住，工农子弟进大学，这在旧教育制度下有多么不容易！面对着冷若冰霜的资产阶级把门人，贫协老代表气愤地说："共产党、毛主席把学校办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可我们贫下中农还是进不去。"怎么办？新来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振臂一呼："既然是资产阶级把门，那你就打进去嘛！"教育革命的成果，无一不是斗出来的。"打进去"，突破资产阶级的封锁线，就是为无产阶级争夺教育阵地的开始。我们看到，在龙国正的主持下，有贫协老代表参加，无产阶级的把门人一旦取代了资产阶级的把门人，这场考试的方法、内容及其结果，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饲养员徐牛崽录取了，育种能手李金凤录取了，小铁匠江大年录取了，群众顿时欢腾起来，牛崽喜若雀跃，就象对着全世界宣告那样高喊着："考上了！"这一新生事物出现时的大喊大叫，足以使得资产阶级失魂落魄，受旧传统观念束缚的教务主任孙子清皱起了眉头，惊讶不已："这样的招生法，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但这却恰恰证明，这样的招生法，已经有力地冲击到旧的教育制度，同旧的教育思想划清了界限。

"考大学要有资格"，这是影片中孙子清一本正经地说出来的一句话。说到资格，不同阶级的资格是各自不同的。在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有资格进"最高学府"，有资格"出洋镀金"，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却没有资格上学，文盲的帽子，不就是剥削阶级统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吗！在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也是那一小撮特权阶级的子女，才世袭地享有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可是，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龙国正高举起小铁匠粗壮的手，深情而又自豪地说道："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影片中这有力的一笔，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使我们产生

了不可抑止的激动。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工农兵学员才能昂首阔步，以主人公的姿态进入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可是去年七、八、九月教育界出现的奇谈怪论，又在老调重弹，旧案重翻，鼓吹什么“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这不就是要把今天的李金凤、徐牛崽、江大年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吗！可见，老的资产阶级把门人靠边站了，也还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把门人。他们从资产阶级的门缝里看人，工农子弟总是“不够资格”。看看影片中所反映的十七年前的斗争，是能够帮助我们对今天的斗争加深理解的。

事实说明，工农子弟打进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大门，还远远不是斗争的结束。打进去以后，短兵相接，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了。是开门办学，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老一套，关门办学，搞“智育第一”即资产阶级政治第一，把学生培养成新的精神贵族？这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争夺青年的斗争焦点。忠实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曹仲和，在工农子女进入学校之后，想的和做的，就是要把他们严严实实地关在校门之内，实际是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这批工农学生。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教训表明：那种“在课堂里植树，在黑板上种田”的教学，只会教出“学农不务农，学农不爱农”的学生。影片中的孙子清，在很少有马的南方山区，在春耕大忙季节，当社员拉着病牛来向他求治的时候，还那样心安理得，没完没了地在课堂讲他那个“马尾巴的功能”。这一辛辣的讽刺，入木三分地使资产阶级那种理论脱离实践的教学方法出了洋相。当然，这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的旧教学制度，从它的本质及其危害的严重性来说，不但是可笑的，而且是可恨的。影片中那个进了当时“名牌大学”的贫农儿子，读了三年书，就嫌他母亲做的布鞋“太土气了”，就不能再回到“那小山沟去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这种恶果难道还少吗！这正

如列宁所说："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因此，要不受奴化，就必须对旧教育制度奋起斗争。

坚决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办学的龙国正，同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同学站在一起，针锋相对地对曹仲和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动了攻势。龙国正针对那种"浸种的时候讲收割，收割的时候讲浸种"的荒唐情况，提出了"教材的系统性应当适应于生产的季节性"；徐牛崽贴出了《少讲马，多讲猪和牛》的大字报；肖萍老师和同学们赤脚下田，"水稻课在田里上"……。这样一冲，便冲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曹仲和慌了，说什么这是把大学办成了农场、垦荒队；孙子清也急了，说什么"全乱套了，这书还怎么教下去"。教育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呀！但是，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随着资产阶级教学秩序的土崩瓦解，无产阶级新的教学秩序就会建立起来，只是资产阶级的偏见，使他们认为这并不是秩序罢了。然而贫下中农对这一破一立的辩证规律，却理解得非常深刻。老代表用了两坨泥巴，就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教学要结合生产的道理讲清楚了。龙国正把这一简单的比喻，评价为一张高水平的大字报。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对于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的论调，正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资产阶级在学校教育方面对付工农同学的策略，总是沿着这样的规律：先是使他们不得其门而入；一旦防线被突破，就关起门来，用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来"消化"他们；如果还不能使其就范，便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在教育质量上大做文章，用"泻肚子"或曰"自然淘汰"的办法，重新把他们赶出校门之外。这个三部曲不是别的，正是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影片中曹仲和用突然袭击的考试办法，"要刷掉一些不够格的学生"，就是一例。小小一张"勒令退学"的通告，硬是把李金凤等人开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工农同学的这一情景，现在看起来还是多么让人触目惊心呵！性格刚强的江大年，由于愤慨已极，

一怒而去。刚从外地返校的龙国正听到这一情况，拔腿就追，他穿丛林，越山梁，一口气追到了铁匠铺，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抱住大年说：“走，跟我回去上大学。”此情此景，使人不禁热泪盈眶，这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诉，也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讴歌。“打进去”又被赶出来，赶出来再追回去，这反映出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多么复杂、尖锐和曲折啊！

怎样看教育质量，怎样衡量学生的好坏？翻遍古今中外教育史，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统一的标准”。曹仲和说什么“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多么虚伪。因抢救遭到严重虫害的稻田，考试交了“白卷”的李金凤，和那个“门门五分”，却以自己刚学到手的一点技术向贫下中农“敲竹杠”的余发根，这两个学生，谁个好？谁个不好？两个对立阶级所持的标准，又怎么能一致起来呢？曹仲和所要求的统一标准，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标准。你不同意他这个标准吗？那就是不讲质量，那就是把他认定的坏学生当成了好学生。当前教育界的那些奇谈怪论，就要说你“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无非是要把教育革命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使之变成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以便让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重新称王称霸。但是，不管资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怎样危言耸听，终究是唬不倒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多少象李金凤那样优秀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为革命勤奋学习，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向党和人民交了红卷。他们的质量，无产阶级满意，贫下中农赞扬，就是不要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质量”！

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龙国正说得很明确：“咱们共大培养的人材，既要有共产主义觉悟，又要有学问，还会生产劳动，要成为又红又专的大学生。”这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的观点。李金凤在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但能够识破而且敢于顶住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出“赵副专员的报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毒草”，这说明她有很高的阶级斗争和路

线斗争觉悟，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她能够培育出优良的稻种，能够发现生产队稻田的虫害，并组织同学和社员一起把它及时扑灭，这难道不算学问，不算文化？有人诬蔑我们批判了“智育第一”，就是提倡“不读书”、“不讲学文化”，这真是奇谈怪论。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历来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把这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又红又专。其实，任何阶级看待教育质量的好坏，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说李金凤是好学生，首先是因为她在校内校外，都敢于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而曹仲和他们把李金凤当坏学生，甚至开大会批她，首先也是因为她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轨，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斗。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认为是好学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正好就是资产阶级定之为“坏学生”的那些“罪状”。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我们历来重视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那些极力维护“智育第一”的人，又何尝是热心智育，他们的真心本意，不过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而已。当然，还有这样的一些同志，由于受旧传统观念禁锢，对于教育革命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专爱挑剔，这正象鲁迅说过的那样：尽管现代的玻璃镜要比古代的铜镜好，但他们总是顽固地认为：“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这样的同志，只有从资产阶级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才能在教育革命的问题上和工农群众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一边看着影片《决裂》，一边总是使人思考着当前教育战线上的这场大辩论。这种看电影的感受是很少有过的，我们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说明我们文艺创作和现实斗争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了，因而大大加强了它的战斗作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不可能不是息息相关的。反映教育战线斗争的文艺作品，有一个究竟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问题。《决裂》是一曲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

因而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赞扬。“放排正逢春江水，劳动大学办在我们心坎上。”影片中李金凤在激流竹排的放歌，也唱出了我们今天广大工农兵学员热爱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的感情，唱出了革命师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教育革命的决心和斗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让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唱得更加嘹亮吧！（附图片）

上图：龙国正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

右图：龙国正举起江大年的手激动地说：“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

新华社供稿

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梁效

1976-01-15　人民日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教育路线。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开展教育革命，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始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教育事业的面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教育革命蓬勃开展，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停息。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战线出现的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当前，教育战线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在这场辩论中，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教育革命的论述，弄清楚教育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教育革命实践，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列宁全集》第

二十八卷第六十九页）列宁这个精辟的论断，击中了旧学校的要害，揭露了它的阶级实质，是批判旧教育制度的锐利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教育阵地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从教育制度到教学方针，从课程内容到教学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说，在教育阵地，还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

解放后，我们党曾经陆续派了一些干部去领导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开设了一些马列主义课程。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把持教育阵地，先是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基本照旧"，以后又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没有从根本上对旧学校进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着我们的学校，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样的学校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旧学校。它口头上也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际上它在各方面都浸透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七页）。什么"读书做官"、"智育第一"、"天才教育"、"知识私有"等等，充斥了学校生活，公开鼓励青年学生"成名成家"，爬上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宝塔尖。显然，这种教育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为修正主义上台培植社会基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学校只让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劳动人民根本无权上学。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给了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政治权利，使学生的成分发生了一些变化，工农子女可以进学校了。但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抹煞教育的阶级性，利用"分数挂帅"等手段，实际上把大批工农的子女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有些工农子女虽然进了大学，也被他们用种种手段"淘汰"出去。工农群众气愤地说："大学校门八字开，工农子女进不来"，"分数线，分数线，劳动人民的封锁线"。一部分工农子女即使上了学，由于学校的根本性质没有变，教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旧学校这个封、资、

修“大染缸”的腐蚀侵袭下，工农子女也往往丢掉了工农原有的阶级感情，不同程度地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四五页）。这个最大祸害在旧学校暴露得最为突出。这样的学校，根本不可能引导学生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理论脱离实际，教学脱离生产劳动，师生脱离工农群众，成为一切旧学校的共同特征。学制太长，课程太多，讲授又不得法，提倡死啃书本，搞烦琐哲学，使青年越读越蠢。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经济学的解释不了货币，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历史的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学工的开不了机器，学农的关在城市里讲种地。大学毕业了，不懂得阶级斗争，不了解社会，同工农兵格格不入。这样的学校，难道不应该彻底废除吗？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使旧学校起着腐蚀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有人却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教育“不见得都错了”，不准提“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对十七年的教育究竟怎样估计，是应当根本否定，还是基本保留，这是当前教育界激烈争论的首要问题。它的要害在于承认不承认这十七年是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散布为十七年旧教育翻案的奇谈怪论，实质上是否定今天的教育革命。我们必须粉碎这股复辟十七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搞好教育革命，在教育领域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一定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教育战线上面临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废除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学校，创立无产阶级的新学校。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前进到共产主义社会，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可能性，决定了学校必然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的场所：它或者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或者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反映在办教育的路线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间的根本对立。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懂得或不承认这两种可能性，那就必然会忽视甚至抹煞两种学校、两条教育路线之间的本质区别，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当前，教育界那种诬蔑教育革命"过正"，攻击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总不是正"的论调，就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谬论，其实质是否定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大好形势，妄图使我们的学校走回头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为俄共（布）制定了"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的教育革命纲领。这个纲领，要求学校"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子弟（《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十页），"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四六页）；要求教师大军"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八页）；要求整个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一页）；要求学校"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总之，这个纲领要求"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

在列宁领导下，根据这个纲领，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教育革命。废除旧俄的教育体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教育体制，实行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取消学衔学位特权和毕业文凭。在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团结、教育和改造教师队伍。这样，无产阶级就在人类历史上进行了勇敢的教育革命的实验，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

从列宁领导的教育革命到今天苏联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是历史的大倒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复辟了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制度、方针和方法，使苏联的学校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苏联教育演变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它说明，教育革命是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让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复辟，就会使学校成为滋生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温床，就有可能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果。同时，它又说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崭新事业，因而是一个极为艰巨困难的事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七页）“文化任务不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要解决文化任务，“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该根据这个较长的时期来规划我们的工作，表现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六十页）如果没有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列宁这条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正是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个伟大历史任务出发，提出和解决教育革命问题的。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的伟大任务，并且着重指出：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

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完成改造知识分子和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的任务，不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多次发出"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并且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必须批判一切干扰和阻碍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教育界竟然有人对"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思想表示怀疑，进行挑剔。这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革命的抵触和抗拒情绪。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要不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原则问题，是学校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这场大辩论说明，教育革命既然是一场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这是革命发展的规律，丝毫也不值得奇怪。我们一定要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大批资产阶级，大批修正主义，用教育革命的更大成绩，去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坚定我们队伍的必胜信心。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根本区别集中地反映在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复斗争的基本内容。

毛主席明确地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里，毛主席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学校的培养目标，同时又给我们指明了具体的办学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是由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所决定的，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学校从根本上来说，总是要为统治阶级培养政治上的接班人。同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教相反，我们从来公开声明，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的政治目的就是"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六十九页）因此，无产阶级的学校理所当然地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培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革命战士，作为新学校的根本任务。任何学校只要离开了这一条，就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旧学校，无论它培养的人本事有多大，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教育界有人说："现在是政治冲击业务"，这种谬论实际上是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用专去反对红，用所谓超阶级的"文化"标准去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作为科学文化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才真正懂得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是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任务。这个任务就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创造灿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文化。工人阶级必须而且一定会在这一斗争中培养出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很明显，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首先是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革命战士，也只有这样的战士，才能不辜负阶级的委托，去努力掌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几年来，广大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的大量事实，不

是已经证明了这个真理吗？把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诬蔑为“不讲学文化”，这种论调只能说明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偏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

列宁指出：“我们的学校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五五至三五六页）无产阶级的战士不能在温室里培育，而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社会主义的学校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组织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使教学和社会生活声息相通。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理工科要“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这是改造旧学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师生遵照马列和毛主席的教导，走出校门，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他们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开门办学、开设短训班、半工半读、“七·二一”大学和朝阳农学院等多种办学形式，为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只有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学习理论和科学文化，才能真正学懂学通，获得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开门办学诬蔑为“实践——实践——实践”，“只当劳动力”，就是反对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企图把他们赶回到死读书的象牙之塔里去。

对待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两条教育路线、两种学校的一个根本区别。同轻视生产劳动的传统观念相对立，社会主义的学校把生产劳动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使师生在劳动中培养工农感情，并学会一定的生产斗争知识。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的新教育制度下，每个受教育的少年儿童从九岁到十二岁每天劳动二小时，十三岁到十五岁每天劳动四小时，十六岁到十七岁每天劳动六小时。要求每个学生“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象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

生产工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一六至二一七页）。马克思正确地预见到，教育制度的这一革命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将具有重大的意义，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三○页），“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十四页）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无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基本标志，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可靠保证。因此，毛主席一贯提倡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又发出了“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伟大号召。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对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给予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这条道路就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彻底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而创造条件；就是要使我们的学校培养出可以和工农“划等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我们应当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景来认识它的深远意义。

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

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强调指出，教育部门，“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并且指出，要在党的领导下改造教育大军，“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紧密地同党和党的思想结合起来，完全贯彻党的精神”（《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我们的学校，封、资、修的旧教育年深日久，根深蒂固，它的势力从上到下，

盘根错节。要巩固和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党的领导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的领导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甚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教育界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使学校一度处于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的局面，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些历史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无产阶级要实现教育革命，首先就要夺回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建立起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主席派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并亲自抓教育革命。从此开始，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参加学校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开创了教育革命史上的新篇章。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七年多来，广大师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大量的教育革命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工人阶级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气魄，战狂风，顶恶浪，坚定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教育要革命”的方向胜利前进。工人阶级的伟大功绩，将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彪炳千秋。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工人阶级占领学校，从根本上说就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彻底改造旧学校，培养和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些诬蔑这几年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的人，说什么根子“在管教育的”，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工人阶级领导，其目的就是要把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宣队赶出学校，削弱党的领导，翻教育革命的案。这是广大革命师生所决不允许的。伟大的工人阶级必将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不断地积累

经验，增长才干，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教育革命搞得更好，胜利地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招生站的一场斗争说起

唐山齿轮厂　陈冠柏

1976-01-18　人民日报

彩色故事影片《决裂》中招生站那场戏写得很深刻，很有特色。斗争很尖锐：孙子清奉共大副校长曹仲和指示，“宁可少招，质量要高”，拿“文凭”、“学历”卡关把门，贫下中农子弟吃了闭门羹，因为“没有资格”。什么“资格”？说是要正经八百的中学生。共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一到，打开了那扇关闭的大门。他认为，共大不是不要文化，但“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大学生究竟是直接从中学生中挑，还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

这实质上是办学的阶级路线问题，教育的政治方向问题。曹仲和这种资产阶级把门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所谓“系统性”、“连贯性”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分选优，层层过筛，拔“尖子”？就是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是高居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高考，是他们设下的森严的关卡，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烟幕下，继续对工农群众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高考，又是他们手中的指挥棒，驱使青年去走“读书做官”的邪路，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无产阶级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普通劳动者中招学生，到大学学习之后再当普通劳动者，这在龙国正看来，是顺无产阶级之理，成无产阶级之章的事。因此，他要打开被资产阶级把持的大门，砍掉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阶梯，而代之以从工农群众中招收学生。

影片《决裂》正是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光辉指示的无比正确。李金凤、徐牛崽、江大年这些朝气蓬勃的工农学员，正因为他们来自工农，十分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敢顶，敢批判。正因为他们来自工农，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对工人、贫下中农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懂得上学为了工农，出来还当工农。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学习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受到工农群众齐声称赞。这同影片中在“名牌大学”上学的那位“一年土，二年洋，毕业不愿回山乡”的贫农儿子相比，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招生制度的这一根本改革，震动了资产阶级，震动了受旧观念影响较深的人。那位孙子清不是惊叹：“这样的招生法，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吗？但是，这恰恰说明，我们没有因袭资产阶级的一套，而是在革命，在前进，在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看《决裂》，想现实，这场斗争并未结束。不久前教育界那种奇谈怪论，不也要挑中学生“直接上大学”吗？打掉他们那个什么不让“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幌子，可以清楚，他们的目的是让资产阶级重新专我们的政。我们要象龙国正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

（附图片）

《决裂》一个镜头：龙国正从工农学生徐牛崽的一张大字报联系到烂掉的谷种，严正指出：不批判资产阶级脱离实际的学风，教改工作是搞不好的。他号召师生掀起一场教育革命的风暴。　新华社供稿

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评彩色故事影片《决裂》

柏青

1976-01-18　人民日报

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彩色故事影片《决裂》与观众见面了。这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教材，加深了我们对教育革命伟大意义的认识；也是一张革命的大字报，狠狠回击了教育界那股右倾翻案风，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影片《决裂》是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创办过程为题材的。江西共大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形势下，在教育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所新型大学，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劳动实践教育人、培养人。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特别是共大的诞生，猛烈地冲击了刘少奇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而遭到他们的疯狂反对。影片以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与副校长曹仲和的斗争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教育战线的这场革命。整部影片热情地歌颂了共大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无情地鞭挞了资产阶级旧教育，深刻地反映出教育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

影片以"决裂"为题，从本质上抓住了共大的特征，这就是敢于同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彻底决裂，同教育阵地上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同维护这些旧制度、旧观念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



学校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把学生培养成哪个阶级的接班人，是教育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也是新、旧教育制度的分水岭。在这些问题上，

龙国正与曹仲和存在着根本分歧。曹仲和利用副校长的职权，顽固地维护旧的教育制度，而龙国正则抱定“把那些资产阶级老爷办的大学改造过来”的决心，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共大革了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命。

影片通过招生站门前的斗争，尖锐地揭露了旧学校“资产阶级把门”的严重情况。曹仲和挥舞“宁可少招，质量要高”的大棒，用文化卡工农子女，充当了资产阶级的把门人。龙国正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请贫协老代表把门，宣布“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把学校大门向工农敞开，这确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李金凤满怀喜悦地唱道：“放排正逢春江水，劳动大学办在我们心坎上。”这是劳动人民对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热烈赞颂。但是，直到今天还有人一心想恢复挑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旧招生制度，妄图让资产阶级重新来把门。广大工农兵群众是决不会答应的。

工农子女进了大学校门，并不就意味着能得到很好的培养。因为在旧教育制度下，教学内容和方法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教育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践，学生在课堂里植树，在黑板上种田，学的很多是“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烦琐无用的知识，整天忙于赶考试，争分数，学农不务农，学农不爱农。在这种制度下，工农子女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被毒害，遭摧残。他们或者被曹仲和之流赶出校门，或者被塑造成所谓“高精尖人材”，也就是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我们不会忘记，那位贫农大娘到旧大学探望儿子的镜头：一个苦水里泡大的孩子，上了三年大学，竟变得思想又脏又臭，嫌布褂子“难看”，嫌布鞋“土气”，有了知识，忘了爹娘；穿上皮鞋，忘了家乡。大娘拉着儿子，满含悲愤的眼泪说：“孩子，这书不能念了！”这是对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的旧教育的血泪控诉。我们同样不会忘记，江大年为抗议曹仲和无理开除工农同学，回去打铁的场面：他咬紧牙关，高高地举起铁锤，使尽全身力气砸下去，仿佛恨不得把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一锤子砸碎。

龙国正，这个忠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干部，他的心与工农是相通的。他敢于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对着干，发动群众“打资产阶级店”，终于闯出了一条崭新的办学道路。这就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按照农、林、牧的生产季节改变课程”，并且开门办学，“把学校的小课堂搬到农村的大课堂去，拜贫下中农为师，做到学用结合，上生产斗争课，上阶级斗争的主课。”正是沿着这条办学道路，造就了象李金凤、徐牛崽、江大年这样的敢批修正主义、敢斗资本主义、有文化、能劳动的无产阶级新一代。李金凤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她能文能武，学以致用，及时发现和领导大家扑灭了生产大队的虫灾；她立场坚定，敢于抵制“三自一包”妖风，在走资派的迫害面前，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可以把我关起来，你们可以不给我饭吃，可是要我检讨，办不到！”影片令人信服地表明：只有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哺育下，才能培养出这样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共大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新就新在同旧教育制度彻底决裂，把学校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共大的成长也不例外。曹仲和等人污蔑共大“是农场，是劳动大队”，污蔑李金凤等工农同学“调皮捣蛋”，“胸无大志”，“是坏学生”。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党内走资派。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风雨的冲击之后，今天有人操着同样的腔调，又在咒骂教育革命了。他们把半工半读、开门办学污蔑为“光劳动，不学习”，是“实践——实践——实践”，把工农兵学员污蔑为“投机取巧”，“水平低”，“拖后腿”等等。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

二

学校向来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智育第一、知识私有、读书做官、成名成家等旧的传统观念，年深日久，流毒很广。这些观念不

破除，新的教育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即使暂时建立起来也不会巩固。因此，教育要革命，就必须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影片在这方面做了较为充分的描写。

孙子清是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既是旧传统的因袭者，又是旧思想的传播者，处处表现出同新事物格格不入。他认为反常的，无产阶级看来恰恰是合理的；他认为天经地义的，正是需要根本改变的。学校招收工农子弟入学，他说不够“资格”；学校办在山沟里，他说“活见鬼”；学校采取的教育革命措施，在他看来简直不象样子，“全乱套了”。虽然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怀有仇恨，但是旧的传统观念，驱使他把自己推向教育革命的对立面。人们从他对教育革命新生事物的阵阵反对声中，可以看到教育阵地上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是多么根深蒂固。

这种旧观念不仅束缚着很多教师，而且还侵蚀和毒害着青年。富裕中农子弟余发根，在他父亲向他灌输的“等你学会了本事，不管到那儿都能赚钱”的思想影响下进了共大，正是这种“知识私有”观念，促使他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曹小妹又是一种典型。她思想单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又始终处在走资派父亲的直接影响下，当工程师、做科学家，对她有着很大的诱惑力。这就在她思想上投下“读书做官”的阴影，使她产生要不要上共大以及上了共大要不要离开共大的矛盾与斗争。这说明，青年一代还处在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争夺之中，怎样使青年一代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是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列宁早就指出：“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龙国正正是以这种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的伟大气魄，公开向旧传统观念宣战的。同曹仲和这个旧传统观念的卫道士相反，他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改造人，引导学生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健康地成长，鼓励教师与工农相结合，帮助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改造旧思想。孙子清的转变很有典型意义。一个曾经被旧思想的重担压得寸步难行的知识分子，终于在同旧

传统观念实行决裂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虽然影片对他转变的基础表现得不够充分，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巨大威力。那种把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说成是“一讲知识分子，就骂一通”的人，实际上是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这是徒劳的。影片还通过“批判大会”这场戏热情赞扬了曹小妹、余发根同旧传统观念的决裂。在龙国正、李金凤革命精神的感染下，曹小妹激动地走上讲台，当众撕毁了父亲给她弄来的上“名牌大学”的介绍信。余发根也悔恨交加，当场摔碎了搞资本主义邪门歪道的贮钱筒。他们撕毁和摔碎的绝不仅是一封介绍信、一个贮钱筒，而是“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旧传统观念的精神锁链。影片通过孙子清、曹小妹、余发根的变化，说明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只有冲破旧传统观念的阻力，才能阔步前进。前不久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极力阻挠对智育第一、知识私有、读书做官等传统观念的批判，我们必须给予坚决回击！

三

能不能同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决定的因素是能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影片告诉我们，维护旧教育制度、旧传统观念的人，党内外都有，但危险主要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为副校长的曹仲和，自称办教育“有发言权”，但他搞的一套全是修正主义的货色。他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校，把凯洛夫等资产阶级教育权威捧上了天。他利用职权，强制推行“三脱离”的教学大纲，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无理开除工农同学，极力扼杀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成为共大教育革命的主要绊脚石。曹仲和之所以如此专横跋扈，还因为在他身后有赵副专员这样的走资派给他撑腰。因此，敢不敢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斗，是教育革命成败的关键。龙国正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大学校长，对党和毛主

席无限忠诚，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富有继续革命的精神。毛主席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就使他不仅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而且具备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实思想基础。因此，在出现修正主义逆流时，他有“开顶风船的勇气”。他敢于抵制修正主义教学大纲；敢于批判“三自一包”的毒草；敢于反对撤消共大的错误决定。赵副专员威胁他：“如果不改，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撤消你的职务。”龙国正针锋相对地回答：“这并不说明你们有道理，并不说明你们正确。不！真理不在你们手里。你们这些做法，使我又一次坚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好！办得对！”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革命师生坚决斗争和贫下中农的热情支持下，共大的教育革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教育革命在共大一个学校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教育阵地的全面胜利，一个回合的胜利，更不是最后的胜利。因为象曹仲和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事实正是如此。就在毛主席给共大写信的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经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亲自批准，一下子砍掉了江西共大六十二所分校，对教育革命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它有力地说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只有经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把赵副专员、曹仲和之流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经过文化大革命，象曹仲和、赵副专员这类走资派，不少人确实改正了错误，但有些人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新的形势下又重新犯错误。一九七二年，教育界出现了修正主义回潮，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又出现了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他们散布“教育革命的问题总没有解决好”，要由“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也就是让曹仲和这样热心资产阶级教育的人物来重新把持教育大权，把教育革命的方向再“扭”回去，开历史倒车。这说明，教育阵地

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

“不管有多大的狂风恶浪，也阻挡不住我们前进！”龙国正这句坚定有力的话，表达了教育战线上一切革命同志的心声。让我们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气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劈波斩浪，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智育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

高路

1976-01-19　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修正主义路线对学校的统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蓬勃发展。但是，在一段时间里，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散布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他们说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一”。在他们看来，“智育第一”并非全然不好，广大群众批判“智育第一”批错了，批的结果是“不读书”、“不要文化”，造成了当前教育部门的“最大危机”。

这样，我们就面对着一场严重的挑战：对“智育第一”要不要批判？究竟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还是继续推行“智育第一”，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于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智育第一”从来是修正主义教育的一个基本口号。苏修教育学家凯洛夫就提出：“在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中，智育，即教养，应占第一位”。刘少奇、林彪一伙也宣扬什么：“教育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叫做传授知识，学习知识”；“知识——为主要环（节）”。一切修正主义者如此狂热鼓吹“智育第一”，决不是关心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是要利用这个口号，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前不久，教育界有人又捡起“智育第一”的货色，目的何在？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就不难识破。

推行“智育第一”，把学校说成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就必然推行“教授治校”，“分数挂帅”，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并不是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前，刘少奇一伙正是借口“传授知识”，鼓吹“智育第一”，让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动权威窃取了学校的领导权，使学校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他们要把学校的党组织变成“业务党”，要把党委有的部门变成资产阶级专家的“服务部”。在大学究竟向谁开门的问题上，他们搞的是谁考分高，谁上大学，结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广大工农兵竟被排斥在校门之外；有的即使进了学校，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奴化；有的则被以“文化低”、“脑子笨”、“不堪造就”等罪名赶出学校，而对剥削阶级的子女却大开其门。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狂热鼓吹的“智育第一”，是他们搞资产阶级教育、法西斯教育的一块遮羞布。在那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通过一大批顶着“共产党员”和“专家”、“学者”称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现对学校教育的控制，连大学教研室主任也明文规定必须由“具有教授学衔或博士学位的人”担任。他们公开贩卖知识是“最高仲裁者”的谬论。苏修《真理报》还发表了题为《知识是进入高等学校的通行证》的社论，实质上，这是为特权阶层子女颁发升官发财的通行证，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智育第一”的背后，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推行“智育第一”，就必然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党的教育方针，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要按照这个方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智育第一”的推行者却反对这样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激烈斗争。学校千百年来又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课程内容、学科体系充满了封、资、修的毒素。如果不彻底加以改造，不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学生的头脑，不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搞什么“智育第一”，业务挂帅，埋头读书，就势必使学生一头栽进封、资、修的“大染缸”，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刘少奇叫嚷“只要学好一门专长，

将来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林彪一伙鼓吹什么“业务是现钞”。刘少奇、林彪一类就是利用“智育第一”这个口号，宣扬“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谬论，使人们把掌握文化知识，作为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等级的手段。在他们的毒害下，许多人轻视工农，鄙弃体力劳动；或者向党闹级别待遇，伸手要特权。名利在前，开足马力拼命干；无利可图，就叫喊“知识无用”。在这些人看来，什么无产阶级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什么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不少人一遇政治风浪，就左右摇摆，敌我不分。有的人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既然“智育第一”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着如此明显的破坏作用，为什么批不得？

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一”！修正主义者鼓吹的“智育第一”同历史上资产阶级的“崇尚智育”是一脉相承的，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资本主义教育的阶级性，总是鼓吹学校可以脱离政治而单纯“传授知识”。其实这完全是撒谎骗人！列宁指出：“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六至三八七页）。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资本主义学校不仅通过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哲学观点，去培养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人材，而且连自然科学课程中，也无不渗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他们的阶级偏见、道德说教。当无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以后，资产阶级更加拼命鼓吹学校可以“不问政治”，引诱学生为知识而知识，以阻挠他们接受工人运动的影响，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传播。所谓“崇尚智育”，完全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了“智育第一”所造成的严重政治恶果，深刻揭示了

这个口号的阶级根源和反动本质。这种批判好得很！不批判“智育第一”，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就不能彻底摧毁；不批判“智育第一”，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

鼓吹“智育第一”的奇谈怪论说什么：批了“智育第一”，就“不要文化”，“不学文化了”，就“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完全是污蔑！

在学习文化的问题上，两条教育路线的根本分歧，决不是要不要文化，或者多学一点文化少学一点文化，而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要不要在教学中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我们的学校为了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当然要重视智育，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引导学生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掌握必要的文化科学知识，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和新的科学技术。但是，学生在校期间，首先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解决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一个学生，只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提高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觉悟，就会为革命刻苦学习社会主义文化，掌握技术，去攀登科学的高峰。相反，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就会迷失方向：或者不愿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努力学习；或者学了一些知识却不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试问，我们的学校如果不把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位，这同资本主义学校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如果光要有文化懂技术、只专不红的人，那还要社会主义学校干什么呢？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攻击我们“不要文化”，“不学知识”，恰恰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仇视和恐惧。资产阶级视为珍宝的那一套封、资、修的文化，无产阶级当然要批判。旧的教学方针，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必须彻底改革。只有破了封、资、修的旧文化，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只有破

了唯心论和烦琐哲学的旧学科体系，才能建立符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新学科体系。

批判“智育第一”，批判旧学校那条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唯心论的认识路线，把它变成实践——理论——实践，难道就叫做“不学知识”吗？毛主席指出：“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有的人却认为只有死啃书本，才算学知识，才能学知识，参加阶级斗争便斥之为“空头政治”，参加生产劳动便骂之曰“当劳动力”。这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的偏见。事实上，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就是有一些片面的书本知识，最多也只能算个半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如果不经过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与工农相结合，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究竟能有多少用处呢？今天，我们的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紧密结合，学生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学到的书本知识，而且还可以从劳动人民那里学到丰富的实际知识。这就有利于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提高，也有利于学生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正是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需要。所谓批了“智育第一”，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云云，说穿了，就是认为要搞“四个现代化”，只能走修正主义的老路。在现代的世界上，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有资本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现代化。离开马克思主义路线，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呢？这些教育革命的反对派，才真正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绊脚石！

围绕要不要批判“智育第一”的这场原则争论，是当前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搞“智育第一”，就必然要由所谓“热心科学”而实际上热衷于搞修正主义的人来领导学校，这样，工人阶级的领导就取消

了；搞“智育第一”，就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样，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的招生制度就改变了；搞“智育第一”，就会关门办学，关门办科研，这样，《五·七指示》道路就否定了，如此等等，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就要被篡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要全面复辟，学校就会重新变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智育第一”的老调，修正主义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唱了十七年。今天面对正在高歌猛进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有的奏惯了旧曲、走惯了老路的人，不但没有改弦易辙，反而老调重弹。教育革命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阻挠，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如果在教育战线搞“智育第一”，科研部门搞“科学至上”，工农业战线搞“技术挂帅”，照此办理，“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思潮就会泛滥，党的基本路线就要被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新生事物就要被扼杀。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才能目张。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它们之间是纲和目、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决不能把它们平列起来，决不能加以颠倒。

毛主席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强调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毛主席又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时候，要特别牢记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决不允许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在中国重演。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大连工学院和红旗造船厂实行厂校结合办学

1976-01-28 人民日报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在厂校挂钩的基础上，实行厂校结合办学，这是大连工学院和大连红旗造船厂在教育革命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这种新的办学形式，进一步树立了无产阶级在学校教育中的优势，有利于对理工科大学的改造，使教育革命朝着毛主席指出的“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进。

从厂校挂钩到厂校结合

厂校结合办学，是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大连工学院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照抄照搬外国的洋教条，学校成了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工具。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提高了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遵照《五·七指示》，于一九六九年走出校门，同红旗造船厂等工厂、农村社队实行挂钩，开门办学，使教育革命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走向社会办学的门虽然打开了，但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还没有肃清，资产阶级“智育第一”那一套还时而干扰教育革命的方向。有的专业或班级以选择“典型产品”、“典型任务”为名，到各地去跑，把下工厂、工地单纯作为获取知识和验证理论的措施。红旗造船厂的工人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你们这样开门办学，是鸟儿出门‘打食’，飞一圈就回‘老窝’，还是搞资产阶级那个课堂、书本、教师‘三中心’！”工人的批评引起大连工学院和红旗造船厂党委的重视。他们在总结经验、肯定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领会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

命的论述，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大连工学院党委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搞好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必须在教育革命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红旗造船厂党委也认识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不仅表现在学校，也表现在工厂。教育革命这副担子，学校要挑，工厂也要挑。要用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工厂和学校研究决定，把大连工学院造船系的船体专业放到红旗造船厂的船体车间去办。船体车间把船体专业作为自己的学校，船体专业把船体车间作为自己的五·七工厂、校外教学基地。厂校双方共同建立了有工人、干部、学员参加的相对稳定的三结合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以工人为主体，百分之六十的成员是船体车间的干部和工人。整个教育计划，政治思想工作，教学内容和方法，都由三结合领导小组发动群众来讨论、决定、落实。这样一来，广大工人群众把教育当作重要任务，人人管，自觉管，一大批工人成为不脱产的工宣队员和兼职教师。教育真正置于工人阶级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之下。广大工人说：“这样办学好，想管管得了，有劲使得上。”

课堂大教师多教材新

厂校结合办学后，厂校双方坚决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充分利用课堂大、教师多、教材新的有利条件，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厂校结合办学中，厂校党委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员，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在首位，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学员进厂后的第一课，是由车间党总支书记讲建厂七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史，老工人作忆苦

思甜的报告。工厂还给学员上“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课，讲怎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党、团员学员在厂期间，同工厂党、团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学员同工人一起学习，参加工人理论小组的活动，参加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这样，使学员们亲眼看到工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表现，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厂校党委对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大胆改革，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他们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三年的教学过程做了如下安排：第一年，参加一条船从放样、下料到合龙的建造全过程，结合学习船舶结构、造船工艺和有关基础理论知识；第二年，参加设计一条船的全过程，同时学习船舶原理、船舶设计等方面的课程；第三年，参加技术改造和科学研究工作，学习机械、电工等方面的课程，进行综合训练。用工人的话说，这三年是“先干一条船，再画一条船，最后搞技改”。三年中，学员有两年左右时间在工厂学习、实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船体专业共有三十多门课程，现在，逐步精简为十二门。课程的设置，教学内容的选择，注意突出重点，学用一致，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教师讲课学生听，是几千年来旧的教育制度，在厂校结合办学中也开始改变。工人师傅讲实践经验，教师从理论方面加以分析，工农兵学员也讲参加生产实践的体会。大家互相补充，共同讨论，出现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厂校结合办学，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学到了真本事。文化大革命前，大连工学院造船系船体专业师生在黑板上“放样”，在教室里“造船”，六届毕业生只设计了半条船，更没有从头到尾地建造过一条船。文化大革命后的四届学员，不仅用自己的双手与工人一起建造了六条船，而且亲身参加了六条船的设计工作。其中，有几万吨的油轮，有货船、起重船，也有一百来吨的渔船。很多学员毕业

后，马上就挑起了担子，发挥了作用。有的回厂三、四个月，就和工人一起，搞成两项技术革新，解决了厂里的生产关键问题，受到了广大工人交口称赞。教育界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说什么工农兵学员“质量低”，开门办学“不学文化”，完全是恶意的歪曲和诬蔑！

可喜的成果

厂校结合办学，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它一出现，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大连工学院继船体专业之后，又有造船系船机专业、机械系的金相和铸工专业，分别同大连红旗造船厂的柴油机、热处理、铸造等车间实行厂校结合办学。现在全院二十一个工科专业全部与对口厂矿、工地结合，实行了这种新的办学体制。随着这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学院教育革命步步深入，有关厂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更加喜人。

厂校结合办学，有利于工农兵学员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茁壮成长。文化大革命前，大连工学院培养了一万三千多名大学生，没有一个提出毕业后要当工人和农民的。今天，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工农兵学员，敢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以革命行动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继女学员郑延军毕业回乡务农后，去年又有马万力、赵颖、王建华等十一名毕业生，奔赴西藏和农村。学员王建华，三年前，挑着井冈山贫下中农送的毛竹扁担来上大学；学习了三年，手捧院党委赠送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肩扛锄头和铁镐，又回到当年插队落户的井冈山去当农民。今昔对比，可以看到，在教育革命风雨中成长的工农兵学员，精神风貌是何等可贵。去年毕业的七百二十二名工农兵学员，同工农相结合，在教师指导下，承担并完成了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一百五十多个科学研

究和技术革新项目，其中有十一项成果填补了我国工程技术领域的空白，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厂校结合办学以后，广大教师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在工人阶级的教育下，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刻苦改造世界观。很多教师不仅教好专业课，还认真做好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有的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结合实际，在教学工作中敢破敢立。一年多来，全院共编写新教材一百八十多种。

厂校结合办学，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更紧密结合，推动了工厂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红旗造船厂充分利用学校为工厂技术教育提供师资和教材的好条件，提出在本厂普及大学教育的规划，努力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去年，全厂二十三个车间、科室办起了工人业余大学，共设二十七个专业，有近两千人参加学习。他们注意培养工人兼职教师队伍，使他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产业工人直接参加教育革命实践，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打破了少数人对科学技术的垄断，使广大工人能在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工厂党委积极引导学员和教师把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作为教学、科研的重要内容，同工人群众一起攻关。去年，船体专业在大连红旗造船厂共完成二十二项科研和技改任务，利用学校实验室，为工厂进行了船舶造型、改型和船舶结构等十五项生产实验。

厂校结合办学所取得的成绩，对教育界那种“今不如昔”的奇谈怪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辽宁大学大批判组

1976-02-01　红旗

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这本来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夕，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明确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告诉我们，那时的教育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学校没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倒是资产阶级在这里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主席从实际出发对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教育所作的正确估计，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受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却总是想推翻这个正确的结论。围绕着这个问题，近十年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去年夏秋之交，教育界有些人又在这个问题上挑起了争论。他们制造种种奇谈怪论，妄图证明教育从根本上来个革命是没有必要的，从这里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是多此一举。

然而，事实俱在，他们的用心是徒劳的。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拼命叫嚷"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那么，他们所极力肯定的"十七年教育"，占统治地位的到底是一条什么路线呢？建国初期的教育，是从国民党反动派那里接收过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那一套东西。虽然校长换了，派去了党委书记，但是其他如教员、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等等都不可能换掉。这种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部分，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建国后不久，毛主席指出：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但是把持教育大权的刘

少奇一伙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基本照旧”的反动口号，不许触动国民党的教育制度。他们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在原有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教育中，又大量增加了修正主义的货色。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根据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批驳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但是，革命刚刚兴起，刘少奇一伙就大泼冷水，用“乱、糟、偏”的罪名，把它压了下去。接着，他们大搞反攻倒算，进一步强化了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的统治，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黑货更加系统化，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养精神贵族更加合法化、制度化。从一九六二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对教育革命又作了一系列指示，再一次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极其愤慨，“很不赞成”，要求完全改变。刘少奇一伙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推行所谓“两种教育制度”，来继续维护资产阶级对学校的统治。

纵观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两条路线斗争，可以看出，那时的学校虽然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根本性质没有变。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因此，那时的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场所，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资产阶级学术体系、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腐蚀和毒害广大青少年的场所。不许同这条反动路线对着干，难道要我们同它顺着干吗？很显然，如果这样干下去，不仅劳动人民不能在文化领域得到真正的翻身解放，而且连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当家做主的地位也将会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丧失。这也许正是那些猖狂反对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人们的真正目的吧？！

“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这是奇谈怪论制造者们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唱的一曲赞歌。所谓“很大成绩”表现在哪里？在他们看来，就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高，现在的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教育质量问题，总是和一定的阶级、一定的路线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培养目标是精神贵族。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则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旧学校绝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高质量。先从政治上说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公开鼓吹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从各个不同的渠道，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学生从进校门开始就打上“读书做官”、成名成家的烙印。旧辽大有些受毒害的学生，发誓“熬尽最后一滴骨髓油，也要一鸣惊人”，而政治上则只要求“过得去”就行了。但是，甘居中游，中游难保，想“过得去”者，却往往“过不去”，有的人一遇风浪，就左右摇摆，甚至走向反动。这样的学生的政治质量，能够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农兵学员相比吗？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业务上也一样。那时候，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是教学的“台柱子”，他们本身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因此只能用他们从旧学校学来的那些陈旧不变的本本和条条来填塞青年的头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关起门来读十几年书，结果是，学哲学的不会分析矛盾，学文学的不会进行创作，学历史的只知道死记硬背帝王将相的家谱，不会用历史唯物论总结历史经验。和奇谈怪论者的估计相反，就这些学生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来说，说他们许多人赶不上今天的“中技”水平，倒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呢！“十七年”大学的学生成分是有变化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工农子弟增加了。但是，他们进了这样的学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工农群众花那么大力量办了学校，结果自己的子女上学之后，却在思想上背离了自己。修正主义教育的这些“很大成绩”，我们早已领教够了，它不是别的，恰好是我们无产阶级和劳

动人民最痛心的历史教训。时至今日，奇谈怪论制造者们又在那里津津乐道这样的“成绩”和“高质量”，到底要把我们的教育“扭”到哪里去，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当然，“十七年”毕业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但这绝不是什么旧学校的“功劳”。他们今天能有所进步，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最基本的是从学校毕业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长期参加社会斗争实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结果。不少人刚从旧大学出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和工农没有共同语言，到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以后，不少事情需要从头学起，无产阶级要用很长时间，花很大气力帮助他们转变世界观和思想感情，才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为工农服务。这不仅不能说明“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相反，只能说明那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妨碍了青年的健康成长，影响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建立，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喜看今日社会主义大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农兵大学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来自工农，不忘工农，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和工农结合在一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挥较大作用，与旧大学生形成了鲜明对照。辽宁大学七二届工农兵毕业生有十二名回乡当农民，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树一代共产主义新风。这十二名同学，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干社会主义有本领，批资本主义批得深，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的深刻变化，充分说明，只有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过去是路线错了，不是说一切方法都错了”。这也是奇谈怪论制造者著名的奇谈怪论之一。表面看来，他们好象承认过去路线错了，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方法同路线不能绝对分开。教育方法总是由一定的教育路线决定并为它服务的。象教育界奇谈怪论制造者们所说的那种脱离一定阶级路线的超阶级

的教育方法是从来没有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招生到分配，从教学到考试，哪一种方法不是受那时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支配并为它服务的？大学招生，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录取与否，决定于分数高低。修正主义教育把大批工农子女拒之于学校门外，不正是用的这个方法吗？旧的教学方法，建立在唯心论的先验论基础上，严重脱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工农群众，把学生禁锢在课堂上和书本里，大搞烦琐哲学。讲授法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整天处在精神紧张状态中。整个教学工作死气沉沉，形式主义，一切生气蓬勃的、健康的东西都被扼杀掉。学生让死人、洋人牵着鼻子走，窒息了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这种教学方法，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那里传下来，被资产阶级接过去，用以培养“五分加绵羊”式的驯服工具，也正符合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再看过去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整学生，专出一些怪题、偏题，搞突然袭击。考试多如牛毛，考场如法场，监考似法官。升级、留级、毕业，全由一张考卷定命运，使学生拼死争那个五分。有一些工农子女不合于他们定的标准，被赶出了校门。至于分配，大学一毕业，学生就再也不当工农兵，实际是让他们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从工农兵中分离出来。这一套方法是同修正主义路线维护和扩大三大差别相一致的。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从根本上结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也就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一套修正主义的教育方法。毛主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同毛主席这一教导相反，奇谈怪论制造者们妄想把那些旧的方法一个个地复活过来，这不就是要复活那条“十七年”占统治地位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吗？

对“十七年”的旧教育，广大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身受其害，深恶痛绝。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紧密结合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展开了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革命大批判。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教育战线“旧貌变新颜”的深刻变化，正是在批判“十七年”旧教育

的过程中出现的。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就是“旧世界”的维护者。他们“颂古”是为了“非今”。他们要为教育战线“十七年”翻案，就是要否定整个教育革命，进而否定首先从教育领域开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想阻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革命洪流。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我们应该向这些人大喝一声：必须改正错误，赶快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教育革命大辩论是一件大好事。剥削阶级的教育延续了几千年，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至今仍象梦魇一样纠缠着一些人，使他们对彻底否定“十七年”旧教育总是有些想不通，对教育革命新生事物总是有些看不惯。这些习惯势力是不能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加以克服的。通过这场大辩论，首先是有力地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也将使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促使那些想不通和看不惯的人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更快地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实行决裂。这就会推动教育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斗争当然还是长期的，但不管斗争如何曲折，我们完全相信，只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持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无产阶级崭新的教育制度就一定会在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反对形而上学”是假　否定教育革命是真

武汉大学大批判组

1976-02-01　红旗

前一时期，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玩弄了种种骗人手法，其中之一就是打着“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号，攻击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是“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他们真是反对形而上学吗？完全是假的，他们那些奇谈怪论就是极力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标本。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否定教育革命。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全面地深刻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在文化上彻底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按照毛主席的这条路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坚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可是，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攻击我们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只讲培养工人、农民的“一面”，不讲培养干部、技术员的“一面”，有“片面性”。

关于学校应当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学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下，把广大工农兵排斥在大门之外，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高贵者、修苗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学校向工农兵开门，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毕业后又回到工农兵中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奇谈怪论者却攻击我们培养无产阶级的千百万是“片面”，而对旧学校培养少数高贵者这个目标不置一辞，这只能说明他们顽固坚持剥削阶级的偏见。

无产阶级的干部和技术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首先应当是普通劳动者。如果不能而且还不愿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还能够做好无产阶级的干部和技术员吗？把自己看作比普通劳动者高一等，这就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这正是今天要加以批判的东西。而奇谈怪论者却把做工人、农民和做干部、技术员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工人、农民就不能培养干部、技术员，因而是“不全面”。显然，他们所谓的“全面”，就是要用“干部、技术员”这一面，否定“工人、农民”那一面，就是要培养脱离群众、傲视工农、高踞于工农之上的精神贵族。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党的教育方针规定的培养目标，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在阶级社会里，学校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各个阶级总是要为自己培养政治上的接班人。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我们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战士，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作出贡献。这是对一切旧教育制度的深刻革命。它划清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根本界限，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可是，奇谈怪论者却借口不同学校有不同特点，攻击从工农中选拔学生，又回到工农中去有“片面性”，这岂不是说党的教育方针只适用于一些学校，而不适用于另一些学校吗？这同刘少奇竭力推行过的资产阶级的“两种教育制度”，同林彪鼓吹的学校要培养“五分”“尖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可见，他们攻击我们“片面”，不过是借口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否定党的教育方针，改变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校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就是专门培养干部和技术员的，没有一个毕业生去当工人、农民。这就是那些奇谈怪论者攻击我们教育革命中所缺少的“那一面”。但是，那时的情形怎样呢？有些工农子弟好

不容易上了大学，却被以种种借口赶出了学校大门；有的人则由于封、资、修思想的毒害，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反而瞧不起工人、农民。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从一九七〇年秋开始，先后招收了六届近五千名工农兵学员。他们不忘阶级的委托，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毕业分配时，他们纷纷要求当工人、农民，决心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现已毕业的二千余名工农兵学员，正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不少人既是工人、农民，又是干部、技术员，热心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称赞他们是"劳动人民的大学生，上了大学的劳动者"。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奇谈怪论者却攻击我们"片面"，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又是什么呢？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复斗争的一个基本内容，是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是抓在了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奇谈怪论者撇开这个本质方面，侈谈什么要"全面"，无非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保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由少数人垄断科学文化，恢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由此可见，我们同奇谈怪论者之争，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必须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坚持开门办学。而奇谈怪论者却攻击我们"只开门，不办学"，"不讲学文化"，是"不全面"。这是对开门办学的恶意歪曲！

毛主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开门办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转变学生的思想，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

如果不懂得阶级斗争，分不清路线是非，怎么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呢？只有通过开门办学，让学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才能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把他们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如果只讲“学文化”，不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丢掉阶级斗争这门主课，那就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奇谈怪论者口口声声强调“学文化”，却只字不提思想革命化，完全是为了搞“智育第一”、即资产阶级政治第一，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全面”。

我们坚持开门办学，把社会大课堂和学校小课堂结合起来，正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广大学生走出狭隘的学校圈子，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可以大大激发为革命而学习的热情，认真钻研业务，做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生直接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还可以学得生动、活泼，掌握在书本上学不到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知识，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试问：学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知识不叫学文化，难道象旧学校那样学习“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才算是学文化吗？我们在开门办学中，既上好了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又学到了真正的科学文化知识，这能说“不全面”吗？

事实是对奇谈怪论有力的驳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校广大师生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工厂、农村开门办学，把教育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参加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结合评论《水浒》，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师生的思想革命化，大大加速了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进程。几年来，理科师生实行厂（社）校挂钩，结合典型产品和典型任务组织教学，与工农技术人员一起开展科学研究，先后完成了二百多项科研和技术革新课题，其中一百六十九项科研成果已在有关部门应用推广，有的填补了国内某个科

技部门的空白，有的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奇谈怪论者攻击开门办学“不全面”，完全是一种不顾事实的主观臆造。

列宁说：“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那时，师生被禁锢在高楼深院，读死书，死读书，向故纸堆里讨生活，从文献夹缝里找课题，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向古人、死人、洋人顶礼膜拜，搞“纯学术”、“纯理论”式的“研究”，不少人由于受封、资、修思想的毒害，变成了书呆子、“病壳子”，有的甚至成了“修苗子”。对于这种情况，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而奇谈怪论者却念念不忘恢复摧残青年的旧学校。可见他们攻击开门办学“不全面”，就是妄图恢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继续让资产阶级在学校这块阵地上专无产阶级的政。

列宁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正是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来欺骗群众的。在培养目标上，他们既讲了培养干部、技术员“一面”，又讲了培养工人、农民“一面”，看起来很“全面”，实际上是主张培养精神贵族，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在开门办学问题上，他们诬蔑我们“只开门，不办学”，好象他们既赞成“开门”，又赞成“办学”，也很“全面”，实际上是主张关门读书，搞“智育第一”，反对开门办学，取消无产阶级政治。他们就是这样处处以“全面”、“公允”的面目出现，左一个“全面”，右一个“全面”，“一方面”，“另一方面”，攻击我们这也“片面”，那也“片面”，似乎别个无不偏激，唯独他们自己最“正确”。事实上，他们是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第二，主要次要，统帅被统帅，用形而上学的均衡论代替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他们妄图以此掩盖事物的本质，混淆路线是非，全面篡改党的教育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

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反对教育革命，并不是奇谈怪论制造者的新发明，而是刘少奇之流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故伎重演。一九五八年，广大革命师生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可是，由于刘少奇一伙把持着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他们破坏了。他们打着“纠偏”的旗号，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要培养什么“高、精、尖”人材，攻击许多革命师生走出课堂、下乡下厂是“打乱了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等等。他们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旗帜，把支流当主流，把革命的东西说成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一下子把教育战线上的许多新生事物砍掉了，把修正主义的一套货色又重新搬了出来，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历史舞台，夺回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学校面貌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涌现出大量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者又搬出刘少奇一伙曾经使用过的那一套卑劣手法，妄图扼杀这些新生事物，使学校重新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因此，一场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场大辩论，是教育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谁专谁的政的问题。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教育革命的论述，认真总结教育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力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决不允许旧的招生制度重演

物理系工农兵学员　韩兆东

1976-02-10　文史哲

在教育革命大辩论中，我们与奇谈怪论者们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坚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还是“要挑选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是毛主席关于改革招生制度的伟大指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项重大成果。这一新生事物一经产生，就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教育的阶级性质，为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奠定了基础。列宁早在《关于苏俄高等学校的招生问题》中就指出：“这里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的和实际上的特权。首先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列宁强调从工农中招收学生，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阶级路线上得到保证，才能对旧学校来一个根本的改造，使学校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是这样做的，我们今天也正在这样做。实践证明，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不仅彻底地改变了少爷小姐充斥学校的现象，而且已成功地培养出了工农兵所欢迎的知识分子，难道这不是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吗？要扭，扭到哪里去呢？过去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苏修更是一个活标本。今天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层的阶梯。他们的学校已完全成为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工具。不久前，据苏修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弟被排斥在大学之外，而城市知识分子（包括官僚阶层）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这是一个

多么鲜明的对照。奇谈怪论者们拼命反对工农兵上大学，不就是企图使苏联教育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吗！这是我们永远不能答应的。

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巩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破除了“三中心”、“三脱离”，培养出了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工农兵学员通过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一开始就成为教育革命的一支生力军，成为工人阶级牢固占领学校阵地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力量，使工人阶级在学校占了压倒的优势。他们遵照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指示，坚决支持工军宣队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农兵学员把革命教师，革命的干部看做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为改造旧大学同心同德，团结战斗。有人说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管是管自己，改是改造自己。工农兵学员理直气壮地驳斥这些无耻谰言，他们回答道：我们不仅要管自己，更重要的是要管学校，管方向，管路线；不仅要改造自己，更重要的是改造旧学校，砸烂旧教育，创建无产阶级的新教育，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话说的何等好啊！事实证明，有工农兵学员在，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一统天下就很难建立起来。

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心不离工农，身不离劳动，与工农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牢记毛主席“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导，纷纷走出学校，以社会为课堂，拜工农为师。今年上半年仅我系就在十六个厂矿企业建立教学基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学员和许多教师都下去了，这就彻底地打破了旧大学把学生关进高楼深院，大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使学生天天看着大学的名牌，日日想着高官厚禄的未来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工农兵学员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边学边用，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会做工，会种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近年来，我校文科师生，结合斗争实际，编写了十几部书，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理科师生从工农业

生产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一年来完成了一百四十多项科研项目，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任学明、刘生如等同学大学毕业回农村，不拿工资拿工分，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这样的大学生，工农兵信得过，用得上，有了这样的水平和质量接革命的班，我们的红色江山就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奇谈怪论者们说工农兵学员水平低质量差，张口过去，闭口过去，什么都是过去好，试问，这是那些认为上了大学就高于工农、贵于工农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所能比拟的吗？

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奇谈怪论者们：工农兵上大学是上定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剥夺我们上、管、改的权利。我们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用战斗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让时代的大鹏迎着火红的战旗，昂首展翅，博击长空，让蓬间雀们发出阵阵灭顶的哀鸣吧！历史将再次庄严宣告：社会主义是不可战胜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

批判“知识私有” 坚持教育革命

史新

1976-02-10 文史哲

当前，我国教育战线形势大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但是，应当看到，教育阵地几千年来一直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正如列宁所说的“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资产阶级偏见在教育界的主要表现，就是“知识私有”、“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理论至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二十六年来，在这些问题上，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几经反复，每进行一次重大改革，资产阶级总是伺机反攻倒算，力图使旧的东西复辟。最近，教育界又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说什么批判“知识私有”“智育第一”就是不讲学文化知识，开门办学就是不要学理论，工农兵上大学“质量低”，学校“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等等，企图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此，必须痛加批判。

一

毛主席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是革命的主力军，历史的创造者，因此，知识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创造的经验，至多只不过起了一个总结和概括的作用。但是，几千年来，知识一直被当

作私有财产，成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这种历史的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本来，在原始社会，并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剥削，产生了阶级，原始社会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才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恩格斯说："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可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体现了阶级的对抗。没落奴隶主代言人孟轲叫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成了商品，知识也不例外。资产阶级"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毛主席说，解放前的中国"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在旧中国知识是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私有财产，被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反动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和灵魂一道出卖给反动统治阶级，作了反动派的忠实爪牙；有些人则把知识作为商品进行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争名夺利，因而"知识私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全国解放后，反动政权已经被打倒，"所有制变更了"。被作为"私有财富"的旧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却不能象对待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工厂那样处理，既不能剥夺，也不能没收。因此，解放后，我们对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给予他们种种优厚的待遇，这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制痕迹的反映。全国解放后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费用大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本人不应当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可是有些人"知识私有"观念也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在我国，虽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经基本上变为公有制，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原有对立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处于优越的地位，反映这三大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人们还起着腐蚀作用；我们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因而在分配领域里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高，是所谓复杂劳动，有权从社会领取较多的消费品，因而生活上处于优越的地位。这些就给“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存在和泛滥，提供了客观的经济条件。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相当“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几千年剥削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私有”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上不少人的头脑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一下子变不过来。原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更是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虽然已经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厂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却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识”为资本，继续向上爬，做骑在工农头上的精神贵族。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之流也大肆贩卖“知识私有”论，教唆青年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当作个人成名成家的资本，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知识私有”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这就是“知识私有”观念赖以存在和泛滥的思想政治条件。

总之，“知识私有”观念是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形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有它赖以存在和泛滥的经济、政治条件，因此，我们应当针对“知识私有”这种传统观念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危害，无情揭露，深刻批判。现在有一种所谓批判“知识私有”就是“不讲学文化”，就是提倡“文化无用”或“知识无用”的奇谈怪论，其实，“文化无用”论是“知识私有”的反动理论受到批判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批判“知识私有”观念，决不是说“知识无用”、“技术无用”、“文化无用”。无产阶级非常需要知识，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关键问题是对知识持什么态度。

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是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还是作为个人猎取名利的资本？这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把知识看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集中表现。



二

在教育战线上，“知识私有”是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理论至上”，都是“知识私有”这条黑藤上的毒瓜。

第一、他们以“知识私有”作武器篡夺教育领导权

学校教育事业是由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专家来领导？这是关系到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能否贯彻，关系到学校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却把教育事业的领导大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他们竭力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大造舆论，胡说什么“权，不是哪一个给的，硬是要掌握本事，掌握知识的人”，“知识多就有权”，“中国最有文化的是资产阶级，包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疯狂叫嚷“要让他们坐天下”。很明显的，他们鼓吹“知识私有”，就是要让资产阶级坐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就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统治我们的学校。

因此，在教育阵地上，两个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求“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妄图把共产党赶出学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起打退了右派的进攻后，党对学校的领导有所加强，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蓬勃开展，可是不久，刘少奇一伙，又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实行反攻倒算，

他们制定了各类学校的工作条例，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教育阵地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发动了反攻，在毛主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的号令下，全国人民奋起夺回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的教育大权，粉碎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工宣队和贫下中农开进学校，开始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开创了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工农劳动群众亲自领导、管理、改造学校的新局面。但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把教育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牢固地占领下来，还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还会以知识为资本，顽强地抵制工人阶级的领导。有的人说什么：“工人阶级只能占领礼堂，不能占领课堂”；有的人还转弯抹角的提出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篡改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妄图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举反掉。这实质上是打着“热心科学”的招牌，贩卖“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黑货，其根本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重新篡夺教育领导权造舆论，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对学校的统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真正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第二、他们鼓吹“知识私有”，疯狂推行“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极力宣扬“学校就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大肆推行“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竭力引导青

年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他们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其实，教育“脱离政治”、“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目的是“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为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在一些人的眼中，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起来造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揭发和批判了“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是，它的流毒还远未根除。由于“知识私有”观念作怪，重专轻红、重业务轻政治、重科研轻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还严重存在。现在，有人散布“工农兵学员业务基础差”、“教育质量降低了”的论调，企图利用人民要把科学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恢复“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谓“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实际上，就是反对批判“智育第一”。对教育质量，不同的阶级有根本不同的看法。我们看质量首先要看学生的政治质量，即为无产阶级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要看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即使就业务学习而论，也决不能以念了多少本书为标准，更要看其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以能否死记硬背封、资、修的教条，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决不能认为刘少奇、林彪一伙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摧垮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了，“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路

线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们应当看到：只要阶级还存在，“知识私有”之类的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会在新的形式中表现出来。我们应当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第三、他们以“知识私有”作诱饵，极力引导青年走“关门读书”“个人奋斗”的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因此，教育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才能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但是，长期以来，从苏修的“全民教育”到刘少奇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都是宣扬“理论至上”，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苏修的反动教育“权威”凯洛夫胡说：“教学不是，也不可能是与科学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过程”，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刘少奇一伙也公开号召“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在刘少奇、林彪倡导的“关门读书”“个人奋斗”的办学道路指引下，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教育以教师为中心、书本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把学生禁锢在与三大革命实践相隔绝的书斋里，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这样“个人奋斗”下去，有的人就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殉葬品。

文化大革命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教育开始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实行开门办学，开始改变着“三脱离”、“三中心”的修正主义办学路线。现在有人把开门办学歪曲为“不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这完全是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道路的诬蔑。实践证明：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大学文科几年来以社会为工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紧密结合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组织

教学，推动了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的改造。理工科在开门办学过程中，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既使学生学到有用的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又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坚持无产阶级开门办学的道路，还是坚持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道路，也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那种把开门办学诬蔑为“不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要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关门办学”的老路，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

第四、他们利用“知识私有”观念，大肆兜售“读书做官”“成名成家”的黑货

毛主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导，知识应当成为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但是，刘少奇一伙大肆兜售“读书做官”“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黑货，胡说什么“只要学好一门专长，将来就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就“会有重要地位给他的。”林彪之流大肆散布“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经，采取“以官，禄，德”相“诱”的反革命策略，妄图利用“知识私有”的剥削阶级陈腐观念来腐蚀人们的灵魂，把知识当成奇货可居的商品，当作成名成家、升官发财的资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这种“读书做官论”严重地毒害了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荡涤了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使文化教育领域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革。例如招生制度的改革，贯彻执行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大学生从工农兵中来，再回到工农兵中去，对于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新部队，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深远的意义。招生制度的改革，不仅在学校中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震动，特别是震动了资产阶级，震动了旧的习惯势力。因此，有的人总是看不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总是觉得“新

的招生制度不如旧的好”。一九七三年，在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中，就曾经有过一种片面强调文化考试而忽视政治质量和实践经验的倾向发生，张铁生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坚决地抵制了教育界这股资产阶级的错误潮流。时隔两年，有人竟强调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企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高等院校招收什么人，培养什么人，直接体现了教育的阶级性质和政治方向，关系到引导青年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如果这种怪论变成现实，那就会重新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广大工农兵学员就要重新被赶出高等院校的大门，让那些所谓“尖子”去爬那个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为资产阶级培养“合格的人材”。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的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千百年来的愿望，广大工农兵学员以“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响亮口号和优异的成绩，有力地驳斥了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在工农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了的今天，那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历史，决不允许重演。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大都是经过高等院校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我们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三

一百多年前，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我们同剥削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作彻底的决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教育阵地的变革是深刻的，但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还刚刚开始，教育革命并没有搞过头。在我国教育领域里，剥削阶级搞了几千年，

修正主义搞了十七年，资产阶级的影响是相当顽固的，用马克思主义把教育阵地完全占领下来，改造过来，要经过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私有制的锁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巩固起来。但是，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因此，要彻底清除教育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必须继续完成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把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知识私有”观念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因此，要破除“知识私有”观念，必须打破这种状况，实行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

必须热情地扶植和发扬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新生事物。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宏伟纲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能文能武、亦工亦农的共产主义新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广大革命师生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厂开门办学；工农兵业余理论队伍的成长；三结合的写作组或批判组的成立，等等。所有这些新生事物，对于无产阶级占领和改造教育阵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壮成长，加速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伟大目标。

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资产阶级的势力和旧的传统观念是相当顽固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

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因此，要破除“知识私有”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无产阶级必须把上层建筑各个阵地牢固占领下来，改造过来。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大是大非必须辩论清楚——驳所谓“教育质量下降”的谬论

北京五中理论组

1976-02-26　人民日报

在教育界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中，所谓“教育质量下降”的谬论曾经喧嚣一时，诬蔑教育革命“不要智育”，“不学文化”，“不讲质量”。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妄想借此否定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扼杀教育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翻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案，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账，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一场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之争，必须辩论清楚。

我们作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见证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者，今昔对比，心情激动。我们要用切身的经历批判所谓“教育质量下降”的谬论，回击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早就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各个阶级办教育，都有本阶级的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从来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电影《决裂》中李金凤所答的“红卷”和曹仲和所判的“白卷”，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质量观的鲜明对照。质量问题总是和路线联在一起的，不从路线上看问题，质量标准便无从谈起。因此，我们与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在教育质量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水平高低之争，而是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教育质量，是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还是倒退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的原则争论。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极力吹捧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质量如何高，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它究竟是哪个阶级的高质量吧！作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重点学校

的五中，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学生中获得金银质奖章和奖状的有九十四人，可谓“高材生”了，他们的质量“高”在哪儿呢？

一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比例高，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相当于工农家庭子弟的五倍。仅此一点，重点学校为谁开门，就一清二楚了。二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乃至思想反动的比例高。三是身体有病的比例高，主要是近视眼、神经衰弱和肺结核。学生一头钻进故纸堆，整天为分数死记硬背，怎能不把身体搞垮呢？四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低。数学尖子不会视图、画图，不会测量、拉计算尺；物理尖子没见过机床，不会安保险丝；语文尖子不会搞调查，不会写通讯。如此“三高一低”的状况，当然不是学生个人的过错，而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学生一进入五中，就与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相隔绝，在四合楼里过上了书院式的生活。听到的是一片琅琅读书声和宣扬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放长线、钓大鱼”的故事，看到的是在校史展览中一张纸用铅笔、钢笔、圆珠笔写过多遍的密密麻麻的外文单词，接受的是“吃得十年寒窗苦，哪怕日后名不露”的训诫。在这种染缸里滚上六年，怎么会不变呢？

列宁曾一语道破旧教育的实质：“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究竟哪个阶级欢迎呢？一个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看到自己孩子获得奖章，欣喜若狂地说：“咱家翻身，全在你身上了。”这触目惊心的言词，不是清清楚楚地说明，这正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教育质量吗？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教育阵地“旧貌变新颜”。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学校正在被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系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教育战线开花结果，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在健康成长。

千变化万变化，最根本的一条是方向路线上的变化。现在，为革命刻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师生中已蔚然成风；从小粗知马列，已成为广大青少年的要求。他们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受到锻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大为发扬。升入中学不到一年的学生，便能有计划地学习几十篇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写出上万字的心得笔记；有的还能自觉地拟定专题，一步比一步学得深，用得好。学生无论是在学校课堂，还是在学工学农基地，都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学生入学的第一课是“文化大革命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害死人”。他们在校期间便积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拜工农为师，参加科学实验活动。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学习与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联系起来。我校七四届高二学生刘小华在学校的五年中，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学习笔记，注意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在一次水库工地劳动中，遇到了意外的塌方事故，不幸光荣牺牲。在党的阳光雨露的哺育下，刘小华虽然只活了十八个年头，但他一步一步地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他的成长是无产阶级教育质量的生动体现！

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升学率”是衡量教育质量的主要标准。为了追求升学率，学校解散了学生组织起来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砍掉了学生的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为了追求升学率，可以不顾学生死活，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复习提纲比教科书还厚，升学考试之前，几次三番搞“战前”演习，甚至猜题押宝，弄虚作假。这样做，致使高中毕业生中的各种病号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有的学生甚至累得吐血，在考场上晕倒；有的学生被逼得精神失常。看！这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

总之，“一心为了上大学”成为套在学生身上的精神枷锁。他们在中学六年所受的教育是：“考上大学成龙，考不上大学成虫”，“上不上大学是从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水岭”。因此，有人竟连考四、五次大学，“金榜”无名不死心，继续回中学旁听，准备再考。有的人简直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范进”！

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学毕业生，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仅我校近几年，就有一千三百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到东北、内蒙古、云南、山西、陕西、京郊等地插队落户，决心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他们在校期间，就到工厂、农村和部队去开门办学，边学习，边实践，为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他们还生动活泼地学到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与旧学校用“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塞满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的资产阶级智育，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

事实是这样清楚，对比是如此鲜明，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什么喋喋不休地叫嚷“教育质量下降”了呢？这也毫不奇怪。因为用资产阶级观点看问题的人，光明与黑暗是颠倒的。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按照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这一规律发展的。在革命青少年的面前，他们总是发出象“九斤老太”那样“一代不如一代”的哀叹；在新生事物面前，他们总是叫喊“今不如昔”的陈腐论调。这就使他们不能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

右倾翻案风在教育质量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实际上是他们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在教育战线上的反映。他们大喊大叫“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轻视理论是主要倾向”，妄图利用人们要把科学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推行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诬蔑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质量低了，其目的就是妄图否定教育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让资产阶级在学校重新专无产阶级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击这股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半是谤文　半是挽歌——痛斥苏修对我国教育战线大辩论的诬蔑

梁效

1976-02-27　人民日报

我国教育战线上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一场革命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深刻揭露了在教育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对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教育革命在凯歌声中正迎来又一个生气勃勃的春天。面对这样一派大好形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而克里姆林宫的一小撮叛徒则本能地感到恐惧。最近，苏修教育部的喉舌《教师报》就连载了一篇长文，叫做《中国学校的曲折道路》，对我国教育革命进行了无耻的诬蔑和恶毒的咒骂；苏修《苏维埃文化报》也就我国当前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发出了反华的叫嚣。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十九世纪欧洲封建王朝的复辟狂对当时革命的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辛辣地嘲笑这帮反动小丑说，他们诅咒革命、鼓吹复辟的谬论尽管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实际上却不过“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今天，苏修这类反革命谰言，只能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当前教育战线这场大辩论的深远意义，更加坚定我们回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一

苏修《教师报》无限惋惜和愤愤不平地说，在中国解放后所建立的“新的教育体系”，不幸被教育革命“一笔勾销”了。因此，他们气急败坏地要为它扬幡招魂。

苏修妄想在我们这里恢复的那个“教育体系”，就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体系”。对这十七年的教育体系应当怎样估价？我们的教育

要不要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这正是我们教育战线上这场大辩论首先面对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阵地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先是实行“基本照旧”，把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保护下来，不准改革；以后又照抄照搬苏联那一套，使我们的学校成为封、资、修教育的大杂烩。那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重地统治着学校，用“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知识私有”、“成名成家”等剥削阶级思想腐蚀毒害我们的青年一代，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教育阵地却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这是多么怵目惊心的事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充分表达了亿万劳动人民的心愿，也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作的历史的宣判。这样的教育制度，无产阶级当然要彻底摧毁它，岂止将它“一笔勾销”，而且要口诛笔伐，深入批判，不断地肃清它的流毒，决不允许它在中国复辟。这是我们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苏修《教师报》攻击我们的教育革命造成“学生知识水平的急剧下降”，《苏维埃文化报》则诬蔑我们实行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是“没有教育的教学”。对这类谬论，我们并不感到陌生。苏修叛徒捡起老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破旗，不过是为了借口保护“智育”，来保护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那些千方百计要给我国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的人，唱的也正是这个调子。但是，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超阶级的智育是根本没有的，对于智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本来就有截然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因此，我们和修正主义在“知识水平”问题上当然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修正主义者所不可能理解的。相反，他们所要培养的

是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而在无产阶级看来，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才是最愚蠢的。

苏修在他们的“国民教育法立法原则”中声称：“苏联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他们说什么苏联高等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是“深刻和牢固的知识”。苏修鼓吹所谓“智育第一”，似乎在他们那个“发达社会主义”的“发达”的教育制度下，只要用功读书，谁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经指出，所谓“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资产阶级法权无限扩大，阶级和等级的鸿沟日益加深，劳动人民的子女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生活条件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上学和一切社会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竞争，而只能在竞争中被排挤、被压倒。苏联新资产阶级的子女可以通过聘请家庭教师、进各种补习班等等途径，而在入学考试中获取较高的分数，更不用说贿赂官员、雇人代考和购买假文凭来骗取学历之类的无耻行径了。据苏修报刊自己透露，对新西伯利亚青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在一百个出身于农业工作人员（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当中，只有十人升了学。不仅如此，某些劳动人民子女即使上了大学，也往往因学习上遇到困难而被迫退学。仅以高尔基城为例，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中，就有四分之三以上被列为“低能学生”。大量事实说明，苏联今天的学校已越来越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所垄断，重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

鲁迅说得好，革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总是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我们把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苏修就要为它哭丧喊

冤，哀叹旧教育的灭亡，这是很自然的。苏修诋毁我们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是为了美化他们自己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维护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

二

“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这一光辉思想，是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指针，是在教育战线检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试金石。教育界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就极力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把它诬蔑为“政治冲击业务”。苏修《教师报》也拼命攻击我国的教育革命是“为了满足政治运动的需要”，“使学生脱离了系统的课程”。这些论调遥相呼应，如出一辙，都是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是多么发人深思呵！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能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正如列宁所指出：“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把旧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成为反修防修的坚强阵地。为此，“我们的学校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这就是说，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紧密结合，成为这一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在苏联曾经进行过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但是，革命的成果没有得到巩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大搞反攻倒算，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今天，苏联的教育制度在实质上已经同沙皇时代没有什么区别，所谓苏维埃的教育制度只剩下了一个外壳。在那里，“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苏修近年来吹吹打打搞了一阵所谓教育改革，不过是使苏修的教育更加赤裸裸地资产阶级化，更加适应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反革命政治的需要。例如，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苏修叛徒集团叫嚷要利用教育“从思想上保证贯彻执行苏共纲领”，规定要在课堂上讲授苏修“二十四大文件”和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等等；同时，出于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争霸世界的目的，苏联的学校充斥着法西斯军国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叫嚣。在他们的课堂上，老沙皇的忠实奴仆、野蛮的殖民主义强盗变成了苏联的“英雄”和历史的“功臣”；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公然宣称“兄弟”邻国的“村庄”，就是“我们村庄的一部分”，并把沙皇扩张领土的侵略战争描绘成“起了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苏修如此狂热地向青年一代灌输“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就是为了驱使苏联青年去充当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炮灰。试问，这样的法西斯教育，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政治，又是什么？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毛主席这一指示精辟地概括了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给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任何阶级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塑造新的一代。苏修《教师报》回避这个要害，却喋喋不休地侈谈什么“教学质量”、“系统的课程”等等，这只能暴露他们的虚伪和胆怯。实际上，在今日苏联，情况正是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统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渗透在它的一切教育活动中。工农的子女进了这样的学校，“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勃列日涅夫在苏修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上以一副投机商人的嘴脸，贩卖“知识资本化”的黑货，说什么：“提高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这些在青年时代赚来而以后又不断添加的资本，将终身为你服务”。正是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定了他们“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使学校完全变成培养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

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教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措施。千百万革命接班人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茁壮成长，必将使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正因为如此，苏修对这一新生事物恨之入骨。他们恶毒地诬蔑我们把知识青年“踢到农村”，使“青年们全部谋生计划破产”，“禁止”他们“继续学习和获得专业技能”，等等。

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苏修的谩骂，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恰恰相反，它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干得对，干得好，成绩很大。它说明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创举，影响所及，恰恰触到了苏修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痛处。

在今天的苏联，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向广大青年宣扬的所谓“全部谋生计划”，无非是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一种挣钱多、干活少的职业，一个“甜蜜的”小家庭，一座小别墅，一辆小汽车。他们借此来腐蚀青年一代的思想，使他们沉溺于追求名利和生活享受，服服帖帖地接受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

千百年来，无论中国和外国，都普遍实行着“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剥削阶级的教育制度。时至今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仍然是“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用苏修高教部长叶留金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高等院校的中心人物”，是国家“最宝贵的一部分人”。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苏联大专学校培养的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在那里，体力劳动遭人轻视，工农群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一九七三年四月，苏修一家杂志刊登过一份调查材料，其中透露：在莫斯科被询问的三千个高年级学生中，“只有三十人想

成为从事生产的工人”；“在列宁格勒，百分之八十七的高年级学生想进技术学院或研究所”。在各种社会职业中，“学生们把钢铁工人列为第二十位，车工列为第三十九位，拖拉机手列为第五十一位，而木匠被排到第六十八位”。排在最前列的五种工作，全都属于脑力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缺乏熟练工人，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成了苏联长期存在的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

苏修的教育制度是为它的政治制度服务的，也必然受它的政治制度所制约。苏修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完全操纵在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正是通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使它的成员从高等学校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以便维护和加强它的反动统治。勃列日涅夫对此供认不讳地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苏联工人阶级要同我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一道起首要作用”。据苏修另一头目透露，现在苏联所有的州委书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市委书记，绝大多数市和区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执委会主席，都是持有大学文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苏修的教育制度也是和它的经济制度密切相联系的。今天，中国知识青年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地奔赴农村和边疆，苏联农村青年却象潮水一般大量流入城市，方向道路截然相反，反映着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就俄罗斯联邦来说，农村中学毕业生留乡劳动的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部分经济区还不到百分之十。而志愿留在农村劳动的青年，只有百分之一点九至二点五，其余百分之九十二至九十四点八，全都希望上大学，却又不愿上农业大学。农业劳动之受人鄙视，莫此为甚。勃列日涅夫当政十一年多来，农业搞得凄凄惨惨。列宁说：“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现象”。今日苏联，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整个农村陷于贫困和落后的深渊。农

业越落后，农村青年越要涌向城市；农村青年越是大量外流，农业也就愈益落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这个难题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所不可能解决的。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革命宣布了苏修教育制度的死刑。所以，苏修老爷们几乎用尽了一切恶毒语言来咒骂我们，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这个现象说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同样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因此，我们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必须深入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进一步认清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的共同的反动本质，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反动腐朽的苏联教育

1976-02-29　人民日报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苏联教育领域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今天的苏联学校已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教育路线。十月革命胜利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制定了教育革命的纲领："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指出，为了"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必须"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彻底背叛了列宁的事业，在列宁的故乡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适应其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需要，他们全面复辟了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方针和制度。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了教育成为哪个阶级的专政工具。苏修叛徒集团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力推行"专家治校"的方针，把那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动权威安插在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上，使学校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而工人阶级则完全被剥夺了领导和管理学校的权利。

列宁一再强调，学校必须培养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狭隘眼界的"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整个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

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而苏修叛徒集团虽然口口声声要青年学习共产主义，但实际上向他们灌输的是一整套的资本主义思想。苏修叛徒集团篡改了列宁关于学习共产主义的内容，攻击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竭力通过学校向广大青年灌输“阶级斗争熄灭论”，掩盖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法西斯专政的真相。苏修叛徒集团别有用心地把学习共产主义歪曲为主要是掌握科学和知识，胡说什么有了技术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共青团真理报》则赤裸裸地鼓吹青年的任务就是“学习文化”，把苏联广大青年引上技术第一、追名逐利的邪路。

为了推行反动的教育路线，苏修教育界大肆鼓吹“天才论”、“智育第一”，竭力宣扬什么“特殊天资”、“先天素质”，赫鲁晓夫叫嚷要为“天才儿童”特设专门学校，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为有“特殊天才”的学生开办寄宿学校等。勃列日涅夫更是大放厥词，说什么“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重要的源泉”。苏联教育部长也鼓吹“必须把学业优秀的学生看成是高等学校的中心人物”，说他们是国家“最宝贵的一部分人”，等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竟然拾起德国法西斯的牙慧，狂热地兜售“遗传天才”的反动理论。苏修教育科学院一位通讯院士按照资产阶级的人种分类学，煞费苦心地把苏联中学生划分为六个类型，归结为两种。那些资产阶级的子女属于“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和“组织家”类型，是预先决定的具有真正天才的人；而那些农村的学生，则属于“懒惰”型，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有用的劳动者和“良好”的公民。在苏修叛徒集团看来，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是“庸才”，应当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活该当奴隶；而唯有一小撮资产阶级子女是“天才”，应当受到特殊的教育，成为当然的统治者。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为了使资产阶级的子女受到特殊的“培养”，专门开设军事、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艺术等科目的“天才学校”。从这里毕业的“天才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能升入研究班，成为高级“专家”。他们被看作是苏联学生中的“精华”，是“苏联未来的领导人”，过着“如同沙皇时代贵族一般的生活”。

十分清楚，苏修叛徒集团所鼓吹的“天才教育”完全是资产阶级货色。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利用“天才教育”对工农及其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

学校为谁开门，这是关系到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重大问题。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时代，苏联曾经实行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为他们进入学校创造了有利条件。列宁指出，在受教育方面“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的和实际上的特权”，学校首先应当“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子弟。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以来，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取消了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而冠冕堂皇地说什么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在教育上和一切社会生活方面根本不可能“平等”。在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复辟，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控制了各级领导权，占有整个社会财富。而广大工农群众则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在政治上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利，处于被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他们的子女在受教育方面怎么能同特权阶级的子女“一律平等”呢？事实上，苏联广大工农及其子女在学校里处处受到排斥和打击。连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工人只受过小学教育或更低水平的教育。广大工农子女为生活所迫，常常不得不被迫中途退学。与此同时，在“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大棒挥舞下，大批的工农子女被扣上了“智力落后”、“知识水平低”的罪名并被赶出学校大门。

广大工农子女既然连初等教育都受不满，当然更被排斥于高等学校之外。正如一家日本杂志所揭露的那样，“苏联的大学考试对各阶层的子女赋予客观的‘教育平等’的权利”，但是，“知识分子的子女几乎全都考上大学，而农民的子女几乎全都考不上”，因为“在入学考试之前家庭环境给苏联青年造成了不平等的差异”。苏修在关于新西伯利亚青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不同社会集团出身的青年在升学问题上也是不平等的。在出身于农庄和农场工人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当中，升入大学的仅占百分之十八，而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当权者）的子女中却占百分之八十二。有些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即使侥幸进入大学，也会被用种种借口“淘汰”出去，不少人因考试不及格而被迫中途退学。在乌拉尔地区，工农子弟的退学率竟达百分之四十五点七。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揭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自由、平等的虚伪性。

在今日的苏联，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级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垄断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特权阶级的子女依仗父母的政治地位、权势和金钱，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高等学校。他们不仅可以进入各种收费昂贵的“补习班”、“预备班”、雇请“家庭教师”，取得入学考试的好分数，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左道旁门”进入大学。在今天苏联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依靠权势、行贿、收买、舞弊等等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风行全国。特权阶级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塞进大学是极其普遍的事情。第比利斯市一家工厂的厂长花了一万三千卢布的巨款，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年工资的数目，买通一家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和教授，把自己的女儿送进“高等学府”。官僚、特权阶级的子女，有些即使是刑事犯罪分子，也可以依仗父母的高级社会地位，不仅逍遥法外，而且还能钻进高等学校。苏联《共青团真理报》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透露，苏修一名机器制造部部务委员兼局长曾利用职权，使其因犯强奸罪而被判刑的儿子得到“赦免”，并为他安排了工作，入了团，而且

送进高等学校。至于那些雇工代考的“商号”、假造文凭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只要得到巨额卢布，就会给有钱人的子女提供方便，使他们钻进大学或买到“文凭”。

在苏联学校中，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各类学校的教学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也有着严格的界限。广大工农子女很难进入大学，也只能在小学、中学或职业学校毕业后，从事所谓“低贱”的体力劳动。而特权阶级的子女，则可以沿着高等学校的阶梯向上爬，毕业后成为“专家”、“学者”，从事“高贵”的“领导”职务，世袭其父母的特权地位。这反映了苏联教育鲜明的阶级性。这种教育上的等级制度是由苏联社会的阶级对立决定的，是为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的。一个日本作家在分析了苏联教育方面的情况后指出，“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半仍然是知识分子，农民的子女大半仍然是农民，这种社会现象如果一代、两代、三代这样重复下去，岂不就会超越阶层而形成一种阶级吗？”

历来一切剥削者无不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办学宗旨。苏修叛徒集团同样在教育界贩卖“读书做官”的货色。高等学校成为资产阶级子女升官发财的阶梯。苏修头目公开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高等学校学生是未来的生产指挥者和组织者。

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利用学校来培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来巩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专制。

为了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苏修叛徒集团把商品交换原则推广到教育界。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四年就公开贩卖知识资本化的黑货，说什么：提高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青年们上大学，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本”。苏修的御用学者们也拼命鼓吹“求知识就是为了赢利”，要苏联青年“把自己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学习、掌握知识，完善专业经验”方面，学成“能够生产高额利钱的

贮钱匣”。在今天的苏联，把知识当成私有财产，把掌握知识做为资本积累，爬到特权阶级的一种手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文化教育界，他们不仅疯狂地摧残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而且让糜烂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到处泛滥。他们在学校里散布西方生活方式，向青年灌输“知识私有”“享乐至上”等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毒化他们的思想，腐蚀他们的灵魂。于是，一批批新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从高等学校这个修正主义温床上不断地产生出来，构成苏修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

苏修教育制度的反动、腐朽和没落，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一定会再一次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专政，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重新做文化的主人。

鼓吹“白专”道路的目的何在？

上海外语学院大批判组

1976-02-29　人民日报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制造者，几个月前到处发表演说，说什么现在“大学水平这么低”，“科研不抓，理论不提”等等。似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质量下降”，科研“冷冷清清”了。因此，他要出来“扭”。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说：“搞科研的人，允许是书呆子”，“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就要“爱护、赞扬”。看！为了“扭”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他们公然赤裸裸地鼓吹走“白专”道路。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专”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认为“专”可以脱离政治，甚至认为一个人只要“专”上一门，不管这个人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这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欺人之谈。因为，资产阶级的所谓“专”，就是给“一技之长”贴上一张资本主义的商标，大搞“知识私有”，把劳动人民创造的科学知识变为商品，为资本家服务。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教育部门疯狂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吹大学要培养什么“科学家”、“高级建设人才”等等，实际上是要培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白专”，能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呢？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院英语专业有一个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 A、B、C”。他一头栽进外国的古书堆中去，死记硬背，甚至连举止行动都模仿资产阶级的“专

家”、“权威”。这个学生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由于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整天埋头搞业务，从不过问无产阶级政治，最后发展到道德败坏，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这样的所谓“专”，又怎么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对“白专”道路已进行了多次批判。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然又拿出来宣扬，目的是很清楚的，他们就是要对抗毛主席关于“又红又专”的指示，否定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从而否定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了鼓吹“白专”，制造了种种奇谈怪论，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糟”了。事实又是怎样呢？从政治上看，现在的工农兵学员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方面，比起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要高得多。他们来自工农兵，带着阶级的委托，牢记着“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学习目的十分明确。一九七五年我院五百多名工农兵毕业生，全部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做到了东西南北中，一切听从党调动。这和旧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在分配时和党讨价还价，不服从分配的情况成了鲜明的对比。至于在业务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有人认为，过去的大学生读的是大本书、厚本书，因此教育质量高。这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前，旧外语学院把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所谓古典文学“名著”，作为主要教材，学生死记硬背，不仅谈不上具有正确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反而中毒受害，致使许多人毕业后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群众格格不入。现在的工农兵学员，由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学习生动活泼，记得住、用得上。一九七五年里，我院工农兵学员同教师一起就为有关部门翻译了四百五十万字的材料，这也是旧外语学院所不能相比的。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无视这些事实，别有用心地谈论教育质量高低，鼓吹“白专”道路，这只能证明他们是蓄意要否定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快十年了。十年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妄想用“白专”道路，使人们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宣称，要让一些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来当研究所的所长，甚至说要给所长“配书记，配后勤”。这不是把刘少奇推行过的“教授治校”、“专家治所”等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在新形势下又拿出来了吗？如果按照他们的那一套去办，学校就会重新出现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严重情况，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当前，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全国呈现“到处莺歌燕舞”，“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相信，通过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绚丽鲜花，将会在全国各地开得更加鲜艳夺目。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去悲鸣吧，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智育第一”的罪状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　李良多

1976-02-29　人民日报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叫喊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胡说“批了智育第一，变成不学文化了”。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关心科学文化的样子。但是，把装扮去掉，原来他们是“智育第一”的辩护士。

“智育第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大搞“智育第一”，这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的广大革命同志对“智育第一”实质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我们认为，“智育第一”至少有三大罪状。

其一，“智育第一”抹煞了教育的阶级性，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际上是要在学校里实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也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却极力宣扬“教育就是传授知识”的谬论。在这种论调下，旧北大提出“一切照旧”，维持解放前的整套教育制度，肆无忌惮地贩卖从孔丘、杜威和凯洛夫等人那里搬来的封、资、修黑货。他们抽掉了学校的阶级性，把学校当作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这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同毛主席关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唱反调，同党的基本路线背道而驰。

实际上，“智育第一”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口号，诬蔑工农兵及其子女“不堪造就”，用所谓“知识”、“考试”把大批工农青年

拒于学校大门之外。在“智育第一”的口号下，学校里大量地贩卖封、资、修的毒品。这难道是什么单纯传授知识吗？是什么超阶级的教育吗？“智育第一”也是“教授治校”的一个理论根据。按照他们的逻辑，学校既然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就必须由所谓“知识里手”来管理，必须由懂得资产阶级教育学、教育史的内行来领导，使学校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其二，“智育第一”反对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

所谓“智育第一”，也就是“书本知识的课堂教学第一”。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以书本、课堂、教师为中心，古人、洋人的书以及各种教科书、参考书一大堆，几十门课一齐压到学生的头上。教员关门备课，脱离学生的实际，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讲起课来满堂灌，无的放矢；学生囫囵吞枣，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学生们长年累月关在高楼深院，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不懂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只会背一些没有多少用处的东西，而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的人竟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智育第一”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扼杀了他们的革命锋芒，磨灭了他们的革命意志，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殉葬品。

要正确地制定教学过程，必须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指导。而“智育第一”却是建立在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刘少奇一伙曾经极力鼓吹“学校认识规律特殊论”，认为作为学校教育的“认识规律”，应当是“理论——实践——理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攻击和歪曲开门办学是什么“实践——实践——实践”。那么，他们到底赞成什么呢？还不是企图把“理论——实践——理论”这个反动的公式重新抬出来吗！

其三，“智育第一”把知识变成个人资本，宣扬读书做官、成名成家，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我们批判“智育第一”，并不是否定智育。无产阶级当然需要学好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但是，这种学习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这种学习必须是为革命而学，为人民服务而学，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学，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理想而学。如果取消这个政治方向，把智育放在第一位，那就必然要使知识私有和把知识当商品，引诱学生读书做官，沽名钓誉，追求个人名利。

在“智育第一”的毒害下，旧学校里大搞个人奋斗，大抓书本知识，鼓励学生做资产阶级的出人头地的“名流”。因此有的人搞“一本书主义”，有的人迷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有的人要当活字典、卡片箱，有的人钻牛角、攻冷门，拼死拼活地向那个“小宝塔”的尖上爬。结果，极少数人爬上去了，就昂首翘尾，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伸手向党和人民要这要那。如果个人欲望达不到，便垂头丧气，或满腹牢骚，甚至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道路。有的人没有爬上去，就痛不欲生。“智育第一”毒害的青年还算少吗？

事实证明，在“智育第一”的口号下所培养的学生，决不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是高踞于劳动群众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而是追名逐利的资产阶级接班人。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批判“智育第一”，诬蔑学校的教育质量下降，实质上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取消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妄图使我们的学校教育倒退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去，倒退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那里去。因此，对“智育第一”我们就是要坚决反对，彻底批判！

“知识私有”观念非批判不可

工农兵学员　张德民　梁庆寅　王义库

1976-03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最近教育界出现的奇谈怪论中，有一种说法，“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知识私有”。似乎“知识私有”是个好东西，批判不得。“知识私有”其实就是知识为资产阶级所有。这里表面是谈“知识”问题，其实是资产阶级在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总是企图在新形式下复活旧事物。对这种论调的最好回击，就是深入批判“知识私有”观念。

“知识私有”观念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在观念上的一种反映。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既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也垄断了奴隶创造的文化，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孔丘鼓吹的“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就表明了“知识私有”观念的丑恶本质。封建地主阶级也极力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等反动说教，引诱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作剥削者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成了商品，知识分子变为“资本的走卒和奴隶”，“知识私有”观念发展到最高峰。可见，“知识私有”是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它当作维护剥削制度的工具。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反动观念非批判不可。散布奇谈怪论的人在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是昭然若揭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行这两个决裂，必然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地主资产阶级凭借其在文化上暂时的优势，利用文化教育“世袭领地”同无产阶级较量。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一类，就极力兜售“知识私有”，宣扬“闭门读书”，“成名成家”，用学得的一门专长去占人民

的便宜。他们妄图鼓动人们，以一技之长为“资本”，向党讨价还价，并用这类言行腐蚀革命队伍，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把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利用资产阶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在我们的队伍中宣扬“知识私有”观念，其恶果是不可低估的。中毒太深的人就会“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恰恰就是要把学校办成培养新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

古往今来的事实说明，“知识私有”就是知识归剥削阶级所有，搞“知识私有”就是要继续让旧教育制度重新来摧残人材，摧残我们的青少年。说“知识私有”批不得的人，完全是在为资产阶级效劳。

我们说对“知识私有”观念非批判不可，还在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观念还有其存在和滋生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形式，还有私有制残余；反映旧式分工的三大差别依然存在；“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正是维持和滋生“知识私有”观念的土壤。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对于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分配方式是一个否定。但是，“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默认了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了不同等的人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的特权。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

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时间，就可以得到较多的酬劳。在这种情况下，鼓吹"知识私有"这一资产阶级思想岂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把知识看成商品！这完全是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大唱反调。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是"知识私有"观念得以生存的一个因素。知识分子由于基本上从事个体的脑力劳动，长期脱离体力劳动，因而在思想上、习惯上带有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特点，容易被"知识私有"所束缚。同时也往往曲解知识的来源，错误地认为知识是个人奋斗的成果，而忘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他们的知识是在党和人民培育下得到的，不是也不应该是私有财产。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掌握知识，完全是为了"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武器"。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叫嚷"知识多就是有权"，还胡说"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解脱体（力）劳（动）""才能想问题"，极力扩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用"物质刺激"与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诱骗和腐蚀知识分子，以扩大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因此，批判"知识私有"观念是直接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维护"知识私有"，就是要扩大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领域中专无产阶级的政，使教育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这是多么惊心动魄！但是，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要搞复辟倒退是白日做梦，我们决不答应！

"知识私有"观念在政治是反动的，在哲学上也是极其荒谬的。

在认识论上，"知识私有"观念否认人民群众是认识的主体，否认劳动群众是知识和文化的真正主人。资产阶级把知识看成纯粹个人活动的结果，自封为知识的化身，而劳动群众却要靠他们"开导"。他们编造了"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只有具有"批判"头脑的"天才"才创造一切等邪说妄语，愚弄群众。但是，这些先生们忘记了，没有那些他们所鄙视的"愚民"创造的物质生活资料，他们就根本不可能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真正的知识最先来自劳动者的直接经验。离开

这种经验，再高超的思想和论文也都是玄思幻想、一派胡言。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否认劳动群众是知识文化的真正主人，正是唯心史观的重要特征。受这种思想毒害的人，必然走上脱离工农群众的邪路。

“知识私有”观念否认实践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才能出真知并使认识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光辉思想经过革命实践，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已为我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掌握，并在教育革命中取得可喜的成就，这是主流。少数顽固坚持“知识私有”的人却把认识看成个人活动的成绩，把认识的深化看作是翻弄故纸堆的结果，完全颠倒了认识的“源”和“流”的关系。这些人一不做工，二不种田，三不了解社会，对工农的要求，对实践的要求，茫无所知，只好在烦琐考证中讨生活。如不改弦易辙，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能否离开实践面获得知识呢？不能。赵普羽一根银针打开聋哑禁区，是在自己身上扎了几百针，认真体验研究的结果；姚士昌种花生丰收，是多年餐风饮露，仔细观察，不断实践的结果。阶级斗争方面更是如此。离开阶级斗争，根本不可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同广大的实践者相比，“知识私有”论者像蛀虫一样，躲在人类文化的乳酪中，除了蚕食这丰美的糕点外，不能给人类知识增加半点新东西。

坚持“知识私有”的人根本否认了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他们把知识当作获取个人利益的敲门砖。为此，他们投机取巧，尔虞我诈。这与无产阶级伟大的认识目的水火不相容。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正确地说明世界，重要的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中国工人阶

级的光辉榜样王进喜说：“我们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手里做的，要结合起来，念了一火车书，光说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这里批评的不正包括了那些坚持“知识私有”的人吗？！

“知识私有”观念相当顽固，不会轻易从人们头脑中退走，我们必须对它进行长期的批判。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开展，资产阶级不断变换手法来拉拢腐蚀知识分子、工农兵学员和青年学生，他们忽儿说“智育第一”，忽儿又说“知识无用”，其实，都不过是“知识私有”的改头换面而已。

无产阶级不是不要知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需要真正的科学知识，需要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并希望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积极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并将努力建设自己的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但是，对待知识的资产阶级态度必须批判。这里的关键是为哪个阶级、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知识私有”观念，为革命努力掌握科学知识，为我国早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

驳“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论

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大批判组

1976-03-01　红旗

“白专”道路是受到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多次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货色。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又把它端了出来，大加赞扬，极力提倡，还制造了一条“理由”，说什么“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真是奇谈怪论！

白专道路意味着什么？这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是很清楚的。“白”是“红”的对立面，是代表反动派、代表资产阶级的，正如“白军”、“白区”、“白色恐怖”，是为了对抗红军、红区，镇压革命而存在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那样喜欢“白”，这难道不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他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吗？“白专”就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为资产阶级钻研业务，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因此，白专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这样一条道路，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却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这清楚地说明，他是明目张胆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劲”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猖狂程度。还在走的走资派岂但在走，简直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使劲跑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与各种专业间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各行各业，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毛主席从来要求我们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幌子，要人们去埋头搞科研，埋头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让教育、科研走上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邪道。这是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顽固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明显例证。

“白专”决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而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严重的危害。这对于亲身经历并深受“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人来说，是记忆犹新的。

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有的人走上了白专道路。他们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埋头钻业务，关门死读书。虽然读书几十本，论文写了几十篇，但实践用不上，生产不沾边。拿我系河口海岸研究室来说，以前颇有几个成天写书、写论文的人，但他们所研究的尽是一些所谓专家出的对实际毫无意义的题目，而对国家需要研究的围垦土地、改良港口等实际问题却不感兴趣。这难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吗？

一些走上白专道路的人，为了个人名利，为了论文一鸣惊人，不择一切手段地垄断资料，伪造数据，对他人“保密”、“封锁”，这就不能不影响科研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呢？

照着修正主义路线走白专道路的人，平时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但头脑里浸透着资产阶级政治。他们是一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一旦个人的名利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发展下去，遇到适当的气侯和土壤，就会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我们地理系就有不少所谓“拔尖”的“好学生”，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试问：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有什么好处？

修正主义路线鼓吹白专道路，是要广大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把学校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大批走白专道路的大学毕业生，以高官厚禄为钓饵，让他们掌握各级领导权，要他们为社会帝国主义服务。这些所谓专家实际上是社会帝国主义搞扩军备战、制造杀人武器、镇压人民群众、掠夺第三世界的工具，这就是白专道路的最后结果。

问题很清楚，如果说“白专”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只能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一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有好处。他们走苏修的老路，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热心提倡白专道路，培添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提倡“白专”，实际上就是打着白旗反对红旗，组织“白军”攻打“红军”，发展“白区”围剿“红区”，最后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使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只能走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的道路。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教育革命的迅猛发展，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阵地，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开门办学，开门搞科研，为我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创造了条件。以我们地理系为例，几年来，革命师生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把书本知识、科研任务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为金山的围垦，陈山码头的选址，连云港港区的扩建，为黄山茶林场新建公路的勘测和中小型水库的勘测与设施，为长江口航道的研究，崇明岛的港口建设规划以及上海市郊区农田水利规划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广大革命师生不怕烈日严寒，不怕风急浪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坚韧不拔地战斗在荒山原野、河口海岸，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受到有关部门和工农群众的热情赞扬。事实证明，只有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引导学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才能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才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如果按修正主义路线办学，走白专道路，即使学的知识再多，也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又有什么用呢？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想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全部否定，重新拉我们走白专道路，这是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决不能允许的。

我们反对“白专”，决不是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污蔑的那样，“不学文化”，“不敢讲专”。我们批判“白专”，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的专，坚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社会主义钻研业务，学习文化。我们的工农兵学员肩负无产阶级的阶级重任来到学校，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并刻苦认真地学习文化，学习专业。他们走出校门能很好地胜任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红专”还是“白专”，这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这个问题所以值得展开辩论，就是因为它剥去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伪装，直截了当地说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同这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把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沿着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方向，引导工农兵学员坚定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为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开门办学不容否定

西安医学院大批判组

1976-03-01 红旗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别有用心地攻击开门办学使教育质量降低了，是“实践——实践——实践”、“不要理论”，使教师“无所适从”了，等等。他们攻击开门办学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妄图在教育阵地上恢复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状况，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西安医学院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六·二六指示》，面向农村，开门办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教育革命使教育质量不断提高，这是事实。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事实面前不能不遭到可耻的失败。以我们学校来说，旧医学院学制六年，现在工农兵学员只学三年，但学三年比学六年的质量还要高。就从学生的业务水平看吧。旧医学院的学生，“一年不沾医学边，三年不沾临床边，六年不沾工农边”，书读得不少，但如何应用却懂得不多。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那时侯刚刚毕业的学生，不讲全体，也不说极个别的，可以说相当一个多数是“说起来一套一套，见了病人冷汗直冒”。直到毕业以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才逐步学会防病治病。现在我们实行开门办学，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下乡参加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实践活动，使得书本知识与医疗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学生开始学得比较完全的知识。现在二年级的学员一般都能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痔、瘘、阑、疝等外科手术，诊治部分常见疾病；三年毕业后就能独立工作，不仅可以初步运用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治常见病多发病，而且有的能在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独立完成象脑脊膜膨出切除这样一些难度较大的外科手术。这样前后一对比，哪种质量高，哪种质量低，不就很清楚了吗？

然而，讲质量，政治质量是更重要的。对医学院的学生来说，如果认为不管政治上表现如何，不管为谁服务，只要会看病就是“高质量”，那是道道地地的修正主义观点。医学院培养的学生能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愿不愿意为广大工农兵看病，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旧医学院培养的学生，有的人“技术学到手，人被资产阶级夺走”；有的人“拿了针头，忘了锄头”，向往大城市、大医院，不愿为工农兵服务，想当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看，这种教育还有什么质量可谈呢？要使学生真正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应该使他们在学习期间就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火热的实际斗争生活，学工、学农、学军，这就必须开门办学。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带领师生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正是为了首先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农兵学员的思想觉悟不断得到提高，对旧社会、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更加仇恨，对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理解得更深刻。大家都表示，不能做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而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他们为了让病人少受痛苦，在自己身上互相练习打针、扎针；有的学员听说蜂蜇能治面神经麻痹，就在自己身上作试验；有的学员为了抢救重危病人，摸黑走几十里路去取药，没有血库就献出自己的鲜血。毕业时，不少学员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这是那些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可以比拟的吗？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开门办学，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使学生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锤炼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而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医疗技术就可以发挥得更好。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我

们遇到过一位患腮腺混合瘤的贫农老大娘。文化大革命以前，她的病也经医生治过，因为医生治疗不认真，没有治好。我们师生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克服了种种技术上的困难，终于为她摘除了肿瘤。这说明，医生对病人的思想感情不同，医疗结果就不一样。只有具备了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医疗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在为人民除害灭病的斗争中做出较大的贡献。培养这种又红又专的工农兵学员，才真正称得上是无产阶级的高质量。

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不要理论”吗？比起旧学校，开门办学后实践的确多了，但这有什么不好呢？“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认识客观世界、取得比较完全知识的途径，从根本上说，教学也必须遵循这一途径。正是由于开门办学比过去重视了实践，所以才打破了过去“理论——实践——理论”的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教学体系。但是，开门办学重视实践决不是说不要理论，而只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理论和实践统一。毛主席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学习理论完全脱离实践，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是不能学好的。如药理学这门基础理论课，过去在教室里讲很长的时间，但一进入临床，往往不会用药，也忘了“理”。开门办学后，我们结合工农兵学员防治疾病的实践去讲这门课。学员边学理论，边实践，理解得深，学了能够应用，使医学基础理论从书本中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了。又如，临床理论课，我们结合典型病例进行教学。有一个医教队，遇到一位大医院诊断不清的贫血患儿，学员们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调查研究入手，翻阅了很多资料，正确诊断为自家免疫性贫血，治愈了患儿。然后师生一起进行总结，由教师进行讲解，从个别到一般，使学员不但对自家免疫性贫血认识得比较深刻，而且对各种贫血的特点、发病原因、鉴别诊断要点及防治办法，都得到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这样联系实际进行理论教学，改变了死记硬背书本的状况，学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

比较完全的知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看我们结合实际学理论，就大喊什么“不要理论”了，这只能证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窍不通。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医学书本上的理论，是前人的经验总结，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有的地方会出现不符合实际的情况。通过开门办学，师生在医疗实践中可以纠正这些地方。如，过去的书本规定，血色素低于百分之六十五时，不能作胆总管囊肿空肠吻合这样一类大型手术。在农村开门办学中，我们遇到一位患胆总管囊肿的病人，血色素仅百分之三十，但不立即动手术，病人可能有生命危险。为了抢救病人，我们在作了各种科学分析及准备后，给患者做了手术，获得了成功，类似这样的事例，曾不只一次地遇到。事实说明：开门办学，不断解决实际生活向医学提出的新问题，可以获得对疾病的新认识，积累同疾病作斗争的新经验，可以使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完善。这根本不是“不要理论”，而是使学生学到更加科学的理论。

任何理论都要么？也不是。我们确实“压”了一些理论。旧医学理论大半是照抄外国的，整个医学体系和教学体系都深深打着剥削阶级的烙印。旧医学院课程门类繁多，内容陈腐，三十多门课程中，每门又自成体系。医学基础课非常烦琐，从细菌鞭毛的染色方法到蚊子翅膀的脉络走向，从保持健康应当食用多少水果、牛奶、鸡蛋到鱼的新鲜与否的鉴别方法，甚至与医学不沾边的文昌鱼的解剖结构，也成了医学理论的一部分。旧的医学教材塞进了不少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垃圾，如把医学理论的产生归功于几个天才等等。开门办学，把这些东西拿到实际生活中去一检验，就看出它们是一些学了无用的东西。对于这些充塞在旧医学中的陈腐的理论，我们不仅压了，而且还要不断地压，直到把它压个干净。因为不把它压下去，它就会替资产阶级来压垮我们的青年一代。如果因此骂我们

是“不要理论”，那就正好暴露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维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嘴脸。

开门办学给教师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借题发挥，说什么教师“无所适从”，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必须看到，大多数教师是从旧学校出来的，本身受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教育，许多人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虽然有了一些书本知识，但有的理论脱离实际，如基础医学理论课教师不会看病；有的离开了现代化医疗设备就束手无策，不会在农村现有条件下防病治病，开展教学工作；分工过细，西医不懂中医，治眼的不会治牙等等。过去，他们年复一年地照着旧的一套向学生灌输。如果不改变教师的这种状况，要培养工农兵需要的学生是不可能的。“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开门办学，对于广大教师来说，就是要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以“适从”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适从”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在开门办学中，广大教师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刻苦改造世界观，思想进步很快，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人在业务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院教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二十多种新教材，使之适应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需要，基础理论课教师都分期到临床各科学习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绝大部分临床课教师都参加了中医学习班，初步学到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许多教师积极参加农村卫生革命，向赤脚医生学习，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践使教师打破狭隘分工，由专一到兼二兼三，向一专多能发展，锻炼自己在农村条件下独立开展医疗和教学工作的本领。很多事实证明，开门办学正是使教师对于教育革命由不“适从”到“适从”的途径。广大教师通过开门办学，更适应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们心情舒畅，感到在自己的岗位上大有可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借这个问题作文章，妄图挑拨革命教师来反对开门办学，只能是枉费心机。

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我们深深地感到，实行开门办学，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资产阶级顽强的抵抗。我们正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了教育革命的节节胜利。前一个时期，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兴风作浪，刮起了右倾翻案风，企图否定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我们决心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粉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猖狂进攻，继续坚持开门办学，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梁效

1976-03-15　人民日报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哪些问题上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

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代表资产阶级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妄图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教育阵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搏斗的一条重要战线，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首先要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他们抛出了连篇累牍的奇谈怪论，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让我们看看这是些什么货色吧。

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形势？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大学水平还不如过去的中技高”，“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咒骂现在“教育战线形而上学很猖狂”，简直是一团糟，必须由他们出来“扭”转局面，进行纠“偏”。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怎么估计？他们说那可是个宝贝，“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为它翻案。

学校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什么，要培养什么人？他们公然不让提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准批判“智育第一”、“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什么“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要爱护、赞扬”。在他们看来，上了大学，就

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他们要把学校重新变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对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持什么态度？他们横加指责，竭力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说“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攻击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诬蔑开门办学是“只当劳动力”，反对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方向和道路，否定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一句话，对这些新生事物一概反对，必欲扼杀而后快。

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究竟怎么估计？他们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作的科学分析已经过时，反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工农兵的关系，妄图要知识分子走回头路。

学校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他们攻击这几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不行，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妄图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让资产阶级重新夺走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他们否认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再鼓吹“这几年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妄图用“业务台风”刮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教育战线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任务。

把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加以分析，就清楚地看出，贯串其中的是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就是要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为了弄清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质，我们必须对这些奇谈怪论深入地进行分析批判。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为反对教育革命制造舆论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把剥削阶级世代把持的教育阵地搅了个“天地翻覆”。在这场大革命中，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教育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来还没有这样的事情：创造世界历史的无产者，第一次用自己长满厚茧的粗壮的双手，把握了培养青年一代的航向。学校为工农敞开了大门。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血肉相连。一批批大中学校的毕业学生，满怀革命的豪情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人民需要的战斗岗位上去，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幅多么振奋人心的情景！“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教育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文化大革命前教育阵地的状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于这种大好形势，亿万工农兵和革命师生欢欣鼓舞，而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把它攻击得一无是处。什么“降低了教育质量”呀，“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呀，他们难道真的在关心教育质量吗？就以农科大学为例，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学生，虽然读了不少书本，但是学农不务农，学农不爱农。现在朝阳农学院等院校培养的学生，学了能扎根农村，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同广大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作出了优异成绩。对此，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说水平低。可见，他们满口的“文化”，“质量”，都不过是否定教育革命的借口罢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工人阶级占领了学校，开始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有力地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工农兵学员肩负着阶级重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无产阶级在教育战线的一支生力军；开门办学使师生和学校各项工作时时处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监督和关怀之下，大大增

强了无产阶级改造教育阵地的力量；广大教师队伍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农兵群众的再教育下，增强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校体制，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正在深刻地改造。教育阵地上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巨大变化。这就是今天教育战线“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的本质所在，也是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那么加以仇视的原因。

把革命形势描绘成一团漆黑，是反动派历来否定革命的一种手法。孔老二攻击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的革命形势是“天下无道”，彭德怀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得不偿失”。一九六一年前后，刘少奇一伙对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时，也疯狂叫嚷这是“乱、糟、偏”，“降低了教育质量”。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拣起这个破烂武器，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然而，螳臂岂能当车，实见其不自量而已。

对十七年的教育怎么估计，实质是对旧学校要不要根本改造的问题

问题还是出在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的教育如何估计上。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已不再公开说国民党办的学校不要改造了。他们说，十七年的学校都是好的，是已经改造了的社会主义学校，它培养出许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怎么能否定和批判呢？

这是欺人的谎言！

解放后，我们从旧社会接收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办的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有没有变化？从形式上看，是变了，我们派了一些人去领导学校，学生成分和课程内容也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学校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一伙党内走资派和他们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一贯重视教育领域的革命，解放初期就提出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之后，毛主席又进一步为我们规定了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提出了“教育要革命”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用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旧学校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但是刘少奇一伙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提出了一条教育“应按过去办法，基本照旧，加以若干改良”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说，在不触动国民党教育制度的根本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修正主义的内容，把我国的教育变成封、资、修的混合物。在刘少奇一伙的把持下，这条黑线在教育界统治达十七年之久。他们把教育大权拱手奉送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资产阶级的党阀和学阀的联合专政。他们让少数资产阶级“权威”垄断学术讲坛，肆无忌惮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毒害青年。他们在文学艺术中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哲学中宣扬唯心论、合二而一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历史学中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和让步政策论，自然科学中鼓吹“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和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动的孔孟之道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校中到处泛滥，构成了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的思想支柱。

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学校不是为无产阶级而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它用“智育第一”、“知识私有”、“成名成家”、“读书做官”等种种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引诱他们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即令是工农子弟，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也有一些人程度不等地丧失了原有的阶级感情，逐步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被资产阶级奴化。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有力控诉，是十七年旧学校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铁证。

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好的，有的还有所发明创造。但这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什么功劳。每个有切身体会的人都很明白，他们之所以能为社会主义做出一些贡献，正是由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批判旧教育所给予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结果；是离开旧学校以后，在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重新学习的结果。越是革命向前进，就越感到改造世界观的必要，就越加痛恨旧教育的毒害，这正是受过旧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如此猖狂地要倒退，要复辟，清楚地说明走资派还在走。这种现象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什么那么仇视教育革命，肆意攻击大好形势？为什么那么美化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它翻案？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今天在教育这块阵地上，无产阶级开始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学校正在被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要害还是一个谁专谁的政、学校为哪个阶级的政治服务的问题。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都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两千多年前孔老二办私学，就是为了宣扬“克己复礼”，培养维护和复辟奴隶主专政的门徒。资产阶级办教育，是为了替资产阶级培养各种统治人才和训练恭顺的奴仆。从来没有不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学校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个问题上，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答案吗？

无产阶级担负着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旧世界的任务，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就必须靠许多代人坚持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办到。要改造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改造人，培养人，因为世界正是靠人来改造的。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占领教育这块阵地，作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用它来宣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培养一代又一代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列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工具，教育革命是一个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实践证明，教育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关系极大。苏联由于没有坚持列宁的教育革命路线，学校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学校培养他们的接班人，这些人可以通过学校这个阶梯，进入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包括政府的各个部门掌权，使红旗落地，国家改变颜色。这个教训是无产阶级必须深刻记取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任务出发，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个教育方针，全面深刻地体现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进一步阐明了学校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作用。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攻击我们没有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似乎他们最“全面”。这不过是用一种折中主义的诡辩手法来骗人。他们篡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把有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要地位，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把“有文化”这一点变成主要的东西，大肆鼓吹“智育第一”。

搞“智育第一”，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他们说，“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一’”。但是请问，“智育”什么时候“第一”过呢？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智育，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智育。所谓“智育第一”，不过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抹煞教育的阶级性，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一个手段罢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然鼓吹“白专”道路，就道出了他们宣扬“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实质。

他们攻击无产阶级的教育“不讲学文化”，无非是说现在学生读的书本不如旧学校多。在他们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对旧学校进行批判改造，开门办学，联系实际地学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用的文化科学知识，都不算学文化，而叫做“苛捐杂税”和“不务正业”。这就说明他们主张学的“文化”，正如列宁早已揭露过的那样，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是浸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毒汁的文化。

他们认为大学的任务只能是培养干部、科学家，说什么现在大学“就是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公然反对批判“读书做官”，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这就暴露了他们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和三大差别的真面目，说明他们要培养的所谓“干部”、“科学家”，正是那种以知识为资本，凌驾于工农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看不起劳动人民，自以为高人一等，其实是最蠢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被他们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就是他们在名为“全面贯彻”，实质是全面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的口号下所制定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很清楚，他们要办的学校，正是不折不扣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我们进行教育革命和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离开了它来谈什么教育，就必然要迷失方向，走到修正主义的斜路上去。“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的这一指示，用最简洁、鲜明和准确的语言，概括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阐明了我们学校的根本性质。承认不承认列宁的这个论断，是教育战线上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试金石。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鼓吹者公然不让提列宁的这一论断，说明他们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

一场群众性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正在全国蓬勃展开。不坚决回击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的猖狂进攻，教育革命就不能前进。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还会利用教育这个阵地，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教育这块阵地，无产阶级要占领它，把它完全改造过来，是不容易的，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把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直到完全的胜利。

右倾翻案风要把教育革命“扭”向哪里？

北京师范大学　岩松

1976-03-26　人民日报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说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一’”，如果“批了智育第一”，就会“变成不学文化了，那就危险了”。他们为什么要把“智育第一”当成一条动不得、批不得的永恒的教育原则？他们为什么如此醉心于“智育第一”？让我们对照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推行“智育第一”所造成的恶果，来看一看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的险恶用心吧。

学校大门向谁开，是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大问题。苏联在列宁领导的年代里，工农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一九一八年，列宁就指出：在教育方面“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的和实际上的特权。首先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根据列宁的指示，苏维埃政府取消了入学考试和入学资格的限制，使大批工农分子进入高等学校。但是，早已背叛了列宁的苏修叛徒集团，却鼓吹“知识是最高的仲裁者”。《真理报》还为此发表题为《高考的新裁判者——知识》和《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等社论和文章。苏修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公然说什么“学府为有才华的人洞开”。他们在助学金条例中明文规定：考试分数是评定助学金的标准。他们一方面露骨地说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了“惊人的淘汰率”，把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另一方面，这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依仗特权和资本，通过私聘家庭教师，上“补习班”以至买考试小抄等办法，让其子女取得“好分数”，进入高等学府。据统计，新西伯利亚农业工作人员家庭的子女能升入高等学校的只占百分之十几。进入高校的工农子女，也因

为经济困难，有的经常外出做零工，甚至有的去医院卖血。不少人因为考试分数不好，被诬为“智力落后”而被赶出校门。

苏修教育中这种严酷的现实，彻底戳穿了“智育第一”的阶级实质。所谓“智育第一”，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突出表现之一。它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对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一种手段。而今天，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后，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又攻击工农兵大学生“水平低”，说什么“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公然鼓吹“智育第一”，妄图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

苏修叛徒集团竭力推行“智育第一”的目的，就是要驱使青年学生走“读书做官”的邪路，把他们培养成鄙视劳动、鄙视工农的精神贵族。勃列日涅夫就曾公开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事实也正是这样，现在把持着苏修各级党政大权的人物，很多是从这种修正主义统治的学校中毕业出来的所谓“最优质的、最有知识素养和最能干的红色专家”。就拿教育界来说吧。现在的苏修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长，他们既是苏修中央委员，又具有院士、教授的称号，是所谓的“专家”、“学者”。在一般高等学校执掌大权的校长、院长，如果不是教授、博士之类的人物就不能担任，就连教研室主任也必须由“具有教授学衔或博士学位的人”来担任。这些都非常清楚地表明，苏修叛徒集团之所以把“智育第一”作为选择教育部门领导人的标准，其目的就是要让那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披着专家、学者、教授外衣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控制教育阵地，为巩固其修正主义的统治服务。

看看苏修教育界的现状，回想一下我国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带来的恶果，我们就不难看出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批判“智育第一”的居心。他们所谓“关心”教育质量、“关心”四个现代化是假，要把教育界“扭”回到文

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是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我们决不能答应的。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否认“知识私有”的存在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赵洪洲

1976-04-18　物理

去年夏季前后，教育界和科技界出现一股右倾翻案妖风。奇谈怪论之一，就是否定“知识私有”的存在。说什么“谁见知识私有是方的还是圆的”啦。什么“社会主义都是公家的人，干活为国家，还分什么私有、公有的”啦！等等。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知识私有”？社会主义还有没有“知识私有”？它在资产阶级法权中起什么作用？到底应不应该限制它？这些都是当前革命大辩论中的重要课题：它涉及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大事。因此，必须弄清楚。否则，我们将会在理论和实践上，犯极大的错误，混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界限。

（一）

马克思认为：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①随着阶级的产生，随着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分工的出现，在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旁，必然伴随着精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在阶级社会里，文化、知识和技术，作为精神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一直把持在统治阶级手里。并且造成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知识私有”形态。

“古者学在官府”，说的是奴隶制社会的“知识私有”。官府垄断和王族世袭，构成奴隶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社会精神生产资料的最野蛮、最直接的阶级占有。

封建社会，除了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通过国家机器）对精神资料的阶级占有外，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精神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它是封建经济的必然产物。所谓“家藏万卷书，能生千担粮”。就是封建社会“知识私有”的写照。古

人讲，“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它生动地刻划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何通过“知识私有”和“科举取士”制度，达到“读书做官”的目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人上升为资本家和政府要人。绝大多数人，由于资本的力量，被迫沦为“自由的”精神劳动力，一个只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脑力劳动者。

恩格斯指出：“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③。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便出现一种特殊的私有制形态，即我们通常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见到的所谓“现代知识私有”。它既不同于奴隶制出现的“官府垄断”，也不同于封建时代的“个体私有”。它是把知识当作精神生产中的“特殊工具”（如供抽象思维的数学知识），为知识分子本人所独占。这种私有的知识，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等价交换中“有学识劳动力的较高价格”，变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私有财产。这种私有的知识，由于实现自己的价格，通常要物化成精神产品，上升为精神生产资料。或者被资本家阶级占有，或者被资产阶级个人占有。因此，“现代知识私有”，仍然属于精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

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谁有了知识和技能，谁就能得到“有学识劳动力的较高价格”（如资本家付与知识分子较高工资）。谁有了知识和技能，谁就有了复杂劳动的能力，就可以把业余的精神产品，换成“专利”和“版权”。谁有了知识和技能，谁就可以身穿白领，“高人一等”，趾高气扬起来。因此，“现代知识私有”，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享有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别证书”，变成了知识分子中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直接根源。直到社会主义社会，这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仍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私有”形态，不再表

现为“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而是“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的“比较大的价值”④罢了。

“知识私有”，不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管是“阶级占有”形式，还是“个人占有”形式，本质都是一样的。都属于精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都是少数人不合理地占有了应当属于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它是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反映，也是物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是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分工以来，社会上出现的特殊的历史现象。所谓知识私有观念，乃是这种社会现象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消灭，“知识私有”现象，也是不会消灭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知识私有”现象，这是不言而喻的。那种矢口否认“知识私有”存在的论调，不但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而且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因而完全是错误的。

（二）

事实上，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精神资料的个体私有制和个体精神劳动方式，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农村里的祖传仕医，城市中的旧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技艺之人。他们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或者著书立说，写诗撰文；或者行医销药，操琴卖唱。他们往往脱离组织，脱离集体，脱离物质生产劳动。靠版权、稿酬等方式，谋得生计。当时，广泛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说，如实地反映出我国解放初期“知识私有”的客观存在。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精神资料的个体私有制，基本上随着物质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的取消而取消。但是，个体私有制的残余还存在。尤其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勾结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他们盘根错节，结党营私，把应当属于全社会所有的那部分精神生产资料，实际上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并且通过“三名”、“三高”、“科学奖金”和“国际稿酬”等方式，不但领取巨额工资，而且还获得大量货币，成为社会上一小批特殊人物。他们这些人，把知识看成自己的财产。待价而沽，没有高价，就不出卖。“知识私有”，成了他们占有大量货币的手段。成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得力工具。直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才得以结束。铁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所谓“社会主义都是公家的人啦，还分什么公有和私有”的谬论。

（三）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私有”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以后，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肆意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尤其近年来，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公开提出，“国家主要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取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这就使“知识私有”现象，如同大河决堤一样泛滥起来。同时“读书做官”的封建特权也在苏联借尸还魂。私聘家授，买卖文凭，弄虚作假，学阀横行。知识重新商品化，精神劳动力重新商品化。就连苏修报刊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把智力职业搞得更易于世袭知识分子所行走”。

通过“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的道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批大批地从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成为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除了拿到高于工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工资，还利用职业特权，牟取大量的花样繁

多的学术酬金，形成了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苏修叛徒集团所豢养的一小撮反动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封、资、修兼蓄，集反动之大成的社会寄生虫。是“知识私有”这种毒菌，在资本主义回光返照中，孳生的一批特殊生物。历史注定了他们短命的厄运。

苏联的教训，完全证实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说过的一段话：“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这种事情用一般的公式和抽象的对比来谈是很容易的，可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并不马上灭亡，而且它愈接近死亡，就愈加疯狂地进行反抗），这却是一个最吃力的任务。”⑤

列宁的话不仅向我们指出，限制“知识私有”这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根本问题在于如何把资本主义积累的人类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一步一步地由资本主义工具变成社会主义工具，由“资本主义占有”变成“社会主义占有”（或者说，由“私有”变成“公有”）。而且还明确地告诉我们，限制“知识私有”这件事情，是“一件最吃力的任务”。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在它接近死亡的时候，必然进行拼死的反抗。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所以如此反对批判“知识私有”，正说明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拼死的斗争。

（四）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可以没收资本家阶级的财产，并不能没收他们头脑里的知识和技能。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的专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⑥。资产阶级也会利用“知识私有”这部分资产阶级法权，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方面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只满足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而忘记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那么，

资产阶级必然会凭借自己在知识方面的优势，并且通过钻进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名义上)，继续对社会的精神生产资料，实行“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占有”。从而使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根本无法问津。他们把持教育大权，统治无产阶级的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培养勃列日涅夫那样的大学生。让一切牛鬼蛇神出笼，塞满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义、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实际上，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完全可以专无产阶级的政。由此可见，“知识私有”的泛滥，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精神方式的复辟。意味着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领域对无产阶级专政。因而“知识私有”的泛滥，也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社会矛盾。而这个矛盾，又往往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所激化。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社会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带有过渡时期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分工，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利用它。但是另一方面，由此而来的“知识私有”这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如果弄得不好，不仅两种劳动之间，可能重新发生对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决不可以为，经过一两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私有”问题就解决了。

毛主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⑦

目前，在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公有，还是私有？知识分子所学的知识，究竟为无产阶级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比，到底应不应该“高人一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知识私有观念和两种劳动之间的等级观念问题，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问题。有的人把从国家图书馆和实验室得到的资料、数据垄断起来，以求成名成家。有的人把属于全民所有的贵重仪表变为小集体所有，实则扩大了的私有财产，等等。由于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要真正地克服它，那才是最难、而又最吃力的任务呵！

我们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所谓“知识私有”问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区区小事”。也不是“一天早上就可以打扫干净的东西”。而是象列宁讲的那样，关系到把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工具变成社会主义工具，由资本主义占有变成社会主义占有的大事。在整个过渡时期，它始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在知识界的反映，也是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忘记了这一点，就忘记了阶级斗争。否认这一点，也就否认了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就会滑进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泥沼里。

（五）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说：“批判‘知识私有’过头了，现在变成‘知识无用’啦！”这真是奇谈怪论！！

前些时候，社会上确实出现过“知识无用”现象，但是那决不是批判“知识私有”过了头的缘故。而是“知识私有”的变种。说明围绕在“知识私有”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仍然相当激烈。

“知识无用”现象，为什么不出现在解放初期？为什么不出现在 1962 年？而偏偏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呢？显然，过去，知识（对

某些人来说），不是“无用”，而是“万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文化大革命，取消了“三名”、“三高”、“科学奖金”等制度，限制了“知识私有”这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这就铲除了某些人“为一万元稿费而奋斗”的经济基础。他们怎么能不觉得“知识无用”呢？原来，所谓“无用”，就无用在不能给某些人带来更多的货币。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至于无产阶级，他们从来没有觉得知识无用过。“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有价值的成就。相反，它正是把人类思想和文化两千年来的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接过来，并加以改造。”⑧（注意！这里是批判的继承。）无产阶级反对“知识私有”，并不是排斥一切（对无产阶级有用的）科学知识，更不是排斥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反对的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正象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并不反对大工业技术基础一样。无产阶级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明白，正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害得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并且祖祖辈辈被人愚弄。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当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懂得了知识是他们求得解放的斗争工具”⑨时，还有谁能象他们那样，对科学知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呢？正因如此，他们比谁都更加了解列宁所讲的，要把知识由私有变成公有的伟大意义。并且下最大的气力，批判“知识私有”，努力完成“知识公有”的历史任务。

“知识无用”论，同无产阶级利益，从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说穿了），它不过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散布的反动谬论。其目的就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知识私有”。所谓“知识无用”，象“知识万能”一样，都是“知识私有”的变种，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知识界的具体表现，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里的反映。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因为“知识私有”改

换了自己的形态，就放弃对它的批判。任何放弃对“知识私有”的批判，都意味着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向资产阶级投降。那些搞右倾翻案的人，正是在“知识私有”问题上，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背叛了党的基本路线，变成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积极鼓吹者。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国内外的大好形势，防修反修的伟大任务，“两步设想”的宏伟计划，给我国知识分子展现出无限光辉的未来。我们有什么理由让“知识私有”这种有害的政治微生物，侵蚀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呢？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其中包括现在正在开展的教育革命，对于限制“知识私有”这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进而完成列宁所说的那种“最吃力的任务”，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是一项最有力的战略措施。让我们举起双手，欢呼新生事物的成长吧！让我们团结起来，在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上，奋勇前进！

①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52.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27.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3），199.

④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3），199.

⑤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572.

⑥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571.

⑦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6），352.

⑧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6），292.

⑨列宁，《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66），357.

⑩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

“让位”与篡权

范柏

1976-04-26　人民日报

在今日苏联，出现了这样一场拙劣的争论：莫斯科一个所谓“评论家”扎别林在他所著的《人和人类》一书中公然胡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是为了在历史舞台上让位给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成为革命的阶级了”。扎别林的书一问世，苏修另一个御用文人麦德尼科夫就在苏修《十月》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扎别林的观点进行所谓“批判”，指责扎别林“将自己的评论和西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言论搅在一起了。”也许扎别林的观点事关重大，勃列日涅夫也亲自出马，出来说话，他胡诌什么：“在生产和科学技术”中，“苏联工人阶级要同我国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一道起到首要”的领导作用，等等。

一个要工人阶级“让位”，另一个出来似是而非的“指责”，而苏修头目又要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一道”来领导，真可谓一场颇为热烈的闹剧。

不能说扎别林没有一点眼力，他总算说出了今日苏联的工人阶级已不再是社会的统治阶级，或者说已被资产阶级篡了权，用他的话来说，已经“让位”。那么，是不是如扎别林所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苏联的领导阶级了呢？在这里，扎别林是故作糊涂，或者说，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诚然，在今天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权的情况下，不少知识分子自愿或不自愿地为苏联目前的统治阶级服务，是客观的现实。但是，它并不能也不可能掌握苏联的政权。

在今日苏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部门、各单位的大权都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把持。即使其中有知识分子，也已经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官僚垄断资产

阶级的代表人物。即使有的是工人出身，但这些人已经成为工人贵族，是工人阶级的可耻叛徒。他们的权力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从工人阶级手中篡夺来的。哪里是什么“让位”？苏修企图抹煞苏联社会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对抗，是徒劳的。

那么，为什么麦德尼科夫要出来进行一番“批判”呢？这是因为麦德尼科夫看到扎别林所谓工人阶级要“让位”的一番话，不利于苏修叛徒集团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所进行的统治。所以麦德尼科夫摆出一副“批判”扎别林的架势，甚至给扎别林扣上什么“西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其实，麦德尼科夫的批判是假，掩护苏修叛徒集团是真。

勃列日涅夫的用意又何在呢？在最近的苏修“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还继续胡说：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一起领导，在“党的工作”和完成“各项任务中作用是非常大的”。请注意，勃列日涅夫所谓“共同领导”论是一个大骗局，而且也表明他的反动手法比扎别林和麦德尼科夫更为狡猾，更为狠毒。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在“共同领导”的幌子下，篡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大肆打击、迫害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供认：他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现在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受过工程技术教育及农业教育”；“市委和区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二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是工业和农业专家。”这些从旧大学培养出来的所谓“红色专家”，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也就是说，今天在苏联掌握大权的，既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一上台，就完全背叛了列宁制定的“在整个国家管理方面、整个国家建设方面、整个新生活的领导方面，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九八页）的革命原则，竭力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篡夺了苏联工人阶级在各个领域的领导大权。苏修头目公开叫嚷：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他们在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把代表工农利益的干部清洗掉，把大批忠于马列主义的革命者赶下领导岗位。仅苏共中央委员会，经过二十大至二十二大就清洗掉苏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百分之七十八。仅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间就至少开除共产党员十六万余名，其中大多数是工人党员。苏修叛徒集团经过多年的排挤、打击和迫害工人阶级，把持了一切大权。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篡权得势，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全面复辟。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遭受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这就是苏修新沙皇的所谓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共同领导”的血腥现实。

苏联复辟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篡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所以十月革命的胜利得而复失。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告诫无产阶级：是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工人阶级“让位”给资产阶级来领导，这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革命与复辟的大事。苏联工人阶级一定会从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

教训，积聚斗争的力量。尽管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苏联工人阶级必将走上列宁指引的道路，在苏联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幼芽不可摧——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调查报告

1976-05-10　人民日报

一年前，清华大学在首都南郊大兴县办起一所农村分校，学员实行社来社去，教学实行几上几下，写下了理工科大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新篇章。

一年后的今天，这所农村分校的首届四百九十三名学员，在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毕业了。这是清华大学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开展教育革命、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又一个胜利。

清华大学创办的这所农村分校，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在教育阵地上出现的又一棵共产主义幼芽。它的诞生、成长，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代表着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方向，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上靠阳光下靠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资产阶级想反反不掉，党内走资派想压压不垮。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一）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是在去年年初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创办的。

当时，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传遍全国，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在清华大学，围绕着理工科大学要不要学朝农，怎样学朝农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有人说：“朝农姓‘农’，清华姓‘工’，学朝农只能学精神。”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反驳说：“朝农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教育

领域的新世界，它培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理工科大学难道能特殊吗？”

广大师生员工还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后清华大学的深刻变化，把旧大学与朝农作了对比，进一步看到了朝农经验的普遍意义和深远意义。他们说，旧清华排斥工农子弟，公开号召学生去爬那个修正主义的小宝塔，向什么“副博士”进军。被资产阶级标榜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的旧清华大学，实际上是一块扩大三大差别，培养精神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政治舞台以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拆掉了爬上精神贵族的阶梯，学校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朝阳农学院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创造了改造旧大学的新鲜经验。象清华大学这样的理工科大学，创办农村分校，实行社来社去，直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更有其特殊意义。它培养的学生首先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士，同时又有一定的业务知识，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又会做工、又能务农，亦工亦农，必将为巩固工农联盟，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开辟新的途径。

清华大学党委，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领导了这场大辩论。校党委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派出调查组到农村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他们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农村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热火朝天，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欣欣向荣，迫切需要理工科大学直接为农业服务。校党委还专门派人到朝阳农学院去学习，提出“全国学朝农，清华怎么办”的问题，让大家讨论。在学习和讨论的基础上，多数人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学校形成了一种学朝农势在必行的革命空气。最后，校党委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决定在原大兴县校办五七农场开办一所农村分校。

去年三月初，这所新型的农村分校，在两条路线激烈的斗争中诞生了。这是清华大学六十五年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事情，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热烈欢迎。广大农村知识青年和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有志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革命青年，听说清华大学要办社来社去的分校，个个踊跃报名，都想到这个分校来学习。大兴县沙河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年轻的共产党员张玉生，中学毕业后决心扎根农村，工厂几次来招工他都没有去，掏粪、养猪、当记工员，凡是革命需要的他都积极去干。去年三月他正带着民兵奋战在水利工地，听到让他去清华大学农村分校学习的消息，他愉快接受了，从工地上扛起行李卷就来到了学校。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说，过去青年上大学好象青石板上炒豆子，熟一个蹦一个，这次清华大学培养的学生还回来当农民，我们坚决支持。许多公社党委专门开常委会，反复研究落实招生问题，选出最好的苗子送去学习。

（二）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设有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村电工、农村建筑等四个专业，招收京郊区县的贫下中农入学，不受文化程度和年龄的限制。它的培养要求主要是造就一代能识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敢于同贫下中农一起和走资派作斗争、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新型农民。对这样的一所学校，无产阶级说“好得很！”资产阶级却说“糟得很”。清华大学农村分校刚刚办起的时候，正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的时候。走资派出于反革命的本能，灵敏地感觉到这样的学校，是培养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学校。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摧残这棵刚刚出土的幼苗。办校之初，清华大学的党内几个走资派，在革命形势的压力下，也曾举手赞成办这所分校。但一开始他们就抛出了一个所谓“象样”的建校方案，妄图把农村分校纳入他们修正主义的“正规”，这是走资派惯用的一种反革命策略。去年夏季，邓小平树起“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刮起右倾翻案

风。教育界的走资派立即心领神会，四处活动，到处放毒，大骂教育革命，大骂朝农经验。他们还制造种种谣言，妄图整垮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时候，校内几个走资派认为时机已到，干脆撕去伪装，赤膊上阵，背着清华大学党委，到农村分校使用了政治上压、经济上卡等种种资产阶级专政手段。

去年九月下旬，朝农的同志来到清华农村分校交流办学经验，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清华大学的一个走资派却事前急忙跑到农村分校，搬出邓小平“教育要整顿”的黑指示，背着党委，恶狠狠地一连给分校下了五个不准的命令：不准提“朝农经验带有战略性”；不准提“社来社去是方向”；不准提“学朝农，迈大步，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不准讨论“在朝农这个先进榜样面前，我们怎么办”的问题；不准讨论“学朝农如何学根本”的问题。但是，分校党委，不信邪，不怕鬼，没有听他那一套。他们和朝农的同志们交流了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经验，互相支持，互相鼓劲。分别时大家激动地流下热泪。他们表示：“朝农、清华，地隔千里，心在一起，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学校的走资派政治上失败了，又在经济上卡他们。一个走资派说：“今后农村分校要钱，一分也不给。”走资派卡，清华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却积极支持农村分校。入冬了，农村分校没有取暖用的炉子，学校管炉子的工人同志，避开走资派，把炉子给了分校。

就在这些和走资派斗争的困难日子里，农村分校的师生员工们，在清华大学党委和分校党委坚强领导下，革命斗志越来越旺盛。他们没有教室，就在大树下面挂起黑板上课；没有桌凳，一个马扎随身带；宿舍不够，就住活动房屋，一个屋子睡两层。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养猪，自己盖房，一颗红心一双手，自力更生办大学。师生员工们豪迈地说：“走资派压我们，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阶级斗争的好课堂。一年学习时间虽然很短，但学到了和走资派斗争的革命真本领。”

去年十一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始了。毛主席亲切关怀清华大学，给了全校两万多名师生员工以极大的鼓舞。农村分校的师生员工们，扬眉吐气，满怀对走资派的无产阶级愤慨，斗志昂扬地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农村分校，一派革命气氛。一张张革命大字报，象一颗颗炮弹，一齐射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份份批判发言稿，激扬文字，控诉了邓小平搞翻案、搞复辟的罪行。今年四月七日以来，全分校的师生员工们，热烈欢呼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策，愤怒声讨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最近举行的毕业典礼大会上，学员们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向毛主席表决心："一身泥土进清华，满手老茧回家乡；铁心务农学大寨，反修防修当闯将"，"誓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三）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师生们学习毛主席这一指示，对于怎样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学校应培养能和走资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战士。回顾一年来的办学实践，他们体会到，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课，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作基本教材；必须让学员在学习期间亲自参加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践，在斗争中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去年，学校组织学员参加了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农村中大量阶级斗争的事实，使学员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不少学员深有体会地说：不会堵资本主

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一位学员，入学前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过去，他认为搞点“物质刺激”、“工分挂帅”，还是可以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上了农村分校后，联系实际学马列著作、学毛主席著作，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他毕业后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少学员说：我们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上了农村分校后，深深地感到自己过去并不真正了解农村。好多事情，过去并没有提高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待，因此对农村的阶级斗争，看不清，认不准。上农村分校的最大收获就是学到了阶级斗争的新本领。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是培养亦工亦农、具有一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新型农民的一所学校。他们总是要求学员身体力行，做一个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这些学员经过学习，更加坚定了回到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农电专业有个学员，原在农村当了二十年的电工。经过一年学习之后，决心回去亦工亦农，和私有观念实行决裂。去年三夏他回队实践时，带头破除了当地电工的四个旧习惯：一破干活吃请；二破干活拿额外补贴；三破到点下班的雇佣观念，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干；四破电工不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的旧习惯。他回队第二天早上两点多，就拿着镰刀跟社员一起下地割麦子。贫下中农称赞他上大学才几个月就变样了。他回答说：“有了技术就搞特殊，不参加劳动，这是资产阶级法权。”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学员们，学习期间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结合实践，刻苦学习业务技术，较快地掌握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文化技术本领。去年九月，学员回社队实践。据不完全统计，三百个学员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测量规划了农村道路一百一十四条，一百九十一公里；规划排灌渠道二百九十二公里；搞了现代化固定喷灌十亩，活动式喷灌规划一千亩；地下管道测量布置六千九百米；参加设计或试制、改革成功了双向犁、十五尺宽平地机、小麦播种机、

气流清选脱粒机、轮胎装卸机等农机具十项；修了扩大机四十二台；设计了农村建筑八千平方米，还为社队举办了农水、农电专业短训班。农水专业学员入学不久，就到一个治河工地上，以河道为课堂，开始了测量课的教学。在短短十天里，边干边学，共完成了十六公里多的河道纵横断面测量任务，向工程指挥部提交了一百九十张纵横面测量图纸，学会此类工程的测量操作和计算本领。农建专业学员王廷起，原来是一个四十岁的社员，他在学校学习期间，运用新学到的知识，一年之中，就为自己家乡的生产大队，规划测量了一个三百亩的果园，设计了一个能养一千头猪的养猪场和一个大队新村的建设蓝图。

贫下中农看到这样的大学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指出：走资派诬蔑这样的学校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一百个大学生。四个现代化要靠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只能“化”到资本主义黑道上去。广大贫下中农急切地盼望这些新型大学生回乡后同他们一起战斗。当这批学员毕业时，他们所在的区、县和公社以至生产大队，都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地欢迎。中共大兴县委员会，组织了五千名干部、社员来欢迎他们。这一事实，又一次说明了共产主义的幼芽，有着千百万革命人民的爱护和浇培，它的生命力是无限的。走资派想摧折它，只能是蚍蜉撼树，枉费心机。

《北京日报》记者

《光明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首届社来社去学员，一年来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学理论、评《水浒》，参加农村基本路线教育运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很大提高。在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的鼓舞下，他们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批邓斗争。 新华社记者 摄

反对“社来社去”就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朝阳农学院师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1976-05-13　人民日报

在党中央两个重要决议鼓舞下，一个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新高潮，正在朝阳农学院蓬勃兴起。广大师生员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判的火力集中指向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向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朝阳农学院师生员工们在前一段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在党中央两个决议发表以后，都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联系教育革命的实际，对邓小平反对教育革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展开了深刻的批判。

朝农师生员工回顾了本校从城市搬到山区办学六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深刻地认识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要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师生们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方针，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但却遭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种种非难。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党内走资派，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们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命根子，一看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新生事物就反感，必欲除之而后快。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

的修正主义纲领后，一时间攻击朝农“社来社去”等教育革命经验的种种奇谈怪论也随之而来，什么“不全面”、“不周到”呀等等谬论甚嚣尘上。师生们透过这些嘈杂的鼓噪声清楚地看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朝农“社来社去”等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正是由于这些经验批判了几千年来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判了剥削阶级竭力扩大的资产阶级法权，触痛了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卫道士们的神经。

首先，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对资产阶级“知识私有”、“技术垄断”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学校，在这方面必须发挥它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不但要在物质财富的占有方面“剥夺剥夺者”，（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而且要把资产阶级“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如果没有这后一个“剥夺”，那么，前一个“剥夺”也将是不巩固的。毛主席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却被地主资产阶级所攫取，这种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这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朝阳农学院，努力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招收农民进大学，大学毕业当农民，把大学办到贫下中农的家门口，逐步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一切，就是为了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的一项重大措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之所以拼命反对“社来社去”，就是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要扩大资产阶级的知识优势，维护他们所赖以复辟的资产阶级法权。师生们说，我们一定要和党内不肯改

悔的走资派对着干，用我们这一代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前进步伐，踏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旧大学吹得神乎其神，诬蔑今天的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朝农师生们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这样吹捧旧大学，是妄想要恢复资产阶级失去的这块“世袭领地”。旧大学有什么可以迷信的呢？自古以来，有几个革命的英雄、政治家、发明家是大学毕业的？真正的本事并不是在大学课堂里学的，很多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学到。师生们说：“我们就不迷信旧大学那一套，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由大老粗办大学，大老粗上大学，大老粗管大学。”

六年来，朝阳农学院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已有三届长期班三百四十多名“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回乡当农民，还采取办科学实验队、农民业余大学、分段教学班、短期培训班、流动教学班等形式，培训了一万六千多名农业学大寨的骨干。这批新型农民对于打破资产阶级的知识垄断，起了很大作用。过去，为了搞好果树生产，有些社队从外地请人来，给很高的报酬，还要好吃好喝好招待；队里牲畜要劁骟、治病，私兽医要很多钱，不然，他们就拿一手。现在，有了朝农毕业生，这些人再搞垄断就吃不开了。毫无疑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步伐必然加快，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必然形成，资产阶级知识上的优势一定会完全被剥夺。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朝农实行“社来社去”同样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朝农毕业生，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农民，他们正象马克思所说的“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曾经这样设想：“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

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如今，这样一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的情景，已开始在朝农毕业生的身上体现出来。

这些新型农民会抓阶级斗争，会搞科学种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他们一身泥土，两手老茧，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简直分辨不出谁是大学生。老一辈的贫下中农说得好：“这些孩子上了朝阳农学院，没有变；要说变，就是思想觉悟更高了，斗争性更强了，本领更大了。”

这件事却触怒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说什么：“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他们竭力反对大学生和工人农民划等号。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大学毕业当工人、农民这件事如此害怕和仇视，就是因为这种革命行动，猛烈地冲击了资产阶级法权，拆掉了“读书做官”的阶梯，不利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很反感，咒骂攻击，暴跳如雷。这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死斗争的反映。

朝阳农学院的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深懂得了：上了大学就不能和工人农民划等号，那就是要做精神贵族。那是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他们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又一次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就是要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更加坚定地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和工人、贫下中农划等号。“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导者的水平往往不及普通劳动者，原因就是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高喊大学生不等于普通劳动者，恰恰暴露了他们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是站在群众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官老爷。

大学毕业当农民，挣工分，这是在分配领域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有力批判和限制。它闪耀着巴黎公社革命精神的光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摆出一副“权威”架式，反对缩小三大差别。你要实行“社来社去”吗？他说这是超越阶段，“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朝农的师生们指出，消灭三大差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任务之一。消灭三大差别的过程，是一个由逐步地“缩小”以至最后“消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阶级斗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准我们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就是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我国，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还占着统治地位。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坚持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力图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他看来，大学毕业的人，有了知识，就应该“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诱：以官，禄，德”，使他们变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朝阳农学院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反了千百年来“读书做官”的潮流。他们的毕业生回到农村，努力和贫下中农“划等号”，和农民一样参加劳动，和农民领取同样的报酬。有一些毕业生因为工作需要，当了干部、技术员，仍然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和农民拿同样的报酬，不搞任何特殊。这些毕业生继承和发扬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一不图名，二不为利，干的是社会主义，想的是共产主义。他们的革命行动，是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有力批判。

坚决当农民、拿工分的朝阳农学院学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同教师、干部一道，再一次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他们看到，巴黎公社“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列宁：《国家与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受到革命导师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样就是“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朝阳农学院的师生们说，正是革命导师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伟大革命精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使我们懂得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面对着这些破除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批判资产阶级

法权的英勇战士，那些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资产阶级庸人们，显得是何等的渺小啊！

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意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说明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广大工农兵是要革命的，他们不喜欢修正主义大人物压他们。矛盾是尖锐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行径，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和斗争。朝阳农学院师生斗志昂扬地说：走资派越是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就越要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要举起榔头，敲响旧制度灭亡的丧钟；抡起大斧，砍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根；挥起钢锹，挖掉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

“翻案不得人心。”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广大人民群众绝不答应！朝阳农学院的师生员工，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进一步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为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通讯员

《光明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彻底批判邓小平妄图利用大学培养工人贵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吉林大学大批判组

1976-05-20　吉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前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他重新工作不久，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带头刮起右倾翻案风。在教育战线上，他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公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他一方面要砍掉朝阳农学院这面红旗，另一方面要树起“国防科技大学”这面黑旗，妄图使旧教育制度全面复辟。

教育战线翻案反翻案、复辟反复辟斗争的现实，向我们尖锐地提出：邓小平为什么要拼命地抓大学？为什么狂热鼓吹修正主义办学道路？为什么极力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这一系列问题，包藏着邓小平的险恶用心。他的反革命阴谋必须彻底揭穿，他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邓小平叫嚷“无以为继”，反对与工农划等号，就是要培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工人贵族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去年九月，他直接策划筹办“国防科技大学”，他大肆鼓吹这个大学“不是象清华那样培养应用人材”，而是“要培养研究人材”，要“快点办”，“否则技术力量就无以为继”了。好一个“无以为继”，它充分暴露了行将灭亡的资产阶级的绝望心情。在教育革命蓬勃发展，革命接班人茁壮成长的大好形势下，是“无以为继”，还是后继有人，这是两个阶级对教育革命做出的截然相反的回答，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击中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要害，尖锐地揭露了邓小平妄图利用大学培养工人贵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戳穿了邓小平“无以为继”的反动实质，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大学的培养目标。

学校培养什么人，不同的阶级有根本不同的标准和要求。邓小平叫嚷：大学要“培养研究人材”，要培养“干部”，不培养“干部”和“研究人材”，“还办大学干什么？”在这里，邓小平的“无以为继”，要继的是什么，培养的是什么人，不是暴露得一清二楚了吗？他所要培养的“干部”，就是修正主义的大官；他所要培养的“研究人材”，就是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苏修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不都是通过“大学”的阶梯爬上修正主义大官宝座的吗？这一触目惊心的现实，彻底揭穿了邓小平利用大学培养“工人贵族”的反革命阴谋。至于邓小平所要培养的“研究人材”，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已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控诉。旧吉林大学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大搞“智育第一”，鼓吹“向科学进军”，“向副博士进军”，引诱青年走成名成家的道路。这样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所谓“研究人材”，不少是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如当时物理系有一个学生写了一首诗，表达他一心走白专道路，追求成名成家的急切心情。诗中写道：“政治我不问，改造扔一边，集体与我无缘，专！专！专！”这些人沿着成名成家的道路要“专”到哪里去？历史系一个学生的事例作出了无情的回答。这个学生是所谓“高材生”，被旧吉大的走资派所看中，认为他有“天才”，要“特殊培养”，特许他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和集体活动，并且专门拨给他一间小房，让他写一部大型历史剧，结果剧本没写成，他却成了坏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严峻的事实和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青年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真是害死人。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这种教育制度

“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广大工农兵对自己的子女进大学受毒害，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毕业不愿回家乡的状况，万分痛恨，难以容忍。可是刘少奇、邓小平对这种教育制度却倍加赞赏，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动实质，也充分说明邓小平所要培养的“干部”和“研究人材”，就是修正主义大官及其复辟的社会基础。对此，我们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邓小平大声疾呼“无以为继”，就是唯恐地主、资产阶级后继无人，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传宗接代，就是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效法孔老二搞“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是邓小平这个复辟狂反动嘴脸的大暴露，也是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恶毒攻击，是腐朽没落阶级的绝望哀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大学由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的染缸，改造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熔炉。实行“社来社去”，“大学毕业当农民”的朝阳农学院，是教育战线上一面鲜艳的红旗，它同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拆掉了“学而优则仕”的梯子，堵死了“读书做官”的路子。邓小平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气急败坏地说，“拆梯子、堵路子，越讲越歪了嘛！”这里我们可以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是要拆掉“学而优则仕”的梯子，堵死“读书做官”的路子，否则教育革命才真会走上“歪歪道”，偏离正确的方向。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校广大工农兵学员，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誓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许多应届毕业生纷纷写出申请书，贴出革命大字报，要求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学毕业当农民，不拿工资挣工分。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百五十余名学员提出了申请，这是我校建校三十年来从没有过的事情。要求向“世界屋脊”登攀、去西藏工作的学员豪迈地说：“明知西藏苦，偏向西藏行，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决

心。”要求下乡务农的一批工农兵学员，在大字报中写诗抒发革命豪情，他们写道：“工农兵学员，高唱理想之歌，开赴战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把我们的一生，献给共产主义的明天。”他们的坚强决心和崇高理想，展现了新型社会主义大学毕业生的崭新思想风貌，这是对邓小平反革命谬论的迎头痛击，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批判，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丰硕成果。

邓小平叫嚷“无以为继”，正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打中了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样的“无以为继”好得很！我们无产阶级办教育，就是要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就是让他们“无以为继”，断子绝孙。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无以为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邓小平鼓吹的关门读书，“重点学理论”，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道路

什么道路培养什么样的人。广大工农兵学员，跨进了社会主义大学，要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关键在于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有一条正确的办学道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高楼深院里，只能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是把学生放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经风雨、见世面；还是把学生关在大楼里，脱离三大革命运动，死抠书本，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学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顽固坚持修正主义办学道路，主张在他操办的“国防科技大学”里，“学生主要是学理论”，实行关门办学。

邓小平鼓吹的“重点学理论”，就是诱使青年脱离三大革命运动，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走白专道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十七年，走的就是

这条路。在这条道路上培养出来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越学越蠢，越学越修。其中很多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与工农兵格格不入；甚至有些人向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对无产阶级革命严重抵触，一遇风吹草动，就会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的反革命暴徒里，就有这样的人。

邓小平所鼓吹的这条道路，正是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那时，也有工农子女和一些工农兵进了大学，可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实行关门办学，大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这些工农子女和工农兵不是被他们用“泻肚子”的办法排挤出去，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甚至有一些人做了资产阶级的奴仆。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邓小平推崇备至的旧教育制度的根本弊病，有力地回击了邓小平对教育革命的攻击和诬蔑，再一次阐明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道路。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实行开门办学，广大工农兵学员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健康成长。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证明：只有实行开门办学，才能使广大工农兵直接参加教育革命，彻底改造旧学校；才能依靠整个阶级、整个社会的力量，转变学生思想，为反修防修培养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才能使学员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增长才干，学到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本领。

邓小平却恶毒咒骂开门办学是“进进出出，象抽疯似的”，胡说什么：“大学读书都成了问题了”，教育“存在着最大的危机”。开门办学冲破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经院学府，极大地改变了死读书、读死书的局面。邓小平却惊呼“危机”，这到底是哪一家的危机呢？这是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最大的危机”。资产阶级的危机，就是无产阶级的兴旺，就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新型的社会主

义大学里，革命师生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刻苦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景象。邓小平却说大学“不读书”了。不读书，不看报，不学马列的不是别人，就是邓小平一类的修正主义大官。象他这样的人居然大叫“读书”，戳穿了其险恶用心，就是让学生钻到故纸堆里，继续走那条追求个人“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校革命师生，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办学道路，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他们深入工厂、农村，踏遍全省七个地区，分赴省外有关单位，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教育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一年多来，我校理科各系师生，共完成了一百一十三个科研项目，其中十项填补了我国的空白，六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文科各系师生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与工农兵理论骨干一起编写了三十六种新教材，为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去年六月，我校哲学系师生顶着右倾翻案风，协助怀德县陶家屯公社办起了一所农民业余大学，培养不脱产的贫下中农理论骨干。今年三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我校创办了半农半读、社来社去的德惠农村分校，培养农电、农化、政治理论和群众文艺等方面的学员，谱写了我校教育革命史上的新篇章。广大革命师生在开门办学中，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代新人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茁壮成长。

邓小平对这条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辉道路，极端仇视，恨之入骨，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胡说什么“大学读书都成了问题了”，学校不象个学校的样子；工农兵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学生不象个学生的样子；“教育革命搞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做过一次总结”，经验不象个经验的样子。

邓小平“三不象”的叫嚷与当年孔老二对“礼崩乐坏”的哀鸣，是何等相似。复辟派的祖师爷孔老二，面对春秋时代社会变革的大好形势，痛心疾首，看什么

都不顺眼，就连拿起酒杯也发出了“酒杯呀，酒杯呀，你都不象酒杯的样子了”的感叹。当今的复辟派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天翻地覆的革命变革和茁壮成长的新生事物，说得一无是处，这也不象样，那也不象样，要横下一条心，拚着老命往回“扭”。他要扭到哪里去，就是要扭到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邓小平要的是什么“样子”？无非是要把大学办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大学的样子，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总之他就是要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样子。这是白日做梦！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中国，彻底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样子，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邓小平拼命抓大学，就是要把大学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把黑手伸向教育阵地，拚命抓大学。刘少奇提出大学要“基本照旧”，“全盘苏化”；林彪一伙对其死党的子女毫不掩饰地说：“大学就是为你们办的”；邓小平在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又迫不及待地要办起邓记“国防科技大学”，说“要招收高中学生，数理化知识好的”，“学生主要是学理论，搞千把个，逐步扩大”，“教授不够，可以从全国调”，“要快点办”。从招生来源、培养目标到师资配备，规定的这么具体，真是精心策划，煞费苦心。他在大树黑样板的同时，却大砍朝农这面红旗，恶毒攻击朝农“不全面，不成熟”，“在实践上行不通”，不准推广朝农经验。邓小平对朝农这面红旗砍的这么狠，对“国防科技大学”这面黑旗树的这么急，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学在阶级斗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力图把学校作为本阶级专政的工具。

大学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重要舆论阵地，又是培养接班人的重要场所。无产阶级办大学是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为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大喊大叫，培养一代又一代反修防修的战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资产阶级则要利用大学传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从而改变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颜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教育阵地开刀，邓小平大搞翻案复辟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也首先从大学下手，这绝不是偶然的，是两大阶级生死搏斗的必然表现。邓小平唆使清华大学的走资派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主席的指示揭穿了邓小平的反革命阴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邓小平向无产阶级进攻，搞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首先要从大学打开缺口呢？就是因为，大学这个地方一直被剥削阶级所霸占，大量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比较集中，至今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势力；就是因为邓小平所极力维护和扩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大学这块地方还严重存在，三大差别特别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表现的尤为突出；就是因为，大学里封资修流毒年深日久，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还有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精神资本。大学的重要作用和本身的特点，决定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定成为两个阶级的必争之地。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把大学办成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搞得不好，大学培养资产阶级新贵和修正主义大官是随时可能的。对此，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邓小平抓大学首先是把工军宣传队赶出去，把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下去，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抬上来，篡夺学校的党政领导大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用了造谣生事、诬告陷害等卑劣手段，无

所不用其极。其次，就是网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重新统治学校。他在抓“国防科技大学”这个黑样板时叫嚷：“教授不够可以从全国调”，“教员不够找教育部支援，老的技术人员也可以当教员。”邓小平搞的这一套，就是地地道道的“教授治校”。一个学校，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教师队伍的政治状况怎样，是直接关系到学校性质和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大问题。邓小平一手搞篡权复辟，一手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以便肆无忌惮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把大学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妄图把社会主义大学倒退到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这就是邓小平拼命抓大学的要害所在。

在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战胜党内资产阶级，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走资派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总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革命，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总是要不断地把黑手伸向大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们战斗在教育战线的革命同志，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彻底清算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树立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不断地粉碎走资派妄图利用大学培养工人贵族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我们的国家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教育革命的一朵新花——记清华业余大学

1976-05-30　人民日报

在清华园，有一所深受广大工农兵欢迎的业余大学。这是一所冲破党内资产阶级重重阻力而产生的新型大学，是教育革命百花园中开出的又一朵新花。它对于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要的意义。五月二十二日，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业余大学的第一届学员胜利毕业了。毕业前夕，他们怀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喜悦，带着教育革命的累累硕果，向党表示：我们来自工农，永做工农，永远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清华业余大学是在去年三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中诞生的。它是清华大学贯彻执行毛主席“七·二一”指示，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的一个重要措施。根据工厂和农村的实际需要，设有普通机械、电工、自动化、汽车、焊接、热处理、铸工、锻压、化工、环境保护等十个专业。一千四百多名学员，来自北京市的一百七十多个工厂和人民公社，绝大多数是工人、贫下中农，其中不少是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他们不脱离生产劳动，每周利用两个晚上和一个下午学习；学习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听辅导课，搞调查研究，讨论问题等等；学校教员，除一部分本校专职教师外，还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当兼职教师。

毛主席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业余大学创办的一年，就是同走资派斗争的一年。一年来，这所大学顶着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前进，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成长。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清华办业余大学，他们说什么“业大是办不好的，坚持不下去的”，“办

业大没有必要”，妄图把业余大学这个新事物扼杀在摇篮中。清华大学党委认为，要不要办业余大学的斗争，其实质是要不要缩小三大差别，要不要打破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的垄断，要不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重大原则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这场斗争，党委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广大工农兵非常欢迎这种既能学习，又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班组群众的办学形式。就在创办业余大学的消息传开后的短短三四天内，便有一百二十多个工厂的两千多名工人报名上学。直到开学半年后，有些单位还不断要求增加学员，不少学员自带马扎来听课。学校附近的工厂，反应更是强烈，他们说："清华大学和我们是近邻，但是，文化大革命前，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我们隔开。现在，清华大学的大门真正向工农兵敞开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业大开办不久，一个老工人在学习情况调查表上写下了七个大字："业余大学就是好！！！"广大工农兵的热情支持，使清华大学党委更加坚定了办好业余大学的决心。他们坚定地说："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过去，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劳动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这是历史的颠倒。我们必须通过各种形式，使文化知识回到劳动人民的手中。"

业余大学应当办成什么样子？用什么思想指导办业余大学？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也充满了斗争。业余大学开学后，邓小平刮起了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个别走资派提出"业余大学还是要从基础课讲起"，"不能结合政治和生产任务进行教学"，社会上也有人煽风说："上业余大学一不能提工资，二不能算资历，三不能摆脱体力劳动，上这个大学，有什么好处？"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把业余大学引上修正主义邪路。但是，广大师生识破了走资派的阴谋，愤怒地说："按照他们这一套办业余大学，和过去修正主义路线下办的旧'夜大'有什么区别？"旧清华办的旧"夜大"，招收的都是中技和高中水平的学生，用"智育第一"、"读书

做官”等修正主义黑货毒害学生，用资产阶级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资产阶级奴化教育。它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一部分。

以旧“夜大”作为反面教材，广大师生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坚持把业余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学员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业余大学学员、第三建筑公司的老工人杨金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批判了旧教育制度。文化大革命前，杨金龙为建设大学盖了十几年房子，清华大学盖主楼就有他参加。可是别说上大学，有些学生碰见他，竟捂着鼻子绕道走。更使杨金龙气愤的是，旧大学培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工厂企业搞技术垄断。有一次，杨金龙拾到一份计算电动机电流的公式草稿，一个旧大学培养的技术人员为了不让他看，抢过来就撕掉，还把另一份草稿放在嘴里嚼碎。当时，杨金龙并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十几年了，还会出现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经过文化大革命，他才明白了：这是因为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教育阵地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旧大学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现在，杨金龙已经成为清华业余大学的主人，他听到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时，愤怒地反驳说：“我们上业余大学，不是为了领文凭，不是为了长工资，而是为了劳动人民知识化，为了掌握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广大师生自觉地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课。业余大学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组织学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并且要求学员积极参加厂校的政治斗争，定期向本单位党组织和工人群众汇报思想，做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始终在广大工人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之下，迎着斗争的风雨锻炼成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广大学员积极投入这场斗争，深入批判邓小平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业余大学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坚持开门办学，根据学员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特点，创造新的教学方法。热处理专业组成小分队，到学员所在工厂，结合生产任务进行教学，边学习，边解决生产问题。铸工专业让学员带着本厂的生产问题来上课，引导学员针对这些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机械专业根据工厂生产中的疑难问题，组织教师下厂“会诊”，下厂备课，送学上门。这样，业余大学的教学形式多种多样，机动灵活，既有“官教兵”，又有“兵教官，兵教兵”。他们把业余大学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工业学大庆经验的推广站，先进技术的交流站。广大学员深有感触地说：“这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学的东西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用得上，既学到了专业知识，又为工厂解决了实际问题。”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保证了业余大学学员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他们拆掉了“读书做官”的梯子，破除“知识私有”的旧传统观念，毫无保留地把学到的知识用于抓革命，促生产。一年来，听了政治课，在厂里进行理论辅导的学员有三百七十多人，听讲人数达两万一千五百多人次。在厂里讲业务课的学员有三百四十多人，听讲人数达七千三百七十多人次。去年，当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时，业余大学正在上“鞍钢宪法”课。机械班青工学员李宁，同老工人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把“三项指示为纲”和“鞍钢宪法”加以对照，明确地向所在单位的领导提出：“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在党支部的支持下，他们勇敢地抵制了右倾翻案风。李宁所在的单位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名职工的物资经理部仓库。为了改变这个单位的繁重体力劳动，他带头搞技术革新，先后搞成了土吊车、皮带运输机、土汽车，为改变本单位面貌做出了贡献。铸工班一位学员，发现有人以技术问题不好解决为借口，想私自压缩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去生产利润高的产品。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表现，

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同时，他和其他工人一道改革了旧的生产工艺，保证了国家生产任务的完成，坚持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正确方向。一年来，业余大学的学员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针对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搞了三百一十八项技术革新，其中一百七十九项已用于生产。为什么他们能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学员们说得好："业余大学从生产第一线招收学员，学习时不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毕业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来，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毕业后不做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永远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业余大学的发展，促进了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它不仅完全打破了旧大学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的招生和分配制度，而且从教材到教学方法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清华大学普通班的开门办学、教学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业余大学的创办有力地促进了教师的思想改造，教师们深入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思想面貌变化很大。有一位教师在文化大革命前，曾参加过旧"夜大"的教学，那时，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进城上课，要有车接车送，教了几年书，从来没有到过工厂。这次，他通过不断的下厂实践，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自觉地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和工人一起研究生产新课题，搞技术革新。广大工人说："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有这样的教师。"

目前，清华大学正在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包括业余大学提供的宝贵经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将全校教育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本报记者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知识私有”观念

伍其斌

1976-06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编者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将去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约来的一篇很有生气、旗帜鲜明的文章发表出来。这篇文章原准备在本刊去年第三期上发表，但在送审过程中，遭到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的种种责难，不让发表。他们极力反对开展对“知识私有”这一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批判，说什么：“什么叫‘知识私有’，是长方形，是平行四边形，……，谁讲得清楚。”这篇文章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他们所拼命维护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知识私有”这是知识分子中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破除“知识私有”观念是关系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一个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具有重大的意义。

批判“知识私有”观念，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

“知识私有”观念是剥削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老二及其信徒鼓吹“耕馁、学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资产阶级则“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武器。”反动

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总是垄断科学文化，鼓吹“知识私有”，愚弄劳动人民，把人们的思想控制在他们的王权之下。

剥削阶级在其反动统治被推翻之后，必然会凭借他们在上层建筑的一些“世袭领地”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倚仗知识上的某种优势，利用“知识私有”的传统观念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种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指出的那样：“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回顾科研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提出“专家治所”等反动口号。他们以知识为资本，公开与党争夺领导权，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十几年来这场斗争从来没有止息，只不过在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资产阶级往往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这批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权力，时而扯起“知识私有”、“知识万能”的破旗，培植所谓有“知识”的精神贵族；时而利用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引诱那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业务知识转化为商品、货币和权力；时而刮起阵阵阴风，什么“马克思不能领导爱克斯”，什么“大老粗管不了高精尖”，什么“不懂外文不能搞科研”，抵制工人阶级的领导，对抗党的基本路线，妄图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虽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私有”观念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直到今天，在资产阶级还“把持着”或“占优势”的某些领域，“知识私有”观念仍是他们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这是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部门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特点之一，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

毛泽东思想认为，对于领导权问题，不能只看形式，还要看实际内容，要看执行什么路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科研系统许多单位的领导权问题，还不能说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我们有的领导同志正是在“知识私有”这种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影响下，维护按“知”排辈等资产阶级法权，不相信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作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重业务、轻政治，只相信专家、权威，不相信广大群众，执行专家路线，甚至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专家。对业务领域中反映出的两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不敢去抓，划不清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一旦社会上资产阶级复辟思潮袭来，就很容易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或复旧倾向，以至丧失这方面的领导权。可见，破除“知识私有”观念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大问题。通过批判“知识私有”观念，才能使我们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批判“知识私有”观念，促进世界观改造

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切知识都是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的，都是工农群众创造的。知识应该归于工农群众所有，为工农群众服务；知识应当是公有的。

解放以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知识分子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世界观改造上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但是“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破除“知识私有”观念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一个艰巨的课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不少知识分子思想上“知识私有”观念仍象臭豆腐一样，闻闻是臭的，吃吃还是满香的。其中有的就拿着“知识私有”的尺子去量度自己和别人的“一技之长”，并以此作为评价一个人的主要依据和标准。对业务上“有一套”的人很羡慕，就如同小生产者那样，“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在他们看来，“只要业务上做出成绩来，其他一切都会跟着来的”，因此拼命积累知识上的财富，想在业务上露一手，搞出点名堂，“不成这方面的专家，也要成那方面的专家”，把占有知识作为要名要利要权的阶梯。“知识私有”观念这种精神枷锁，把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在一个以“我”为中心，以个人名利为半径的牢笼之中，视知识为私有，垄断居奇，待价而沽，追名逐利，孜孜不倦。当看到个人奋斗的道路走不通，知识卖不到高价，又消极怠工，散布“读书无用”，不看书学习，不想挑担子，不肯动脑子，成天混日子。两种表现，一个根源，都是头脑中“知识私有”观念在作怪。

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有了“知识私有”观念，就会离开无产阶级政治，就会丧失劳动人民的感情，就不可能很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所以，知识分子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就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知识私有”这种旧的传统观念决裂。

当然，我们批判“知识私有”，并不是不要知识，更不是反对知识分子掌握知识。我们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需要造就一支宏大的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为它服务，所以党和毛主席一贯关怀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进步，鼓励他们在正确路线指导下为革命积极掌握科学知识，钻研

业务，号召他们走又红又专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我们希望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振奋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向盘踞在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土围子开火，砸碎“知识私有”的精神枷锁，冲破“知识私有”的思想牢笼，促进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激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努力为革命钻研科学技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完全彻底地贡献给党和人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至于那些抱着“知识私有”观念不放，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并以知识为资本，向党伸手，要高价，拼命追求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迷恋过去那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人，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赶快回头！你们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抗的，是绝对行不通的。

批判“知识私有”观念，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知识私有”观念是私有制的产物，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弊病”和“痕迹”，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种土壤。自从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产生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剥削阶级攫取了生产资料，垄断了文化知识，“知识私有”观念就开始形成。几千年来，这种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一直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流毒甚广。

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些旧痕迹是“知识私有”观念得以存在和产生的政治思想根源和社会经济根源。

“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总是拼命地宣扬腐朽的意识形态。而我们不少知识分子过去受资产阶级教育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宣扬的“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知识万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毒害；因而受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思想的毒害，头脑

中的旧意识就特别明显。这种旧意识的核心是一个“私”字，它表现在知识问题上，就是“知识私有”观念。

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土壤，也是产生“知识私有”观念的经济基础。

按劳分配“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反映着形式上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在获取劳动报酬上，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熟练劳动优于不熟练劳动，受较高教育的人优于受教育较少的人。这就会使一部分人把工作能力（包括智力）看作是发财致富的私有财产，把“知识私有”观念当作猎取名利的神圣信条。

等价交换是商品流通、货币交换必须遵循的原则。这种原则反映在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便是“知识万能”、“知识私有”观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本身不是商品的东西，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拿去交换货币，并通过他们的价格取得商品的形态。”知识本身也不是商品，但在商品交换原则的影响下，有的人也可以把知识作为资本，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以换取更多的货币、商品和权力。这样，搞研究，选课题，写论文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知识私有”观念，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旧的意识形态，用它“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林彪一类资产阶级野心家就是利用我们某些同志头脑中残存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来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所以批判“知识私有”观念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的需要。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进一步深入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不断地削弱和消除着旧社会的痕迹。科技战线也和其他战

线一样，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工人阶级登上了科研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工农兵大学生源源不断地充实到科研队伍中来，科研人员到“五·七”干校轮训，下乡下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开门办科研的路子越走越宽，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蓬勃开展……这些都是对“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有力的冲击和批判。它对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广大知识分子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教导的：“要具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一定要坚持宪法规定的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学习革命理论和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世界观，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与“知识私有”的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苏修教育的不治之症——“分数狂”

何卓

1976-06　广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苏联的教育得了一种不治之症，人们给这种不治之症起了个名字叫“分数狂。”苏修的报刊不打自招地承认：“分数狂——提高对学生的评分来达到学校的漂亮指标”，“分数百分比在我们这里变成了偶象，而我们就象偶象崇拜者那样崇拜它”。修正主义教育学的祖师爷、已经死去的苏修教育部长凯洛夫曾经坚持说：“分数百分比是评价教师与学校工作的标准”。其继承人、现任教育部长普罗可菲耶夫也“断然反对放弃分数数字指标”，因为这些分数数字指标“可以使人分析学校活动的进程，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在教育界的这些大头目指使下，下面的教育局长、校长便竞相强迫教师用“提高对学生的评分来达到学校的漂亮指标”，“报告关于学生成绩的赫赫战果”。他们“对教师的良心公开施加压力，直接或间接地强迫”“把占四分之一的 2 分改为 3 分”。阿塞拜疆共和国教育部中小学管理总局副局长供认：“近几年来成绩的百分比在增长，同时学校领导人不愿落后于平均水平的愿望也在增长。为了不至于落后，这些领导人就拧紧分数百分比的螺丝”，“强迫教师把学生的成绩提高。”由于各级头目施加压力，“分数狂”恶性泛滥，苏联现在有人担心：“五级分制将逐渐变为两级分制。而这两个分数——4 分和 5 分与学生是否很好地掌握知识并无丝毫共同之处。”

据苏联《文学报》透露，由于笼统地按照分数百分比来责骂教师或夸奖教师，于是“教师就在分数百分比上下功夫”。教师不但受到上面的压力，而且互相牵制，互相施加压力：“如果您不把我班柯良的您这门课的 2 分改一改，从而使我那个班丢脸的话，那么您那个班的丹娘在我这门课就会得 2 分”。就这样，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祸害下，苏联教师被迫得尔虞我诈，拿分数作交易。

二十多年来，“分数狂”这个祸害长期地折磨着苏联的广大师生。据《文学报》透露，在“分数狂”的压力下，“有些教师一怒之下退出了学校”；“有一个教师说他四十七岁就退休了。他身体很好，精力也很充沛，但是被分数百分比的问题搞得精疲力尽。他认为‘分数狂’在破坏教师的神经，降低教师的人格和尊严”。但是受害最深的还是学生。在学校里教师把学生当作敌人，乌里扬诺夫师范学院有那么一个副教授就直言不讳地说：“教师是把自己和学生对立起来的。他们倾向于把功课、教材掌握不好只归咎于学生。”于是学习差的工农学生就受到歧视和迫害，被骂作“倒霉鬼”，“小懒虫”。教师拿 2 分威胁学生，2 分由此获得了一些别名，叫做一种“特殊的威胁手段”，“教育耳光”。教师们“令人可怕地相信‘教育耳光’万能的威力”。你不去死啃书本吗？那就请你吃“教育耳光”。分数是通过考试来评定的。学生在考场上就象过堂受审一样，受到无情的摧残。苏修剧本《要象人们那样生活》中就津津乐道这样的考试场面：一个工人考动力技术学校时，惊慌失措，呆若木鸡：“我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事，我站在主考人面前，就象傻瓜一样，脑子里一点主意也没有”。女主角娜达莉在大学最后考试时，“她晕倒了，血从鼻子中涌出来。”……这样被摧残的青年，在苏联竟成为歌颂的典型。他们把分数当成一根包着橡皮的钢丝鞭子，驱使学生去死啃书本。苏修规定奖学金只发给学习成绩好分数高的学生，分数越高奖学金越多。中学毕业时分数高的发给金质奖章，可以优先进大学。大学毕业分数高的另行发给“优秀毕业证书”。一旦得到这种证书，无异身登龙门，可以青云直上。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分数这根橡皮钢丝鞭子无时无刻不悬在学生的头上，一步一步赶着学生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使他们学会弄虚作假，争名逐利。学生为了捞取高分数，有的“干脆抄别人的”，因为“抄袭比较轻松，欺骗则有利”；至于高官新贵的子女，就用卢布买分数，买一个大学入学考试的高分数，要花二千卢布。于是，在苏联，什么“私人授课”业，“代人考试”业，“论文出售”业，“毕业证书制造”业等等提供高分

数的行当，应运而生。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苏联今天的教育堕落到何等卑污的地步！

就象苏修经济发生通货膨胀那样，分数狂也愈演愈烈。苏修对于这种膨胀的分数百分比象对通货膨胀一样毫无办法。《文学报》哀叹：“呜呼！这个题目在报章上已连续讨论了二十年了”，“但是祸害尚在，这个问题，显然进入了‘永恒主题’的行列”。苏联人民对“分数狂”是深恶痛绝的，有关的读者来信“象潮水一样涌进编辑部。”《文学报》一九七五年就收到一千多封这种信件，不得不装腔作势地出来对这种无法掩盖的现象谴责一番，以欺骗群众，平息民愤。但是不改变修正主义的路线和制度，这种顽症又哪能治得好！正如一个苏联女教师说的：“经过如此长期的围剿，膨胀的分数百分比应该早就寿终正寝了吧。但是学年开始了，而我觉得，一切依然照旧”。象这样明摆着的痼疾，苏修的《文学报》却仍极力进行掩饰和辩解。它在洋洋数千言的编前、编后语中，首先大力为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贴金，吹嘘什么“苏联普通中学的成绩是巨大的，是不容置疑的……达到了极高的教学质量”，说教育部长坚持要分数指标也是对的，因为“反映真实成绩的分数百分比仍不失为一个评价的标准。”那么错在娜里呢？《文学报》认为，错在校长“虚报成绩”，错在“教师水平低，又不敢给很多学生打 2 分”，把罪过往下面推，玩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把下面的人拉出来作“替罪羊”的惯伎！最后，为了掩盖矛盾和转移人民对这种教育制度的不满，《文学报》还给“分数狂”开出了一帖医治药方，叫做“取消留级制度，不及格的也升级，但他必须在新学年内补回功课，补课的钱应按法律规定由其父母支付才算公正”。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苏联人民，把“分数挂帅”这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继续推行下去。呜呼！《文学报》这种所谓医治“分数狂”的妙法，到头来只是向着学生和家长开刀，使他们从政治思想到经济上双层受害。苏修一伙这种倒行逆施的丑恶行径，使我们更加清楚认识修正主义是什么样的货色！

“分数狂”从它脱胎之日起就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苏修叛徒集团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强化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养精神贵族的目的，就必然要把学校变成他们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必然要出现“分数狂”这种不治之症。它与腐朽没落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制度是血肉相连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苏修叛徒集团不垮台，修正主义不消除，“分数狂”就必然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文学报》玩弄的障眼法，只不过是更加疯狂地以“高分刺激”引诱苏联青年走修正主义道路罢了。

去年秋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妄图从教育领域打开缺口，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教育界奇谈怪论的炮制者四处活动，大肆攻击教育革命，极力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说什么“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其用意就是要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那一套。从苏修的“分数狂”，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和教育界奇谈怪论的炮制者妄图复辟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动实质，与苏修所搞的教育何等相似。我国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一伙照搬苏修“智育第一”、“分数挂帅”那一套，对工农学生进行残酷的迫害，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在学校里，考试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学生入学都要根据考试分数的高低决定取舍，升留级制度、退学制度等也都是以分数为主要标准。从全国到省、县，学校按分数排名次，分优劣，树“名牌”。分数成了对工农子弟实行管、卡、压的一根大棒。在这根大棒挥舞下，广大工农子弟被排斥在校门之外，他们说：“分数线，分数线，是对工农的封锁线，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线”。这种教育阵地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沉痛教训，革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对这种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毛主席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作过极其深刻的批判。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彻底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育阵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教育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公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批判“智育第一”，反对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克己复礼”，使我们重新回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老路上去，象苏修那样，把教育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从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批邓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为捍卫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斗争。

坚决与工农划等号——驳邓小平攻击大学生当工人、农民的谬论

工农兵学员　袁培树　黄天佑　李发华

1976-06-10　湖南师院学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农兵学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导，坚决与工农划等号，大学毕业当工人、农民。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却视若洪水猛兽，必欲扼杀之而后快，炮制了种种奇谈怪论进行攻击。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剖析，深入批判。

邓小平反对大学生与工农划等号的谬论之一，即所谓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必须指出，在这里，我们与邓小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是不是“取消”学校，要不要干部和技术员；而在于办什么样的学校，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尖锐，不许回避偷换！

毛主席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也就是说，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大学还是要办的”，培养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毛主席在这里着重强调了这支队伍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就是说，无论是干部技术员，还是科学家，都必须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普通一兵，“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引自《人民日报》1967 年 11 月 19 日）绝不许可做高踞于工农之上的精神贵族。这样的队伍，首先必须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战士，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必须打碎旧分工体制的束缚，象李光庆同志那样，既是干部、技术员，又是农民；既从事科学研究，又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为此，就需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学校是培养工人农民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是，在邓小平看来，工人农民用不着上大学，上了大学就不能再当工人农民，不这样，就等于“取消”了学校。显然，邓小平所要办的学校，就不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旧十七年的那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学府”、“摇篮”。他要培养的“干部”、“技术员”，当然也不能与工农划等号，而是骑在工农头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在这里，邓小平不正是彻底背叛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吗？

“搞一点白专不要紧”。这是走资派邓小平引诱工农兵学员走白专道路，破坏大学生与工农划等号的又一腐蚀剂。搞一点白专果真不要紧吗？否！事关大局，事关路线。白专道路是与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道路，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用以争夺接班人的软刀子。路线之争，要紧至极，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历史已经证明，学校从来就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阶级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阶级利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政治派别的划分上；不管大学生多么无私、纯洁、富于理想等等，他们不可能是整个社会的例外；……谁借口大学生的思想上的团结和大学生的一般革命化等等来抗议这种选择，谁就是使社会主义意识模糊。”（《革命青年的任务》）工农兵学员要在这场争夺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关健就在于必须从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有意识地把与工农的等号划好。从工农大众中汲取生气勃勃的战斗力，依靠本阶级的力量来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相反，如果一上大学，就把扎在工农之中的根拔掉，不愿意再与工农划等号，甚至想爬到工农头上“捞一把”，那么尽管根正苗红，历

史光荣，也难免被资产阶级俘虏过去。毛主席说：任何一个知识青年，如果“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这样，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大学毕业以后仍然应该回到工农中去，仍然应该与工农划等号。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后，醉心于资产阶级法权，往白专道路上走去，脱离甚至背叛自己的阶级，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惨痛教训，正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走资派邓小平打出“搞一点白专不要紧”的幌子，正如列宁一针见血地所指出的：“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七页）邓小平正是企图把“白专”与“干部”、“技术员”联系起来，并加以制度化，用“干部”、“技术员”等等桂冠作诱饵，把工农兵学员从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拉出来，拼凑自己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扮演中国的纳吉，其政治用心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与卖国贼林彪的“诱：以官、禄、德”是一脉相承，共裤连裆的。

攻击“社来社去”是“极左”，“是超越阶段”，这是邓小平反对大学生与工农划等号的又一“论据”，也是他在大学生当工人、农民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面前，资产阶级心理的恶性发泄。

我们知道，实行“社来社去”，培养的学生首先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士，同时又有一定的业务知识，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又会做工、又能务农、亦工亦农，为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开辟了新的途径。这正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做的事情，因而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他们说：“过去旧大学培养这人材，那人材，就是不培养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人材；旧大学这个系，那个系，就是同贫下中农没联系。现在办社来社去的大学，我们贫下中农养得起，三大革命用得着，送出去的回得来，毛主席‘完全赞成’，我们热烈欢迎”。可是邓小平却攻击它是“极左”，“超越阶

段”，就彻底暴露了他妄图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重新转化为阶级对立，把历史车轮重新“扭”回到由一小撮精神贵族垄断文化，而广大工农永远处于没有文化当牛作马的旧社会去的险恶用心。

由上可见，大学生要不要与工农划等号，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同邓小平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核心问题，我们工农兵学员必须头脑清醒，旗帜鲜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与工农的等号划好。

邓小平极力反对大学生与工农划等号，这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从阶级根源上来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就是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他代表着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时时刻刻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而他们之所以总是企图从教育阵地首先打开缺口，这是由于他们的倒行逆施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违背了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的利益，“翻案不得人心”，在政治战线上屡战屡败，极端孤立。妄图退守教育一隅，抓住这个旧传统最深，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的“世袭领地”，把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过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由上而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是对邓小平的这种反革命罪恶用心的一个绝妙图解。在斯大林逝世后，党内走资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利用窃取的权力，大肆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公开鼓励学生应以“爱情般的态度”来迷恋科学技术，“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文化水平”，增加这些“将终生为你服务”的“资本”，把上大学与当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并加以制度化。把大批名曰“红色专家”，实则已奴化成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训练了大批“人材”，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扮演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复辟剧。走资派邓小平继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衣钵，打着“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旗号，抓住教育阵地不放，而当大学生做工人农民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傲然崛起，从根本上动摇了资产阶级的世袭殿堂，打破了邓小平把教育阵地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的阴谋，这怎能不叫他如丧考妣，痛哭欲绝呢！

历史上的社会思潮总是有其继承性的，邓小平反对大学生当工人、农民，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孔丘反动教育思想这个罪恶渊薮。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卫道士孔丘，为了挽救奴隶主的“先王之教”，为了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以达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目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办教育，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教育思想。孔丘教育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他提出的培植“死守善道”的反动分子的教育方针，即把奴隶主贵族的下一代训练成至死不悟的维护奴隶制度的顽固分子。为了达到他这个反动的培养目标，孔丘赤裸裸地举起功名利禄的钓饵，提出“举贤才”和“学而优则仕”的口号，要奴隶主贵族招纳、收买知识分子；向门徒灌输“学也，禄在其中矣”。孔丘及其门徒公开把求学叫做“干禄”，“干”者“求”也。毫不隐晦他们求学为的就是升官发财。孟轲进一步阐发了孔老二的这一观点，说什么读书人做官，同农民种地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把“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奉为办学的宗旨。这样，一个要买，一个愿卖，“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孔丘就是企图用这个办法，以读书做官这条金锁链，把知识分子紧紧地拴在没落奴隶制的破船上。这就不难看出：孔丘提倡“学而优则仕”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读书人个人升官发财，而是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出发，培植决心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官僚，为奴隶制寻找殉葬品。这就是孔丘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根本目的所在。

党内走资派邓小平公然反对大学生与工农划等号，用扩大三大差别，膨胀资产阶级法权来“刺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鼓吹大学毕业应该当工人贵族，凡此种种，不正是孔丘的“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读书人不做官就不合道理）的现代语翻版吗？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孔丘宣扬“学而优则仕”，是为了把教育

变成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工具；当今的邓小平鼓吹要当工人贵族，是为了把教育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百倍的警惕。针锋相对，自觉地、有意识地坚决与工农划等号。让党内走资派邓小平死抱住孔丘的亡灵去哭泣吧！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胜利进军，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我们要用自己“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来建设灿烂的新生活。”（列宁：《致我们的接班人》，《列宁全集》第三十卷）。

新沙皇与新贵族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岱山红

1976-06-20　人民日报

马克思主义认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是与阶级社会相始终的。随着阶级的消灭，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在内的阶级差别必将消失。而在自称已经消灭了任何阶级“冲突”和阶级“对抗”的苏联社会，人们却看到了相反的景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不仅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别，而且存在着越来越尖锐的对立。在今日之苏联，精神贵族一类的人物天然高人一等，从事体力劳动则被视为下贱的事情，那些读书做官、鄙视劳动人民等腐朽思想大量蔓延。在苏联一些学校调查的结果表明，由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结果，普遍追求专家、博士之类的头衔和职位，而钢铁工人被列为第二十八位，车工为第三十五位，拖拉机手为第五十一位，田间劳动和饲养牲畜则被视为“最下等的职业”。难怪有人说，在苏联，“除了在党的宣传品中，体力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声誉”。

很显然，苏联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不断扩大，一批批鄙视体力劳动的新精神贵族的不断产生，这是苏联社会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苏修新沙皇。今天苏联的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在这些学校里，苏修竭力向青年灌输知识资本化、读书做官等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大搞“天才教育”。苏修的所谓《教育立法原则》就明文规定：进职业技术学校的人应被训练成为“工人阶级后备军”、“青年熟练工人”；进高等学校的人则可以爬上“高水平的专家”的宝座。苏修还为所谓“天才生”开设了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这些同工农划不等号、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特殊学生，一出校门就被分配在苏修统治机器的各级位置上，享受与老百姓截然不同的待遇，为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效劳。至

于能进高等学校和特殊学校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子女。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受更高的教育被苏修污蔑成“在石头上播种的无效劳动”，至于其中一部分进了职工技术一类的学校，也只能被培养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熟练的雇佣劳动者。这真是等级森严，泾渭分明！长期以来，由于勃列日涅夫一伙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散布修正主义的毒素，采用各种措施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象阴雨后的霉菌一样，应运而生。

当然，苏修为了掩盖他们背叛马列主义、背叛苏联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叛徒面目，在演说中和宣传中还是少不了塞进一些冠冕堂皇的虚伪辞藻。他们除了给那些培养精神贵族的学校戴上“人民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学校”一类的桂冠外，还煞有介事地喧嚣什么要“按照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规范培养学生”，用“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子女”，“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等等，这统统都是无耻的欺骗。勃列日涅夫一伙不过是在这一骗人的幌子下，竭力培养精神贵族，培养资产阶级奴仆。苏修满以为凭这种廉价的喧嚣就可以遮人耳目，实在是可笑至极。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历来是阶级对立的反映，苏联社会也不例外。今天的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下，一小撮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广大工人和农民终年辛劳，却收入低微，而那些精神贵族却成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宠儿，他们不劳而获，却占有比一般工人、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工资收入，此外还享有种种特权，过着优裕的生活。这种严重情况，不能不加剧阶级的对立，激起苏联广大劳动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苏联人民总有一天会奋起推翻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在苏联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一切土壤而斗争。

决不和工人讲平等的新贵族——评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范毅平

1976-07-01　红旗

在苏修舞台上，近年来有个名叫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的“能干的女人”大出风头。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还特意把她夸奖了一番。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勃列日涅夫“为之而感动”、并赞不绝口呢？翻开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一看，明白了：原来这个“能干的女人”，在推行勃列日涅夫的反革命路线方面确实“能干”异常。

这个“能干的女人”，是一家有一百四十年历史的纺织厂的厂长。在厂里，她简直就是一个勃列日涅夫。一个车间完不成计划，她就下令各车间的工人放弃休息日加班；工人如果不老老实实遵从她那套规章制度，她便加以训斥、嘲骂，甚至以收回住房和解雇相威胁。在和工人的关系上，她完全以比工人高一等的统治者自居。当马尼娅等老工人在住房方面提出平等要求时，这个女厂长便振振有词地教训了她一顿：

“不，马尼娅，我们不是大家都平等的。我和你就不平等，你别见怪。过去我们曾经平等过，可是后来……我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我们这就已经不平等了，对吗？只不过你知道，我的权利不是继承的遗产，也不是买彩票赢来的。权利大家都是一样的嘛。”

好一个“我和你就不平等”！好就好在她直言不讳，鲜明地道出了苏修社会的阶级关系，清楚地说明了苏修教育制度的性质。

人所共知，勃列日涅夫不断吹嘘苏联已处在什么“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没有敌对阶级和剥削”，到处是一片“新的、和谐的关系”。可是，他宠爱的这

个“能干的”女厂长，却公开亮出坚决维护和工人“不平等”的信条。这的确和勃列日涅夫的鬼话不太“和谐”，然而却是事实。今日的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操纵着社会产品的分配，从而也就支配着工人的命运。从中央的总书记、部长，到每个企业的经理、厂长，构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他们和工人的关系，已成为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列宁在《论国家》中说得好：“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6 页）。住在有现代化设备的高级住宅里、并以压迫工人为自己“权利”的安娜，怎么会与住在十九世纪盖的“兵营”里的马尼娅讲“平等”？从这点上说，安娜不无可爱之处，因为她比勃列日涅夫坦率得多。

耐人寻味的是，安娜本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她和工人“曾经平等过”。从“平等”到“不平等”的奥妙何在？就是因为她“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就应该从和工人“平等”的地位上升为统治工人的贵族老爷的地位，就理所当然地要享受各种特权。在苏修新沙皇的统治下，苏联的一切文化知识，一切科学技术，统统商品化了。前不久，勃列日涅夫就公然宣称：“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这些青年时代赚来而以后又不断添加的资本，将终身为你服务”。这一妙语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苏联教育的修正主义本质。有了大学文凭，就等于赚来了“宝贵的资本”，获得了压榨工人的权力。知识，这个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在今天的苏联，就这样地起着资本的效用而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贵族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把知识作为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不是安娜的创造，也并非勃列日涅夫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从我国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孔丘、孟轲鼓吹“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到封建文人鼓吹“万般皆下品，唯有

读书高”，一直到欧洲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知识就是力量”等等，都把掌握文化作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资本。大家知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是造成阶级差别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原始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治“劳力者”的“劳心者”。只是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才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所谓“劳心者”。从此，文化科学知识就被这些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劳心者”所垄断，成了剥削阶级的世袭工具。这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53 页)。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这种不平等。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居然恬不知耻地为“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不平等高唱赞歌，这正好说明在他们那个名曰“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发达”的正是资本主义。

安娜之所以受到勃列日涅夫的特别宠爱，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把受高等教育当作爬到工人农民头上的阶梯。正是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当上所谓“红色专家”后，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不想与工人划等号了，并且拼命追求、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成为骑在工农头上的吸血鬼。这些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时机一到，他们就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伙新资产阶级分子，极端仇恨工人，压迫、剥削人民比老的资本家还厉害。从表面上看，确实如安娜所说，他们的权利“不是继承的遗产”。但是，苏修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却保障和维护了他们的继承权。当大官必然要读大学，读大学就有条件当大官。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里如数家珍般地夸耀：“现在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受过工程技术教育及农业教育。……市委和区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二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是工业和农业专家。今后我们应当

更加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安娜便是这条反革命路线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这条路线的狂热推行者。然而，正是通过安娜这个“能干的女人”和她那套不平等的理论，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都看到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血淋淋的现实，懂得了勃列日涅夫发誓要“更加坚定地贯彻”的“这条路线”，是把一小撮新贵族捧到天上，把劳动人民打入地狱的路线。

苏联变修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不但要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必须坚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所以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痕迹。对这种不平等是限制它，缩小它，创造条件逐步消灭它，还是赞美它，扩大它，表现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不是公然反对读了大学和工人农民划等号吗？划不划等号，意味着属于哪个阶级的问题。愿意划等号，就是愿意跟工农兵一起革命，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不愿划等号，就是以为读了点书便有了资本，想爬到工农头上作新贵族了。这后一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出路的；要找出路，则必然热衷于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的路线，在阶级本质上和勃列日涅夫的路线是一致的。如果邓小平的阴谋得逞，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妨看看这个剧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不失为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安娜这个被勃列日涅夫所宠爱的女厂长，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反对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就是要培养工人贵族——批判邓小平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罪行

云彤文

1976-07-14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学校培养什么人，沿着什么道路和依靠谁培养，这些问题，我们和邓小平存在根本分歧。深入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批判邓小平反对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谬论，对我们坚持“教育要革命”，发展大好形势，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必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

为哪个阶级培养人是教育领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焦点。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邓小平则继承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青年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

上了大学，要不要和工农划等号，是关系到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教育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总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它是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为无产阶级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最终目的决定的。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科学论断，深刻揭露了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进一步指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两个阶级的阶级斗

争，突出地表现在党内。走资派成为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作坚决斗争，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这是无产阶级的长期和艰巨的历史任务。学校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必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能同党内外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革命战士。

现在，大学正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出现了大学生毕业当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力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这场深刻革命，触动了资产阶级利益。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便亲自挂帅，竭力反对，胡说“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恶毒攻击工农兵“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为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反对教育革命，反对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他心目中的大学生，就是高踞于工农之上的工人贵族。他要把学校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邓小平反对大学生和工农划等号，是孔老二“惟上智下愚不移”的翻版，是邓小平唯心史观的大暴露。有人认为上大学掌握了科学文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比普通劳动者更大，怎能划等号呢？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必须指出，劳动人民是科学文化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读了大学不当普通劳动者，就会成为工人贵族。讲贡献，首先看路线。劳动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贡献最大。我们只有作为普通劳动者，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做出应有的贡献。

同邓小平反对划等号对着干，我们就一定要树立为工农上大学，来自工农，回到工农，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一辈子的思想，自觉改造世界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做反修防修的革命战士。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谁都要改造，

不然，即使工农出身和经过革命斗争长期锻炼的人，也会变坏，变成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者。

必须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

沿着什么道路培养人，也是教育领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问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无产阶级教育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开门办学，走光辉的《五·七指示》道路，"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实践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向工农学习，真正实现"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培养与工农划等号的、敢于同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革命战士；才能有利于工农参加管理学校，有利于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提高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邓小平出于资产阶级本性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总是迷信把学生关在高楼深院，搞"三脱离"的旧大学。他恶毒攻击开门办学，胡说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把整个现代化教育水平拉低"，"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诬蔑现在的大学生不如"十七年"培养的质量高，胡说无产阶级教育有"危机"，要"整顿"，妄图反对我们走《五·七指示》道路，培养与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把教育"扭"回到"十七年"修正主义老路上去。

回顾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的严重状况，对比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邓小平鼓吹的所谓"高质量"，反对在三大革命中培养人的谬论是什么货色。

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中山大学，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学校，严重“三脱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不少青年的革命青春、革命朝气被消磨净尽，有些工农子弟被腐蚀而走上和平演变的歧途，真是触目惊心。那时，走资派公开鼓吹“政治上不进法院，健康上不进医院，业务上要进科学院”的修正主义口号。资产阶级教授宣扬“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的反动的人生哲学。当时，许多人毕业后，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和工农大众格格不入。学理科的解决不了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学文科的不会搞阶级斗争。这就是邓小平所要的“高质量”。

现在进校的工农兵学员，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走光辉的《五·七指示》道路，与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中锻炼成长。他们经过几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继续革命的觉悟都大有提高，业务学习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在校期间就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文科师生坚持以社会为工厂，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和其它战线，积极参加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评论《水浒》，在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中，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们在工农兵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结合各项战斗任务，编书，编教材，写批判文章，翻译外文资料，举办短训班和学习班，培养理论、宣传骨干，协助工厂、农村开办工农业余大学，做学习辅导报告和专题讲座，在斗争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理科工农兵学员的质量，也是旧大学理科学生所不可比拟的。拿七五届工农兵学员的毕业实践来说，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开门搞毕业实践。在教师指导下，选择了力学、广播电视、激光、有机化学、生物防治、稀有金属、地质等方面的研究和设计为课题，在完成的一百三十多项毕业实践任务中，有四十四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些项目的成果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空白，有的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校已毕业的工农兵学员，

都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其中有不少人志愿到边疆、农村、海岛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和旧大学许多毕业生留恋大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认为看质量，首先要看路线，看德、智、体全面发展，看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有社会主义觉悟，没有这个觉悟，单纯追求提高生产力，那和帝、修、反的大学有何区别？资产阶级总是打着“智育第一”的幌子，向学生灌输“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思想，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恭顺奴才。搞“三脱离”，读死书，死读书，向古人、洋人顶礼膜拜，搞什么“纯理论”研究。这是修正主义路线培养人的道路。可见，我们和邓小平在质量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坚持什么方向，沿着什么道路，培养什么人的分歧。只有坚持“教育要革命”，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坚持在三大革命中培养人，才能符合无产阶级的质量标准，培养出与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而按照邓小平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去搞，就会象苏修那样，培养出“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培养与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根本保证。邓小平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鼓吹“教授治校”，胡说“右派教师也可以起主导作用”。他重新工作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狂叫“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教育要整顿”，妄图整掉工人阶级领导，整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青年干部，让那些资产阶级教授、权威重新掌权，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以资产阶级的面貌培养工人贵族。

回顾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斗、批、改以来，学校发生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回顾按照工人阶级世界观改造和培养人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最先进、最革命的工人阶级最具有三大革命的丰富经验。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几年来，遵照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我校采取了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请进来，走出去”、厂校挂钩、厂校合作、半工半读、社来社去、几上几下、办短训班等多种形式，把学校教育置于工农群众直接参加、管理和监督之下，坚持在三大革命中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在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广大师生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工农群众一起学，一起批，在斗争中接受再教育，吸取政治营养，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一位学员围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看了许多书，摘录了不少资料，自以为懂了。在农村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时，遇到生产队长以加工分刺激社员的积极性，他认为不错。但遭到贫下中农的反对。他总结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深刻教训，在实践中自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工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做好了各项工作。他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在三大革命中，接受工农再教育，提高路线觉悟，才能分清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才能加深理论与实际联系的理解。”师生们的切身体会，给邓小平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学校以有力的回击。

邓小平既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培养人，又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他打着关心知识分子的幌子，挑拨他们同党的关系，破坏建设革命化的教师队伍。总结教育革命的实践经验，我们深深体会到，要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必须建立一支以工农为骨干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校在依靠工人阶级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同时，还注意对原有教师队伍的团结、教育、改造，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不断地改造世界观，使他们在三大革命中，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树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提高他们搞好教育革命的积极性。不少教师在教育革命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邓小平一面叫嚷“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培养人；一面又鼓吹“白专”道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妄图用“白猫黑猫”论，网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教授、权威、右派分子，恢复“教授治校”，依靠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培养工人贵族。这就更清楚地看到，在依靠谁培养人的问题上，邓小平一贯推行了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通过批判邓小平反对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谬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党的最终目的，才能自觉地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弄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树立长期作战思想，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和邓小平对着干，努力培养能够同党内资产阶级作长期斗争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使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新体制调查

1976-07-15　人民日报

在繁花似锦的教育革命大花园里，有一朵光彩夺目的鲜花迎风怒放，它就是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这个厂是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光辉照耀下，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开始建立的。厂里设有计算机、半导体、程序设计三个专业，和生产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器件以及仪器设备维修等车间。一九七五年初，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推动下，全厂正式实行半工半读，三个专业分别和相应的车间合并，工人、工农兵学员、教员混合编班，从上到下建立了统一的党、团、行政机构。它实行校办工厂，厂办专业，专业和车间合一，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学员以学为主，半工半读，边学习、边生产、边搞科研；教员以教为主，半工半教，边教学、边生产、边搞科研；工人以工为主，边做工，边学习，同时管理教育，参加教学和科研工作。这是大学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冲破了旧大学的老框框，向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的方向前进，为办好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提供了新鲜经验。这是在教育阵地上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措施，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步骤，是一株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幼芽。最近，我们访问了电子仪器厂。在半导体专业二年级，我们看到，课堂就是生产半导体器件的车间，学员们有的在光刻机旁聚精会神地操作，有的在扩散炉前冒着高温劳动，正在试制一种尖端产品。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一边搞科研。去年下半年，这个专业二年级的工人、学员、教员三结合的研究小组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解剖国内外同类型的产品，虚心学习有关经验，提出了新产品的设计方案。工人、学员、教员都登台讲课，进行认真的讨论，教学生动活泼。一位教员说："文化大革命前讲的是外国四十年代的陈旧教材，步洋人

的后尘；现在讲的是反映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崭新内容，走自己的道路。”他们就是这样，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确定了设计方案。然后分成几个小组，人人动脑，个个动手，设计电路，绘制版图，试制生产。学员们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学习期间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一个外单位的科技干部在仔细看了学员们设计的电路和绘制的版图之后，惊讶地说：“真想不到二年级学员就能做出这么出色的成绩！”学员们结合这项战斗任务，学习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半导体物理、电学、数学等课程。他们普遍反映，这样学得快，理解得深，记得牢，用得上。

电子仪器厂各专业都象半导体专业二年级一样，结合战斗任务和典型产品组织教学，使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各专业都有通盘考虑和大体安排。比如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在整机车间劳动，熟悉电子计算机结构，掌握生产工艺；二年级在设计调机车间劳动，主要进行计算机的设计、调试、维修；三年级重点参加新产品的研制工作，各年级都密切联系实际学习有关课程。这样，就打破了旧大学“老三段”（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体系，打破了以教师、书本、课堂为中心的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论组织教学，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半工半读对于转变学员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工农兵学员在劳动中自觉地磨练思想的生动事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产一种高级精密的半导体元件，需要超净的条件。不少学员在四、五十度的高温下，一天八、九次跪在地上用毛巾擦地板，裤子磨破了，膝盖跪肿了，仍然坚持战斗，把地板擦得闪闪发光。他们说：“旧大学生根本看不起这些工作，我们就是要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我们擦掉的不仅是地板上的灰尘，而且擦掉了思想上的灰尘。”学员在和工人共同劳动中，培养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有个学员看到车间里的有害气体

影响工人健康，心里非常不安，便主动设计了一个排气系统，近一个多月以来，他经常和工人一起干到深夜，现在已经制造、安装成功。工人师傅高兴地说："半工半读育新人，工农兵大学生和我们心贴心。"有个学员刚入学时曾错误地认为，自己上大学就是来"装知识的"，对半工半读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工人师傅不为名、不为利、一心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想，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什么？难道是为了不和工人划等号吗？这不是在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精神贵族的老路吗？从此，他虚心向工人学习，自觉地当好普通劳动者。前些时候，为了完成一项突击性的战斗任务，他把铺盖搬到车间，日夜奋战，困了休息一会儿，半夜爬起来用凉水冲冲头再接着干。这次我们访问他时，他感触很深地说："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不实行半工半读是不行的。"

专业和车间合并以后，各级领导班子都有工人参加，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各项工作的领导，工人参加教育革命，做学员、教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一起编写大学教材，登上大学讲台和大学科研阵地，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半导体专业的工人有四分之一以上登台讲过课。计算机设计调机车间工人有一半以上参加过计算机的设计和调试工作。老工人吴占海被学员们称赞为"教育革命的带头人"。他经常和师生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七·二一指示》、《七·三○指示》，使大家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度，认识半工半读的重大意义。他主动搬到学员宿舍去住，和师生谈心。他一面生产，一面参加教学，把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传授给学员。

电子仪器厂党总支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和工厂、农村、部队、商店挂钩，组织工农兵学员广泛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实践，不断提高大家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电子仪器厂毕业的大学生，来自工农，不忘工农，努力同工农划等号，当普通劳动者，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做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士。去年年底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纷纷要求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现在，他们大部分朝气蓬勃地战斗在祖国的边远地区，有三名学员奔赴世界屋脊，豪迈地表示：扎根西藏干一辈子革命！有个毕业生回到原来的工厂，主动到被旧大学生认为没有技术、低人一等的班组当工人，他看到工人磨一种产品把手都磨破了，效率又低，便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工人共同研究，大胆改革，用机器研磨代替手工，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工人师傅高兴地说："这才是咱们工人自己的大学生。"

教员半工半教，经常在车间顶班劳动，和工人、工农兵学员并肩战斗，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老教授黄昆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一些熟悉他的同志说："老黄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简直是两个人。去年他从国外参观访问回来，刚到厂便直奔车间，袖子一卷就和工人一起干活。"这次我们找他，他正在车间旁边挖土坑埋水管，他把铁锹往墙上一靠，擦了擦汗水，便和我们谈起来。他说："和工人师傅相比，我还是个小学生。"他谈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北大，他当了十年半导体教研室主任，却没有到半导体工厂呆过一天。文化大革命后，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从工农兵中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和实践经验。电子仪器厂的党组织对他政治上的进步十分关心，使他更加坚定了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决心。近几年来他和工人、工农兵学员共同努力，研制成功了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集成电路，为国家填补了电子工业方面的空白，在实践的基础上，又一起修改教材，理论上也有所提高。黄昆愤怒地批判了邓小平妄图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的罪行。他说，邓小平想以名利为诱饵，把知识分子拉回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充当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

更令人高兴的是，许多青年教师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坚决和工农划等号，展现出一代新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去年八月，全厂革命、生产蓬勃发展，食堂成了薄弱环节。一九七○年留校当教员的红卫兵小将魏引树，主动申请当炊事员。他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看实际行动。"到食堂后，他虚心向老师傅学习，起五更，睡半夜，埋头苦干。数九寒天，自来水冰凉刺骨，他抢着刷家具；盛夏酷暑，锅灶旁烟熏火烤，热气蒸人，他抢着烧火、抬屉；下水道堵住了，他蹲下去用手把又粘又臭的垃圾掏干净。他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革命行动受到群众的称赞。有人吹冷风说："放着大学教师不当，跑到食堂里侍候人，还美呢！"他响亮地回答："努力缩小三大差别，奔共产主义大目标，美得很"！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电子仪器厂师生员工能够在教育革命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阔步前进，是他们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结果。去年六月这个厂研制成功两种型号 1024 位随机存贮器，填补了我国电子工业的两项空白，它对于我国电子计算机、通讯工程、空间技术等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出于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编造"两千片才成功一片"的谣言，攻击这个厂搞成这种尖端产品"是碰的"，说什么外国比我国"高得多"，我们"理论不行"。电子仪器厂师生员工不怕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愤怒批判邓小平崇洋媚外的无耻谰言。他们说："邓小平攻击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道路。他所谓的'理论'，就是旧大学那种脱离我国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的'理论'。他要恢复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老路上去，把学校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和邓小平对着干，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在今年三月试制成功了一种新型的、更先进的 1024 位随机存贮器，又填补了我国电子工业的一项空白。去年以来，他们共进行了二十四项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完成十三项，其中

四项填补了国家科学技术空白。仅去年一年，这个厂的工人、学员、教员平均每人为国家创造了价值近二万元的财富。

毛主席教导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目前，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师生员工正在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记者

坚持“七·二一”道路　培养工人阶级科技队伍

中共上海机床厂委员会

1976-07-20　中国科学

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胜利地向前发展。在这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搏斗中，我们全厂职工在狠批“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过程中，以落实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实践，有力地回击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的恶毒攻击。

1968 年 7 月 21 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了光辉批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无比英明正确，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1968 年 9 月，厂里办了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前两期已有一百五十名工人学员毕业，第三期一百零九名学员也已入校学习了近两年。此外，通过“三结合”设计，以及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等多种途径，又培养了一百多名工人技术员，涌现了四、五百名技术革新能手。全厂还有两千多名工人，先后参加厂、车间两级的各种业余技术、文化班学习。目前，参加厂业余政治学校和干部读书班学习的干部、工人有近两千人。现在全厂工程技术人员有七百多人，工人出身的比例从 1968 年的 45%上升到 65%。走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使我厂在政治、思想、技术、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工人阶级的优

势不断扩大，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进一步落实。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学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联系七年多来贯彻落实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实践，我们感到格外亲切，深深感到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土壤的一项战略措施。

然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对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进行无耻的歪曲和恶毒的攻击。他公然跳出来，胡说什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是个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玩弄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污蔑这条光辉道路仅仅是个"形式"，否定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事实胜于雄辩，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光辉道路不容诋毁！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工厂的部分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广大工人群众手里。解放以后，工厂虽然已是全民所有制了，但是许多事实说明，在技术领域里，领导权实际上被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着。比如说，有这样一件事：当时，国家需要我们厂设计制造一种大型磨床，厂里开会讨论接不接，有的同志认为，根据现有条件，是可以想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主张承担下来。可是，厂里个别领导人却借口"条件不具备"给否定了。就是这样的大型磨床，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工厂生产条件没有多大改变的情况下，已经制造出来了。这件事说明，工人群众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只有在正确路线领导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大批工人登上了工厂各个方面的领导岗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进一步贯彻。虽然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比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要好得多。还是拿技术领域来说，有个车间的变化给我们深刻的启发。这个车间近五百人，几年中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支援内地建设。1974 年与 1965 年相比，职工人数相近，生产能力却提高了两倍。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工人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努力学政治、学技术、学文化，工人技术人员的队伍从 1965 年的十二人增加到现在的四十多人。这些工人既能做工又会设计，几年中，自行设计和制造了专用设备三十多台，实现小改小革六百多项，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新贡献。这使我们看到，贯彻落实毛主席“七·二一”指示，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工人群众越来越多地成了技术领域的主人。有了这支队伍，就能使工厂的技术大权更加牢靠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就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上述事实说明，科技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对企业的技术领导权要得到巩固和加强，必须有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技术队伍，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技术的垄断，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七·二一”道路，贬低为“形式”，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我们工人阶级已经得到的包括技术领域在内的领导权再夺回去。

技术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是造成等级、特权的一个条件，是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是否让广大工人群众掌握科技理论知识，这关系到对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扩大，对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是保留还是铲除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工厂不但要出产品，还要出人才，成为反修防修的战斗堡垒，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如果工厂只搞生产，不实现无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仍然有改变性质的危险。坚定不移地按照毛主席“七·二一”指示，不断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扩大无产阶级的优势，才能保证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我们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已毕业的两期学员，无论是本厂或是外厂的，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以后，大多数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技术革新运动中的一支骨干力量。本厂的一百名学员中，有 80%是工人理论队伍成员。他们参加设计制造的五十八项新产品，有精密、大型、自动、数控磨床，也有生产急需的专用设备，其中有的已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工人群众称赞他们是“理论学习的骨干，反修防修的尖兵，技术革新的闯将，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突击队”。工人技术队伍的不断壮大，也为更多的工人群众掌握科学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我们再努一把力，通过厂办大学等多种途径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又红又专，能上能下，能文能武，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紧密结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共产主义新人，工厂的各个领域将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

目前，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技术知识作为商品，懂得一些知识，就高人一等，轻视工人群众。工人要搞革新，由于不会画图、计算，有些设想就不容易实现。如今，由于落实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这种情况就有了改变，不少工人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技术理论知识，要搞革新能动笔，画了图纸能加工。这样就使得把技术作为商品的市场缩小了，促使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逐步建立起新型的相互关系。我们厂原有四百名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其中一百九十名陆续支援内地），六年多来，绝大多数都参加过一年左右的连续生产劳动，有的几年来一直扎根在班组，与工人相结合，在世界观的改造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1968 年调查报告中提到的那位“副博士”，当时，她看到调查报告，情绪抵触。后来，她到二车间参加两年多的装配劳动，在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下，认识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自己的

毒害，思想感情起了变化，逐步消除了“怨气、泄气、不服气”的情绪，在劳动中注意改造世界观，进步较大。最近，她参加一种国家急需的大型磨床设计工作，担任一个部件的设计。在设计过程中，下车间向工人学习，听取群众意见，受到了称赞。这个“副博士”的变化，说明了从旧学校出来的，即使是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较深的知识分子，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其中结合得好的，还可以大有作为。实践证明，工人技术队伍越壮大，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就越有利，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将更加健康。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所指引的“七·二一”道路走下去。经过长期的努力，工人技术人员将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得越来越好，就能逐步打破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的等级界限，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逐步使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同一个人身上体现。实现“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伟大目标。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恶毒攻击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光辉道路，正说明他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狂热维护者。

落实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实践，促进了工厂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为例，不仅有二百多名工人上大学，而且还有六、七百名工人分别担任兼职教师或参加辅导设计、实习、编写教材等教学活动。工人直接参加上层建筑领域的实践，就取得了更多的发言权，提高了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自觉性。我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第一期学员周赛飞，毕业后分配到厂磨床研究所。她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坚持现场服务，不脱离生产劳动，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她对知识分子中出现的问题，能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设计工作中认真听取工人群众的意见，敢于冲破老框框。几年来，她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被群众推上领导岗位，现在担任了磨床研究所党支部副书记。象这样的同志，我们第一、二期毕业生中，还不止是她一个。这样的大学生与有些旧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闹名誉、要地位，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

比！实践证明，让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工人参加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对于工人阶级占领、改造上层建筑大有好处。同时，也有利于在设计、科研和生产中更好地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就拿我厂新产品试制来说，六、七年来，我们试制成功一百多种新产品，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一倍半。其中由工人技术员担任主要设计的有六十多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倍多。过去，在修正主义企业路线影响下，我厂对特大型磨床设计制造任务不接收。现在，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下，只要国家需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1974 年大型机床的产量比 1965 年增加了三倍。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七·二一”道路的罪恶目的，就在于反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对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正如毛主席早在 1957 年就指出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个任务，加速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光辉道路，大力发展厂办、社办学校，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厂来厂去，社来社去。实践证明，厂办工人大学是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我们厂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平均每年从大学分配来厂担任技术员的只有十五人，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六年来培养了一百五十名，每年达二十五人。厂办工人大学已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造就工人阶级宏大的知识分子新部队，难道还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吗？说穿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无非是以“不是唯一的形式”为幌子，贩卖他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否定毛主席指引

的“七·二一”道路，否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妄图把刚刚深入开展的教育革命，扭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

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是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的金光大道。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不等于说培养一批工人懂得技术理论知识就完事了，而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自觉战斗。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走“七·二一”道路，首先是“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这一条，或者不自始至终地坚持这一条，就是违背了毛主席指出的根本方向。有些同志认为，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领导权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多设计一些产品。这是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竭力推行的“唯生产力论”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有过教训。有的工人，开始表现很好，后来他掌握了一定的技术，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名利思想充满了头脑，贪图享乐，滑进了资产阶级的泥坑。工人群众说这些人是“知识到手，人被夺走”。我们深深感到，要办好工人大学，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上好阶级斗争的主课，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事实证明，凡是这样做了，就前进；凡是有所忽视，就出现教训。我们实践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对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理论基础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有力批判。

文化大革命以来，工厂向学校派出工宣队，这是“掺沙子”。“七·二一”工人大学办在工人阶级集中的工厂里，好比是办在“沙窝”里，这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办好大学的优越条件。但是，“沙窝”里有阶级斗争，“沙窝”外边也有风浪。这个风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从阴暗角落里刮起的。我们决不能低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侵蚀。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工人大学生也要演变过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社会

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我们工厂内部来、工人大学内部来。1972 年，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基础风”，说什么结合典型产品组织教学使学员“学习面太窄”，是“实用主义”；说什么工人大学是“小学的底子，中学的本子，大学的牌子”；说我们培养的学生“基础太差”、“质量不高”。当时，我们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和有关教育革命的其他一系列指示，顶住这股不大不小的西风，坚持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甘心失败，如今再次跳出来与我们较量，不可一世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又在“质量”问题上攻击我们。然而同样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对于教育质量，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路线有不同的标准。现在我们的大学，贯彻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从生产实践中来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几千年教育史上，有过吗？按照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要求，我们还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但是，就是现在，我们学校的质量也是与旧学校无法比拟的。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使我们认识到，“七·二一”工人大学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旧土壤上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旧学校的痕迹，还可能走老路，也可能出现“新垃圾”。这几年来，在对我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看法上，有些同志只看到“七·二一”工人大学是新学员、新班子、新学校，觉得完美无缺，什么都好。有的同志，对于学校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分主流和支流，不看现象和本质，不作具体分析，就觉得与旧学校“差不多”，怀疑它的方向。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都不符合客观实际。“七·二一”工人大学七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我们对毛主席指示学习、理解还不深，贯彻执行还不够自觉，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办学虽然起步比较早，但步子不大，办学形式比较

单一，我们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且现在也不是理解得很深了。学校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党委的问题。上级党委和工人群众也经常对我们提出尖锐的批评，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正确方向。然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抹杀成就，攻击主流，胡说“七·二一”道路“是个形式”，我们是绝不能答应的！

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决心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朝农”和各地的先进经验，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狠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走下去，努力把“七·二一”工人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工厂办成一所共产主义大学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科研所——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而作

中国共产党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委员会

1976-07-20　中国科学

正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在全国深入发展的时候，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迎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周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有极其伟大的意义。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科技战线也同全国一样，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历史经验，大胆实践，不断提高认识，不断前进。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科技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使所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去年夏季以来，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了右倾翻案风，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扼杀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搞复辟倒退活动，公然叫嚷：“什么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谁能说得清楚？”明目张胆地为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翻案。然而，“翻案不得人心”。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最近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以及粉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胜利，宣告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的破产。我们一定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乘胜前进，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们在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斗争中，对于如何办好一个社会主义的科研所，有一些初步认识和体会，概括为八个方面。

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掩盖科技战线的阶级斗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则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努力把科研所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历来以“科学技术特殊”为借口，打着“为科学而科学”的幌子，掩盖科技战线的阶级斗争，抗拒在这个领域里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在他的支持下，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公然提出：“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拼命反对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充分暴露了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我们必须和他们对着干！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建国二十几年来，我们科技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非常尖锐、激烈的。在我们科研单位，怎样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就要用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科研单位几个方面进行阶级分析，并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首先，我们对领导班子进行了阶级分析。因为，路线是根本，班子是关键。通过分析，看看我们班子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是否清楚？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矛盾以及阶级矛盾在本单位的表现能不能看得清？反映的是哪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三个正确对待”解决的好不好？也就是说，看一看我们领导班子是一个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战斗指挥部呢？还是相反。通过总结历史教训，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揭发批判了过去领导班子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忘纪了阶级斗争，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那时，群众问我们班子的主要领导：“化物所阶级斗争表现在什么地方？”他说：“看不清”，当时确实是看不清。由于看不清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然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难以很好的理解，也就很容易接受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我们班子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加深了对阶级斗争及其在本单位的表现的认识。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使我们懂得了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领导干部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这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弄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必须注意抓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促进资本主义的衰亡。在斗争实践中，我们领导班子有一条体会，就是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要结合实际，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取得主动权，不断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什么？怎样革的问题。

第二是对知识分子队伍要进行阶级分析。我们化物所有职工一千多人，其中科技人员近七百人。这支知识分子队伍，就其历史和出身成分来看，一部分是从

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大都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以来大、专学校毕业的，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或是干部子弟。从政治表现来看，可分三部分。一是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得比较好，世界观改造有成效，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不断前进。这部分人虽然是少数，但却是我们的骨干力量。中间的是多数，这些人解放以来，经过多次政治运动和路线教育，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练和几年来科技领域的革命实践，思想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他们敢想、敢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以上这两部分人汇成了我们单位前进的主流。还有一些是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比较顽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抵触，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常常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和我们相对立，当反面教员。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气候土壤一适合，便会跳出来，要把社会主义的科研所往资本主义道路上拉。例如，一九七二年社会上出现右倾复辟思潮时，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在所的科研计划会议上争学科、争领域。因为不能满足他在某方面的学术垄断地位，就反对按照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把全所的科研工作集中为几个任务方向的做法，无视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实际上是向党争夺领导权。去年夏季前后，当右倾翻案风吹来的时候，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一反常态，跃跃欲试，甚至有的还公开宣称："我对党领导科研有点不习惯呀！"更为严重的是还有的在公开场合指责党支部说："你们天天讲阶级斗争，到处抓阶级斗争，还让不让说话了。"对这部分人坚持的资产阶级方向，我们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

除了对少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进行斗争外，对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也是意识形态领域里

的阶级斗争。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这就指出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

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和名利思想。列宁说过："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表现在政治上的自由化，一遇风浪就左右摇摆，有些人总想削弱党的领导，摆脱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在科研工作中也有很多表现，突出表现在自由选题，片面强调"学科积累"，常常借口搞理论而脱离实际，对工农兵和国家的急需不那么热心，不那么积极，造成了科研单位严重的"三脱离"倾向。如一九六二年，我所有一位研究员想搞一种催化理论，通过查外国文献臆想出来一个课题，目的是想建立催化理论的大连学派。当时，为这个课题成立了一个一百一十多人的研究室，集中了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科技人员三十多人，搞了三年时间，花了八十多万元，结果一无所成，而国家急需解决的科研项目却被扔在一边，不闻不问。

再一个就是知识分子的名利思想，它突出的表现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也就是"知识私有"观念，把知识当成私有财产，当成个人争名夺利的资本，"资本"不多的人，为了捞取"资本"而"披星戴月打基础，无精打采搞任务"，走上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邪路。"资本"比较多的人，则向党讨价还价，名利大的就大干，名利小的小干，没有名利的就不干。如，我们所有一个副研究员，一九七二年在大连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报告会时，要他在会上作报告，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不满足他的条件，他就不干。这种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在相当多的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是对科研单位这个上层建筑进行阶级分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科研所，从所有制来说，是全民所有，理所当然应是社会主义的科研机构。但是，由于专业科研机构的一套做法，基本上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科研阵地长期以来为剥削阶级所霸占，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资产阶级搞科研的旧传统、旧观念、旧秩序、旧习惯在科研单位影响还很严重，有着很多表现。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级森严，因神设庙，技术垄断，有些技术领域，实际上还是被资产阶级把持着。所以，我们这些科研单位实际上究竟是无产阶级所有，还是资产阶级所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也就是说我们科研单位这个上层建筑还有很多方面并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因此，也必须加以改造。

此外，我们还重视对机关的阶级分析和革命化建设。机关是领导班子的工作机构，机关工作人员中也存在受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腐蚀的问题，存在对社会主义革命是否理解等问题。如果机关不革命化，这个单位的阶级斗争就抓不起来，路线斗争也不可能开展。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一个科研单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这种斗争经常是围绕着什么是主要矛盾，依靠哪个阶级，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要谁来领导等问题而展开的。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才能在科技领域里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科研所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专家治所”、业务挂帅，把科研单位搞成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我们则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来占领和改造科研阵地

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在我们所，高级研究人员被捧为科研工作中的“将校”，工人则被放在从属地位。一九六八年，工人宣传队进驻了我

们所，和我们所的工人一起，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无论是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外交的斗争，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再次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党委反复学习马列、毛主席的教导，逐步树立了在科研单位也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认识到依靠工人阶级办科研，这是党的阶级路线问题。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科技阵地和知识分子队伍，才能端正办科研的思想政治路线，才能坚持在科技领域里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有人说，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会影响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事实恰恰相反，近几年来，由于我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为这样作，正是为了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改造的标准。这和一切要革命、要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前进方向是一致的，因而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自觉性越来越高。他们和工人团结战斗，促进了全所革命和科研的大好形势。有的表现好的知识分子在三结合中，使人很难分辩出谁是工人，谁是知识分子。工人同志亲切地说："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知识分子说："搞设计、定方案、建设备、攻难关，都和工人师傅一起商量、一起干，这样心里才踏实"。

工人阶级参加科学研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工人阶级胸怀革命大目标，帮助知识分子端正方向道路，克服名利思想；工人阶级大公无私，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帮助知识分子克服动摇和右倾保守思想；工人阶级以丰富的实践知识和经验在科研工作中起主力军作用，帮助知识分子密切结合实际选出国家最急需的课题，确定比较实际的技术方案，克服脱离实际的毛病。近几年来，在全心全

意依靠工人阶级上，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具体作法是：在政治上注意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各项政治运动都由工人带头；通过内外三结合，让工人阶级给知识分子以政治上再教育，业务上再学习；开展学大庆、大寨活动，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端正方向，汲取力量；从科研计划制订到具体科研工作的每个重要环节（搞调研、定方案、建设备、大会战、作总结等）都有工人参加，他们同知识分子一起解决科研中的难关，发挥创造力；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加强工农成分，驻所工宣队参加所、基层党支部两级领导班子，同时注意选拔所内优秀工人充实各级领导班子，不断加强工人阶级的优势。我们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中，还注意帮助工人同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技术水平，更好地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事实证明，在科研单位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阵地，这是贯彻毛主席革命科技路线的根本保证。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叫嚷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等等，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是企图复活"专家治所"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这是痴心妄想。他们越是反对，我们越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

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鼓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劳动，"关门办所"。我们则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门办科研，坚定地走三结合道路

开门还是关门？一字之差，但却反映了一个科研所的阶级性质。只有开门办科研，工农群众才能占领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才能端正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向。方向路线对了，科研才能搞上去。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开门还是关门，三结合还是三脱离，从思想路线讲，是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的问题，从政治路线讲，是依靠无产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党委比较自觉地加强了对开门办科研的领导。从一九七三年起，把开门办科研，走三结合道路列为重要议事日程来抓，要求研究室、题目组在制订计划时，要订好互相联系的三个计划，即革命化的计划、科研计划、三结合计划；每年都要开几次会，专门总结开门办科研，走三结合道路的经验；党委的领导同志也分别到过一些三结合单位调查研究，许多支部书记都亲自带队下厂搞过三结合。科技人员，到工厂，到农村，也不是走出去就三结合了，这里也有斗争。比如，下去后是真结合还是假结合，是思想结合还是形式结合；是把改造思想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业务放第一位；是为工农兵服务第一，还是为科学而科学，等等。去年以来，我们要求科技人员实行三结合要交好四本账：路线账、思想账、劳动账、成果账。

几年来，我们坚持开门办科研，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同生产实践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反复实践，路子越走越宽，形式越来越多：有的在国家统一计划和安排下，根据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的需要选题，并同工农兵一起制订研究计划，确定技术方案，开展研究工作；有的在取得实验室成果后，到使用单位和工农兵群众一起扩大生产；有的派出小分队到生产第一线去，和群众一起攻难关；有的把所内工人请进研究室搞大会战；有的在所内设立“门市部”，接待各地各部门的来信来访，帮助解决生产中的迫切问题；还有的举办新技术讲座或学习班，如，一九七四年先后在大连、兰州、上海举办过有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二百多个单位的五百多人参加的比表面积测定仪学习班。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三百多个单位建立了联系，派出六十八个小分队，走出去五百多人次，请进来二百多人次。研究项目包括工业的，农业的，国防的，援外的，上天的，下海的。由于实行了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三结合，科研、生产和

使用三结合，实际上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的结合，使我们所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科研成果一年比一年多。

但是，我们坚持开门办科研，走三结合道路，却遭到了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攻击和非难。他们说什么："不宜笼统提开门办所"、"这种创新还是少点好"，还说什么："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等等，这只能说明他们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极端仇恨。开门办科研，走三结合道路，有利于加强工人阶级对科研的领导，有利于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由于坚持开门办科研，我们在科研工作中，不仅成果出的多，研究周期短，用于工业实践的速度快，多快好省地发展了科学事业，而且还使科学研究工作在广泛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得到了提高。例如，我们所第二研究室二〇三组搞烯烃聚合高效催化剂的研究，由于深入三个工厂，紧密结合生产，与工人一起做了近千个实验，筛选了近五百个催化体系，大量的实践为他们提供了提高科研水平与发展科学理论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在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同时，对大量第一手材料、数据进行了科学分析和整理，推导出氢对聚合物分子量影响的公式，找到了两种催化体系活性衰减规律，研究了催化剂活性与顺磁性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催化理论，初步做到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充分说明，开门办科研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党委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广大科技人员走三结合道路的自觉性空前高涨，步子迈的更大了。今年第一季度，全所派出了二十六个下厂下乡小分队，有一百四十多人走了出去。还先后接待了八百多名工农兵来访和三百多封来信。第九研究室分赴北京、鞍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科研小分队，纷纷传来胜利喜讯。其中赴鞍钢的九〇四组小分队主动服务上门，在下厂的四十多天里，先后深入鞍钢所属采矿、运输、冶炼、轧钢等十九个工厂和矿山，边学

习、边调查、边实践、边推广新技术，先后举办了十五次技术讲座，帮助解决了六台大型设备的漏油问题，受到工人的欢迎和好评。大型轧钢厂一位老工人说："你们在斗争中坚持开门办科研，下厂三结合，这是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工人阶级坚决支持。"通过实践，科技人员深有体会地说："在开门办所的道路上我们每前进一步，就是我们的心向工人阶级靠近了一步，思想里增加了一份无产阶级感情。"

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用名利、地位，物质刺激的手段，拉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我们则从造就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目标出发，抓紧知识分子队伍的改造，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逐步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前，在我们所，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强调个人奋斗，鼓吹"安、钻、迷"，对少数专家、权威生活上照顾，政治上迁就，这样就使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长期得不到改造，一些工农出身的科技人员也受到腐蚀，走上白专道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加深了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解。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我们体会，从根本上改善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就是要从阶级关系上改变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帮助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同工农群众一道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我们通过阶级分析，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明确了三个问题：一是要从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目标出发，工作重点着眼于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革命化，不能只照顾少数。二是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关键是抓改造，不能只讲生活照

顾，更不能在政治上迁就。三是在弄清他们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以后，要根据一贯表现区别对待。从我们所来看，全所近七百名知识分子，助研以上的才有七十多人，所以，我们一方面注意到对少数高级研究人员的政策落实和必要的照顾，但工作的重点是看到大多数。在使用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以来表现好的，就提起来重用；表现一般的，注意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练。个别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表现又不那么好的人，一九七二年落实政策时，我们有右倾，有的官复原职了，结果压抑了群众的积极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作了一些调整，让这样的人有更多机会到工农群众中去锻练，使他们有了进步，发生了变化。所以，不能把落实政策看成是一律官复原职。

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上，我们主要抓了三个方面。首先是组织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这两年着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等问题。例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批资产阶级法权，批知识私有，正确认识批判知识私有和为革命钻研科学技术的关系，树立为革命读书的风气；引导大家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促进派。其次是创造各种条件，引导科技人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第三是掺沙子，在科技队伍中增加工农成分，培养工农兵青年知识分子，加强无产阶级优势。这是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方面。

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几年来，全所有二十二名科技人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去年，有一百零一名科技人员被评为省、市和所的先进工作者。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把知识分子重新拉回修正主义道路，极力鼓吹白专道路，说什么："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应爱护、赞扬。"他们所爱护和赞扬的正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要把知识分子培养成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五、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鼓吹个人奋斗，专业对口，搞分散主义，技术垄断，冷冷清清地搞科研。我们则大搞群众运动，多兵种联合作战，三结合大会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并且特别强调："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在科研工作中，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要不要组织共产主义大协作，这确实是个路线问题。在我们所，文化大革命前执行专家路线，"专家说了算，群众围着转，工人靠边站"。经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近几年来的实践，我们深深感到，坚持科研"两服务一结合"的方向，制订好科研计划是一个关键，而如何组织好力量打好科研仗，多快好省地把科研搞上去，则又是一个关键。我们组织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学习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和大庆搞大会战的经验，大破部门之间和专业之间的界限，用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办法，根据情况组织会战。比如，去年四月，搞一项紧急的农用塑料薄膜毒性分析鉴定任务，时间急，工作量大，由党委直接组织大会战，经过十天十夜的奋战，分析鉴定了四千多个样品，接待了五十五个公社，一千七百多个生产队，四十三个"五七"农场，三十多个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供销社，帮助他们解决了由于塑料薄膜毒性而带来的生产中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对某些工作或在一定阶段，一定场合还需要少数人、个别人来搞，搞大会战更不是否认个人的努力。

根据具体情况，我们搞大会战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对于一些重大任务，组织多兵种联合作战，如新能源的研究，就把有关学科和不同技术专长的人集中到一个研究室来搞；对于突击性强的大任务，打破室组界限由党委直接组织会战，如援外的“梯克油”分析和加工途径的任务，“745 工程”任务的会战等；对于长远性的探索性项目，提出阶段指标，分阶段会战，如化学激光等。

现在，在我们所会战一个接着一个，任务提前再提前。在科研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能够打破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使科研工作中分散经营、各把一摊、技术垄断的资产阶级传统习惯没有市场，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克服科研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分散主义倾向，可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培养战斗作风，使一些艰巨的科研任务很快攻下来，使科研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六、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我们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主席的论述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关系。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却断章取义，根本不谈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却片面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这实际上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在科研工作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影响极大，这也是我们科技领域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处理自然事物的一定范围内，可以有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但如果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不起唯心主义的侵袭的。为什么在我们科研单位，对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科研与生产的关系，学习与独创的关系等等，一直争论不休，有的月月闹学科，年年闹方向，就是因为认识路线没有得到解决。这条资产阶级的认识路线，极大地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严重的影响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有的科技人员由于坚持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甚至走向政治上的反动。所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占领科研阵地，还是一个艰巨的战斗任务。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广大科技人员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几年来，全所坚持“实践第一”观点的人多了；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人多了；掌握“一分为二”观点，懂得“矛盾转化”道理的人多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新的人多了。当然，在科技战线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还仅仅是开始，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战线的统治地位，用实际行动深入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同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的右倾翻案风对着干。

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我们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勤俭办科研

在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影响下，一些科技人员崇洋迷外的思想比较严重，在科技工作中常常表现出洋人的路子不敢改，洋人的水平不敢超，洋人没有的不敢干，甚至作出了超洋人水平的成果还不敢信，让洋框框束缚了手脚。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说什么“和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了”，大讲我国科学技术落后，水平低，表现了十足的洋奴相。毛主席指出：“要少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科技人员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树立无产阶级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我国自己发展科学

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以来，取得了一百三十九项较大科研成果，有一百多项已经应用到国防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上，许多项目赶上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近三年来就取得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十七项。去年一年就搞出了八种催化剂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其中降凝剂催化剂比国外报道的同类型最好催化剂收率高二十倍。在科研条件、设备上也要大破崇洋迷外和等、靠、要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志气问题。几年来，我们强调要自己动手研制高、精、尖的仪器，先后研制出七十二种一百四十四台新型仪器，有力地推动了科研工作的迅速发展，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还经常教育科技人员要逐渐养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我们建立了“勤俭库”、“节约箱”，大搞废物利用，一物多用。这样，就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仅去年一年，就为国家节省了近七十多万元。

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大搞专家治所，反对党对科研的领导；我们则坚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文化大革命前，科学院系统的科研所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作法，科研大权把持在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手里，“所务委员会”由所长主持，党委书记只能兼副所长，在“学术委员会”开会时只是列席，所以，名义上是党委领导，而实际上并没有掌握领导权。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取消了所长制，建立了新党委和三结合的革委会，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去年我们又取消了室主任制，建立了在党支部一元化领导下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室革命领导小组，由支部书记兼组长，加强了党支部的领导。题目组也成立了核心小组。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认识到，党对科研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我们党委带领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认真看书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对于事关路线的重大问题，党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

学，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要求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对于错误路线，错误言行，不管来自哪里，都坚持斗争，予以抵制。实践证明，由于我们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所就出现了生气勃勃，持续跃进的新气象。

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竭力反对党的领导，说什么："科研人员有水平，有知识"，"为什么不让他们当所长？要给他配书记，配后勤"。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紧跟而上，胡说什么："业务要所长抓"，"党委书记不要发号施令，轻则瞎指挥，重则破坏。"他们这样做，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把科研大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霸占科研领域，在科研领域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科技战线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决不允许的！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我们要彻底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给以全面的反击，誓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促进科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

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毕业学员、老工人　吴永章　施文汉　吴继洲

1976-07-20　人民日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发表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光辉批示，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为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培养和造就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指出了光辉的道路，有着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毛主席光辉批示的指引下，一九六八年九月，我们厂创办了工人大学。

八年前九月的一天，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我们接到了上大学的通知书时，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祖祖辈辈被剥夺了学文化的权利，那时候，我们背着地主资本家的少爷小姐上学堂，而我们自己却不能跨进学堂门槛一步。解放后，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我们还是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春雷一声震天响，毛主席发出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给了我们工人上大学的权利。我们扬眉吐气地跨进大学的门，成了工人大学生。树高千丈有根，水流万里有源。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没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哪有我们的今天啊！

我们到学校以后，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教导，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学校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使学员们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在课程方面，除了学习专业知识，首先学习革命理论，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学习期间，"两耳不断机器声，两手

不减油泥味”。我们的教学过程始终和工厂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紧密结合，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七·二一工人大学从创办到现在，已经有两届学员共一百一十人毕业，回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党要求这些学员不仅在技术业务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关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由于这支新型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我们厂的技术队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技术的状况被打破了。全厂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在全厂技术人员中的比例，已从一九六八年的百分之四十上升为百分之六十，进一步增强了工人阶级在技术领域中的优势。

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学员，来自生产实践第一线，回到生产实践第一线。我们了解工人的要求，熟悉生产的情况，所以能够想工人之所想，急工人之所急。

我厂二车间，从南到北有一条长一百六十米的运输线。过去，工人们靠几台平板车搬运几十吨重的大型零件，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女行车工王彩彩早就有革新平板车的强烈愿望，多次向那些技术“权威”提出革新建议，得到的回答都是摇摇头。毛主席发出光辉的《七·二一指示》后，王彩彩跨进工人大学的门，多年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她大学毕业以后，同群众一起，从设计、加工到装配，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造出了电动平板车，实现了工人群众多年的愿望。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的工人大学生就是好！”

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反动统治，总是宣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七·二一工人大学坚决同剥削阶级对着干，坚决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学员毕业后，一不发文凭，二不增加工资待遇，三不搞技术员的头衔，继续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做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我们身在车间，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人人争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一位原来当车工的老工人，从工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车间轴套工段。由于工作需要，几年之间，先后换过七、八个工种，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辅助工。他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后来他又担任施工员，仍坚持干重活。车间加工沉重的主轴零件，都是用双手上料下料，他和工人一起设计、制造了“机械手”，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他刚回车间时，正缺普通工，他坚决要求当普通工。有人问他：“大学毕业还打扫垃圾？”他说：“都是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们说：“工人大学培养的学生，是知识化的工人，劳动化的知识分子。”工人们欢迎能文能武，能上能下，党叫干啥就干啥，摆在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的新型大学生。

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诞生，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发展、壮大的。它从创办到现在，不过短短的八年，却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它已象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的大地。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它前进的步伐，它必将象滔滔的黄浦江水一样，永远奔腾向前！

“社来社去”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宋新

1976-07-25　破与立（曲阜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报）

朝阳农学院在教育革命中创造的新鲜经验“社来社去”，是教育史上一场深刻的革命，是我国教育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生长着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战胜腐朽的旧事物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胜利。“社来社去”这一新鲜经验，对于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和分配制度、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崭新的教育制度，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社来社去”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创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诞生的共产主义幼芽。它闪耀着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思想光辉，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坚决支持，普遍拥护，但却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种种非难和拼命反对。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即马克思所说的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就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冲刷旧社会的“痕迹”，促使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迫使资本主义因素走向灭亡。学校作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为这个任务而斗争，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勇战士、缩小三大差别的革命先锋。高等学校实行“社来社去”，“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社来社去”反了几千年反动没落阶级传统的教育思想，冲击了走资派的命根子资产阶级法权，触痛了资产阶级法权卫道士们的复

辟神经。党内资产阶级及其挂帅人物邓小平反对“社来社去”，这充分证明他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派。他们越是反对攻击，越证明“社来社去”方向对，路子新，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诞生的有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必须热情扶植，大力推广，坚决搞好。

教育领域是资产阶级法权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培养精神贵族是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传统宗旨。“学而优则仕”、“知识私有”、“技术垄断”、“知识即权力”等腐朽反动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不断加工制造的精神枷锁。在资产阶级失去政权和物质生产资料之后，教育领域里的这些腐朽观念，仍然流毒社会，腐蚀人心，成为资产阶级垄断教育阵地的精神支柱，成为党内走资派在文化教育阵地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破烂武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个历史的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打破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限制教育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对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指示为我们彻底改革旧教育制度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大学应该扎根工农之中，学生来自工农，毕业后又回到工农中去，做普通劳动者。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高等学校才能逐步摆脱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早日迎来共产主义灿烂的明天。实行“社来社去”，正是在教育领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可贵而有深远影响的措施。

实行“社来社去”是对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旧传统的彻底否定，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力措施。一切剥削阶级历来都把孔丘的“学而优则仕”奉为培养“劳心者”、“治人者”的方针。封建统治者设立科举制度，把读书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资产阶级搞“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知识即权力”等

等，把“智育”、“知识”当作攫取地位、权力和财产的资本；苏修则更加露骨地把“提高文化”看成是“最有效的投资”；刘少奇、林彪接过封、资、修的反动衣钵，主张培养什么“专家”、“尖子”即资产阶级“人上人”；邓小平继承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大学培养普通劳动者，反对大学毕业当工人农民和工农“划等号”，反对“从工农中来，回到工农中去”，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顽固地维护“学而优则仕”的旧传统，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社来社去”的新鲜经验是斗出来的，是同剥削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的产物，是招生和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它打断了“学而优则仕”这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精神支柱，拆了“读书做官”的梯子，敲响了旧教育制度的丧钟。

实行“社来社去”是对资产阶级的“知识私有”、“技术垄断”的猛烈冲击。就知识和技术作为个人的特权而论，它是教育领域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基础。旧教育制度浸透了资本主义商品原则和竞争原则，它确认“知识私有”、“技术垄断”合法化、制度化。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旧高等学校推行管理上“教授治校”、工资按“知”论级、学衔按“知”评定、招生按“知”录取、毕业按“知”分配这样一整套教育制度，其核心就是“知识私有”和“技术垄断”，其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结果使“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历史的教训，千万不能忘记。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不仅要在生产资料方面“剥夺剥夺者”，而且必须要把资产阶级“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苏联变修的教训说明，如果没有这后一个“剥夺”，前一个“剥夺”是不巩固的。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几千年来为剥削阶级所占有，这种被颠倒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的革命洪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阻挡不住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正在形成。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经指出，“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实行“社来社去”正是列宁这一光辉思想的实践，是工农兵占领文化教育阵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所需要的。邓小平拼命攻击“社来社去”，要翻批“知识私有”和“技术垄断”的案，公然扬言“还我十七年”；教育界的走资派跟在后面嗡嗡叫。这证明“社来社去”在破除“知识私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起了冲击作用，戳到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疼处。

实行“社来社去”，有利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教育造成的恶果之一，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这是由它们的剥削本质所决定的，是为它们的剥削和反动统治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教育，是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它的历史任务之一，就是造就“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的一代新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断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实行“社来社去”，大学毕业当农民，使这新的一代大学生懂得阶级斗争，会科学种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能文能武，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这体现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的光辉前景，堵住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和对立的通路。它是恩格斯上述光辉设想的实践。邓小平所以对大学实行“社来社去”咒骂攻击、暴跳如雷，是由于“社来社去”动摇了他修正

主义教育路线的基石，破坏了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从反面证明“社来社去”好得很。

还应该看到，实行“社来社去”也是在分配领域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限制。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分配领域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这是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肥沃土壤。列宁曾经提出过“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领导联共（布）党实施了这一巴黎公社原则，并认为这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社来社去，大学毕业当农民，和农民一样参加劳动，领取同样的报酬，不搞特殊，不图名，不为利，干着社会主义，想着共产主义，这正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这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防止修正主义，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

当然，限制以至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拼命抵抗，特别是走资派的拼命反抗。你要实行“社来社去”，向前迈进一步吗？邓小平说你超越阶段，“现在就要实行共产主义”。在他看来，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限制，大学毕业有了知识就不能和工农“划等号”，不能当工人农民，不能领取同工农一样的劳动报酬，而只能高官厚禄。人们不难看出，邓小平的主张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社来社去”，就是维护“按‘知’分配”的资产阶级原则，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翻案不得人心。”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搞复辟倒退，是永远不会得逞的。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毕业生，人人是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尖兵，自觉与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英勇战士。他们的豪迈誓言，打破了邓小平的复辟迷梦。他们坚定地宣告：

我们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尖兵，

我们要举起榔头，敲响旧制度的丧钟；

我们要举起大斧，砍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根；

我们要挥起钢锹，挖掉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

这些铿锵响亮的激扬文字何等好啊！它是时代的号角，它是八亿革命人民讨伐资产阶级法权的战斗檄文。

“社来社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它将在同旧制度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胜利进军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莫斯科版的“升官图”——评奇文《怎样成为部长》

桑娄东

1976-08-01　红旗

旧中国有一种赌具，名曰“升官图”。一张半公尺见方的纸上，印着一些挺胸凸肚、耀武扬威的人像。每个人像边记上“官阶”，编成号码。赌棍们按图掷骰，耍尽手段，力图从“学生”开始，通过“保长”、“乡长”、“县长”……一直爬到“大总统”的宝座，赢个“满堂”，大把儿银钱钞票往口袋里装。赌场上的“升官图”正是旧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生活写照。这种肮脏的玩意儿，连同产生它的腐朽社会制度，在我国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今天，我们却在那个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看到了又一幅“井官图”。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列维科夫的蹩脚文人，秉承主子意旨，在去年十一月五日莫斯科出版的《文学报》上，抛出题为《怎样成为部长》的文章，大吹青年工人怎样升官发迹的问题。他用点题之笔，开宗明义地说：“弄清楚工人个人的官运如何，他们在官阶上能升多高，是很有趣的。”瞧瞧这篇奇文，简直令人作呕。如果把它改题为《莫斯科版的“升官图”》，那倒是恰如其分的。

据这篇文章说，某机器制造厂一个二十岁的钳工谢尔盖“一心想当部长”。这个“愿望”受到了作者的喝采，要求人们“不忙着向他泼冷水”。只要这个钳工“身强力壮，聪明能干，精力充沛，并且有上进心”，要实现“自己的未来”，是“很容易的”。不信吗？作者拿出“论据”说，前不久任命为苏联汽车工业部部长的一位大官，就是用了三十多年，从“钳工”、“工长”、“车间主任”、“经理”，一直爬上了今天的宝座的。“升官”的秘诀究竟在哪里？据作者长期观察得出结论说：部长“基本上是从副部长提升的”，而副部长“主要是从经理中选拔的”。而经理呢？主要是从持有“高等学校毕业文凭”的“专家”中“任命”的。因此，青年工人

要想“爬上比经理更高的官阶”，获得“诱人的薪额”，就必须千方百计弄到一张“高等学校毕业文凭”，这就是“升官图”的“现代化形式”。作者对此有一比喻，说“文凭”好比一张“火车票”，“凭自己的车票坐车”，由此可以沿着“领导职务的道路”，“畅通无阻”地通向克里姆林宫。否则，对不起，“火车就开走了”，那么，你的“出路”就只能在“机床、压床、高炉、自动线、组装传送带和起重机旁”。

真是妙不可言的自供状。妙就妙在这篇奇文，公然把如何升官发财作为头等大学问要人们去研究，恬不知耻地大肆鼓吹鸠山式的“做人的诀窍”：要发财必须升官，要升官必须升学。殊不知这一来，却把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种种社会丑态，把勃列日涅夫一伙的叛徒面目，暴露得淋漓尽致。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564 页）看，今天苏修叛徒集团所极力宣扬的，不就是这样一套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吗？他们已堕落到何等地步，人们不难从这里得到答案。

苏修叛徒集团为什么对“工人个人的官运”突然感到“有趣”，这倒是真正“有趣”的。在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以勃列日涅夫为头目的一小撮官僚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同工人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部长”和工人，一个是嗜血如命、杀人成性的压迫者，一个是身处暗无天日的地狱中的被压迫者，他们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根本合不到一块儿去的。作者深知主子玩弄反革命两手的心计，凭着他的生花之笔，炮制了这么一个自以为令人神往的“升官图”，硬把工人和“部长”拉到一条板凳上来，用个别工人贵族当“部长”的事例粉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门面，掩盖当今苏联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诱骗工人们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拴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机

器上。他们以为有了这么一着，就可以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了。莫斯科版的“升官图”，原来不过是勃列日涅夫一伙所设下的陷阱和骗局而已。

勃列日涅夫之流把工人升官发迹之道，说得口沫横飞，头头是道，那么天真的谢尔盖们的“理想”能否如愿以偿呢？能不能捞到那张进入苏修官场的“入场券”——高等学校毕业文凭呢？答曰：未必。因为统治今日苏联的，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对工人怀有仇恨，剥削和奴役工人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他们特别贪婪，利用所窃据的权力，把自己和三亲六眷的子女塞进高等学校，以便日后为官做宦，成为世袭的资产阶级接班人。他们把一切都商品化了，什么“大学毕业文凭”、什么“学位”、“学衔”，都可以用卢布买卖。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大学校门八字开，无钱无势莫进来。广大工人、农民哪里能够象官僚们那样用成千上万的卢布去购买大学毕业文凭呢？“升官图”的实现是全靠垄断资产阶级的“护官符”来保护的，真正的“秘密”就在这里。因此，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青年工人来说，“大学”全然是一块禁地，官场更是无从插足。

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曾经是劳动人民的祖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遵照列宁的教导，大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工农兵代表被选拔到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工作，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是，标榜对青年工人个人官运饶感“有趣”的勃列日涅夫之流，却恶狠狠地诬蔑列宁开创的“选拔制度”“已过时”，为“现代科学技术所禁止”。其实，正是为他们这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禁止。他们就是这样赤裸裸地背叛列宁，背叛苏联无产阶级的。

莫斯科版的“升官图”，对苏联人民来说当然是一场骗局，但它却也反映了苏修官场腐朽不堪的现实。君不见，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不正是这样如法炮制、粉墨登场的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个坏兵”这类鬼话被看作金科玉律，大学毕业文凭被当作进入克里姆林宫大小门槛的敲门砖，一级级向上爬“台阶”被钦定为官爵升迁的铁则。于是乎，尔虞我诈、拍马溜须、收买利诱、剽窃

抄袭、雇人代笔等等丑事，在今天苏联的官场、考场则是层出不穷，无奇不有。鲁迅在评介中国清末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时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中国小说史略》）今日苏修一小撮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大官们，正用自己的丑恶行径撰写一部活生生的无奇不有的新《官场现形记》。

黑暗的尽头必是光明的来临。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正在现形，他们在“升官图”中所描绘的“花花世界”的好景不会太长了。被压在“升官图”最底层的苏联工人阶级，要革命而不是要做官，对修正主义的官禄视若粪土。他们必将高举列宁的旗帜，发扬十月革命的精神，把勃列日涅夫这伙吸血鬼从“升官图”的宝塔尖上拉下来，给予应得的惩罚。“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重要指示的初步体会

季殿文

1976-08-15　沈阳机电学院学报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传来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尖锐地指出当前教育战线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再次严厉批判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内的一切旧教育，满腔热情地支持了教育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学校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反修防修的重大课题，为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使我们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鞭策，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振奋。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地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此十分恐惧，恨之入骨，拼命攻击。这就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大学究竟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当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击中了党内资产阶级反对大学培养普通劳动者的要害。我们应该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从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高度，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的高度，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大学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是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由于工农群众是社会主

义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继续革命，从未停止，最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工农群众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力军，依靠千千万万工农群众才能在我国的土地上筑起一道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所以社会主义大学要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培养学生和工农划等号，成为普通劳动者。这不是一个简单地担任什么职务、做什么工作的问题，而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坚持还是偏离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是把学校办成哪个阶级专政工具的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的全局中占有突出地位，斗争始终围绕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而展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重视教育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要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资产阶级不论把培养目标换上多么冠冕堂皇的说法，但总是离不开“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那一套，目的在于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扩大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无产阶级夺回了教育大权之后，学校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现象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然而，培养什么人的斗争并不因为工人阶级占领学校而熄灭。从党的基本路线高度去领会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可以使我们更深刻、更清醒地看到这种争夺接班人斗争的严重性，由于这种争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社会上和学生头脑中还存在着旧传统观念，特别是学校这块地方，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影响还很深，工农兵学员和旧十七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每个工农兵学员都面临着两种可能，或者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普通劳动者，或者成为资

产阶级接班人，精神贵族，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因而，培养大学生和工农划等号不能不成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不能不要求把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位。由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如同电影《决裂》中李金凤所具备的那种觉悟：心明眼亮，头上长角，身上带刺，既善于识别走资派，又敢于同走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同样要求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之所以会有这种相矛盾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的某些领域仍然占有优势。这个矛盾不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战线，资产阶级占了统治地位，培养出来的学生学工不会工，不做工，学农不爱农、不务农，有些即使出身工农的青年，到学校学几年后也变得和工农格格不入，事实上扩大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些人名曰“干部”，其实如不加以改造，就会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类似教育阵地的这种情况，决定了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势在必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教育界开刀，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占领了教育阵地，夺回了教育大权，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旧教育。党的教育方针开始得到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努力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

工农兵大学生和工农划等号，会做工，会种田，能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搞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大学培养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是逐步改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主动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和促进经济

基础的发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一项战略措施。这样做，将“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邓小平胡说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说明他在理论上根本不懂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则力图维护那种阻碍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其实，邓小平所要的现代化，是使工农群众受压迫受剥削、愚昧落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中国，这只能是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倒退的同义语而已。

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是一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清除旧制度的基础，建设一个崭新的即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朝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清除旧制度基础，是比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更伟大的、更艰巨的任务。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内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走资派赖以复辟以及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社会主义大学培养什么人，对于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逐步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这就有利于剥夺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打破他们的“知识私有”和对科学技术的垄断；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有利于破除“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在产品分配方面，大学生和工农划等号，意味着大学生的个人收入略等于普通劳动者的水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做斗争”。

无产阶级从尝试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第一天开始，就迈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可贵步伐。一百年前，恩格斯在批判杜林鼓吹假社会主义，企图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永恒化时，曾经满怀信心地预想：“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

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恩格斯的科学预想，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我们高兴地看到，一批批大学生到农村、到边疆，为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战斗。这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科学预想日益成为生活中的美好现实。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大学培养普通劳动者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竭力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大学毕业当干部被制度化，也就是把大学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合法化，这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必然恶果。邓小平对这样的旧大学十分迷信，胡说不培养干部“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好象离开他那个旧大学，就会“后继无人”，失去了“干部”来源，这完全是歪曲事实。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真正的本事都不是在学校学的，就连邓小平他们十分崇拜的“圣人”孔老二也没上过大学。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破除对旧大学的迷信。即使对社会主义大学也不应夸大其作用。因为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不可能把他们一辈子用得到的知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知识都学到手。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着重培养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提高，而这一切也不是闭门读书能够实现的。无产阶级的干部是在三大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决不是上几年大学就可以培养造就出来的。但是，我们反对把大学毕业当干部制度化，决不是说只要是大学毕业生，即使根据实践斗争的需要，也不能当干部。问题在于应当使他们回到工农中去，无产阶级的干部应当从工农中选拔，当了干部，也还是要自觉地置身于群众之中，决不可以高踞于群众之上。“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

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邓小平所鼓吹的大学必须培养“干部”，——为什么培养”干部”，培养哪个阶级的“干部”，苏联变修的现实已经给这个问题作了清楚的回答。苏修叛徒集团公然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吸取……干部。”这就是说，苏修党和国家的权力主要控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手中，高等学校变成了爬上特权阶层，攫取最高权力的阶梯。事实证明，修正主义教育在使苏联变修，强化法西斯专政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是一面镜子，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念念不忘大学必须培养的“干部”，不折不扣的是不和工农划等号的工人贵族，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干将”。的确，这样的学校早就该取消了。

邓小平攻击大学培养普通劳动者是“社会主义阶段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情”。好一个“阶段论”！简直和当年陈独秀、刘少奇鼓吹的要在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而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如出一辙。是我们超越了社会主义阶段，还是邓小平要向资本主义开倒车？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办了共产主义事情，还是邓小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学毕业当工人、农民，这一新生事物一出现，就如同报春的梅花，迎来了山花烂漫的喜人景象。一批又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工人，当农民，同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偏见和传统观念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情称赞和坚决支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做的的确是前人没做过的事情，但也是社会主义革命中需要做和可能做的事情。邓小平把这诬蔑为超越了阶段，妄图加以扼杀，这岂不是活灵活现地暴露出一付资本主义卫道士的丑恶

咀脸吗？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又一次为我们扶植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揭了邓小平反对大学培养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工农群众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前进；工农群众是三大革命实践的直接参加者，最聪明、最有才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大学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这同旧学校为资产阶级培养称心如意奴仆比较起来，是“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但是邓小平出于唯心史观和保护修正主义大官的利益，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的。他们要把学校办成他们世袭特权和培养奴仆的场所，变成压迫工农的工具，他们与工农是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两个阶级。大学培养工农，无异于增加了他们的掘墓人，他们怎能不极力反对呢。所以，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上，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维护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旧教育。

一脑袋唯心主义的邓小平，曾说什么只要有一千名“专家”，我国的科学技术就可以搞上去。这种唯心主义的宣传目的何在呢？无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揭露的：“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相信世界到底“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真是无独有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揭露和批判的一个崇拜天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同邓小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毛主席在深挖了邓小平反对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同时，强调指出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而且工人阶级也要不断地改造自己，把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提到了进步还是反动，革命还是变修的高度。认识不到这一点，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工人阶级要变坏，工农兵学员也要变坏。

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既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没有阻力。教育革命的成果还不巩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必将指引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定不移地为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而长期作战。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犹如强劲的东风，必将使得社会主义大学百花盛开，春色满园。

大学招生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为高等院校实行“三来三去”叫好

雷慕然

1976-08-15　广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今年，各高等院校所招的大学生一般都将实行“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和“哪里来哪里去”，大学的这一招生和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是贯彻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重要步骤，也是大专院校一次重大的教育革命，它将为高等教育带来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大大加快了当前教育革命的前进步伐，推动了上层建筑包括教育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前发展。对于这样重大的革命措施，我们将热情欢呼，坚持拥护，努力实行。

一九六八年，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了被走资派篡夺的部分权力，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七·二一”指示。毛主席在这一光辉指示中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这一光辉的指示，是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彻底改革高等教育制度的战略措施，它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八年来，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指引下，许多工厂、农村办起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农村五·七大学等新型学校，大学教育“旧貌变新颜”。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辽宁朝阳农学院等教育革命先进单位创造了许多重要经验，为全面深入开展大学教育革命闯出了新的道路，开创了光辉的前景。几年来，他们

按照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精神，实行厂来厂去，社来社去，已培养出一批能与工农划等号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毕业后，牢记阶级的委托，满怀革命豪情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当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工人、农民，用实际行动打破千百年来“读书做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传统观念，自觉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大多数人坚持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同工人农民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搞革命大批判，在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朝气蓬勃地干革命。他们把学到的有用知识无条件地贡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三大革命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不少人已成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科学种田的能手，技术革新的闯将，工农理论队伍的骨干。对于这批能文能武、能上能下、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的新型大学生，广大工农兵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们称赞说：“这样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我们一百个赞成，一千个欢迎。”实践证明，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无比英明正确，它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代表了亿万工农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工大”和“朝农”的办学道路，已充分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是我们彻底改造旧大学创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正确方向。

对于贯彻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实行“社来社去”、“厂来厂去”的重大变革，并非所有人都感到同样高兴。它将破除几千年来遗留在人们头脑里的旧传统观念，并直接冲击资产阶级旧教育的根基，必定要引起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对和攻击。在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恶狠狠地跳出来攻击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胡说什么“大学培养工人农民，还办大学干什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是个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诬蔑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是什么“搞投机”、“不周到”、“国家大，行不通”，恨不得把它一棍子打死，把“社来社去”、“厂来厂去”这一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扼杀掉。对于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对“工大”、“朝农”的污蔑

和攻击，我们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击，彻底打退他们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猖狂进攻，而对于一些对“七·二一”指示不理解，对“朝农”、“工大”的先进经验有怀疑的人，我们必须加以大力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使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和“七·二一”指示精神深入人心，为亿万革命群众所掌握。

大学要不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关系到社会主义大学教育要不要与旧大学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不要贯彻毛主席制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把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要求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也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以摆脱资产阶级对它的影响，才能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相适应，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否则，它不仅会落后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会给已经变革了的政治和经济起反作用，使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革命成果归于失败。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要同传统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也提出要对旧的学校进行“根本的改造”，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可是，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这伙走资派却总是把资产阶级教育那一套奉为至宝，疯狂反对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伟大指示。可见，是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教育方针，深入开展教育革命，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试金石。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大学向谁开门，招什么样的人进来，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毕业后又回到哪里去，关系到教育的

阶级性质、教育方针、办学道路和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奴隶们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工农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历史的主人，也是文化教育的主人。可是，几千年来，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大学这块阵地，历来被剥削阶级所垄断，成为他们培养本阶级接班人的工具。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农民造成的”。创造文化的劳动人民在旧社会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反动统治阶级颠倒历史的结果。过去，一切剥削阶级都把劳动人民看成“天生愚昧的群氓”。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解放以后，工人农民翻了身，成为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人，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可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旧大学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广大工农群众仍然被排斥于大学校门之外，即使有少数工农子女上了大学，也不免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旧教育，使学生变成了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毕业后不愿到工厂、农村去，更谈不上与工农划等号了。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要求学生从工农中来，回到工农中去，这是大学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必由之路。它把大学教育从资产阶级手里彻底解放出来，成为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提高的场所和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基地，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这是与旧大学实行最彻底决裂的一项重大措施。邓小平攻击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反对实行“社来社去”的办学方向，鼓吹“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其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和驯服工具。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学校，由于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在招生方面设立种种关卡，排斥工农及其子女上大学，以维护剥削阶级子女上大

学的特权。他们宣扬“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黑货，鼓吹“成名成家”、“白专道路”，引诱学生去爬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宝塔尖。学生毕业后，又把他们直接安置在上层建筑各个部门，“按知分配”，“按等论价”，高踞于工农群众之上，脱离体力劳动，脱离广大工农，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老爷。这种教育制度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了三大差别，为修正主义培植社会基础，为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教育革命不断深入，工人阶级进驻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大学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在招生分配制度上还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使得大学的教育革命迈不开大步，资产阶级法权得不到限制，大学这块阵地还保存滋生资本主义的深厚的土壤，如果大学按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实行“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办学道路与招生制度，广大的工人农民就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直接参与招生与分配工作，保证了工农兵上大学的优先权，发挥了工农群众在教育方面的主人翁作用，学生毕业后又回去当工人农民，直接打破了旧大学以私有观念为基础，“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一反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旧传统，拆掉了“读书做官”的阶梯，真正体现了巴黎公社提出的“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的原则，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应该看到，大学实行“三来三去”的制度，必将进一步促进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必将带动大学教育以至整个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由于招生分配制度的改革必然要求学校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工农，必须根据三大革命的需要和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的要求，来研究制订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学制、学校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改革措施，这就必将促进大学教育的系列变革，推动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同时，大学实行“三来三去”的原则，改变过去大学毕业生直

接当干部的分配办法，也有利于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今后，国家的用人制度也要随着大学毕业分配制度的改变进行相应的改革，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也要随着学校实行“三来三去”采取必要的协调措施，这些都会牵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进行，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将起着重大的作用。大学教育的这一重大革命措施，触动了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法权的要害，对党内外资产阶级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那样疯狂反对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恶毒咒骂实行“社来社去”的朝阳农学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邓小平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彻底动摇资产阶级法权老根的朝农经验当然是要恨之入骨的，无产阶级欢欣之日，就是资产阶级难受之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仅要在物质财富“剥夺剥夺者”，而且要把资产阶级“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实行“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正是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剥夺资产阶级知识优势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邓小平反对工农上大学，反对大学培养工人农民，充分暴露了他是孔孟之道的虔诚信徒，是资产阶级法权的顽固的维护者。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是在与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提出来的，也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得到贯彻。大学实行“三来三去”不仅是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也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它涉及到各个方面的问题，也触动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因此，它不仅会遭到党内外的资产阶级的攻击和破坏，而且还会受到那些受“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人的非难。只要阶级与阶级斗争存在，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还存在，围绕着“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的办学道路的斗争就不会止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牢记党的基本路线，

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全面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三来三去”的办学方向，努力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而努力奋斗。

坚定不移地和工农划等号——沈阳机电学院总结培养普通劳动者的经验

1976-08-24　人民日报

沈阳机电学院党委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连续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关于社教工作的批示，联系一年多来全院师生员工热烈讨论两张大字报的实际，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新鲜经验，促进了批邓斗争的步步深入，发展了全院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培养普通劳动者，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去年春天，这个学院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推广朝阳农学院经验时，自动化三班七名学员和铸造二班十二名学员先后贴出了《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和《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两张大字报，观点针锋相对。学院党委和驻院工宣队认为，《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大字报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两张大字报的出现，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两张大字报讨论的内容，涉及社会主义大学究竟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应当如何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因此，院党委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用两张大字报做活教材，在全院开展社会主义大学究竟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大讨论。讨论刚一开始，教育界走资派就秉承邓小平的旨意，极力反对，横加指责，说什么这样的争论“我们不感兴趣”，争论下去“会影响安定团结”等等。沈阳机电学院的同志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们在中共辽宁省委和沈阳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把两张大字报的讨论继续下去，旗帜鲜明地同修正主义奇谈怪论对着干。去年七、八、九月，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两张大字报的讨论也搞得热火朝天，有力

地回击了教育界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经过学习、讨论、批判，全院师生员工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统一了认识，增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为后来全面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锻炼了群众，打下了基础。两张大字报的作者也由原来观点上对立，取得了认识上的一致。他们互相学习，并肩战斗，共同反击右倾翻案风。

和工农划等号，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

文化大革命前，旧沈阳机电学院把“红色工程师”、“高级建设人材”作为培养目标，鼓励学生拼命爬那个资产阶级的小宝塔。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少人不愿和工农划等号。这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大罪状，是学校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突出表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讨论两张大字报以来，沈阳机电学院师生进一步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从来都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为一定的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大学生和工农划不划等号，实质上就是要做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划等号，就是站在工农一边，跟工农一道革命；不划等号，就要高踞于工农之上，成为精神贵族。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根本标志。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作为基础课，引导学员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现在，沈阳机电学院工农兵学员在学习期间就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胸怀共产主义，朝气蓬勃，勇敢战斗。学员中成立了一百多个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铸 02 班理论组的工农兵学员，运用所学理论观察分析问题，在

讨论两张大字报、评论《水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先后写出了四十多篇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和大字报。焊 03 班理论组的学员，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教育界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识别得早、反击得快，于去年十一月在全院第一个写出了批判奇谈怪论的大字报。广大工农兵学员不忘阶级委托，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努力从思想上、行动上同工农划等号。去年这个学院首届毕业的三百四十二名工农兵学员中，有二百六十名主动申请当工人、当农民；分配到沈阳、旅大、鞍山、营口、辽阳等地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争做普通劳动者。现在在校的工农兵学员中，又有四百三十多名提出申请，要求毕业后到农村、边疆当农民，当工人。他们决心“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02 页）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诬蔑大学生做普通劳动者“不象大学生”，这恰恰说明，他们所要的大学生就是那些不和工人划等号的工人贵族。机电学院的师生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从孔家店捡来的“学而优则仕”的破烂货。在他们看来，工人农民不能上大学，上了大学就不能当工人农民，这正表明他们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390—391 页）师生们表示，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宏伟目标一定要实现，一定会实现。

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

沈阳机电学院党委在组织两张大字报的讨论、总结培养普通劳动者的经验的过程中，进一步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方针，实行开门办学，把学员放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去培养，让他们经常同工农搞三同，拜工农为师，从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同工农划等号。去年，全院结合讨论两张大字报，组织机器制造、电机、无线电等十一个专业、四十六个班级的近两千名师生，深入沈阳、丹东、昭乌达盟、铁岭等地区广大农村和工厂，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起批判资产阶级，进行调查研究，从工农群众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促进了教育革命，建立了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厂校结合，定厂办学，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去年，这个学院进一步发展了校内外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在校外，与十九个工厂建立了长期固定挂钩关系。在校内，三结合基地发展到十一个。校内外三结合基地的建立和发展，使广大工人能够直接参加和领导教育革命，参加培养工农兵学员的工作，为学员在学习期间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工人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促进了教师队伍的锻炼提高。学院的教学、科研、生产相互促进，取得了良好成绩。去年，三结合基地共生产十种产品，有九种提前三十天以上完成国家计划，创造了学院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还研制成功顺序控制器、小型水冷电焊机、等离子喷涂等国家急需的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遵照毛主席关于“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教导，去年，沈阳机电学院对普通班的教学进行了改革。学员入学后，第一年在校办工厂半工半读，第二年开始到校外工厂定厂开门办学，结合生产和科研任务进行教学，最后用半年多的时间进行毕业综合实践。这样，就使工农兵学员在三年学习期间始终不脱离工农，不脱离实践，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在劳动中培养工农感情，在实践的基础上学习理论。去年一年，全院师生先后到四十四个工厂开门办学，与一百多个工厂建立联系，结合教学完成了二十七个科研项目和

一百○二个技术革新项目。校办工厂为国家创造的财富，等于做到了办学经费半自给。

学院在办好普通班的同时，还大力举办短训班。去年，共办短训班一百二十个，培养各种人材七千多人。今年上半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全院举办的短训班又有新发展，半年培训的人数相当于去年全年，其中有四分之一是为农村举办的。现在，学院又筹办农村分校。他们决心为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培养更多的普通劳动者贡献力量。

建设一支能和工农划等号的教师队伍

毛主席教导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要把学员培养成为普通劳动者，就要求教师首先能和工农划等号，逐步建立起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教师队伍。他们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从工农兵学员中选留教师，从校外工厂聘请工人兼职教师，每年选送一批校办工厂工人上大学，在校办工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从中培养教师；另一方面引导原有教师认真看书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世界观，担负起培养普通劳动者的重任。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其实，"关心"是假，坑害是真。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强调思想改造会不会影响积极性？事实是最能说服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沈阳机电学院党委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重视教师的世界观改造，积极引导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励他们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到工农兵中去，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再提高，到目前，已有百分之八十三的教师参加过一年以上的学工、学农、开门办学实践。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少同志进步显著，为教育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几年全院

有二十九名教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四年度有二十一名教师被评为学院的先进工作者。机制专业教师阎以诗深有体会地说：“知识分子只有到工农中去，才能正确认识自己，只有和工人师傅一起实践，才能增长才干。”在开门办学中，他不但教工农兵学员技术，而且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主动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群众的好评。铸造专业教师杨景祥，过去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现在下厂开门办学，与工农兵学员、工人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究怎样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他决心做一名普通劳动者，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认真改造世界观，到工厂自带行李住工人宿舍，和工人吃一样饭菜，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并同工农兵学员和其他教师一起，与工人、技术人员紧密结合，完成了五项科研任务，有的项目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事实说明，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引导教师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调动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作出贡献。

关键在建立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头和工农划等号的领导班子

去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讨论两张大字报的过程中，沈阳机电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到要把学员培养成普通劳动者，党委一班人必须首先成为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最近，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教导，联系教育战线的斗争实际，进一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决心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党委书记张国栋说，走资派就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同工人、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只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坚决同工农划等号，才能识别走资派，才能自己不变成走资派，也才能带领革命群众坚决同走资派作斗争。

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学院有些领导干部受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毒害，产生了“政权到手，革命到头”的思想，滋长了当官作老爷的作风，脱离了群众，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阶级开进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几年来，学院党委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持按照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建设领导班子。老干部不断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青年干部注意吸取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斗争中锻炼成长；驻院工宣队发扬工人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对错误路线、错误倾向、错误思想敢批、敢斗、敢顶，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满腔热忱，大力扶植，用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发挥了政治作用。但是在斗争实践中，他们也看到了差距。为了建立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带头和工农划等号的领导班子，沈阳机电学院党委正在作出很大的努力。他们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深入群众，深入社会，调查研究，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汲取政治营养，不断洗刷唯心精神；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从思想上、行动上和工农划等号。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我和你就不平等”——从苏修文艺作品看苏联社会的阶级对立

翁义钦

1976-09-02　人民日报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学士，为了掩盖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真相，一迭连声地扬言在今日的苏联社会里，人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友好和同志式的互助关系”，“实际平等”已经“获得解决”，等等。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些苏修文学作品，却在勃列日涅夫一伙设计的这幅妙不可言的画面上戳了一个窟窿，表明他们的这类漂亮言词不过是分文不值的屁话。

让我们先看看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总结报告中极力称赞的话剧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中的女厂长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的所作所为吧。当马尼娅等老工人要跟这位女厂长讲平等时，她便直截了当地教训马尼娅说：“不，马尼娅，我们不是大家都平等的。我和你就不平等，……”。一部题为《帐目两清》的喜剧剧本也明明白白地供认：“关于平等，我们这里不过是在歌里唱唱，或者是在电视里演演。”

的确，在阶级社会里，人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关系。“我和你就不平等”、人们之间的“平等”只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这正是今日苏联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逼真写照。

人们知道，在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象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一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凭借苏修政权的力量，霸占了原来属于全体苏联劳动人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迫于生活，“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列宁：《自由派教授论平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9页）。中篇小说《万卡·普罗斯库林》中，农村官僚垄断资产

阶级分子占有生产资料和大量资金，迫切需要劳动力；因为没有劳动力，海里的鱼就没法捕捞、加工，他们也就无法吸食劳动者的血了。而万卡·普罗斯库林等农业劳动者，除了劳动力外，“什么都没有”，只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来谋求生存。这种情况在话剧剧本《明天的天气》等作品中，也都有反映。剧本中的柯席尔，据说是个有着“电子控制式”的一双手的调整工。他曾因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向分厂经理提出过合理的要求，但却遭到拒绝；当柯席尔表示要转到别的部门去工作时，这位分厂经理竟威胁说：“我们不强留任何人。”只是当生产作业线发生故障，眼看要影响到汽车装配，而又非得柯席尔修理不可时，分厂经理才答应考虑他的问题，并且表示可以留用。这就是说，当工人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没有用时，就会被一脚踢开；而只有当这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认为工人还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时，才予以雇用。这类事实清楚地表明了今日的苏联，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复活了，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一类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及他们的总代表勃列日涅夫集团正是靠吮吸工农的血，“靠剥削别人的劳动发财致富”（列宁：《在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124 页）。

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贪婪地吸工农的血，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总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极力强化和扩大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话剧剧本《外来人》、特写《爱和功勋》、话剧剧本《适得其所的人》和长篇小说《人世间》里，人们把工厂企业、农场、农庄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切什可夫、叶弗列莫夫、鲍勃罗夫和卡尔金们分别称之为“严厉的主子”、“全权的统治者”、“土皇帝”、“旧时代的官老爷”等等。这些“严厉的主子”、“官老爷”对工农群众充满着蔑视、仇恨。看一看《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一段描写吧：

“奥列格·奥列戈维奇站起身，不慌不忙地向工人们走去。普隆恰托夫越接近工人，他的身形越变得坚定、严峻、神气起来。当他在离工人五公尺的地方站住时，他绷着脸，没有一丝笑容，也不打招呼，用令人难堪的鄙视的眼光盯着他们。他仰起头，嘴角露出厌恶的神情，……”

正是这些仇恨工农群众的人，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大力强化“个人管理”，也即强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势，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这一帮子人大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声称要强化法西斯的“纪律”，要对工人“严”一些，要时刻监视工人，“盯住他们，扼他们的喉咙”，对不顺从的工农群众，要予以“解雇”，列入“黑籍簿”，让这些人“不论到哪里，不论到什么时候，也找不到任何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搬出“物质刺激”的一套，用“卢布”“教育”或鞭打工农群众。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普隆恰托夫、切什可夫、卡尔金们的作为，充分地暴露出他们极端仇恨工农大众、凶狠地榨取人民群众血汗的丑恶本质。而劳动人民呢？正象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所供认的那样：“如今看车床或扶木犁是叫不响啦。你讲出自己的这类身份，只会惹人笑话。”事实上，岂但“叫不响”或“惹人笑话”，他们已经完全被压在底层，处于无权的地位了。

在《明天的天气》里，一名叫做索波列娃的女工想对厂里的生产提点意见和建议，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女工，走，干活去，车螺帽去。”就是说，今日苏联的工农群众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10 页），他们就只能象短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农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所说的那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一直干到精疲力尽而不得不躺倒为止”，或者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劳动者要“劳动、劳动、劳动”，为这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及其总代表勃列日涅夫创造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表明今日苏联的“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

难以忍受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48 页）。

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友好和同志式的互助关系”，什么“实际平等”，实际上就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对立关系。为了维护和扩大这种关系，他们炮制了种种奇谈怪论。例如，《外来人》和《适得其所的人》中的切什可夫和鲍勃罗夫就说过，由于他们是“领导者”、管理者，所以他们理应“站在高处”，思考“战略性”问题，“用嘴、用脑筋来工作”；而被管理者、直接生产者则要“亲自动手去干活”。又如《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中的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不和工人们讲平等的理由，就是所谓“我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我们这就已经不平等了”。苏修文学界在评论《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时也说，普隆恰托夫一类脑力劳动者、“上等人”是“靠智慧的威力来完成自己的公民功勋”；而体力劳动者，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则是“靠耗子般地卖死力气”干活的“生产工具”。这就是说，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是天经地义的。这完全是剥削阶级极其荒唐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实际上是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苏修一伙把旧式分工绝对化，竭力予以扩大；并且加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其目的不是由于别的，而是妄图证明他们是管人的，而工农群众是为他们所管的，借此来为他们剥削压迫工农群众进行辩护，维护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动统治。

但是，克里姆林宫的权贵们越是强化和扩大人们之间的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就只能使他们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处于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从而进一步激起苏联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安娜·格奥尔基也夫娜、普隆恰托夫、切什可夫和他们的总代表勃列日涅夫之流是逃脱不了必然覆灭的命运的。